



麦克米伦回忆录

3

时来运转

商务印书馆

目 录

序.....	1
--------	---

第一篇 在职的最后几个月(1945年)

第一章 使命的终结.....	13
第二章 1945年大选	31

第二篇 在野党(1945—1951年)

第三章 议会人物志.....	47
第四章 工党的胜利和挫折.....	76
第五章 俄国的侵略.....	105
第六章 苏伊士以东.....	140
第七章 欧洲委员会.....	151
第八章 欧洲：联邦还是邦联.....	182
第九章 从帝国到联邦.....	220
第十章 保守党的复兴.....	266
第十一章 工党政府衰替史.....	302
第十二章 1951年大选	334

第三篇 再任公职(1951—1955年)

第十三章 造房.....	351
第十四章 在阵痛中的欧洲.....	433
第十五章 伟大的下院议员.....	456

第十六章	和平缔造者丘吉尔.....	485
第十七章	核阴影.....	530
第十八章	第一次最高级会议.....	552
第十九章	纷争的种子.....	598
第二十章	一项新的使命.....	653
附录(一)、(二)、(三)	664

序

1945年5月德国投降，一般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际终了。远东战役尚待结束，而且虽然英国对日作战的兵力殊非等闲，但在我们英国人眼中，绝大部分作战负担已落在美国盟军身上。当时无从知悉战争会在短短几个月内结束，更不可能料到会由于首次使用新的原子武器而加速其告终。关于这种新武器，即使是极其含糊的传说，当时我们也只有极少数人听到过。在搞出这种可怕的发明上，西方盟国侥幸万分地抢在德国人的前面。

一直如此长期地和专心一致地埋头于战时日常工作的绝大多数全国男女同胞，在那年春日的一片欢乐之中，很难料想和平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无论在海外或在国内，几乎所有男女老少都被吸收到战争机构中去工作，其动员程度非任何其他国家所能比拟。甚至在一向自夸效率高的德国，也决不能达到像英国那样的规模，来动员这么多男女的力量。因此除了少数人外，我们的目光都如此局限在眼前的事物上，以致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那种心情去瞻望远景。然而即使在战争年代里，随着岁月的推移，有些突出的问题已开始露头。当胜利来临，我们可有略多思考的机会时，这些问题就看得更清楚了。

人类为德国侵略和暴行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直到今日也难以想象。光是在欧洲就有一千二百五十万战士死去，而平民的死亡则达二千九百五十万这样一个骇人的数字，其中包括六百万犹太人，xii 占欧洲犹太人总数三分之二。此外尚有七百万男女老幼被奴役而受尽折磨。远东战场也同样有人力物力的损失，破坏遍及各地，

野蛮暴行惨不忍闻。这种仇恶和忿恨的鸿沟看来似乎很难弥合，然而，仅隔几年，昔日仇敌间的这种痛苦记忆已消融在比这更大的恐惧之中。共同危险这一纽带使他们结成了新的同盟关系。

同时国内也有许多可忧之事。大选显然是不能再拖下去了，而不管大选后产生什么样的政府——保守党的或工党的或联合政府——经济和财政的前景都是可怕的。除了维持残废和孤儿寡妇的费用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负担一直很重的养老金支出之外，我们还有新的债务和重税的负担。此外，英国独力抵挡希特勒进攻时所付出的巨大费用，显然意味着又要牺牲它的大部分国外投资。一面是内债——尽管它会破坏现存社会秩序，我国人民能够承担，也乐于承担，一面是严重的国外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几乎没有任何有形的或无形的出口，海外投资所得的收入又被剥夺，英国经济只是仗着租借法案才幸免于破产。现在有什么能代替租借法案呢？假如竟然有一笔慷慨的美国贷款来周济我们的燃眉之急，这也只是暂时减轻痛苦，过了头几年之后，反而增加付息还本的负担。根本问题仍未解决。

英国的工业曾经被无情地弄成适应于战时生产，而令人痛心
xiii 地不管牺牲多少出口贸易，并且往往采取独断专行的方法。现在我们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事实上，结果已经证明，我们的情况比我们的盟国和敌国都要糟糕。美国生产的巨大规模把他们的产量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已能轻而易举地把民用需要和一切军需结合起来。德国——其后是日本——的工业装备大都被毁，但不久在他们先前敌国的帮助之下，眼看着大部工业又重建起来。这样，他们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无需任何防务开支，又有现代化新工厂，战败国经过头几年的困难和混乱之后，便能在世界市场上与战胜国相抗衡了。

同时，第一次大战引起的社会变革显然加速了。甚至对那些

在战争后期拟订所谓“重建”计划的人来说，变革速率也超过了他们自信的预料。劳合·乔治在1918年许下“给英雄们安家”这一竞选诺言未能兑现。尽管那些对这一诺言的命运记忆犹新的人对前途持某种怀疑态度，然而人们仍都抱有一种希望，认为和平无论如何会带来进步，尽管可能出现各种困难和艰险。按照贝弗里奇计划，并靠社会主义经济或半社会主义经济支持的新乌托邦的前景，已经开始使一大部分平民和军人心向往往。其后不免有失望和迟误。然而怪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场社会革命，在经过一些犹豫和挫折之后，却注定要在前后几任保守党政府手里获得最大成就。所谓“富裕社会”这个口号，随批评者的兴趣和偏见，被当作一种恭维、诋毁或妒嫉的口号。

这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也随之带来不少问题，既有精神上的也有物质上的。但如今批评它的人，很少能认识到或记住当时它所克服的条件是多么严峻，并且往往是多么原始。

回想战后所面临的局势时，我们大部分人都认识到，这个可以称之为阶级社会的社会因第一次大战而引起的某种程度的部分解体过程，必然因第二次大战而大为加剧和加速。对财产和日常收入的高额税率，再加之所有人的习惯和愿望都已改变，这必然使城乡的社会结构根本改观，这些改变将影响到我们国民生活的每一方面。

同时，第二次大战也像第一次大战那样，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大步前进，特别是在专门技术方面。战争的迫切需要使许多研究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金钱，其规模不是和平时期的预算所能吃得消的。这是一个可悲的真实情况。在空气动力学和许多其他科学方面，进展特别迅速。即使今日，在西方各国和俄国，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工作都得归入防务名义之下。如所周知，英国工业面临着调整和现代化的巨大任务。它的成功表现在出口方面已经

取得巨大增长。它的失败或许是由于强烈的保守主义所造成的，特别是由于过时的种种限制和规章制度。但是，正如我们所预见的，我们高于一切的需要是，要靠有形的和无形的出口来赚得足够的钱，以支付我们的进口，并借以维持海外投资，而这海外投资虽会使支付平衡产生令人不安的压力，却是维持和发展岛国力量的一个传统的而且实际上是唯一的方法。

处在这么多的不定因素之中，我们不知道我们国防力量——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前途如何。在大战的较后阶段，我有时常和一些所接触的高级军官谈论这方面的问题。三军的相对作用如何，就是我们谈论和辩论的问题。我们深知，人口众多和具有巨大工业潜力的美国和俄国双方的力量，已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平衡。但是，也很显然，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转变中，飞机的发展成为另一重要因素。当海洋曾是唯一交通途径之时，土地小的海运国家居于领先地位。飞机很快成为交通工具，并产生了大陆强国。

在战争的最后几年，由于斗争中的领导权开始从我们手中转移出去，世界力量平衡已明显地起了变化。同样明显的是，旧的帝国和殖民体系虽曾在两次大战中一直坚持下来，现在也必须发生根本的甚至革命性的变化。

xv 二次大战的各个战场，标志了不列颠帝国英雄时代的终结。虽然，在非洲，在意大利，在法国，在远东，大批军队在英国人指挥下集结和作战。这些部队中不仅有出生于或祖先为英国和欧洲人的兵员，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南非等地的人，而且还有遍及全世界几乎所有大小殖民地的土著^①。然而我们意识到，这很可能是演了几个世纪的一出戏的最后一幕，尽管还是光辉灿烂的。尽管有丘吉尔本人强有力的手腕，在联合政府时已经和印度领袖们

① 参阅本回忆录第二卷《战争风暴》，原书第170页。

进行了商谈，但从商谈中已可明显看出他们将采取独立的重要步骤。印度带了头，其它殖民地也肯定要照办。甚至到了战争快结束时，虽然我们尚未预料旧体系的解体会来得那么快，但我们心里明白，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正确的。

更有甚者，虽然我们希望东方战争及早结束，但英国的声望，而且实际上是所有欧洲人的声望，已由于日军轻而易举地席卷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这一广大地区而大为下降。不幸的是，日军征服这些地区时，竟发生了英国军队前所未有的并且是大规模的投降。当时我们一有时间便多次谈论这些地区的前途。我们没有一个人还乐观地相信旧体系仍能原样不变地保存下来。即使我们不能明显看出事件的进程，我们也知道，它决不会还是老样子了。这种剧变太不寻常又太深邃，不能看作是一个插曲。

尽管英国出于最高尚的动机和最良好的意愿，准备把它的殖民和帝国的历史长河引向一条新的渠道，但无论在战时和战后，它总受到国内的自我批评和国外的诽谤。来自我们朋友和盟国的攻击也并非最留情的。美国人错误地拿他们自己的独立斗争来作比拟，出于无知和偏见，不能理解英国的意图和目的。与之相反，当英帝国的转变过程在进行之际（有人会说这转变太突然了，但无论如何它是不可避免的），俄罗斯帝国却正以惊人的步伐向各个方面扩张，一部分以直接吞并的方式，一部分是把各个毗邻的共产党国家置于莫斯科控制之下。当西方国家正迅速复员他们的部队时，在亚洲和中欧、东欧，苏联军队却巩固和扩展他们所占的地盘。

欧洲是怎样一种情况呢？德国被摧毁了——没有政府、军队、工业或财政机构，内部互相责怨并为举世所深恶痛绝。法国刚刚解放，政治和经济前途渺茫，工业被破坏或卷走，很多人力被遣送到德国去，财政混乱。意大利，遭受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的蠢行与灾难之后，有将近两年成为残酷战争的战场。比利时和荷兰不久

前才从征服者的残酷勒索下解放出来。欧洲一蹶不振，遍体鳞伤，鲜血流淌。经过这么多年的大难之后，还会不会再出现旧的——或者不管是什么样的——欧洲呢？根据战争年代的回忆，我知道，只有依靠长期的持续不断的美国援助才能使欧洲复苏。至于这种援助能够慷慨到什么程度，那只有到将来才能见分晓。同时，共产主义的阴影正开始降临所有这些国家，甚至包括西欧。

西欧的复兴很多方面要归功于几个美国伟大人物的先见之明，虽然其后许多有关的国家并不十分热心承认他们领受过这番恩情。然而，世事多乖，让俄国统治中欧和东欧的一大部分国家，美国的错误战略却应负其责。如果当时能让陆军元帅亚历山大执行他向丘吉尔提出的那些计划（而丘吉尔也曾向罗斯福坚决要求执行这些计划^①），那么斯大林及其军队在中、东欧的优势地位是可以阻挡和挫败的。因为如果不在法国南部作不必要的登陆（此举严重削弱了亚历山大的军队，而对该战场的胜负并不起相应的作用），如果美国人接受这个计划，迅即调军队通过卢布尔雅那山峡去占领维也纳，并确保今日共产主义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世界历史就会改观，因战争末年的事态发展而大受挫伤的西欧元气和力量，也许会有相应的充实。可惜时至今日，这一切说起来只不过是空自叹息而已。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我有几个月为这个重大问题伤脑筋。俄国要干什么？它受什么动机支配？这是六十四美元的问题。^②自然，我觉察到丘吉尔有预感。在1943年开罗会议上，他就看穿了。^③他认识到德国力量摧毁后，我们主要担心的是新的苏联威

① 《战争风暴》第十八章。

② 美国广播电台或电视台悬赏要儿童回答问题，六十四美元为最高奖，这里意指最重大的问题。——译注

③ 见本回忆录第一卷《风云变幻》，原书14页。

胁。在他眼里，苏联的威胁已经开始代替纳粹这个敌人。^①但美国人仍然怀着伙伴和亲善友好的心情；在重大的决策中，英国的影响已经开始下降。我没有忘记，我们在几个月前把希腊从共产党手中拯救出来时，美国人是悻然勉强同意的。^②当盟军还在波河和莱茵河一线时，由于俄国军队的迅速推进，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前途几乎没有希望，甚至奥地利也岌岌可危。南斯拉夫是在巴尔干半岛上最强有力和最有效的共产主义领袖的控制之下。我们当时不曾想到铁托的坚强性格会导致他最后脱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莫斯科的主宰而宣告独立。当时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是南斯拉夫民族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表现，这种扩张已经令人不安，甚至成为一种威胁。

在战争的末后几个月，丘吉尔因罗斯福无视于新的危险而日益焦虑。但是，这位总统和他的顾问一样，除了对德国作战外，很少想到别的事情。而且，罗斯福迫切要表明他并没有和英国盟友“结帮”（杜鲁门至少在起初也采取这种态度），他似乎准备抛弃同丘吉尔的长期交情，以赢得斯大林的微笑。在雅尔塔会议上，这位又瘦又弱的总统，不能应付面临的巨大问题，丘吉尔则感到自己处于日益孤立的地位。在他回国向下院保证他相信俄国能履行对波兰的诺言时，说这番话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但是，俄国的诺言马上显出有点靠不住，波兰的命运注定使人第一次幻想破灭，终于导致大同盟的破裂。然而在雅尔塔，斯大林表现友好姿态，对战后问题总的态度似乎是欢迎和希望维持英美苏的紧密合作的。当然，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俄国军队占领整个东德，柏林已在它的实际控制之下。但这一切都是按早先的协定办事的。这些在极不相同的情况下商定的不幸的协定，仍为英国和美国严格遵守，其结果却证明

①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六卷《胜利与悲剧》，伦敦，1954，第496页。

② 《战争风暴》，第二十一——二十三章。

是可悲的。

在卡索塔盟军总部时，我们日复一日地看到我们上级之间的意志冲突，我们意识到英国外交影响即使在丘吉尔的坚强领导下，也已在普遍下降了。日趋衰老的罗斯福，部分是出于软弱，部分是出于自负，竟以为他能使钢人（指斯大林——译者）听从他。俄国政治家是不能用甜言蜜语劝哄的，但他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可以在坦率和摆事实的基础上同他们打交道。在雅尔塔的决定中，尽管他们作了小小的让步，我们已经看到这里面蕴含着对波兰的可怕打击。我们不能指望俄国会遵守协议的文字和精神。我同在意大利作战的波军司令安德斯将军会谈多次后，使我相信，抱任何较多的希望只不过是痴人说梦。^①因此第二次大战后主导世界政治的东西方冲突显然要开始了。这种分歧仍然阻止对德和约的签订。它阻碍和破坏了联合国的工作，而关于建立联合国的商谈则在1945年春就着手进行了。本拟作为世界各国一种内阁的安理会（以联合国大会作为一种咨询议会）变得软弱无能。意识形态的分歧使世界秩序这个整个概念成为空谈。它甚至还把仍然分割的德国以及人口大于西欧和美国之和的中国排斥在外，不让他们成为联合国组织的成员。

战争结束时，这些困难就摆在我们面前了。我们只是隐约感到有危险。但我们由于对亚历山大那个雄心勃勃、富于想像力的计划不得实施而感到痛心，所以对这些危险也许有更多的体会。我从丘吉尔亲口所讲的话知道他对此感到惋惜和不安。让俄国力量扩张到西方如此之远，让德国分割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如果说美国人要对此负一定责任的话，那么他们以其可嘉的坚韧精神和理想主义所做的不少事情，却足以弥补这一可悲的错误。

^① 《战争风暴》第496、497、694—696页。

供养海外大军、外交上的支持、负起世代美国人前所未有的条约义务，所有这一切，都在以后几年里被美国人慷慨接受并严格执行。根据我在地中海战役中的经验，我欣幸英美合作的全面和真诚。别的一切也许会靠不住，但这个合作总是能保持的。

在国内、帝国内乃至整个世界的这一切变化的种子，事实上是第一次大战后就播下的。如今在第二次大战后它们要开花结果了。如果说我在1939年已经预感到未来事态发展的一些苗头，那么在1940年和其后的两年里，我们都为当时那个唯一的问题——争取生存的问题所缠绕而忘却其余一切了。尽管现代世界的困难那么大，如果没有英国成功地并且单独地抗击希特勒，不让他取得胜利，那困难将会更大。这一点并没有被那些受我们抗击之惠的国家所经常记住。但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当盟国已显然有胜利把握时（不管还得经过多久和多么艰苦的斗争），我们大家都知道，前途是黯淡而捉摸不定的。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动摇了旧的国内和国际体系，那么第二次大战就摧毁了各国对政治和经济独立的想法，而不管这些国家多么强大。孤立主义在美国和英国都死去了。有些人相信，各国慑于生命和财产的可怕损失，可能会接受像有效的联合国制度这种形式的世界政府。如果这个不成，那么至少可以创立和维持大片地区国家的结盟。在大战结束时，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危险将出现在那里，虽然这仅仅像是透过玻璃模糊地看到的。非洲和亚洲人民的民族主义必将以一阵激情迸发出来。共产党人的压力将难以抵挡。我们自己人民对更丰富生活的愿望和要求，也将是同样坚决的。

如果说亚历山大和我在德国投降后没有机会松一口气，那么我们至少免于尝受那种在巨大而激烈的斗争后所常有的心神索然之感。大风暴过去了。但在意大利前线乌云密布，预告将有新的危险。我们现在得要对付。

第一篇 在职的最后几个月

(1945 年)

第一章 使命的终结

1945年4月29日，意大利境内德军向陆军元帅亚历山大投降。5月8日，各战线德军全部投降。5月26日，我这个地中海战场的英国大臣、盟军最高司令政治顾问、意大利盟军军管会代理主席卸任了。这就结束了从1943年1月开始的一项使命。^①但是在最后几周里，我们得应付像前几年那样困难和棘手的一些问题。虽然我在这些问题解决以前就离开了，但曾在开始阶段参与其事。

在意大利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们深切关心北意的局势和大量武装游击队可能引起的威胁。这些地区处于墨索里尼傀儡共和国及其德国同伙的控制之下。一旦敌人被逐，谁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在德军撤退后，到盟军及其军政府进驻前的一段期间，会发生什么麻烦。我们大多数人对最近希腊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担心那里——至少在某些大城市里会发生一连串共产党的暴动。由盟军方面装备起来的大量游击队可能不愿意加入意大利军队，也不愿意退伍回家。为准备让他们复员已经做了精心安排。陆军元帅业已特别致函，向这些爱国部队表示敬佩和感谢。我们军政府的所有工作人员对情况充分知悉，准备采取行动。

结果一切比我们所预料的要顺利。5月的第一周在米兰和都灵举行了阅兵典礼，在阅兵式上我们对游击队的工作表示感谢，并且开始有人上交武器。这都说明我们做得相当成功。在西北和东北地区，因法国人不妥协和南斯拉夫的渗透，使游击队员难于脱离部队放下武器。在其它地区，虽在阅兵典礼时上交的肯定只是一部

^① 《战争风暴》，原书第219页。

分装备,但在紧接德国投降后的几周里,一般情况比我们所敢于希望的要好。尽管运输有困难,北方居民食物供应的安排进行顺利。在第五军和第八军的驻防区可以做到令人满意的口粮配给,而且收获季节已接近,也可使我们放手冒动用存粮之险。条件虽艰难,但还能忍受。虽然负责抵抗运动的国家解放委员会在多处设立一套地方行政组织,且其干部队伍中共产党人占优势这一点令人不安,但爱国战士接受现状以及北方居民在盟军领导下进入一种正常生活之迅速,说明他们干得很好。因此,我们一度深为耽心的北意局势,结果很易应付。不过,边界上的局势则是棘手而又危险的。

最高盟军司令官作为英、美政府的代理人,显然有责任把意大利边界保持得像战争开始时那样完整。边界的任何改动必须经过协商。那时我们相信,缔结全欧和约是现实的,并且是很快就可进行的。可是这些希望终于落空了,甚至对意的正式和约直到1947年2月才能缔结。但按上级指示我们是要根据这一原则办事的,而且这样做也符合我们的责任观念。诚然,这些边界,特别是东北边界,是为某些邻国并在某些地区为大多数居民所深恶的。但我们的立场是清楚的。任何争议应通过协商而不应使用武力来解决。同时,我们是处于托管者的地位。

第一次冲突发生于西北,特别是在瓦尔达奥斯塔。1943年9月休战以后,占领法国西南部的意大利军队自然解体。结果,法意边界两侧都有游击队活动,骚袭德军。意大利游击队和法国游击队保持着密切而友好的联系。因这些武装力量只能从法国或意大利领土上的盟军获得支援,所以我们对他们的一切活动一清二楚。^①

^① 哈里斯:《盟军在意大利的军管,1943—1945》,伦敦,1957,第317—318页。

1945年春，正规法军正在边界上迅速集结，意大利外交部长向盟军委员会提出一份正式备忘录，抗议这种行动。意大利政府怕法国企图吞并瓦尔达奥斯塔和旧边界东侧的其它某些领土。但只要战争还在进行，亚历山大有理由认为，如果法国军队能在边界的这一侧牵制几个德国师，那就有助于他打胜最后这一仗，因他目前兵力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因而大家同意让法国正规军按作战需要暂时越过边界。为使英美政府相信此举明智，我是颇费周折的，^①但我认为亚历山大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通过这种方法取得任何军事支持。当时没有任何理由设想德国击败后法军会不愿返回本国领土。但到时法国军队却没有回去。他们甚至超过所许十公里的范围。法方的干涉活动还不仅限于正常的军事占领方面，他们大力鼓动居民要求把当地划归法国，而且使用了许多不正当的方法来煽动这种运动。法国军队事实上已往东推进到都灵西面二十公里处，甚至到达利古里亚海滨的萨伏那。^②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克拉克将军的第五军到达这些地区之前发生的。当美国军队前进时，冲突似将不可避免。甚至在德国最后失败以前，艾森豪威尔将军手下指挥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的第六军团司令德弗斯将军，就曾命令法意边界上的法军司令朱安·杜瓦扬将军在军事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停止前进。5月7日，艾森豪威尔将军要求该地区的法军司令朱安将军对此发出坚决命令。拖了一些日子之后来了一封措词颇为强硬的回信。杜瓦扬声称，战斗行动现已结束，法国军队不再属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战略指挥范围之内。边界问题不再是一个军事问题，它必须由“外交方面”来处理。在有关政府未作出决定之前，他的军队将坚守原地。亚历山大在向联合参谋长陈述他对这一事态发展的意见时，明智地

① 《战争风暴》原书第690—691页。

② 哈里斯前书，第318页。

加上他的观点，说是如果英美政府要达到目的，就必须在巴黎采取坚决的行动。

亚历山大同时命令第五军尽速向前推进。不管是否有法军占领，盟方军政府都要在所有领土上建立起来，而且还要设立边界管理处。如有可能应该避免武装冲突。但必须施加压力。至于法国方面，最后决定显然要由戴高乐将军作出，对他的命令各地指挥官是坚决服从的。

战役结束后的几周里，这一争执使亚历山大和我日益增加麻烦。但是最后阶段直到我离开盟军总部以后才到来。5月末，杜瓦扬将军写给美国第四军团司令克里顿伯格将军一份令人不快甚至带威胁意味的信件说：

我奉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之命占领并管辖这片领土。这一使命同盟军在该一地区设立任何机构是不能相容的，我不得不加以反对。若坚持如此办理，将是一种不友好的、甚至是敌意的表现，而且将产生严重后果。^①

6月2日，又寄来一份更强硬的信件。亚历山大的反应是迅速和果断的。他建议联合参谋长应当下令要他“完成对意大利西北部的占领，并建立盟方军政府，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丘吉尔已吁请杜鲁门总统予以支持。但他无需敦促杜鲁门，因为杜鲁门对于这事早就感到愤慨。他给戴高乐送去一封私人信件，说是除非法军从意大利西北部撤退，否则就不再向法国人供应任何武器装备。这立即产生了应有的效果。戴高乐软下来了，声称法方从未打算以武力去反对美军进入1939年法意边界东侧法军所占领的那一小块地区。他派朱安到亚历山大的总部，“以最宽宏的和解精神”^②来研讨这件事。

① 哈里斯前书，第320页。

② 丘吉尔：《胜利与悲剧》，第494页。

最后,6月10日,协议达成:所有法国军队应于7月10日退到1939年的边界之后。这样,丘吉尔称之为“恼人的争执”告一结束。但它仍留下了令人不快的滋味。此外,这还使盟方军政府处于相当尴尬的地位,因为在这未定之际,解除皮德蒙特和利古里亚地区游击队武装的困难大为增加了。^①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法国人也和我们自己一样,有一切理由痛恨那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法国,也像英国一样,从背后被意大利捅过一刀。戴高乐可能觉得,正如1859年那样,法国为意大利的解放出了力,理应获得一些报酬。但这一次胜利主要是靠英、美兵力取得的,而英美既不要求赔偿,也不要求报酬。

有关意大利东北各省的斗争问题比这还要严重和危险。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领土上所得的好处,曾为乌迪内、威尼西亚·朱利亚和伊斯特拉地区的许多居民所深切痛恨。只是由于奥匈帝国的崩溃和意大利政府坚决要求取得那由于它抛弃了两个盟国而应得的代价,才使它的边界往东扩展到如此之远。伊斯特拉半岛上大部分是克罗特人。在乌迪内、威尼西亚·朱利亚,各民族是杂居的,部分是斯洛文人,部分是意大利人。城市里主要是意大利人,内地是斯洛文人。

早在1944年8月,我们已经碰上这个问题;当时亚力山大的前任威尔逊将军警告铁托,说是无论最后有什么样实现和平的解决办法,盟军在整个地区都需要有自己的军政府。随着战事的发展,很明显,南斯拉夫将在事实上占领大部分有争议的领土。亚历山大不仅觉察到政治上的危险,也深知军事上的困难。如把威尼西亚·朱利亚粗略地划分为两个势力范围,再加之对的里雅斯特城市和港口也许还有波拉港的控制,这就足以保证他有安全通向奥地利的交通线。但这样的暂时划分自然会对最后的主权问题产

^① 哈里斯前书,第321页。

生不利影响。另一项办法是让俄国参加进行联合占领，像在奥地利所安排的那样。

结果，经过同伦敦和华盛顿整整一冬的讨论之后，美国坚决反对任何别的解决办法，非要盟军全部占领不可。亚历山大早就切望和铁托直接谈判，但这不得不拖延了。他仍然感到联合参谋长回避了实质问题：怎样把铁托的部队从他们所占领的地区赶出去？最后决定亚历山大应会见铁托，和铁托进行总的谈判。但华盛顿仍要求在1939年属于意大利的所有地区建立盟军军政府，陆军元帅不得不把他的会谈局限为试探性的交谈。铁托表明，他只愿意让我们控制必要的交通线，并在保持该地区原有的或行将建立的南斯拉夫民政组织完整无损的条件下，允许盟军军政府在这些地区内行使职权。他也许愿意把这些民政组织置于盟军军政府之下。但是他根本不允许盟军军政府行使全部权力。他特别反对把伊斯特拉半岛包括在内。

几周过去了，铁托的游击队正在迅速地向前推进。在盟军总部，我们开始感到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占领我们所能占领的一切领土，包括的里雅斯特和波拉港；在尽可能大的领土上，建立盟军军政府，合适的话，通过地方团体（不论是意大利的或是南斯拉夫的）进行工作，同时通知铁托，整个地区内的任何武装力量都得归我们指挥。但联合参谋长对此并不满意。4月28日他们发出绝对必须遵守的命令，要求占领全地区并建立政权。并将要求俄国政府对铁托施加压力使之撤退。不过，在发生任何实际冲突之前，亚历山大应通知联合参谋长。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颇为不现实的做法。^①艾登也认为，这些命令不能执行，至少不能全部执行，并把这意见告知当时的新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

当我们的上级还在争论时，亚历山大决定尽快推进他的军队。

^① 《战争风暴》，原书第693—694页。

他于4月30日把占领的里雅斯特并确保交通线这一意图通知铁托。铁托的答复里也把自己的计划通知陆军元帅。他不能同意盟军或军政府进入伊松佐河以东。英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史蒂文森爵士担心一场冲突不可避免。但杜鲁门总统则变得焦虑起来，10 美国人不像以前那么强硬了。当时，丘吉尔断绝了所有军事供应，试图对铁托施加压力。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显然不是一种有效的办法，因为游击队的供应很好，不仅有来自英国的装备，而且还有从意大利人和德国人那里缴获的一切装备。

其次是要不要俄国人来插手的问题。总统对此是很热心的。艾登和我总的来说是反对的。史蒂文森在危机期间始终保持着令人钦佩的冷静态度，现在他相信，铁托并不希望把事做绝。还认为在铁托的声言中有虚张声势的因素。那些日子我们在卡塞塔天天都在讨论这问题。我把当时的形势记录如下：

不幸，美国人一开头采取了一种非常学究式的态度。他们认为我们必须占领并统治整个威尼西亚·朱利亚……去年2月陆军元帅会见铁托时，我想在划定双方军事分界线方面可能容易达成纯军事性的协定。那就是把阜姆和波拉给他，而把的里雅斯特给我们。这可以满足意大利舆论，使局面保持平静以待和平解决。我不敢说现在能否做到这样……目前，美国(通过国务院)要求全部占领。但国防部却不愿使用美国军队，而总统则开始感到震惊。除非我们非常小心从事，不然它将是另一个希腊。——照样又要我们来挑重担。①

我仍然切望我们总部和铁托直接达成纯军事性的协议。但是我开始担心可能为时已太晚：“美国和英国的政府还是那样没来指示，只是犹豫和缄默。”但是抢占的里雅斯特的那场竞赛我们至少并未落后。弗赖伯格将军率领他的新西兰部队接受了七千名德军的投

① 1945年5月5—6日，这些话引自我致妻几封家信，这些信实际上是一种日记，其后引自日记的话只注年、月、日。

降,并占领了码头和港口,而南斯拉夫人则取得市区。在抢占戈里
11 齐亚的同样竞赛中,我们能够使用属于第八军的一个美国师。这
是一件有价值的保证,因为否则的话又要由英国挑重担。

亚历山大虽然不安,却保持冷静。他一直坚定地说出他的意见:如果严格按照联合参谋长的命令执行,那就非用武力不可。但是我始终劝他若无我们两国政府签署的明确指示,切勿采取行动。现在从这混乱局面中泄露出一个可能有重要意义的消息。史蒂文森发自贝尔格莱德的报告说,南斯拉夫人似对获得俄国支持并没有完全把握。俄国要照顾许多别的地方。我们从罗马听到,苏联代表已经向意大利政府作出暗示,如果意大利承认华沙的波兰政府,苏联政府愿意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斡旋解决的里雅斯特问题。意大利也深切关注在波兰的十万名渴望返回家乡的被俘人员的命运。如果能设法让他们回来,那就会给意大利首相伊凡诺·博诺米增加声誉。同时,俄国人自己也认识到,东北边界问题会使意大利的共产党人处于很尴尬的地位。意大利不久将举行大选,许多人都认为共产党将是最强大的政党。然而,如果他们被反对派指责为在全意人民十分重视的问题上缺乏爱国主义,那么他们就将大为削弱。几年后贝文就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利用了这一情况。能不能把这种消息通过什么方式透露给南斯拉夫呢?

5月7日的局势没有变化:

竞赛仍在进行。现在没有出事故,但是即使在我们有部队的地方也不得不放弃建立盟军军政府的尝试。南斯拉夫用民政组织和军事组织控制了那些地方。(这一切多么像希腊呵!)^①

12 许多措辞尖锐的信件在亚历山大和铁托之间来往,每人都对对方的所作所为表示惊愕。铁托毫不隐瞒他的政治动机,声称威尼西亚·朱利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意大利强行吞并的。但是,

^① 1945年5月7日。

他同意亚历山大的建议,认为双方参谋长应当进行接触。于是5月8日摩根将军去贝尔格莱德,看看能做些什么。他是去建议签署一项临时军事协定的,把威尼西亚·朱利亚划分为两区,盟军军政府在西区,南斯拉夫在东区。波拉和的里雅斯特则必须由我们控制。亚历山大、摩根和我仔细讨论了他应该说些什么和应该使用什么论据。我们是在指示范围之外甚或违抗指示的情况下越权行动的,但我们现在对此有了一些经验。无论如何,事态的发展要求我们这样做。

问题确实是难办的:

英国和美国军队都不想为了让“意国佬”保有的里雅斯特而进行新的战斗。另一方面,完全退让则可能又成为一种对斯拉夫人的慕尼黑。^①

在这同时很难确切知道该向伦敦提出什么建议。在5月10日的总司令部会议上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但很少进展:

这种大型会议也像内阁会议那样,其主要目的是让每一个人知道目前事态并发表意见。寇克^②大使和麦克纳尼^③将军之间的长时间的争论是很说明问题的。国务院强烈反对铁托并要求采取强硬行动;国防部却温和得多,他们主要考虑的是远东。^④

我们已经收到铁托的反建议,它可以在交通方面满足我们眼前军事需要。但是陆军元帅认为这建议作为一个整体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他们是根据这种政治条件提出的,即伊松佐河以东的领土在事实上¹³和法律上都属南斯拉夫所有。作为交换条件,他提出的里雅斯特和交通线可以自由使用,并[对伊松佐以西]建立一种军事“共同管辖权”。他要

① 1945年5月9日。

② 亚历山大·寇克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并任地中海战区海空军司令政治顾问。

③ 陆军元帅亚历山大的美国副司令。

④ 1945年5月10日。

求其余地区应该归还,并将予以占领和统治。^①

我们决定告诉铁托,既然他提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事情就超出亚历山大的权限,而必须由有关政府来解决。同时我们的计划工作人员着手从军事上充分估计应有多少兵力才能把南斯拉夫部队完全赶出去。

摩根将军当天下午就回来,并对铁托的决心和坚强性格有深刻印象。可是史蒂文森仍然认为铁托不致于坚持要求而不惜一战。不幸,由于他的军队大部分都占了这些地区,如果动武责任就在我们的身上。大量电报不断地来往。在给联合参谋长的一封函电中,亚历山大加了一段话,这个我认为足以给华盛顿的老爷们敲警钟:

一旦和南斯拉夫作战,我必须知道我能够调用哪些师。如果你们能同美国、英国、新西兰、南非、印度、巴西、波兰和意大利各国政府商谈此事,我将深感鼓舞。^②

英国驻罗马大使诺埃尔·查尔斯先生开始为博诺米和他的政府担忧,认为他可能因此垮台。我劝他要重视另一方面的因素——共产党人在政治上的尴尬地位:

如果他把牌打好,他〔博诺米〕可以让意大利共产党人倒霉。他们处于进退维谷之中,应该让他们紧紧地困在那里。^③

14 我对英国的处境越来越感到不安。麦克纳尼将军除任副司令以外,还负责这一地区的所有美国部队,他十分坦白地告诉我,他受命不许他自己卷入南斯拉夫的纠纷。然而国务院却采取恰好相反的路线。

正当这时,新的困难产生了。南斯拉夫所要求和侵入的,不仅有意大利的领土,而且有奥地利的领土,包括斯图里亚和卡林提

^① 1945年5月10日。

^{②③} 1945年5月11日。

亚二处。英国外交部指示驻贝尔格莱德的史蒂文森，要求他们的军队撤退，因为这些地区已拟定为英国占领区。在这问题上，艾登想从俄国和美国政府方面得到支持。杜鲁门表示他在这两个问题上决心持坚定态度，于是丘吉尔开始对亚历山大施加更大的压力。

现在，主张采取坚定措施的函电开始在总统和首相之间交往。但我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相信丘吉尔固然一向愿意采取强硬行动，但美国人却会在紧要关头退缩。实际上美国人已经又开始松口了。总统在他5月12日的函件中，要求亚历山大必须取得“对的里雅斯特和波拉，对通过戈里齐亚和蒙法尔科内的交通线及其以东足够大的一片地区的完全的和绝对的控制，以确保交通”。但这话一点也不明确，从字面看，他已悄悄地放弃了对全部威尼西亚·朱利亚的占领，而且自然还放弃了对伊斯特拉的占领。

我立即致电丘吉尔，重复表示我的疑虑，并强调指出形势的变化：

感谢你让我看到总统5月12日的电报。这自然根本改变了我们在这里迄今所处的地位。5月10日，战区副司令麦克纳尼将军斩钉截铁地通知我们，他已接到特别指示不重复不许美国军队卷入南斯拉夫事务。麦克里里^①将军要把所率美军第八军第九十一师的一个营派到的里雅斯特去，还有一些困难。^②

尽管总统满口说什么决不向“武力、威胁或讹诈”屈服，他在最后函 15
电中对分界线所提出的迁就既成事实的安排和我们2月曾经很易于商妥的办法，同出一辙，但那在当时却被认为软弱无原则而遭到否决。我忍不住在给丘吉尔的复电中加上最后一段话：

你会记得总统所提出的路线，大致也就是陆军元帅亚历山大3月间

① 第八军司令。

② 1945年5月13日。

要和铁托商谈的路线，但当时由于美国反对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①

亚历山大曾建议我去北方看看真实情况如何。于是，我在5月12日一早带一名部属菲力普·布罗德离开卡塞塔。上午十点半我们到达特雷维索，麦克里里将军在那里迎接我们，此外来迎接的还有他的参谋长弗洛伊德，和军管部部长本森。麦克里里将军很担忧，又因消息闭塞颇有牢骚。因此，我原原本本向他介绍了情况，告诉他所有的问题和困难。他也告诉我他的处境：

胜利后这么快就到了这里，他们和他们的军队发现自己处在这样困难和棘手的局势中，自然要感到失望。他们不允许用武力去掌权。因此，他们只能坐在一旁，看着南斯拉夫人建立他们自己的地方政府，在他们已经渗入和仍在渗入的地区内强占一切公共建筑物，征募村民，征用食物和运输工具等。他们不仅实际控制伊松佐河以东的领土（在的里雅斯特的码头地区我们有一个旅，南斯拉夫则控制着市区），而且他们还使盟军军政府在河西的某些地区也不能进行工作。英国士兵也只能依靠他们（像伦敦的警察一样），而且他们的人比我们多得多。^②

我身边带着有关卷宗，把最近来自世界各国首都的函电给麦克里里将军看了。这至少从心理学的观点看来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它使将军和他的僚属开了眼界。

16 午饭后，我们（乘“蚊式飞机”）飞到蒙法尔科内附近的狭长地带，在那里一位老朋友哈丁将军来接我们，他以前任盟军总部的参谋长，现在指挥第八军团。他住在一所富丽堂皇的城堡中，有一个漂亮的花园，窗外美景如画。哈丁将军照例总是坚定、有信心和精力充沛的。他不喜欢他所处的地位，因为他的部队或多或少地处处得唯命是从。但他觉得，必要的话他能够在进行协商的几周内

① 1945年5月13日。

② 1945年5月12日。

维持这种不舒服的平衡。我在下午七点二十分回到第八军机场，感到这次访问至少在向战场上的司令官说明一切有关问题这一点是有好处的。

黄昏，我们驱车到威尼斯。当我们沿大运河下行，经过卡沙·德旺罗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宫殿，并在礼风（Salute）和海关大厦（这一切幸而完整无损）对面停车浏览，景色真是十分动人。

翌日，5月13日，星期日，我们飞到奥地利的克拉根福。

这一天舒服极了——在地面确实很热；在大约一万英尺的高空凉爽宜人。飞越阿尔卑斯山时看到的景色实在壮丽极了。亚平宁山脉比起这些悬崖峭壁间或披着雪衣的崇山峻岭来，简直像是不足道的小丘。^①

在克拉根福，我们有第五军团的凯特利将军和他的一些部属来接我们。克拉根福和附近地区是

一个美丽的阿尔派恩谷地，面积相当大，有湖泊等等，还有阿尔派恩枞木林场。进入南部的唯一通道，是经过菲拉赫和格拉茨的山间大道和曲折小路。既然进入奥地利这一地区的唯一实际交通线通过这些城镇所在的区域，而且最好由的里雅斯特而不是由威尼斯来管理，所以我们在奥地利占区的占领问题就和威尼西亚·朱利亚的占领问题有紧密联系。^②

南斯拉夫对卡林西亚省的一部分（虽还不是全部）提出领土要求。他们相信实际占领有十分之九的合法性，因此同我们抢着开进奥地利，正像他们同我们抢着开进威尼西亚·朱利亚一样。他们确在我们之后开到克拉根福，因此我们能够先占最好的楼房并在那里 17 布好岗哨，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员去守护每个地方。

南斯拉夫来了相当多的人，部分是正规军，部分是非正规军——并重施在威尼西亚·朱利亚的故技。我们贴上盟军军政府的布告，他们就撕下来换上他们自己的。他们征用、掠夺和逮捕所谓纳粹分子和法西

①② 1945年5月13日。

斯分子。我们只能无能为力地旁观着，因为我们现在的计划是不使用武力，不挑起事端。①

在抢占克拉根福及其周围地区的斗争中，我们用几个旅去对付三万到四万南斯拉夫人。但是还是有别的麻烦。

[凯特利将军]有近四十万已经投降和正在投降的德军待处理，这些德军尚未解除武装(除了坦克和枪以外)，他们必须被押送到某一地区，给以给养和营地，等等。在他的右翼，多尔布亨元帅的军队已经铺开到奥地利的拟定英占区，包括重镇和交通中心格拉茨。②

有相当多的保加利亚军和俄军在一起，这就增加了总的混乱。正在投降的德军中有大约四万名携带妻眷的哥萨克人和白俄罗斯人，俄军司令自然要求交出这些人，我们也别无他法，只得交出。其实，我们如果拒绝交出确也没有任何办法来处理他们。使我深为苦恼的是找不出什么别的办法。但我们至少从交换得到在该地区德军手中的约二千名英国战俘和伤员。我们也劝说俄国人立即释放他们，而不要按例把他们遣送敖德萨后再释放，那样要使他们受极大痛苦。

13 我们已经在克拉根福地区发现不少(我想超过一千)英国被俘人员(许多是伤病员)。我看着救护车把他们送到机场。他们将乘达科他式飞机飞到那不勒斯或南意的其他医院和兵营。③

难民中有好几千乌斯塔人或者奇特尼克斯人(反共的南斯拉夫人)，绝大多数带着妻儿，他们在铁托的前进部队到达以前惊恐万状地逃离他们的地区。他们之中

什么样的人都有，从那些为德国人所招募、武装并供养的斯洛文尼亚族、克罗地亚族和塞尔维亚族游击队员，直到那些由于他们是罗马天主教徒或是政治上的保守分子，或者由于多种原因而不同情革命的共产主义因而被认为是法西斯分子或纳粹分子的人。(这是一种很简单的公式，我发现有人企图在英国政治生活中也采用其变相形式。)④

①②③④ 1945年5月13日。

此行又使我深感战争所带来的混乱和痛苦。景象令人伤心；但要想使所有这些不幸的人减轻痛苦，我们却又无能为力。

当我在5月13日晚返抵卡塞塔时，我发现英美联合声明已签定并送交贝尔格莱德了。5月17日，铁托答复了这份通牒。实际上他只是重复申述他早已向摩根将军提出过的反建议。看来局势正在危险地朝着类似战争的状态发展。

亚历山大在几周以前，就担心使用武力会对他所属部队的士气产生不利影响：

在我们介入以前，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部队对于此事的想法。他们深为赞佩铁托的游击队，而且对游击队为自由而战的斗争寄予极大的同情。所以，在我们要求他们丢开共同敌人而同一个盟军作战之前，我们得非常谨慎才是。

但是，他现在(5月18日)相信，反南斯拉夫的情绪正日益增强。我们的部队不喜欢被人赶来赶去。见了他们认为不合理的行为而不能去干涉阻止，这种无所作为的状态不是他们所乐意的。经过19几次讨论之后，我们都觉得亚历山大应向联合参谋长发出新信号，表明他提到士气问题的真意所在。如果我们要想让我们的战士去全心全意地执行这项任务，那么除了别的任何事情之外，尚必须使他们知道这项任务为的是什么。英国广播公司和报纸的宣传工作必须做好。在英国(可能的话也在美国)不得有意见分歧。——如同关于希腊问题时那样，而且必须有绝对明确的指示，该使用什么兵力，可用的部队(不管是哪国的)有多少，都应说得明明白白。

5月18日，我接到一份电报，通知我返回伦敦。我于19日到达，并和首相一起在契克斯首相别墅度过周末。但是，虽然我们讨论了许多我很感兴趣的其他问题，这次聚会却没有使我主要关心的局势得到很大改善。5月22日，我又回到意大利。

当我在英国时，获得一些迹象表明南斯拉夫副总理卡达尔似

乎准备和解，并渴望在一定条件下举行谈判。因这些条件不能令人满意，所以杜鲁门就在丘吉尔赞同之下，给斯大林送去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知，要求他给予支持。斯大林的答复中，在关于最后解决领土纠纷问题上替南斯拉夫说话，并声称南斯拉夫军队从道义上讲有权占领从敌人那里解放出来的领土之后，提出一个不无裨益的建议：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公正解决办法是这样：南斯拉夫军队和在该地区工作的南斯拉夫的行政组织应留驻原地。同时在该地区要建立盟军最高司令部的监督和控制，并根据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和铁托元帅之间的相互协商，划定一条分界线。采纳这些建议后，伊斯特拉——的里雅斯特的行政管理问题也将会得到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

事实上，他建议划定一条分界线，这一解决办法美国人颇为赞成。

20 虽然在以后几天内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件，例如一个南斯拉夫师长对美国将军发出一些要他撤退军队的强横命令（予以愤然拒绝），还有在地方司令员之间含有类似敌意的交往函电，但我感到，有了斯大林的这封信，我们算是“飞越驼峰”，过了危险。

5月21日，南斯拉夫外交部送给英国和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一份通牒，在这份通牒里，他们像美国人那样，事实上又改变了以前的政策。现在，他们同意在所建议的分界线以西建立盟军军政府。他们提出了一定的条件，例如要求南斯拉夫军官参与军管并在该地区保留武装部队，虽然这些部队要归亚历山大统率。他们还要求，盟军军政府应通过当地业已建立的民政机关进行工作。无疑地，这是由于俄国政府在权衡许多互不相容的得失之后劝他们让步的结果。虽然按照他们目前提出的条件是不能接受的，但只用了不到三个星期的商谈问题便获得解决了。

按协议的最后形式，“摩尔根线以西的”整个威尼西亚·朱利亚地区以及波拉港归盟军最高司令管辖。此线以西的任何南斯拉

夫部队，除了将属亚历山大指挥的二千人外，都要撤退。协议明确规定盟军军政府将完全控制盟军所在地区，但可使用工作尚能胜任的任何民政机构。铁托应当不迟于6月12日从盟军区域撤退他的所有正规部队，并解除所有非正规部队的武装。协议还规定，南斯拉夫政府应将前所逮捕或押走的居民遣返盟军地区，并归还他们所没收和取走的一切财产。最后还声明以后分界线两边的最后归属并不受本协议的影响。^①

这协议是在6月9日签字的。说起来颇有讽刺意味，经过这一切危险、威胁而获致的解决办法，几乎同2月间便可以取得的解 21
决办法一模一样。但当时远在伦敦和华盛顿的政府不了解这个地区的困难和危险，就那么简单生硬地否定了我们的建议。

这个故事其后是这样结束的：盟军军政府在盟军地区一直统治到1947年签定对意和约，当时除的里雅斯特外把这些地区划归意大利。南斯拉夫所占地区以及波拉则并给南斯拉夫。但是的里雅斯特问题本身仍未解决，多年成为国际冲突和协商的对象。其后英美占领军几乎有十年之久仍留在那里；但是最后，在1954年10月，意大利和南斯拉夫都同意满足于原定分区，并且除了边界线有调整外，把这一地区分为两部的分界线很近似于以前军政府辖区的边界。然后西区盟军由意大利军队接防。

在我最近回英格兰时，丘吉尔曾经告诉我联合政府将告结束，并邀我在他所组的政府中担任一个职务。临行前，在罗马和那不勒斯都举行了多次告别。以后几天，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告别宴会中度过的。其中有一次是在卡塞塔宫我们的办公楼里举行的，被邀请的是在盟军总部或在许多广泛英美合作事业中帮助过我们的所

^① 哈里斯前书，342页。

有英、美人员。我们的所有部属，打字员、译电员和办事员等，也都参加了。亚历山大来得很早，而且一直留到结束，这给予大家以极大的欢乐。

第二天，5月25日一早，我飞往罗马，并于上午11点晋謁教皇庇护十二，向他告别，并于临走时接受他的一枚银质奖章。

自然，他深为担忧和伤心：未来似乎是黑暗的，但是，谁都不能不被他那圣洁而善良的心所感动。可怜的，孤寂的人物！^①

22 我也和盟军委员会的英方和美方同事们举行告别。在謁见翁伯托摄政王储向他告别之后，我拜访了意大利首相博诺米。

他怀疑能否在目前的危机下继续执政，但他并不绝望。无疑地，的里雅斯特事件对于意大利共产党是一个挫折。^②

5月26日我终于离开那里回到家中，与我同行的有约翰·温德姆，在这次新奇的经历中他自始至终都和我在一起；还有罗伯特·塞西尔，他是最近到我部下参加工作的。上午十点我们这个班子乘陆军元帅的达科他式飞机离开机场。

一场很顺利的送行，陆军元帅及许多英美军官都去机场。时间虽很急促，但我想我没有忘了向谁告别。约翰和罗伯特的工作都是出色的。^③

搞了这么长久和这么身不由主的一项任务之后，最后离别的情景颇使人黯然神伤。无论如何，这是一次无与伦比的经历。

这就是“地中海走马灯式的演出或从达尔兰到铁托”这一章书的结束。^④

①② 1945年5月25日。

③ 《战争风暴》，原书第705页。

④ 1945年5月26日。

第二章 1945 年大选

一旦参加党派斗争，丘吉尔就是个坚决而又足智多谋的战士。但是，象他那伟大的祖先马尔巴勒一样，他本质上不是一个党派人物。他一辈子忙于处理大事，最乐于在所有党派的联合下，或者至少是在集中温和派与中间派意见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第一次大战前，他同劳合·乔治和 F. E. 史密斯^①进行过试探性商谈，筹组中央政府，提出战备纲领以对付日益加深的德国威胁。这就必须对当时两大党之间争论得相当厉害的若干问题获得协商一致的解决。战后，他仍然忠于第二次联合，直到 1922 年，由于保守党的党员群众在著名的卡尔顿俱乐部集会上那次决定性的投票结果才破裂。^②他曾因自由贸易问题退出他早年矢忠的保守党而加入自由党，又在眼看到自由党因阿斯奎斯的追随者和劳合·乔治的支持者之间产生决裂而削弱与分崩离析之际，他又渐渐退回到保守党圈子里。1924 年他虽以“立宪派”的名义当选，却在鲍德温第二次组阁的政府中担任高职。从 1931 年组成国民政府他被排除在外以后，他同保守党的官僚阶层日益疏远。当德国侵略威胁的黑影再次投到欧洲大陆上的时候，他为重新武装和加强同以前盟国的联系而展开斗争。但当时他孤掌难鸣。在下院只有少数人拥护他，在全国缺乏任何有组织的支持，他的事业似乎注定要以挫折和失败而告终。1939 年第二次大战爆发之际，他参加张伯伦政府，矢 24 忠效劳直到该政府倒台为止。但是他的也正是全国的最得志的时

① 后来为伯肯黑德爵士。

② 《风云变幻》，原书第 128 页。

刻，却直到1940年5月才到来，那时他受万众欢呼作为真正的全国性领袖应召担任最高职位。他主持了英国历史上最大和最强有力的政府达五年之久。在分发给他的手下一切工作人员的青铜奖章上的铭文中，他理所当然把这届政府叫做“大联合政府”。

诚然，在1940年秋张伯伦去世后，他不顾大部分报刊和许多好心私友的劝告，接受了保守党领袖的地位。他没有忘记，劳合·乔治在其政治生涯后期之所以无能为力，乃是由于缺乏一个他所能掌握的有力的党。虽有那些人在危机时刻正当地称奉他为超乎各党派的全国性人物，丘吉尔却很机灵，并没有被这种奉承所蒙蔽。他知道，一旦舆情起了变化，长期以来治理英国的传统制度又会恢复。所以，象一个慎于用兵的将军那样，他觉得为应付将来而确保一块可靠基地乃是明智之举。但是，他内心里并不重视党派本身。象他的大多数同胞一样，他的感情部分是保守的，部分是激进的。他从未忘掉他父亲的志向和抱负。虽则伦道夫勋爵政治生涯的下场很悲惨，但儿子仍矢志于他父亲所倾心向往的主义。

因此，当战争接近结束时，虽然他承认必需有一个新的议会来代替将近十年前选出的议会，丘吉尔本能地感到莫如延期选举，继续让联合政府工作到完成它的任务时为止。否则的话，他也有在竞选后重组中央政府的打算。如果竞选结果是随便哪一个党都只有微弱的多数，那末，他的计划就可能是现实的。

早在1944年的夏秋，当时德国的失败显然在望，政府内外许多人士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开始转向未来的政治局势。连内阁大臣们也不能全神专注于联合政府的未竟之业上。重新建设问题和对付战后问题的各种分歧观点愈来愈多地盘旋在他们的脑子里。较为积极活动的党派领袖，如艾德礼和莫里森不会不想法振兴他们党的力量，他们在本届下院中的人数显然和作战士兵以及平民中的舆论不相称。比较活跃的工党左翼人士早就在开始鼓动，要求

有奉行社会主义政策的自由。还有，工党仍建立在各个工会的广泛基础上，这些工会的机构还完全保存着，战争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他们的影响，而保守党的政治组织几乎已烟消云散。所以，很明显，不管选举结果的胜负如何，它一定会增加工党在下院中的席位。1935年的选举是在非常不利于工党的条件下举行的，而且反映了工党队伍在鲍德温的灵活策略下陷于混乱的状态。因此月复一月，政府成员开始按党派分为不同的集团。用丘吉尔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已不是战友，而变成政敌了。”

1944年秋，不得不又一次用立法手续延长本届议会的寿命。那时普遍认为，虽然对德作战至迟可在1945年春结束，但日本还要在希特勒完蛋之后十八个月光景才能打垮。在1944年10月31日提出必要的议案时，丘吉尔宣布，由于本届议会工作已延长十年之久，如果再把它的使用寿命延长到对德作战结束之后，那就是错误的了。他用这种话（我想他事后会反悔的）没有必要地或者过于拘谨地束缚了自己的手脚。让联合政府继续工作到打败日本之时并非毫无理由；而且正如丘吉尔自己所指出的，有可能在此期间制定一个有抱负的一致的政纲，以谋求改革和社会进步。即使在战争的紧张压力下，这方面也已经采取了一些初步行动。政府已 26 通过贝弗里奇计划和关于全民就业的白皮书以及其他多方面的政策声明，把各种无所不包的计划广泛地公之于众。丘吉尔自然会希望他能主持执行这些计划。他在秋季演说中坦率指出他对联合政府非常满意：“我在下院服务四十二年，从未见过任何政府能使我给予更忠诚、更信赖和更坚定的支持。”然而，他把议会寿命限于对德作战时期的那番话，已经记录在案不可抹掉了。

我在5月间短期访问首相别墅契克斯，就发现对这个问题比对我所关心的威尼西亚·朱利亚问题讨论得多。这头一夜与会的人很少，只有丘吉尔、彻韦尔爵士和我，还有一位私人秘书科尔

维尔：

席间谈了不少事，主要关于国内政治形势。首相已致函艾德礼，提出联合政府应工作到对日战争之后。如有必要，对应否延长议会寿命的问题可以举行公民投票。他拿出这封信并读给大家听……^①

那时丘吉尔相信艾德礼和贝文——特别是后者——能够而且愿意使这个计划在工党年会上获得通过，我并没有抱这样的希望：

我不相信它。工党对贝文比对丘吉尔还要不放心。当我两天后回到契克斯时，艾德礼的答复已经来了：

首相关于延长联合政府的建议已被拒绝。自然，他们需要10月大选，但是在那以前很难进行工作，因为事实上政府已经解散。艾德礼信中答复的语气不必要地辛辣甚至刺耳，丘吉尔感到恼火。那封信是在晚餐时送到的……^②

当晚大部分时间花在反复起草首相致艾德礼的复信上，这项工作我们一起参与了。

- 27 艾德礼在拒绝丘吉尔关于合作到对日战争终结的那个答复中，提出了一个反建议，其中表明他们只准备合作到10月。丘吉尔仍然相信对日战争至少还要花十八个月，故为此深感失望。另一办法是立即举行大选，这是保守党头头们所极力主张的。这比搞五个月令人不安的竞选运动要好一些。从6月到10月，这个时间太短促，不能用立法手续在国内战线上完成什么实际工作；但是，它使大臣们、议员们，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全国一星期比一星期厉害地处于一种紧张的政治空气之中，那为时又未免太长了。丘吉尔认为如果必须在1945年举行选举，那就越快越好。他这个决定，除了根据敌对政治组织的现状为党的利益着想之外，无疑是正确的。

① 1945年5月19日。

② 1945年5月21日。

十分出乎意外地，日本在 1945 年 8 月那么早垮台了。这使得整个争论回顾起来都成为不必要和无的放矢了。艾德礼自然要抱怨我们在搞突击选举，对此，丘吉尔也理所当然地回答他不仅不搞突击选举，而且除了在解散议会和投票之间给予正常的二十天时间之外，还提前三星期给予通知。

一党执政的政府在临近选举的前夕要想进行有效的工作已经足够困难，对于一个联合政府来说要这样做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何况国内外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都要求作出毅然决然的决定。这只有相信自己有权力并能获得议会多数全力支持的一个政府才能如此。所以自然要熬过一段尴尬的时期。5 月 23 日丘吉尔代表他自己和政府向英王递交辞呈。由于保守党比其他各党议席的总和多一百八十席，所以丘吉尔受命组织一个新政府。新政府的成员虽主要是保守党人，但首相留用了如安德森爵士，莱瑟斯勋爵，邓肯爵士，伍尔顿爵士，格里格爵士，索尔特爵士和彻韦尔爵士这样一些没有政党色彩的人士，以使新政府尽量少带党派气味。格威林·28 劳合·乔治也留下来，还有其他一些具有强烈自由党传统的人士，如恩内斯特·布朗、马贝恩和霍尔—贝利沙。所以继大联合政府之后的并非是一个纯托利党的政府。不幸，它马上被人戴上“看守政府”这顶泄气的帽子。

当我在契克斯时，丘吉尔提议我担任劳工大臣，但是我说，我认为过去两三年来太脱离政治，不宜担任这个职务。但我听他决定。结果，我当了空军部的国务大臣。内阁任命名单正好是我撒手离开意大利那一天发出的。

常有人说丘吉尔是在比弗布鲁克和布伦丹·布雷肯的高压下才坚决主张放弃联合政府、组成主要是保守党人的政府并立即解散议会的。但莫里森清楚知道，在击败德国后不可能有延长联合政府的问题。诚然，他书中提到过贝文站在丘吉尔一边，而且在工

党执委会上公开赞成丘吉尔的计划。^①但艾德礼和莫里森是容易按他们自己的意旨办事的。当然丘吉尔从未放弃过延长联合政府的念头。那是他确实想要并且衷心认为对国家更有利(而事实上也许确会更有利)的事。但一旦那个计划被拒绝,他的亲信要求他及早举行大选也是正确的。任何其他途径都将证明是难以忍受和行不通的。

虽然投票在7月5日就举行,但投票结果一直要到26日才能公布,因为计算部队人员的票数有困难。因此我这个新职的任期延长了两个月,而其大部分时间是搞选举活动。除了日常行政工作外,想做其他工作显然是不可能的,也确实是不合适的。由于我在地中海战役过程中和空军有过多次接触,我发现自己担任这个职务很顺利。我能负责这样一个大部并管理这样一个堂堂的军种,确使我引以为荣。但是在长远计划方面却没有什麼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我去驻德空军进行了一次有趣而愉快的访问,并重晤许多旧交。我受到他们司令员空军元帅科宁厄姆的盛情招待。我回国途经巴黎时也得以了解艾森豪威尔和特德的一些事情。

但这八个星期却是一个不愉快的插曲。我感到自己在国内几乎成了一个异乡人,而且我已经好久没有考虑狭义的政治问题,故颇有莫知所措之感。我有两年半时间专心致力于军需供应部和殖民事务部的日常紧急工作。此后,在北非、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同那些在新的和前所未有的情况下出现的困难和曲折的问题,又打了两年半时间的交道,经历过奇奇怪怪的斗争和激动人心的场面。即使在最近几个月里,我既无时间也无兴致去阅读那些关于重建计划的政府白皮书。那些开始在国内讨论的政治问题和酝

^① 兰贝思·莫里森勋爵:《赫伯特·莫里森:自传》,伦敦,1960,第234—235页。

酿中的竞选活动的气氛，对我很少影响。当我成为新政府的一员时，我颇感乏味和无能为力。首相到波茨坦处理重大问题去了，关于这些我们仅仅听到一些远方的偶然的传闻。内阁会议很少开，开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我们知道我们确实是“看守者”，而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地看好房屋，直到合法选出的住户（不论是谁）回来行使他的权力时为止。

但报界总的认为政府还不错，并且一般占上风的想法认为保守党将以大约三十到五十议席之间的微小多数重新执政。甚至工党领袖们也没有预料到实际选举结果会那么一边倒。我离开国家如此之久，当然不可能有任何见解。我离意大利前不久，曾接到外交部的请求，要我预测关于决定君主政体前途的意大利公民投票可能有什么结果。我答复说如果外交部能告诉我下次国内大选谁 30 能胜利，我也愿尽力之所能对意大利的公众舆论试作类似的预言。我没有得到答复。

当我在意大利时，我收到很吸引人的一份邀请，要我放弃斯托克顿而改任绝对可靠的威斯敏斯特的圣乔治区议席。这个向我讨好的建议是有关委员会里一致同意提出的。但我还是根据五年前在希钦所考虑的那些理由作出了我的决定。况且，因被投票人抛弃而另谋议席是一码事。这是我在1929年的处境，当时我有一切理由去另觅选区。但即使在当时，我反复思量之后决定仍回到我的老相好那里。这样做曾经获得成功；1931年我重新当选，于1935年又当选。而未经逐鹿就放弃斯托克顿，那又完全是另一码事。我无需多经考虑便下了决心。于是，我写信给圣乔治区保守党协会的主席，向他致谢但拒绝邀请。这个决定于4月26日正式宣布，同一天，我给斯托克顿保守党组织送去一封在会上宣读的信，说明如果符合我在斯托克顿和索恩比朋友们的愿望的话，那么当时机来到时，我将以自己再度参与竞选为荣。但同时我必

须守在海外的岗位上。

虽然在我作出决定的时候，我还没有预见到倒向工党的势头之大，但我自己心中却怀疑我个人是否能获胜。我已被迫不关心我的选区有五年之久了。虽然所有必要的通信和个别选民的种种要求都由我的秘书并在我的议员同僚帮助之下加以处理，但即使当我在伦敦时，我也很少访问斯托克顿。最近二年半我在海外时，我只有一次设法去过当地。我的妻子辛勤工作，热情待人一如既往。但一个议员长期不露面，即使是由于公务，也是不会被人理解或原谅的。加之，我们的地方组织在动乱的战争年代几乎完全消
31 失了。然而，我是那么热爱东北滨海地区，所以我想无论如何也要等到人家把我撵走才放弃。我不愿当逃兵。

当竞选活动认真搞起来之后，我就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三星期竞选战斗平静过去了，平静得太过头了。我演讲时来听的人不少，但会开得平淡乏味。这是我在选区里的第六次竞选，从中我得到这样的经验，当我的对手有胜利把握时，他们就对我特别客气而且给面子。提问题不多，打断我讲话的几乎没有。然而，当他们开始觉得他们可能落选，或者当他们在选举过程中开始面临失败的时候，气氛就改变了。会上变得吵吵嚷嚷气势汹汹。在那种情况下，除了回答一连串的问题之外，演说往往是不可能进行的。双方激情愈来愈高，支持者的游行队伍走上街头，使人产生一种兴奋的感觉。因为无线电还很少利用，电视又完全没有，所以在通常的选区中，当地竞选不受外界干扰。但颇为不可思议的是，倒向左派或倒向右派的情绪波动在全国却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尽力之所能把竞选斗争进行到底，但是我很少有成功的希望。许多人相信，丘吉尔在电台上的第一次广播讲话是使我们走向不利的一个转折点。这个演说肯定是偏激而欠斟酌的。他预言，如果社会党人胜利，我们的全部生活就会愈来愈受控制。他把

社会主义在英国的最后实现描写成具有盖世太保式的政治特色。但是，使用这样可怕的字眼来描写他的政敌是一个痛心的错误。而且，对过去五年来同自己十分和睦地工作过的同事——持温和派意见的一些人如艾德礼、莫里森而尤其是贝文——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这很容易被人嗤为悖理。自然，如果冷静而仔细地研究这段话，那它的意义是很清楚的。丘吉尔只是说，一套控制国家的办法，如果在包括若干年的一段时期内日益无情地加紧推行，那么他相信其结果会变成什么样子。丘吉尔对拉斯基教授的一些愚蠢的说法印象很深。（拉斯基在工党执行委员会中虽有重要地位，但未为任何工党政客头子所重视。）他读了海克教授的《走向农奴制之路》一书后更加强了他的忧虑。于是，他便以他那一贯的渲染手法把未来描写成许多人眼中视为荒谬的情景。后代人是否觉得他的话就那么过分夸张，这也许是可以怀疑的。但当时普通老百姓听了却又震惊又生气。我不相信，这次偶然事件对竞选的成败会有什么决定意义。按照我的看法，那次选举在它开始以前我们就失败了。

丘吉尔被他在千里竞选旅行中受到的热情欢迎所鼓舞。大量的人群成批地出来看他，向他欢呼，他们从战争开始以来就很难亲自见到他，只从那些有名的广播中听到过他的声音，使他们在危难中有所依靠，在胜利时有所鼓舞。他们想对他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表示感激之情；这在所有人都是真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希望他和他的托利党同事们来领导他们在未来岁月中的生活。不管是平民还是战士，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都相信这样的说法：战争结束后，就会自动出现一种乌托邦。英国人民将在他们自己领袖的领导下毫不费力地进入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国家，这将在普遍和平的世界中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他们也没有忘记或容许他们自己忘记战前的年代。这时出版并流传了大量的小册子

和书籍，攻击“慕尼黑的一些罪人”。1945年大选中失败的不是丘吉尔，而是张伯伦的幽灵。

选举从开始到结束场面一直都是平淡的。不象往常那样，在投票当天下午十一点和午夜之间，向在高街的欢呼群众公告选举结果，而今我们不得不等候三周。那时，候选人在他们的少数朋友陪同之下，在下午去到市政厅听取选举结果。没有群众，没有热情，只是一种枯燥的例行公事。

至少就我的情形说票数是决定了的。我怎么也无法改变这个
33 结果。我的工党对手切特温德是一位风度出众的青年，他曾在陆军教导团服务，为选民所熟知。他轻易地取胜了，得到八千六百六十四张多数的选票。（意外地，我的儿子莫里斯在西翰同伊曼纽尔·欣韦尔作毫无希望的竞选，相对地说却比我们大多数人搞得更好一些。）我妻和我感到泄气，但未感惊异。我们象往常那样乘夜车回到伦敦。无论如何，我的竞选记录是胜负各半的。在二十二年的过程中，我有六次在斯托克顿竞选，三次胜利三次失败。由此我根据观察得到这样的经验，谁要是在选举中失败了，就会怀疑那基于公民普选权的制度有什么价值。“光数人头！就凭这种办法来选出一个伟大帝国的政府！”但是谁要是胜利了，感想就完全不同。胜利的候选人会这样说，“我一直相信，英国人民心里是明白的。”总之各说各的理，这就是政治生活。

翌日，内阁在唐宁街十号开会——一项颇为沮丧的事务。工党议员在旧议会里有一百六十六席，现在有了三百九十三席。保守党则从三百九十八席降到二百一十三席。工党的胜利确实是压倒优势。这是无可原谅的，也是用不着秋后算账的。丘吉尔似乎被这次打击弄得有些迷乱，但他没有说出一句埋怨的话来。我觉得他无负于党。并非由于他我们才失败的。而倒是我们有点想抓住他的衣袍过此难关。对于未来，我们只能等待事态变化。丘吉

尔自己回忆起他妻子安慰他的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丘吉尔答道：“此刻我是但感失马未知其福。”^①不久，我开始感到丘吉尔夫人的话是对的。紧接着战后的年月是国内财经困难和国外危机四伏的时期。也许英国人民凭他们可靠的直觉认为让一个左派政府来管理这两方面的事务较为明智。就对付苏联威胁来说，确定让贝文掌外交部而不是掌财政部这最后一分钟的变化，真是多亏老天爷保佑的事。他将会感到失望，但他将坚定应付。斯大林肯定看不起那在他心目中必然认为是粉红色类型的社会主义。而贝文也是吓不倒的。如果说其后几年工党在其他方面犯了许多错误，那么他们所作的某些改革则是不可能也不应该予以扭转的。同时，选举人也获得许多有益的教训。对付国家的困难，他们不久就准备采纳较多实用主义而较少教条主义的解决办法。

丧失议席，对我个人自然是一个打击，更有甚者是因为这显然将终结我与东北滨海区的长期联系。我妻和我都同各行各业的许多人建立了真诚的友谊，而且对北方工业地区确有感情。我认真考虑过是否应另觅席位，或者接受现状并把我的未来活动限制在和我长期有联系的祖传企业上。我已经五十一岁了，对战前的党派政治没有很愉快的回忆。在战争时期，我有幸能在伟大事业中起了小小但并非微不足道的作用。若为求稳妥和图个人安逸，我似乎应该“功成身退”了。但我旋即回想起战前和战时种种新奇的经历，以及第一次大战后促使我厕身政界的那些激情。于是我又下决心尽可能干下去。我觉得当时的问题多得惊人，但也错综复杂地吸引人。工党虽获得几乎是空前多数的议席，但这种状态似不可能保持到一届或至多两届议会期以上。我也许仍有机会从事公务。对于这个决定，丘吉尔给我以鼓励，嘲笑我的踌躇，而他自己则以七十高龄满怀信心地开始其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幕。

^① 丘吉尔：《胜利与悲剧》，第 58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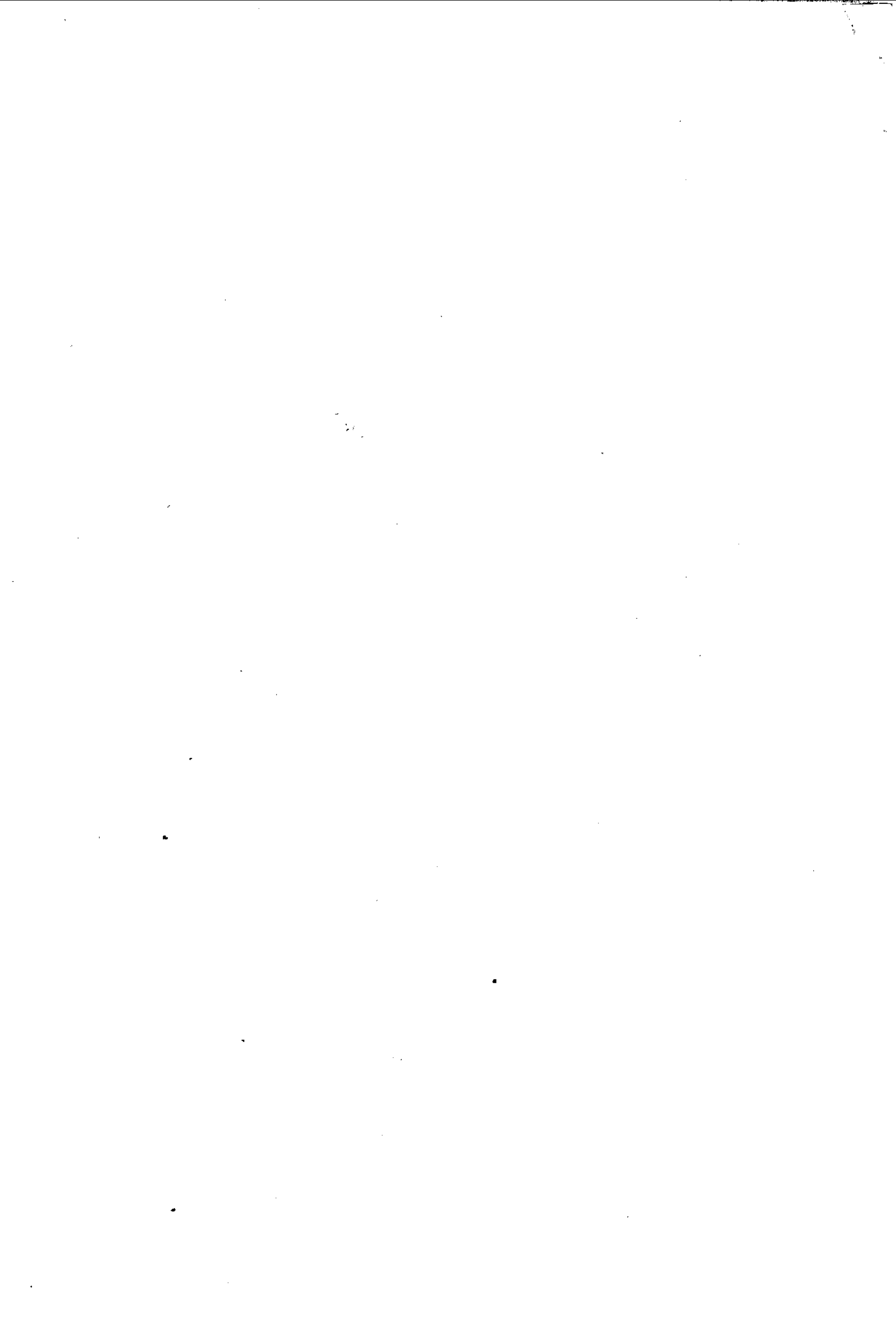
于是，在丘吉尔和保守党中央办公厅的帮助下，我被提名补到一个席位上去，这席位是由于一个新当选议员的死去而突然地令人伤心地空出来的。这是布朗利、贝克纳姆和彭格选区，曾经长期由爱德华·坎贝尔爵士所代表。虽然他的多数已经从1935年的二万七千九百四十一票降到只有六千二百五十九票，并由于总的而且显然还在继续向左摆的趋势，不能认为这个议席是绝对有把握的，但这是我所能获得的最好一个机会了。地方委员会正在寻找一名后继者。经过一番奔走营谋并由于伦道夫·丘吉尔慷慨退出名单而让位于我之后，我于8月底被正式提名为未来候选人。由于党的地方组织仍很弱，我们觉得莫如到当年晚些时候再去申请较为明智。接着是几个月艰苦的准备工作。在我妻的帮助之下，我们开始交新朋友并处处获得盛情的接待。但这是与前大不相同的一个选区，因而我们觉得使自己适应有些困难。这个选区又很大，除布朗利外还包括贝克纳姆和彭格。在下次大选以前，这选区产生两个席位，布朗利的面积和选民人数变小了，从而也容易处理了。

补缺选举到来时工作颇为紧张。我决定毫无愧色地坚持我战前的观点，并散发根据“中间道路”和战前其它文章写成的一本小册子作为我的竞选演词。这无疑使选民们不太理解，但是我认为也使他们对我有一定印象。唯一不寻常的事是丘吉尔从恰特韦尔来访问一次，这是我深为感激的。他驱车来到我的总部，简短地讲了话。在他周游选区时，他受到暴风雨般的热情欢呼。当投票结果公布时，得票的情况和大选结果差不多。爱德华·坎贝尔爵士当时得二万六千一百〇八票，我得到的票数几乎相同——二万六千三百六十七。自由党和工党的票数分布情况多少有所不同，一大部分自由党人显然弃了权。因此我所占的多数比爱德华爵士少七百票，但是有五千五百五十七票这个数字也就颇能令人满意了。

当我于 11 月 20 日到下议院就座时，我并非（按一般惯例）由督导员来介绍，而是由前卫生大臣哈里·威林克和前邮政大臣哈里·克鲁克香克来介绍入座的。他们二人都是我在伊顿的同学，同年被选送大学，而且都是素所尊重的朋友。这是重复了五年前克鲁克香克和我对威林克采用的那套办法。我不相信以前有过这样的事：三个伊顿的同年同学同时当前后两届议会的议员和两届政府的成员。所以，我们认为应当采取这种姿态来庆贺这种不平常的事件。 36

工党议员占压倒多数的下院开会时，我自然见不到以前那种动荡纷争的场面了。毫不足怪，他们如此热情地相信，他们将当权二十年或更久。毫不足怪，他们会热情洋溢地高唱“红旗”歌。毫不足怪，新大臣之一会得意洋洋地宣称：“现在我们是主人了。”

议会内外我党的一些年轻党员，于失败后照例互相责怨，而且似乎深恐这新的下院将结束议会政府的寿命。但是一些老手，自然包括我们那个有经验的领袖在内，却看得比较清楚。“上去的必定要下来”，或者引用坎宁的名言：“我不怕下院中的火把。当它们落到地板上时，他们就发出嘶嘶声熄灭了。”



第二篇 在野党

(1945—1951 年)

第三章 议会人物志

迪斯雷利在 1868 年紧接着保守党的失败，卸去他的第一次短促的首相之职后写道：“世间很少有比竞选失败的政党更令人丧气的了。”他当然有充分根据体会每个反对党领袖所面临的失望和苦恼。因为，除去两次短暂的间隔，他一生有二十年以上的时间花在这项倒霉的任务上。这个在他那一世纪里唯一有天才的政治家直到晚年才获得真正的权力，而那时他已太老，既不能充分享受又不能充分行使这种权力，这确实是一个悲剧。

丘吉尔却不一样。虽然他担任这一新角色时年已七十，却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能以满意的心情，回顾他那辛劳而光辉的、举世无双的五年首相任期。选举失败了，他仍然是投票人心目中该登上首相之位的人。虽然继续支持丘吉尔的只占选举人数的五分之一，可是这一政治上的惨败并不是对他个人的谴责。在整个竞选过程中，自由党，无党派候选人，甚至工党的候选人都力求把自己打扮成敬仰他的人。如果他们攻击保守党，他们往往觉得未始不可以引用丘吉尔战前的言论。几乎可以肯定说，如果是总统制的选举，丘吉尔将会胜利地重新掌权。据说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有人对选举人说他们可以投自由党和工党候选人的票，而丝毫不会影响丘吉尔继续当首相。至少，我们在刚遭失败时的失望之余正是试图用这种说法去安慰他的。然而，当我重进下院之时，丘吉尔已经开始安心执行他的新任务了。

当反对派还有一种不好受的味道，就是总有一种劳而无功的 40 感觉，特别是对于那些曾经身居高官、乐于肩负重任而好揽权的人

更是如此。迪斯雷利在受到类似的挫折之后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以卵击石既不光彩也无用处。”所以，他认为反对党的本分应当是“寡言和沉默”。他不轻易改变这种态度。反对党想要击败一个拥有大量多数议席的有力政府，在 1945 年并不比 1868 年更容易些。政府可能会逐步自趋灭亡；不过一方面固然得用相当力量进行议会斗争，但最后较量却在于全国大选。丘吉尔决心要争取重新当权，不管斗争将会多长多艰苦。在他离开唐宁街的时候，他在伦敦没有一个家。但不久，他卜居在海德公园门附近一所漂亮的房屋，在那里他一直住到去世。他买下了毗邻的房屋供他办公和秘书之用，而且不久就组成了一个气派很大的私人事务所，这是他不管在掌权或退位时照例都如此的。那里立即成为一个活动纷忙的场所。

当他卜居在海德公园门前的时候，丘吉尔经常向我们解释这是因为那里靠近下院。他似乎深恐我们会感到他之远住或许是一种政治上冷淡的表示。“我向你们保证”，他多次对我说，“我能够在十五分钟内赶到下院。”然而，像是为了弥补这一点散漫生活似的，在他宴请同僚或预料下院散会很晚或有特殊紧急事务的日子里，他就搬到他所谓的“前方总部”，这是萨沃饭店内的一套宽大而且肯定很费钱的房间。我相信，他觉得用这种姿态可以表示他更靠近战斗，而在设立威斯特敏斯特的“前方总部”和肯辛顿的“后方总部”相呼应这一点上，他仿照了亚历克斯（亚历山大爱称）或蒙蒂（蒙哥马利爱称）在沙漠战场上的做法。

41 当反对党领袖并不是丘吉尔唯一的和全神贯注的工作。他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有国际问题，主要是俄国与日俱增的威胁，这占据了绝大部分思想。他得计划和编写六大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前五卷在他于 1951 年重新执政之前事实上已经完成）。他要作画，要度假期，要用部分精力来恢复体力，因为即使像他那样强壮

的体格，在五年战争的可怕消耗之后，这种体力恢复也是必要的。但这还不足以妨碍他去从事一项全新的创举——（统一）欧洲运动，他是这一运动的策划者和倡议者之一。

在下院，丘吉尔的威望虽有动摇，却仍然很高。他并没有犯进行太多干涉的错误，不管是通过正式发言或提问。碰到他兴致发作时，他会不断插话，气势汹汹，有时使那些分不清伟大和夸大而且不了解丘吉尔性格中孩子气成分的人狼狈不堪。

每届议会的下院很快就形成它自己的特点。这特点很难言传，很微妙，但确有其事。如果政府方面要有效地操纵它或者对党方面要成功地适应它，就应该研究和理解它所特有的、与以前不同的风格。1945年的议会必定使丘吉尔觉得有点像1906年激进浪潮席卷一切时议会中的情况。工党议员因前所未料的胜利而感到得意忘形。从我们的观点看来，他们骄傲，自负，无礼而且心胸狭隘。从他们自己的观点看来，他们感到“扬眉吐气，充满献身精神，飘飘然，与命运偕行”。^①虽然最初那股热情在刻板的议会日常生活中，在那拖沓的办事作风中逐渐消磨掉了，但这是个有新气氛的下院，它不耐烦听人提起那传统的一套办事方式或议事方式。在这里按照旧议会风格发表的冗长的演说，纵然雄辩滔滔，也为听者所厌弃。而这种情绪还不仅限于执政党。丘吉尔起初感到自己难于适应这种改变了的情况。他时常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这些演说仅仅在几个月前，还会被人洗耳恭听鼓掌欢迎。有时说话的句子太长，甚至抨击或谴责的话太文雅，也不合会上听众的口味，因其中大部分人完全不习惯于议会中的老一套规矩。加之首相艾德礼说话很少超过二十分钟，声调低沉，说话简单近于平庸，而且还有点滑头，很易于为他的追随者所接受，并且也适合处理事务的

^① H. 多尔顿著《回忆录，1945—1960：高潮及其后》（伦敦，1962），第3页。

新精神。在举行不信任投票或反对党对政府作类似攻击的场合下，他常常设法在第一个发言人之后发言。丘吉尔总是用强有力的和雍容华贵的词句开始他的发言，那里面往往闪耀着一些新鲜的和发人深省的思想，不时流露出独具风格的幽默感。但是，他的演词过于拘谨周到，过于持重，尤其是过于冗长。当艾德礼起来回答时，他的讲话是意外地有力量，像小孩子发射几箭或掷出几块石子那样，一下子就把气球戳破了。在艾德礼那种非常务实而又平淡的回答下，那一整套丘吉尔式的伟大堆砌开始摇晃并垮台了。在艾德礼那冷静踏实的作风面前，富于想象的、浪漫的、堂皇的词藻黯然失色了。

有一次，当政府的声望仍然很高的时候，当那美丽的晨景还没有开始蒙上国内外困境的阴霾时，丘吉尔发表了一篇准备得很好的并广加宣扬的抨击演说，结果只是被艾德礼使用上述手法搁在一边（他的论点非但没有得到回答，简直是不受理睬）。当我们去到吸烟室走近丘吉尔常坐的桌旁时，有几位议员正围着他，我看到他情绪低落，为刚才所发生的情况所激怒和困惑。他认为，他作了一次漂亮的演说，而为此他花了不少心思和功夫。但是它没打响。艾德礼几乎没有说什么像样的话或流露什么感情，不知怎的就把他给制服了。这时，有个人头很熟但往往不甚机灵的我党议员走了过来。“丘吉尔先生，你是不是觉得艾德礼很了不起？他干得很出色？看他今天的发言，他真了不起。”丘吉尔粗声答道：“噢！你那么想。”“确实是的，首相——我的意思是说，丘吉尔先生，艾德礼搞得很出色。”“噢”，丘吉尔答道，“少校先生，（因这位坦率然而未免愚鲁的朋友曾有过那个军衔。）你读过梅特林克的书么？”“噢，没有，我没有读过梅特林克的书。”（说真的，我怀疑他是否曾听到过梅特林克的名字。）“好，如果你读一读梅特林克的书，”丘吉尔回答说，“你就会知道，如果用王浆喂蜜蜂幼虫，就可以把它变成一只蜂

王。”描写权力对人的影响没有比这句话更恰到好处了。丘吉尔开了怀。然而那位少校似乎却还莫明其妙。

在第二次大战前后，下院的组织和控制都没有象今天那么严密。这一表现在反对党的办事方式上最为突出。反对党领袖（往往是前任首相）有一群顾问，这批人自 1929 年后被报界命名为“影子内阁”。但它的成员并不象真的内阁成员那样委派一定的职位。这批人丘吉尔是按传统制度挑选出来的，因为他是最相信按先例办事的。这些人包括坐在反对党前座右边的枢密大臣。其他人，没有当枢密大臣的，丘吉尔逐步提拔；既然，在一开头，当我们这些落选的前大臣如布雷肯、理查德·劳和我开始回去以前，我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少，所以有一两个人从一开始就被邀去帮助工作。所有这些人每星期三都会集在反对党领袖的房间里，讨论当前的工作，并按此分配不同的任务。主要的成员，从下院来的有：艾登、奥利弗·斯坦利、奥利弗·利特尔顿、尔·埃·巴特勒、“谢克斯”·莫里森（后来当议长）、哈里·克鲁克香克、温特顿勋爵、拉尔夫·阿什顿、詹姆斯·斯图尔特、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和我；从上院来的有：索尔兹伯里、斯温顿和伍尔顿。此外，还有约翰·安德森爵士，他虽然因其长期出色的公务工作不愿意正式列名为保守党员，但一般也参加我们的会议。不过我们谁也没有被指定为“影子内阁”的哪个大臣。在处理主要议案的工作方面，不管是在二读和在委员会阶段以及在更一般的辩论场合，我们有些人总是集中研究一些特殊的问题。在外交事务上，安东尼·艾登自然在下院带头，而在上院则是索尔兹伯里。财政和经济问题由斯坦利、44 利特尔顿、巴特勒和我分担。但没有作严格的或专门的委派。这样就避免了“影子”交通大臣或“影子”邮政大臣这种不恰当的称号。工党在其 1951 到 1964 长期处于反对党地位时采取了新的做法，有时甚至还指定“影子”次官，这种做法后来保守党也沿用了。搞

这种形式有很大缺点。只有从反对党的席位上,才可能使议员们,包括前大臣们,对各式各样的议题发表意见。反对党所得的主要补偿是,它能够使个人在许多问题上得到锻炼,获得多方面的实践和经验。在掌权任职时,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就得限制在所掌那个部的圈子里。卸任之后,他们就可以行动自如不受拘束。这至少是丘吉尔的计划。他每两星期在萨沃饭店设盛宴招待我们(约共十四人)一次。更正式的星期三的集会有时就为这所代替,有时则紧接着这之后举行。自然,所谈的有时多半是刚过去的事而较少谈论关于即将到来的事;但是这些情景是令人难忘的,永远会被那些回忆这种情景的人所怀念,在那里我们可以领略我们敬爱领袖的天才谈吐和盛情招待。

然而也有一些牢骚话,鉴于我们的失败之惨,这些肯定也是意料中的事。有人抱怨丘吉尔在下院出席次数太少。他无疑认为无需在下院提问时每天出面干预或于每周末向全国发表一次声明。自然,那时还没有电视,而“现场”政治活动也还没有成为风气。还有人觉得他不了解下院情况,他的发言不再弹出时代的音调。但当他逐步使自己同下院的新精神合拍,当他向全国讲话特别是当他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发言时,他很易于重新树立他的力量和威望。有时,甚至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为他热中于同议长或同下院领袖赫伯特·莫里森作咬文嚼字之争而深感遗憾。不管他在这些交锋中是成功了还是(正如经常出现的那样)被人挫败了,他投入争吵的那股满怀热情的孩子气,使人不忍再非难他。他爱好正当的议会争吵。无论是在公开演说或私人会谈中,他的发言中总闪耀着意味深长的格言,这说明他是何等注意于借鉴古往以究今来。从许多方面讲,这位老人是我们之中最年青而又最能跟上时代的。

这些年中,在英国,在欧洲和在美国,丘吉尔仍然是一位形象高大的人物。他在议会的许多演说,特别是那些他最感兴趣的大

题目，有关欧洲、俄国和美国的演说，即使在他的反对者占多数的下院里，也能获得热情响应的听众，并在外面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外交事务方面，他虽有时在细节上对政府有所批评，但总是坚定支持贝文所竭力捍卫的主要政策。在经济和财政问题上，丘吉尔的插手就不那么令人钦佩了。他常以老派议会腔调发表一些漂亮的“痛击对方”的演说，从而大有助于重振下院内外的他的支持者的士气。但若剥去华丽的辞藻，这方面演说内容却往往是无创造性的，也是没有想象力的，同他在大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显然相形见绌。事实上，他在经济方面总的看法本质上还是他在维多利亚时代上学时所接受的那一套。他固然随时准备研究新的观念，而且大方地接受追随者的建议，但他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在财政、金融或经济政策上采纳新概念。他确实能够有力地批评因政府所采取或未曾采取的行动而造成的结果。但看来他对于探究祸害的病根或提出新的措施方面就不那么有办法了。很显然，他治国的主要药方是尽快把政府推翻，由他来组织一个新政府，把他能够找到的所有最有才干的人集合在他周围，并多少按照他解决战时问题的方式来处理和平时期的问题。尽管党内有一些批评，这位不屈不挠的老人还是这样继续沿着他的路稳步前进。到头来他会办成的。

在党内，艾登在议会内外都居于第二把手的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于这一点从来也没有任何怀疑，同僚中谁也没有任何企图要向他的地位挑战。这一切使大家都有良好的愿望和友好的合作。没有个人之间争雄的问题；一旦我党重新执政，两个最高职务已经决定好了。我们也不全都那么一心一意置身于政治生涯中，以致于念念不忘这些事。在六年的战争以后，尽可能在私生活上和娱乐上享受享受是使人十分惬意的。我个人的事情是满多的，因我得和我兄弟合营管理我们的出版事业，还要享受家庭天伦之乐和朋友的广泛交游。

从议会角度来看，我们是一个坚强的团体。除了必要时有丘吉尔这管重炮可供使用外，艾登是一个老练和巧妙的实干家，特别是善于总结一场辩论。就我所知，他是最精于此道的行家，是我从没有见过的。当需要他说话时，他常常说得合情合理，明智而且有节制。整个下院都非常注意地听他的讲话。有这样一种说法，说他仅仅在外事辩论的发言中闪耀光辉。事实上，他对于解决经济问题所作的贡献远比他那谦逊随和的态度所表现出来的要大。

在经济和财政问题上，奥利弗·斯坦利是我们之中无与伦比地最能干和最机敏的发言者。他从不把一件事情说得言过其实。他从不生气或心烦意乱。他能一针见血地击中要害，特别是击中对方的弱点。但在这方面他似乎也不能作很明确的创造性的带头发言。或许这不是反对党领袖们的职责，特别是在下院。但就一个在野而且代表人数很少的议会党团来说，在发挥它的有限的作用——进行高明而尖锐的批评方面，斯坦利是公认的能手。他是一个最擅于词令的议会演说家，他那机敏的词锋使下院的每个角落为之欢腾。我记起这样一个典型事例，说明他能轻松愉快地处置一项令人遗憾的事件。这种事件也像一切个人问题一样，对于尊
47 重议会传统，并对处于困难中的议员同僚怀同情心的不论是什么党派的人来说，都是不愉快的。这事出在一个不幸的大臣身上，他曾被奸人暗算，置于对某种坏事涉嫌的境地。所牵涉的问题必须送到法庭，由法官林斯基先生来裁决。报告提出后必须在下院进行辩论。案中那个主要歹徒把他原来那个颇不常见的姓名换成一个他无疑自以为更值得尊敬的姓氏而自称为斯坦利。我们让奥利弗·斯坦利代表我们对此事发言。这是个尴尬的问题，谁都感到不愉快。他明智地并不强调剖白，没有对这件不幸事故大做文章。政府方面自然对此感到紧张和焦虑。我记得奥利弗发言中对他们说，他很高兴，因为这位仁兄终于使他的姓氏能一度名噪全国。这

话使焦虑不安的下院为之欢腾，并解除了紧张不安的气氛。

斯坦利发言的弱点是，听众虽乐于听他那一连串的解颐妙语，但在他说到重要问题时使人迷惘，不能打动人。他那才华机智反而使他的论据减轻力量。但他是一位优秀的议员。他有点怯生和拘谨，这使有些人觉得他孤芳自赏，甚或高傲；但是他的朋友都热爱和尊敬他。可惜他于盛年身罹恶疾，经长期痛苦的卧病后于1950年去世。如果他还活着，他也许会在1951年被丘吉尔任命为财政大臣。这样，他将成为政府中权力最大的一员，因为他对公众生活经验之丰富仅次于艾登。在艾登病后，他无疑将继任首相。

巴特勒比起我们之中的一些人来语言不多，但却是言必有中。他的讲话受到政府议席方面的注意和尊重，因为他所说的往往是重要的，也经常是深刻的。但他把大部分时间放在重建党的哲学方面，主要负责党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动。

奥利弗·利特尔顿虽因进下院太晚没有学到真正的议会风度，但他在谘询工作中足智多谋，有时在辩论中也能起作用。干得最好和最始终如一的是哈里·克鲁克香克。他从1923年便当议员，精通下院的一套，能利用这方面的知识随时抓住有利于我们的时机。他谈吐诙谐动听，发言时常被打断，但从不被人激怒。

在混乱的辩论和在冗长的委员会工作方面，我们有两位杰出的律师，后来都在他们的本行中获得登峰造极的成就。他们是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和雷吉·曼宁厄姆—布勒，两人后来都成了大法官。若是需要有战斗性的、强硬的发言，我们总可指望布雷肯，政府方面的议员愈是怒气冲冲，他的态度就愈沉着。我方不久又增加了一些青年议员，著名的有昆廷·霍格、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塞尔温·劳埃德、安东尼·黑德和奈杰尔·伯奇。

因此虽然我们的人数少得可怜，我们的辩论力量从来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年复一年地有所增强。

但在议会中当反对党不能说是件引人入胜的事。各种政府法案都需要在二读的辩论中进行斗争,并通过委员会逐条辩论。在头两年里,政府一帆风顺似乎不可动摇。拿我自己来说,我并不欣赏这种工作,因为我的全部生活,不管是在商业方面或在政治方面,都倾向于做建设的而不是做破坏的工作。批评别人而自己却没有机会采取有效的行动(特别是在掌过实权之后),令人感到腻烦乏味。然而我恪尽本份并尽可能使我的工作干得有生气。那些年对我是很有好处的,因我开始学习和研究战后下院里的作风和格调。那时我发言的缺点是,准备得过于充分,喜欢发表过多的怪论和警句。而且在议会这种场所没有人会爱听那不偏不倚的或有哲学意味的议论。议会是一个战场,在那里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对优势力量作战。我得设法鼓舞我方的斗志,不要怕偶然的议会冲突。有一位自告奋勇给我写传记的作家曾指责我在那时期是“轻浮、傲慢、肤浅和自大”。但他又以特有的宽厚笔法补充说,保守党人认为我是“聪敏的、坚强的、有力的、善辩的”。辩论的水准很高,但是辩论的方法,从今天看来,无疑已不合时宜。准备周密的演说已不合听众胃口,除非能同样周密地把这种准备瞒过听众。同样地,辱骂和嘲笑,也许由于我们处于劣势而可以原谅采用,但当各党派更接近于势均力敌,或者当严重的危机连续出现而使这种言语显得不合适和几乎不体面时,那就更难于为人所接受了。

我们所对付的是现代最能干的一个政府,在它因受外部冲击与内部纷争而开始分崩离析之前,它还是最强有力的政府之一。在战前搞竞选时,我们有一种虽不很厚道然而很管用的论点,即工党——甚至在他们的两次短促执政试验(在1924年和在1929—1931年)之后——仍然没有出色的领袖适于让他们试行执政。但这话在1945年肯定不适用了。在战时联合政府执政过程中,他们已出现几个伟大人物,为公众所熟知并为公众所景仰。

克莱门特·艾德礼通过五年的考验显示他是丘吉尔的能干的和忠实的同僚。在丘吉尔经常外出期间，艾德礼曾不声不响地主持过战时内阁。欧内斯特·贝文在工会和雇主方面都广泛受到尊敬，曾把全国所有男女力量都动员起来担负战争的任务。赫伯特·莫里森，作为内政大臣，负责国内安全工作，提高了他在大伦敦市议会时已享有的声望，以善于搞组织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而闻名。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也崭露头角，并已显然从一个左翼的激烈分子转变成为一个稳重而勤勉的大臣。休·多尔顿曾经主管战时经济部这个在战争中关系重大的工作，在政府和在议会里都显示了他的才能。所有这许多人都曾在丘吉尔洞察一切的眼光下经受过最严格的训练。论身份地位，除去丘吉尔是独一无二的以外，他们当然都和我们差不多。关于说理和议会工作的才干，他们在有 50 些方面比我们强。还有，他们有大多数议员的支持，有一种胜利感加上使命感。

首相艾德礼常被人们评价过低——他的有些同僚也并不是最不善于贬低他的人。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会议主席之一。他倾听别人的议论，很少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从任何委员会的成员的 viewpoint 来看，这一点都能使他成为一个完美的主席。在结束一次会议时，他总是简短地、明确地和果断地加以总结。人们有时诚然会有这样的感觉，即他是在观望别人的意见，企图探索哪方面会居多数。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很有用的本领，至少在通常的日子里是如此。此外，他是冷静的、不易激动的，而且从不忘乎所以。自然，在战时，主要的担子是放在那些更坚强更宽阔的肩上的。但在他任首相的六年中，像所有首相一样，他不得不经历一连串的危机和困难，有些是属于他个人的，有些是公众的。战后国家的财政和经济地位都非常脆弱。如果说在头几年那潜伏的弱点尚未表露出来，如果说从 1946 年起这种弱点又被大量美国贷款所减轻，那么，

不断临近崩溃的趋势必定会使他苦恼。1947年的兑换问题危机和1949年终于到来的货币贬值，就是这个衰落过程中的突出之点。

同时，他还要克服许多不愉快的个人困难。但是，他至少在表面上似乎以非凡的自制——或泰然的态度——克服了所有这些困难。在议会中，他要应付丘吉尔，而且常常取得战术上的实质胜利。他那平淡、简单明白的和不动感情的作风，使他有时能用冷峭的语言去回答丘吉尔的论点，而尤其是因为他回答得那么安详自若，给人的印象就更深。所有这些都适合那些听从他的追随者的口味。而且尽管他在口头上高谈那些比较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信条，他也能在危机时刻作出符合国家利益的果毅决定。美国决定
51 使用原子弹以结束对日战争之事似并未使他觉得不合适。他完成了为英国制造原子弹这项重要的难以估价的工作，甚至事先没有通知议会，而是在财政估算上玩弄一些花招，秘密拨出一亿英镑。在工党内那些气魄不够大的议员能对他加以限制之前，他已经把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必须搞起来，英国一反其长期传统而于和平时期参加牢固的防御同盟（包括在欧洲驻扎一支规模很大的军队）的时候，他似乎并未意识到他所倡议的那个政策的革命性。当朝鲜战争爆发时，他毫不犹豫，并派出英国和英联邦的适当部队参与这场长期而激烈的斗争。同时，他在和同僚的关系中是无情的。他是“一个好屠夫”，这据说是当一个好首相所必需的重要才能。如果说他对改变伟大事件的进程谈不上有什么贡献的话，那么在逢到困难和危险的问题时，他是能冷静应付的。

一位敏锐的观察家和训练有素的批评家曾经这样描写他：

人小而瘦；动作快而机敏；面部表情是一副蒙古人的冷淡样子，平淡的嗓门和急促而时断时续的讲话声调——所有这一切适足以掩饰而不是流

露他的真实才能。他像歌唱队里一个老练而含蓄的经理，他对队员的影响由于和他们之间的差异而显得更大。^①

在他任首相之初，曾经有过一场争夺，但其详情不甚清楚。虽然赫伯特·莫里森否认他自己企图夺取领导权，但毋庸置疑的是，在丘吉尔辞职后他曾建议艾德礼在没有开过议会党团会议以前不要应召晋见英王。挑选首相的方法，也像英国宪法的其他部分一样，这几年来自然也有所发展。其后在我由于病魔侵袭而放弃首相职务时，对于所采取的程序就有许多争论。1922年，博纳·劳在第一次晋见国王乔治五世时拒绝吻手，直到一次党的集会选举他为领袖之后才奉行仪式。然而这却被认为是破坏传统，也许只因 52 其情况特殊才能加以原谅。因为，当博纳·劳在卡尔顿俱乐部的集会上击败劳合·乔治政府时，他是个无党派议员，并违反了保守党领袖奥斯汀·张伯伦的劝告而采取行动。^②不过在1945年，既然艾德礼从1935年以来已经成为党的领袖并在战时当了五年副首相，那么在接受首相职位前强迫进行选举的计划肯定不会有结果。作为一种手续，它是没有必要的；作为一种阴谋，那它失败了，因为它为熟谙世情并绝对忠诚的欧内斯特·贝文所反对。

在艾德礼任首相的整个六年中，有过反对他的领导权的运动。这是总会有的，甚至丘吉尔当首相时也在所不免。在1947年冬，当胜利的光辉开始失色时，燃料危机和食品供应不足合在一起，使反对党提出一句顺口溜：“同斯特拉契（粮食大臣）一起挨饿，同欣威尔（燃料大臣）一起挨冻。”与此同时，国家破产的迹象开始出现。于是许多人怀疑“在这些危机日增的年月里，艾德礼是否具有足够的个人天赋和众望来当领袖。”^③但在可能与他争夺首相地位的人

① 索尔特勋爵著《一名公仆的回忆》（伦敦，1961），285页。

② 见罗伯特·布莱克著《不知名的首相》一书（伦敦出版，1955）第460页。

③ 见多尔顿回忆录第236页。

之中,莫里森已是个病人,多尔顿在该年年底以前卸职,贝文则虽常常批评艾德礼的散漫和对于部长的任命不妥,但他非常忠于艾德礼而不参加任何反对他的密谋。^①随后贝文的健康也开始恶化,艾德礼唯一的可能对手只有克里普斯,这人总是忙于出新主意和进行新的政治组合。但艾德礼的政治头脑比克里普斯强得多,很容易战胜他。在这些困难的月份里,“克里普斯借口艾德礼在这次危机中没有尽到首相职责,在转单独辞职的念头。他要把这件事情告诉艾德礼,并在所发表的双方来往信件中将它记录在案。”^②

虽然处于反对党的地位,我们也能听到一些有关工党内部的这些谣言,但从他成为首相时起直到他辞去党的领袖,我在任何时候都从未意识到艾德礼不是在掌握全局。

与此同时,艾德礼是多少有些神秘的人物,而且似乎常常有点落落寡合。赫伯特·莫里森比工党中任何人更深知艾德礼,他写下了自己的判断:

虽然我和艾德礼的密切接触已经有三十年以上,但我很遗憾地说,我并不真正了解他。实在说,我也不能在工党中指出任何一个人(活着的或死去的)是同艾德礼真正搞得亲密无间的。^③

莫里森所抱怨的这种沉默寡言的态度,使艾德礼显得像是个遥在天涯难于接近的人:

在对待同僚的态度上,艾德礼出奇地像拉姆齐·麦克唐纳,总使人有疏远的感觉,所以要想十分接近他,成为他的知心,而且了解他真正在想些什么,那是完全不可能的……^④

总起来说:如果说艾德礼缺乏魅力,他并不缺乏勇气。如果他不由自主地会陷入困境,但他通常可以找到摆脱困难的方法。他是

① 见多尔顿回忆录,第239—240页。

② 同上书,第241页。

③④ 莫里森勋爵《自传》,294—295页。

机敏的；他也是坚定的。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在议会中的名誉和在国内的声望是有所增长而并非逐步减色的。他虽不能博得对手的爱戴，却能获得他们的赞赏。他的历史地位，也像他的政府的成就一样，是肯定的。

赫伯特·莫里森，下院议长兼下院领袖，是所有工党领袖中最有经验的政治家。如果他在1931年并没有因微弱的少数而不幸失去议席的话，那么，他就毫无疑问地会在战争爆发时成为议会党团的领袖，而且几乎可以自然而然地于1945年继任首相之职。他就这样纯粹由于时运不佳而成为牺牲者。他在大伦敦市议会的工作使他能在工党里独执牛耳；他长时期地领导伦敦工党，并获得关于地方政府的渊博知识。他在全国政界的地位也同样是无疑问的；⁵⁴作为一个运用党机器的巧妙能手，他可以号称为1945年大选中“胜利的主要组织者”。他在第二次大战中的纪录是好的。虽然他在供应大臣的任期中工作并不出色，但那个任期是短促的，因此公众只记得他当内政大臣负责国内安全事务时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当时莫里森式防空洞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他是一个好的行政人员，也是一个有相当风度的人。当我在他领导下在供应部工作时，我发现他是一个易于相处、能体谅人、能爱护人的首长。然而特别吸引我的是，他可以说是典型的伦敦油子，几乎是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他甩动额上一簇乱发，活像一个街上顽童；他的声调是自然的，或许嗓门嫌大些。

莫里森在工党中代表中间偏右。虽然我在辩论中常常和他交锋，我们的意见相距并不太远。他相信“公用事业要公营”，例如铁路，煤气，电力和其他类似的事业。在公路交通方面，他拥护C种执照系统，这种系统已被证明对现代工商业大有裨益。由于长期的和不幸的历史背景，采煤业是一种例外情形。但他所要求的改革也就到此为止。他竭力反对钢铁国有化，而当这措施有政治需

要时,他又是提倡采用妥协办法的主角,使他得罪了社会主义狂热分子。莫里森有长期为工党服务的纪录足以自豪。他仅次于伍尔顿勋爵,是政治历史上的一个最伟大的党务管理人。他以圆通与谦和的态度领导一个胜利的党,这样就无需使下院处于过分紧张的状态下,得以通过大量争论甚烈的法案。他为反对党所喜爱。他既不像多尔顿那样向我们大声嚷嚷,也不像克里普斯那样教训我们。他是一位好的议会领袖,因为他善于诙谐,并以友好的态度“嘻嘻哈哈过日子”。他用“大家都度过了良辰美景”这样的词句来形容一场激烈的辩论或通宵的会议。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议会演说家;虽然他并不以善于辞令自负,更不讲究什么风度,但因他的大多数发言都是即景生情随机而作的,所以显得更加有力。但是,在1951年3月贝文因病退休而由他任外交大臣时,那使他适于作

55 为一位议会领袖的品质却对他不那么管用了。他在管理一个部和解释一项政策时所用的方法,并不适用于他的新任务。例如,有一次,有人问到朝鲜战争的局势,他竟使用这样令人震动的词藻:“我想如果安排了停火,那就必然是每个人都要停火,否则火就停不下来。”作为一位外交大臣,这是不能够维持他的尊严的。然而,如果说他的语言平庸,他的演说却是得心应手而且轻快的,因而一般都能达到应有的目的。“他像燕子那样飞翔,飞得很快,但往往非常贴近地面。”如果说他在思想内容或表达方式上并不企求展翅高飞,但他总能飞到他想要到的地方。

在1945年那届议会的头几年中,莫里森统治着下院,并且以富于风趣的方式,而又从未以不正当的手段来利用他所处的多数优势地位。他在各方面都得人心。1947年一场重病使他的体力可悲地衰落下来,使他未能一如既往那样兴致勃勃。

但新政府中最强有力的人物无疑是贝文。就是他,不仅获得有组织的工党人士的信任,而且得到大量中派人士的信任,而政府

的力量最后都必须依靠这些中派意见。组织政府时，贝文原定担任财政大臣，而让多尔顿担任外交大臣。但是艾德礼听从了英王的建议或命令而另作了安排。于是在这有利于国家的安排下，贝文在战后那个困难和摸索的时期负责外交政策。像其他许多人一样，贝文殷切希望战后的俄国将采取新的、较少侵略性的政策。在选举中，他曾充分运用这样的议论。他宣称，社会主义的政府将能比托利党同共产主义的俄国相处得好些：“左派对左派，信得过，盼得着。”可惜，他的信心不久就破灭，他的盼望也成为泡影。但是对于他，失望并不等于灰心丧气。他的刚强性格和坚毅精神使他能接受和经受那不可避免的事情。除了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他屈从于手下顾问们亲阿拉伯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观点而外，他在这些困难年代的事件进程中主持工作取得广泛的成就。布鲁塞尔条约，北大西洋公约，立即接受马歇尔援助，所有这些事都打上了贝文的想象力和权威的烙印。作为当代最伟大的工会工作者，而且确实是工会高级官员所信任的代表，他在工党内和全国都具有特殊的威望。他那突出的个性使他战时在公众眼里成为仅次于丘吉尔的第二号人物，现在战后又使他成为最突出的人物之一。他不搞装腔作势的外交风度。用索尔特爵士的话来说：“他使用大棒而不使用短剑。”他不断受自己左翼的折磨，他控诉他们从背后用刀捅他，但他得到反对党的一贯支持。很少有外交大臣像他那样受到部内人士爱戴的。他进部时对外交工作人员怀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但很快就佩服他们的才能和献身精神。他对外交部和外事工作上多方面的改组，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工作，直到今天还给人留下亲切的回忆。

作为战时的劳工大臣，他的调停常常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他根据长期经验，对他所处理的问题有渊博知识。甚至当他领导新的部门时，他的说话也是有权威的。作为外交部长，除回答问题

以外，他在辩论中不那么有力。外交部有一种惯例，这是我在短促任期中得知的，即每逢作一般性讨论时，要给部长准备一个长篇的、精心准备好的但颇为枯燥无味的文件，用最正确的官方文体写成，更像一个备忘录而不像一篇议会演说。贝文就会从头至尾宣读这个文件，念到难字时结结巴巴，但还是硬着头皮往下念，常常不管声调和段落是否与所念文字符合。这种部里称之为全面铺叙的东西，是根据不同部门各自的文稿编成的，而且很少有单一的主题。这东西看起来腻人，宣读起来恼人，听起来累死人。偶然地，贝文会离开文稿讲几句朴素的话。但在正常情形下，这种演出总要按部就班走完它那令人厌倦的全过程，直到念完为止。不过，在争论重大（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者德国或者马歇尔援助）问题中作答复时，贝文可以按他自己的方式并用他自己的语言，不受“文件”的约束，做一次很好的发言。那时他发言痛快淋漓，使他的批评者哑口无言而使他的朋友拍手称快。

自然，我们这些曾经在丘吉尔战时政府中服务过的人，同我们的旧同僚如艾德礼、莫里森等人保持着友善的关系。但是对于贝文，我们有一种特殊的和持久的情谊。他也从未忘记那些峥嵘的岁月。他偶尔会和丘吉尔争吵几句，因他有时对丘吉尔刺人的说话方式感到气愤；但是，这两位伟大的人物彼此间有着真正的感情并互相尊敬。

也许，贝文所经历的最难受的危机是苏联对柏林的封锁，这次封锁从1948年6月中持续到第二年5月。对这，如同朝鲜战争爆发时一样，他毫不犹豫。在这两次事件里，他受到自己党内左翼的批评——有时很厉害，却受到他对方的支持。不幸，在他任内最后几个月里，他的健康开始恶化。看到他逐渐衰弱下去——他的生命和精力都确实像在枯萎，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难过。他虽能支持到1950年大选之后，但工作的负担太重了，就只能靠药物和刺

激品勉强支持着。他终于在 1951 年 3 月 9 日提出辞职,五周以后便去世了。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为他所服务的事业更真诚地献出了一生。

在 1945 年胜利的工党政府的部长中,次一个重要而又有影响的人是休·多尔顿,他原希望在外交部,但颇为意外地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我很喜欢多尔顿,虽然许多人觉得他不吸引人甚或可厌。我喜欢他是因战前他曾是一位坚强的爱国者。他曾经尽他最大的努力去劝说自己的党放弃他们关于重新武装的愚蠢见解,并转变他们的和平主义传统。在张伯伦的统治下那些令人丧气的年月里,我和这位愉快的、乐天的外向性格的人建立了很好的友谊。他曾经在某些重要时刻帮助过我,让我知道工党可能采取什么态度,而且在一些危急关头支持过我。他的回忆录几乎完全根据他的日记 58 写成,极为有趣,并且即使在公开出版的形式下,也比几乎其他任何方面更多地透露了工党政客的幕后活动。和工党中许多社会主义的马尔伏里奥(莎士比亚剧中一个自以为是惹人讨厌的人物)如克里普斯之流相反,他是工党内阁的托比爵士。他总把政治和生活看作是人生乐事。他总是那么喜笑颜开,除去在他任职财政部的结束阶段,当时他开始为他的财政政策所造成的结果感到压抑。他说话很放肆,由于他的嗓门大,几乎从威斯特敏斯特宫的一头直到另一头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因而他说话放肆的声名就远扬了。但是他在工人运动方面作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他鼓励提拔有才能的青年人。在他的影响下,工党内中等阶级知识分子的人数不久就等于、而后又超过了“满手老茧的劳苦大众的子弟”。他是一个保守派教师的儿子。他也是一个大阴谋家。艾德礼、贝文和莫里森都知道这一点。但是他的阴谋是如此公开和直率,以致使人几乎会原谅他。他担任财政大臣时心境热烈而愉快,因为那正是胜利的最初几年,至少在国内战线方面是如此。

随着一个接一个的国有化计划，多尔顿不断地尽情发出一连串吼叫似的演说，这些演说诚然使反对党生气——而且几乎使之震耳欲聋，却鼓舞了他那方面议员的热情。他设法拨出一笔利率为百分之二点五的无限期的贷款（出名的或臭名昭彰的“多尔顿”贷款），而且有了从美国和加拿大借来的大宗款项作后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通常是“心里哼着一支小调”从事工作的。作为一个副产品，他甚至废除了纳尔逊伯爵家族的永久抚恤金。他颇为天真地告诉我们他同克里普斯搞的一个阴谋（虽然他很少想到它的一切后果），企图用几乎像盖伊·福克斯的方式把领导轰下台。正如他的议会私人秘书乔治·布朗报告给他的：

在通宵出席讨论这星期的运输议案时，小伙子们都在谈论关于缺乏领导的事情。

59（其后我是多么深刻地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啊！这就是每一届政府里那些“小伙子们”经常干的事情。）

大多数人赞成由贝文来接替艾德礼；他们似乎认为，这两个人只要对调工作就行了。他又告我说，如果那样不成的话，他们认为我是可能当新领袖的唯一的人！他们认为我是迄今为止显然“干得最出色”的一位大臣。他说，没有其他更强的候选人。大家都觉得，莫里森是一个有病的人，不可能担任这工作。没有提到其他人，既没有提到克里普斯也没有提到贝文。^①

但事情并没有这样顺心。一个致命的虽然实际上是可原谅的过错，一下子终结了多尔顿的政治生涯。这是个可悲的故事。在这场事件中他成为有关预算案的那个严密的并成为传统成规的一个牺牲者，并在我的思想上觉得这对他是颇为不公正的。1947年11月12日，鉴于财政状况日趋紧张而提出一项补充预算。在他去会议室的路上曾和《星报》驻议院记者相遇，并和这位记者谈了关于

^① 参看多尔顿回忆录，238页。

补充预算的一些内容。结果，刚好在预算实际公布之前，这个报纸（现在已停刊）上登出了一小段，仅仅是很小的一段报道。第二天，质问提出了。多尔顿作了一个坦率的解释，对他所谓的“严重失慎”行为“向下院深表歉意”。丘吉尔初时的反应表现出他典型的宽大为怀的精神。他承认“财政大臣态度很诚恳，并对他信人不当表示同情”。那天晚上，一般认为错误可以不追究了。我相信，丘吉尔本人也希望不要追究了。尽管保守党的一般议员很不喜欢，甚至害怕多尔顿，他们发现他是一个可使他们在周末演说发言中进行攻击的方便靶子。说实在的，他们对于这个人有一种奇怪的好感，因他至少可以给他们当做取乐的对象。因此，当宣布他辞职时，大家的感受可用奈杰尔·伯奇那句深表痛惜的名言来表述：“我的天哪！他们把我们的狐狸给打死了。”丘吉尔的大多数同僚都宁愿不再提这件事，因为觉得对他这个小过失给他那么严重的处罚似乎是完全不相称的。但是，当晚党内开始出现一种情绪，觉得应该利用这个事件。肯定是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并根据我方督导员的劝告，丘吉尔当晚写了一封信，明确提出，虽然他承认这位财政大臣的道歉是真诚的，他要求指定专门委员会去调查和报告事实的真相。可是，在这封信发出以前，多尔顿的辞职已经为艾德礼接受了。或许，艾德礼已经听到一些有关多尔顿——克里普斯策划把他从领袖地位上拉下来的密谋。

出于许多原因，而主要是对于我们两人战前曾共同反对“绥靖政策”的回忆，使我对这事深感遗憾。当我们两人都成为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的成员时，我很高兴又能和多尔顿重温友情，并同他和衷共济地进行工作。

多尔顿的垮台导致克里普斯的擢升。这个奇特怪僻的角色在战前以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会客室里的布尔什维克”而开始名噪当世。他那过激的观点和对一切现存制度的无情攻击，曾激怒

了保守党并吓坏了他自己党内的许多人。他诋毁过王座，明确说过他希望把议会降为仅仅是社会主义专政下的橡皮图章；在希特勒威胁世界和平的最危急的年代，他曾经号召英国的工人不要制造军火去保卫资本主义社会。在搞这些公众活动的同时（这些使他曾一度被开除出工党），他又是一个最有成就的律师，他的业务是那时最大的营业之一。在这个国家里，企业家不是傻瓜。出于那种促使丘吉尔欢迎同斯大林结盟以反抗希特勒的同样的本能，使得那些最大的公司和个人，决定继续让克里普斯经管那些涉及大笔个人或公司财产的法律事务，尽管他们不喜欢并讨厌他的政治观点。因为他们看重他的律师才能。这个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恶毒叛逆者，在法庭上享酬最高的律师，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和高贵的家庭。克里普斯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私生活方面，他是
61 一个惹人喜欢的伙伴，但进餐时除外，因为他不吃不喝，只会抽烟。1942年当他从俄国回来而我去地中海以前，我才开始比较熟识他。

那时，他作为下院的领袖，工作很少或者他自己认为很少，而这个职务他仅仅担任了几个月^①。所以，他就经常访问他那些年青的和年老的同僚，作为他的一项本份工作。我记得同他在长时间谈话中，他曾向我解释未来殖民帝国的必然瓦解和我们在这一过程中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我从不对这些突如其来的议论感到恼火。你不会老是觉得克里普斯这个人可气的，因为他是如此的真诚。像所有怪人一样，他带有一点脱离现实的白衣骑士的气味。他是如此献身于他所服务的事业，以致他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换个任何其他他人就可能被认为是完全不忠实的行动。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 1947 年夏搞阴谋的全部真相。关于这个

^① 《战争风暴》原书第 182 页。

阴谋，多尔顿曾作了十分生动的描绘^①。当时我们只听到隐约其辞的谣传。克里普斯得出的结论是，“艾德礼必须下台”，于是他和多尔顿便开始搞一个最复杂的阴谋，要以贝文来接替艾德礼。按照他们的看法，只有贝文才能控制国家的经济局势，并渡过即将来临的风暴。克里普斯相信，除非艾德礼立即为贝文所接替，否则“党和国家都要下沉^②”。贝文应当成为首相，克里普斯作为贝文的参谋长应当成为枢密院长，多尔顿应当去到外交部，莫里森可留任为下院领袖，并作为副首相。不幸出现这样一个障碍：

莫里森完全同意艾德礼（应下台）。而不同意贝文（来接替）。他认为，他（莫里森）应当是首相。不管怎么说，领导下院并不是一个专职工作。他不愿意在贝文手下做事，并责备克里普斯把一管手枪对着他的头。^③

这个计划就像这类事情通常的遭遇一样终于成为泡影。我怀疑贝文是否会参加这个阴谋，虽则他可能愿意接受首相之职，如果把这份礼物放在盘里现成送交给他的话。 62

艾德礼听到人家建议要他让位给贝文，就非常巧妙地处理了这件事情。他并不认为贝文想离开外交部。艾德礼使了一些手法，提议克里普斯应当任生产大臣；于是事实上就这样决定了。他的新职务是1947年秋宣布的，他任经济事务大臣。莫里森现在完全被剥夺了到目前为止一直担任的搞“中央计划”这一重要职务。这些勾心斗角的事当时我和我的朋友听到过一些，但是，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等着瞧这幕个人戏剧的演出。在那紧急关头，当多尔顿因他那不幸的错误而辞职的时候，克里普斯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算是定了。因为，他不用放弃经济事务和计划大臣而现又继任了财

① 多尔顿回忆录第二十九章。

② 同前书，240页。

③ 同前书，242页。

政大臣。这样，至少在国内战线上，他成为政府中最有权力的唯一人物。

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们许多人开始对休·多尔顿的去职深表惋惜。这很像所罗门和里霍勃姆，前者用鞭笞惩罚我们；而后者则用蝎子惩罚我们。同多尔顿这个工人运动中乐天的托钵僧塔克相反，克里普斯是一个新奇的对照。严肃的克里普斯实际上不是乖戾的清教徒，但是日复一日地看了展开在他眼前的关于悲哀和痛苦情况的报告，他却几乎感到有一种喜悦之情。不过，他的牢固地位是由他的某些特殊品格而取得的。他在法律工作方面的训练使他具有一种独到的讲解问题的能力。即使最复杂的一系列数字他也能把它说得头头是道。但他之所以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还不单是由于他所具有的聪明才智，他的真诚，他的清心寡欲，他那戏剧性地向上苍呼吁的言词，如果出之于任何其他人之口那是不能令人忍受的，而在他的口中，却使下院听众留下深刻印象。在他后一段工作期间，他在人们心目中所处地位之高，使人觉得几乎不该（⁶³虽还不致于觉得神圣不可侵犯）打断或插问他的发言。那些对他更为忠诚的信徒像一群虔诚的善男信女集合在他的周围。这种把经济和宗教等同起来的说教之所以能成功，乃是因为他深信他的政策不但是基于正确的唯物的论据，而且还建立在道义的真理上。他现在满怀着异乎寻常的白热的献身精神，甚至是狂热的精神。他从前任接过来的是濒于绝望的财政局面，他努力使人民大众厉行超过战时艰苦生活的节约制度以谋挽救局势。先前那个财政大臣心头的小调现在变成了一曲忧郁的挽歌，而为这新大臣以他那透彻无遗的才华反复吟诵着。英国人民曾经忍受过伍尔顿年代的挨饿，当时这位世间最优秀的推销员用笑脸把“物资短缺”出售给人民，但在战后几年看到这位新大臣还要实行配给制甚至减少配给量，并纯粹以超尘绝俗的隐士心情赞赏他们的困苦生活，他们

就深为激怒了。克里普斯不饮酒，而且据说是靠吃硬壳果和水田芥生活的，因而当他那献身工作的可怕的紧张压力开始影响他的健康时，他似乎越来越像一个印度的托钵僧了。

1949年不可避免的英镑贬值使他的希望破灭，给他以严重打击。还有，由于他是一位自尊的人（即使在他搞反首相的阴谋时，他还是把要他下台的计划直率告诉那受威胁的领袖），因此在他硬着头皮否认关于英镑贬值的任何问题的漫长的几个月中（尽管他和他的顾问必然知道这是欲盖弥彰的事），他是感到很大痛苦的，他不喜欢这样做；他为自己被迫扯谎而感到羞耻。在他由于健康恶化被迫辞职之前，众多的事件和责任的重担的无情压力已开始把他折磨得垮了下来。但是他继续斗争着。当我在战时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还能偶尔露出一丝幽默的甚至打趣的情绪。然而这些神态现在似乎已经消失了。他的外貌开始流露出他所经受重担的痕迹。最后，他的肉体无法承担他所负起的紧张重任，终于在1952年4月21日死于一个瑞士诊所。在他的亲密朋友的小圈子之外，凡是知道他的忘我无私和献身精神的许多人，都为他哀悼。⁶⁴他的虔诚的基督教信仰无疑地鼓舞着他的一生。但像一切有高度使命感的人一样，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然而多尔顿的看法是正确的，他有近于天才的能力，但少判断力。

这五个人组成的内阁阵容，论才能可与议会史上任何内阁媲美。而且，正如常常碰到的，当一个长期不执政的政党在多年以后终于执政时，他们也不是没有受过考验的。他们五个人在立法和行政工作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他们都在大联合（内阁）中服务过，而且都胜利渡过了战时的严酷考验。所有他们这些人，除贝文从未学会过下院的工作方式和理解下院的特性以外，都参与过下院的生活，并能把握下院奇怪而难以捉摸的情绪。

1945年，在这个星座中加入了一颗怪僻而又不受控制的明

星,也许几乎是一颗扫帚星。但是在许多方面,他们是他们中最出色的,也是最值得记忆的人。他就是安奈林·比万。我第一次认识比万是在战前那几届阴沉的议会里,当时我正在努力劝说我们的领袖不要只搞登记失业数字和最起码的救济而该做更多的工作。比万自己就是那些鬼日子的产物。他不能并从来不肯忘记他在南威尔士矿区所见到的苦难情景。这位热情奔放而有献身精神的青年,以一种使任何有感情的人所不能抵御的热情,猛烈投入当时那些沉闷的辩论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日趋成熟;但我想有些人也许会说他变坏了,他不光愿碰生活中的钉子,而且变得喜爱生活享受了。他甚至变成一个小农场主和一个不大的画品收藏家。但是就在他的早年,比万已和其他当时的抗议派不站在一起。在他的发言中,他和任何人一样激动地反对容忍这种悲惨情况存在的社会结构。不过他并非仅仅是一个煽动家。他研究和学习议会工作方法。在辩论中,他变得和任何一个议会雄辩家一样敏捷而机智。他也像丘吉尔那样善于利用自己生理上的小缺陷来增强他演说的效果。他的口吃本身就能引人注目。他天赋感觉锐敏。当我们习惯于在休息室里坐谈辩论几小时之久的时候,他常常能准确区别哪些保守党人他认为是在尽力而为并给予一定的同情,而反对那些他认为社会公敌的保守党人。总的说来,他在这些事情上的判断常使我惊奇地感到是相当正确的。但是,他说话不大注意分寸,很容易因感情冲动而失言。在战时,这经常使他显得没有爱国心,而且几乎应该得到“下贱的讨厌东西”这样的谴责,这是丘吉尔有一次在激怒时说他的。由于他是在野的,而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物都在丘吉尔政府中工作,比万不得不担任批评者的角色,正和左翼的欣韦尔和右翼的温特顿的做法相同^①,不同的地方是

^① 《战争风暴》原书第 121 — 122 页。

比万有着真正的天才。他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雅各宾党人。战后，从工党政府的观点看来，他成为一个危险的同僚。因为，他的思想从一个极端到另一极端变化得如此之快，并且他又如此爱作诡论，以致他往往不自觉地帮助了我们这处于劣势地位的保守党人。他保险会说出一句话而被我们抓住辫子加以利用。

第一次失言是在 1945 年选举中为反对出口贸易而作的那个出名的长篇激烈演说：“根据托利党人脑袋瓜里胡诌出来的理论，劝说世界远方人买我们的商品是件好事，而由我们自己人民来消费这同一商品将使我们破产。”但是，这个邪说比起那有名的“虫豸”演说来却又是小巫见大巫。这句愚蠢的话——“我认为托利党人比虫豸还低贱”——是在一次不出名的小会上即席演说时脱口说出的。这话自然可以给讽刺画家提供材料，也可被一个在国内工作进展很小的反对党大加利用。我们在全国成立了虫豸俱乐部，可怜的莫里森为此深感惊慌失措，以致他从未能再镇定下来。

然而，这种轻率的失言不过是一时冲动的产物。比万虽然宣称托利党人比虫豸还低贱，但在事实上，他仅仅是从整体上这样来看托利党人的。对于作为个人的所有人包括托利党人在内，他是一位和善的并具有同情心的朋友。即使他称莫里森是“一位第三 66 流的塔慕尼（美国民主党中央机关别名）党阀”，这句话中最刺伤人的地方是说他是第三流。

比万在许多方面是所有工党头头中最有鼓动性的人。使人想不到的是，他还是一个好的行政人员，也是一个好的大臣。他的住宅政策的失败仅由于他所主持那个部的职责范围过分宽广。这届议会的卫生大臣的主要任务是创办以贝弗里奇报告为基础的卫生服务工作；可是住宅问题却也包括在它的范围之内。因此，在执行社会服务事业的巨大方案时，尽管财政困难，比万先后从多尔顿和克里普斯那里设法挤出几乎是无穷无尽的钱来，但在执行他的住

宅计划时就不能要求人家也这样大方了。另外，他也把部下工作人员对他讲的情况看得太认真了。大多数大臣的错误不是一意孤行，而是太受白厅陈规的拘束。当我接受处理住宅问题时，我发现所谓财政部和住宅专家对建筑业（在给予鼓励和允许自由行动后）所能发挥的潜力，估计得多么错误。

如果说比万是个难以对付的淘气孩子，他肯定也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孩子。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甚至当他在1951年在哈罗德·威尔逊（当时是个冷静而工于心计的反叛者）支持之下辞职时，我觉得比万是按照他内心深处的天性采取行动的。比万像所有诗人（特别是切尔蒂克诗人）那样，他易于为那些对他敬而远之的正式敌手所赞许，而不易为其密切共事的朋友所爱慕。不管人们对于他偶尔失检的某些话有什么评论，他是没有什么虚情假意和伪善的。自然，像许多社会主义者一样，他在精神和性格上都是个人至上主义者。

当他在1960年去世时，他已有多年默默无闻了；但是，突然地，而且似乎是意外地，下院和全国都感到颇像失去了一个亲人似的。当下院悼念他时，我想人家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个终生毁誉颇有争论的人物，能在他生命结束的时候赢得人们这样的赞许，甚至爱戴：

67

首先，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没有丝毫虚假。如果有激烈的意见（那怕是偏见），他就用激烈的言词说出来，但他是诚恳的。其次，他是一个愉快的战士，而且是一个有豪侠气的战士。如果他给人的打击有时招致恼怒的反击，他总是准备承受这种反击的。还有，如果他的话有时厉害，但从不枯燥乏味。他有时苛刻，但从不迂腐。

最后，在他自己和他的事业中，在他的一生中，他表达了全国普通老百姓的一些最深刻的感情。和许多先知者不同，他在自己本国特别受到尊敬。他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但他从不玩弄政治手腕。他多少

是一个革命家；他始终是一个爱国者。同时，在他那切尔蒂克人可爱的和热情奔放外表下，他是一个极为严肃的人。^①

总的说来，这届议会中执政党和反对党双方的前座政治人物肯定不逊于过去任何时代的前辈。在那尚由议会而并非由无线电或电视来形成政治思潮和支配政治行动的时代，这批人组成一个值得注意和值得回忆的一群人物，可与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代人物相媲美。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60年7月7日。

第四章 工党的胜利和挫折

新政府在其选举获胜后踌躇满志之际所推行的一长串“社会主义”措施的第一步，是精心选择的。这就是英格兰银行国有化的法案。这一步得到他们那边支持者的双倍拥护。一方面，1931年“银行家的讹诈”之类的事，在人们的记忆中犹有余痛。把拉姆赛·麦克唐纳诱坏，使他背叛那个几乎为他所创立的运动而进行“大出卖”的，正是银行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那么长时期以来实际上左右政策的银行总裁蒙塔古·诺曼的阴险势力，才导致或至少是延长了两次大战之间经济大萧条的岁月。现在，清算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挑选这个问题是精明的。它从一开始就搞乱并分裂了反对党。因为正值丘吉尔争取第一个机会（在关于请愿书的辩论中）宣布，他认为这事“并非原则问题”的时候，他的有些同僚却对这种超脱的态度感到恼火，决心在一提出这议案时就竭力反对。这样，在执行“国有化”方案的最初阶段，早已是微弱的反对党分裂了，而且让人觉得在扮演颇为可笑的角色。此外，众所周知，坚强的财政部长（象第一次大战时的劳合·乔治和博纳·劳）是能使不听话的银行总裁就范的。如果说丘吉尔在1926年被压服的话，那是由于对接过去等价恢复金本位制的危险一无所知，而不是出于软弱。

反对这议案的理由有两方面。第一是说英格兰银行和英镑地区有特殊联系并对这些地区负责，使银行为联合王国政府所有显得不合适，并可能引起对英镑的不信任。第二点理由与第一点理由多少有点矛盾，认为这种变化没有必要，因为，很显然，股东们对董事会从不产生任何影响，而对银行总裁的影响更小。然而正是

根据这些理由，奥利弗·斯坦利在约翰·安德森爵士的支持下，在1945年底尽最大力量去反对这个议案。

实际上，这是一场假斗争。对于社会主义者说来，英格兰银行国有化一事的意义主要是作为新时代的象征。国家银行——掌握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必须归国家所有。对于许多保守党人来说，普通股票与任命各届银行总裁权在形式上的移交并不重要。一旦面临考验，英镑的力量将由事态所决定。幸运的是，我没有卷入这场争论，因为我刚被重新选进议会。

回顾过去这些年，其中包括我作为财政大臣和首相而直接负责这些重大问题的几年，我不相信新体制有多大意义。每个银行总裁认为他有责任以一种独立精神提出他的意见并说明他所担心甚或忧虑的事，而这种独立精神是历届政府都尊重的，而他一般也不难得到财政部的支持。如果说工作重点有了大变化，那并不是由于政府成了银行股东的缘故。这是一般人认识了货币政策对国家经济生活重要性那段时期内的自然过程。在往日，这些都是神秘的，公众甚至报纸都很少敢于去讨论这些神秘的东西。在两次大战之间，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批评把帷幕拉开到一定程度。可是，揭露这些神圣的秘密仍被人认为是有点不道德的事。在最近几年里，这些事已经变成每天讨论和辩论的课题。没有一届政府，不管是右的或左的，不管是否赋有新的权力，会甘心让最后控制权落入他人之手的。但是我还不致于接受象一位主要商业银行家对我 70 说过的那种看法，认为如今英格兰银行已无足轻重，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只是财政部的东端(指伦敦东端商业区——译注)办事处”。银行和银行总裁仍然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且仍感到他们对国家负有责任。总裁的辞职是任何一届政府渴望避免的一项重大事件。总裁好似参谋长，不但可以直接去见他自己的大臣即财政大臣，而且可直接晋见首相。象已往一样，总裁的权威主要取决于他

的个人品格。

无论如何，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保守党领袖们，他们已为选举失败受到剧烈震动。因此，为重振后座议员的士气采取了通常的做法——于是年年底提出不信任案。这是奥利弗·利特尔顿提出的动议，丘吉尔让我作我们这方面的总结发言。我应当说，这并不是一项很轻松的工作。政府在下院和在国都一样的强有力，而且我认为辩论的时期尚未成熟。然而在我长期离开下院以后（从我上次议会发言以来已经三年了），这是使我重新出头露面的一次机会。我的演说受到议会同事的好评，并获得报纸的广泛赞扬。在这篇演说中，如同我在政府地位显然无懈可击的时期不得不作的其他演说一样，我试图批评，甚至攻击他们的政策，而又不放弃我过去所宣传过的进步政策。为了使这种不容易保持平衡的发言获得几分成功，我得用尽可能轻松的语言来表达我的意见。这导致我犯了想把逗乐的话说得太多的错误，而这是我有更多的经验之后才认识到的。虽然各派议员都喜欢听犀利诙谐的发言，但要注意避免被人责为态度轻浮。然而，要用大棒攻击两倍于你的多数党是困难的；长剑似乎是唯一可用的武器。在这场辩论中，如同在其他辩论中一样，艾德礼开始表现出他在工党内的最高权威和在下院日益增长的优势地位。莫里森和克里普斯都是可钦佩的。克里普斯以其奔腾的狂热给人深刻印象，而莫里森则以辛辣而又热情洋溢的戏谑打动人心。我们这一炮没有打响。

从这时开始，政府的法案以无比迅猛的速度相继提出。民用航空的国有化在1946年1月24日已有预兆；煤炭工业国有化法案的二读是在1月30日举行的，5月20日举行三读。海底电线和无线电也得为国家接管。我不得不参加头三个议案的辩论，因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地成为定局，所以仍认为最好是用一点哲学态度去对待那些我们在战后必须面临的一般问题，并用一定份量的

打趣戏语来减轻所发议论的沉重感。

关于民用航空,联合政府时代同意采用一种所谓斯温顿方案。这是一个在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方面结合公私两方优点的合理妥协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却被新政府推翻了,尽管它已为旧政府中全体重要大臣所批准。我忍不住要说他们对待联合政府时期所达成的协议的态度是多么有策略。如果是一个他们希望促进的方案,他们就要提出这是他们旧同僚所一致同意的;而当他们不喜欢这个方案时,他们却又否定他们的意见。他们的记忆力有时似乎非凡的强,有时又装得很弱。肯定地说,他们处理这种事情都是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

我现在理解(我始终理解),正统的或者可称之为“超尘拔俗”的社会主义者们,相信或者假装相信一切生产、分配和交换资料“收归国有”的全部教条。现在,根据枢密院长的崇高权威,如在加拿大经常有人表达的或者在英国偶尔有人表达的那样,一种更宽容的解释逐步为大家所接受。……他采纳了这样的主张,认为在国家经济生活的广大范围内,有一个公私双方都能起作用的区域。至于这区域在任一既定时间的准确界线在哪里,则是一件可议论和调整的事。甚至贸易大臣(克里普斯)那冰清玉洁的头脑也屈服于这种诱人的坏思想。他自夸,即使在他和他的 72 朋友工作干得最坏时,我国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仍将掌握在私人手里。自然,必须保持大的自由圈子,要不然我们到哪里去找训练有素的合适人材来经管国有化事业?①

或者,我还可以补充说,哪里来的利润去支持国营事业呢?时至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情况多少还仍是这样。甚至可以设想,正统的和传统的国有化计划中,钢铁国有化应是最后一着——1945年以来的一种残余物。但是,当时按文字教条解释的危险很大,而且至今依然存在,所以,设法定个界线并保卫它是相当重要的事。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6年1月24日。

在煤炭法案进行二读时，我尽最大努力想把它改成另一个计划。这是包括在当时称之为里德报告中的一个计划，它可能行得通也可能行不通。我知道代表煤矿选区的议员们有强烈情绪，并熟悉这门工业至少在一定时期内的悲惨历史，我以反对法案所提出的那种国营形式（没有任何工人代表）来宣扬我的方案。该法案包含的另一个危险是，没有通过地区联营之类的准备过程，一举而把八百五十个企业合并为一个单位。当然，那时我们谁也没有料到下一代由于原子能和石油的竞争竟如此急剧地削减煤炭产量和使煤炭工人改行。国营的最大好处也许在于（在充分就业的条件帮助下）提供了使这一过程中减轻人类痛苦的各种手段。

当我们进行三读时，我不得不结束这场辩论。我预言，而且我认为说得颇为有理，将来煤炭部里那些不知姓甚名谁的成员不会比旧业主更受矿工的欢迎，而且将远比旧业主更难以提出有效的
73 批评——“新长老”不过是“旧牧师的放大而已”。的确，在我1961年任命罗本斯勋爵以前，对于煤矿上工人福利方面的事进展极小。但是，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新结构既不是公私合营也没有煤矿工人参与管理。它纯粹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但是，我接受这样的事实：这个争论现在必须解决，而且必须在大致满足政府及其支持者以及满足煤矿工人的条件下，加以解决：

我知道，尊贵的对方议员们会多么高兴，甚至欢欣鼓舞。特别是那些多年来代表矿区选民的议员们，他们是本届下院中最老而又最受尊敬的一些人。这对于他们是一个大喜日子。他们的伟大目标眼看就达成了；他们的胜利是彻底的，而且如果我们不乏宽宏大度，我们得向他们表示尊敬和钦佩。在这国有化的长期斗争中他们苦干着，作出了不少牺牲。^①

我在结束时提醒他们说，如果胜利是属于他们的，那末责任也是属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6年3月20日。

于他们的。如果说保守党认为它有责任在这最后阶段正式反对这个法案,那么我们还可以为所有那些生活、劳动并成长在煤矿上下的人共同祝福。

国有化运动在 1946 和 1947 年继续以非凡的速度推进。至少在这一点上谁也不能责怪大臣们没有实现他们的诺言。除去英格兰银行和煤炭工业的国有化而外,铁路和公路交通,电力和煤气都同样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控制体系。整个过程完成于 1950 年底。只有钢铁仍待最后立法通过。这个工业性质和其它工业是那么不同,在工党领袖中也是意见分歧很大的,而且法案的执行也被推迟到大选以后。

所有这些议案的文字在形式上有一共同特点,在当时受到广泛批评。它们留下许多不明确之处,——一部分原因无疑是为了不让议员和公众获悉白厅方面认为不必要的内情;部分原因是由于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还没有达成最后的决议。可叹的是这种不把事情说清的趋势仍延续至今,而且鉴于现代立法的复杂性,或者已经变成不可避免的了。但在当时,那是不寻常的,甚至是新奇的。在一次辩论中,我指出这种违反老规矩的做法:

大臣有很大的潜在权力。大臣可以指导;大臣可以制定规章。这一切如今是司空见惯的事了。的确,如果摩西也懂得这套办法,那末他就不会让他自己恪守象十戒那样明确而且有时显得那样不方便的条文。他从西奈山下来时应从上帝那里取得制定规章的权力。^①

钢铁和公路运输除外,国有化的斗争,除了关于管理结构是否有效及其他重要细节而外,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真的斗争。我们保守党方面许多人早已认识到,由于不同理由,某些企业(煤炭是根据历史的和感情上的理由;铁路是出于财政上的理由;公用事业和其他垄断事业如煤气和电力是出于技术上的理由)与数量很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6年5月20日。

大的工商业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在我自己的著作中（这自然要被莫里森和欣韦尔大量引用来反对我），我曾坦白认为这方面应分公有和公营的必要。比较值得怀疑的是所采取的政策，即不让人有任何机会从经验学习，而把这么大的变动挤在这么短促时间内进行。加之，由于付出大笔款项作为代价，从而使固定资产转为流动资产，增加了政府开支中所需要资本投资的数目，这些在财政上的影响将证明是严重的通货膨胀的附加原因，而这很快就会危及政府和国家。

75 虽然如此，工党政府在这一届议会的成就是不可动摇的。从那些急于想推广国有化过程者的眼光看来，有那么多国有化了的工业在紧接战后时期早已趋于衰落状态，也许是件不幸的事。当时认为能享有一切垄断好处的煤矿工业，已经日益为其他热量和能量的生产方法所取代，而且事实上这个工业部分地要靠对石油的征收保护关税来维持。同样，在整个十九世纪享有垄断权的铁路恰在行将丧失垄断权的时候移交国家，而历史整整绕了一个圈子，公路交通又恢复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其他方面，甚至在国家控制的工业之间，相当大程度的竞争肯定已有良好的结果。由于原子能、石油和煤炭之间的竞争，使修建发电站的设计不断改进，从而使费用相应降低而效率提高。煤气和电力（虽然都归公有）之间的竞争也同样是有好处的。

本届议会在国有化上的胜利使工党精疲力尽；随着时间的流逝，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古典形式似乎已经过时，而且肯定不适合于国家生活所依赖的工业、贸易和商业，特别是不利于出口市场。并不是没有人指出——事实上这是反对党发言人不断指出的一点——即使连那最极端的社会主义者也极不愿意打扰那些主要为出口市场工作的任何企业。特别是，不管有些头脑发热的人怎么说，没有任何理由去干涉获取重利的无形出口——银行、保险公司和

类似的事业。

从立法的观点看来，艾德礼政府的最初几年是成功的和多产的。在行政方面，他们也可以说是有效地处理了战争结束后的最迫切的问题。

但在处理财政问题上他们就不那么顺手。他们所承受的肯定是可忧的局势。四年多来我们事实上是靠租借法案来维持局面的。不列颠和整个帝国的巨大军事开支只有赖此才能维持。但是，在对日战争结束后七天，杜鲁门签署了一项命令，要立即采取步骤中止一切租借工作，并将此项命令通知外国政府。所有重要合同统统被取消了。这个摧毁性的打击，事先毫无警告，而且不容有任何商量余地，完全是出人意料的。而且这命令的执行也没有限制对象和变得和缓些。所有装好货物运往俄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船只都立即禁止启航，有些船只事实上已经返航而且卸货了。然而，当杜鲁门了解到他所做的（或者是被引导去做的）会有什么结果时，他采取了步骤来缓和这一行动的冲击。接着就举行匆促的讨论。伴同所提贷款协定的最后解决办法，还算是慷慨的。在击败日本前已订的和即将订的各项货运都承认有效。已经运到英国或帝国的大量物资立即无偿移交。此外，双方互欠的各种债务一笔勾销。 76

但是，即使局势有这种好转，财政困难几乎还是不可克服。由于有巨大的英镑差额有利于许多同盟国和主要的英联邦国家（我们拯救他们免于受希特勒奴役所付出的痛苦代价，如今奇怪地颠倒公理，要由我们来负担），由于储备很少，由于海外军事任务的承担很大，看来只能在破产与借贷之间作一选择。政府并非毫无理由地选择了后者。

在我于 1945 年底回到下院的时候，我发现各方面都十分热烈地讨论这一紧迫问题。各方面都有强烈的情绪。贷款数是大的，

共计三十七亿五千万美元。虽然允许在任何特殊危机时期可以延期偿还，但是关于利息和还款的条件是苛刻的。协定的其他条款也是苛刻的，而且事实上违反了布雷顿·伍兹协定的精神。^① 我们
77 有义务接受英镑的自由兑换，但是我们被剥夺其它签字国所享有的五年过渡时期。英国的宽偿期从协议批准后之日起被削减到十二个月。再者，唯独我们得放弃在管理英镑工作中享受援引“稀有通货条款”的利益。唯有我们不得在脱离“国际基金”系统及其义务后恢复行动自由。

和美国财政部进行协商是由凯恩斯负责的，而且以他的全部威望将所作协定推崇为可能获得的最好协定。他在上院答复比弗布鲁克的演说，是他逝世之前最后一次公开声明，而且极有分量。但我们知道，许多大臣都因条款的苛刻和美国政府措辞的傲慢感到不安，甚至厌恶。反对党领袖们的意见也同样不一致，而且他们在会议中的讨论也拖长了。

执政党的一个好处是，不管内部对任何问题的意见如何不一致，只要没有完全分裂或出现某些大臣辞职的事，政府必须以阵容统一的面貌出现。至于反对党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没有担负责任，也就没有那种压力，于是他们一致。丘吉尔本能地赞成接受美国借款，部分原因是他坚信英美合作，这曾在战争危急关头给了我们多大帮助；部分原因是他很讲实际，深信如果什么地方出了太大的毛病，无疑会另作一次安排。比弗布鲁克虽不参加我们的正式会议，但仍有相当大的势力，他是激烈反对借款的。他受到布雷肯的同样有力的支持。在我们其余这些人中，斯坦利是赞成接受贷款的，尽管它有些坏处，而我们大多数人则附和丘吉尔和斯坦利。

^① 1944年7月，四十四国在布雷顿·伍兹开会。所达成的协议于1945年12月为英国批准，并于1945年12月27日生效，结果创立国际货币基金委员会和国际银行。国际交易收入在五年内可以自由交换。最初规定的货币平价，不经过和基金委员会事先商量，不得变更，而且要按黄金和美元来计货币平价。

我们党整个说表现得颇为糟糕，因为有六、七十个保守党人投票反对协议，只有少数人赞成。我们其余的人，包括前座议员，被迫处于尴尬而不光彩的弃权地位。这样我们有了钱——和短暂的喘息时间。 78

没有美国贷款，我们的局势毫无希望；有了它，除非采取某种特别合适的政策，我们的局势几乎还将是毫无希望的。因为我们的外贸账上每年花费的比收入多二十亿英镑。我们的储备大约只剩五亿英镑。当然，我们的一大部分海外开支用在支付世界各地的三军和占领军的薪饷和补给上。但这笔钱也许不会超过七亿到八亿英镑。那么另外那十二亿到十三亿英镑的钱花到哪里去了呢？唉，花在进口货上啦。即使在严密的控制制度之下并受到世界范围船舶缺乏的限制，进口还是大于我们所能供应的出口，尽管各方面都特别需要我们的出口货。但至少在我们的部队复员和工业生产恢复到和平状态以前，情况还是如此。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我认为工党政府接受贷款是正确的，即使是在这些苛刻的条款下。他们不够谨慎的地方也许是：拿了贷款就忘记一切，仍然几乎是死命地加速执行他们的国有化政策，听天由命地坐等不可避免的垮台。在我国历史上的这一时刻，我们需要几乎象 1940 年那样举国一致的联合努力。但我们虽然在 1940 年迎击希特勒的挑战之前产生出联合政府，如今却摧毁了联合政府而过早地回复到党派政治。

然而在这关于出口、进口的细节，关于美债和美贷，以及其余一切复杂的经济和财政问题的辩论（这在那段时期似已成为下院的家常便饭）之际，许多人心中盘旋着这样一种思想：真正的解决办法也许在别的地方。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企业谁好谁坏的辩论可以无休止地而且往往是毫无裨益地进行下去。但两派政党中的许多人都开始怀疑问题是否真的就在这里。这些人开

79 始觉得紧要的问题是怎样应用最现代的方法；怎样能促使人们更合理地（如果不是需要更辛勤地）进行工作；怎样使科技为生产需要服务；怎样把过去那些旧的、反动的一切限制（那些限制只适用于失业成为主要危险的时代）统统扫掉。一句话，只有正视生产问题才能真正解决财政问题。这在今日仍然正确。

甚至在 1946 年底，尽管政治斗争激烈，已有人产生这种看法。我和同僚在接近年底的历次讨论中曾说服他们可以利用对英王致词提出补充的机会，来引起对这些问题作一番有益的讨论。这是要进行两天的一场辩论；头一天由我提出修正动议。在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当时的有些论点也许还值得回忆。

在我国的漫长的政治和社会历史的每一阶段，似乎总会出现一个突出的主要问题。在相继的每个世代里，人们的希望和恐惧，想望和失望，人们的斗争、争论、失败、部分成功，都集中在这一问题上。在我置身议会的这二十年间，就业问题便是这个主要问题。每届政府都相继受到严重失业的祸殃。每届政府都设法想减轻它的痛苦和根除它的病因——遭遇各有不同，但从未获得成功。

与凯恩斯之名连系起来的，并为战时联合政府中各党派共同发扬和采纳的那个新的货币政策，还没有经受考验。因全世界对物资和服务工作的需求是这么大，而供与求相差如此悬殊，在未来许多年里似不会有生产过剩的危险。所以应使出口繁荣。当然价格和质量必须合适才行。我们在战后那么快就碰到不少障碍和麻烦，其中包括物资短缺，尤其是原材料。但大体上说，新经济政策站住了脚，我也真诚相信它会成功。我们在下一代的麻烦事不会是失业和通货紧缩，而是通货膨胀及其随之而来的各种危险。象我们这样
80 样一个依赖维持进出口平衡的国家，这特别危险。

……在我们开始进入的这个时代里，失业问题将为生产问题所取代——能否提高生产、能否战胜物资缺乏，能否增加有形与无形的输

出。这将是检验标准。政府的好坏将用这根尺子来衡量。他们是否能站得住脚将以此来判断。

如果我们把时间浪费在关于私营企业、社会主义、自由贸易以及诸如此类过时的和徒劳无益的讨论上，我们大家的前景将是黯淡的。这些斗争和争论已经不合时宜了。而上两次大战之间，各党的政府都采取限制生产的办法来谋求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平衡：

在雇主这一边不鼓励插进新手，从而减少了竞争。由于作出了内部销售的安排，产生了许多导致垄断或半垄断的方法。这些在当时的条件下和熟悉当时情况的人看来是合理的。它受到保守党政府和社会党政府同等的支持。同样，各职工会也产生种种限制办法，以使就业时间尽量延长，因为脱离一个职业就会冒找不到另一职业的极大风险。^①

所有这些做法，在过去不管有多大理由，到如今肯定是无法辩护的。它们好歹必须取消，至少必须改变做法。这将是本届议会及今后多年中相继的各届议会有待解决的问题。

莫里森答辩时采取一种很友好和建设性的姿态，他主要的批评是怀疑我所说的究竟有几分代表党的意见，有几分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虽则辩论最后以莫里森与丘吉尔之间的意气争执以及许多纯粹是党派摩擦而告终，报章和公众对我发言的主旨表示兴趣和赞许。这事如今看来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颇为新鲜。

1947年3月又有一次关于经济局势的长时间辩论，其时我进 81
一步发挥了同一论点，提出我对计划形式的一种见解，认为计划应以政府与工业界之间的协作为基础，这是民主社会中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一种纯凭权威办事的方法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工党极左翼及克里普斯本人。在这次为时超过三天的讨论之中，尽管照常出现政党间的攻击与反击，总的气氛是有助于消除当时临近的危机的。辩论确实是发人深省的。我重复表达这样的论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6年11月20日。

点,认为在一个现代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不管什么样的政府都不能摆脱很大程度的干预乃至战略性的管理。我们决不能回复到古典式的听之任之政策上去。我们保守党人反对这种教条毕竟已有一个世纪多了。问题显然在于政府在执行其任务时应采取什么方法,管到什么程度和怀着什么目的。

1946年11月我说过以下的话:

我们必须在十九世纪早期的极端个人主义和现代社会主义的极权倾向之间找出一种妥协办法来。这种妥协肯定合乎英国的传统,而若要得到合理的解决,它必须基于合理的职能分工。一句话,我们得搞出这样一个制度来,使政府定出的公共规划能够同私人的主动精神结合起来,使得秩序和自由能够并行不悖。^①

如今我又重复说了这些话。到辩论结束时我清楚看出,除了保守党的极右翼和工党的极左翼而外,一般人都接受那种类似我长期来倡议的中间道路的东西。其后出现的所有争论都在于方法问题而不在于原则问题。诚然,新近反对一切“计划”的呼声颇为流行。但很难认真对待这种反对呼声。十九世纪老的自由主义思想是不能复活的了。有时这种呼声是因滥施滥用计划的结果。有时这仅仅是表明一种姿态而并非政策。

1946—47年的冬天是多年来最可怕的。当严霜卡住整个国家的脖子时,希特勒及其轰炸所未能摧毁的这个社会和工业机构似乎一下子就垮台了。这当然由于时运不好;但部分也由于管理不善。政府自然强调第一种原因,而反对党同样会着重于第二种解释。不幸的是,当1946年夏令人不安的煤炭实际储存和将来储存数字开始为大家知道时,主要有关大臣欣韦尔采取了颇为漠不关心的路线。六星期的霜、雪和雾使一切陷于混乱。煤矿工业正处于从一种制度转变到另一制度的过渡阶段。这个,再加上铁路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6年11月20日。

和公路运输的困难，产生了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严重局面。对工业的动力和电力供应完全切断，对私人用户的供应严加限制。到1947年2月2日，失业数字上升到二百二十五万人以上。甚至到3月中旬仍超过七十五万人。换言之，失业率从一般认为多少是正常的百分之二点五上升到百分之十五。即使在自然困难克服之后，失业率仍保持在百分之五。

在这不幸的一年里，我国人民在赢得这么大胜利后的如此短促时间内遭到这样的灾难，他们当时的情绪如今是很难追述了。霜后继之以雾，霜雪消融后来了一场吞噬一切的洪水。世人记忆中从未有过象这样的事。残酷而又滑稽的是，伦敦连水的供应也因蓄水池污染而受到威胁。出口因缺乏燃料而剧减——估计损失达二亿英镑之数。最糟的是煤炭生产数字继续下降。这时各大臣之间也显出某种分歧，有的呼吁举国一致，有的继续鼓吹阶级斗争。比万的“虫豸”讲演当时还没有出笼而是到下一年（1948年5月）才发出的。但欣韦尔的名言说工人以外的任何人都一文不值（以后解释为他对这类人“毫不在乎”）在当时正是给人们以伤害之外又横加侮辱，因当时他在他那个部的工作干得特别差劲。他是燃 83
料大臣。

在这以前，政府交了一连串的好运，这时则似已到了一个转折点，虽则选民仍对他们异常忠心。事实上，在1945年到1950年的所有补缺选举中，保守党人从未夺回过一个席位。然而自从这次冬季的不满之后，大臣们的自信心未免稍有动摇。虽则我们之中很少人认识到无情的财政危机将如此迅速地临近，但政府主要成员应是深知事实真相的。多尔顿1945年10月的第一个预算案和1946年春的第二个预算案是了不起的成就，为市金融中心、报纸和公众欣然接受。尽管在战争开销能削减和主要部队能复员以前仍必须有巨大的支出，财政大臣还是大言不惭地说，在下一年中我

们将非常接近预算平衡。自然，在战争年代和紧接战后的年代里，财政赤字是难免的。但多尔顿在1947年4月15日提出的第三个预算中却声称他可以使预算有稍低于三亿英镑的盈余。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结果。报纸和公众都钦佩地赞扬这位财政大臣，不仅认为他讲得清楚透彻，而且觉得他有魄力和信心。

但他的内心必定知道，他主要担心的事不是国内开支方面的预算平衡，而是(国外)支付平衡上的亏缺和美元贷款的耗尽。艾登吁请政府“勿再沿国有化道路奔驰下去”，而应集中“他们的注意力，来解决供应受到威胁的食物、严重短缺的燃料、计划上数量不足的住房、因丧失牲口和因洪水而深受打击的农业，特别是(对外)贸易平衡问题。”

84 尽管危险日益临近，国有化机器仍是无情地开动着，从一个目标转到另一个目标，随之而来的是通货膨胀，花在补偿上的开支和新的投资。国民保健服务事业——多年来逐步走向福利国家的最终成就——定于1948年7月开始，使财政部的负担愈来愈重。在1947年间已经清楚知道，主要用在消费品上的美元(贷款)即将用罄。多尔顿在他那揭露事实最为彻底的回忆录中称之为“美元消失”的问题，开始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了。

但多尔顿仍然毫不畏缩地坚持他那个不值钱的货币政策。靠征收新税——即使一年能征二亿英镑来限制通货膨胀，在钱这样不值钱而又可以随便弄到手的情况下，他这个政策也不能生效。为什么在他和他各个后任当政的整个时期要把银行利率保持在百分之二呢？答复无疑是：要记得通货紧缩和限制信贷的岁月，它们伴随着痛苦的失业时代，并且可能是引起失业的原因。但一种新的背谬现象代替了老的。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里，我们曾诉苦说“财富满仓人挨饿”。如今，食物比战时还难得，几乎什么东西都限量配给或“供应不足”，住房缺得吓人，除了钱之外，什么东西都

贵或者难以到手。

1947年从春天到夏天，危机一直在无情地逼近。美贷和加拿大信贷原来打算维持到1949或1950年，指望到那时我们的贸易平衡可以平安无事了。

我们常提出质询(有时得到答复,有时被人回避),问美元贷款是怎么花掉的,还剩多少?天哪!由于物价上涨,借给我们的美元迅速贬值,百分之三十或更多的钱都付之东流啦。此外,每年约要花一亿二千万之数的美金去喂德国人的肚子。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在1945年底议定的条款已经不可能在1947年夏以前如约兑现了。我们承诺从(1947年)7月15日起在一切交易流通中使用英镑(而不是只当做资本交易使用)。我们按时履行了我们的诺言。到1947年7月底,三十七亿五千万美金(储备)中只剩下约十亿 85 美金了。还有六亿英镑的黄金储备马上也要耗尽。早受限制的进口计划又大受削减。这就必须使肉类配给降到比战时还要低。但因世界物价迅速上涨,这些措施对救济外汇不足很小作用。在整个危机时期,煤炭生产的继续停滞不前使人深为忧虑。除了总的生产迟缓之外,有些地区的非正式罢工又招致新的损失。随着生产下降和新劳力的招收减少,即使是最轻信的人也开始怀疑国有化带来的心理效果是否真象所吹嘘的那么大。

过了六个星期,我们感到吃不消了。当时美元奇缺而英镑充斥,果然不出所料世界各地向我们大量提取美元。8月20日,通过紧急磋商,不得不取消自由兑换。比这更严重的事也许是,自1947年9月起,美国贷款或信贷余额将只剩四亿美元了。于是就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重新采用一些古典方法来恢复信用。

夏末当美元继续耗失之际,全国都等待政府定出计划来。英镑地区对于美元的逆差据说如今已总共达一百亿英镑之数。但看来部长们仍然对局势无计可施。最后克里普斯终于以经济事务大

臣的名义于 10 月宣布一些更坚决的措施。若把业已宣布的削减计算在内,短缺的美元折合每年将达四亿七千五百万英镑(约二十亿美元)。对原材料和烟草及海外驻军进一步限制后,还可以再省下一亿英镑。国内将在资本投资方面削减二亿英镑作为“第一步”措施。新建房屋将予以推迟,允许开工的仅限有出口任务的工厂厂房。(这时私人房屋几乎完全不许修建。)他希望在商订各种国际协定后出口将有增加。此外美国宣布马歇尔援助计划一事给欧洲带来了新希望,这是美国政治家在充分知悉事实真相后具有非凡远见和慷慨精神的又一例证。如果对欧洲的援助本身不限于只用美元采购(我们相信这是很可能的),则英国出口的前景将是有所希望的。所有这些步骤都是多尔顿提出他最后预算案的前奏。但当这一预算案在 11 月 12 日提出时,一个议员把它描述得很恰当,说当时我国需要的和准备接受的是一次惊厥,结果却得到一服镇静剂。更大的惊厥还在后头。

工党政府的威信在其生命的这一阶段下降到最低点。它所受的信任大为动摇。局势严重程度的一个标志是,政府攫取了和平时时期前所未有的大权。8 月间通过的《过渡时期权力法案》,包括劳工管理权(虽然这权力很少使用),这似乎把无限的权力交给了政府。丘吉尔把它恰当地称之为“开给极权政府的一张填空支票”。但艾德礼和莫里森都不会是用行政命令搞一次社会革命阴谋的人。危险倒在于他们办事犹豫不够果断。选民们虽然受了打击和失望,他们也还没有转而效忠于反对党。我们寄托很大希望的格雷夫森德补缺选举,结果使我们失望。那里的票数也象其他两处票数一样朝我们一边摆动,但还不足以使我们赢得席位。

这就是 1947 年底的局势。艾德礼仍以表面上冷静的态度主持政府工作,在这困难的风暴中毅然保持清醒的头脑。想把他拉下马的企图无趣地失败了。社会党人一切计划的垮台到多尔顿的

去职达到极点(迄今为止,他那股兴致勃勃的劲头似是工党当年趾高气扬的象征),从而使一个具有突出品格和特殊才能的人崭露头角。如今工党甚至全国的希望都集中在克里普斯身上,指望靠他的力量来渡过难关。

在1947年的经济压力和忧患之中,政府突然出现一个奇怪的插曲。10月21日英王演词中提到关于修改议会法的议案,重新 87 引起了沉眠三十六年的一场争论。上院的否决权从两年减到一年。由于谁也没说过上院曾滥用它的权力或做事不负责任,所以政府很难反驳对它的这样一种责难,说这只是一个巧妙的政治伎俩,其目的是可以让钢铁议案拖到这届议会后期,不致于冒因其太晚而难免被上院否决的危险。到1948年春显然可以看出这就是他们的真实动机。3月间就这个问题举行了一次两党间的会议,达成了关于新上院如何组成的协议,但未能就对特定措施行使延期否决权的延缓期限达成协议。政府提出从二读起为期十二个月,保守党领袖们不接受这个期限,坚持要从二读起十八个月或者从三读起十二个月。我总觉得保守党领袖们这样做犯了错误。结果是新议会法案强行通过,上院削弱了权力,又未能因其成员的改变而改善它在公众面前的“形象”。这一争论以及其他争论,不幸在本届议会的余剩岁月里增加了党派斗争的气温。在议会解散前的秋天,政府安排了一次短期议会,其目的纯是为了在议会解散之前使那个按1911年法案规定的《新议会法案》获得通过。这一颇为不正当的手法又加深了保守党人的痛恨。

1948年中有个“改组法案”,它不仅取消了一人多选区投票的最后残余,还取消了大学代表席和两个市议员中的一席,并将议席作了大的重新分配。提到莫里森的“改组法案”,也许还值得追述关于选举时利用汽车的一场激烈(虽则也颇为可笑)的争论。1948年有人认为保守党将获胜,主要是由于他们有权用汽车接送选举

人到投票处去,于是就通过了一些繁复的规定,以限制或制止这一众所周知的做法。今日人们似难相信这个问题居然能有人提出
88 来。但在那些日子坐汽车尚被人视为富人的特权。“富裕社会”还得等“托利党的糟糕执政”十三年之久才得变为现实。

但这些是插曲。整个 1948 年中,议会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经济和财政事务上。在 1946—47 年那场灾难之后的十五个月中(即从 1947 年底到 1949 年春),政府的力量逐渐增加,全国的精神有所恢复。的确,在克里普斯的干练和决心的魅力感召之下,人们信任政府的情绪开始回复。如果人们能指责 1947 年底多尔顿的紧急预算不够雷厉风行,不足以应付经济局势的话,那么,对 1948 年克里普斯的预算这种指责就不适用了。间接税加得很重,对啤酒、酒精和烟草额外加税,作为压缩消费者大众过分购买力的主要方法。克里普斯一方面对低收入者作某种让步,而对那些付超额税者则严厉对待以平息他党内的意见。他的计划事实上等于是征收资本,因这是对高收入者“一劳永逸”的征税,以此索取追加一年的超额税。显然所得税每英镑九先令,超额税又提得很高,投资收入的追加税就只能从资本中来支付了。这一计划虽激怒了萧伯纳先生,却满足了工党的左翼。同时,“当局”改奉凯恩斯教义(按照这些新信徒一般所理解的教义)的效果是如此之大,致使银行利率始终保持在低得如今难以置信的百分之二的数字。

克里普斯在他下一年所谓的“偿付能力仗”里是较有希望的。问题是这样的,虽则预算里有七亿英镑盈余,但外贸差额有同样数量的亏缺。不过前者是英镑,后者是美元。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当年马歇尔援助的效果如何;而且虽则马歇尔援助要到 1948 年中才得到国会批准,克里普斯毫不犹豫地预言压力将会减小,外汇
89 亏缺将会减少,如果全国支持他征收高额税和过艰苦生活。不过是年春天作出了一项让步。汽油配给量改了,改到可以让公众终

于有每月旅行九十英里的机会；不过这一标准配给量并非现行各种特许配给之外另加的。

但克里普斯不能——或没有——收起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引起这些麻烦的政策。尽管业已国有的工业孱弱无力，国有化计划仍继续执行。通货膨胀性的大量资本倾泻出来，不足以为克里普斯在其他方面的措施所抵消。他把出口作为他的主题，下院的我党许多人指责他强调这个迫切需要。因他们觉得他没有充分认识到，在大规模生产的工业中，兴隆的国内市场是取得高额出口的主要基础。然而克里普斯大体还是正确的，在他的坚强领导下各方面感到有进步。如今至少是储备有可能维持到1949年底。1946年的净流失是二亿二千六百万英镑；1947年是十亿二千三百万英镑。有希望把1948年前六个月的净流失减到二亿二千二百万英镑。储备在几年内全部流失的危险似未使全国特别吃惊。他们想美国终归还得再来拯救。这是危险的幻想。克里普斯提倡稳定工资、采取走向一个“收入政策”的头几步，固定物价以及限制赢利和分红，他以越来越大的热情，以绝对的甚至感人的真诚宣扬这一切。如果它们没有产生更大的效果，那是因为政府并未实行他们所宣扬的东西。

这一年过去了，约翰·斯特雷奇在非洲丛林种花生供养英国的宏伟计划开始看出就要失败，并不久将冲击政府威信，传为一个可笑的妄举。多尔顿在沉默一年之后参加我们的讨论，责怨市金融中心和财政刊物施展阴谋挫败他那个不值钱的货币政策。但如今“多尔顿派”只剩七十六人，而且一般相信职工会的经费在这类事业上投资很多，所以对他重新露面有一定的抵制。克里普斯对 90 “反通货膨胀”的某些迹象（如消费者拒购奢侈品）在刊物上公开表示喜悦，说这是“朝向我们应走方向的头一步”。^①这句话至少概括

^① 《纪事年鉴》1948（伦敦1949），第42页。

了他的一部分哲学，即只要把一般生活水平降得低而又低，避免享受小奢侈品的诱惑，就可能胜利渡过难关。但是可惜啊，他虽能靠财政手段和其他手段部分地控制消费，增加生产的问题却不是这样容易解决的。

虽则马歇尔援助(正式名称是《欧洲复兴计划》)的财政手续颇为含糊(其中关于什么是英国直接从美国提取的，什么样的往复交叉支付是可以同欧洲进行的，都有繁复的条文规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得到三亿英镑之数的好处。所以随着1948年的过去，前景有所改进。克里普斯开始作出他那一长串的宣告，说是谈不上会有英镑贬值的问题。通过和各国缔结一系列双边协定后，我们的地位加强了。这些虽可悲地同战后世界满怀希望的多边贸易背道而驰，但他们在短期内是有用的和有利的。

到1949年春，看来已经时来运转前景光明。1949年初期政府可以夸口说稳定英国经济的希望就在眼前。人民所要做的只是愉快地接受暂时的困难和限制。

最恼人的限制也许是肉类配给的进一步削减到每周八便士，这是我国历史上所曾达到过的最低点。但这并非完全由于缺少钱，而是由于迟迟未能同阿根廷政府达成协议以及该政府未能履行其任务。其他方面情况有所缓和。1949年夏季数月中的汽油配给量加倍了，在历史性的五·一节那天，街灯限制取消了。大量拥挤的人群站在皮卡迪利广场观看耀眼的灯光，那是自从十年前战争爆发时一直熄灭了的。纸张配给也增加了；到1949年春甚至衣服和纺织品也可以自由购买了。

在1949年最初几个月的这种局势下，我们保守党人的前景是颇为黯淡的。我们尽可以反对克里普斯和他的哲学观点，但看来它肯定胜利通过了。议会补缺选举我们还是失败。地区选举也没

有多大进展。随着大选的临近,尽管我党的改组工作大有进展,我们当前的希望却不大。这就是1949年4月的情况。

1949年初几个月里,政府仍依靠克里普斯(这个传教士兼经济学家)的世界信誉胜利前进,因这两种职业受一般人的钦佩,认为是既有声望又有权势的。1月间克里普斯向公众保证说去年12月贸易逆差的数字是两年多来最低的。我们有了进步,只要不断努力,就可达到目标。他仍吁请限制工资与利润。莫里森也为同一路线出力斗争,看来好象工党领袖们真有理由表现得如此信心十足。和往常一样,议会内外我党那些不够坚定的支持者之间就相应散布一种不满情绪。人们开始更公开地谈论领导不得力。在一次我们深信能获胜的重要的南哈默史密斯补缺选举中,我们又失败了,这更肯定了他们的疑虑。又有人开始嘟囔丘吉尔年纪太大,无能,和不适应现代生活。我经常注意到,所有这一切无非是那些即将投入另一次竞选活动者的一种过敏反应。

一切似乎都平静地进行着,举行了关于林斯基法庭事件的辩论(结果是小题大作),应否取消或禁止打猎和骂人的辩论,是否需要改革文字拼法的辩论。国外局势虽还混乱,但似已不再象过去那样咄咄逼人。在国内,运输工业的罢工或罢工威胁只是件麻烦事,并无危险。在工会方面,阿瑟·迪金的坚定立场又一次挫败了共产党人的攻击。他声称共产党定在1949年8月用一年前在法国用过的同一方法进攻英国经济。这话引起很多人注意,并有助于加强公众对职工运动领导及其盟友工党的信任。哈·波立特(共产党领袖)的断然否认似乎肯定了指责的真实性。

在经济战线方面,我们怎样向美国说明情况以申请马歇尔援助的为难之处,由于一个副大臣的轻率发言所引起的反应而加重了。他宣称我们已完全恢复,达到海外支付平衡的日期在望。华盛顿的反对派立即抓住这句吹牛的话,决定要重新开会听取下一

年英国是否需要九亿四千万美元援助的意见。可怜的克里普斯这时不得不发出声明,说我们只有“皮克威克”或“克里普斯”式的复原。我们超过了战前生产水平,但至少需要十亿美元的援助才能渡过外汇难关。掀起得那么快的这一场小风波是很能说明情况的。但我们仍很少认识真相或懂得前途的危险。

这样,一切似都说明这将是平静前进的一年,其后的高潮是大选,而保守党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恢复到平起平坐的地位。贸易大臣哈罗德·威尔逊最近向英国布商保证说政府不打算把零售布业收归国有。议会末期那场闹剧就是以这个低调为背景的。4月6日提出了预算案。这将是保守党获胜的里程碑和社会党坟地的墓碑。现在时运之潮终于流转到有利于我们的方向上来了。退潮约在将近十五年之后才到来。

结果提出的是个不“硬”也不“软”的预算案。它是中性的。以后被称作是“加固性”的预算案。换言之,因它所作的是大多数正统权威认为是该做的并有所补益的,它没有使任何人心喜。如果克里普斯对“富人”再施行一次野蛮的打击——就是说如果他对收入较高的一帮人(早已被高税弄得几乎绝迹了)再增加负担的话——他会使他的大多数支持者高兴。如果他露出些苗头要采取一种奖励生产的“物质刺激”政策,或者采纳一些走向较大自由化的措施以利工业发展——特别是如果他对政府开支作出重大削减——他的建议将受到保守党人的欢迎,并且一定会受到各方面许多温和派的欢迎。但1949年的那个预算案,虽然照常被他阐述得那样清楚透彻和真诚,并且无疑是怀着危机临近之感而提出的,它——在使人猛感失望之后——引起了大家的愤怒浪潮。各方面对它不断猛烈攻击。又因这很可能是大选前的最后一次预算案,使他和他的同僚再也没有时间进一步玩弄伎俩。

在议会早期提出一个“平淡”的预算案,可使一个政府获得战

略上(如果不是战术上)的好处,只要它能以此为基础在后期作出有效的进展。但作为伟大的社会党议会(在1945年选出时对它寄托了多高的希望)的最后一次财政措施来看,它似乎是软弱无力并带着失败主义气味的。1948年的“特殊贡献”(它把附加税提高到几乎成为资本征收的形式)不能再搞了,即使政府可以不顾或回避当时作出的诺言。对大产业增加了一些遗产税,或者甚至对聚赌征税的增加,都不能使政府的支持者感到满足。高达四亿八千五百万英镑的食物津贴,如果不变,估计来年将达五亿六千八百万英镑,现在必须削减了。必须规定一个四亿六千五百万英镑的限额,而不管必然要随之而来的生活费上涨。邮费有些增加,但在某些社会福利方面的免征所得税和对工业的救济措施(增加对新工厂的津贴)可与之相抵。但在前几年那些激动人心的做法之后,这一切做法算是十分顺畅的。

以乔治·威格带头的工党后座议员们称它为托利党的预算案, 94 以奥·斯坦利为首的一批保守党人则称它为“一代社会主义政策和社会主义宣传的终结”。有人抱怨说财界和英格兰银行在他们长期反对社会党财政政策的斗争中获胜了。另一些人说职工会领袖再也不能保持限制工会的政策,持续不断的物价控制和工资控制的一切希望现在落空了。历史又重演了;有些这种怨言当时觉得那么新奇,如今可悲地变得司空见惯了。如果预算案中含有社会主义政策的惊人发展,它会受到激烈反对,但能获得强有力的甚至热情的辩护。如今破天荒第一遭,连克里普斯的魅力也不中用了,魔术家的魔杖失灵了。念符咒似乎不起作用了。

初步效应表现在地区选举上。兰开夏早已转向托利党,但在提出预算案后,工党在全国各地都遭惨败。伦敦郡议会的选举产生了戏剧性的和十分意外的结果。原来工党有将近六十名的多数,现在两党完全相等,此外仅有一名自由党参议员举足轻重。这

个意想不到的角色落在一位受人尊敬的虽颇为平凡的下院议员珀西·哈里斯爵士身上。为及早进行选举的预先宣传象一股洪流开始以越来越大的流量倾泻出来。几个月前工党方面那么高昂的士气很快变为低沉；而反对党方面的士气则相应地高涨起来。

这时我们进入了长期的美元危机，它将支配是年夏秋英国政治。对这个大家已是太熟悉的问题，如果再追述其一切细节，未免乏味，但简单提一下，使大家了解我国多灾多难的人民受到什么样新的打击，还是必要的。

麻烦开始于欧洲主要国家在布鲁塞尔的财政部长会议上，在那里关于马歇尔计划负债国的提款可否兑换为美元以及可否在欧洲地带自由转移的问题，讨论陷于僵局。经过在巴黎重新进行长期商谈之后，达成妥协；但问题解决后不可避免的美元流失，显然将给英镑地区早已枯竭的美元储备加上重担。如以往经常发生的那样，美国的小小衰退对欧洲，特别是对英国，产生过大的影响。结果是对美出口下降，这又因美方关税过高而造成的贸易障碍以及对重要原材料（特别是生橡胶）进口的限制，使情况更加严重。为支援人造橡胶工业而采取的这一保护措施，使英镑地区至少每年损失一亿英镑，这是殖民帝国战时所作努力的可悲报答。^①在官方和非官方的圈子里，照例有人讨论许多计划：黄金提价；削减关税；新的世界货币流通制度。照例没有一项计划被采纳。讨论日益延长，危机日益加深，于是关于英镑应否贬值的争论甚嚣尘上。

7月间美、加、英三国财长集会伦敦，发出例行的公报，措词含糊，但能抚慰人心，并正式否认贬值问题。公报中议定三方财长于9月间在华盛顿重新商谈。同时英国政府开始单方面采取一切短期应急措施。早已有限制的自美元地区的进口许可进一步削减。（值得提一下的是，我们仍生活在战时遗留下来的许可和控制的严

^① 《战争风暴》原书 168 页。

密制度之下。)机器、木材、纸浆、非铁类金属、钢和烟草的进口将予削减。糖配给量减到八英两,并由于商店里反正见不到糖果糕点,战时配给制又复活了。但所有这些办法都不会起作用,除非能用某种办法使出口增加,或者再搞到大量贷款。不过在1947年巨额美贷之后,新的借款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这时候党派的宣传小册子大量出现。一方提出“工党对英国有信心”,他方又以“英国的正确道路”来反击。丘吉尔以最富于战斗性的姿态向全国作了两三次有力的演说。艾德礼则巧妙指责保守党“装扮门面”来作答复。事情就这样下去,一直弄到公众情绪如此迷乱,对前途未卜的情绪如此有害,迫使首相于10月13日采取不寻常的措施,宣告他无意咨稟英王而于当年解散议会。 96

但对于英镑(贬值)的生命攸关的决定已经作出了。局势变得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储备的流失从涓涓滴滴而涨大成洪流。鉴于英镑可能贬值以及国内外有大量的(或者如克里普斯所宣称的)“黑市”和“廉价英镑”交易,停止预约和先期付款。于是在9月18日,克里普斯在一次著名的广播中宣布英镑从四点〇三美元贬值到二点八美元。在考虑到使英镑浮动或定值的好处后,政府决定把英镑重新定值到可能维持的最高点。在这次广播中,克里普斯说了一句不中听的话,常被人引用来反对他。他在回顾近几年的历史时,说到“我们设法用一系列应急措施来对付一系列危机,而当每一措施无能为力时便引起一系列危机”。

9月底重新召开一次短期的和没有结果的议会。对这次被迫采取的措施有什么相对的好处和坏处,进行了漫长的辩论,但未得出很清楚的结论。政府坚持说,贬值以外的唯一抉择是通货紧缩,大量失业和贫困。同时仍不得提高工资;不得增加红利;要奖励储蓄;要不顾一切牺牲增加出口。反对党以同样激烈的口气宣称这都是政府的错误。

辩论没有说明什么问题,只是使大家觉得现今正是合适时机,让全国来决定愿意选什么样的政府来操舵渡过危机。虽则在10月底议会照常开会时首相宣布进一步削减开支,反对党领袖进一步贬谪政府的政绩,但仍然存在着总的和增长着的不现实感。

97 在议会结束使这些无益的争论告一段落之前,有过一段关于钢铁法案辩论的奇怪后文。大家同意在如下的谅解下将使上院通过这一议案:新的国家机关得在1950年10月后才去接管,法案得在1951年1月1日后始能生效。换言之,这等于是让行将举行的大选来裁决这个问题。两党都毫无热情地接受这一妥协办法,但都感到宽慰,觉得在一些重要得多的问题急待解决之际,在处理这个争论上至少有了一定程度的明智。

12月16日议会终于闭会。许多议案(大部分是次要的)依法登入法案录。但大家都知道不久即将解散议会,我们的讨论要从会堂转移到竞选场上去了。我也和同僚们一样对即将到来的政治斗争满怀热情,虽然我们似不可能在一次选举中击败我们面临的这么大的多数。而且深思之下对胜利后的前景也确实不那么吸引人。我们所接管的只能是一种黯淡的而且几乎是危急万分的局面。

这次伟大的工党议会至少在财政和经济方面的历史就此结束。这是掺杂了胜利和挫折的历史。这五年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如今还存在。怎样能使经济扩展而又没有通货膨胀;怎样使我们既能承受储备通货的负担又能享受它的好处。在持续六年之久蒙受如此可怕损失(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二次大战之后,紧接着就产生这些特别迫切和难于解决的问题。即使时至今日,虽在许多更有利和更从容的条件下,我们仍不易站稳在这两难之间的一条狭路上。一方面是不适当的扩张经济,结果是过高的工资、薪金和利润,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的一切风险;另一方面是通货紧缩措

施,随之有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以及经济停滞的危险。

我们的地位在一个方面是大为改观了。现今很难追想战后头几年仍存在的限制和控制程度之深。有这么大的机器开动着,我们98无法避免“兑换”危机和以后的“贬值”危机。随后,一个左派政府被迫放弃它在竞选热潮下贸然许诺的愿望,并由于不得不向冷酷的现实局势(它的造成部分地应归咎于政府)低头而使其一大批追随者灰心失望。然而那一届议会的幸存者仍可回顾工党运动史上这一伟大的时期。1945年的政府是由相当大的多数民众选出的,他们在下院享有稳固的地位。这届工党政府同1924和1929年的不同,它是“掌权”而又“当政”的。它的支持者可以满意地看到我们这个混合经济体中产生的变化,这是用大刀阔斧的措施把我国一些最重要的工业和公用事业收为国有并置于国家控制之下而引起的。这些决定一旦实施之后就被接受或只部分地取消。他们还可以自称主持了社会革命的迅速前进和福利国家的飞快发展,虽然这福利国家的基础是他们的几届前任早就打好的。

在与英国生产发展及其工商业前途关系最密切的人员中,不管是经理人员或工人,都在本届议会的最后几年中产生一种挫伤的感觉,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加之英国财力和军力的相对下降(这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不好受的),这有时就使各党中较多思索的人引起一种忧郁的情绪。这不是失败主义而是灰心失望。斗争曾是那么艰辛。胜利的果实似乎又那么苦。我曾在1949年夏同陆军元帅斯马茨谈话时(也许是愚蠢地)表达了这方面的一些感情。他回去后不久写给我一封信,重复表达他那较为健康的观点。这信至今我仍珍存着。信中最末是这几句话:

我深感我们身上的重担子。英国的战斗仍在进行,但其意义比1940年的战斗更为深刻。这也是全世界的战斗,全人类的战斗。我在那场合下所说的那几句话正是出于迫切感而说出来的。

99 在南非，事情糟到远甚于我可能相信的程度。但这里战斗也在继续，而且一直要继续到又兜过一个圈子让人民再见到光明时为止。正是由于这个战斗，所以我不顾年迈而仍站在前线。

现在正因他也象丘吉尔那样与世长辞了，我们更需要以这种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来勉励自己。

第五章 俄国的侵略

在 1945 年夏以这样一个胜利的多数当选的工党政府,如果说 100 它在国内注定要受许多迫切困难问题的折磨,从而妨碍他们成功地推行他们的许多社会主义信条,那么他们所面临的国外问题就更为棘手了。正同国内问题一样,眼前的危险起初是被战争胜利后的幻想与庆贺心情所笼罩的。但新政权的主要大臣在其上任时并不是没有学识和经验的人。他们许多人在丘吉尔政府中任要职,并在战争将结束的年代里分担那些开始使丘吉尔伤脑筋的种种忧患。虽然他们仍痴心希望英国的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可以同俄国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府搞好关系,他们对俄国日益蛮横无理的迹象不可能闭目不见。

西方盟国和俄国的主要协定是 1945 年 8 月的波茨坦协定。在这会议的前阶段,丘吉尔代表英国,杜鲁门总统代表美国^①。因英国大选结果尚未分晓,丘吉尔便邀艾德礼和贝文同去,使不管大选结果如何,工作不致中断。正是在会议期间,7 月 17 日,收到了新发明的原子弹试炸成功的消息。一星期后,在与丘吉尔商定之后,总统把这件大事通知了斯大林。

波茨坦会议上的主要问题,除了关于管理德国的及赔偿问题上的许多争吵之外,主要是波兰人要求割让迄奥得河—西尼斯 101 河为止的德国领土。这个要求得到俄国人的支持——而且事实上为他们所怂恿——并因该地区已被波兰人所占为理由而振振有词。但丘吉尔在早先讨论这个问题时只打算让波兰西部边界划到

^① 罗斯福总统于 1945 年 4 月 12 日逝世。

奥得河—东尼斯河为止。他竭力反对这一额外要求，因这样一来又要有三百万德国人迁离故居，使离乡背井的德国人总数达八百万或九百万人。此外，这些德国难民将使西方盟国所要养活的西德人口增加，而且他们将失去以前供他们衣食之源的土地。用丘吉尔的话来说，“他们得到食物，而我们得到待哺之口。”

俄国人用“德国人都已跑光”为理由来为他们的要求辩护，但这话与当时获悉的情况不符。俄国人提出将此事留待在和平会议上最后裁决，作为一种妥协；但这不过是一种骗人的让步，因为到了有可能开什么和平会议的时候，占领已成了十分之九的合法。因此丘吉尔坚决不同意。丘吉尔走了以后，只留艾德礼和贝文作为商谈人员。他们终于被这样的理由说服：德国人逃走后留下了“真空”，波兰人正好去填补，至少“在目前暂时如此”。

波茨坦会议结束后不到几天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事件，这一惊人的消息使举世为之愕然，绝大多数人是完全意想不到的。8月6日在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三日后又长崎投下另一颗。效果是毁灭性的。8月14日日本投降，二次大战于此正式结束。在这些新奇而阴郁的环境下，人类进入了核时代。

但当时英国眼前面临的局势并不是危急万分的。尽管俄国在波兰的立场矛盾，事情仍可能搞得比我们所担心的好一些。1945年7月成立波兰政府，其中包括农民党领袖斯坦尼斯拉夫·米科莱契克。雅尔塔协定的结果至少使他们形式上组成联合民族政府。尽管有许多令人不安的事态，大家仍相信通过友好的商谈，由贝文特别耐心而坚定地进行工作，情况将会好转。因俄国人的意图虽属可疑，但尚未清楚。

客观地讲，英国的地位肯定不容乐观。我们的基本弱点暂时为胜利的欢腾所掩盖。在战时，我们的威望加强了，首先是由于1940与1941年我们独力抵抗希特勒，其次是由于大不列颠及英

帝国投入战场的兵力超出其人口比例以及他们的光辉战绩。但我们力量的削弱，虽然掩盖着，却是真实无疑的。除了长期斗争对全体人民的重担之外，我们把经济完全转为战争需要服务，其规模之大远超过美国试图做的或德国人已做到的；我们的国外财产损失十亿英镑；所负外债至少达三十亿英镑。我们的出口贸易大部分放弃了，失去了许多最好的顾客，有的是因他们自己破了产，有的是因为我们无力满足他们的需要。在东方，对日战争的胜利（主要是美军打胜的）未能恢复我们昔日的威望。这一切都使英国国力急剧下降，其后几年接踵而来的经济危机就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这一点。更有甚者（虽则我们起初没有认识到它的重大意义），我们给白人自治领以完全独立主权的传统政策（这在第一次大战后终于实现），至今以不可避免的并难以摆脱的势头向前推进，把我们在亚洲与非洲的领地也包括在内了。同时，根据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声明，全部美军将于胜利后两年离开欧洲，美国似又要回到它传统的孤立政策上去。在此期间，英美两国的武装力量则迅速复员。由于控制半个欧洲的俄国兵力仍然毫不减少留在欧洲，这样，西方盟国的力量就开始减弱而苏俄力量则仍然强大。103但在短短几年内这一切都颠倒过来。俄国侵略的结果使美国舆论根本改变，并使美国政府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相应改变。

1945年的局势与1918年的局势有一重要的不同之点。两次大战都搞毁了西欧与中欧；但在第一次大战末俄国和德国都一败涂地。如今俄国虽在人力物力上受重大损失，却是赫赫的胜利者，持有巨大人力和大量武器装备。俄国政府也不用担心公众舆论要求他们迅速回复平时状态。加之俄国居于中央地位，能以其日益增长的威力对四邻国家施加压力，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1945年后英国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应是重建经济；确保其自治领（其后是英联邦）支持英国的外交政策；在不影响维持我国势力

的条件下尽量减少我国膨胀了的兵员；尽量争取美国的帮助而又不要惹得他们退回到孤立主义；尽我们力之所能（而不要盲目乐观到无视现实）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这种情绪在头两年是左右一切的。

1946年2月20日我被选定来发动一次历时两天的外事辩论。外交大臣贝文要求最后发言，而没有一个大臣在我之前发言，这种不同寻常的程序使我颇感为难。在表示欢迎联合国第一次开会（一个历史性事件）后，我觉得该说一下我们不应把另一方面的情况视若无睹。大国之间的关系现在是大大地甚至是惊人地紧张起来。三强中这个或那个的四周形成一群新的卫星国。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俄国外交政策似是要在地中海和中东指向公认的和既成事实的英国利益。在安理会上似也采取同样的伎俩——攻击世界安全与和平的一切薄弱环节。

104 尽管在战争年代经历这么多困难而仍这么牢固保持的英、美、苏同盟，现在已经实际上——虽则还不是正式地废除了。要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将是愚蠢的。

自然，我把一部分发言时间用来说明和辩护英国在希腊的政策，如今已成功地证明它是正确的。意大利恢复元气，成为地中海一个稳定的和民主的国家，这是英国和世界的利益所在：

停战条约签字后将近两年半了。他们争取回国还要走一大段路。美国人和我们都为意大利出了大力气，现在的紧要工作是应该并且早日签订正式和约。^①

（事实上，又过了一年还未签订和约。）接着我表示担忧说，意大利将成为大国外交游戏的一只棋子，而这对意大利和我们都是不利的。这一切不定因素产生一种猜疑和不信任的气氛。我记得梅特涅在维也纳会议上听到俄国大使死亡的消息时有这么一句名言：“唉”，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6年2月20日。

他惊呼说，“真的吗？这能是什么动机？”我得承认，现时舆论的焦虑（更不用提日益加深的怀疑）情绪也许比第一次大战后自我陶醉的乐观情绪健康些。但尽管我们有忧虑，力求搞些妥协而不要放弃努力，显然是正确的。因此我毫不迟疑地代表我党全力支持贝文，支持他阻止欧洲趋于最后分裂的斗争。

在我发言的最后部分，我试图打破当时（而且如今仍在一定程度上）对苏联政策的神秘感。我提出什么是俄国人真正想要的？这一切行动后面的动机是什么？那是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沙俄所追求的扩张政策（当时使欧洲许多国家大为不安）的新表现吗？在革命时期暂时收起的这种愿望是不是重新支配了他们？似乎有 105 那么一种不断出现的力量曾经先后支配了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现在俄国是否也屈服于这种力量，决心要称霸世界呢？这是不是推行一种新帝国主义？或者如同许多人所相信的，这是不是又回复到传布国际共产主义的热潮？可能作出的解释很多。如果要我们就要成为任何一种新侵略的牺牲品，我们就将尽力保卫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精神遗产。但只要有可能，我们应力求知道真相：

这些事太重大了，从党派的或先人为主的立场来对待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做亲俄派或反俄派；我们必须做亲人类派。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让它这样下去，那就会充满危险，最后势必引向大灾难。^①

为求得出一个可能的解释，我提出一件事，这是俄国人在地中海战役之际及以后向我十分强调指出过的。我觉得我们有时对俄国人民的心理背景估计不足：

在整个俄国历史中，在早期的、中世纪的以及现代史中，俄国先后受到一些敌人从东方和西方的人侵。俄国最近的宣传（电影、著作的或口头语言、英雄勋章等等）都集中于宣扬过去抵抗外来侵略的英雄人物，这不是偶然的。不管是迪米特里斯·董斯柯，或是库图佐夫，或是苏沃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6年2月20日。

洛夫，这些大人物的名字都重新唤起在公众的心头上，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对俄国领土的先后几次侵犯（在最近一百三十年中有四次，拿破仑，克里米亚人以及德国的两次入侵），每次都引起巨大的苦难，使俄国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最近这次最为惨重，其程度之酷烈我们也许很难体会。^①

这一切使俄国人产生什么反应呢？当然是追求安全。上次大战后法国要求获得莱茵河前线地区，谋求的也是安全。当他们两者都
106 得不到，得到的只是美国的担保，他们就不得不展开一系列外交斗争，以形成各种同盟来孤立德国。是否可以这样说，苏联政策的这种沙文主义表现，为的是谋求保险而不是扩张；他们本能追求的目标是安全而不是帝国主义野心？是不是就为了这个目的，

所以才搞出一批卫星国和仆从国（以实力和主义，双管齐下，做到部分地强加控制，部分地使之皈依）作为新的防疫带？这些小国形成一种防御工事上的护坡，他们向克里姆林宫求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理论指导，向当地的俄国指挥官求取物质支持，并用他们的武力和警察而不是选票箱来作为权力工具。^②

如果对俄国动机的这一解释正确，那么只要应付及时就不一定是不可收拾的。听任和拖延都可能会使我们陷入深渊。安理会这一工具已变成只是公开辩论的讲坛。我们早晚得突破它，通过外交途径和个人接触，重新建立一种真诚谈判的方法。

在这次两周辩论期间，传来了丘吉尔的富尔顿讲演。他用这样一句名言：“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拉下了一道铁幕，横跨（欧洲）大陆”，震动了甚至激怒了美国舆论。波兰发生的事件，确实使那些相信斯大林会守信用的人大为失望。起初引起人们关心继而使人愤慨的，倒还不是国界的改变，而是该国的逐步布尔什维克化。波兰这个友好国家的安全和自由，毕竟

^{①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6年2月20日。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诱因，虽不说是其原因。波兰军队在漫长的意大利战役中，在盟军指挥下忠勇作战。波兰空军曾赢得当之无愧的英名。对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俄国确也在开始施加压力。但至少从狭隘的观点讲，他们可以看作是以前的敌国，无需我们为他们担心，也无权要求我们去帮助。

107

所以富尔顿讲演的反应是各式各样的。美国主人对丘吉尔本人是热情欢迎的，对他的讲话主题则是有保留的。把共产主义比做法西斯主义，这对我们不久前的盟国似不够礼貌。二次大战肯定无疑地至少是一次终止战争的战争。那么这位老政治家在搞什么名堂？是不是吃饱了饭闷得慌？是不是他失权之后的失望情绪？或者——那样想可有点令人不安——也许他是正确的？在以前他毕竟是正确的。

在英国国内，官方和非官方的舆论界领袖，都装作感到麻烦和震惊，也许主要是感到麻烦。首相、外交大臣和所有工党议员都竭力要同这位惹是生非的家伙以及他那危险的思想脱离关系。许多人走得更远，要求对他公开批驳甚至谴责。这一切丘吉尔必定早已料到。但他特意决定要把这种危险戏剧性地告诉人们，而当时所有在位或不在位的美国人，则一直决意想对此装做若无其事，或置若罔闻。

我虽然同意丘吉尔对事实的分析——谁能听了他那句句若敲警钟的雄辩而无动于衷呢？——但我还不能十分肯定，他对伟大俄罗斯人民的统治者的心情和动机，是否看得过于简单化了。斯大林是否真的那么有权，可以纯粹用独裁手段推行他的政策？记得在1945年3月战争结束前不久，当时在西欧“满天飞”的罗斯福总统的许多私人代表之一爱德华·弗林到卡索塔来访我。对那次访问我有深刻的印象。当时或在以前他的职业是政治竞选活动的大老板；他也是个仪表堂堂颇能惹人喜欢而且非常精明的人：

弗林对俄国的看法很有意思，颇有独到之处。他非常欣赏控制着苏联的那个政治机器。“他们是‘一帮’伙计。”但他觉得我们都易于把斯大林那至高无上的地位估计过高。他并不把他（如我们今日所流行的）看作是波拿巴（即拿破仑）之流的人物（第一执政官，虽名义上不是皇帝）。弗林认为，一架政治机器是要靠它的支柱的。“老板”必须有第一流的“二掌柜”。这些二掌柜必须是强有力的、活跃的、聪明的、苦干的。否则的话，“老板”本人也会站不住脚。他也不能依赖精神统制权（象教皇那样）或执礼如仪神圣不可侵犯的世代传统（如同一位沐膏加冕的帝王或沙皇）。

弗林认为，政治局（不管它叫什么）还是很坚强的。他觉得“伙计们”对斯大林在雅尔塔的让步不太高兴。许多人觉得他在波兰、罗马尼亚和一般解放区的妥协上走得太远了。自从他回莫斯科后，“伙计们”一直在“阻挠交易的实现”。他们（他同莫洛托夫积极合作，莫是妒嫉斯大林的）用一切手段阻止已达成协议的实施。因此，照弗林看来，斯大林不敢采取积极的步骤，虽则就他个人说他是愿意履行诺言的。斯大林也象参与那些会议的罗斯福和丘吉尔一样，喜欢装出是个大权独揽的人。虽则控制（往往是反对）总统和首相的那些力量是公开的，但它们并不比那些暗中和私下对斯大林起相当作用的力量强大多少。^①

经过一场伟大而英勇的斗争，在那场斗争中他们几乎惨遭覆亡，完全靠超凡的努力和极高的献身精神才得以从中翻过身来，在这之后，我们当然很有理由相信俄国起了许多变化。

1941年德国的进攻是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痛苦打击，尤其因为它没有预料，所以更为难堪。他们两人对希特勒所怀目的的明显征象都不肯相信。^②但除了因战争而引起的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混乱之外，另有一桩更危险更微妙的事使俄国统治者感到担心。入侵德军在开进乌克兰时确实受到许多民众的欢迎。如果德

① 1945年3月21日。

② 《战争风暴》，原书第148页。

国人的行为稍为慎重些，他们很可能搞成一股强大的分治运动。但他们照例蛮干，以致丧失人心，而没有用让步博取他们的好感。^① 不过向前推进的德军被作为解放者而受到欢迎的这第一个阶段，已使莫斯科震惊失色。其后，当战争快结束时，俄国的农民大军开始横跨西欧，他们第一次有机会看一眼外部世界的情况，看到那里即使在连年战争之后还是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和文明世界的许多新鲜玩意。这一切都对士兵有深刻的冲击。最后，战争时期为唤起爱国心，必不可少地宣扬俄国过去光荣的历史，激发了往昔沉眠已久的情操。以为俄罗斯的生活和光荣只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才有的这种想法相应地削弱了。“神圣的俄罗斯”这一概念又从迷朦中抬起头来。从一定意义上讲，自 1917 年以来一直有一道“铁幕”；在战争末期的几个月中这个幕暂时拉起。这也许（或者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正由于害怕内部的反应而并非出于搞新的征服——出于进行一次新的侵略的愿望。

但俄国军队是声威赫赫的。他们不仅有效地占领东德，对波兰日益加强控制，而且由于西方盟国的错误战略，使他们在维也纳处于凌驾一切的地位。^② 斯大林世界革命的计划搞到什么程度在当时而且迄今都是不清楚的。世界革命是托洛茨基的大口号，而托洛茨基曾是斯大林最危险的敌人。斯大林曾经说搞“一国社会主义”。现在则是一系列地扩大到“一个地带社会主义”。^③ 这一地带的控制权肯定要看作是对俄国生死攸关的东西而严加守卫，这部分是为了防止西方思想的毒素渗入马克思主义的土地，部分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军事侵略的安全需要。

他们这后一种恐惧究竟有多少真实性，我当时不能嗣后也很

① 帕蒂布里奇著《战后俄国史》（伦敦，1966），23 页及其后。

② 《战争风暴》，第十八章。

③ 见帕蒂布里奇前书 38 页。

难下一个断言。俄国政府肯定应该知道，美国决不会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但自 1918 之后俄国人的观点无论如何是有了改变的。第一次大战后，俄国的共产主义政权勉强从外国干涉势力所策动和支持的一次内战中幸存下来。然后，在革命热情的劲风鼓舞下，他们把重点放在世界共产主义上，几乎当作是为使革命能够生存下去的一种防御武器。二次大战后，苏联的动机更复杂了。首先是需要保护马克思主义俄国的贞洁，因它有被资产阶级思想玷污的危险。其次是本能地要建立一种强有力的防御地位，如果一旦再有战争，以确保不让它在苏联领土内打——即采取一种纵深防御政策。第三，许多世纪来支配俄国的老的帝国主义图谋又复活了。最后，德国以及德国重新复活的危险是斯大林及其继承人最念念不忘的事。

到 1947 年春已很清楚，昔日盟国间继续团结的前景确实黯淡得很。幸而以俄国和三个西方盟国为一方的一些和约还能够一致缔结。于是对意大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芬兰的和约这时都签订了。但这在各国的效果是很不相同的。盟国管制委员会撤走后，已经使意大利实际上得到自由。芬兰靠那种巧妙的平衡外交(这是那个勇敢国家历届政府采取政策的特点)，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虽然只是在损失不少领土和给俄国偿付了重大赔款之后才取得的。芬兰政府也被迫同意严惩它的主要大臣，其中包括冬季战争的英雄人物之一维诺坦纳。然而芬兰仍旧是自由的。但就保、罗、匈说，盟军管制委员会撤走后接着是苏联控制的日渐加紧。我们无能为力地眼看着东欧的反共人物逐个消灭，流亡外国算是幸运。

这样，昔日的希望随着日月的推移而消失。贝文进行了刚强的斗争，他的神经从未衰弱，他的决心从未减退。他仍拒绝丘吉尔在富尔顿阐明的主张。但 1947 年 3—4 月间的莫斯科会议未能就

欧洲的任何重大问题取得进展。正如以往那么经常发生的情形一 111
样，丘吉尔的警告和预感证明是正确的。美国逐步被拖入另一次
世界角逐。美国舆论只是勉强地接受欧洲分裂这一冷酷的现实。
在整个 1946 年中，驻在海外的英军人数与美军相等，而且尽管我
们有一切经济困难，仍有人在谈起 1946 年秋要更快地撤退美军。
当时美国人的态度是，一旦俄国侵略，欧洲就应该放弃而不是保卫
它。但在 1947 年春——主要是由于莫斯科无济于事的争辩——
他们的政策有了根本改变。是年 3 月，杜鲁门总统致函国会要求
给予欧洲受威胁的自由民族以军事和财政援助。其中包括对希腊
和土耳其赠送四亿美元。

贝文总是坚定地想耐心谋求达成四国协议，即使其成功的希
望显得可疑。照他在 1946 年 12 月 22 日的广播，工党官方政策明
确表明，英国社会党人仍希望充当东西方（俄国和美国）之间的“调
停人”。他声称，英国既不赞成美国那种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也
不赞成俄国的共产主义。他完全反对丘吉尔所要求的那种与美国
结盟的想法。他的目的是要使俄国和美国进行合作。甚至在莫斯
科会议失败后，贝文仍未灰心。

1947 年 5 月 15 日下院展开一场大辩论。外交大臣用他那非
常富于个人风趣和独特的风格带头发言。他先是提醒大家说已经
没有德国政府可与之打交道了，“战争的结果是一场大破坏”。^①所
以他办事没有先例可循。但问题很迫切。如把重建工作不适当地
推迟，困难将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如果在下次会议（11 月间开）中
未能就德、奥以及东西方关系等主要问题获得满意结果，那么谁也
不能预言世界事务将会朝什么方向走。

同时，他对双方互相指责的情况表示遗憾。例如，俄国人指责 112
我们雇用并保护前纳粹分子。这一切都是很不真实的，并且可用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7 年 5 月 15 日。

事实和数字来证明：

如果考察一下给予对德管制委员会和行政当局的巨大任务，即肃清那些经希特勒教条灌输的最坏的纳粹分子，我们就会认识到他们完成了一项巨大任务。^①

我对这话很同情，因我们以前在意大利正好也碰到同样的麻烦事，并在我当盟军管制委员会主席时也受到同样的指责。贝文的主要论点是：波茨坦协定已作出，就应无条件无保留地全部实施。

当时争辩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关于在德国留下的工厂及其今后的用途，以及许可或鼓励它达到的钢铁产量。俄国人颇为自然地受两种矛盾愿望的支配，一是想拿走他们马上用得着的一切资财，一是需要继续维持当前的一些生产，以求不断取得赔款。这一切就导致长期的、烦人的无益的争论，至少是除了对西德人以外对其他所有人都毫无益处的争论。而西德人则在受了几年苦之后，大部分在它昔日敌人的帮助下，重新装备起现代化工厂来。同时，由于波茨坦协定并非实际上在起作用，英美占区在经济上融为一体就成为当务之急。这事莫斯科自然不欢迎，但贝文坚定地为其辩护：

113 除了粮食问题之外，解决目前德国困难问题的良策是首先成功地融合英美占区，然后把其他两个占区和联合的英美占区融合，只要一旦他们有了这种准备。我说过那么多次的融合协议，对其他人的加入是开放的。最后，我希望并相信它会导向产生一个统一的德国。^②

尽管法占区不久即和英美占区融合，但贝文那个较大的希望始终未能实现。

关于奥地利问题，他没有什么鼓舞人心的话可以告诉大家。他以前希望根据条约条款在莫斯科达成一个协议。但这仍因德国

^{①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7年5月15日。

在奥财产问题而未达成。虽在波茨坦都承认不应向奥地利本身索取赔偿，但也同意在奥的德国资产应包括在赔款财产清单之中。然而在波茨坦并未明文规定什么样的东西算是德国资产。关于这一问题，连同其他一些小问题，辩论将再继续进行八年。

外交大臣虽受他们左翼方面的一些狙击，两党大部分的议员仍觉得到下半年局势有希望改善。甚至在保守党人中，对丘吉尔的主要论点还抱有一些怀疑。

当我代表反对党发言总结辩论时，我集中讲了美国政策的戏剧性改变。有一个巨大的突出的收益——收支账中的一笔大收入，足以抵销我们的许多失望。这就是新近美国人的主动精神。

美国已采取一项决定，一项非党派性的决定，对共和党和民主党人都有约束力的决定，就是放弃孤立主义，正视这样一个真理，即新世界的安全与繁荣同旧世界的恢复与重建，是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①

我不禁又要追述 1944—45 年冬希腊革命的时期，并把它同现今的局势进行对比。当共产党人想靠突击夺取政权时，只有英国单独 114 一国拯救希腊人民的自由。我们用自己的资源来担负救济工作和承担军事义务。为此，陆军元帅 H·亚历山大不得不在他早已准备好打意大利战役的最后几仗之际，从他的部队中抽出一些英国师和印度师：

虽则他的总部和美军总部在各方面——海、陆、空、经济领域以及伤脑筋而又花钱的救济工作方面——都是合成一体的，但我们的美国盟军受上级指示〔对希腊问题〕严守中立。在被围困中看到战友保持中立不是件很愉快的事。同时，相当一部分英国报纸对英国政策的荣誉和正直发出一阵阵无根据的指责。^②

由于在这期间，他们脾气好，通情达理，战场上英、美部队之间的关系从未不适当地紧张过。每一方都谅解并承认对方的立场。现今

^{①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7 年 5 月 16 日。

局势根本改观：

难道有在短短两年内比美国对希腊的政策更富戏剧性的变化吗？难道有过对英国政策更完全的认可吗？难道有过对我们当时的明智做法更激动人心的称许吗？1944年冬雅典燃起了共产主义革命之火，而若没有我们，没有英国人，那场大火将蔓延及剩下的那部分自由和民主的欧洲。如果现在我们要把当初接受下来的并忠实地充分履行了的一部分责任交给我们的伟大盟友美国，我们可以骄傲地而不是惭愧地交出去，“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漫长的工作做完了。”^①

看到我们的政策终于证明是正确的，这虽然使人自慰，但也不能无视我们的批评者所以改变立场的理由。这并不是因为世界局势的改善，而是由于它的严重恶化。美国被迫把赌注放在欧洲，作为防
115 御扩张主义俄国潜在威胁的战略据点。这些当然只是预防性的措施，但毕竟只是防御措施。我无需再强调局势的严重性，虽则下院内外的人们似乎才开始对此有所觉察。俄国对德国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拖延战术，显然是为了防止德国东山再起，而且肯定还是为了阻止德国统一。对奥和约的达不成协议；多瑙河受到苏化的威胁而不是按早先实际上一致同意的办法使其国际化；还有对中、东欧的大施压力，这一切显然表明一场新斗争的开始。但即使在当时，我心里感到早晚必须搞出一种共处办法。我们不应忽视俄国侵略的危险，但也不应加以夸大；我们必须重新研究在他们那顽固执拗的做法后面，有些什么动机，恐惧心理和禁忌：

在这个精疲力尽支离破碎的世界，这无疑还只是一场神经战；但一场神经战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能在一个适当的时期内找到共产世界和民主世界真正共处的办法，谁敢断言我们一生中经历过的两次悲剧不会重演，而如果再演，这一次将是最后的，致命的？^②

1947年6月5日，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的一次著名演说里，

^{①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7年5月16日。

提出了难忘的马歇尔援助计划的建议。先是进行前所未有的资源调集的租借法案，接着是联合国救济总署（UNRRA）的捐献和许多美贷，然后是马歇尔援助。这个“就其目的、规模和气魄，就其不带限制条件来说……在和平与战争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①政策，确实是一系列光辉、明智和慷慨的行动。

马歇尔讲演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而且是戏剧性的。它立刻受到代表英政府的贝文和代表法政府的皮杜尔的欢迎。几星期之内，6月18日，他们在巴黎同意向苏联发出邀请，一道开会讨论重建欧洲和美国援助这整个问题。俄国人接受了邀请，于是在6月27日开始英、法、俄三方讨论。但几天之内就明显看出，俄国人不愿意搞马歇尔计划。他们的正面理由是反对所提出的那套办法。这办法要求欧洲各国调查一下他们自己的资源，看哪些是他们自己生产足以供应他们需要的，然后根据这些初步调查，不足之处请美国帮助。但莫洛托夫却认为美国应先声明他们打算提供多少钱，援助多长时间，有些什么条件。然后欧洲各国提出自己所需物资清单。不久就明显看出，俄国的反对实际是由于害怕任何一种共同调查的结果必然导致形成一种包括东西方的欧洲联合体，至少在经济问题上是如此。他们的借口是：马歇尔的办法牵涉到干涉国家主权和国家复兴计划。但这理由软弱无力，不能令人信服。这计划之所以为俄国所厌恶，乃是因为它无所不包，打算把欧洲的共产主义国家和非共产主义国家都包括进去。莫洛托夫在一怒之余甚至指责美国人感兴趣的，只不过是扩展他们的国外市场，以应付“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危机”。

结果马歇尔计划成为欧洲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同时又是使它可能发生分裂危险的大问题。俄国人似乎下决心自行其

^① 索尔特勋爵《一名公仆的回忆》，311页。

是——把尽可能多的一群卫星国集合在他们的周围，以确保他们的军事安全以及他们与之结发终身的共产主义思想。因此这铁幕不是美国人和西欧人强加给他们的。事实上我们的政治家总是希望能有什么办法使铁幕收起或穿破。铁幕本身是表明政策的，这种政策是斯大林自己决定的，或者是他的最亲近的顾问强加于他的。莫洛托夫不让俄国和它的朋友同马歇尔援助发生关系还不够，
117 他在发言之末还警告英法注意随之而来的严重后果：俄国以前对付过“威胁”，谁也阻挡不了它去做它认为该做的事。这话确实是“颠倒是非”，把美国人的慷慨帮助竟歪曲成对和平的威胁。

这些商谈一破裂后，英法政府即邀请所有其他欧洲国家于7月12日开会讨论马歇尔的计划。此外，并拟定初步草案，成立一个组织以有效执行那个计划。这就是以后闻名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它的任务是使欧洲渡过最危急的恢复时期。俄国的卫星国十分违心地被迫拒绝。但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奥地利、挪威、瑞典、丹麦、冰岛、希腊、葡萄牙、瑞士、爱尔兰和土耳其接受了邀请。

马歇尔著名演讲发表的那一年，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六十亿美元以上的“援助”金额，其中四十亿用于欧洲复兴计划。美国的慷慨大方还不仅限于这番巨大的努力，除了美元援助之外，它还规定给一些国家以贷款。在事过境迁的今日，以感激的心情来记取这件事将是明智的。如今许多人轻易地忘了甚至痛恨他们所曾身受的好处。

根据事态的进程，1947年12月在伦敦重开的外长会议不出所料地陷于完全的僵局。莫洛托夫再次要求立即成立德国中央政府，并声称这是举行任何和会的必要先决条件。当时对边界、权力、选举办法都未达成协议，这看来是个颇为不真诚的建议。然而它使俄国处于这样一个有利的战术地位，好像它是赞成德国统

一似的，而把延长分裂状态的罪过推在西方各国身上。随着漫长腻人的谈判日复一日地进行下去，连贝文也失去了耐心。“每逢我们请他们提供情况时”，他说道，“我们得到的是侮辱、嘲讽或责难……”在英占区，没有把任何德国的工厂或企业出卖供赔款之用；没有把出售鲁尔煤或德国木材的所得收归英国政府。而俄国则自战争结束后至少拿走了价值七十亿美元的物资。在外长会议上进行了长期的激战，但这是一种舌战，现在清楚了，丘吉尔毕竟是正确的。从今后看，不管为时短或长，欧洲分裂的命运实际上已经定了。 118

1947年12月18日下院开会时，大家都有一种无可奈何与失败之感，但也对贝文报道这段可悲历史时那种沉着庄重的态度表示赞赏。他原希望四强会以日益增进的友好和谅解精神进行会谈，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和约的时间花得真太长了，特别是对意和约，虽然对意和约以及对卫星国的那些和约最后终于缔成。对奥和约的拖延毫无道理可言，只有德国在奥财产问题上穷吵不休。俄国人的要求是站不住脚的，它等于让苏联永远控制奥地利经济。关于德国人(在奥)居留问题，贝文说他年初在莫斯科打算尽他所能设法达成协议。然后受到欧洲各国欢迎的马歇尔援助的建议来了，它没有任何干涉他们独立和主权的東西，但俄国政府曲解它。他提醒大家说，10月间成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作为俄国侵略和破坏的工具。同时联合国的安理会被利用作为毁谤的讲坛。他对这一切攻击和挑战都不加理睬。他还是希望能达成协议；但如今终于失败了。即使这样他还是没有把大门关死，不过，他说了这么一句打动下院人心的话，“我们不能再照以前那样搞下去了”。

贝文以前一直对俄国人的态度抱最大的耐心，并尽可能作最好的解释。到1948年1月下院开会时，他似乎终于下决心要面对

119 现实了。他声言,苏联的政策无疑是要“用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让共产党控制东欧,而且现在看来也想控制西欧”。只要看看地图,就可知道战争结束以来俄国势力扩展有多大。如今在希腊也在施加同样的压力,“那里的问题不是什么保皇派、社会主义者或自由党执政的问题,而是一个强权政治问题”。至于德国,我们诚心地试图在四强合作的基础上,逐步求得最后缔结和约,并出现一个得力的德国政府。但俄国人想要的德国政府和我们想要的大不相同,他们的想法是很阴险的。

贝文一直否定“力量平衡”的旧政策。但根据他的分析,现在很难看出有什么办法能避免采取这个政策了。当时,工党左翼对他表示怀疑和痛恨。丘吉尔的情绪是阴沉的,但在他发言中有些建设性想法,聊以鼓舞人心。他并不采取完全悲观的看法。人们曾问他“会不会再发生战争?”

当本届议会刚开始时,我说有了原子弹可以给我们三、四年的喘息时间。也许可能更多一些……但其中有两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①

但我们摇摆不定太久了;最可能防止战争的办法是在为时未晚之际把事情摊开,并和苏联达成一种解决办法:

同共产党人说理或争论是无济于事的。但是有可能在公平的现实的基础上同他们打交道,而且,根据我的经验,一旦问题解决了,只要合乎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信守达成的交易,而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则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②

这些意见是没人料到的,给下院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问题后来长期萦绕他的脑际。我始终记着他的话。

艾德礼首相提出一种颇为新鲜的——使他党内极左分子感到不安的看法。他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经济学说……它对体验过西方文明的人很少吸引力,但对从未懂得更好学说的落后人民则大

①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8年1月23日。

有吸引力”。^①

在所有这些危急的年头，始终存在着德国问题，我们许多人对它都感到难办，充满了不祥的预感。甚至早在1946年2月间的辩论中（主要讨论日益令人关切的俄国政策），德国问题就盘踞在我的脑际。我总觉得，自俾斯麦崛起之后，德国——不是法国甚至也不是俄国——始终是欧洲的关键。所以在希特勒和他的兵力失败后还不到一年时，我就说过，除了我们当时所讨论的那些国家以外，还要考虑到另一个大国，它人口众多，农业和矿产资源丰富，有巨大的工业能力，有巨大的智力和组织能力，而且过去曾有伟大的成就。目前它暂时处于神秘与黑暗之中。关于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几乎得不到什么消息；统计数字上和国际关系上都实行了一种灯火管制。但那个国家位于欧洲的中部，而且是欧洲问题的中心。它就是德国：

什么是我们的对德政策呢？除非能找到一种共处办法，东西半球之间建立一种定则，否则你就不可能有健全的对德政策。如果找到了那种共处办法，那么这常使欧洲遭殃的祸星德国就会在适当的时机变成欧洲大家庭中一名健康的和可贵的成员。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德国人民的灵魂。如若不然，一旦东西方之间有了争端与不和，以及紧张情绪，那末它就会再度成为和平的威胁。局势的这一不可避免的和合乎逻辑的发展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今天的德国一蹶不振，被人憎恶，像脏物一样谁也想躲开它，但到时候两方面都会向她讨好，她将从一个挨饿的流浪儿变成欧洲娇奢的妓女，谁出的价钱最高就卖给谁。她会再度战败而赢得和平，从而希特勒的梦呓和狂妄预言得以实现。所以让我们在为时尚未太晚之前采取行动吧。^②

121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8年1月23日。

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6年2月20日。

1947年夏，原属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下一个分支机构负责的英占区管理委员会改属外交部。前任部长领养老金离职了——或者莫如说是去当养老事务大臣了。这时，虽在辩论德国问题之后过了将近一年，我们得到的恩赐却只是一系列追加的开支预算，先是八千万镑，然后三千九百万镑，和五千八百万镑，这些货币损失是我们要从自己的储备金中和借来的美元中掏出来，支付在德英占区所需的费用。对于这个一直使我们吃力的负担——它甚至对可怜的德国人也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好处，议会方面是很有意见的。在相隔一代多人的时间之后的今天，我们很难追述当时面临的问题和所受的痛苦。德国经济恢复的奇迹当然主要应归功于德国人民在其杰出的公仆们与部长们领导下持久的努力。但平心而论，也应记住自己身在困难之中的贫穷的英国为此所作的贡献。

在1947年夏末的一次重要辩论中，我又承担了为反对党发言的任务。我发表意见说，盟国方面之所以负担这么大的费用，原因之一是由于德国经济陷入近于瘫痪的境地。所有这一切，姑且不谈由于德国问题使我们受到的重大损失和给人类带来的痛苦，这样做还带来了巨大的危险：

如果说，有人认为好斗的共产主义是更大的危险，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复活了的好斗的纳粹主义是更大的危险，那么我想，最最危险的是两者结合形成侵略性的集团，大家一定都会同意。^①

- 122 当时我竭力设法从官方和非官方的各种朋友那里搜求所能得到的统计数字。这是件困难的工作，因政府很刁，不大肯透露消息。幸而在《劳埃德斯银行评论报》上发表了一篇最开人眼界的文章。它是可靠的档案材料，是客观的，而且有事实根据的：

1946年底，德国工业生产降到只有战前生产的百分之三十五。这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7年8月4日。

只是就英美占区而言。到1947年2月，又降到战前的百分之二十五。消费品的生产在1946年10月还维持在战前的百分之二十三，而到冬天则几乎减到零。该地区的食品生产，如果单靠自给，只能给每人供应约一千卡路里。因此我们如此悲惨的生活又经受着双重压力——由于食物短缺而导致生产减产和由于消费品短缺而导致农民不愿生产或出售他们的食品——这一恶性循环正在无情地进行着。^①

我接着争辩说，同样严重的是德国完全丧失了工作推动力。当然，我们自己也开始懂得，控制可能是减轻物资短缺的一种方便的办法，但不能医治物资短缺的病症。只有生产出更多的东西才能做到，而现时在德国谁也不想去生产。有了钱买不到东西得不到服务，因每样东西都是配给的和控制的，因此没有人想去赚钱。事实上，德国唯一的真正自由的市场是邮票和古玩。

不幸的是，我们双方把自己的教义斗争也带到英、美占区去了。英国政府要把一切东西都国有化；美国人则赞成完全自由经营。同时又没有币制改革。这本来有可能在1946年办成，因当时还有商品和服务事业来支持新货币的发行。而今一大批积存的钱以及新发的工资一起抢着消耗于愈来愈少的商品和服务事业：

甚至黑市也不能作为回收货币的好渠道，因目前黑市上十支香烟的 123
价格是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而一件毛呢大衣则要化一年的工资。^②

当时为什么迟迟不处理这些重大而迫切的问题呢？原因现在弄清楚了。这是因为（也许并非没有充分理由），西方盟国都抱着万一的希望，以为仍可能在某种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那时我说过一番话曾受到多方指责，但在二十年之后的今天看来却不无道理：

我们现在必须按既成事实(*de facto*)承认分治。而我并不认为它是合法的(*de jure*)。^③

①②③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7年8月4日。

当然，英美都不能对此事负责；现在他们必须承认这是既成事实。我们应尽一切力量在柏林保持一个盟方管制委员会（包括俄国人），并保持我们在柏林的权益。即使在这种最无效用的形式下，委员会仍能起些同俄管东德进行某些接触的作用，并在一旦俄国政策有所改变时作为改善关系的机构。但我吁请英、美、法三占区现在必须联合成一个有效的、可以进行工作的经济和行政单位。由于只有美国人能提供资金，在对马歇尔计划拟定欧洲建议时，这正是把西德包括进去的一个机会，不应再坐失良机了。

在发言之末我提出一项请求，这在1947年当然不是那么吃香的。我觉得时机已到，该把非纳粹化工作告一结束了，或者至少它的活动应该有所收缩。

我对政治审问政策（它的最高潮是纽伦堡那个长期演出）总是抱一些怀疑态度的。对我们大家有幸的是，希特勒自杀了；墨索里尼被意大利游击队处决了。这样我们就释去了处理国家元首的重任。但要是我们把他们活捉了，那又该怎么办呢？把他们像拿破仑那样流放到圣赫勒那岛去就太抬高了他们的身价；把他们干脆杀掉又有失体面；公开审讯无助于粉碎而只能助长对他们统治的神秘感。

然而要求公审的论据是很充足的。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多次宣告我们要法办一切战争罪犯。对此斯大林也热烈赞同。但国内的罪犯与暴行是一码事，对他国的宣战、侵略或征服是另一码事，两者之间似有所区别。对后者，按政策而干出的种种勾当，不管多么可恨，在整个历史上是有许多先例的。纽伦堡诉讼确实就在这个问题上几乎垮了台：这就是，战争，那怕是侵略战争，从未也不能被人当作刑事犯法行为来起诉。戈林在这一点上为他自己作出的辩护是很漂亮的，他使美国检察官R. 杰克逊法官陷于困境。戈林能够振振有词地举出俾斯麦、腓特烈大帝、拿破仑、路易十四，而且事实

上二、三百年来几乎每个欧洲的统治者，都可以在这些大政治问题上受到严格公诉的制裁。但在戴·马·法伊夫的无情的和不倦的对质盘问下(他所无情追诘的不是什么决定国家大事的问题，而是那些几乎不忍卒闻的纳粹虐杀暴行)，戈林屈服了，垮了。英国的起诉书是经过对官方的档案和记录作最细心的分析后拟定的。关于集中营、关于蓄谋的种族绝灭行为以及关于纳粹统治下所犯的一切其他可怕罪行，都有确凿并仔细核查过的大量文件作为佐证，“不仅有来自纳粹的命令和记录，并且还有来自他们自己的影片——他们借此以自己的暴行来饱餐眼福——以及我们亲眼看到的集中营铁证如山的报道文件”。^①

希特勒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基础是伪造历史，包括散布一种神话，说是德军在第一次大战并未战败而是背后被人捅了一刀，以及欺骗人们说凡尔赛和约——所谓“迦太基式的和约”如何残暴。如果记取这些教训，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该在二次大战之后把纳粹制度的腐朽和罪恶无可争辩地肯定记录下来。要是战后出现什么希特勒的辩护士，或出现旨在辩护和重建新纳粹主义的运动，那么纽伦堡所展现的无懈可击的记录、文件和影片，就可以永远作为证据而使人无辩驳的余地。 125

以工作量的浩大，可以说纽伦堡审讯工作是进行得相当快的。这是在1945年11月开始而于1946年底结束的。另一方面，尽管我们新近对我们的俄国盟友表示热情，对于消息灵通的英国舆论界来说，在对本国公民的大量迫迁、大量囚禁和大量没收财产或拓展领土的罪行进行惩办时，居然能让俄国法官一本正经地参与其事，则似乎有点滑稽。如果说索尔杀过上千个人，那么大卫是杀过上万人的^②。

① 基尔穆尔伯爵著《回忆录：政界历险记》第111页。

② 索尔和大卫均为古代以色列王。——译注

所以,总的说来,我当时(而且迄今仍)觉得,为未来着想(重要的只是未来,对盟国和对将来几代新成长的德国人民来说都是如此),纽伦堡公审才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这并不是因为谁喜欢看到几个大罪犯被处以极刑,更不是愿意有其他人被判可怕的无期徒刑。那些记录在案的大量证据(那是任何评论者也决不能推翻的),是纽伦堡公审的真正价值所在。

但我对那旷日持久的非纳粹化工作从未感到高兴过。我在意大利时就发现,当一个政权存在像墨索里尼那么久的時候,几乎不可能找出任何一个身居要职或具有一定技能的人而不是法西斯所任命或与法西斯党无关系的。当然,在墨索里尼统治下,其暴行是同希特勒政权一样的。然而,在清除了党的主要领导人、地方长官和所有其他人之后,如果这项工作继续做下去,很难不损及德国的恢复工作,并最终引起一些反抗。

126 在战后头几年中,非纳粹化工作始终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产生许多不安和厌恶。而且各占领区所采取的办法也各不相同。在英、美占区,这项工作进行实在太慢。从名义上讲,该有成千甚至成百万人受非纳粹法制裁。但在实际执行上,注重的只是几个最突出人物。还有使许多人觉得奇怪的是,有些像冯·巴本与沙赫特这种人,他们已在纽伦堡法庭获释,现又要在美占区的非纳粹化法庭重新受审^①。这一切对未来都是令人不快的,甚至是危险的。这一工作以后逐步交给德国行政当局,于是德国法庭开始起作用。但这个过程年复一年地拖下去,对盟国和对那些真诚想合作的德国人,都成为越来越重的负担。在战争结束后两年,我听到凯瑟林陆军元帅被一个英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事吃了一惊。虽则他的

^① 弗朗茨·冯·巴本,1932年11月—1933年1月任总理,1933—1934年任副总理;后任驻奥与驻土大使。雅尔马·沙赫特博士,1923—1930年,1933—1934年任帝国银行总裁,1934—1937年任经济部长。

判决以后改了，但总觉得这个案件是否值得审理是令人怀疑的。在整个意大利作战过程中，凯瑟琳元帅对 H. 亚历山大陆军元帅的进攻是防守得很漂亮的。我在辩论过程中发表了类似的一些见解，虽则当时并不受欢迎，但以后也没有什么事能使我改变观点。

除了这个不得人心的问题之外，还有需要搞出一种德国行政制度的问题。大的困难问题之一是缺乏干练的人才，在工业和地方政府方面都是如此。盟方想用以控制德国人一切生活细节的庞大官僚机构，必须迅加裁削。从我在意大利见到的，深知这种机构多么容易膨大，这是多么危险的事，它将阻止一切真正的自力更生精神和真正的自治的出现和发展：

德国必须远超过它今日允许的程度进行自治。从上到下，从最高层的联邦一级……到小得多的区议会和县议会各级，必须有真正的自治政府。应该尽可能恢复传统的德国边界。乡土观念应尽可能保留，地方爱国主义应允许发展，但不能因此导致经济分裂。德国人必须负起责任来，必须使他们感到自己负有责任。^① 127

至少在我们英占区里，保留项目太多，与德国官员处于平行地位的英国军官太多，以致妨碍他们真正负起责任来。诚然，情况有些改善。在 1946 年，单是在我们的占区里就有四万二千名官员。如今，在 1947 年据说只有两万名了；但那还是太多。盟方的人不应做日常行政官员；有一小批专家顾问就足够了。占领军的人数也没有任何不能大加削减的理由。我们的权威——至少是在德国——并不依靠军事力量，而是依靠我们掌握的经济权，因为如果没有英美的进口，德国人就得挨饿。最重要的是，对德国各政党不应多加干涉，也不能有所偏袒。我们必须让德国自己发展它的自由和生活：

在上次大战后，我们想把自由主义强加给魏玛共和国，结果既断送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7 年 8 月 4 日。

了自由主义，又断送了魏玛共和国，因为这在德国意味着失败和耻辱。同样，如果我们打算把社会民主制强加给德国人，那么一旦他们能自由行动，他们就会进行反抗。^①

最后我吁请立即进行币制和税制改革。没有这些就谈不到回到何种健康生活；必须重新使个人有进取的推动力。德国经济应尽可能是自由经济，英、美、法三占区必须完全合成一体。

128 这方面有些事情处理得相当迅速。1948年间成功地推行了货币改革，嗣后全部德国生活开始改观。假装要同俄国人合作的姿态最终抛弃，这至少有个好处，可以让西方盟国无所顾忌地自行处理德国问题。由于俄国人封锁柏林和对柏林空运长期而胜利的斗争，战时的盟国戏剧性地分裂了。在1948年6月前，俄国人已开始千方百计进入柏林，而在6月以后干涉加紧了，从6月18日起一直到几乎一年后俄国人承认失败为止，这一斗争一直继续着，全世界对这一局势都越来越表示关切，把它看成是考验双方意志的首次大较量。由于英美杰出的共同努力，在那几个月中进行了二十万次以上的飞行，运送了一百五十万吨以上的物资。^②贝文在他的一次极其有力的发言中声称，英美空军在一般和平时期所完成的任务，足以同战时最辉煌的一些战斗相媲美；我们确实有一切理由为此而感到骄傲。但更伟大的是它在精神上的作用。

这无可争辩地说明，柏林人民不愿沦为苏联的附庸，因为他们知道这就是接受奴役的第一步。^③

德国人民响应了我们，并由此认识到不可能违反国际协定把我们赶出柏林。美国人承担了百分之六十的任务，我们承担了百分之四十。我们的伙伴关系还像战时那样完整无损。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7年8月4日。

^② 封锁虽在1949年5月12日撤销，但为了预防发生变卦，空运继续到1949年10月6日。

^③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8年9月22日。

6月6日,柏林开始封锁后的几个星期,为支持马歇尔计划的经济合作正式条款签了字。西欧的巩固从而实现了,但也意味着承认东西方的分裂。德国局势发展的道路现在明朗了。到1948年底,四国统治的整套机构垮了。但在西方三国的占区内,由于货币改革和来自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开始出现显著的经济复苏。为建立联邦议会和联邦政府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在着手进行;其各领导机关暂设法兰克福。 129

虽则仍然有些复杂问题有待解决,还有关于中央(即联邦)政府和各邦(或省)之间的权限划分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一个新的西方国家的宪法草案已着手拟订。这是在宣布盟军占领法案,调整西德边界,融合三占区行政机构以及成立盟方军事安全委员会之后进行的。仍在争论中的一个最麻烦的问题是鲁尔国际共管总部。这个问题,同拆迁政策交织一起,在1949年春引起许多麻烦。各盟国的意见有分歧,而德国人则颇为巧妙地利用了这些分歧。但经过几个月的商谈和1949年4月华盛顿西方三外长会议的结果,所有问题终于都解决了。新占领法案以简化的形式发布,三国同意对德国推行一种新“政”。结果是正式采纳了基本法。1949年5月23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了,她的宪法迄今仍大体未变。各省,除了有强烈分治倾向的巴伐利亚以外,都投赞成票。波恩被定为临时首都。8月间举行了选举,9月间新议会正式开会,当时选定西奥多·霍伊斯教授为第一任联邦总统。康拉德·阿登纳以微弱多数当选为总理后组成政府,它注定要维持许多年。这样,在战争结束后仅仅相隔四年多的时间,在一个被战败、一蹶不振而大部被毁的德国,经过一番混乱和困难之后,终于诞生为一个新的民主国家,这个国家以后证明是有力量和有生命力的。

德国的这些事态发展主要是盟方回敬俄国侵略的结果。在1947

和 1948 整整两年内，俄国稳步加紧对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控制。1947 年底，罗马尼亚国王迈克尔被迫逊位，在俄国控制下宣告成立共和国。波兰如今成为一个十足的共产国家了，虽然它的人民是忠于天主教的。匈牙利整个落入苏联政府之手，它也像保加利亚一样大部被俄军占领。东欧国家一切形式的自由和民主的逐步被侵蚀，最终都得到承认，虽则是怀着遗憾和痛恨的心情。南斯拉夫的铁托，一方面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持强硬立场，使意大利共产党大为尴尬，一方面结束了国内的君主制度，按照马克思主义路线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他自己独揽大权。

但最后的打击，是众所周知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强奸，这是使西方特别感到痛恨和恼火的消息。事件发生在 1948 年 2 月。捷克斯洛伐克在苏联影响下建立共产党统治的过程，也同其他国家业已有效采取的路线一模一样。它不是本国独立革命行动的结果。实际上，斯大林对这种发展是无特别好感的。在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同以前的波罗的海国家一样，共产主义制度是在外部压力与内部颠覆相结合而建立起来的，没有一国——俄国除外——是未经外来压力而成为共产主义国家的。如果有那么一类国家的话，俄国确实也不会大加宠爱的。在南斯拉夫，一个获得人民支持的政府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那怕是流亡的政府，因而权力就自然地落到游击队手里。那里马上开始出现某种独立精神，以后便导致贝尔格莱德与莫斯科之间的剧烈纠纷。不管从理论上讲苏联有多么真诚的愿望想让共产主义遍及全球，任何一个独立的共产主义国家在实践上必然要采取一种限制教皇特权的政策。特别是当共产主义制度是只通过内部方式建立时，没有俄军帮助，也没有俄国间谍的渗入，那么情况更可能会是这样。这样转变过来的信徒是不足信的。如果共产主义这个真教是外来压力产生的，那么教皇的极权精神就会更加得到发扬。换言之，即便

共产主义像在莫斯科那样受重视、但更多的仍是被当做实现帝国主义目的或安全保障的手段，而不是真正当作一种信仰。 131

为完全控制捷克斯洛伐克所采取的方法，同用于波兰的那些方法并无不同。^①在波兰，共产党人从边区（即奥得-尼斯河线以东地区）割据一片一片土地。在捷克斯洛伐克他们也这样做，但集中在波希米亚地区。在这两处，他们都成功地建立了严格的极权统治，然后以那些地区为基地扩展到全国。在捷克斯洛伐克，伟大的托·马萨克的继承人贝奈斯始终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1938年在几乎不堪忍受的压力下他屈服于德国。他也抵挡不住俄国的压力。战后他接受了人民阵线政府，它当时还不完全是受共产党控制的。但共产党要求完全控制的企图在1947年早有先兆，而且看来他们似乎至少可用名义上合乎宪法的步骤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到1948年春，共产党领袖似觉以政变攫取政权更为可靠，这之后才以通常操纵选举的形式来让人民批准他们掌权。贝奈斯起初似乎坚定不移，但到1948年2月底事情终于闹翻，剩下的几名非马克思主义部长都被排挤掉了。共产党人用一系列曲折的巧妙的手段巩固了他们的权力，等到俄国代表到达布拉格时，这场赌博输赢就定了。病中的贝奈斯丧失了一切实权，终于签署一项文件，任命了共产党人占主导地位的新政府。在立宪议会一致投票信任共产党人哥特瓦尔德及其政府的同一天，马萨克，这个不愧为他伟大父亲的好儿子的人，被人发现死在切尔宁宫的窗下。他的被谋杀或自杀，在整个自由世界引起一阵憎恨的浪潮。

这样，在1948年早春，在一个西方早已公认具有自由主义和民主传统的国家里，俄国人组织了和强制推行了一次夺权。这些 132
事件对欧美公众舆论冲击很大。在英国，那里对慕尼黑的记忆还很强烈，人们特别感到气愤。全国引起一种震惊而且几乎是失望

^① 参看帕蒂布里奇前书，第86页。

的感觉,同时相应地产生一股冲击力量,要求西欧团结并和美国紧密结盟。俄国的目标看来不再局限于谋求它自己国界的安全和主宰以前的敌国。他们那整套宏伟的计划现在似已展开。除了吞并波罗的海诸国以及芬兰和东部波兰的部分土地外,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新成立的波兰以及如今的捷克斯洛伐克,都成了俄国控制下的卫星国。南斯拉夫虽然不稳,总还算是共产主义国家。几个月之内,柏林封锁事件着重表明,俄国人终于要把东德也归入它的势力范围。这样,要搞到何处为止呢?俄国的向前推进的界限在哪里呢?那么无情那么冷酷的这些现实行动,再也不能用谋求安全来进行解释了。它们是人所共知的帝国主义野心或共产主义狂热的产物。这样,在同希特勒进行生死搏斗之后不到三年,命运又注定要我们同来自东方的新侵略对抗下去。

贝文不能再使他自己相信“第三种力量”的价值了,1948年1月他曾提出要进行一种“力量的新调整”。在前一年3月里,英美曾签订过敦刻尔克条约,成立反对任何德国新侵略的互助同盟。现在面临来自更东边的威胁,于是1948年3月17日订立了布鲁塞尔条约来代替前一条约。在布鲁塞尔条约中,比利时、荷兰与卢森堡也加入了。该条约保证所有缔约国共同抵御任何武装侵略,并成立由各国部长定期参与的常设协商会议。强奸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响还在扩大,因为美国政策在1949年春发生了戏剧性的大转变。1949年3月15日大西洋公约签字了。这个非同寻常的条约标志着美国放弃了它对外部世界的传统态度,因为从该公约的条款

133 看,美国和加拿大都加入了布鲁塞尔条约缔约国的行列。几星期后,1949年4月4日,又来了个北大西洋公约。这时,挪威、丹麦、冰岛、意大利和葡萄牙都参加了大西洋组织,结盟的目的也规定得更加准确了。正式条约中含有这样一句重要的条文:“对他们中一国或几国在欧洲或美洲发动的武装进攻,将被认为是对他们全体

的进攻”。在这阶段，希腊和土耳其还没有被邀参加，但在1952年2月，两国都加入了。

美国作为这一新的伟大同盟的奠定者和首脑，它的领导地位受到西欧各国的普遍欢迎。当时很少有人发出反对美国干涉或责备美国称雄的呼声。其后几年滋长起来的对美国的不健康的妒嫉心，当时甚至在法国也还没有产生。同时美国在当时还独占或在事实上独占新的原子能。英国由于艾德礼及其同事们的爱国热忱，也在开始制造自己的原子武器，但这事议会还不知道。无论如何，看来只有靠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这才能成功地抵抗对欧洲的一次新的野蛮侵略，而这在当时似已迫在眉睫。

其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牢固建立起来了，谋求一种可行的解决办法，让分裂世界的双方能够共同生活，虽不是真正和平地至少是互不冲突地共同生活，这样做看来是谨慎的，并且也是可能办到的。在这个新阶段，又有了摧毁力量的平衡，因这时俄国也有了可怕的核武器。在互怀恐惧这一不安的然而也许是方便的基础上，一些较多的建设性的政策有可能建立。但在1948和1949年，侵略势力不满足于东欧和巴尔干国家，它的矛头已开始伸到西欧来了。其明显的意图是要倾覆法、意和其他西欧国家，所用的同样是颠覆与渗透那一套。因此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作为坚定而有决定意义的回答。的确，只有美国全心全意投入世界政治斗争并最后放弃孤立主义，才能维持力量平衡，并 134 保卫西方的和平与自由。

英国政策的这一重大转变不是经过许多深思熟虑和思想斗争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工党和社会党的热心人士。正如在国内问题上的情形那样，1945年光辉的胜利不久就开始被一连串的财政、经济危机搞得黯然失色；在国际事务上的那种奢望，以为英国社会主义将是俄国共产主义天然的和互相同情的盟友，也在两三

年内消失而变得黯然失望。

时局的发展使工党从整体上说越来越感到不安甚至恼怒。在1949年初辩论德国问题时,极端分子的攻击使我日子很不好过。他们不愿听人提起无情的实际事态进程,即绥靖政策的破产,以及他们向选民许下的诺言成为泡影。在1949年4月签订北大西洋公约后,政府请求议会给予正式支持。贝文再度竭尽全力去争取他自己党内持怀疑态度者的同情。虽然在分班表决时只有六名议员在投票审查员帮助之下跑到反对签约的票房里去投票,持这种态度的人实际上比这还要多。辩论中发言最得力的是普里特和齐利亚克斯。普里特是个出色的英王顾问,有广泛的实际工作经验,他在战时早已使他自己成为一个相当难对付的人,而今则妄想成为那三十年代克里普斯的精神继承人。齐利亚克斯则比较活泼些,也比较讨人喜欢。贝文只能再重述过去四年的悲惨的经过,并列举苏联的罪状。他一桩一桩举出罪行。波兰和罗马尼亚,那里的“政府被人搞掉而代之以新政权,其手段的冷酷无情我们大家是熟知的”;在匈牙利,小业主党选举获胜,但却被赶出政权;一直讲到最后强占捷克斯洛伐克。他再次不顾自己的党内许多人的观点而为战后英美保卫希腊自由所采取的行动辩护。他提醒大家,我们曾如何在德国努力把混乱搞成有秩序,进行了货币改革和振兴了贸易。周复一周,月复一月,西方盟国受到俄国不妥协态度的阻碍。因此我们不得不自己定出对西德的计划,而俄国的回答是封锁柏林,“企图把二百五十万人民同外界隔绝,以便把西方盟国赶出东欧,并取消我们按占领法所应享有的权利”。^①幸而这个封锁现在已经解除了。

然后他发表长篇议论为大西洋公约辩护。这些议论之所以值得回忆,主要是因为它揭露了害怕和反对美国的强烈情绪,而当时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9年5月12日。

这甚至在“进步”的政治家和作家中也是存在的。他声言大西洋公约不是侵略性的，不会导致战争。无论如何，在1914年或1939年没有这种公约也并未阻止战争。生活在大西洋周围的同出一源的人民，具有共同的道德与伦理标准，以及有来自同一传统的制度，他们只把这看成是一种慑伏性的而不是威胁他人的同盟。

接着进行了冗长的而且颇带技术性的讨论，谈论大西洋公约和联合国宪章之间有什么关系；不过我们大多数人都清楚，安理会这整套结构已不复受人尊重，因为俄国人手里有那个永久可以使用的否决权。丘吉尔作了简短答复，他感谢贝文所作的努力。大家并不认为几星期前苏联政府解除柏林封锁一事是一种和平姿态，对这种认识他感到高兴：

上次大战前，我记得很清楚，每当希特勒先生作出某种保证如“这是我最后一次领土要求”时，就有人跑来对我说，“看，你以前说的话多不对，他说这是他最后一次领土要求”；但我们所经历过的痛苦经验……使我们变得比较谨慎，不对这在口头上表示一下姿态而过早高兴。^①

他以自己的名义并代表他的党对大西洋公约表示热烈欢迎，并对美国人民如此决心在世界上起这种光辉的作用，表示我们特别的感谢。如果他一点也不谈到1946年3月他在富尔顿提出过的观点，那他就很难说是近人情的。他提醒他的听众说，当时提出过一个动议对他进行谴责，工党议员一百零五人在上面签了字，这在议案簿上是有案可查的。提出这样一个针对个别议员私人或前任大臣的动议，是很不寻常的事，然而这种动议竟然提了出来。在这一百零五人之中，他们必定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思想转变过程：

……我自然欢迎人家思想转变，而英王陛下政府也一样欢迎。曾有人说，“有一个肯改悔的罪人总比有九十九个认为无需改悔的仁人君子更值得高兴”。据我估计，这里我们一下子就有一百个这样的人，虽则他们有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9年5月12日。

些人是以不出席参加辩论这样一种合适的、表示忏悔的行动，来着重表明他们的回心转意。^①

他加上一段话，呼吁要有个更好的军事组织。现在需要有个类似艾森豪威尔统率下的最高司令部这种组织（它是在战争时期产生出来的）；但司令部中的成员则必须能充分代表参与公约的所有国家。这一次实践证明，丘吉尔又是正确的，虽然在实施他所预见的计划时又照例要拖延时日。北大西洋公约在形式上从1949年8月开始生效，但直到1951年2月才继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之后组成欧洲盟国最高司令部。

对政府听从丘吉尔的要求一事，极左派人士发出许多嘲笑。一位社会主义雄辩家这样说：北大西洋公约只不过是三年前丘吉尔富尔顿讲演的具体化。现在要我们大家来投票赞同富尔顿主义，不是掺了水的富尔顿主义，而是百分之百的富尔顿主义。

在这些心烦意乱的年月里，英国外交政策几乎全由贝文指导，
137 他是个魁伟的人物，赢得而且他也理该赢得议会和全国的普遍拥护。虽则他掌舵通过的急流是如此危险和艰难，但他从未迷失总的方向。开始他力图忠勇而耐心地执行波茨坦协议。当这些希望由于苏联的侵略行为而渐归消失时，他就依靠缔结那些旨在维持世界力量均势的防御同盟，全力推行一种所谓遏制政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是其最高点。

到这届议会快结束时，贝文变得日趋衰老。但他以可嘉的毅力支撑了一年多。在1951年3月他因健康恶化不得不引退。4月他就去世了。尽管有些缺点和偏见，他是工党政府中最强有力的人物。同时他还博得保守党人的同情甚至爱戴，在这方面他有许多知心朋友。在紧接着战争之后的几年中，他在外事工作上走过了痛苦曲折的道路，这并非他的过错。那段时期里，他曾幻想能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9年5月12日。

同苏联达成互谅。也许由于他抱这种幻想过久而该受到责难。然而在当时,对他来说,很难让他放弃这种希望。归根到底,他作为外交大臣所干的工作,尽管有美中不足之处,毕竟鼓舞了自由世界,并加强了它的力量。

他对英国和世界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他把抵制苏联和共产主义这一政策强加于一个不愿这样做而又踌躇不决的党。这对于一个托利党的外交大臣(在紧接着战争之后的那些年月里)是办不到的。^①

然而,尽管贝文对议会和全国的个人影响如此之大,但启发英国、英联邦各国甚至美国舆论界的任务,这一次还得落在丘吉尔身上。同以前一样,事实证明他是真正的先知,他是公众情绪的先导,而并不是跟从者。事态发展的逻辑证明,他的富尔顿讲演是正确的,因为在讲演之后三年内就出现北大西洋公约。他又一次及早看出并喊出时代的迫切需要。

在这整个时期内,大战危险之得以避免是由于核力量掌握在美国人手里。1951年10月,俄国人向世界承认它成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于是这可怕的毁灭力量不再是西方国家所专有了,而在这危及世界生存的可怖阴影下,人们现在必须开始谋求——虽谈不到和平然而至少是——共存。

^① 1951年4月16日。

第六章 苏伊士以东

当俄国侵略威胁的乌云笼罩欧洲时,苏联在亚洲的活动,至少在战后最初几年,是较克制的。

由于1945年在雅尔塔会议上所取得的让步,俄国的亚洲边界是大为加强了。苏联人被许诺并不久就取得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他们在外蒙的势力扩大了;此外,他们在朝鲜和满洲都取得海军基地。在1945年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失败以后,苏联政府以其在他处如此行之有效的颠覆与渗透这一套东西,在北朝鲜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这就注定要在几年内导致悲剧,并引向一场长期的和剧烈的争夺战。

满洲提供一个进行无耻劫掠的好机会;在索取赔偿的借口下,本地区各种工业装备都被抢光。但是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错综复杂的局势,使俄国至少在开始时采取了摇摆的政策。中共的胜利不是由于俄国的支持;国民党的失败,部分是由于他们自己的无能和腐败,部分是由于共产党军队的矢忠和勇敢。这一点中国的新统治者并没有忘记。同时,由于取得了外蒙并巩固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在这一重要边界上的控制相当加强了。^①在这方面,俄国的目标同它在欧洲所追求的并无不同。苏联政府决心要加强它的重要边界和保障它的经济利益。但在远东其他地区,它满足于搞些比较小规模的行动。

同样,那些年里苏联对中东的兴趣也是不大的。诚然,他们在伊朗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迫使他们在1946年5月撤走他们战

^① 参看帕蒂布里奇前书,106页及其后。

时占领伊朗北部的所有军队，甚至放弃他们并入阿塞拜疆省的领土要求。接着是土耳其成为苏联宣传和压力的主要目标，因为土耳其与西方结盟并接受美援开罪了莫斯科。俄国人不断地坚持要求获得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新特权，但未能如愿。同时俄国也想要求托管的黎波里塔尼亚，同样没有成功。

同以后发生的事件相对比，很怪，俄国当时的政策是亲以色列和反阿拉伯的。1948年阿拉伯联盟各国侵入巴勒斯坦时，俄国呼吁他们撤退，或者至少“持克制态度”，而新成立的以色列则立即予以承认。他们以后改变政策的原因是不难找出的。当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屹立于世时，它不仅是苏联内部犹太民族主义的力量集结中心，而且它（尽管还痛苦记得以前同托管国英国的争执）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一直面向西方。同时阿拉伯联盟则已不再被苏联政府看成是“英帝国主义的工具”了。

所以，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从1945到1950年，在中东和远东的俄国势力，虽然是重要的，而且往往起干扰作用，但还不像它在东欧和中欧那样是决定性的。

在中东，英国仍是个大国。我们在伊拉克和利比亚都有相当的部队，而且保有重要的空军基地。我们在外约旦的影响是无可比拟的。在埃及，我们根据1936年的条约控制了运河地带。苏丹仍受我们管辖。美国对我们在该地区的力量和威望没有丝毫妒嫉。相反地，他很乐于让英国照管世界这一地区。而且一般说我们也照管得不错。在俄国在伊朗受到严重挫折的同一年，外约旦正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并与英国签订盟约，使英军能驻在那里，这样在一个相当重要的战略地区保持了我们的势力。—— 141

但是，如果说俄国压力在中东和远东并未成为严重麻烦的话，英国政府在战后却面临一个痛苦而又讨厌的问题。这就是巴勒斯

坦问题。

在所有这些年里，这是个最难办而且到头来证明是无法解决的难题。英国人民诚心希望承担原来托管所规定的义务，这就是根据著名的贝尔福宣言，给犹太人搞一个民族家园。如果我们能想出一种办法来调和对抗双方的利益，从而组成一个和平与独立的国家，并由于对我们怀有真正的同情甚至是感激之情而与我们紧密联盟，那末这对我们还有很大的政治利益和战略好处。

多年来下院内外对这一问题甚为关切。在战前，工党大多数人强烈亲以色列的。保守党的情形正相反，亲阿拉伯情绪占支配地位。在1939年春，当对德战争显然不可避免之时，我们迫切需要保证不让阿拉伯落入德国之手。于是张伯伦把犹太和阿拉伯双方领袖请到伦敦，并设法使他们同意采取一种联合政策，其条款写在一份著名的白皮书上。但阿拉伯与犹太双方都拒绝接受这些建议。这计划虽被阿拉伯人拒绝，其实它显然是对阿拉伯人有利的。按照白皮书，对往后入境的移民几乎是关了门的（而当时这一受迫害的民族对此正最有需要），因而把犹太人的希望和雄心都堵塞住了。在此后五年内，只许可有七万五千名受迫害的难民迁142 入，而经过五年后，须经阿拉伯人同意始能移居该地。换言之，英国政府作出这一决定后，等于宣告说有了这个最终移民数字，它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的任务算是相当地虽还不是全部地完成了。但其时人口比例约为三分之二阿拉伯人，三分之一犹太人；所以一旦时机到来给予独立时，居压倒多数的阿拉伯人就会团结起来。

迄今为止，总是把托管解释为允许入境的犹太移民数以到达“经济吸收容量”为限——这公式是丘吉尔在1922年新创的。（白皮书里）除了规定一个同托管协定完全不符的移民制度之外，还提出要限制犹太人购买土地。丘吉尔在利昂·阿默里及其他一

些保守党人(其中有我)支持下,同工党领袖一起强烈抗议反对白皮书。它甚至被人称作“中东慕尼黑”。但大部分保守党人从军事和战略观点支持这个白皮书,他们觉得坚持英国政府将近二十年来信守不渝的政策固属重要,但在欧洲目前岌岌可危的局势下避免进一步得罪阿拉伯人更为重要。

接着是几年的大战,在整个中东,战争时起时伏。丘吉尔下令征集巴勒斯坦大量犹太居民并发给武器,同时鼓励犹太人充分发挥作用来保卫该地区,防止德军可能通过土耳其、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进击苏伊士运河。当时还在伊拉克发生亲德阿拉伯人的暴乱,但不久就被镇压下去。叙利亚被解放了;伊朗则保住了。但在大战结束时,巴勒斯坦问题仍未解决。

现在无需再详谈当时提出过的各种计划和建议,方案一个接一个,每个都在试过几个月之后被认为不切实际而放弃。1946年143
1月艾德礼和杜鲁门指令成立一个英美委员会,就巴勒斯坦本身和全欧洲幸存的犹太人的情况进行研究,考虑该做些什么工作。他们提出的主要建议是立即准许十万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委员会同时还建议继续托管,不应单独成立阿拉伯或犹太国家。它以没有多少根据的乐观态度预计在托管国的治理下将来阿拉伯、犹太人会合作。它建议给两族居民团体以一定的自治权,但都不给予政治独立。这报告显然是一个妥协办法。但是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尽早接纳十万移民。

通过好几个月商谈,英国政府想找出某种全面的解决办法。其第一步是在美国政府同意下派一些“专家”——或至少是官方的——代表。这些人的任务是重新研究原委员会的报告,但英国政府一直要等到1946年7月底才能够把他们的建议告知下院。专家们指出希特勒主义的压力在全欧洲造成了犹太难民这个大问题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由各国设法在欧洲或海外给这

苦难的民族找到新家园，让他们重得安居。他们拟定了一个完备的计划，但后来几乎完全不起作用。总之，它不能满足许多犹太人想到巴勒斯坦去的热烈愿望，也不合乎我们应有的这样一种责任，即只要该地区能吸收他们而不致影响经济，就让他们去。专家们接着承认这样一个原则，即整个巴勒斯坦不应成为一个犹太国家或阿拉伯国家，两族社团谁也不应高踞于谁之上。因此必须继续保持某种中央政府的形式。然而他们觉得两族之间的情绪如此不和，所以唯一的希望是搞出这样一种制度，使每族人实际能自己处理当地事务。因此他们建议搞一种权力下放。巴勒斯坦分成一个阿拉伯省和一个犹太省。耶路撒冷将置于独立控制之下，尼格夫因大部地区尚无居民，将来再单独处理。一个代表托管国并向托

144 管国负责的中央政府在防务、外交、海关和税收方面享有全权。只有在实施这一计划并在各省能处理它自身的事务（包括移民问题）后，才可以把欧洲的十万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地区。

在各种犹太组织的恐怖行为日趋激烈（最厉害的一次是炸毁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里的政府办事处，死者将近一百，许多人受伤和失踪）的背景下，议会开始对这个报告进行辩论。这时因贝文留在巴黎开外长会议不在场，由莫里森宣布说，恢复秩序的最大障碍似乎是巴勒斯坦犹太人拒绝同英国当局合作。在他那个经过细心准备的清晰的发言过程中，莫里森说，英国政府接受专家们的报告，认为至少可以拿它作为采取行动的基础。因此，他建议召开一个有犹太代表和阿拉伯代表参加的会议，按照这些粗略的框框来讨论一个宪法草案。在辩论第一天代表保守党发言的奥立弗·斯坦利赞同这一制度（它有时叫“当地自治制”，有时叫“分区制”）。他的发言是熟悉内情的（他自己当过几年殖民大臣），而且也持莫里森那样的温和态度。

就在当天以及在8月1日重新讨论时，有许多（主要是工党方

面的)人强烈反对这一计划。自然,他们反对的主要一点是该计划未能有效实施原英美委员会所提出的最重要建议——立即接纳十万名移民。

然而,正如往常那样,最打动下院人心的(虽还未能使人信服),是丘吉尔在第二天的发言。他明白指出,虽则他承认斯坦利的发言代表大部分保守党人的意见,但他希望发表他自己的看法,说出他所知道的情况。这次引人入胜的长时间发言,虽然并不能完全适合他的追随者的口味,却是我所听到过的一次最有力最有气魄的发言。发言时间长达一小时,内容遍及问题的各个方面。他提醒大家说,虽然主要由于在欧洲遭受迫害,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四分之一世纪内从八万人增到将近六十万人,使工农业生产有显著发展;但还应该记住在这同一时期内的阿拉伯人口也增加了一倍。这说明在英国的帮助、指导和支持下,双方都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他重新提到他曾强烈反对的1939年的白皮书,根据那个方案,“容纳量”这一原则不要了,因而五年后就停止一切犹太移民的进入,除非经那占人口多数的阿拉伯人的协商同意,而这是不可能取得的。当时他就认为而且迄今仍相信,这样做是违背我们所负责任的。他在追溯战争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并指出情况已经改变后,清楚表明他的立场,并说明,如果他掌握政权他会采取什么方针。他也像所有其他发言者一样,谴责犹太极端分子的残暴行为。但他并不因此放弃托管国的全部职责,不放弃他一贯支持的犹太民族主义事业。但他觉得把这副重担子全压在英国身上是不公平的,结果还引起那些对英帝国如此重要的许多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国家不满和惊恐,而且要耗费我们很多资源:

所以在开始讨论战后问题之初,我总想让美国朋友明白,或者是他们得前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犹太民族主义问题(对此他们有强烈感觉),而且我觉得应该双方平起平坐,平分负担,或者我们就应辞去我们的托

管,这个,我们当然完全有权这样做。^①

146 这番坚定的讲话,颇使各派的大多数议员感到吃惊。但他以如此的热情和决心讲这些话,使我不由得相信,如果在他手里,这计划可能办成。他也许能通过个人之间的协商,使美国人愿意分担责任,如同他们在一年内分担了保卫欧洲自由的责任那样。但当时美国舆论尚未开始离开孤立主义立场,甚至在以后也还不能达到必要的合作。而在那种情况下,丘吉尔必将坚持放弃托管,一起撤回我们的行政人员和武装部队。

当政府把它的方案提交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时,他们都拒绝了。事实上,不管我们提什么建议,都一样会遭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以及他们领袖反对的。结果就必须在该地区驻扎大量部队,负担沉重的开支。恐怖行为继续使部队和平民遭受着痛心的伤亡。到1947年底,垮台终于难免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立场完全不能调和,犹太人要求成立单独的犹太国家,而阿拉伯人仰仗他们的多数,坚持不让成立这样的国家,而竭力叫嚷要独立。并且托管的条文上也没有规定我们真正有权接受或强使他们分治。于是政府在失望之余又把此事提交联合国。在巴勒斯坦,当地的暴乱和恐怖行为则有增无已。阿拉伯人宣布抵制犹太工商业,收效颇大。我们进行工作,想让别的国家,如法国,特别是美国,来帮助我们。问题提交联合国后,他们就指定一个委员会作调查报告。但当9月间联合国大会开会讨论委员会的建议时,英国政府清楚表明,不管讨论结果如何,英国最后决定退出不干。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对这一威胁或诺言的是否真实,表示非常怀疑。许多别的国家也有这种看法,他们深信英国决不会放弃“帝国主义政策”。对英国行政人员的尽力工作,对英国部队的勇敢负责,或是对那为了维持秩序和发展经济、造福于巴勒斯坦两族人民所花的大量金钱,在当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6年8月1日。

时及以后,很少人表示感激。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以多数通过,赞成分治,虽然当时分治的条件对犹太人远不如以后他们用战争取得的那么有利。不过,政府终于作出一个必须坚决贯彻的决定。这项决定由殖民大臣琼斯在12月正式向下院宣布。如同在联合国大会上已经宣布的那样,他明确指出,托管至迟到1948年8月1日结束,并撤退军队。事实上,经与派去主持分治事宜的联合国委员会协商后,这日期定为5月15日。这一决定虽则下院两边议员都不喜欢,但大家认为不可避免,只得接受。因为没有有一个预先精心安排的计划由英美共同坚决执行,1947年底丘吉尔的结论再一次被大家承认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个结论在1946年夏,人们是不愿意听的。

在次年(1948)这可怕的一年中,头六个月是这样的一段时期,当时英国的权威和势力日趋衰落,托管期也快满,引起了双方不断发生游击战争。当巴勒斯坦局势陷入无政府和内战状态时,可怜的英国部队还得尽力维持秩序。但他们人数开始逐渐减少,并日益受到攻击,我们的权威就差不多变成只是事态的旁观者。英国军官尽他们力之所及谋求局部地区停战,用一切办法减少当地痛苦。同时阿拉伯国家不团结,无主张,于是有大量阿拉伯难民从犹太人占领区逃出来,据有些人说数目达六十万。在托管期终之日,犹太国民议会和犹太民族主义者总会立即宣布成立一个犹太国家,称为以色列。世界闻名科学家韦茨曼博士任临时议会主席,大卫·本-古里安任第一任首相。杜鲁门总统立即宣布美国政府承认新以色列国家这个既成事实。这是1948年5月14日。不出三天苏联政府也跟着承认。

美国政府之所以很快决定承认,部分是因为他们同情,部分是因为受国内政治压力。至于苏联政府之承认得这么快,则说明当时他们对犹太人的支持以及对阿拉伯人的反对何等坚决。资本主义

和共产主义两大巨头奇怪地共同开创了这样一个先例，我们对阿拉伯国家有许多责任，在中东有重要利益，我们的处境很为难。一直到后来阿拉伯—以色列战争结束，停战协定于1949年春生效时，英国政府才给予承认。

在我们撤退后留下的真空地带，立即爆发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激战。当时谣传很广，说是英国军事专家认为一旦英军撤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很容易制服犹太人。的确，当时大家相信，至迟到5月底，阿拉伯人会攻占特拉维夫而将该国切成两半，抱这种看法的也不只限于军界。许多观察家，包括有经验的外交家都有这种看法。莫里森斩钉截铁地说这曾是贝文本人的意见。^①然而尽管起初得到胜利，其中有一次几乎推进到特拉维夫，阿拉伯人仍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虽然他们的武器和人数都远远超过以色列。6月11日经联合国委员会商定停战一个月，但在停战期满前一天阿拉伯人重新发起进攻，想以此取得最后胜利。但他们在各条战线全被击败，于是到签订第二次停战协定时，犹太人的军事地位大有改善。在是年整个一年内，战争时猛时息，一直继续着。到1949年初，以色列军队似有成功进击一举压倒对方之势。可是他们也未能把胜利推向彻底。

埃及政府首先提出联合国施加巨大压力要求结束战争，至少安排一次停战。于是在以联合国调停人为主席的委员会工作下，在1949年春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签订一系列停战协定。约旦河西岸阿拉伯人所占的那部分巴勒斯坦以后并入外约旦。——1949年6月改名约旦。

这样结束了巴勒斯坦问题的一个重要阶段，可惜这并不是由于采取了什么双方同意的和解或由于签订了一个最后的和约而结束的。

^① 莫里森勋爵《自传》272页。

这时下院暂时摆脱了一个迫切问题，虽则还要担忧。这个旷日持久的危机自然给当时的政府及其支持者以最大打击，因他们对此负有全责。但反对党对此也不高兴，而且意见分歧。虽然同战前一样，我同情丘吉尔对这问题的看法，但我明白，他的大多数支持者并不同意。但他坚持他的意见，并在必要时总用他那种清楚有力的言辞表达出来，而且不致于在任何方面损害他和同僚们的一般关系。他既坚决而又公正，使我无限钦佩。

1949年停战后，英国开始有限地供给阿拉伯国家以武器，各方继续捉摸不定和存在危机感。到1950年5月25日，三个西方国家英、美、法同意发出著名的三国宣言。在这宣言中，他们对中东军备竞赛的危险提出警告，并由三国成立一个委员会控制军火流入该地，以保持稳定与平衡。宣言中还包括一项重要的政策声明，说一旦发现任何一国侵犯边界或停战线，三国政府按照他们作为联合国成员所负的责任，将立即在联合国内外采取行动，以阻止这种侵犯。那些渴望重新发动战争的阿拉伯国家，自然要猛烈抨击这一宣言。不幸的是，这一政策不像大西洋联盟那样，并无有效的防御组织作为后盾。

这是许多阿拉伯国家动乱的岁月。当时英国人民痛苦地察觉到，他们满以为容易获得阿拉伯人的友情，而事实证明是想错了。1949年3月叙利亚发生革命；1951年3月伊朗首相被暗杀，5月，150
新政府宣布将供给英国用油百分之二十五的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并没收世界最大的阿巴丹炼油厂；7月约旦国王阿布杜拉被暗杀；一年后埃及法鲁克国王被推翻，随之引起对苏伊士运河未来命运的一切后果。

在这一时期内，如果说中东是不断发生麻烦甚至危险的根源，那末相对地说，我们在远东的问题就不那么尖锐。但英国甚至西方的势力和影响已开始衰退。不错，日本（主要是在美国的影响

下)对我们继续保持友好,但英国对东方的控制是严重削弱了。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从直接受英国统治变为较弱的联邦关系。缅甸完全脱离我们的圈子。在马来亚,我们面临共产党游击战,这必须在一位高明的英国指挥官、忠勇的军队和干练的行政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加以克服。在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共和国到1949年秋几乎在整个国家赢得全部权威。同年,印度支那各国,包括老挝和越南,成为独立国,但仍在法兰西联盟内。不久,世界又爆发一件更惊人的危机。1950年6月25日,受苏联影响并为共产党控制的北朝鲜政府入侵南朝鲜。这时英国人民面临一次新的考验,并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引起广泛的反应。

第七章 欧洲委员会

统一欧洲的思想几乎同欧洲一样历史悠久。多少世纪以来，政治家和哲学家总是梦寐以求会有那么一天，看到欧洲各国觉悟到他们有相同的文化传统，能忘却敌视和争雄对立，共同携手谋取和平与繁荣。从罗马帝国各处废墟上滋生的民族主义精神，无疑使欧洲许多国家的生气和力量随之得到非凡的发展，并相应地扩展了他们在世界上的影响。但在现代条件下，各大国间利害关系的冲突和切齿的嫉恨，似已到了危及他们自身生存的程度。1897年，在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的胜利节日时，英帝国的声威臻于极点，当时的首相索尔兹伯里想得比较远，他环顾欧洲状况，作了如下的宣言：

在世界这一地区的各个国家，不断遭受战争的恐惧与祸害，不断承受武装和平的沉重负担，使他们忧心忡忡，感到前景暗淡。要摆脱这一切，唯一的希望是欧洲采取联合行动（如果我们能维持这种联合行动的话）。欧洲联邦是我们的唯一希望。^①

1930年，当时的法国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在一次令人难忘的会议上，向日内瓦国际联盟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时，也是怀着这种胸襟的。但与会者的反应狐疑不决；时机稍纵即逝，随着美国经济大崩溃之后，欧洲迅即陷入经济灾难。接着是希特勒崛起，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然而白里安这个法国最有想象力的政治家采取的主动倡议，并未被人完全忘却。 152

^① A. P. 肯尼迪著《索尔兹伯里，1830—1903，一个政治家的形象》（1953年伦敦出版），273页。

甚至在大战进行期间，在抗击希特勒的地下工作者当中和流亡政府首脑人物当中，都有许多人同情统一欧洲的思想。于是统一欧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反抗希特勒欧洲新秩序的一个象征。前波兰总理西科尔斯基将军在雷丁格尔博士（他往后成为欧洲运动的一个重要人物）协助之下，是从事这项工作的最著名人物之一。后来形成比、荷、卢经济联盟国的关税联合的，其初步方案就是在那些苦难年月里拟定的。比利时的两名杰出政治家保罗·范·齐兰和保罗-亨利·斯派克，在开展统一欧洲的工作中同样积极活跃。参与他们工作的还有象捷克斯洛伐克的詹·马萨里克，荷兰的艾尔科·范·克莱芬思博士，挪威的赖伊（其后为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这样一些人。

甚至在二次大战初期，我们许多人心目中也有类似思想，尽管当时还表达得多么不完善。例如，我在自己的故纸堆中，找出1939年10月底答复战争目的问的文章中，似已大胆提出了我那坚定——虽则未受人启迪——的信心：

许多人问，在今日的混乱局面之后，可以指望出现什么样的欧洲。这只能极其粗略地来描述。但若西方文明能保存下去，那就必须瞻望西欧一切国家，在经济上、文化上乃至可能在政治上形成一个组织^①。

在那些早期的年月里，一个远为伟大的头脑与远为煊赫的权威也在为这问题操心。1942年秋，阿拉曼战役前几天，我军胜负尚在未定之天时，丘吉尔给当时的外交大臣艾登送交一份具有卓越远见的备忘录：

153 我必须承认自己的思想主要放在欧洲——如何恢复作为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发源地的欧洲的光荣。如果让俄国的野蛮主义吞噬了欧洲古老国家的文化和独立，那将是一场不可估量的灾祸。尽管现在还很难

^① 《画报》1939年10月28日。

说,但我深信欧洲大家庭将在欧洲委员会这样一个组织的领导下一致行动。^①

这个非凡的文件接下去道:

我指望将来出现一个欧洲合众国,使各国间的障碍大为减少,旅行将不受限制。我希望有人来通盘研究欧洲经济问题。^②

甚至在那令人焦虑的胜负未卜之际,丘吉尔已在开始考虑成立欧洲各国政府委员会的问题。这委员会中

可能含有十个单位,其中包括先前那些大国,和若干邦联——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多瑙河地区、巴尔干地区等邦联,他们可以拥有一支国际警察部队……^③

鉴于其后法国人对此事的疑虑,接下去的一句话特别值得注意:

当然,我们必须在许多方面,而且在那些极其重要的方面同美国人合作,但欧洲是我们的首要关心所在……^④

六个月之后,1943年3月21日,丘吉尔发表一次闻名的广播讲话,其中好些地方专门谈欧洲的重组和重建计划。第一个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是如何创设一个欧洲委员会。不管战后国联采取什么新的形式,他已专门在讲话中好多地方详细讨论这样一个欧洲委员会在战后国联中的地位。他认为欧洲的重振同美苏的长远利害相符,一个重振和壮大了的欧洲只会对他们两国有利。虽则他的许多听众可能会觉得这些想法同当时压在他们心头的迫切实际
154
问题,似相去万里,他仍毫无顾虑畅谈这一问题。我还记得餐后在H. 亚历山大将军营房里聆听这次广播的情景。那是个星期天;那时一场行将扭转非洲战局并使我军可能早日登陆欧洲的大战已经

^{①②③④}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四卷,“命运的关键”(1951年伦敦版),504页。有关内容摘录于本书附录一中。

激烈进行了两天。我们两人都沉湎在丘吉尔的想法——对未来的想法上了。当时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亚历山大会在两年内接受地中海战场上与他相对峙的全部德军的投降。

在 1945 年大选与丘吉尔丧失直接政治权力之后，他在全世界的声誉和威望仍是巨大的。下一年，1946 年，也可列在他一生工作成果最多的年代之中。1946 年 3 月他发表了富尔顿演说，接着 9 月又在苏黎世发表一次演说，其结果几乎也是同样惊人的。他并不想阐明一个详尽的计划。他只打算就欧洲统一问题提出一项广泛的和面向大众的呼吁：“摧毁了纳粹政权之时，我曾问我自己，对这个遍遭涂炭民穷财尽的欧洲大陆的兄弟公民们，我能向他们提出什么最好的建议呢？我向欧洲提出的建议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联合起来！”

在 1946 与 1947 之际，迅即出现多种组织。最早的是以前比利时首相保罗·范·齐兰为主席的欧洲经济合作联盟（ELEC）。这组织成立于 1946 年 5 月；一年后出现一个英国人组织的委员会，它在其后几年中行将取得重大成就。哈罗德·巴特勒爵士是它的第一任主席；莱顿，哈罗德，钱伯斯，贝丁顿-贝伦斯和其他一些人做了大量的细致研究工作；它有一个专心致志的秘书威廉斯夫人。这一帮人甚至还可以向人夸耀说，对五十年代恢复欧洲经济生活起过如此重要作用的欧洲支付联盟，主要是由于哈罗德爵士和他同伙们的工作创建起来的。法国那里在多特利领导下成立了类似的运动，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对欧洲问题的各个较大的侧面，迅即有人讨论各种各样的目标，从联邦主义到以后所谓邦联的主张都有。许多欧洲知名人士对这些殊途同归的工作都起了卓越的作用，他们这些人是舒曼，齐兰，菲力浦，尤其是斯派克。

在英国本土，丘吉尔于 1947 年初成立统一欧洲运动。他在保守党同僚中招纳了马克斯韦尔·法伊夫和我参加管理委员会的工

作，那是个“非党派性”的组织，其中包括象莱顿，卡特夫人和罗伯特·布思比这样一些知名人士。但该组织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桑兹的坚持不懈，他有这样的本事，能获得很多方面人士和团体的帮助与尊重。发起这一创举的首次会议，是5月14日在艾伯特大厅举行的。开会时大厅挤满了人，台上布置得气派非凡。主持大会的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并收到国内外许多政界首要人物的贺电。

欧洲各国当时陷入的悲惨苦境现在已很难追述。丘吉尔在会上声言的话并非夸张，他说，

在我们为重振欧洲的光荣、幸福与繁荣而进行的工作中，可以肯定说我们是从它命运的最低点出发的。

他把昔日欧洲的情况与今日卑微可怜的景况作了对比，接着说：

这里是地球上最美好、最温和宜人、最富饶的地区。多少世纪以来，欧洲以及基督教世界的势力和影响曾塑造和主宰了历史的进程。欧洲儿女曾奋身外出，把他们的使命信息传遍世界各处。全世界的宗教、法律、学术、艺术、科学、工业，在那么多的地方，在世界各种不同气候的地区，都深深印着起源于欧洲的烙印或受欧洲影响的蛛丝马迹。

但今日的欧洲又是怎么样呢？

它成为一堆废墟，一所陈尸堂，蕴育瘟疫和仇恨的场所。民族间的旧恨，意识形态上的新争，使苦难饥馑的人们惘无所从而又愤怒满腔。心怀恶意的说教者提出像数学上那样准确的数字要求偿还旧账，误人的引路者把人们指向无情的报复，妄以为这是通向繁荣昌盛的道路。 156

他接着提出一个问题，这在今日可能显得过于夸张，但在当时却扣动人们的心弦：

难道欧洲除了传染黑死病之外再无他物奉送给这个世界吗？难道欧洲各民族还要长此为战争与仇恨相互蹂躏虐杀下去，直至那赋予人生以尊荣逸乐的一切都销毁无遗吗？难道欧洲各国要永无休止地把他们劳动所得的第一批果实，浪费在建立新路障、军事要塞、关卡墙、以及错

综复杂的护照制度来彼此防范吗？

丘吉尔并不想给欧洲设计什么政治上、军事上或经济上的组织方案，这也许正是他那种做法的弱点同时又是优点所在。对我们来说，在那个阶段还不是试图定出完整结构或设计完美方案的时候。统一的欧洲可以在联合国体系内形成一个重要的地区性集团，他认为这样英国可以在欧洲充分发挥作用，而无损于对英帝国和英联邦的传统利益或忠诚。他最惊人的慷慨陈词也许就在于对重建德国的呼吁：

德国今日一蹶不振，宛转沟壑；嗷嗷待哺。我们显然不能指望它主动有所作为。该让法国和英国来带个头。他们必须和衷共济地携起手来，把德国人民拉回到欧洲圈子里来。

两年后他还要在斯特拉斯堡为此目的作一番戏剧性的姿态。然而他却只想提出一些大原则和最灵活的方式方法。

出席大会的有包括工会在内的各党派各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除了丘吉尔之外，要算卡特夫人的发言最为动听，斯坦利在大会终结时发了言，声言要为实现这一运动的目标贡献他的力量。

我一直摸不透为什么艾登对这事漠不关心。很可能是丘吉尔深怕把这样一个朋友和同僚太多地卷入这项工作中去，因为一旦保守党政府重新上台，艾登必然是外交大臣，或者，在丘吉尔去世或患病的情况下，必然是个首相。也可能是艾登根据他自己在外交部的多年工作经验，感到不能同意他的领袖那种热心。他肯定知道，即使为实现我们那些最起码的目标，必需克服多么巨大的困难。但当时我觉得并在其后更深感我们所失之大。要是贝文及其后的艾登，不仅同情地赞同欧洲大陆各国互相靠拢，而且又能及早使英国积极参与其事，那其后几年的历史很可能大不相同。

有这么多各自为政的组织在各国几乎自发出现，自然就难免有引起混乱和发生倾轧的危险。最后经过长期谈判，终于在 1947

年12月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以便协调所有这些活动。在各国的所有这些活动现已通称为“欧洲运动”。像对付一切自发组织那样,统一工作是克服了相当多困难,解决了人与人之间以及这些原则与那些原则之间的矛盾以后,才搞成功的。这大部分应归功于斯派克的循循善诱和支持他的邓肯·桑兹的坚持不懈。有时这两位性格坚强的人物意见相左,但一旦他们合作从事,则是无往而不胜的。这样,由整个欧洲运动组织的这次“欧洲大会”的舞台已经布置就绪,大会于1948年5月初在海牙开幕。

同时,国际事态的发展也使西欧各国至少在政府一级采取了重要的合作步骤。1947年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宣布他的欧洲复兴纲领——马歇尔援助计划。同年10月底产生比、荷、卢三国关税同盟。1948年3月17日成立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其成员有联合王国、法国和比、荷、卢。这组织还包括由五位外交部长组成的咨询委员会,至少每三个月会晤一次,并有一个常设委员会,由有关各国大使和一些官员组成。必要时,还可召集军事委员会。贝文声称,订了这个条约之后,英国“事实上成了欧洲的一部分”。这位外交大臣以及其他许多人确曾利用政府间合作这一巨大进展,来反对以任何形式把国家主权移交给更广泛的组织。他们争辩说,没有正式机构,没有那种民众组织或议会之类的机构,照样可以搞有效的统一行动。此外,为更好地安排马歇尔援助的分配工作,有关的十四国政府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这件大事是在4月16日搞成的,仅在海牙大会之前几个月。军事方面的商谈也已开始进行,结果产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因此代表们是在期望甚至激动的心情下参加这次历史性的海牙大会的。这确实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极不平凡的、最有代表性的欧洲知名人士的集会。与会者共八百人,有些是代表多种志愿组织,有的是为运动所吸引或关心运动的人。有好几位是前任首相,

有二十九名前任外交部长，还有几位是现任部长。就欧洲的代表性来说，那是不成问题的，除共产党外，各政党都有代表参加；各行各业，持各种不同意见的人都有。英国代表团里除议员之外情况也是这样。有各派教会人士，工业家，工会人士，行政官，经济学家，教授，科学家，诗人，艺术家。而且我们对自己这个队伍也是满可以自豪的，有像约翰·安德森爵士这样一个伟大的总督和行政官和桂冠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与著名小说家查尔斯·摩根并坐一堂。出席的还有天主教主教，英国国教首脑人物，非国教派牧师，皇家学会会员。代表大化学工业出席的是麦科恩爵士和保罗·钱伯斯，代表化工工会的是它的总书记爱德华兹；在济济一堂的经
159 济学家之中有阿瑟·索尔特和罗伊·哈罗德。

关于我们议会方面的代表性问题，丘吉尔处境是颇为尴尬的，作为曾帮助拯救欧洲的战时领袖来说，他自然享有无与伦比的地位。但他又是个党派政治家，是一名活跃的有时是擅于兴师问罪的反对党领袖，是位要削弱现政府并想尽可能早地取而代之的人。作为一党之首，他不会看不到相当一部分保守党员对这新运动是抱怀疑甚至不安心情的。他们不无道理地担心，在政治上以及在经济上，英国在帝国和英联邦内的首脑地位多少会受到削弱。这些疑虑是一直存在的，要到许多年之后才大部解决。自由党是个小党，在这个问题上则是一致的。但他们在议会内外的影响是有限的。工党方面，至少就它的领导人物讲，对整个事业肯定是深表怀疑的，即使还不至于公开反对。他们自然妒嫉丘吉尔那个独一无二的地位，深信丘吉尔在利用他那地位搞这一运动。虽则我们委员会里也有几名工党议员代表工党，其中包括戈登·朗教士，他是个很受尊敬的议员，与邓肯·桑兹共管英国代表团的秘书工作，但就整个政府来说，他们对我们的活动是不安的，甚至持敌视态度的，这无疑是由于当时白厅方面尤其是外交部和财政部方面这种

情绪占了上风而使他们更不友好。那些暂时掌权的人和那些常年执行官方职权的大部分人,对于任何运动,只要是同民选团体组成的欧洲机构或欧洲民选议会的代表有瓜葛的,他们都一律怀疑歧视。怎么能让这些人参与这种大事呢?为谋取欧洲统一所需做的任何工作,都可以由政府通过部长、大使和官员做得更好。这是主教和牧师管的事,俗人顶好回避。

更有甚者,国内和欧陆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一般都打算向人民 160 灌输这样一种思想,说是欧洲的自由和繁荣只有在社会主义者手里才能保险。当工党方面知道他们中至少有四十名议员打算参加海牙大会时,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就函告他们改变主意。2月27日在首相艾德礼亲自参与的一次会议之后,执委发表声明如下:

民主社会主义的生存同西欧作为一个精神整体的生存息息相关,而统一欧洲的思想“可能被反动派所滥用”。^①

他们似乎觉得,为了在战时谋取生存,搞联合是情有可原的,但在为谋求保持和平与恢复繁荣就不许这样做。

当时我在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一次集会上讲话时,试图对这种偏狭态度提出异议:

今后几个月将是个关键时刻,因为迄今被遏制的共产党攻击活动行将在法、意重新展开。在捷克,看来已经开始了。

我对大家宣告说,欧洲已被什切青到的里雅斯特一线分为两半,如果再划一条新界线,把社会党人之外的一切人士都看作印度的贱民,那确是件蠢事:

想用社会主义者联合阵线来阻挡共产主义,这是最危险的一种幻想。我们必须有一个相信民主和自由的一切政党和人士参与的民主统一战线;把自己分裂而想统一欧洲,那是决不可能的。

在那些创立运动的年月里,左右翼两方面的迟疑不决还要继续一

^① 《1948年年鉴》第9页。

些日子，并对运动造成很大的损害。英国命定要被保守党人的担心和社会主义者的疑心所阻碍，不让它在这个伟大的创举中发挥充分作用。

参加海牙大会的衰衰诸公中，除了丘吉尔之外，最风云一时的人物也许要推著名的法国国民议会激进派议长和前总理赫里奥特了，他当年曾坚定地站在共和传统的立场上，反对维希政府的卖国行为。现时他是欧洲统一运动法国委员会的主席。联邦主义者的代表是一位荷兰社会党人亨得利·布鲁格曼博士。主要由基督教民主党人组成的“新国际阵线”由一名前法国部长罗伯特·毕歇为首率领的。还有由阿登纳博士率领的一批人数不多的德国代表团也出席了大会，突出表明感召与会者的大会宗旨何等深远。

这次大会，也像所有这种人数众多的集会那样，开得很乱。大会下设三个委员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委员会，各由合适的著名人士主持，它们各有自己的管理“班子”予以协助，并有一批从不缺席的虔诚信徒作为坚强核心。我们别的人就像大学生那样在各个教室里随便听讲，哪里有闻名的发言人或哪里争辩激烈就往哪里跑。我们大多数人，也像刚从中学毕业初进大学的学生那样，参加大会的主要兴趣是可以结识新朋友和重晤老朋友。我们代表团里的大多数人，除了因公出差之外，几乎有十年之久没有离开那受敌人围困的孤岛。能够有那么几天避免国内颇为严峻的艰辛生活，而能享受一下欧洲大陆的舒适生活条件，那是颇惬人意的。自然，我们没钱，或者钱很少，因当时经济危机“起来”了。所以我们只有很可怜的一点外汇。但一些欧洲大陆朋友供给我们食品票，还有一些人请客款待我们。这就是我们所享的胜利果实。

在可以称之为业余创办的基础上，没有内政人员和外交机关的帮助，组织这样一个规模的大会，是很吃力的。如果欧洲各国政府也象英国政府那样表示漠不关心甚或抱敌视态度，这次大会便

很不可能开成。结果是三天大会顺利开完，没有任何严重挫折。代表们的食宿问题解决得很好；大会厅和小组会地点都有了；所需的文件都可以印发。经过历时很久的讨论和许多修改，最后决议也搞出来了，可以及时提请全体大会通过。有些年青热情人的过分要求，被那些较有经验与较为谨慎者婉言劝阻。然而，正如许多 162 业余演出的情况那样，到了“演出当晚”才算诸事就绪。政治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通过了十项决议草案。这些决议也象基督教的十诫那样，其重要性，有轻有重；其执行程度有难有易。起草委员会把这些决议草案提出之后，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但大会内外人物所主要关心的一项建议是尽速召开一次欧洲大会。这是丘吉尔在最后一次会上慷慨陈辞时提出的。他发言时外面正下暴雨，电闪雷鸣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他发言的效果。“欧洲议会”就在这种颇带华格纳交响乐气氛的情况下宣告闭幕。

返国时贝伦斯租了一架鸽式飞机，邀我同行。同机的有哈罗德·巴特勒，华尔特·莱顿，维奥莱·波南-卡特夫人和彼得·桑尼克罗夫特。我们在暴风雨中顺利起飞，但在飞抵克罗伊登上空时，我们的东道主告诉我们说驾驶员不能放下起落架。驾驶员做了几次虚拟着陆的急降动作想把架子松开，但都无效，结果只得在天空盘旋一个多小时，把汽油用完再设法尽可能安全着陆。贝伦斯似担心飞机在机场上空长时盘旋迟迟不着陆，会引起客人们的惊恐。我却不这样看。不出所料，卡特夫人和莱顿兴致勃勃地谈着自由党的未来，谈了一个多小时，毫不感到出了什么意外。巴特勒和桑尼克罗夫特在辩论经济问题。东道主和我两人则尽可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看着机场上开来救火车和救护车那种准备应付事故的熟悉情景。这一切不禁使我悚然回忆起在地中海战场那些日子里的类似经历。最后我们终于没有遭难着了陆，并安全跳出飞机。桑尼克罗夫特和我在着陆之际高风格地喊道：“让女士们和

自由党人先出去”。万一出事，他们都将成为一批现成的软垫子。

163 有些方面的人士讥笑海牙大会的做法是经常乱糟糟的逢场作戏。这之后又开了两次会，规模较小，一次在布鲁塞尔，一次在威斯特敏斯特。那两次会肯定是开得认真卓有成效的。第一次是在1949年2月开的，主要讨论组织工作和确定应予立即动手的宣传工作大纲。在这前一年的秋天，我曾去德、意两国作旅行演说，看到人们对统一欧洲的思想怀着越来越大的热情。所以我对布鲁塞尔所定的计划也是能作出一些贡献的。

威斯特敏斯特会议是1949年4月在欧洲经济合作联盟主持下，专为讨论财经问题召开的。与会者有英国和欧洲的许多杰出经济学家，其中有的是代表团成员，有的不是成员。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货币兑换、欧洲支付、基本工业的组织以及难民问题。但这些当然只是瞩目已久的欧洲委员会的前奏。

我们从海牙返国后不久，丘吉尔就召集委员会一班人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决定请艾德礼接见我们的代表，向他汇报与政府有关的会议结果和主要建议。首相答应接见，并约好日期。

我永远忘不了这件有些异乎寻常的事。当天我们共约十几个人会集在下院丘吉尔的房间里。商定好做法之后，我们排成庄严的队伍出发，走过新宫院，穿越议会广场，然后到达唐宁街白厅。丘吉尔带头走，照常口衔雪茄，照例手指作V字手势。当我们两个一排，象一群在校园里散步的女学生似地跟在我们的领袖后面规规矩矩地走去时，值勤警察似颇感惊奇。但他还是指挥车辆暂时停驶，让我们通过，然后我们以相当整齐的队伍到达唐宁街十号，这地方我相信丘吉尔从1945年夏以来还从未来过。

首相和外交大臣(以及其他一些大臣)以适当的礼仪和庄重的态度接见了我们。丘吉尔把情况说得头头是道，并集中强调一个
164 主要问题：请求有关政府，也就是布鲁塞尔条约五个签字国(英、

法、比、荷、卢)的政府,应同意研究召开欧洲大会的问题,并采取主动措施,按实际情况,把组织基础搞得越广泛越好。

到10月,五国政府同意指派一个委员会研究这个计划。经过多次讨论,尽管贝文很勉强,五国政府外交部长终于在1949年1月28日决定成立欧洲委员会。3月18日他们邀请另外五国意大利、爱尔兰、挪威、丹麦、瑞典参加。这几国都同意参加,并于5月5日在伦敦开制宪会议,通过成立委员会所必需的各项法律文件。

虽然英国政府想方设法不让这新组织过问防务问题(说是已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管这些事)和经济问题(说是归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管),我们似乎只能讨论法律问题和文化问题,但我们谁也不怀疑,一旦大会开幕,代表们想讨论什么问题就可以不必有多少顾忌地讨论什么问题。后来事实也确是如此。

与此同时,我们抱着关切与希望的心情,等待瞩目已久的将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欧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欧洲委员会包含两个机构:由各会员国外交部长组成的外交部长委员会和各国议员组成的议员咨询大会。在后一组织中,大国可有十八名代表,小国可有六名或八名。1949年8月8—13日外长委员会通过的第一项议案是接纳希腊、土耳其。这使会员国总数增到十二个,大会代表增到一百零一名。

6月初,英国议会已接到通知,说是根据规定应由政府决定代表成份,代表中将有十一名社会党人,六名保守党和一名自由党。社会党代表中有莫里森、多尔顿和主任督导怀特利。因多尔顿新任海外领地部长重新上台,所以代表团的工党成员中有三名大臣,这种安排在多数国家是力求避免的,使莫里森与外交大臣贝文的地位关系搞得颇为尴尬。工党方面的其他人员有毛利斯·埃德尔曼、R·麦凯(一位热心的欧洲统一运动者)以及其他一些往后在

政治上起相当作用的人如弗雷德·李和L. 托马斯; 保守党的一批人是丘吉尔、马克斯韦尔·法伊夫、埃克尔斯、布思比、罗纳尔特·罗斯(代表北爱尔兰地区的议员)和我。这第一次会议没有派桑兹为代表, 但可由他在欧洲运动中所任职务发挥作用。由于他熟悉大会中许多人员, 所以除了当丘吉尔的参谋长之外, 还可以在幕后起很多作用。

早在5月里就开了一次筹委会, 商定部长委员会和大会的议事程序草案和开支预算。在下院事务主任吉尔伯特·坎比昂协助下, 临时草拟了大会的“议事规则”。最后商定的计划是英国和欧洲大陆双方办法的折中。会议大厅要象欧洲大多数议会一样呈半圆形, 但会员坐次不按所代表的国家或党派而按姓氏字母次序排列。这样就不分什么国家集团和“右、中、左”。这样做对进行辩论颇有好处, 更显得发言自然, 有助于讨论问题时消除纯国家或党派的成见。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 丘吉尔当时坐在两位意大利代表之间, 用他那独特的法语滔滔不绝地同他们畅谈。同时, 走廊小吃处和酒吧间的作用比大会厅里还显得重要。

会议厅虽是照大陆方式布置的, 但代表们发言则采取英国式的。没有大讲坛; 每位代表都象我们议会里那样就地发言。许多大陆朋友起初感到这样不太习惯, 但以后似颇欣赏这种方式, 觉得这样发言可以使人少唱高调多谈实务。大会由一名议长在四名副议长协助之下主持进行; 这些人形成一个管理“班子”。大致说来, 决议和动议的措辞以及修正案的提出和表决步骤, 一般都采取英国式和欧洲大陆式的折中办法。但坎比昂爵士设法让组织委员会采纳他的许多想法, 并受所有人的深刻尊敬。他头脑冷静, 谈吐文雅, 丝毫不感情用事, 娴熟大会规章制度, 好象已经搞了一辈子这套东西似的, 所以早就成为大会的厄斯金·梅^①了。代表们一般

^① 厄斯金·梅(1815—1886年)英国的法学权威。——译注

都用法语称他为“‘英国不那样做’先生”，因他对所有不同意意见，都用这话回答。

除了派正式代表以外，各国政府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派副代表出席，他们在正代表缺席的场合下可享受参加会议、发言、投票等全部权利。但英国财政部在莫里森支持下搞得十分小气，如非必要，不肯提供派副代表的经费，使我们不能充分利用这一办法。然而，很明显，倘若要把大会开好，让越多的议员参与大会越好。

我们所有人聚会在斯特拉斯堡时，确是激动人心的。为什么偏要选这个地方作为欧洲委员会的会址，道理谁也说不清楚。当时那里交通不便，因机场小不宜于大飞机起落，而从巴黎搭火车要花六小时。有人想，所以选中斯特拉斯堡，是因为它的象征性位置，因它位于西欧正中，所以比任何一国的首都更合适。有人怀疑那些最不赞成统一欧洲思想的外交部长认为交通不便有好处，免得人们太向往这次大会。确实，不少法国朋友感到在斯特拉斯堡不便久住，经常返回巴黎。然而从许多方面说，斯特拉斯堡是适合我们开会目的的。如果会议在巴黎或伦敦那样大都市开，就很少有 167 机会在代表中间培育团结友爱的感情。斯特拉斯堡很少游乐分心之处。在许多工作日时间里，参与大会或各个委员会的人都住在一起。公余之暇，我们都在融洽气氛中，分享社交娱乐和非正式讨论的乐趣。

在参加会议工作的三年期间，我结识了欧洲大陆几乎所有的知名人士。由于欧陆各国大臣的更迭比我国快，所以常有进进出出的人物。例如，在第一次会议前几天碰巧比利时更换政府，这就使斯派克能摆脱他的外交大臣职务，使他率先成为大会会员之后又被一致推举为大会主席。这件事对我们的工作大有裨益：

头五个星期的会议要是由别人来当主席，就不可能获得这样大的成功。因为在第一次大会上——如同在早期英国议会中那样——议长不

应只限于沿袭先例。他必须破格创例。他不应该象英国下院议长那样，按多少世代的经验和繁文缛节办事——就是说什么都得干，但自己不发言。斯派克主席在会上讲话很多，讲得很风趣很明智。他得引导代表们按新创的程序进行工作。^①

我得老实承认，英国代表团中各党派人士之对斯特拉斯堡怀有好感，乃是因为能有几个星期的机会逃避英国当时严酷的日常生活制度，这种生活我曾颇为轻率地称之为靠“鱼和克利普斯”过日子。这里我们可以饱享阿尔萨斯的肉排。我们大家已习惯于享用那一星点儿的配给肉食和其他食品，所以旅馆和市内餐厅里供应的丰盛菜餚，确非我们这些业已萎缩的胃口所能应付。在没有习惯以前，一份肉食往往足够我们三个人吃。斯特拉斯堡的饭食，除那遐迩闻名的鹅肝之外，久以其美味丰盛驰誉于世，特别是以其丰盛出名。这情况可用阿尔萨斯一位阔老（我是在当地认识他的）的一句话来概括：“我有法国人的口味和德国人的胃口”。气候不错——经常是热的，有时热得难受——但有了在北非住过的经历之后，我对这种气候是可以适应的。第一次来时，我妻不能离家，所以只带我的女儿凯瑟琳。但其后几年我妻也来了。这样我们虽然工作很忙，但都过得很愉快。

除了享受这些物质上的甚至是过分的乐趣之外，我们确实是在精神振奋的气氛下聚会一堂的。我们确实感到有信心能在旧世界莫立新秩序——民主、自由、进步的秩序，它势必恢复繁荣并保持和平。虽然几乎所有人对少数极端分子热烈提倡的联邦思想嗤之以鼻，但大家都承认，在重建欧洲这个共同目标下成为真诚的伙伴之后，各国总得放弃一些主权，并建立某种形式的政治组织，否则这些欧洲机构都难免成为一种纯技术性的组织。所以在这些早期的日子里，尽管困难重重，大家都满怀希望，充满信心。成立欧洲

^① 哈罗德·麦克米伦，《旁观者》，1949年9月16日。

委员会时的那种团结友好的精神诚然还大部保持着。许多有益的工作仍在进行。但统一欧洲的思想——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已经完全变样了，并让他人控制了。这主要是我们的过失；而当我们想挽回局势时，为时已太晚了。但是同时，我们仍满腔热情抱着希望。

大多数英方代表住在当地两个大旅馆里，住得很舒适。宿费由财政部支付，伙食则发给为数不多却不能算太扣门的现款。丘吉尔住在一个别墅里，带着他常有的一批“扈从”。

1949年8月10日大会第一次正式召开。因未选出主席，第一次会议是在赫里奥特主持下开的。

赫里奥特作了“开场讲话”之后，大家休会。笑话出在后头。

麻烦出在可怜的莫里森和他那一帮子人身上。他根本不懂得外国人，没有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也很少想象力。莫里森显然觉得他可以在斯特拉斯堡重演威斯敏斯特的那一套，他将“操纵”会场，我们则应扮演百依百顺感恩戴德的反对党角色。那些“外国佬”应当在英国的国威和英国大臣（别国很少派大臣出席这次会）的权势面前俯首帖耳。^①

第一天下午，莫里森召集英国“代表团”（他不甚正确地这样称呼我们）开会。我们则并不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代表团，而只是由政府指定参加一次欧洲议会的个别代表：

他要改订大会规章；他要挑选一批办事官员；他要重排座次（本来是按字母次序，而不是按国家甚或按党派次序排的）；他要任命他的主任督导（怀特利）当大会副主席（好似罗马皇帝卡利古拉任命他的马当护民官一样）。

我们（托利党人）愿在这里（如同在威斯特敏斯特那样）服从他的高级权威，以博取他的一小份恩赐（一点点威士忌酒和文娱费用）。

丘吉尔未与会……我对这种做法是颇有个人看法的。

① 这段及其后几段引文，都摘自当时我给我妻的信。

在一两天内，火上的油就烧起来了。

大会一致通过选斯派克当主席之后，余下的问题是选副主席。四名副主席中三名顺利选出；提出了斯蒂番诺·耶西尼(意大利)，弗朗索瓦·戴·蒙松(法国)和奥尔·勃寻·克拉夫特(丹麦)，并且大家都觉得可以。第四名副主席显然必须是个英国人。但这次选举却引起轰动的甚至激烈的竞争。莫里森坚决要任命怀特利(一位和蔼可亲并孚众望的主任督导)。这人在战时联合政府里是詹姆斯·斯图尔特的同僚，凡认识他的人都理所当然地喜欢他，尊重他。但要他当这个职务却确实不适宜。副主席不但要轮流主持会议引导大家辩论，还得帮助委员会做许多工作，并组织大会顺利
170 进行工作。这些事在大会初期尤其重要。莫里森决心要为他所提的候选人竞选，于是就展开一场斗争：

我们提出了莱顿，并放手为他竞选。莱顿吓坏了，想引退。在一次晤谈时，丘吉尔抓住了发抖的莱顿向他咆哮道，“如果你此刻退出，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你这就出卖了我。你这就出卖了整个自由党。”

于是竞选活动就一本正经地开始了：

在头一天夜里一次大吵大闹的集会上，大会的全体社会党人同赫伯特·莫里森做了一项交易。赫伯特为了买通他们选怀特利当副主席，他得同意让他的对手安德烈·菲利普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席。(菲利普涕泪满面又羞又恨地对我用法语说——“你有什么办法呢？没有比这个莫-莫-里-里-森更难对付的人了。我对这事感到恶心。”)

我们向所有意大利人(除了二人之外)进行游说；希腊人和土耳其人是坚定的，他们奉命唯丘吉尔的马首是瞻。投票是秘密进行的，选票投进一个罐子里。用抽签办法推出两个唱票人。巧不可言地是居然抽中了丘吉尔当唱票人，使这场戏演得更加热闹。大家情绪兴奋热烈极了。结果是“该死的险胜”，莱顿仅以五十二票对四十七票当选：

可怜的老头子怀特利，每个人(记者，秘书等)都以十八世纪那种激烈的方式参与赞成和反对他的竞选活动。伦道夫〔丘吉尔〕和阿里·福布斯多少起一些督导员的作用。和福克斯与威斯特敏斯特的选举一样，会上到处传播一种谣言，说怀特利(尽管他一生经历两次大战)直到今天从未渡过海峡……拥护怀特利的人则愤然驳斥，说事实正相反，他以前是到过国外的。他在好多年前曾从佛克斯通出国到布洛涅作过一天旅行。

这一切也许堪受诅咒，但想起来非常有趣。

选举后自然又是休会，大陆议会制度的最妙之处是每逢出现有趣或激动的场面后就休会，喝点酒，聊一阵，或休息一下。于是 171
我随同丘吉尔去他的别墅。这所别墅，包括酒、食、仆役，是由斯特拉斯堡人民供应他的。这城市确实该感谢他，因在上次大战最后阶段的危急关头，当德军从阿登进行反攻时，艾森豪威尔曾下令美军从莱因撤至孚日，这就会使斯特拉斯堡重遭敌人蹂躏和残酷报复，因当地居民曾热情洋溢地欢迎过他们早先的解放得救。当时凑巧丘吉尔在艾森豪威尔的总部，就吁请总司令别采取这一行动，结果使艾森豪威尔取消了他的命令。斯特拉斯堡人民知道这件事，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第二次得救。

丘吉尔象个学童那样兴高采烈，乐不可支：

他累得和衣躺倒在床上，但仍不断大声说，“这是多年多年以来最有趣的事情。真妙，真逗。”

这样，莫里森遭受了 1945 年以来在议会中的首次失败。

部分由于炎热，部分由于上午激动场面，丘吉尔累极了。但他仍不顾疲倦同我一起回去参加下午的会议。头半小时是主席斯派克的就职演说，讲得很好，又实际又生动感人。然后大家议论今后该讨论什么，怎样拟定一项象议会议事程序单之类的文件。当各国政府建立协商大会时，外交部长们的初意显然是想把会议的活

动范围尽可能加以限制。从权力观点讲，这样做不无道理。但大会当然没有什么权力，它只是一个协商机构，它的职能就是讨论和提出建议。所以，认为应把它所讨论的事项严格限制，以致使它的议程成为一出滑稽戏，似乎没有多少理由。所以随之而起的争论是围绕着大会是否有权讨论任何事项这样一个问题展开的。

172 丘吉尔所处的地位并不是完全轻松的，虽则他的主意是打定了的。他嘱我把这个大问题作为紧急事项提出来。我在事先取得斯派克同意后遵命照办了。我们虽显然想讨论一些重大问题，诸如面临欧洲的一些经济和政治问题，还有如同人权问题之类的法律问题，但还不准备提出丘吉尔当时思虑甚深的德国前途问题。当时西德正进行选举，所以明智的做法是等待他们选举完毕（8月15日下星期一）后再说。但按规定，大会所讨论事项必须在开会（8月10日）三天内征得外长们同意。如今已是8月12日。如果我们等着，并完全遵守规定，那就为时太晚。无论如何，部长委员会不久就要收场。经过长时间辩论后，大会决定委托主席向外长们吁请给予大会以较大的自由。此刻我们当然并不特别提到要谈德国问题，只是要求在开会过程中有权讨论任何新问题：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丘吉尔多少“操纵”了这次大会，这是使莫里森大为恼火的事。每逢老莫启口，就会有人——通常是法国社会党人——站起来反对他。

在讨论结束时，发生了一件最不愉快的事，使大家都觉得尴尬。当时白厅决定指派一位保守党“副代表”前来，因大家认为丘吉尔无需每场亲临或久坐会场。为此就指定派约翰·福斯特前来，并获批准。但能否发给他津贴费一事仍在伤脑筋。财政部的意见是，除非他确实出席会议，否则不给他津贴费。每天二英镑的津贴费就成了问题：

在会议厅里，莫里森傻头傻脑地走到丘吉尔座旁（那时主席刚离座，旁听

公众开始散场，但会议厅里还满坐着代表)，要求他暂勿离座，问福斯特的津贴费怎么办。

“我不想同你谈。请书面通知我。”“是的；不过我们不能发给福斯特每天二英镑津贴”。“噢，那是你们的钱吗？你们自己的钱自然可以爱发给谁就发给谁。别跟我谈了。让我走吧。你可以书面通知我或通知麦克米伦。” 173

会就这样中断了。我们向财政部交回了几英镑的钱，我想莫里森总可以称心了吧。

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看了这场面都非常惊讶。

第二天上午不开会，但到下午斯派克告诉我们说外长委员会让步了：

经商定，开会期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新问题。这新问题应（通过电报或其他方式）提交外长委员会请求准许讨论，外委会则可在五天内给予答复决定。

这标志着大会的一次重要胜利，但我感到很难劝说丘吉尔接受这项办法。因我与他座位相去颇远，所以我得不断离开座位，把我的折中意见用耳语传给他。最后几经周折，他勉为其难地接受了新办法，但仍喃喃表示不满。

有人告我说“他是个执拗的老头子”。“这无疑正是他打败希特勒的那股子拗劲。”

这样结束了第二轮摔打。次日晨，大会把业已商定的附加议程送交外长们核批。保守党人所提的动议全给批准了。不过这些动议虽然牵涉面足够广泛，容许我们在讨论过程中提到德国问题，但当时还未就此专门提出建议。

此时大会宣布休会到下星期二，在休会期间是活跃而有趣的：

星期五晚（辩论后），在大广场（克莱勃广场）开了一次盛大的公众集会，与会者达两万人光景。这……是欧洲运动发起的，会上讲话的有斯

派克、雷诺、克拉夫特和丘吉尔。丘吉尔受到盛大欢迎，并作了一次非凡动人的演说。演词用英文写成，译为法文，讲的声调比往常好。大广场的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每个阳台每个窗户——除一处以外——都有人在观看。那例外无人的一处是贝文所住旅馆起居室面临广场的窗户。^①

我的许多时间都花在去“丘吉尔别墅”进中餐和晚餐。晚间待客时间往往直到深夜。他在这时显示了惊人的活动能力：

我不能想象他怎么会受得了。他是来者不拒，所有的人——美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意大利人，凡是他能哄劝开导的，他都接待。

与此同时，一个拟定详细程序的委员会正在星期天和星期一整日工作着：

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由大卫〔马克斯韦尔〕法伊夫作代表。为尊重他的大臣身份，莫里森被选为委员会主席，但因他很不习惯于同大陆人士坚持讲逻辑的头脑打交道，他的日子显然很不好过。他想装出一副轻松得意的模样，但法国人和别国人就讨厌那种模样。由于没有一个唯命是从的多数票来支持他的一切提议，他自然弄得一筹莫展。在这种议会里是没有多数派的；没有政府一派；没有反对党；没有督导。你得依靠自己讲话的循循善诱和论据的份量……这情况使我们有些人感到很奇怪，并且颇为惊讶！

8月15日星期一，是个节日。那一天丘吉尔接受斯特拉斯堡的荣誉市民称号。我想他也许认为这公众节日是为他祝贺的。当有人向他说明这是为了欢庆天使报喜节时，他颇有失所望之感。

最后，到了星期二和星期三，关于欧洲政治前途的辩论正式展开了。辩论过程中有一些确实精采的发言。乔治·皮杜尔和保罗·雷诺似都比往常显得年轻，他们的发言特别有力。但当丘吉尔在这些前奏小仗之后起立发言时，会场和廊上的情绪就显得十分激动。我开始体会丘吉尔采取的战术：

^① 为参加部长委员会，贝文早已到达。

在头几次会上，这位大人物似乎太快地堕落到一般政治鼓动家的水平。他插手干预莱顿与怀特利的竞选事件，他几次关于大会有权自定义程的简短发言，都(也许是有意地)表明他是个议会政客，而不象个伟大的国际人物。你可以想象，我们对此是多么耽心。我们劝他，他坚决不听，甚至粗暴拒绝。他肯定比在下院里更注意倾听辩论。他到处走动，同每位代表闲聊，走进吸烟室，总是在尽力博取那些新议会同僚的好感。这是他竭力追求的事。他利用他的别墅款待那些比较重要的人物，共进午、晚餐；他决心要博得他们的欢心和仰慕，不惜花费很大力气。

如今他似已把这些搞笼络人心的动作撇在一边了。他站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高度。大家盼望已久的他那个发言使多数人失望，或者至少觉得是不合时宜的。西欧早已开始笼罩在一个新阴影之下，不仅担心俄国，还担心那重新武装和重新兴起的德国。有些人不愿多想或多谈这种事。然而这也许是最迫切的欧洲问题。怎么解决这问题呢？只有使统一的欧洲成为现实并使它包括尽可能多的国家。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或遏制新军国主义。丘吉尔明白这一点，而且敢于把它说出来。由于他那先知者的预见和激动他的大无畏精神，他没有作那听众爱听的演说。在这种场合下，他要是把赢得听众的掌声看得比讲真话还重要，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欧洲委员会的成立毕竟主要还是他付出心血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天的会是他的“专利”。他满可以用一些动听的一般号召博得欢呼赞扬。然而他毫无顾虑地在发言中主要而且几乎是专门讲德国问题。他的话使一些人吃惊，而且几乎凌辱了另一些人。他演戏似地，慷慨激昂，环顾会议大厅，几乎语气凌厉地问道，“这里有德国人吗？”他要求立即邀请西德政府参加我们的会。时不我待，不该再迟误了。“我们不能坐等一年后再请德国参加，而没有为此而做更多的工作就在本月底大家分手。这一年的时间太宝贵了，我们等不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失的将不是这一年，而

可能是这个年代。”

他在斯特拉斯堡逗留期间，一直坚持这立场，而在他离开后，我们得为此继续进行斗争。别的人不可能作这样的演讲。它虽不象在富尔顿和苏黎世那两次讲话那样长期而密切地、那样纷纷地受人议论，但它的效果却是相埒的。

翌日，丘吉尔飞赴蒙特卡罗。他打算在法国南部逗留一周或十天，然后再回来促使大会通过一项邀请德国参加的决议。他着我负责领导我们这一帮人，要求每天向他汇报情况，并为实施他对德国问题的建议继续努力。

这之后在政治、经济、法律方面的一般工作有法伊夫和埃克尔斯出色地帮助进行。法伊夫在各项问题上都是顶梁柱，埃克尔斯在辩论经济问题上的发言显出他的真才实学。邓肯·桑兹则继续在幕后牵线起作用。我们取得可观的成就。法伊夫在人权问题上和在欧洲成立专门法庭保障人权的建议上，取得名副其实的胜利。在委员会上的讨论是漫长而复杂的。此时，在泰得根先生的帮助之下，法伊夫的建议通过了，他

在总结辩论时作了长篇有力的发言。我和他相识愈久，对他的好感与赞佩也愈深。他是个杰出的人物，忠心耿耿，高尚，聪敏而又谦虚。

在委员会上和全体大会上的辩论是又有趣又有教益的。我发
177 过几次言，颇获好评。有一次听到一番双料恭维的话特别使我高兴：

一位意大利朋友称赞我的发言，说“你真是个幸运的人。你在辩论中发言最出色，你还有那个极其美丽的女儿——真象个天使。”

我甚至对议事程序问题（这在国内是枯燥无味的）也觉得很有趣。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显出各国的作风有所不同：

拉丁民族对我们不讲系统的思想方法感到吃惊；我们（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人）则觉得拉丁人的逻辑不胜其烦。

我们的幽默形式也不受欢迎。他们很讨厌那种自鸣得意的打趣话；风趣的话当然可以，但取笑别人则不可。

在辩论一般经济问题时，多尔顿讲得很出色，远胜过他的同僚；但就是他也免不了犯这样的错误：说些挖苦丘吉尔的话。安德烈·菲利浦，雷诺和有些意大利人表现特别好。同时我们这小圈子里又添了新人。弗雷迪·伯肯黑德作为“副代表”同他的妻子来了。

欧洲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仍是件新鲜事。于是许许多多外交家、政治家、运动的拥护者、记者、美国观察员，都被吸引到斯特拉斯堡来。正式和非正式的欢宴和送往迎来川流不息。所以日子是过得够快活的。

但丘吉尔在他离去时交付我的任务却并非都是易于完成的。他向大会提出的正式请求，即认为大会应请外长们采取必要步骤，立刻通知德国政府参加大会，或是及早在新年为此目的召开特别大会。这项请求被大会主席斯巴克违其心愿地拒绝了，认为在目前阶段还“不合时宜”。但他建议在闭会前也许可以有机会用这种或那种形式辩论这一问题。我自己则觉得不知怎么办才能把德国问题提到火候上来。我们感到有点左右为难，是按规定在五天内提请外长们批准好呢，还是把它放在政治委员会里去讨论。

皮杜尔作为当时法国最大政党的领袖是颇能举足轻重的。他同情我们，但也有他的顾虑和保留。意大利人也担心触怒他们国内的舆论。说来说去还是这个问题：用什么方法能把大会的意见通到外长们那里去。除了手续上难办之外，人们还容易有这样一种想法：这些国家最近刚被纳粹暴徒占领蹂躏（距战争结束才四年），很难让他们的代表能立即热情支持邀请十八名德国代表来共处一堂。我们这里刚开始融洽相聚，他们来了会不会引起齟齬。另外还牵涉一个问题，法国人竭力想避免采取任何有关行动，以免

影响对萨尔地区前途的决定。加之我们从可靠方面获悉，外长委员会在休会前已决定反对把德国问题列入我们的议程。据说贝文和他的顾问深信他们能得到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数，来否决任何这类提案。

可能采取的办法有好几种。我们可以说服大会同僚按规定在五天前发出通知，在取得外长们同意后讨论这整个问题，然后可以提出一个正式决议，让大会写入最后决议中作为会议结果报送外长会议。不然的话(法国人似乎觉得这样做好)，可以不专门提邀请德国，而扩大范围提“邀请新参加国”。我把这事汇报丘吉尔，并附上我的意见说：“多数法国人的意见仍有分歧，并由于尚不知新的德国政府持什么态度，公众舆论深为不安”。我还说，我觉得法国人一定要保留萨尔的未来归属，作为他们同意讨论德国问题(不管外长们是否许可)的代价。

最后我们同法、意的同僚商定了一个可以应付这局势的方案。
179 我们将申请在本届会上或按相应规定召开的特别会上，准许辩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萨尔地区同欧洲委员会的关系”问题。8月22日，我接到丘吉尔复示，同意我的建议。同时他告诉我他打算在8月24日星期三晚返回斯特拉斯堡，并邀请我们大家同他一起进餐讨论局势。这时候莫里森和他的支持者正在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打算推迟或挫败我们的计划。但我相信丘吉尔回来后凭他的威望可以战胜他们。

于是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会议最后阶段，并通过实质性的决议，不料8月25日我们接到丘吉尔患病的不幸消息：

我们接获许多过甚其辞的传说——他患了肺炎，中了风，病得很厉害。但邓肯·桑兹一早跑来告诉我说，他同丘吉尔通过电话，觉得他似乎身体还不错。看来他肯定是着了凉。由于莫兰大夫同他在一起，可能不让他回来——至少在这几天里。谣言自然当天就传开了，虽然发了安

定人心的公报,还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我以后获悉,丘吉尔当时患了一次轻度中风,这是此后一生中不断危及他的老毛病。但万幸这次很轻,由于新闻控制得好,居然瞒过了公众。这位不屈不挠的老头子命中注定还要参加两次大选竞争,并再组织一次历时将近四年的政府。

当他开始恢复健康,传来的电话铃声也开始越来越急了。我清楚记得在他上次病后在阿尔及尔与马拉喀什两地间的电话长谈^①。这次我又深感难以从远处把当地变化多端的复杂情况对他说清楚。但我可以向他担保说,我们能以各种方式办成他所希望办的事。

同时,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在其从委员会递交全体大会批准 180 (相当于一种三读)的最后阶段,我们取得了可观的成功。埃克尔斯被选为报告人,他

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提出的修正案确有八十或九十条之多,有些修正案要把原决议弄得面目全非。英国社会党人苦于没有通常的议会多数,不能通过他们的主要论点(虽则他们想迫使委员会这样做),于是他就尽一切办法破坏这个决议报告。

在第一天完了时,多尔顿想提出“把报告退回去的动议”,这种做法惹怒了大陆社会党人。做不到这一点,他和他的朋友就想阻挠。有五、六十处修正要待大会表决,而没有能让主席挑选或使用“砍杀”的制度。这种议会制度在英国国内是习以为常的,但在斯特拉斯堡大家不能接受:

他们做得太过分了,使大会都反对他们。到末了,他们只有自己这一帮人投票,被大陆社会党人蔑弃了。在有些问题上,甚至怀特利老先生也投票反对多尔顿!

如果你想知道,在政党组织严密化和督导员权势甚盛以前,英国议

^① 《战争风暴》,原书 439 页。

会可能是怎么搞的，那末这次大会就是个最有趣的榜样。

还有一个重要之点，即大会将要进行表决不打铃通知。只有当场参加辩论的人才得参加投票！因此在整个一次会议期间几乎没人离开他的座位。

我看了这场面很感遗憾。它将削弱英国社会党人在下次辩论中的地位。

我们就这样一直搞到9月3日星期六。为取得丘吉尔所希望的结果，一切要看下星期一提出的政治委员会报告。因为我们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觉得德国问题以不单独提出为妙，而是可以放在政治委员会提请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中，这一点我们是办成了。但当决议文字公布了，却感到难以使报界体会它的含义：

181

虽然我觉得在委员会里不能直接通过提请德国参加的动议，但我的下列建议却获得一致通过：(1)在1950年初开一次紧急会议；(2)在该会上讨论接纳新会员国参加欧洲委员会的问题。

这一点我得在下星期一明白指出，以免记者报道说大会决议是对丘吉尔建议的漠视。同时我又得委婉措辞，别讲得让法国人听了吃惊，因为他们只同意照这个公式讲。

由于不能亲自参加最末一次会议，丘吉尔想寄一份发言稿来让别人替他宣读。这种办法可能引起许多困难，包括英国工党人士的反对。这一做法肯定会使斯派克为难，他很不愿开创一个将会使今后工作带来许多麻烦的先例。我和邓肯·桑兹、大卫·法伊夫讨论之后，电复丘吉尔不鼓励他这样做。我同他商定，在最末一次辩论会上，应由我作一次简短发言，表明丘吉尔对不能出席的歉意。为加强发言的效果，我建议在会上宣读一段他在1942年10月间写给艾登的备忘录^①。我在星期天(9月4日)晚上与丘吉尔(当时他已返回恰特韦尔)电话商谈后，他立即同意了。

^① 参看本书152—153页及附录一。

9月5日星期一那次辩论是第一届斯特拉斯堡大会的最高潮。由于我们已办成了头一步(即在政治委员会里获得一致通过,将丘吉尔主要关心并为之全力以赴的那个问题作为政治委员会的建议提交全体大会),我深信能取得成功。但我深感自己身上担负着重大的责任。我一早就把自己发言的抄件送交报界。抄件中附有丘吉尔的备忘录。由于那份备忘录从未发表过,它自然具有相当的新闻价值。

我在下午四点开始发言。我把身上的旧法兰绒服换成硬白领和黑色礼服(我觉得发言时应该穿得象样些——特别是在作一次耸人听闻的重要发言时)。发言时热得我每个毛孔都在淌汗——但幸而发言时间不长。 182

我提请大会代表注意所用的措辞(“欧洲委员会的新成员国和新协作国”)是包括了整个德国问题的。这段话以前在委员会上是经过多次辩论后才一致通过的;如今我相信也会使大会同样接受。我接着说:

大家会记得,在我们对欧洲政治结构作一般性辩论时,丘吉尔先生在一次简短然而深刻的发言中提出了德国问题。

遗憾的是他今天不能同我们一起开会,所以他把这件事交给我办。我必须请求各位代表允许我就这件事讲几句话,但是我将说得简短。

我回顾说,在8月14日丘吉尔当初那番讲话之后,皮杜尔以非凡大方与具有政治家风度的发言响应了他。皮杜尔(当然他有这种权利和义务)提出了其他地区——特别是萨尔地区的地位问题。他还指出,在适当时候,奥地利应成为一个候补成员。因此,委员会一致建议用这个措辞,使它含义足够广泛,不仅能包括迫切的德国问题,而且能包括所有其他的要求和情况。这建议同提出1950年初召开特别会议处理新会员国问题的建议合在一起,就确实同三星期前丘吉尔在本会议厅里呼吁的要求非常接近。我接

着说：

没有那个人的意见能象丘吉尔的那样值得受人重视了。因他的意见不是新近的决定或投机性的，而是长期研究和深思熟虑的结果。

近几天他寄给我有关这重大问题的一些记录，其中有一篇备忘录，他已允诺我在这里宣读其中的一小段在我想来是最为有关的话。这是他在七年前——1942年10月当英国首相时写下的。我请大会同仁记住这个日子：1942年10月。

183

然后我宣读那段话。我附带声明说，这些话以前从未发表过，现在能在首届大会上公之于世那是最合适不过了。

这一文件的宣读引起很大轰动，特别是当我提到撰写的日期时——那时战争胜负谁属尚在未定之天，“在(敌人锐气)终结以前，离敌人崩溃则更远”。

两位法国人士接着发言，都表同情。耶西尼也发言，对我大有帮助。必需的决议都获得一致通过，于下午六点半钟会议结束。英国社会党人在发言或投票时都未表示反对。天气一天比一天热起来，最后欧洲运动设盛宴招待，斯派克是主客。当天夜里丘吉尔来电话，他对会议结果似深感满意。

现在除了把各个委员会里拟定的决议交付大会通过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工作可做了。这些决议中有一项关于人权和政治权利的规约草案(所谓“人权”宣言)，以及成立一个委员会和法庭这样的机构，还有关于在经济方面、社会治安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合作建议。当然，在关于欧洲的政治结构以及加强统一的方法问题上，意见颇有参差。丘吉尔和莫里森都不希望有欧洲合众国之类的联邦性组织。但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大家都希望加强大会的权限和实力，并希望它同各国外交部长和政府有更密切的联系和合作。

在我们最后首途返国以前，我同多尔顿交谈了一次，他早就是我的一位好友。这时莫里森已回国，托他领导他们那帮人。这样

气氛就更加随和。多尔顿为人友善。他提议英国人应该慷慨招待一下所有与会人士——大会代表、官员和其他知名人士、报界、斯特拉斯堡社会贤达。这个我听了很高兴。由于费用很容易向政府报销，我马上赞同，于是在最后一天他和我担任了一次大欢宴的主人。花了纳税人的钱，能够这样愉快地消弭我们之间的分歧，何乐而不为！

其后的情况是，无需召开特别的全体大会，终于解决了德国问题。在我们离开以前，成立了大会的“常务委员会”，授权代表全体大会与外长委员会打交道。11月17日，贝文在下院一次辩论中表示愿意尽快就此事取得协议。因德国在名义上尚在占领国管制之下，出于立法技术上的理由，它将作为“协作”国选入。于是在1950年3月30日外长委员会的一次短期会议后，正式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发出邀请。这邀请被接受了，并于5月开始生效。当我们第二次会集斯特拉斯堡时，我们就能欢迎德国代表共处一堂了。不管欧洲委员会今后可能起什么作用，它已朝向和解与团结迈开了决定性的一步。

第八章 欧洲：联邦还是邦联

让联邦共和国参加欧洲委员会，这表明盟方决心要把德国人民重新纳入西欧，并以一种令人瞩目的姿态决心结束他们在被占领年代所处的孤立地位。德国政府和人民不再受到猜忌或当作不可接触的贱民看待；我们欢迎他们加入欧洲集体。然而要恢复和保持信任，仍有许多迫切问题亟待解决。盟国政府对德国的种种限制，当时是必需而且理所当然的，如今则必然要加以解除。但对法国和其他民族来说，他们三代人饱受德国军国主义之苦，这样一来不仅不会消除，反而会加深他们的恐惧。因此人们开始在想，用什么方法能使德国与其西方诸邻国的经济生活一体化，并分担他们的共同防御任务。这些问题此后以“舒曼计划”和“欧洲军”那些闻名的建议体现出来了。

早在1949年3月23日，我在下院的辩论中至少已笼统谈及上述第一个问题。当时有许多人在谈论盟国占领军及早撤出的好处。这样做有许多优点，但也冒一些危险。许多事要取决于鲁尔的前途，因为那里是个巨大的武器库。我提醒下院说，虽然根据托管法将来鲁尔地区的工业属于谁，要由一个德国政府来决定，但这并非问题所在。不管工业属于私人还是归于国有，只要掌权的仍是那种不好的德国政府，都是一样危险的，“对法国人而且对我们也一样，都必须有保证”。但一旦结束占领状态，什么样的保证是可靠的呢？书面保证是没有价值的：

唯一的保证是德国人心是否归向西方。如果德国作为自由与平等的成员加入了西方体系，那才能真正控制德国重工业；这不能是只针对德国

的一种不公平的控制,而是要在数量、规划、发展等方面,对诸如比、荷、卢、法、意、英国的煤、铁、钢工业,完全置于同样规定的控制之下。^①

对这些工业进行一种国际控制,从经济上讲无疑是合理的;从安全上讲则是必不可少的。

欧洲经济合作联盟旋即按这些思想组织一次会议。他们研究了一份关于欧洲煤、钢工业的报告,其中强调指出这些工业有在超国家一级上进行协调的必要。当时的法国外长罗贝特·舒曼欢迎这些建议,并希望欧洲委员会的全会上将在适当时候考虑这些问题。于是全会的经济委员会在1949年的一次会上提出一个方案,拟在欧洲内部成立煤、铁、钢联营组织,并在适当时机成立电力和运输组织。在1950年头几个月间,在关心这些事的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中间不断进行着非正式的讨论。但当舒曼在5月9日突然宣布他这个名噪一时的计划时,举世都感到惊奇。

罗贝特·舒曼在品德和才智上都是非凡的人物。他是法国式的基督教民主党的杰出成员,他与德意两国从事这类运动的领袖(阿登纳博士和阿尔基德·德·加斯佩里)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三个人,一个是莱因兰人,一个是蒂罗耳人,一个是阿尔萨斯人,他们的家乡都是历史上各国纷争的地区,因而他们都确实浸透着欧洲精神。由于一种奇特的机缘,德·加斯佩里曾在奥地利议会当过议员,而舒曼年青时当阿尔萨斯还是德国一个省的时候,参加过德国军队。谁也不能像舒曼那样以更大的热情说出他的信念,以更大的才智捍卫他的主张。舒曼这时一跃而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政治家。人们马上看出,他的建议主要不是出于经济上的动机(尽管这些问题很重要),而是出于政治目的,把法德两国结成不可分割的集体,把旧日的宿仇化为新的伙伴关系。

盟国对鲁尔地区的控制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德国早晚要在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9年3月23日。

那里重获主权。但若由它单方面重获此项主权，那么昔日的所有恐惧又会在法国复活。在英国也会这样，因为英国受德国侵略之苦并不亚于法国。由于钢产量是军事力量的主要基础；由于德国看来决心要控制自己的钢铁工业，并且不愿限制它的生产能力；由于好几代以来德国问题总是欧洲的主要危险，舒曼计划真是个敢想、敢说而且切实可行的计划。德国可由此重获平等地位，欧洲将由此获得安全。

舒曼计划虽然主要是为了将德法两国的煤钢资源置于联合高级管理机构之下合营而提出的，但它设想成立一个组织，使其他欧洲国家都能参加。诚然有人可以责难，说舒曼未经充分的外交准备就放出这一炮，未免做得不对。但他无疑是担心这样一个新颖的计划会被人修改得面目全非，或陷入漫长的讨论而一无结果。不管怎么说，英、美、法三国外长是预定要在两天后(5月11日)开会讨论一些问题的，主要是关于由俄国人施加压力而引起的紧张局势。他们会谈的结果发表了一项公报，声明西方各国决心维护他们在柏林的权利，并抗议苏联政府对遣返德国战俘问题的态度。¹⁸⁸但公报中也指出舒曼对于法德煤钢工业所提建议作了解释。当时对此虽未作认真讨论，但以后获悉贝文在会上曾尖锐批评舒曼的计划，其措辞之激烈使他的法国同僚感到惊讶，甚至震怒。不过艾德礼于5月11日在下院的声明里对法国人的建议正式表示欢迎，并同时强调指出所提议的“未来经济结构具有深远意义”。几天之后，曾任舒曼主要顾问并任当时法国计划委员会主任的让·莫内，私下到伦敦来说明详情。

对于担负这项使命，谁也不能比他更合适了。以前当我在阿尔及尔的时候，曾和莫内一连好几个小时讨论过法国相继而来的历次危机，颇知他对一些战后出现的问题具有建设性的远见。当我早在1944年7月与他见面时，他刚从华盛顿回来，满口谈的都

是关于处理德国问题的重要性：

他认为欧洲的未来取决于德国问题的解决，以及有效地削弱德国的作战潜力，不仅在和平实现后的头几年，而且要在长期内都保证如此。

他认为真正的欧洲合众国还不能实现；但他觉得在西欧各国之间可以成立有效的坚强联盟；也可能有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和金融安排同时配合。

在这方面，英国应该带头，而法国应支持英国。较小的国家如比、荷、丹麦，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及西班牙、意大利，则必须是这西方体制的支持者和受惠者。^①

那末，能不能使那个被剥夺了作战能力的德国，真心诚意地接受这种想法，共同享受更和平、更文明的生活呢？

虽然大家都知道商谈在秘密进行，但英国政府迟迟不作正式答复。这当然使我的朋友和我很耽心，因我们觉得英国政府并无充分理由迟疑不决。固然贝文是病了，但别的大臣完全可以应付和处理这件事。因此，我在5月17日在伦敦的一次演说里，就英国官方迄今对舒曼建议的颇为冷淡的态度表示吃惊：¹⁸⁹

我相信英国政府不致于把自己置身于这项计划之外，更不致于在会谈阶段扼杀这一计划。

我认为舒曼先生的建议是一项具有高度勇气的行动，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政治家才能够提出来的建议。这可能表明是长期以来法、德之间可悲关系的真正转折点。每个法国人足以为此自豪，因这一主动建议出之于一个法国政治家之手。

我希望英国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至少会不辜负这一新的责任和新的时机。因为欧洲不能再退回到法国人提出这一建议以前的状况了。

如果大家来推动和执行这一计划，那将是很了不起的前进了一步。如果计划失败了，那将意味着严重的挫折。那将比失败还要惨，那将是一场灾难。

^① 1944年7月7日谈话记录。

我同欧洲经济合作联盟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起，在1950年5月22日致《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再一次申明这个观点。这至少引起了公众的足够注意，当时《每日快报》认为有必要在翌日发表一篇社论猛烈抨击我们的观点。我对比弗布鲁克勋爵对欧洲问题的矛盾态度总感到可笑。任何关于同欧洲国家合作的话，就会激动他的整个心神，认为是对他那毕生信奉的伟大帝国思想的出卖。但同时，他又如此深深而诚心地爱戴丘吉尔，他在猛烈抨击那些拥护丘吉尔的欧洲运动的人时，从来不点名指责他那伟大的朋友。

英国政府一直拖到5月25日才第一次正式答复法国人。复文中表明愿意立即同法、德两国进行“试探性”商谈。又表明希望说如果能明确看出以后计划进行的情况，我国“也可能”参与其事。此后就出现一种几乎是滑稽可笑的扯皮局面，主要是由于英国坚持要通过书面交换备忘录来进行商谈。法国来照又同英国照会扯皮，要求英国公开声明同意舒曼5月9日文件中的建议。于是英国政府又发出照会，重申他们的观点，说一定要在不承担任何明确责任的情况下，才能参加商谈。但这时西德和意大利政府已接受了法国的要求。到6月4日，当大家都获悉英国政府拒绝参加商谈时，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政府表明他们全部同意。但几天后荷兰政府进一步提出一项保留条件，这在英国议会里以后还引起许多讨论。荷兰政府希望

保留在协商期间重新考虑这些总原则的自由，如果出现同它希望相反的情况，就可能在未来实际运用这些原则时遭到严重的反对。

但英国政府决心坚持他们的立场，6月13日首相发表正式声明，表示他们不愿参加预定在6月20日开始的商谈。他们不能事先决定拒绝或接受法国建议中的原则。他又说“此刻还谈不上由英国政府提出任何另一种建议的问题”。首相的声明自然引起了下院各方的许多关切。但由于当天下午就要发表白皮书，而且有

希望可以早日进行辩论，所以事情就此告一段落。当英国对整个问题的白皮书发表时，其中引述了大量文件和来往函电，^①这就引起了一些尖刻的批评。在这白皮书中，虽然似又肯定首相声明的原文，但在所引一项文件的第二段话里出了矛盾，这段引文立即就传了出去，其中有如下的话：

在法国主动精神的鼓舞下，他们〔英国政府〕本身也在积极准备提出建议，以便随时作出这方面的贡献。

在其后的讨论中，大家对于究竟为了哪一点才终于决裂的问题，意见分歧。有人认为这是根本问题，另一些人则认为几乎毫无意义。法国原建议是应征求政府接受这样一项计划，即煤钢生产要联营，并组成一个高级管理机构，使它所决定的措施“在原则上”具有约束力。但英国政府仍不愿在未获悉整个计划之前，就这样贸然交出主权。他们说整个计划还没有定出来。但如果不事先接受这计划的一些原则，我们又怎么能参与讨论这一计划呢？法国决心要保证他国以积极的而不是以消极的态度来参与协商。特别是他们要钉住德国，必定要它完全遵守那些法国人认为在经济和军事安全问题上至关重要的一些原则。

英国的态度引起多数人失望。但许多人觉得我国政府的立场有理，至少在这一点上是如此，即在“原则上”同意煤钢资源联营时，不公开认可这一计划的主要基础。但除非对字面作非常狭隘的解释，并对英国和大陆的政治家对这些问题不同的态度有所了解，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法国、西德、意大利以及比、荷、卢三国终于能参加，而我们却不能同他们一道商谈。事实上，在公开发表的表面理由后面，还有深刻得多的思想感情因素甚至分歧。在大陆人士的心目中，在“原则上”接受计划这句话肯定不排除这样

^① 英法双方对法国有关西欧煤钢工业所提建议的讨论。1950年6月13日发表。（皇家文书局，伦敦）

一种情况，即参与任何会谈的任何人，如果觉得计划执行起来不现实或者不策略，他就可以光明正大地退出会谈。

我必须把此事告诉我的选民，并坦率地摆出我的观点：

这一星期对英国、对整个帝国、对欧洲乃至对世界和平是个黯淡的日子。

192 舒曼计划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它在经济上和工业上的意义。它的目的是谋求法、德联合。若有英国参加，那就能保证和平；因那样俄国就不能对这些国家各个击破或勾引。若无英国参加，法、德联合可能不是安全的，是潜伏危险的。

对英国社会主义者奉行已久并于现时敢于公开宣扬的那种孤立主义政策，我们不久可能就要付出可怕的代价……

如果说政府面临一个难题，必须对是否按人家提出的方式参与会谈一事，迅即作出有效决定的话，那么反对党也多少陷入同一种处境。当时，我们的地位已不像战后头几年那样不敢承担责任。在大臣级议席方面我们并不再象以前那样，面临对方压倒多数的没有力量的残兵败将了。大选还仅仅是几个月以前的事，我们现在已经几乎有三百名保守党议员。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在下院保守党的领导集团里，而且在一般议员中，大家都有更大的责任感。在作为丘吉尔亲密顾问的我们这个小圈子里，大家对于眼前的问题和重大决策所持的总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丘吉尔对于他所倡导的统一欧洲运动的原则当然是深信不疑的。艾登虽未积极参与这一组织，但他一如往常地持随和认可的态度。这事对恢复欧洲实力和保持世界和平的成败关系之大，谁也不能比他知道得更清楚。我们有些同事对“交出主权”是一反到底的，或者他们会喋喋不休地谈论对英国经济的实际困难和不利之处。我们英国钢铁工业毕竟是欧洲效率最高的；如今我们能比他人生产出更好更便宜的钢铁。我们的煤，只要能挖出来，就可以立即远销海外。那末

放弃我们目前的地位之后还能获得什么好处呢？但另外一些同事 193
则和我一样，痛感不管有什么困难和危险，如果英国甚至连商谈也不参加而让欧洲工业重新改组的话，那么损失就会比这大得更多。

一本题为《欧洲统一》小册子的出版，对大家讨论这问题很起作用。这是英国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声明书，据说是由多尔顿授意（即使并未由他执笔）撰写的。几乎可以肯定看出，这小册子是未经首相过目或赞同的，它所采取的那种反动、守旧甚至是失败主义的态度，使许多工党议员感到震惊，并使工党政府十分尴尬。作为一个能对公众负责的工党，它竟然直言不讳地说，除非按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原则办事，否则它就反对欧洲国家间任何形式的合作。这当然使人失望。但当我要在6月20日去斯特拉斯堡以一个成员的身份参加一个委员会会议时，我更为关心的是保守党对此该采取什么路线仍未决定。我深恐同僚不肯作出有效的决定，甚至支持政府固执的狭隘立场，于是给丘吉尔送去一份紧急备忘录，其内容如下：

1. 舒曼先生所引起的局势很可能是欧洲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对托利党的命运则肯定是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如要重新获得主动权，这问题就提供我们最后的也许是唯一的机会。

2. 尽管有人对法国那种颇为粗暴而迂腐的态度，抱有一种自然而谅解的感情，但必须记取：

(a) 他们很迫切需要在某些问题上同德国人毫不含糊地敲定下来。

(b) 拉丁民族总是先验地按演绎方式思考问题的。这是亚里斯多德和圣·托马斯·阿奎那的传统思考方式；而自宗教改革以来，盎格鲁-撒克逊人则后验地按归纳方式思考问题。

(c) 基于近年来的经验，法国人对贝文、莫里森、多尔顿之流抱有一种很自然的不信任感。

(d) 他们对你不会这样。因他们信任你。

3. 当然现在还不存在舒曼计划……现在正谋求产生一个计划。 194

4. 而这正是英国在一开始就该参与的理由所在。那样就可以按照我们的格局塑造这一计划。

5. 如果我们不参与:

那么,或者(i)整个计划就要垮,从而使欧洲合作的一切真实希望落空,

或者(ii)德国人将在适当时期取得全部控制权……

6. 现正盛传英国政府将进行巨大(并可能是成功的)努力重开谈判……要出现那种情况,托利党特别是你施的压力以促其实现,这是万分必要的。

7. 因此,你必须出来带头,这是英国、整个帝国、欧洲和世界都在期待的。每个人都指望着你。他们觉得应该指望你。但迄今为止他们对你的无所作为感到失望,而且颇不耐烦。他们很快就会起疑心。

8. 据说有人指示驻巴黎英国大使馆(无疑还有别地的其他使馆)散布一种说法,说你在某些顾问的影响下,并为了怕丢失选票,在这正该采取切实的决定步骤之际,准备放弃关于欧洲统一运动的整个想法。“丘吉尔正在出卖欧洲”的说法正在到处流传。这一宣传引起许多忧虑,并使人不敢向你启口。

9. 你发起了欧洲统一运动,没有你就没有欧洲大会,没有部长委员会,没有咨询大会,没有斯特拉斯堡盛会。现今是第一次而且是最大的考验。你不能让整个欧洲失望。

10. ……我恳请你尽快提出一项动议——能行的话今天就提出……这一动议现在正是时候,以便能对政府的新行动先发制人。

11. 但不管政府可能或不可能怎么做,我们早晚该定出我们的政策。今日的这个保守党是坚强而有想象力的。但它期待并且尊重坚决的领导,而不要调和折中。选民们不喜欢看到保守党领袖们提出一种“贝尔福式”^①的搞平衡的走钢丝绳式的政纲。

195

12. 社会主义者在全民就业和优厚工资这两方面,享有并且似将继续保持很大的威信。迄今我们只能在学习费用和住房情况糟糕这两个

^① 贝尔福(1848—1930年),曾任英国首相。——译者

问题上来指责他们。

13. 我们必须把整个问题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来考虑；我们必须支持舒曼计划的原则，其理由有两方面：

(a) 应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但要逐步实现，且要保证产业工人全部就业，从而就得维持目前的工资水平。

(b) 但重要得多的是为保障欧洲和平。

这是个重大的战略思想，应能受到大家拥护。无论如何，若有英国参加，那就是向和平迈进了一大步；否则我们就面临重大危险。在这方面，谁的话都不能像你那样有威信。

14. 当然舒曼计划并不是个新思想。战前有人议论过，战后又广泛议论；这是去夏在斯特拉斯堡聚讼纷纭的一个问题，并包括在一个几乎受到一致拥护的决议中。

15. 在社会主义者的宣言书“欧洲统一”中，你无疑已注意到他们立场的后退几乎同其中的邪说一样突出。“第三种”力量的想法已经过时云云……

16. 这是对欧洲的关键时刻，也是对你和对党的关键时刻。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个新的托利党，他们讨厌政治权术和声东击西，而绝对愿意跟随他们的领袖投身进行伟大的事业。

我接着告诉他保守党议员有关委员会在前一夜开会的情况。出席会议的八十余人。发言的人有二十三人赞成计划，只有二、三人反对。绝大多数人认为(保守)党应起来带头并提出动议。有些在辩论后段发言而且被认为对有关工业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也支持这样做。青年议员迫切要求采取明确而积极的态度。我又寄给丘吉尔一份决议草案，其中要求政府和法国政府重开谈判，以便按照已被采纳的荷兰政府的那种条件参与商谈，从而以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制定各项建议，以谋推进充分就业，保证英国工人的工资水平，196同时对维护欧洲和平与保卫自由民主制作出贡献。

当我从斯特拉斯堡开会后回国时，得悉丘吉尔已下了决心，并

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所有同僚乃至全党的赞同。于是就大体上按我所建议的各条提出了一项修正案。

在1950年6月26与27日举行的辩论会上,辩论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的。首先辩论那个范围较窄的问题,即英国政府该不该在大体接受原则的基础上,发表类似于荷兰政府的那种声明以维护自己的立场,去参加商谈。反对这种做法的,论点简单明确:事先接受一种可能在实践上会感到无法接受的公式,这种做法违反我们的整个传统。而且,如果我们采取任何减少而不是增进欧洲各国按舒曼原则取得协议的步骤,那就错了。这一点当时的财政大臣克利浦斯在一篇很有力的演说中进行了辩论,但许多人觉得他的措辞可以用在法庭上而不宜用在议会里。如果英国政府不能说服人民去交出这类计划中所牵涉到的一星半点主权,那就无疑可以说明我们这种冷淡态度是有理的。但艾登清楚地指出,关于主权问题的这种论点究竟有多少价值是很值得怀疑的。苏联政府肯定是经常利用这种论点的。他们据此来反对建立国际原子能管理机构的计划;他们以此来劝说许多国家拒绝接受马歇尔计划。但事实清楚表明,主权这个狭窄的概念近年来大家已同意必须大加修改。我们参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那个组织里就有“和平时期交流军事情报和资源的规定,而这仅仅在几年以前肯定被认为是一种交出主权的行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现在已经成立了。许多新的组织随之而产生,在那些组织里,用艾登的话来说,“我们承担了直接的或间接的义务,而并不觉得它们与我们的主权不相容,或者与我们这个英帝国和英联邦的中心地位不相容”。

工党那边对问题的广义方面进行了有力的论辩。在下院和全国,有许多集团对于把英国重大利益所在的煤钢业置于任何“外国”控制之下的想法,基本上是反对的。除了社会和经济问题之外,还存在着就业问题。难道我们得听命于一个较高的管制机构,

象高踞于政府之上的教皇那样，就这样关闭英国的矿井或削减英国钢铁公司的产量吗？这种管制机构会不会变成纯粹官僚机构？哪里去找独立无偏的工作人员？这种新议会或各国议员组成的集团能干出什么卓有成效的工作来？难道这种管制机构和议会团体的扩充就算是一部分欧洲新秩序吗？此刻英国的煤和钢都有现成的市场。有人耽心执行新计划的结果会照顾大陆上生产能力较弱的单位而给予我们一些限制，而这种限制将严重影响我国的财政利益和工人权利。

可惜贝文因病缺席，使我们不能听到他那无私无畏的意见。在辩论进行过程中，保守党的不少后座议员作了有杰出价值的发言，他们之中有些人其后擢升到大臣级的高位。这些人中有大卫·艾克斯，Q. 赫格，H. 惠特根生和 J. 艾默里。有几位保守党议员发言表示怀疑，但大部分人支持丘吉尔和艾登带头提出的立场。有一位新当选的议员发表他的处女演说，强烈要求同欧洲合作，给下院以深刻印象。这人是爱德华·希思。

在政府那边，克罗斯曼的发言特别流利多采，他能言善辩，其 198
博学多闻令人倾倒，但他几乎像格拉德斯通那样说话绕弯子和带不必要的保留，是其不足之处。

因此，除了关于政府根据形式上的理由所作决定是否明智，以及会谈处理得是否合适这问题之外，在辩论过程中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潜在的问题是什么。艾登只限于发出呼吁；丘吉尔则马上转到直言抨击。他特别藐视那种依据法律条文的论点。“英国政府在法国人的迂腐之上又堆砌层层偏见，那是无可原谅的”。在朋友之间，所有这些分歧本来都是可以消解的。他对法国人的态度坦率地表示遗憾，认为不该这样突然地向我们抛出这重大深远的建议，不该在未向他们的战时盟友咨询以前就作出明文规定。这也许可以看作是一种报复，因为我们曾经不作任何警告就将英镑

贬值,打乱过他们的整个经济和财政结构。总之他深惜英、法之间缺乏密切友谊,这一点从所有这些纠纷中都表露出来。他发言中有一段典型丘吉尔式的话,非难那种只能使意见暧昧的生造词句——“令人费解的近似超国家的机构”。这些东西肯定是那批贵族才子搬到我们日常政治中来的口头禅,他们自然很想在英国工人面前卖弄才华,表明他们是在温切斯特学过拉丁文的。(丘吉尔听了克罗斯曼的讲话颇为恼火,这段话就是典型的回敬。)然后他对工党的那本(招惹这许多是非的)小册子大作其文章。多尔顿的教条是:如果要搞成一个联合的欧洲,只有所有各国首先接受社会主义才有可能。他对这种“孤家寡人”的社会主义大加嘲讽,指出他们所贬斥的资本主义自然有一处是例外:

199 ……那个突出的、强大的、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的美国,是个例外。不过,那当然是因为他们付给我们很多津贴,使社会主义者可以仰仗那些,吹嘘他们能够维持充分就业。但除开这一重要的例外,他们引导我们跋涉的天路历程,尽是满目凄凉。^①

他并不低估关于事先认可原则或目标这一法律论点的份量,但把这个问题提得使大家都可以凭简单的语言来进行表决:

每位议员应该向他自己提出两个简单的实际问题:“我想不想看到西欧联合取得进展?”而且除此之外至少要问“我们是不是像在荷兰人那样的保留条件下去参加会谈较为妥当?”这是我们今夜面临的两个问题。

关于主权问题他重复申述了艾登的话。关于所涉及的国家主权,只要有满意的条件和保证,他准备毫不犹豫地考虑(并在理由充足时许可)加以放弃。他最末一段话对下院产生巨大冲击。他有非凡的才能,能在单独一篇演说里弹出各式各样的调子——雄辩、幽默、批评和呼吁。他最末那番话应该从卷帙浩繁而往往令人生厌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0年7月27日。

的《英国议会议事录》中提出来留传后代：

而且我还要进一步说，为了这一世界组织我们愿冒危险并作出牺牲。我们为反抗暴政单独战斗了整整一年，并不单纯为了自己本国。诚然我们只有这样战斗才能生存，但由于我们深信为保持英国国旗在1940年和1941年继续飘扬，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全世界，我们这才能战斗得更好。那牺牲个人生命的战士，那为儿子悲泣的慈母，那失去丈夫的妻子，由于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不仅为我们而且是为全人类所珍视的一切而战斗，他们就会获得鼓舞与安慰，并感到他们同全世界永恒结合起来了。保守党和自由党声明，国家主权并非神圣不可侵犯，而为了全世界共同追求幸福的男女老少，国家主权完全可以让出一些的。^①

辩论后期有一个有趣难忘的插曲。当首相站起来答复丘吉尔 201 发言时，他请求先发表关于朝鲜的声明。关于北方部队侵入南朝鲜以及安理会决定建议各会员国对高丽共和国(指南朝鲜)提供为击退武装入侵所必需的援助，这是第一次公开的声明。这一事件除了其深远的后果外，也将使经济局势完全改观。大家耽心的基本工业方面的生产过剩将迅即变成生产不足。

艾德礼在作了关于朝鲜问题的戏剧性声明后，只作了一个简短的答辩。关于那本出名的小册子《欧洲统一》，他处于相当的困境，特别是因为(正如他所坦率承认的)它得到比弗布鲁克勋爵的热烈支持。但他主要是重复申述不能先受一种原则的约束去进入谈判，而这原则他未经全盘审核，并且他和他的同僚在现阶段还不准备接受。他在压低辩论热度和把论题缩到最窄点这方面，表现了他惯有的议会才能。最后表决的结果政府的修正案以三百另九票对二百九十八票通过。如果拿这个来作为英国对战后这最重大事件的最终态度，那是可悲的。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0年6月27日。

曾一起为欧洲统一运动在斯特拉斯堡工作过的一些朋友和我，都感到难过和不满。我们不能把这修正案作为最终的判决来接受。但对目前这个计划所提出的反对意见我们也不能不予以正视。六国会议已在巴黎开幕，今后几个月内无疑会作出重大决定。我们能不能利用8月召开的下届咨询大会提出一些折衷方案呢？经过不少艰苦的工作和多方面特别是像欧洲经济合作联盟这种组织的协助，我们终于能在8月15日召开的大会上提出了英国选定的方案，这方案以后被称之为“麦克米伦—埃克尔斯计划”。计划
202 绝大部分的工作是大卫·埃克尔斯完成的，但许多方面也要归功于一批精明的专家。其中最热情的一位是里斯·威廉斯女士。只有她的那些最亲近的朋友，才能体会到在她的工作活动期间，她对欧洲经济合作联盟的工作以及对其他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讨论，作出了多么大的贡献。她质朴而巧妙地把她精明的智慧和渊博的学识结合了起来。当我们在7月间草拟计划时，她寄给我一些有价值的建议。我在向她致谢时说：

对“舒曼计划”真是越下功夫研究越感到它复杂和含糊。“这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但我相信我们有责任从中提出一些大家都能一目了然的东西来，如果办得到的话。我正希望有你这样杰出的工作和大卫·埃克尔斯这样同僚的协助，我们将能够在斯特拉斯堡提出一些建议来。如果办到了，那就是下了一步好棋。

我们的建议是以正式决议的形式提出的，其主要目的是为消除英国人的顾虑而不损及计划的主旨。我国人民深恐把“关键工业放到外国人手里”，特别是放到外国官僚主义者的手里。我们的计划同舒曼计划有三方面不同：

1. 协调煤钢业的专家要对部长委员会负责，这就保持了跟各国议会的联系。
2. 各国在社会、经济和战略方面的基本利益有保障，不致受专家

支配。

3. 成员国可在发出通知后十二个月正式退出；其他各国也能驱逐任一成员国。

我们在计划中加入了一些条文，以求保证工资水平不致因各国市场间的壁垒消除后有所影响；以求明确集体交易应予保持；以求尽可能分别设立煤和钢铁的机构，这是英国工业界人士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又建议，在必需削减总产量的情况下，应允许任何政府自行决定积储多余产量。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保证措施。对英国出口到英联邦各国商品的帝国优惠制不应触动，联营当局对英国国内的资本投资只有提出建议的权力；联营内部各成员国所占的票数应与其煤、钢的产量与消费量成比例。最后，在整个计划同意后，英国的参加和签字应取得议会的批准。 203

在到达斯特拉斯堡的当夜，丘吉尔邀请我们一些人到他别墅进餐。被邀的人中有大卫·马克斯韦尔·法伊夫和邓肯·桑兹以及特威兹穆尔女士。接着花了不少时间讨论我们的建议：

埃克尔斯和我已经花了一段时间搞这计划，但未能及时完工提交影子内阁。不过，由于奥利弗·利特尔顿已经点了头，而且我在离伦敦前已把抄件分送给各主要同僚，丘吉尔没有表示什么不满。唯一的问题是建议人里要不要放上他的名字。如果他不出面，那就要求他在发言时给这份建议大体上说些好话。我们在事先未与国内同僚明确商定的情况下，能够在这里独立自主地干到什么地步，这是个始终存在的并且有时是很尖锐的问题。但我深信麦克米伦——埃克尔斯计划对国内方面来说是有益无损的。因这计划可以表明我们保守党人也像任何别的人那样，是坚决保卫英国利益的，同时又愿意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同欧洲合作。^①

我又把自己同艾登商谈的结果告诉他们。艾登认为我们此举有助

^① 1950年8月6日。

于欧洲事业，也有益于党的威信。不过他认为丘吉尔最好不要出面，一则是因为来不及同影子内阁会商，二则是他觉得丘吉尔不应参加细节上的辩论。于是就决定让他在发言中表示大体上赞同我们的建议并说些好话。

我也曾把文件抄本送寄莫内，同他交换过信件。他对任何政府可以正式有权自由退出的设想自然不赞同，而这从他那方面说也是理所当然的。他在8月8日给我的一封信中，以他那惯常的明确陈词和逻辑性申述他的意见：

舒曼建议是有革命性的，否则它就毫无意义。欧洲人几世纪来试图通过外交或战争解决我们的共同问题，但在今日欧洲的情势下，通过国家间的协议来维护严格的国家利益是完全不够的。国家间的合作固然必要，但也不能单独靠它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必须谋求把欧洲各国人民的利益融合起来，而不仅仅是增设一些会谈机构来平衡这些利益。

他接着写道：

舒曼建议中设想有一个超越国家对立的共同体，给欧洲各国人民的精力和理想提供一个新的奋斗目标，以此来解决法德之间历来的纠纷。

8月10日下午，舒曼向大会

“说明”或“阐释”他的计划。这是一场奇特的演出。这人有非常吸引人之处，一半是个隐士，一半是个热心救世的布克曼式教徒！

他实际上并未说清他那个计划的细节，而只是一片“神秘”。^①

由于整个事业还处于早期阶段，我对达成妥协还抱着希望：

我不禁感到有两种情况或其中之一很可能出现。莫内的建议仍只在专家手里，但当这些建议到了各国政府（特别是比、荷二国）手里时，他们会觉得计划的某些方面难以接受。其次是，当法国议会和人民意识到这样就意味着他们参加而英国在外时，就可能不愿把他们那个颇为孱弱而大部过时的工业交给德国控制。因为过了几年之后事实就会变成那样。所以我很有把握：提出我们的建议，对国内国外都不会有什么

^① 1950年8月10日。

坏处。^①

8月15日在继续辩论舒曼计划的会议上我发了言。我发言历时约二十五分钟，听众态度友好并表示欣赏。首先我对舒曼建议的主动精神和想象力在总的方面表示欢迎：

它的主要精神并不是个工业的经济方面的设想。它是缔造一个新欧洲的宏伟蓝图；它并不是一项现成的拿来就便于使用的机器，它是个革命性的而且几乎是带有神秘色彩的设想。英国政府也许就是因为看不到这个因素，所以才引起这许多可悲的误解。

不管原因何在，我们的希望曾受到挫折：

双方无疑都有错误和误解。我必须大胆作出这个评语。当我逐页翻阅伦敦和巴黎之间的来往函电：照会，备忘录，外交文件以及其他种种外交武库里的陈旧武器时，我真感到有些吃惊和悲伤。在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联盟关系——共同经受了那么多的痛苦，又共同分享了那么大的胜利——之后，我们很应该像伙伴和兄弟那样进行交往，而不该扮演跳外交双人舞的角色。为什么不进行个人间的接触？为什么不促膝交谈？现今通过英伦海峡毕竟是无需冒险泅渡的。

我讲述了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本性上，对于看问题的思想方法从来就有所不同，而这是两种思潮和辩论方式长期相左的结果。我接着用这一观点来说明会上的形势：

在我们这方面自然会这么说——“那末，我们在一起究竟打算干什么？如果我们决定该干什么，我们就来成立一个委员会，定下规章来。”你们那方面很可能会说（或者我们认为这样）——“第一件事是要有个委员会。委员会会定出规章来。然后委员会会决定我们大家一起该干些什么。” 206

为了使听众松口气，我又插了一段前言：

每个盎格鲁-撒克逊人一听到“原则上”这个词就会感到毛骨悚然。当然，苏格兰人（他们是不列颠人中的知识分子）知道这个词没有什

① 1950年8月10日。

么可怕的。随便什么事“在原则上”都应该接受；应该到桌子对面来，应该开始会谈。

还有一点地方不同。英国舆论界几乎完全是从经济观点来看待这个计划的，把它当作是为了井井有条地管理基本工业而定出的工业措施，以免出现衰退，生产过剩，减价和减薪，对这一切我们大家都是记忆犹新的。尽管这计划有许多引人入胜之处，但我们英国人是害怕专家老爷的，特别是害怕国际专家老爷。我们摧毁了国王的神权，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此后可以拜倒在专家的神权面前。但我们并没有充分认识该计划支持者所怀的政治目的——解决那个那么经常那么近才发生过的深刻冲突，它曾经威胁和毁灭过欧洲的和平。那末怎样来撮合这两种不同观点呢？那个所谓麦克米伦-埃克尔斯建议就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认真尝试。我们宁愿有政府的权威而不愿有专家的权威，我们不愿什么小事都受控制而只要有政策上的大体指示。因此我们建议缔约各国成立部长级委员会。但这样一个委员会不应空无归属。它应隶属于欧洲大会的机构——部长委员会。它不应秘密采取行动。因此我们要求咨询大会里有定期的汇报和辩论。

舒曼自己对计划也作出了一些修改。除了高级管制机构之外，他赞成再设部长委员会和议员大会，但这些机构应同时归属各缔约国。我们希望这些机构隶属于欧洲大会。这有两方面理由。消费国和生产国都应享有发言权。欧洲大会则是达到这一目的合适讲坛。此外我们还提出这样一个要求，至少在开始阶段，一个
207 国家有权利退出，各国也相应有权把一国驱逐出去。我们也给高级管制机构定下了一些明确条文，特别是关于集体交易，生活水平应向上拉平而不应向下拉平，以及保证长期计划之外还要有短期计划。至于同英国有关的帝国优惠原则，则在前一年的大会上已经得到确认。

之后，我赞扬了莫内在战争考验年代为英法两国所做的工作；他还了解我们的特殊问题。他虽渴求把事情确定下来，但也知道我们这方面想要先试办一下再说：

他相信逐级的古典式的办事程序。他知道我们喜欢相机行事。但他也知道（至少我自己这样希望）我们是可靠的人；知道我们虽不喜欢受死硬条文的约束，但我们也会相当坚定地设法履行我们承担的诺言。法国人有句成语：“相机行事最为可靠”。（Ce n'est que le provisoire qui dure'。）

我们面临许多国内外巨大任务，我们需要采取许多临时措施——在国防，重整军备，船运，原材料，食品，人力各方面都需要这样。为应付这一危机，不管叫它是战争与否，我们英国人肯定准备在实际上（虽或不是在原则上）接受主权的合并。

目前所讨论的这些建议的背景，当然由于朝鲜战争而起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相信只要开了头，我们定能获得成功：

因为这一临时机构事实上（如果行得通）将成为永久性的。实践会形成原则。我们将不知不觉地缔造出一个统一的欧洲。我承认，我国人民特别喜欢通过那种有意无意的以及相机行事的措施来达到这目的。但若一种措施行通了，就让它这样做下去，岂不是顺理成章吗？如果能这样拯救欧洲同时又缔造欧洲，我们大家都将各自以不同方式尽到了自己的天职。 208

我的同僚在许多卓越的发言中支持了我，特别是大卫·埃克尔斯的发言。大会讨论的结果使我们感到满意，我们所采取的路线是有价值的。整个大会成员不仅对我们彬彬有礼而且表示理解。许多外围的欧洲国家，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同情我们的观点并积极予以支持。我们至少给英国同时也给自己的党树立了可靠的威信。

毛利斯·舒曼继我之后发言，虽然他不能接受我的主要论点，但表

示非常友好和赞赏的态度。他显然(并在以后真的告诉我)打算责备莫内的态度太死板。^①

8月会议的最后一场辩论在24日进行。当委员会报告送交大会时,我们不能接受法国的决议,于是决定提出修正案,措辞如下:

“有关各国政府应立即重新致力于找出达成协议的基础,以使所有欧洲主要煤钢生产国都能充分参加这计划,并强调指出使这一计划(如同其他专业计划那样)同欧洲大会机构内其他计划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舒曼(他总是很友好的)告诉我,他将设法召集经济委员会进行讨论,并且也许能取得协议。那当然很好,但也许有点过于乐观。^②

翌日进行了关于舒曼计划的辩论。我的发言反应良好,虽然雷诺争辩说:协议既然就要在几星期内签订,英国人再提修正建议已无济于事了。他吁请我收回我们的建议。我不得不作出如下的回答:

“对,我们觉得它合适。我们需要它。我想丘吉尔既然已经给你们大家尽了这么多力,我有权利要求修正”(非常生硬和刻板)。于是毛利斯·舒曼说道,“对,麦克米伦还可以凭他本人的名义要求这样做。他为法国出过的力比谁都多,包括丘吉尔”。^③

在另外几个人发言之后(英国社会党人躺下不干,除了麦凯那个以热心的联邦主义者出名的人以外,他们谁也不发言)。

雷诺起立发言。说得真是妙极了。他总的方面同意舒曼;他寸步不让;但是说——对我是最大的恭维——如果我们帮助他渡过他的一部分困难,他也会帮助我们。这项交易不仅是提出了,而且也做成了。^④

最后,表决的结果很好。我们的修正案得到六十六票赞成,十九票反对,十九票弃权。

这之后又是一阵激动和混乱。英国社会党人早已宣告(非常义正词

① 1950年8月15日。1949年毛利斯·舒曼是大众共和运动(M. R. P.)的主席,到1951年他当法国外长。

② 1950年8月24日。

③④ 1950年8月26日。

严地)他们打算投票赞同经济委员会的两项建议。现在来了第三个(麦克米伦修正案)。当这“一揽子”(即包括这三部分的整个决议案)东西提出来时看他们怎么办。通常的做法是,当他们没有督导员可依赖,而且分散坐在各处时,他们只能看多尔顿的动作办事。有人投反对票,有人弃权。整个决议案通过了,弃权的有三十二票……

这次分组表决之后,我立刻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同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进行谈话。当然,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小事,国内谁也不会注意,但这颇为有趣。^①

当晚有几位新闻界代表告我:事实上商谈进行得并不顺利;也许法国人很想收回建议,以保住他们的面子。

当大会在1950年11月重新召开时,计划仍在讨论中,于是我 210
只能泛泛谈论,对英国不能成为创建的成员国表示遗憾,并表示希望我们所提出的一些补救办法和修正案可能会有点用处。

大会由雷诺首先发言,讲得很漂亮,颇有说服力。接着是我。这次发言不大容易,但似乎获得成功,受到大家的赞许。英国社会党人确实感到我的发言打动了他们,对我表示很友好的态度——同8月间的态度截然不同。多尔顿态度很温和,甚至很高兴。^②

但也许是因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或是别的什么理由,英国政府对这件大事不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六国间的商谈在此后的冬春一直进行着,结果于1951年4月18日签署条约,成立欧洲煤钢联营。虽然新机构至少还得在一年后才能实际开始工作,但要做更多的事我们已无能为力。在1951年5月的咨询大会上,我只能向有关政府和专家们表示祝贺。我再一次赞扬莫内:

凡是知道他在战争年代工作的人,都忘不了他是英国在艰难岁月中的一位好朋友。现今他成为一位伟大的欧洲人物,垂名后世。

① 1950年8月26日。

② 1950年11月21日。

我接着对英国不参与的政策深表遗憾。但此后我们仍进行了三天热烈的讨论。第一天(5月8日)莱顿勋爵的一次发言,气魄雄伟,令人难忘:

我从来没有听他讲得这样好。他的话真像“一个权威”。^①

接着是埃德尔曼,他提出一项广为传播的动议,由大会上所有社会
211 党人签名:

[这]是打算重新建立国际社会主义阵线的尝试,因原来那个阵线已在1945年被贝文,莫里森,多尔顿诸公打散了。这是一次勇敢的尝试,但颇不得势。因为在那些共产主义占左派地位的国家里,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他们只有放弃社会主义并成为一种温和的激进派才能继续存在(如在斯堪的纳维亚等处)。也许如今英国正在出现这种情况?^②

之后特威兹穆尔女士接着发言,以她的魅力获得很大成功:

“Mais elle est épatante!”(那可真棒!)云云,云云。法国议员们是特别喜欢听这种话的。^③

这是我们讨论舒曼计划的最末阶段。委员会的汇报和相应决议由安德烈·菲力普报告,他讲得很好,是我听他讲得最出色的一次。接着该我讲,我尽力而为之,结果反应似相当不错:

我设法摆明保守党的观点,并拿社会党人开了一次小小的玩笑,指出现今在英、德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即现代社会党人竟然都成了民族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④。

威廉·布莱顿代表英国工党作了一个奇妙的发言。他在头几分钟向我进行了粗鲁而逗人发笑(按照他自己所描写的用语)的抨击之后,花了三十分钟时间宣读了

一篇[显然]由别人[给他]写的耶稣会式的说教文章……这篇写给布莱顿先生宣读的文章,语气是那么和他不相称,以致使人感到滑稽可笑。

①②③ 1951年5月8日。

④ 1951年5月10日。

布先生是大勒姆郡一位诚笃的矿工代表。那些塞到他口里去的舞文弄墨的话……不能归罪于他。^①

接着是雷诺的一次漂亮的议会风度的发言，总结了全部的讨论。
他的话

风趣多采，对英、德现代社会主义的分析也切中要害。末了他作了一篇即席发言，极有风度。邓肯·桑兹对布莱顿的发言作了简短而有力的回 212
击，他引述了社会党在 1948 年那个著名的决议，其中提出了对煤钢业成立超国家管理机构的要求。^②

当英国政府甚至不肯按荷兰政府那样的条件参加初步谈判时，这真是个可悲的决定。要是他们参加了，我相信会协议出一个能被英国舆论所接受的计划。就那六个签署国的政府来说，他们对所签的计划也不会感到完全称心乐意的，因为它没有把这样一个国家包括进去——它是欧洲最大的钢产国家，同时它的煤产量等于六个签字国的产量之和。然而我和同僚对此时议定的舒曼计划的最终形式也有满意之处。例如，如果说那个高级管理机构仍然还是超国家性质的，它却肯定不是至高无上的；它不是专制暴君制而是立宪君主制。由于必须取得全体大会的批准，现在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要从消费国和生产国双方产生并赋有实权。去年 8 月刚成立的部长级委员会如今将要起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决议须经一致同意这一项规定，尽管有种种反对意见，还是保存了下来。最后一点是，新的管理机构同欧洲大会建立了一些关系，这就是大会有权听取年度报告并对此进行辩论。英国能做些什么？有两件工作，都是切实可行而且迫切需要的。英国政府具有这样一种法律地位，即它曾是鲁尔管理机构掌权时的有关国家之一。如果现在这个新机构开始执行工作，盟方高级专员就得放弃他们的权利

①② 1951 年 5 月 10 日。

和职务。对这一点我们必须立即表示同意。再其次是，我们必须找出一些办法，使我们虽非正式成员，但可成为联营共同体的一种伙伴。在这一点上我们至少可以说到做到。因为当大会于次年11月召开时，英国已经换了政府，并授权大卫·马克斯韦尔·法伊夫通知大会，一旦高级管理机构开始工作，英国将指派常驻使团。

213 这就结束了欧洲合作史中那个漫长而使人失望的第一段插曲，它曾带来了许多令人不快的后果。

如果说1950年公众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欧洲基本工业的协调问题，那末同年主要在丘吉尔的倡导下，在咨询大会上也迫切提出了同等重大的防务问题。

英、法主要关心的事是形成一种永久性的共同防御体系，以防德国重新侵略。对德占领不能永远继续下去；贝文于1947年3月筹商订立敦刻尔克条约，目的就是为防止可能出现新的德国军国主义。但不久对俄国的恐惧迅即变得不亚于对德国的恐惧，甚或超过了对后者的恐惧，结果就产生了导致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行动。^①

但我们必须记住，当时除了占领国驻德部队外，尚未采取步骤成立正式的武装部队，直到后来才设法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武装大西洋条约，这就是将各盟国的部队组成确定的盟军，设有统一的指挥系统和一个作战司令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引起了新的震惊，突出显示了我们在军事准备上的弱点。从北朝鲜来的共军迅即蹂躏该国的南半部。如果说在西方由于大西洋公约集合各国力量得以避免共产党和自由世界的直接冲突，那末远东这个不安定的休战局面现在被打破了。因此难怪欧洲各国在1950年整个夏季感到他们赤手空拳，处在一种真正的危险之中。如何保证有足够且能应急的防御，成为首要的问题。

^① 参看本卷原书第133页。

1950年8月咨询大会就在这种气氛下召开。尽管有舒曼计划同样能引起人们注重讨论，但欧洲人的整个心意都集中在防务问题上了。辩论的第一天，与会者就被安德烈·菲力普的一篇精采演词所深深感动。他宣称，我们不能再把防务看成是少量本国部队所能应付得了的问题。这少量部队只不过是些花钱多而效率低的玩具罢了。我们需要比这更有效的一种东西：必须成立一支欧洲军，由欧洲各国出钱，在一个欧洲的部长领导之下，接受一个欧洲全会的民主控制。重要的一点是这样一支部队必须立刻建立，必须在各大盟国的大会组织起来以前就有。当时丘吉尔并未在场，我在送交给他的备忘录里述说了所得的印象： 214

显然今日欧洲的主要情绪是恐惧。安德烈·菲力普发言中最打动人心的一句话是：“我们不愿意再一次被人家来解放。”^①

菲力普的计划里有把德国部队编入欧洲军的建议。仅仅是五年多一点时间以前，纳粹的长统靴还在横行全欧洲，因此群情愤慨，不只是在被占领的国家，而且在德国也如此。

我在给丘吉尔的备忘录中继续写道：

德国人忌讳德国重新武装问题，原因有二：

(a) 他们担心，被答应保卫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抵御俄国，而却反挑起俄国的进攻。

(b) 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德国人怕老式的军国主义东山再起，怕最高统帅部的复活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但我们也许可以使德国人欢迎在所谓“欧洲军”里有一支德国部队（甚至是很强大的部队）。^②

我接着表示抱着这样一种希望：欧洲人在这种危险感的影响之下，生活在和平与战争的明暗交接关头，他们可能因此产生出足够有力的迫切感和团结感，使他们能达成一种组织共同防务的协定，而 215

①② 致丘吉尔备忘录，1950年8月8日。

不致陷入死扣法律条文的迷阵中。可惜这希望结果落空。在讨论舒曼计划时已经暴露出有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压力来自那种想成立永久组织的人，另一方面来自那些热情要求成立欧洲联邦的人。而在讨论欧洲军时，这两方面的压力立刻又出现了。

对菲力普的这个粗具轮廓(并谅解要把德国部队包括在内)的计划，丘吉尔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同意以他那至高的权威给予支持。他作出这一决定之前不但经过深思熟虑，并且也同他的同僚反复讨论。在开始辩论的前夕晚餐后，他邀我去他的别墅，那里我看到他正在宴请一大群德国人。那里照常有他的一些家人，他的私人秘书以及他作首相时享有的一切设备。所缺的——而这产生相当大的困难——只是用密码同他国内同僚通电报的设备。别的方面都和我在卡萨布兰卡或开罗看到过的几次战时盛会的情景相仿佛：

接着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非常重要的讨论，一直进行到午夜之后。情景确实颇为动人。德国人态度简明庄重。他们把立场说得很清楚，这很有好处。他们不想拥有德国的军队；他们愿意参加欧洲军。^①

第二天的情况是一阵紧一阵松：

丘吉尔先生准备发言——不，他不发言了——是的，他要发言。在上午开会之前，我忙得团团转。他躺在床上准备发言稿。他终于决定明天星期四发言；就这样通知斯派克。事实上那天就像艺术家进行创作构思那样，丘吉尔经历着渴望，不安，不满意，对任何别人搞的也都不满意——总之，是个好的迹象。^②

第二天的主要发言人是雷诺：

他是个绝对的大演说家——风趣横生，措辞明确，思想透彻。近代没有这样的演说家了。也许阿斯奎斯还差不多。^③

216 他反复指出俄国军力的数字，那是确实令人吃惊的。但最重要的

① 1950年8月8日。

②③ 1950年8月9日。

发言也许是向大会致词的第一个德国人——欧根·格斯登迈耶的讲话。这人其后几年将在政治上扮重要角色：

他否认德国人希望拥有德国军队，但承认德国人需要对欧洲防务作出贡献。这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观点，以及其他中、右党派的观点。但我认为恐怕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

那末，如果德国人不参加防务，不想打，他们就将处于无人管的地位；这样他们就要“吃原子弹”。①

8月11日恢复辩论。在这前一天晚上，我到丘吉尔的别墅去帮他研究又一次改写的发言稿：

这一次比以前的好多了。我不得不佩服他这种非常注意细节和精益求精的精神，然后我得到多尔顿那里去执行友好访问的使命。因为现在为了使立即创建欧洲军这一动议获得通过，丘吉尔决定冒一切风险。这一点我照办了；在甜酒（丘吉尔提供的）和苦酒（我提供的）的混合作用下，多尔顿-麦克米伦阵线搞得空前巩固了。我想他和卡拉汉……会弃权；其余的英国社会党人会容许自由投票。②

会议于上午十点三十分开始。

丘吉尔在十一点三十分发言，讲了约二十五分钟，然后提出他的决议案。他的发言在态度上和内容上都是热情洋溢的。几处稍带幽默趣味的话都很合适。但由于大部分听众是靠耳机通过蹩脚翻译来听取他发言的，所以在这种场合下的发言技巧是很不简单的。人们实际是在听他广播讲话而不是听他当场演说。然而丘吉尔的广播讲话有着直接听他演说的效果。③

他十分明确指出，他不是要抹煞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确，当时那个组织既未形成也没有首脑。他的目的是要唤起大家注意西方的弱点。此外，在这战后第一次有德国官方代表出席的盟国和中立国 217

① 1950年8月9日。

② 1950年8月10日。

③ 1950年8月11日。

大会上，他强调指出不仅需要把新德国纳入西方世界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中，而且需要让它积极参加防务。他一开头就提醒大会说，这欧洲军并不担负行政责任和拥有实权，但它必须提供警报和意见。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期间内在欧洲组成有效的防御阵线：

英、美必须派大量部队去大陆。法国必须再一次提供它那举世闻名的陆军。我们欢迎意大利朋友。所有国家——希腊、土耳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都必须尽力参加一份。

因此他建议：

现在我们应从欧洲议会向全世界发出充满信心和勇气的号召书。我们不仅要重申（正如人家所要求我们的那样）忠于联合国，我们还应以宣告赞成立即创建在统一指挥下的欧洲军这一行动，作出实际的和有建设性的领导姿态。在创建欧洲军这项工作上，我们应该负起光荣而有价值的一部分任务来。

在这个阶段，丘吉尔对欧洲军乃至在他欧洲政策中的其他许多方面，都还没有清楚和明确的计划。他当时处于反对党地位，剥夺了大臣们所掌握的那个庞大的机器。他这个老人打算给那曾为他所拯救的世界以新的领导。所以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和一位大臣对一个议案进行二读时的方式不一样。他的目的是摆出总的观点，推动那个业已在起作用的一股力量。至于找出细微方面的解决办法，那是别人的工作。不过从他的语气中可以明确看出，英国应该在他所设想的欧洲体系里起主导作用，而不是仅仅在一旁喝采助威。

一直继续到深夜的这次辩论，从法律上讲是超出咨询大会的
218 “法定”范围的，因为已有特别规定不许它讨论防务问题。但在当时及其后，部长会议并没有坚持不许各国行使他们的职权：

下午多尔顿发言，这是唯一重要的一次发言。我觉得他是在想要表示友好。有人甚至觉得又要形成联合政府了。除了照常的午餐以及为进行“会外活动”的中间休息时间之外，辩论一直继续到晚上九点左右。

在这一天里，大家对丘吉尔的动议能否通过，看法大有分歧。法国人由于内部意见四分五裂可能临阵退缩。德国人出于同样理由也将临阵退缩。所有斯堪的纳维亚人对此抱敌视态度。英国社会党人也可能反对。^①

这次大会之所以有趣，部分原因就在于有这一切不确定的因素和战线的不断变动。晚上九点左右进行表决的结果是：八十九票赞成，五票反对。弃权的有二十七票。

全体法国人和多数德国人投赞成票，这一事实说明这次表决的真正意义。^②

大会所最喜欢搞的那一套准备制定正式提案的工作，立刻就在会外以及通过特设委员会这种机构，虽然并非始终恰如其分地但却是热情地进行起来了。于是很快就由担任小组委员会报告人的邓肯·桑兹制定出一项临时方案，其中确定了欧洲军的组织机构以及欧洲防务部长之类官员的职能。丘吉尔所关心的是要利用斯特拉斯堡大会这个机构来向欧洲各国的国防部长施加压力，而不要越俎代庖。这是有先见之明的。他从来不喜欢在一个计划中列出细则。之后他就离开斯特拉斯堡，于是我就在8月17日给他一信，告诉他在这里出现的繁忙活动和热衷于制定文件的情况，并请他给予指示。他的回信如下：

我可以肯定说陷入细节是错误的。在目前这个阶段的情况下，欧洲大会决不能处理属于政府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它可以指明方向给予启发。我们除了提出决议案之外，不可能再干更多的工作。^③

同时在别的圈子里也进行了关于让德国参加西方防务工作的讨论。9月在纽约开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美国和加拿大政府不仅决定在“一旦发生战争时出兵援助签字国”，并决定提供美

①② 1950年8月11日。

③ 1950年8月17日。

国和加拿大部队作为联合防御力量，并在不久即派往欧洲以维护和平。这是一项很积极甚至是革命性的措施，于是这消息使整个西欧松了一口气，并产生了信心，而这种心情现今的人是很难体会的。据说当时美国要求德国对这共同防御提供约十个师。法国政府则不愿同意有营以上的独立德国部队。英国政府在面临工党内许多人的反对之下终于认可美国人的建议，但已为时过晚，免不了同法国人发生齟齬，从而陷入僵局：

这一切都归咎于艾德礼的迟疑和贝文的妒嫉心。如果一年前丘吉尔首先提出让德国参加防务的问题时英国政府就动手干，所有这些事都可能顺利解决了。现在我担心我们又陷入以前那个两难处境了。我们究竟是向德国求爱还是把德国推开？这是第一次大战后所未曾解决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第二次大战的同样那个问题。^①

法国人的处境确实困难，几乎处于危急境地。除了驻扎在德国和保护法国殖民帝国的部队以外，它所余下的那部分部队越来越多地陷入印度支那，去执行一项几乎是无望的谋求恢复和维持法国控制的任务。但两次大战的记忆犹新，对德军占领法国的暴行余恨未消。一支新的德国军队可能有助于遏制俄国，假如俄国真正是最危险的侵略者。但谁能遏制新的军国主义的德国呢？不能永远指望美国和英国兵留驻防守。那么大陆欧洲能不能想出一些办法，使得既能大家武装起来抵抗外来侵略，又能避免复活民族主义野心？

10月24日，当时的法国总理普利文向法国国民议会提出成立欧洲军的计划。其目的是为适应美国对重新武装德国的要求，而又不致冒德国重新成为军事强国的危险。

按照普利文计划，并入欧洲军的各国部队，应是“尽可能小的

^① 1950年10月23—30日。

独立部队”。建立起来的德国战斗小组要并入以非德国士兵占绝大多数的各师中去。他的计划要求有一个超国家的“权威机构”，其中有欧洲防务部长，有全欧预算，有防务方面的全欧议会。这一切都是仿照舒曼煤钢计划搞出来的。

很明显，这计划的用意多半是为减轻法国人的忧虑，而不怎么能使俄国人望而生畏。凡是对军事问题，对组织、军需补给以及战略战术指挥问题多少有点知识的人，都会认识到这样一支部队，撇开语言不通这些困难，士气将是很低的，因而不会有什么军事价值。它是一支十字军，不是作战军。丘吉尔把这样一支庞大的外国军团讥称为“烂泥一团”。他脑子里总是在按照战时联盟关系的那条路子想问题。有整师甚或整个军团的部队在各自的司令员指挥下作战，但要受一个对有关各国政府负责的最高司令官统率。同时，为加强欧洲共同体的权威，补给工作必须加以集中。武器和弹药要标准化。丘吉尔认为这一切可以由各国政府之间商定安排。他们无需更复杂（而且肯定不要超国家）的机构。

然而，除非按照这些或同样严峻的条件，法国舆论对征用德国部队是持敌对态度的。德国部队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并入一体化的欧洲组织，但不许有他们自己的参谋部和指挥系统。虽则法 221 国高级官员甚或大部分公众对成立联邦式的欧洲合众国的想法并没有特别大的兴趣，但如果有个机构，不管多么复杂，只要它能不管什么新成立的德国部队约束在里面，他们就立刻举手欢迎。根据他们长期以来的痛苦经验，他们甚至希望有朝一日苏联威胁能够消失，美军撤离欧洲，大西洋公约司令部解散。所以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欧洲军事系统，有什么东西能防止退回到发展各国自己力量那样一种经常使欧洲遭殃的状态呢？请问，有什么东西？

在英国，根据当时报纸和议会中的评论，也可以看出公众对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几乎像对俄国的威胁那样害怕。许多德国

人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他们也像法国人或英国人那样对德国的重新武装忧心忡忡。同时，阿登纳博士明确提出，他固然出于这个理由欢迎建立国际部队，但要求德国部队必须同他国部队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这一点是斯特拉斯堡大会上的政治家一般都同意的。

当欧洲大会在 1950 年 11 月重新开会时，邀请了法国外长舒曼向大会介绍普利文计划，其后并立即进行辩论。11 月 24 日我得代表保守党同僚作总结发言，而且还得措辞谨慎。大部分讨论是关于德国问题；许多德国代表反复申述，他们“在民主和议会制度乃至自由政府尚处于幼年时期”，对于有一支“德国国家军队与之抗衡的危险”表示担心。因此德国社会主义者决定投票反对德国参加。我向他们指出他们这种反对有点自相矛盾。大多数德国人不是早就宣称德国所需要的是撤退我们的占领军吗。

222 可以肯定说，这实际表明德国要求他们的作用应予改变，他们的地位应该大为加强和充实。

这样他们就不再是敌人或过去的敌人而变成了同盟军。此外，由于美国、加拿大这两个大西洋国家愿意参加到我们的积极防御组织中来，使整个局面确实为之改观：

这是个意义重大的决定，当我们想起这公约的背景时，这更显得了不起。新世界被召唤来为旧世界恢复平衡，不是在发生灾难之后，而是在出现灾难之前。它所带来的希望不是解放而是安全。

如果德国不接受它的地位，它不可能变成中立地带而只能成为广大的无人地带，受现代战争的可怕折磨。至于德国问题，我可以援引丘吉尔这样权威的话来对他们说，如果德国人参加，他们应该被当作战友来接待，并和任何其他国家的部队一样，“享有同等尊崇的军事地位”。

至于如何能使欧洲军（如果它按普利文计划或任何其他计划

搞了出来的话)配合到那个新的更广泛的欧洲组织里去,那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我只能对技术方面存在的困难予以提醒,并表示希望说,可能在将欧洲军置于大西洋系统之下和单线指挥下,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加以克服。因此关于欧洲军的组成和其中德国的地位,大会只能表示这种不肯定的意见,而重申8月间通过的原来那个决议。对此,只有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投票反对。

但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机构内部,工作正在取得进展。该组织的代表大会(它的主席查理·斯泼福特是我在阿尔及尔工作时的旧友)按普利文建议的路线制定一项提案,打算把“欧洲军”编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中包括约六千名德国人按战斗队编入以非德国士兵为主的一些师里。这个计划被法国政府所接受,并于1950年12月在北大西洋大会上通过。在那次大会上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最高司令,并于翌年2月在巴黎设立他的司令部。 223

因此在这草创的头一年里,虽然出现那么多纠纷,还是取得了两大收获。其一是北大西洋公约在十八个月的过程中已经从受袭击时给予支持这样的一般保证,变到决定成立一支有统一指挥的联军以便随时制止侵略。其二是,既然这支部队至少要包括德军的作战单位,那么同德国军事合作的原则,从而必然导致的德国重新武装,可说是已经被人接受了。但这个计划还有待于适应现实。欧洲大陆各国在法国主张的鼓舞下,继续在设法成立一个两全其美的组织,既能促进成立永久性的欧洲机构,使复兴的德国在其中得以发挥作用,又能保证欧洲在抵抗苏联威胁共同保卫西方文明方面起到充分的作用。

所以丘吉尔的倡议和斯特拉斯堡的冗长讨论并不是毫无成果的。如果说事后证明法国人所首先提出的那个所谓欧洲防御共同体引起了不少纠纷并给英国带来许多新的困难和负担,那末它也给美国和加拿大作了强有力的推动,使他们愿意立即而不仅仅是

在出现不测情况时才来参加防御。

在 1951 年年初,我对于搞出更实际的“欧洲军”计划还抱着希望。1 月 3 日我和雷内·马西格里进餐。

大家谈起在斯特拉斯堡提出的以及舒曼所阐释的那个“欧洲军”。我用我所能想到的最强烈词句,敦促法国政府别再围绕这个简单的问题,搞那法国外长已经尝试过的那套繁琐条文。英国决不会接受欧洲全会下面一个附属委员会之类的议会式控制。重要的一点是欧洲军里面要有英国部队参加,尽管我们的大部分兵力是直接归属大西洋军方的。

224 如要使我们说服我国人民接受,这体制必须搞得简单而且灵活。^①

我仍然感到,如要解除法国疑虑,英国给予某种形式的合作是决不可少的。但事难如愿。

为把这段时期的事情说个园满,应该再提一下 1951 年 2 月在巴黎开的一次会议,那是法、比、卢、意、西德五国讨论成立欧洲军的一次会。主席是舒曼。北约其他签署国包括英国、荷兰在内,都派出了观察员。讨论是冗长而且复杂的。会上同意的那个计划大致按业已搞成的煤钢组织拟订,打算先在各国国防部长会议指导之下进行工作,并最后由一名对议会组织负责的欧洲防务部长来领导。7 月 24 日,五国又在巴黎开会,同意凡成员国提交给欧洲防务之用的任何武装部队,都应合并于一个超国家的军政领导机关之下,应有共同的装备政策和共同的经费。军事领导机关应遵从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观点和指示。11 月间,舒曼向在罗马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大会汇报,说是在制订欧洲武装力量的军事目标方面已经取得进展,即,要有四十三个师,包括装甲师和机械化师,要建立一支国际空军,要定出共同预算和生产武器的共同方式。最后,到 1951 年 12 月,与会各国宣称业已协议建立一个欧洲防务共同体。而早在 9 月 14 日,当时的外交大臣赫伯特·莫里

^① 1951 年 1 月 3 日。

森宣告说,英国虽不能作为正式成员参加这样一个组织,但亟愿与之建立密切与有效的协作关系。

新欧洲出生的阵痛过程,就这样结束了它那重要的虽还谈不上是决定性的一个阶段。一个共同的经济政策和防务政策的基础已经奠定了。下一段时期要出现许多困难,许多密切牵涉英国的纠纷。但这些要由国内一个新政府来负责处理了。 225

在这些年中,我对欧洲运动的各方面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除了上述那些活动以外,还参与了欧洲经济合作总署(ELEC)组织的一些会议,包括参加1951年5月间一次重要的英联邦会议,在那里进行的工作对我后来几年大有用处。这些会议除了本身的积极成果外,还使许多不同国家的杰出经济学家能共聚一堂。虽然所讨论的许多问题,对于我这个在经济学和货币学上知识有限的人颇难理解,但我能体会所有这衰衰诸公进行工作的技巧和热忱。

这工作的另一侧面是1949年8月成立的对付中欧和东欧的一个小组。这是那个不惮其劳的贝丁顿-贝伦斯所建立的。首次会议是1949年8月在斯特拉斯堡开的,与会代表有来自波兰、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人士。其后我们接纳了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代表。不管这个团体有什么实际价值,它对冷战的宣传工作上有些重要意义。我们说服咨询大会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以求在大会及其各委员会制定一切提案时,对那些“被阻不得参与大会工作的国家”,保证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我们也许能给予许多沉痛的心灵以一些安慰。外交部在给予支持方面理所当然地并不十分热情。但至少在作为给予铁幕后国家以一些希望的工具,并在冷战中从道义上维护西方立场这方面讲,我们所做的工作也许还是有它的价值的。虽然我作为主席在这个委员会上花去不少时间,但我从未对它所能完成的事抱很大希望。任

何这类团体，命中注定主要得依靠流亡集团，它必然有严重的局限性。但对在这些当时被压迫的国家内保存欧洲文化传统，我们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帮助。

此外，我还为促进欧洲事业进行过几次游说。我访问过德国和意大利。1951年春，我在欧洲运动英方秘书戈登·朗博士的陪同下，到过瑞典和挪威。在斯德哥尔摩，参议员、我的老友卡尔·韦斯特朗的盛情接待几乎使我们不知如何道谢，我们在那里参加公众集会和私人会谈的日程排得很紧。在挪威，赫曼·施密特-英格布雷生博士对我们的照顾也同样可亲。在英国对欧洲运动所采取的所谓“讲究发挥作用”的态度，与有些大陆朋友的联邦主义趋向对比之下，斯堪的纳维亚人自然同情我们的态度。而对于以欧洲团结来保卫其安全与文化的整个信念，他们的拥护比谁都要真诚。

同样，在这些年中，我们始终从美国那边获得许多帮助和支援，无论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方面都是如此。有些人以突出的热情争辩说，我们应该按照北美合众国的方式，在短期内建立欧洲合众国。有些人了解欧洲国家有长远而复杂的历史；有语言和传统上的差异；有他们的斗争、对立、抱负和仇恨，因而能更现实地估计走向这条道路上的障碍。许多美国人还记得那些年的情况，当时他们对欧洲政府所采取或提出的政策如此多变和捉摸不定，颇为自然地感到不耐烦。还有的人则比较能谅解。我记得1950年在斯特拉斯堡跟杜诺万谈过一次话。我是在战时他精力充沛地负责战略情报局时认识他的。他把他的印象说得很明确和坦率：

他刚去过亚洲。美国人感到颇为孤寂。这是因为他们才第一次尝到担负世界重任的味道。他们过去一帆风顺，一受挫折就恼火不耐烦。希腊事件他们心安理得地忘怀了，那时我们同1944年的共产党革命作战，而他们守中立。对于他们在亚洲帮助拆英帝国的台和抛弃荷兰人所

干的这一切,现在他们也开始后悔了。①

但只可惜,在现今局势下欧洲的困难是根深蒂固的。丘吉尔在苏黎世发出“欧洲团结起来吧”的呼吁时,那是一种感情上的呼吁。要把理想变成现实,无论是在经济、财政或防务方面,确实是非常棘手难办的问题。有一阵子联邦主义的空想成为欧洲舆论的主流,有一阵子又抱比较实际的“讲究发挥作用”的态度;有一阵子欧洲中心地带国家采取一种近乎内向的路线,使业已分裂的欧洲更趋于四分五裂;有一阵子重点放在政府间的合作上;有一阵子放在筹建欧洲议会机构上。整出戏还待继续演出,因为它的路还没有走完。我打算在这里描述的只是这一运动的初步阶段。这个运动不仅是因战争的惨祸而引起的自然反应,而且也是出于真诚谋求欧洲国家在其对发展自身力量以及为世界和平与幸福作出贡献的共同心愿下,起到更为高尚的作用。

① 1950年8月9日。

第九章 从帝国到联邦

当第一英帝国因丢失美洲殖民地而不光彩地终结时，第二英帝国的格局已在形成：

面积大于美国的北美一大片土地；南半球的一些大岛；在印度次大陆上牢固(虽不正常)的地位，和对非洲最南部分的坚强控制，由此并可进一步占领非洲土地；这些就是帝国的基础。此外还有在中国海、在东南亚海面上和加勒比海上的颗颗珍宝。^①

在这基础上建立了遍及世界的工、商业势力。同时又造出了在这地球大部分地区上维持和平与传播文明的强有力工具。在十九世纪末达到了全盛时期的这个帝国制度，经受了布尔战争^②的震撼，虽未为其推翻，然而黯然暴露了英国这个军事大国的软弱无能。第一次世界大战虽恢复了它的威信，不过在战争过程中及其后的年月里，帝国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它下面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集团——独立的和附属的。印度和各殖民地虽在联合王国政府和议会的最终控制之下，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爱尔兰共和国这些自治领，都在其处理内政和外交关系上，获得完全的自治和独立。1931年的威斯特敏斯特永久法案给鲍尔福的那个典型的巧妙公式赋予立法效力。鲍尔福是最机敏最有经验的老一代政治家之一，他搞出来的那个公式也在1926年帝国会议上获得通过，其内容如下：

① 约翰·惠勒·贝内特：《献给史神的花环》(1967年伦敦版)，21页。

② 指1880—1881和1899—1902两次英国在南非与德兰士瓦等地的布尔人作战。——译注

各自治领是英帝国内部的自治实体，在法律上地位平等，在其内政或国际事务上彼此间毫无从属关系，他们共同效忠于英王而互相团结，并作为英联邦的成员国而自由结合。^①

有人深恐这一永久法案同 1935 年的印度法案(它实际上承认在该次大陆上的帝国使命必将终结)一起标志着英帝国的寿终正寝。就英裔各自治领来说，这永久法案只不过是承认了第一次大战后出现的事实。至于印度法案，正如丘吉尔所正确预见到的那样，它必将成为走向同等程度独立运动的前驱，不仅在印度，而且在所有殖民居留地，当它们逐个变成宜于自治——或至少在进步和自由的名义下自认为宜于自治时，都会是这样。但当二次大战发生时，整个庞大的结构，不管是自治的还是附属的，都以惊人的一致和决心响应了召唤。这是由于那些“老自治领”在祖国危难时刻本能地和祖国团结一致的结果。这无疑也是由于他们在思想上和道义上对纳粹主义及其带来的一切表示深恶痛绝的结果，虽然这还不足以给予美国的政策以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在南非，虽然那里有浓厚的日耳曼传统，并对希特勒所宣扬的种族主义无疑有些同情，但史末资不费什么力气就左右一切，并使他的人民在 1939 年 9 月头几个星期里就对德宣战。同样，印度的各种部队作战勇敢出色，在东西方各战役里起了重要作用。殖民地帝国对作战的贡献也并不逊色。

然而，在战争年月中已显得很清楚，战后各种进程将要加速和加强。英国及其盟国所声称的为之而战斗的那些原则，其本身就意味着应承认一切民族，不管其肤色和信仰如何，都应按实际可能 230 尽快走向自治，并享有国家的全部权力和威望。这种压力更由于我们美国盟友的态度，特别是由于罗斯福总统的政策而增强。他们对于“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有一种颇为天真的看法。在战时

^① 《风云变幻》原书第 112 页。

任何一刻，不管局势多么严重，总统总要找机会硬扯他那套反殖民主义的偏见，所根据的很少真知灼见而是颇多晦涩奇谈。他自己以为，来自很多不同国家的移民，能够那么成功地融合在一起，形成自豪而又自信的美国人民，于是也像威尔逊总统那样，甚至连欧洲那种年深月久的民族问题也以为不在话下。他对亚、非两洲在宗教上、种族上、部落间和民族间的紧张关系和复杂性，则根本弃而不谈。

离心力战前就在起作用。战争中的事变，包括欧洲人在东南亚的丢脸出丑，还有缅甸、马来亚、印尼至少暂时地落到日本手里，又刺激了这股力量。美国各层势力又支持煽动，施加压力。到战争结束时，这股力量已不可抗拒。然而1945年选入议会的那些人，很少人（如果有的话）认识到变动会来得那么快。如果把这些年作为巨大的分水岭，那末我们之中很少人能预见到这股水会多么迅猛地——有人会说是多么造孽地——涨为洪流。

第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印度问题。我虽对印度事务的知识和经验很少，但从小就接触过一些印度朋友。我父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国外长期旅行时，奠定了麦克米伦图书出版公司在印度的企业，不久便在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设立印刷和出版发行的分公司。他有许多印度朋友，主要是教育和文学界的，我们常在乡间或伦敦家里招待他们。

231 在两次大战之间我未任政府职务时，曾把一大部分时间致力于经营企业，因而自然同各式各样的印度人有不少交往。我父虽不爱发表强烈的政见，但总认为英国统治印度的正确目标应是为那个辽阔的大陆走向自治做好准备。他深悉印度生活中互相矛盾的各个侧面，能充分认识其中的复杂性和困难之处。1835年英国政府曾决定实施麦考莱关于教育问题的一份出名的备忘录，一位现代作家对此曾发表如下的观点：

它把挡住欧洲思潮和文学的拦洪闸门打开了，使印度最有才智的人从儿时起就受到英国自由主义和科学思想的强烈影响。^①

我父要是活着，是会同意这种观点的。的确，印度教育事业——小学、中学乃至学生拥挤的大学——的迅速发展，曾是我家事业以及英国同行事业成长壮大的基础。

我记得听过关于 1909 年所谓莫利-明多改革法案(那是我父所同意的)的许多热烈讨论。当继而有蒙塔古-契姆斯福特宪政变革时，父亲和他的同僚对“两头政治”制(那是在 1919 年的印度政府法案之下设立起来的)已经有了些经验。教育成为一项“移交”事业，由印度官员主持。我们同新领导人关系友好，并能看出印度人担负行政责任之后产生一些良好的作用，许多温和派的印度人不再去搞革命计划，而转向日常的实际问题去了。1929 年哈里法克斯勋爵宣称，他认为 1917 年宣言的精神说明“宣言所谋求的印度宪政进步的自然结果，是让印度取得自治领地位”。当时保守党因他的话而引起一场危机，而我则是同情那位总督的。其后关于这宣言究竟对西蒙使命团的工作起了多大影响的问题，进行了一场辩论，不过我对辩论细节并未十分注意，虽然我对 1931 年圆桌会议的实际破裂表示痛心。

当这些问题首次突出时(1929—31 年)，那几年我正不在下 232 院。1931 年我回下院时，保守党内部又一次为印度问题发生意见冲突。这是由 1933 年公布白皮书而引起的，最后终于靠塞缪尔·霍尔^② 爵士的机智和耐心，绕过许多困难的危机，于 1935 年以通过印度政府法案而告结束。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无论如何始终支持政府的。至于因此而导致丘吉尔与保守党领导之间的最后决裂，我认为是个悲剧，因不久纳粹党崛起，而希特勒的攫权开始使

① P. 格利菲思爵士：《现代印度》(1962, 伦敦版), 55 页。

② 继之以坦普尔伍德勋爵。

我和一些朋友越来越感忧虑。在这个问题上，我马上和丘吉尔站在一起。但关于印度问题，我本能地感到他错了，觉得他的观点怪得出奇。我同情鲍德温，他在重大问题上发言的说服力是很少有人能超过的。我特别记得1934年12月他在党内一次会上的讲话，现引述如下：

不要忘记：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教了些什么东西给印度？我们把英国的种种制度和民主以及其他有关一切给他们传经送宝。我们给它上了课，现在它要我们兑现。现在全世界刮起一股民族主义和自由的风，这股风在亚洲也同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强烈。难道因为我们说“时机到了”我们就够不上称为一个真正的保守党人？难道那些说“时机会到，但在将来”这种话的人，他们就成其为更货真价实的保守党人吗？^①

当我在多年之后想起使用“风云变幻”这个词的时候，很可能是鲍德温的话在我下意识中的回响。

二次大战爆发之前，英国各党派的领导和党员群众，除少数突出例外不算，一般都认为前进的步伐不能老是那样踏步不前。所有“自治领”——即老的英裔“殖民地”——都已在1931年实现了他们的全部理想。甚至在“殖民帝国”的那些最落后的地区内，也因在总督会议的官员里添入了“民选成员”而向前迈开了最初的几步。233 像印度这么一个能以这样长的历史自豪并这样快接受教育走向自治前景的国家，我们怎么能够永远不让它出现真正的民族主义呢？虽然大家原则上同意必须走这条艰难的路，不管它有多少障碍和陷阱，但关于明确的计划和具体的时间表，做起来自然就有许多难以捉摸的问题。1935年的印度法案实际上谁也不满意，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

对于莫卧儿帝国崩溃后英国在印度统治的历史，不管别人拿什么话来指责，我们至少把和平与物质生活上的进步带给这次大

^① 《风云变幻》，原书第318页。

陆上数目众多而种族复杂的人民大众。我们为这项任务忙碌了好几代；这是一项麦考莱称之为“重建一个崩溃社会的艰巨工程”。因此，如果要体面地完成我们的任务，并给我们后代留下一笔值得自豪的遗产，那末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应该保持印度的团结。但由此就说明，并为任何稍懂印度情况的人所同意，要搞一个孤家寡人的集权制政府是办不到的。必须有一个印度联邦。必须把各自有当地自治政府的各邦，联合在一个中央立法机关和中央政府之下。我们愿把各邦的全部行政职责移交给印度高级官员。中央立法会议由印度人来搞。但最后实权仍属总督会议（其成员部分是英国人，部分是印度人），直到最后阶段到来时为止。

但要推行这一计划，还有两项必要的前提。不管采取什么办法，印度各邦必须和英属印度结成联邦。印度各邦数目很多，总面积很大。在大多数邦里仍由王公进行纯粹个人统治，各王公之间彼此都不和睦，又由于各自有一套古老的传统，以及印度民族主义这股新势力，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不和。他们是冰炭不能相容的。但即使这一困难能克服，还有另一个更致命的分歧。暂且不管佛 234 教徒和信徒较少的其他一些宗教，甚至也不管那几百万“贱民阶层”，那里还存在着穆斯林和印度教之间的鸿沟。说一句答应给他们以自治领地位的话是容易的，但要成立一个全印联邦政府，把印度各邦和英属印度都包括进去，解决怀着深仇大恨的两大派教徒集团之间的对立情绪，这将是一项漫长、艰巨也许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证明确是如此。

二次大战开始之时，尽管民族主义领袖甘地、尼赫鲁等人拒绝接受 1935 年的法案，工作仍已经有了些进展。战争年月的事态，胜利地证明了英国公务员的才干和深得民心。这些数量少而有献身精神的英国公务员和他们的印度同僚在总督之下进行工作，维持了勉强的和平与秩序，并给予盟国事业以巨大的援助。同样值

得赞扬的是印度各族人民的忠诚和勇武，这才使印度对作战方面的贡献——尽管印度最强大的政党国大党百般阻挠——如此杰出。二百五十万的印度男女青年参加了作战部队，这样规模的志愿应征人数几乎是空前的。还有八百万印度人参加了辅助军种；五百万人参加军事工业。印度军队在漫长战线的各方面都英勇作战，并忍受重大伤亡。他们增加了工农业生产，这也是同样了不起的。当德国战败，日本在其后几个月投降时，我们多数人在战争年代因戎马倥偬而忽视了的印度政治前途问题，又一次无可推卸地突出摆在我们面前了。

我于战争头两年在供应部工作之时，曾了解一些印度在军火和工业生产上所作出的成绩。1942年春，当时我虽非内阁成员，但曾听说政府谋求同国大党领导人取得一定程度的合作。这确是在我国历史上危急的时刻进行的。2月15日新加坡投降，而日本的深入亚洲，加之香港失陷，给我们的威信以严重打击：

此时印度次大陆的安全直接受到威胁。看来日本海军可以几乎不受阻挠地自由进入孟加拉湾。印度第一次在英国统治下受到一个亚洲强国大规模入侵的危险。印度政界潜在的紧张局势加剧了。虽然直接搞颠覆活动并希望轴心国胜利的，只是以苏巴斯·鲍斯之流为首的一小撮极端分子，但那支持甘地、掌握宣传工具、力量雄厚的舆论界，却热烈相信印度应在这次世界冲突中保持被动和中立。当日军向前推进时，这种失败主义情绪随之扩散。当时有人提出，如果印度能用什么办法摆脱同英国的牵连，也许日本就不想来侵略。印度的危险很可能只是因为她同英帝国有连系。如果能把这一连系掐断，印度肯定就能采取爱尔兰共和国的立场。他们就这样颇能自圆其说地滔滔发出议论。^①

与此同时，罗斯福总统也迫不及待地要对印度事务提出意见。对此丘吉尔这样悻然写道：

^① 丘吉尔：《第二次大战回忆录》第四卷《命运的关键》，原书182—183页。

没有海外殖民地和领土的国家，在对有这类关系的国家谈论他们的事务时，是很会摆出一副十分清高十分公正的姿态来的。^①

这一严重局势就是当时要派去克里普斯使团的起因。谁也不能比他更适于担负这一任务，谁也不能比他更真诚更同情印度人的要求。他的目的是谋求印度对抗日充分合作，并劝说国大党领袖接受英国全民政府授权由他提出的建议。他十分清楚地说明，只要胜利后召开的印度立宪会议提出，英国准备给予完全独立。政府各党派拟定的那个文件，不仅希望印度团结国内力量进行自卫，还在国际舆论面前表明我们的诚意。但他们一下子就拒绝了。²³⁶我们认为必要的前提他们不能接受，国大党要求立即成立国民政府接受移交的权力；甚至关于防务的必要保留条件也置之不理。然而克里普斯使命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的。除了在道义上对印度和对全世界所产生的效果之外，它至少还使尼赫鲁起而反对国大党许多领袖的盲目和平主义。他宣称尽管会谈失败，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必须打赢，英国在印度的作战努力不应受到阻挠。

当时除了丘吉尔和各大臣向议会报告的情况之外，我由于所处地位不能获悉关于此事更多的内幕。然而这样同情和友好的使团尚且遭到完全失败，从这种事实总该得到一个教训。印度民族主义舆论对英国的感情固然很坏，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内部对立情绪甚至比这还要厉害。所以，正如哈里法克斯和他的后任那些年的情况一样，当他们设法劝说极端分子讲点道理并吁请各集团之间停止暴行时，各方面都觉得把所有罪过都推到总督和英国身上是最方便的事。但许多深悉印度内幕的人担心，对英国政府任何建议的这种强烈反感，部分（即使并非全部）原因是打算借此掩饰印度人内部间不可弥补的怨隙。

在战争结束阶段，印度局势仍是紧张的，但尚不致于不可收

^① 同前书，185页。

拾。1943年被任命总督的韦维尔勋爵^①，在这些年始终保持兼有达观、耐心和灵活的那么一种少有的态度。尽管不断有动乱和集团之间的纷争，次大陆的作战努力仍能充分维持。同时，根据战争期间的一项协定，印度内部有一大笔开支要划到英国财政部的账上。这样一来，印度就从一个负债国变成了债权国，他们的所谓“英镑余额”达到一亿二千五百万英镑之数。好多年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经济就靠这种形式的援助（有时称之为“无偿输出”）来维持，这就对英国生产添上了相应的负担，从而引起支付平衡的紧张。

胜利到来的1945年春，韦维尔尽其全力邀请印度政界领袖开一次行政会议。为此他释放了拘留中的国大党主要党员。6月份在西姆拉开的一次大会上，看起来韦维尔的工作很有获得成功的可能，并能成立一个纯由印度人组成的行政会议，以便作为进一步讨论未来工作的前提。不幸的是，穆斯林联盟在穆汗默德·阿里·真纳的授意下提出要求，不许有盟员以外的任何穆斯林教徒参加任何政府机关，不管是临时性工作还是永久性工作。韦维尔那个大胆的倡议就此被这一条件所断送而归于失败。

当英国大选公布时，印度的情况就是如此。新首相艾德礼对印度事务有些经验。他曾于两次大战之间在西蒙委员会里工作过，并于1942年派出克里普斯使团之前在战时内阁里参加过重要讨论。他具有坚定的意志，但在外表上有时显得有点自卑。

总督到伦敦走了一趟之后，就宣布政府的计划。战时中止的对各邦和中央立法机构的选举，将按实际可能尽快举行。之后便将召开立宪大会。同时总督将举行一些初步会谈，以研究1942年的克里普斯计划是否能行或需要作哪些修改。

^① 战区元帅韦维尔勋爵，1939年—41年曾任中东总司令，1941年—43年任印度总司令，1943年—47年任印度总督。

印度人对这一建议毫无兴趣。民族主义分子的报纸对此大加抨击。国大党提不出什么更好的建议，只是重复申述 1942 年决议中“滚出印度”那个滥调。接着发生剧烈动乱，带头人是尼赫鲁和萨达尔·帕特尔，他们两人竭力煽动恶感和违法暴行。但国大党用不着这么发急。艾德礼早就下决心要脱身了。

此后一段时间演出了一幕悲喜剧，英国政府利用其后十八个 238 月的时间几乎拚命设法摆脱将来对印度事务的任何责任。的确，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大帝国是以这样一种奇特而难测的方式告终的。建议一个接着一个提出来：进行选举；定出制定宪法的人员；把权力移交全印中央政府。想摆脱责任的英国政府，几乎愿按任何条件，不惜任何代价，提出了这一切建议。印方代表，不管是正式选举出来的，还是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这两大敌对集团的领导人，对印度的主子这样迫切硬要塞给他们的独立与自由这一份礼物，似乎不肯接受。结果是，一切想把权力井然有序地移交出去并保持印度团结的任何计划，都被一块硬石头碰破了，这石头就是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韦维尔仍是耐心坚持，但似束手无策。当 1945 年底选举中央议会时，国大党席卷所有“开放”选区的议席，而穆斯林联盟则赢得了每一个“保留”选区的穆斯林议席。这把印度—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弄得更突出了。

为谋获得某种解决办法，1946 年 2 月宣布又派出另一个内阁使团。克里普斯又被派去，但这次有国务大臣佩西克-劳伦斯勋爵与海军大臣 A. V. 亚历山大（其后任国防大臣）同行。同时，艾德礼明确宣称，在中央和各邦选举结束之后，将立即采取积极步骤制定宪法，并成立政府，以便移交权力。由于需要有一种机构来完成这个任务，英国表示愿意协助成立各种机关。艾德礼又断然宣告，今后印度愿否留在英联邦之内，全凭印度自己决定。这一大块地区，有那么多种族，那么多宗教和语言。他对那里的种种困难是心

中有数的；但他却宣称他们的前途不是英国政府的事，而是要由印度人自己来决定。

我还记得，当我一听到这个宣告时，曾对这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情况感到吃惊。我同意一般看法，认为印度应该自治。但居然有一个英国政府这样坚决地要放弃它的责任，而印度人似又同样坚决地不肯接受交给他们的担子，这件事在大多数保守党人看来觉得是荒谬绝伦。因为英国人认为这就像是放弃天职和放弃权力。

在1946年里，韦维尔始终在设法解决那最后证明是不可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愿望是按步就班地执行一项使团结的印度获得完全自治的政策，而这一愿望之未能实现，不能归咎于总督或英国公务员或英国长期统治下的任何既得利益集团或任何其他原因。它的失败只应归咎于穆斯林—印度间的敌对情绪。然而总督的不断施谋划策并几乎每月发表一项方案，这也损害了总督的威望。1945年底选举中央议会的结果早就证明，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这各大敌对势力，已经把其他一切政治集团都扫除了。1946年春的两邦立法人员选举中又重复出现这一情况。另一方面，自战争爆发以来，现在第一次出现这种可能，即邦长管辖的各邦可由任命那些经过选举产生的部长来治理，而无需依赖邦长的保留权力了。

此时穆斯林联盟断然提出对往后那个巴基斯坦的要求，这就是说他们要求分割印度，要求印度的西北部和东北部享有主权，成立一个穆斯林国家。所有那些爱护印度和关心印度的人自然要竭力反对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因这看来就要把两百年前英国干涉印度无政府状态以来所带给印度的最大一点好处，毁于一旦。经内阁同意后，克里普斯及其同僚提出一项巧妙的反建议，计划把印度分成三大部分，使全印中央（或联邦）政府只享有极小权力，但包括由英属印度及印度各邦选出的立法机构。建议那里要有一个由各邦现行立法人员选出的立法议会，以及其他一些建议，目的在于成

立一个松散的联邦，使穆斯林教徒和印度教徒在他们各自地区内享有尽可能大的权威，但又能保证让一个联合的印度能够生存下去。这样联邦中央当局的威信和权威可以慢慢建立和发展起来。

对这个虽颇复杂但有想象力的计划，讨论继续进行了好几个月。此后又建议成立一个临时政府(或行政会议)，由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各派五人组成，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一些代表。这些计划一个接着一个都被推翻，总督不得不依靠由他自己的官员组成的行政会议来进行工作。不过到8月底总算成立了一个印度行政会议，尼赫鲁同意任副主席。但这时穆斯林联盟又不肯参加。接着发生社会动乱和暴行。其后几个月里在加尔各答和整个东孟加拉发生猛烈冲突，并扩及各联合邦及比哈尔。到1946年10月，穆斯林联盟终于决定参加临时政府。但这个政府没有统一目标和谅解。

是年年底，总督去伦敦，并有真纳和利亚加特·阿里·汗以及尼赫鲁与之同行。他们同首相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主要是法律条文上的和争议性的、在内阁使团划分成三区的那个计划里，要求解释这一段或那一段文字的确切含义。

在印度领袖会谈毫无结果而离开伦敦后，英国政府于圣诞节前夕发出声明，似要采取比较坚定的政策。声明指出，任何计划要获得成功，没有印度人合作是不行的，必须有两大政党参加。同时，那个尚未选出穆斯林成员又无各邦代表参加的立宪会议，召开了一次会议，直到1947年1月下旬才休会。

在这整个混乱的局面里，双方越来越清楚地涌现出一批领袖来。一方面是那些受尼赫鲁支持的争当甘地的人，另一方面是 241 那些争夺要当真纳的人。英国政府则尽一切可能想让印度人相信他们的诚意。甚至在我们最后撤出以前，政府就派了一名高级专员去处理纯属英国权益的事务；国务大臣下面不再增员，也不再

在印度军队中增派英国军官。在联合国里还进行了外交安排，以便使人产生似乎已经存在一个独立的印度政府这种幻觉。

在这整个时期内，反对党领袖间多次讨论该采取的路线。丘吉尔根据他的秉性和昔日回忆，对印度事态的发展感到不悦和恼火。他虽然衷心接受让印度走向自治的政策，但对行将出现无政府状态甚或内战的严重局势感到灰心和耻辱。英帝国统治的历史就落得这样一个不光彩的下场，使它深感痛心。同时，在选举后的十八个月里，尽管韦维尔好心好意地作出各种努力，印度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各邦政府的权威，也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垮台了。“我们马上就要撤出”这种感觉，使我们那些受尽折磨的官员，从总督起直到最年青的公务员，很难再受到当地人民过去那样的尊敬。如果我们确实就要出去，那末他们认为值得关心的是“谁将上台？”同时对于那些温和派，既然我们就要抛弃他们，听凭极端分子去摆布他们的命运，我们又怎能继续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效忠呢？这样，我们所有的传统朋友开始疏离，我们所有的宿敌开始嚣张。结果是在某些印度海陆军部队里出现骚乱和近乎兵变的现象。而当正常的救济工作机构削弱之时，由于接连几个季度收成不好，有些地区开始感到缺粮。当然，那时的情况还远远没有坏到像此后几年殃及全国的饥馑状态，但已足够引起那人数日少的英国官员的忧虑和伤心，因他们所负责任重大，他们献身为印度服务的心意始终如一。所有这些消息都从各方面传来。在我们的同僚中，“拉布”·巴特勒是消息特别灵通的，每逢出现事变，他总让我们得悉内情。他家同印度的长期联系，以及他的特殊知识，使他成为最好的顾问。但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在下院和全国力量都弱。我们只能支持政府的每一步行动，他们是想从这种荒唐的两难处境中找出一些解决办法的。这是一个受到抨击的帝国政府，多年来受左翼批评者的辱骂和污蔑，说它是被征服民族的残酷剥削者，但它如今却在多

方挣扎，对决定四亿人民前途的事，力求摆脱责任，而这些人民却曾指望他们的救援。这是一群英国左翼政治家，他们多年来从原则上赞成立即移交权力并且急于想这样做，但如今却处在这样一种尴尬而且几乎滑稽可笑的地步，就是他们不能在实际上做到在交权的同时创造自由，而是相反地引起无政府状态。他们好几月以来设法寻找按部就班移交职责的方法。但最终他们只能失望放弃。

1946年底事情完全陷入僵局。所以我觉得到印度去短期旅行一次，看看那里的情况，可能有些意义。除了政治上的兴趣之外，我也有去那里访问我们各个分公司的实际需要，即使只是为了去鼓舞和安慰我们那些忠心耿耿的英国和印度雇员们，何况还要去处理一些面临的迫切问题。同时我无疑能看到多方面的一些情况。约翰·温德翰和我同行。他表现了战争年代的那种组织才能和对我生活的照顾，并将在以后年月里继续慷慨地献身为我服务。

我们去的时候正逢上重要关头的那一个月。因在我们回来前，白厅已作出重大决定，要把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明确告一结束。这以后的一年，甚至《纪事年鉴》的客观撰写者也把它描述为

自从普拉西战役以来印度历史上最关键性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们看到：它分为两个独立国家，英国统治结束，数目达上百万人的大批移居，而移居之前则伴随着惨绝人寰的残杀和破坏。^① 243

我们在1947年1月24日抵达孟买。穆斯林联盟虽然还在抵制立宪会议，但在德里的临时政府中已和国大党代表分摊部长职务。1月22日，会议中的印方成员申述他们坚定而庄严的决心，要宣布印度为一独立的主权共和国。次大陆的所有领土都属于它的疆界之内，但这些领土形成一个联盟，它们在其中“具有并保持自治

^① 《纪事年鉴》，1947年，145页。

体的地位”。这项颇为晦涩的声明只产生一个积极的结果。1月31日穆斯林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宣称英国制宪计划已告失败，并认为立宪会议的一切措施都属无效。这以后自然出现了一段局势日益紧张甚至无法忍受的时期。

然而，正如我在许多危机时刻所经历过的那样，表面上一切看来颇为平静。自然，我在孟买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同印度作家、教师、教育家和行政人员的交谈上。所有这些人看来非常友好，并对他们的英国朋友和同行表示真挚的感激之情。由于教育事业早已掌握在印度人手里，这无疑使我们比较容易相处。此外也是由于印度人天性彬彬有礼。但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我所接触的许多人中，不论老少，很少人对英国的多年统治表示痛恨或有什么批评。不过，他们对于未来确实怀着一种真诚而且几乎感人的热情：

这些教育家的激情，乃至兴奋，不禁使我深受感动。他们一想起印度的“解放”及其此后的进步，显然都意气风发。^①

我们公司的一些经理人员和印度作家们，都预计在高等教育和成人普及识字教育方面的图书销售量将大为增加。他们对眼前几年的事肯定一点没有表示出什么惊恐甚或担忧的样子。

关于英语在今后教育上的作用，大家讨论得很多，但很少一致意见。大多数从事实际工作的教育家，对于能否用印地语或其他语言来代替（英语）——除了小学以外，都表示怀疑。我在一个星期内参观了许多中学和大学，还参观了化工部和科学院。孟买大学副校长对我的接待特别客气，我所会见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只关心他们的教育事业，而不甚注意整个政治局势。

把报纸上那些充满仇恨和愤怒的胡说八道，同这些受教育人士的态

^① 1947年1月27日。

度比较一下，是很有意思的，虽然他们大多数人(至少在名义上)也许都是民族主义者。^①

同时我又会见了代表各大公司的一些英国商人。我在孟买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们设宴招待，到场的人相当多：

确实是有意义的一次晚会，大家谈论得很多很坦率。一般的看法是悲观的，虽然有些人觉得，如果(大成其问题的“如果”)这个国家居然还能团结一致，那末英国当局撤走后，我们还该是能做生意的。^②

在这之前几天，我曾出席孟买商务局组织的一次会议：

讨论了很长时间，有意义，但殊无结果。一般人的意见显然是：(a)很不可能再走回头路；(b)继续这样走下去不大会出现什么好结果。无非是尽人事而听天命的那么一种气氛。许多大企业都在出让。^③

在整个访问期间我们都下榻政府大厦。总督约翰·科维尔爵士是昔日下院旧友。当年到印度旅行过的人都会记得那里的条件和款待是高标准的。我们住在大院里的一所小平房，仆役很多，凡有所需，随叫随到，并且有时甚至主动提供。多年之后在我作为首相访问印度时，也得到同样慷慨的接待。 245

总督邀请一些印度人士和我共进午餐。其中有一人是莫拉吉·德赛，当时他是孟买内务部长：

他能干，健谈，言之成理，教育程度很高，(进过威尔逊大学)……作为在孟买执政的国大党政府部长级成员(根据第九十三条规定，在总督统治三年或较长时间以后)，德赛负有维持该省法律与治安这一项不是令人羡慕的差使。^④

虽然总督很愿让我同所有政界领导人见面，但我们商量的结果觉得在目前局势下，最好还是只让他邀请几位可靠的老朋友。大体

① 1947年1月30日。

② 1947年1月31日。

③ 1947年1月29日。

④ 1947年1月25日。

说，我觉得所会见的人态度友好但精神不愉快。我也同总督和他的部下晤谈多时。在印度工作的那些老公务员对目前局势自然感到伤心，但总督却显得沉着坚定：

科维尔觉得韦维尔和英王陛下政府不必要地走得太远，办得太急。但事已如此，不可能再把政策倒过来。我们只能“等着瞧”。但科维尔并不像这里有些人那样抱着失败主义情绪。他认为局势的发展至少会使印度留在英联邦内，尽管国大党有那些豪言壮语。^①

2月1日我们到达德里，作为总督的客人在那里住了五天。我不打算描述新德里的市容，因为许多英国游客都很熟悉，在许多关于艺术和建筑的书上都已讲得够多了。在那种时刻住在总督那个非凡的宫室里，确实是有点惊奇。这是一座印度的凡尔赛，是正当英国统治快要结束的时候，在一种几乎是莫名其妙的高傲（或者莫如说是愚蠢）的行动下修筑起来的。从里里外外来看，这都是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有布置得富丽堂皇光辉夺目的大小客厅。那些花园的设计和施工，可以说是巧夺天工的人间奇迹。十年后我去重访时，该处已成为印度总统府。此时接待我的差不多是最后的一任总督了。

我在战时未曾会见过韦维尔勋爵，因我去北非时他已离开中东。他接受去印度的差使是很违反他本愿的，只是出于责任心才勉为其难。他在那里已工作了五年光景。正如每一个会见过他的人都会感觉到的，在他身上质朴庄重兼而有之。他显然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并有一股精神力量引导着他，使他能在许多关头临危不惧。在我们第一次短时晤谈中，他让我尽可能多接触一些人，并在临走前把所得的印象告诉他。不过，我在这首次晤面后颇感茫然：

午餐后与总督晤谈。从他嘴里很难探听出什么情况。他显然明白

^① 1947年1月31日。

我们该走了。唯一的问题是怎么走。我问他若要重建英国统治需要多少力量。他说五个师和一千名行政人员。这个数目小得使我吃惊。只要想想我们用在德国、的里雅斯特、希腊和巴勒斯坦的力量就够了。①

德里的自然条件比孟买更为舒适。这里夜间凉得需要生火，白天则温暖宜人，犹如家乡的6月晴天。我拜访了一些教育家，其中有印度中央政府教育顾问约翰·萨金特爵士，他认为在全印大学里采用“国语”印地语颇成问题，但相信总有一任政府会强制推行。我又会见了梵文和阿拉伯文的大学者莫拉那阿萨德，他盛赞麦克米伦家族在印度做的好事，极其奉承地对我殷勤招待。但在德里，特别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谈论的事当然离不开政治局势。尼赫鲁邀我进餐，这是第一次同他谋面。但因席上还有几位其他客人，有印度人和英国人，

谈话内容轻松，时时改变话题，并且温文尔雅。（不断谈到领略过的铁窗 247 风味，这是唯一刺耳的话题，但提起时也说得轻松、幽默。）②

这位杰出人物以后同我有深交，并在后来领导印度渡过头几年的独立生活起了巨大的作用。当时我把对他的首次印象记录如下：

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克什米尔地方高级婆罗门阶层人士，知识分子，哲学家，作家，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革命家；风度优雅而稍带浮华，是位可敬可爱的东道主。多年的铁窗生涯——或者莫如说是软禁——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据我判断，他一方面对英国人深切痛恨，一方面又愿表示公正客观，而感到难以自解。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神经过敏，易于冲动而且矜持。几个月来他已经对掌权有了些经验。甚至在英国残留势力——而这并非微不足道的——的支持下，这已经使他花了很大力气。他已经体会到当权不像批评那么容易。③

① 1947年2月1日。

②③ 1947年2月3日。

我认识到尼赫鲁是具有头等才智的人,但不甚肯定他

能经得起危难……的考验与折磨。他不是能经受大风大浪的人,只是风暴后飞翔在海上的小鸥。^①

这个判断错了。因为事实证明尼赫鲁的勇气和坚忍并不逊于他的才能。

次晨,我同一位几乎有同等权威的人物赛达·巴特尔晤谈了一小时:

是个给人深刻印象的人——迄今所见过印度人中我觉得是唯一具有个性和勇气的人。样子颇像一位罗马帝王,尤其是因为他披了一条白毯子(这是印度教徒在冷天用的),加深了这样的印象。他对共产党表示愤慨,认为是一种非印度的运动,应予抵制。他不让人家谈别的,只许谈他想要谈的,并且突然结束了会晤,但并无真正失礼之处。他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到尼赫鲁等人,但有一两次轻蔑地谈到“那些想靠言谈而不敢行动的人”。巴是印度的贝文。^②

248

与巴特尔截然成为对照的人,莫过于利亚加特·阿里·汗了。他是新成立临时政府中的穆斯林联盟代表。我对他特有的魅力和彬彬多礼深有印象。他很像我们英国一位有教养的乡间绅士,有丰富的藏书,喜爱户外运动。然而就像他这样好脾气的人也有满腹牢骚,并且毫不隐讳:

他说话之中的牢骚比我预料为甚,因他是个出名的温和派。他责怪内阁使命团和总督,不该一而再地被国大党的诡诈所欺骗。他们(国大党)每次办事总有什么保留和例外,从不坦率。他觉得最近真纳的声明,使作出决定的责任落在英王陛下政府方面了。整个计划业已失败。^③

我指出,印度或世界其他地方的中间派舆论也许不这样认为。关于内阁使团计划的确切形式的那种纠缠不清的辩论,人们是不会

① 1947年2月3日。

②③ 1947年2月4日。

老留在记忆中的。然而突出的事实是：国大党参加了立宪会议，而穆盟却拒绝参加。对此他并无异词，但

觉得穆盟不能让自己越来越深地陷入尼赫鲁(在英国政府纵容之下)所设的圈套。^①

然后他十分明确地说，他认为英国政府面前摆着三条道路：

1. 继续谋求公平解决，从而使印度开始走向前途光明的独立道路。
2. 放弃这项工作，到确定时日离开印度，让印度人自己通过协议或通过内战解决问题。

3. 因循坐待事态恶化，直到中央和各邦的一切行政机构垮台，弄得 249 印度既不存在英国人的统治，也不存在印度人的统治，而只有一团糟。

他认为(1)是正确的道路——不辜负我们过去历史的唯一正确道路。(2)也是合乎逻辑的，如果我们觉得挑不起这副担子，那也是情有可原的。(3)是不光彩的。

接着他愤愤不平地谈到旁遮普省的情况。虽然穆斯林联盟在八十六个穆斯林席位中获得七十九席，但因“偏重”锡克人，和穆斯林里面的少数“吉斯林”^②分子，使总督在没有穆斯林真正支持的情况下，得以组成联合政府。他应该先同最大的政党穆盟打交道。他只应在穆盟组织政府失败后才去搞联合政府。阿里·汗似对总督的这一决定十分恼火，他认为这样做是不公平的，这只能被人解释为对穆盟的明确歧视，甚至可以说是对穆盟的阴谋。

我问他，在这种分歧的情况下，中央临时政府能否存在下去。他回答说，这不是真正的政府，这是总督的顾问会议，由总督凌驾其上，里面的部长只求保官，但它从任何意义上讲不起政府的作用。^③

我仍然争辩说穆盟拒绝参加制宪会议是不明智的，并告诫他英国公众舆论是不能理解他们这种态度的：

^① 1947年2月4日。

^② 二次大战时挪威卖国与纳粹合作的政客，以后作为‘叛卖’的特称。——译者

^③ 1947年2月7日。

他们最好是参加“会议”，而在他们认为不能满意时另行提出少数派的报告，或在其后再退出。他说“北爱尔兰将要战斗，北爱尔兰是正确的”，或者说了类似的话。^①

我在德里的少数几天中，荣幸地列席了中央议会的一次会议。会议程序是我所熟悉的，因那是仿照我们下院的。开会时间是上午十一时：

250

质询了一个小时。然后动议中止质询以讨论“迫切的重要公共问题”——这样的动议提出了二十次。议长让大家随便发言，但之后裁决他们都不合程序。

下午讨论一个关于减少公务员贪污行为的法案！这是内政部方面的议员巴特尔提出来的。说来奇怪，所有发言者并未攻击英国人，而是使劲埋怨他们自己不好和进行精神自瀆，这是很奇怪的事。^②

在离德里去勒克瑙前，我与韦维尔进行了一次历时颇久的谈话，透露了不少内情：

他告我说现在他认识到，1946年5月他认可国大党对〔内阁使团〕计划所表示的同意，这件事他做错了。国大党在思想上和其他方面的许多保留，实际说明他们并没有真正接受；但内阁使团对他进行说服，他违背自己的较好判断加以认可。他当初希望只要能让两党一起工作，那末事态发展的逻辑就会使他们一起干下去。甚至A. V. 亚历山大（他通常在他与克里普斯意见相左时是支持他的）也这样劝说总督。

韦维尔担心国大党不久就会要求临时政府中的穆盟部长辞职，而如果拒绝他们的要求，他们的部长就会辞职。总之，我觉得他几乎是个凄凉可怜的人物，甚为孤单，很少顾问和心腹，对他自己该做些什么，或对英国政府打算怎么办，心中无底。他似乎只能听天由命。他最后一些话里给我的印象是：

事态在急剧发展——比国内人所想象的更为急剧。虽然目前还可能重树权威，但已经越来越难办到了。^③

①②③ 1947年2月4日。

下午我们离开德里，脑子里始终未能忘怀韦维尔这个悲剧性的人物。

到勒克瑙，我们又下榻政府大厦。我先去造访大学副校长拉贾·比谢希沃·达耶尔塞思，他对我非常客气，但对国事一概不谈。其后我同联合邦的副总督法朗西斯·怀利爵士进行了一次有益而有趣的谈话：

他是北爱尔兰人，妻子是南爱尔兰人。他这人不同凡响，非常机智 251
幽默，说话有力，行动果敢，给我的印象好极了。①

谈到政局，他看不到有什么解决办法：

他认为议会民主制不适宜于印度。印度是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国家，彼此分歧很深，壁垒森严。搞议会制度要先有政党，然后谋取政权。一有少数民族，这件事就办不到。同时他又觉得我们这方面已经不想再管也不再受到欢迎。印度的斗争问题是谁继英国拉吉之后来做拉吉的问题。②

次日造访当权国大党政府的教育部长森波纳南德博士。他语气激烈然而面色平静地向我述说了他对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的看法。英国人在中学讲授的历史都不对，而且怀着“不可饶恕”的偏见：

目前教给孩子们说历史上有印度时代、穆斯林时代和英国统治时代。我们必须教给他们国民意识——只有一个印度。③

可惜他这“一个印度”的希望不久就归于落空。

接着又去造访尼赫鲁的妹妹潘迪特夫人，当时她是地方政府部长。我和这位教育程度很高姿色动人的女士这次是初见，其后成为很有帮助的至友。

① 1947年2月4日。

② 1947年2月4日。译者按，拉吉是掌权者或主权的印地语。

③ 1947年2月5日。

她坦率告诉我，国大党只能在英国人走之前保持团结。这以后，那些老的右翼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就将失势，左翼将握实权。（这当然反映了尼赫鲁和巴特尔之间的深刻斗争。）^①

潘迪特夫人真心希望别人不要把国大党看成印度教徒的党，而应把它看成是全国性的党，这对我印象很深。她认为宗教的国家一定要变成世俗的国家才行。说句公道话，尼赫鲁和他的心腹是为这一目的而斗争的。

上午其余时间我们去居留地，参谒了所有地方和那场出名围城战中的每个据守点。多亏寇松勋爵，整块场地保持完好。这是世界上英国国旗昼夜不降的唯一地方。从它升起之后从未落下过。^②

尽管我深信印度走向独立的过程不可避免，但在这样一个时刻来参谒这独一无二的纪念物，总感到黯然神伤。

我们从勒克瑙搭火车去加尔各答。第一天（2月6日）我就去公司的办事处，也像在孟买一样，被公司人员按例行方式盛会欢迎，包括讲话和戴上花环。这些礼节也是印度生活中令人愉快的一个方面。

在加尔各答我们先住旅馆，然后下榻出名的政府大厦，那是一所仿凯德勒斯顿大厦的建筑。不久前这里发生过一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之间的严重暴力冲突，双方死了许多人。这场可悲但又极寻常的冲突，给一次非常盛情招待的宴会投下了阴森可怖的影子。东道主毕斯瓦斯博士同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自然》杂志的编辑布灵布尔先生是好友兼同事，宴会在著名的植物园举行。赴宴者是有代表性的名人，我感到他们给了我极大的荣幸：

我被当作王公大人似地受到接待，每位客人都依次介绍到我跟前，寒暄几分钟。他们同英国人会见是多么真心感到喜悦（不谈政治），对他们稍致问候他们是多么高兴。^③

①② 1947年2月5日。

③ 1947年2月7日。

当我们坐在河边那著名榕树荫下的凉台上时，处于各种腐烂程度的尸体从上游飘下来。一些鹭鹰在追逐啄食。但由于鹭鹰不是水鸟，它想抓住对它来说似乎是最大的珍馐——尸体的面部特别是眼球，就很难办到，如果想达目的，往往要有生命危险。一只鹭鹰奋身俯冲攫向尸体面部，但在尸体被抓时即开始下沉，它只好赶紧往上飞，才不致淹死。温德翰和我为怕失礼，自然假装没有注意到这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但与席上典雅玄远的高谈阔论相陪衬的这个背景，却具有一定的引人深思之处。如果不计这些打扰，那么所有宾客的情绪都是开朗乐观的。他们似乎都希望能找到某种办法，使印度保持团结并仍为英联邦中的忠实成员。但大部分谈的是关于科学和教育之类的事。 253

晚间有立法会议中的欧籍人士设宴招待我们。我觉得我的一位老同学爱德华·本塞耳爵士同余人相比犹如鹤立鸡群：

赴宴者几达二十人，对这一路线与那一路线反复辩论，一直进行到午夜以后。和通常一样，没有出现什么很新或很有裨益的意见。商界人士很耽心以后会提出带歧视性的法案。^①

同在孟买时一样，我走访了几位教育家，其中有些人是我们的作者。最有趣的一次是到 H. C. 拉乔达里博士家去作客：

他同马琼德博士两人最近合作出版一本印度史。拉博士是个老病号。他卧床同我们接谈，在场的有马琼德博士以及好些儿子、女婿、女儿、媳妇等人。谈了许多海阔天空的事——对希罗多德这个历史家的评价——递上不少次茶和糖果，一次很具特殊风味的聚会……

这是在一个典型印度知识分子家庭里的一次确实很有意义的经历。^②

下午，加尔各答大学英语系主任巴塔却里耶博士带我去大学，

① 1947年2月7日。

② 1947年2月8日。

在一次正式茶话会上见了副校长班纳奇教授和所有教授：

递了茶，致欢迎词；我提了几个费思索的问题；副校长和其余人发了言；我再讲了话，然后到校内一些楼里转了一下。

当然，大学几乎是全归印度人管的。他们很耽心孟加拉来个穆斯林政府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来。^①

这里我又深感这些教授和教师的观点多么温和，他们对我接待之周到与尊敬几乎使我难以为情。到处不断遇到的这种感受，使我更加坚信，未来最大的希望，在于这些教育程度高而说话负责的人所起的影响。

此刻我们自旅馆迁入政府大厦，那里舒适得多，并给我另备一间房专门接待来访者。这些人中有孟加拉邦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默克其博士。他曾三度出任副校长，并多少还控制该大学：

从政治角度讲，他有相当权势，虽然暂时与国大党失和。作为婆罗门阶层的正统印度教徒，他是孟加拉邦马哈撒巴（印度教徒中相当于穆斯林联盟的一类组织）的领袖。他们这一派在选举中被击败，但他仍在孟加拉议会中保有席位。他常常出入政界。身材长得好（高大而又结实），言之成理，机智善辩，颇像我经常接触的一些法国和意大利政客。他请求英国确实应该理解孟加拉的处境。穆斯林略占多数（百分之五十三对比于百分之四十七），其优势主要在东孟加拉。但全部文化、一切财富和加尔各答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印度教的。^②

听到一个印度教徒为少数派人说话呼吁，这是颇不寻常的事，因在大多数地区，情形正好相反。

他反对按社团来分配代表名额，认为那违反议会制的整个精神，并必然导致社团间敌对情绪加深。他追溯往事，把这错误归咎于明托勋爵（莫莱勋爵从来不赞成这个），并认为关于孟加拉邦的麦克唐纳奖金是一桩致命的错事。^③

① 1947年2月8日。

②③ 1947年2月9日。

我回答他说，从逻辑上讲他的论点当然正确，但从这似又可得出结 255
论，那就是只有让英国人在印度呆下去，才是少数派唯一可靠的保
障。不过默克其博士的观点是很明确的：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是让[制宪]议会(即使没有穆盟参加)定出
一个宪法条文。他说我们应保留修改宪法之权，其目的有(而且只能有)
两个：(a)给少数派以适当的保障；(b)保护英国商业利益。然后我们应
把它正式通过作为法律，并让一个印度政府来接管。我问他这是否会引
起内战。他说——也许。但我们应尽力而为之，那就能安心离开印度！
目前，他深恐这样得过且过的政策会导致一切行政工作的总崩溃和一场
混乱。①

我又会见了欧籍人协会主席罗安·霍奇先生。他是个很机警
的人，善于抓住新问题，但

我清楚知道，欧籍人协会和商会确实还没有预见到独立(因其不同于自
治领地位)的后果如何。英国政府也是这样。如果确是独立，那末以前
任何条约都将成废纸，除非是在分治后与一个独立的政府商定。如果是
自治领地位，商业上的保障只要通过一宗法案即可获致，并得到加强。②

我们同总督弗雷德里克·勃罗爵士单独进餐。这位总督思想
迟钝但通情达理。他曾在大西部铁路公司呆过，是一位呱呱叫的
工会领袖。他的观点多少有点与众不同，特别是讨厌一切政客。

餐后他领我们到他住所，饶有风趣地跟我们讲了一件他在这里的经
历。沉着的慢性子，然而非常精明，这个搞工会工作的老手能一眼看穿别
人的虚伪和似是而非。真是个坚定的人。③

2月10日我们搭机去马德拉斯，在那里受到总督阿契巴尔德·
奈伊的盛情接待。奈伊以前是帝国参谋总长的代表。席间喜逢理查
德·奥康诺爵士将军(副官长)，自从他同副司令尼姆将军从意 256
大利脱身到我在阿尔及尔的别墅以来，这些年一直没有再见

①②③ 1947年2月9日。

过面……①

此外还有马德拉斯的一些知名人士。其后几天来访者不少，最重要的客人是马德拉斯大学副校长，此人倒是宁愿谈政治而不谈教育的。这位惹人喜欢而有教养的印度人说出来的观点，使我不禁莞尔。他说如果新当选的政府要推行禁酒法令，他们将失去绝大部分的税收，对此他只能深惜他们的愚蠢。那样的话教育事业还办得下去吗？

马德拉斯有许多值得凭吊之处。我们去看了古堡——英国人在印度的最早据点之一，又去参观那在1680年修建的古老的圣玛利教堂。该城这部分地区出奇地幽美，充满了诗意和历史古迹。2月23日午餐席间，除总督和总督夫人奈伊女士外，只有首相T.普拉格萨姆。他似心事重重，因为有一个反对他的牵连复杂的阴谋，只有国大党最高当局才能解决。因此他即将离开，先去德里，然后去东孟加拉：

归根到底，“国大党辉格派”②中究竟哪批人来掌马德拉斯的权，要由老头子甘地来决定，而他目下正在东孟加拉农村步行朝圣（还有报馆、电台记者、摄影记者、警察和脚夫等随行）。③

马德拉斯似比加尔各答或德里平静得多，看来谁也没有认识到危机即将迅速到来。从马德拉斯我们又折回孟买，这次下榻塔吉饭店：

应总督大人之邀，于六点半去政府大厦晤谈。他听到消息说英王陛下政府决定将于今年5月1日结束国务大臣的工作，甚感忧虑。如果有关人员得到合适工作，他们肯定愿意回英国。其他不能这样安插的人，如

① 1947年2月10日。

② 英自由党前身，其含义相当于“左派”。——译者

③ 1947年2月13日。

果没有英国政府给予保证,也不敢再在这里呆下去。因此,(a)无论在中央或地方(根据第93条),英国政府用以恢复行政管理的能力将受到致命削弱;(b)新政府在过渡时期及最初阶段,将失去在印公务工作经验这一巨大财富。^① 257

翌日,2月17日,从新德里不断传来许多谣言:

巴特尔接见美联社记者谈话。甘地致紧急密函与尼赫鲁,阿里·汗在阿利加尔大学发表宣言。一切迹象表明新危机已临近……

同时令人高兴地看到报载巴特尔拒绝干预马德拉斯危机,这意味着普拉格萨姆先生(国大党总理)将要败北。这是因为德里有他的政敌拉贾哥帕拉恰里,此人是国大党在马德拉斯政界的铁腕人物。但这仅是地方性个人之间的纠纷。不过据说普拉格萨姆同老头子甘地的关系不差,所以这位老头子(他同巴特尔的关系不好)还可能救他一把。^②

不过同那即将到重要关头的大事相比,这不过是小纠纷。临时政府已土崩瓦解。据说财政部长阿里·汗拒绝向他的国大党同僚透露预算。尼赫鲁已向总督书面申诉并接获通知(或者这样传闻)说他应等待英国政府即将发出的声明。与此同时,阿里·汗声明只有让巴基斯坦成为独立国才能满足穆斯林的要求。

在这种局势下,我迫切期待同真纳会面(这是阿里·汗给安排的)。这在那最关键性的一天2月17日晚实现了。我们上午八点离开孟买,中午后到达卡拉奇。

我们驱车去马利尔的巴哈华尔普尔宫,该处离卡拉奇八或九英里,那里真纳和他妹妹法蒂玛住在一所舒适的别墅里: 258

路口有武装警卫严守,宅院四周围有铁丝网。先由一位秘书接见我们,经证实我们的身份并在秘书处一间平房稍等片刻(我们比约定时间到早了一些)后,就被领入主楼。真纳先生和他妹妹接待如礼,并递了茶……

① 1947年2月16日。

② 1947年2月17日。

真纳外貌奇特，瘦得几乎骨立，手指很长好像全是骨头，面部深陷，头像骷髅。说话声音低沉但十分动听，显然是在费力控制下发言的。这人大部分神情显然像是个雄辩家或者确实像个演员。

真纳小姐披着长长白发，面庞秀美，长像几乎是她哥哥的复制品。①

进茶后，真纳小姐和约翰·温德翰出去，我们开始谈话：

说了几句向丘吉尔先生，约翰·安特森爵士，艾登先生和巴特勒先生殷勤问候的话之后，真纳先生就发表起他的演说来了。这番话显然是他已说过多遍而且非得让人一口气听完不可的。尽管大部分内容我早知道，但任何想使他少说几句开场白早谈目前局势的尝试，都被他有礼而坚决地顶了回去。如果我关心他怕他多花时间怕他累，那么这显然不会受到欢迎，反而会引起厌恶……真纳显然是孱弱而神经质类型的人。工作与忧虑使他体质衰弱，进茶之际他诉说去年的劳顿跋涉之苦——同内阁使命团长时间的讨论和争辩；迁徙西姆拉；旅游伦敦。②

当时真纳日趋衰老，但显然还有可观的余勇，使我感到坚强的意志能支配孱弱的躯体。他那辩论的风格和论点运用自如的本领特别使我感动：

259 那“老一套”的演词讲得很妙，主题考虑周到，用词简明有力。他一定是个第一流律师。他的手法之一（这无疑在公开演说场合用得更多，但在私人晤谈时也不忽视）是：先给听者讲些四平八稳公正不偏的道理，然后突然把强烈的结论摆出来。③

大体说，他的立场如下：

统一的而似乎又是民主的印度，那是不可能的。印度在不同时期曾被印度教徒、穆塞尔曼（他总是说穆塞尔曼，而不说穆斯林等等）和英国人用武力统一过。这种统一只有在专制政体（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下才有可能。它从来不是也不能是以人民的真正统一为基础的。分歧太大太深。它们超过经济的和社会的分歧。这种分歧是根深蒂固的。印度并非一国，它是个大陆——或次大陆。它决不能只是一个国家。④

①②③④ 1947年2月17日。

我冒昧插问“那末为什么你接受内阁计划？”他回答说，他只是在极大压力下并冒着丧失威信的大危险才同意的：

毕竟你不能永远争辩下去。我们争论了几个星期几个月。能不能有统一的印度毕竟只是个论点或意见。最后我同意让实践来考验。^①

他接着指出，如果忠实执行内阁计划，必然包含如下保障：

第一，民族集团制；第二，每个集团有权制定自己的宪法；第三，归中央掌管的事务——防务、外交、交通，应有局限性；第四，要有一定安排，不能让中央权力增大，除非经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各个集团中分别投票的多数认可；第五，计划是暂时性和试验性的——只管十年，保有此后修改或分治的全部权利。^②

出于这些理由，他才无保留地接受内阁使命团所提出的计划，不管是短期安排还是长期计划，包括组织临时政府和制宪议会。然后²⁶⁰他以无情的逻辑和大量的引证，逐点说明他所谓的国大党方面的背信弃义：

在这一问题的迄今为止的曲折过程中，他们在任何阶段从没有诚实而无保留地接受过计划。但通过巧妙的策划和宣传，由于英国政府方面的动摇和软弱，他们才取得这样一种地位，让人看来，好像他和他的朋友们的被委屈了的。诚然他在7月29日正式收回他对计划的接受态度，但这不过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立场，因为无论是国大党，或是锡克教徒，或是所划分的各阶级，或者是王爷们，都未曾接受过。而尽管他提出抗议，选举还是照样举行了——各邦政府还是组织起来了；中央临时政府还是成立了，人们就一点不管计划本身而一任整个局势恶化。^③

真纳显然对他所受的待遇，特别是对总督在成立政府问题上的改变立场以及愿意不理睬国大党方面的保留，深感遗憾。（同时，这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韦维尔在最近一次谈话中自己表明遗憾的事。）

^{①②③} 1947年2月17日。

甚至在他们目前的宣言中，关于锡克教徒的那些保留条件，关于提到各邦乃至一邦的一部分（在选举前）有权决定退出的问题，以及其他各点，国大党还是回避和歪曲了那个计划。^①

所以，自从他真心诚意接受英国政府的建议后，局势已经变了：

虽然相信不可能有统一的印度这一基本现实，他仍然为了和平而非本愿地接受了计划。但国大党从未改变或动摇过。他们的目标是要一个统一的印度，不管是立即组成还是分阶段组成，要有一个上层印度教徒能把他们的意愿和统治强加于人的印度。^②

真纳宣称，英国政府如果讲道理讲公平，也只能得出相同的结论。

261 他说这些话时，我清楚知道他的政策是坚守原来立场，等着瞧：

如果国大党以退出临时政府和各邦政府相威胁，得以迫使英政府把穆斯林驱逐出临时政府，并听任（制宪）议会进行工作，穆盟就要抵制这一切行动而等待时机。最后决定命运的一举必然到来。那时什么也阻挡不了印度一场内战，于是就会出现混乱、破坏、血流成河。^③

其时我问他，他认为英国政府该怎么做。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英王陛下政府在法律上和道义上地位很强。他们的实力地位仍比他们所想像的要强。他们应该对印度和对全世界这样说：“我们试过了，我们做到了几乎超出仁至义尽的地步。我们请你们拟出一个计划来。谈了几个月之后你们还是没有搞出来。于是我们就拟出一个来。我们相信并希望你们是诚心接受了的。但事实证明你们没有接受，于是计划就告失败”。^④

“不错”，我说，“但往下说什么呢？”他在回答以前，向我申述了英国人愈来愈示弱的情况，和纵容国大党在我们眼皮底下所做的那些事：

①②③④ 1947年2月17日。

第一，他们在把自己形成一个军事组织。他们在起用印度国民军中的不忠诚军官，而把忠诚的军官排除或降职。第二，他们在国大党各邦内施展全力攫取行政机器。第三，他们（显然在我们鼓舞下）正在听任出现一种事实上的自治局面。内阁计划中的两项附加条件——（a）提请英国议会，（b）英印间缔结满意条约——正在被忽视或被认为过时。第四，如同在比哈尔（他声称那里的残杀是由国大党高级人士组织的）的情形一样，有出现恐怖统治的危险。^①

但这些话并未回答我的问题。因此我追问他，请他坦率提出英国政府目前该做和能做的事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明确的：

1. 我们可以宣告，在某个时候我们可以离开印度。我们曾试图把政权移交给组织得很好的后继者。我们失败了。我们要走。

2. 我们可以宣告，由于一切别的计划都已失败，我们要维持我们的统治。一切走向独立的步骤（比方说在十年内）均应停止。

3. 我们可以照着现在这样做下去——随波逐流，听之任之，直到（其时我们没有干预的力量而仍负有责任）冲突到来而印度浸于血泊之中。

这三者之中，他认为（1）与（2）只是理论上的计划。实践起来都无法采取。（3）……看来有可能，但后果可怕。它将使我们一百五十年以上的整个工作毁于一旦，给我们带来物质上的损失，并在精神上受到全世界的谴责。上百万可怜、无辜、无靠的印度人的流血将归罪于我们。^②

不过还有第四条道路，但必须立即并且坚决执行：

我们应宣告，内阁计划由于无人真正接受，已告失败。我们应平心静气然而又不留情面地摆出事实，不给谁打掩护。

但我们应请A，B和C三方面会谈，让各方都组织一个制宪议会，各自制定合适的宪法。然后他们成为分开的三个组织，各自独立。然后应请他们自由会谈，决定他们要对交通、贸易等等（通过条约，像主权国家之间那样）能作出什么安排，正如挪威和瑞典所做的那样。

^{①②} 1947年2月17日。

如其中有一方不愿这样做，我们应允许〔其他〕两方按照所建议的那样制定宪法。对那个不听话的一方，我们就自己给制定。

263 三个主权国之间以及他们和我们之间，可以自由商定各种条约。那样可以明确看出哪儿方愿意同我们站在一起。①

至于这里的各方或各集团，自然是指内阁使团计划中所说的那些。真纳有一切权利把这看成是讨论的中心，尽管大家对此逐渐淡忘。他最后说的话，非常近似于提出穆斯林各邦将愿意和英联邦站在一起，并可能的话和英国商缔确定的盟约。

说完最后这些话，真纳就突然中止会晤。再没有别的话可说的了。说了几句客气话并要我代向他的英国朋友问好之后，他领我到花园，那里我就同他和他的妹妹告别。

真纳先生无疑具有了不起的才能。是个条分缕析清楚透彻的说理家，并善于阐明他的观点，他又是（而且这样两者结合的人很少）一个彻底真诚而有坚强个性的人。你若承认他的基本假设成立，并认为是基于对现实（除了辩证方面以外）局势的正确估计，一切别的结论就都随之而来。如果不可能有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印度国家，那么不是回复到专制，便是必须分治。另一方面，真纳似乎仍生活在过去的时代里，他夸大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间的根本分歧；他没有看到更持久更深刻而且也许此后定将成为更重要的分歧，例如经济困难之类的分歧；他低估了向心力，和人民对一项计划所抱的希望，那项计划（在开头阶段）对国家权利那么强调而给予联邦的权力那么小；如果席卷东方的那股现代——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势力，终将使这些目前看来如此难以克服的分歧成为过时的东西，并使目前似乎不可逾越的鸿沟弥合起来，那么比较可靠比较明智的道路，确实应该是坚决推行印度独立，组织国大党政府，即使包含着一些危险。但只有那些深信印度事务或对印度人的生活与性格有广泛经验的人，才有资格作出这一重大决定。②

264 翌日下午我去参加新议会开幕典礼：

①② 1947年2月17日。

一场很有意思的表演，颇像模拟英国下院的游戏。两大民族的分歧这里可以看得最明显——国大党印度人围着腰布，戴甘地帽；穆斯林则从西服加土耳其帽，一直到穿俾路支部落服装的都有。^①

议长当选后发言占大部分时间，多数是答覆议员所争论的问题：

他并不把议员针对他的发言，看作只是一种形式。^②

这在我国早期议会里无疑也有这种传统，当时议长惯于发表长篇大论的讲话，并在某种程度上被人看作是议院的领袖。

晚上，首相 S. G. 侯赛因·海达亚塔伦来访：

是个有经验的老政客，当信德是孟买辖区的一部分时，他曾在各届总督的行政议会中任职，并在适当的时候辞职。^③

他似乎很了解政局，并熟识各方面的领袖：

他告诉我说，早先(在他还是国大党人时)真纳常说他(侯赛因)是个“英国代理人”。但他总认为穆斯林不能两者兼得。他们不能一面骂英国人，一面又向英国求援。现在弄到如果再让步，连真纳也不能使穆盟听从他了。^④

首相认为，真纳同意内阁使团的计划是冒很大风险的。不过此举在战术上是成功的，因为国大党原来就指望穆盟拒绝。

现在没有办法了。穆斯林不愿接受印度分阶层统治的歧视办法。他们 265 不愿改换(而且是更坏的)主子。印度将有内战，除非我们坚定，并强制推行一种解决办法。^⑤

他也并不认为英国政府应该屈服于国大党要退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威胁。他认为他们不会急于这样做的，并提出一些讽刺性的理由：

他们住公房，听差、住房、水电暖气都不花钱，还有三万卢比的家俱津贴——还有生活简朴的好名声。他们不会放弃这一切的。如果他们放弃，别人会愿意去的。^⑥

①②③④⑤⑥ 1947年2月18日。

他让我带给丘吉尔和英国朋友的信息是“别理会国大党的讹诈”：

这位穆盟领袖讲话时始终吸着一根高级雪茄，并不断喝总督府的威士忌和汽水。总之他老迈而颇为衰弱，我勉为其难地……搀扶他走过一大段路送他上车。最后他捶了我一下肋骨，会意地使了一个眼色说，“印度有两个，一个是喝威士忌的，一个是不喝的。”说完这句莫明其妙的话后他摔了一跤，被人扶起抬进车里离开了。他总戴着那顶羔羊皮帽。真是个好有意思的人。^①

2月20日我们终于离开卡拉奇。五点半抵开罗即去英国大使馆，“那里我们听到艾德礼发表声明和韦维尔下台的消息。这整个事件就此戏剧性地收场！”

现在真相大白。政府决定“离开印度”并确定走的日期。2月20日首相在下院代表政府宣读声明，通告“他们明确的意图，将采取必要步骤，在不迟于1948年6月的一个日期，把权移交给印度人手里。”他接着解释，如果内阁使团的计划失败，而有充分代表性的制宪议会未能在规定日期前制定宪法的话，政府将再考虑是否将全权移交某种形式的中央政府，或在某些地区把权移交给各邦政府。他们将按照最合理最符合印度人民利益的方式办事。对印度各邦来说，交权后最高主权原则将失效。在这期间中央当局可以同印度各邦进行商谈安排未来。许多问题有待解决，许多事尚无头绪。但有一件事已经决定：英国统治将于1948年6月结束。同时将由海军上将蒙巴顿勋爵继韦维尔之后任总督。

当我一两天后返国时，丘吉尔和同僚正在进行一系列紧张的讨论。我们这些人中，见闻最广最有经验的人是约翰·安德森爵士。他虽在下院处于独立党派地位，但接受丘吉尔邀请参加我们的讨论，并不时从我们的前座席上发言。在这场合，由于他学识广博，在印度和国内作为第一流行政人员以及他在道德上和体魄上

^① 1947年2月18日。

的勇毅精神,享有莫大的声誉,使他在发表意见与进行辩论时都更引人注目。由于取消了大学议席,这将是出席的最后一次议会。同时,对于那些他所最熟悉的问题,他在下院处于重要甚至主导地位。

我是在战争年代认识约翰·安德森的,当时作为供应部副大臣我常去参加他所主持的委员会。那时就佩服他的耐心、明智和坚定。我在地中海工作时期很少见到他。但战后开始同他建立深交并成为密友,直到1958年他去世为止。

政府此举肯定把问题突出摆明。在下院开始之前先在上院进行辩论。负责制定1935年改革法案的坦普耳伍德勋爵(前称塞缪尔·霍尔爵士)把政府的政策描述为“无条件投降,牺牲许多我们对之承担特殊责任的人”。哈里法克斯勋爵因其深悉印度政界人物,使他的发言特别具有权威。他似乎感到怀疑和犹豫。他说“确定1948年6月这么早的一个日子,我深感怀疑……凡是曾在印度工作过的人,想起这些问题时……谁也不能不感到难受和痛心,而不仅仅是关切不安而已。但说‘这样做不对’固然容易,要说出怎样做才对却并不容易。”在他说了许多不很赞同的话之后,所作出的结论虽颇出人意料,却起了相当作用。虽然他转弯抹角用双重否定来说出他的结论,但出之于他口里的这个声明,肯定将给政府以安慰:

根据我所知道的一切,不管别的方面做得对与不对,我不打算说这一步是确定无疑地错了。我不打算那么说,因为事实上印度今日的情况是,没有一项解决办法是不会包含最严重的危险的。所以我的结论……是,除非我能问心无愧地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我不打算谴责英王陛下政府所做的工作。^①

许多动摇的或持敌对态度的贵族议员,都受哈里法克斯这种态度

^① 《英国上院议会议事录》,1947年2月26日。

的影响。^①

下院的辩论直到3月5日和6日才举行。这是一场很重要的辩论。克里普斯照常清楚阐明了这个问题。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在印度再呆十年或十五年,以求在此期间产生一种局面,使我们终于能给予一个全印政府以独立地位。但这办不到,理由有三个方面。第一,(印度事务)国务大臣下属人员早已削减,连暂时增添人员的设想也早放弃;第二,我们没有军力可资调用;第三,它将使英国挑起不堪忍受的重担。我们何必由于印度人未下决心而自找这一切麻烦呢?我们应该向他们提出警告,

268 我们准备维持我们的责任而等待他们取得协议的时间是有限度的。^②

因此,唯一的另一条路是明确确定出我们掌权的一个期限。可以肯定说,为使印度人之间达成一种协议,是成立统一体制还是和睦分治,最有效的办法是定出确定期限,施加压力。

接着由安德森作出最打动人心的发言。他强烈反对确定日期。关于国务部里人员不足以及军事地位的论点,他完全不承认,或把责任归咎于政府。他对那一系列使内阁计划歪曲或变了样的事变更更为重视得多。他觉得定了日期,效果正和所期望的相反,它会使有关各党在进行商谈时更加固执。除非事先大致确定我们将把权交给什么政府,否则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发生。那么该有一个还是两个政府,有一个统一的还是分治的印度呢?

在辩论进行过程中,这个问题开始突出成为主要问题。在承认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呆下去所以就得走,承认目前这个现状的前提下,辩论进行得很有分寸。现在下院所要正式决定的只是这个比较狭窄的问题。保守党人提出对宣言进行一项说理性的修改,指责此宣告“由于武断地确定了一个日期,它使统一的或分治的印

① 伯肯黑德伯爵著《哈里法克斯勋爵传》(伦敦,1965),592页。

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7年3月5日。

度制定合适宪法的可能性受到不利影响，它忽视了以前声明过的对少数民族所负的义务……”但这个修正案为绝大多数所反对而被击败了。

然而，好些发言人，包括安德森在内，自然会提出许多别的问题，因为有许多问题不明确。大家很关心我们是否会出卖那些我曾给予特殊担保的集团，例如印领各邦，“贱民阶层”，部落区域以及其他我们允许给以保护的少数民族。最后，关于防务怎么办？但仍然存在这个最重要的甚至连安德森也不能回答的问题。现在我们既然由于因循坐误或被迫陷入这样一个我们不能再继续维持下去的局面，那么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可供选择？我们能经得起如首相所说的“继续拖下去”吗？现在是不是采取这个办法比较好，²⁶⁹ 尽管冒风险而且也不光彩？

丘吉尔认识到这一困难，就在翌日范围广泛的发言中，主要专门谈前几届政府所采取的行动，而对其中的联合政府和看守政府的工作则加以辩护。他争辩说近几个月采取的路线不断改变。政府现在连内阁使团的计划也推翻了。他预言：

政府提出这十四个月的期限之后，就断送了印度取得统一的一切希望。^①

但我们应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离开那里呢？甘地在他那出名的“滚出印度”声明中是愿意面临这种局面的。他在克里普斯战时使团去过之后曾说：

把印度交给老天爷去处理吧，或者用现代的政治术语来说，让它成为无政府状态吧；那个无政府状态暂时会导致内战，或者搞得盗匪横行但由此会产生一个真正的印度，而不是我们所见到的这个伪造的印度。^②

丘吉尔宣称，他认为这同政府决定要采取的政策毫无二致。他以

^{①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7年3月6日。

一段悲怆的话结束他的发言：

我黯然眼看英帝国土崩瓦解，它的一切荣耀和对人类的一切贡献都付之东流。我相信，不久前我们曾经有过胜利的时刻，我们曾有能力或者可以获得能力，来对我们的困难作出体面而持久的解决。许多人保卫过英国免遭敌人的进犯。谁也不能防御英国自己侵犯自己。^①

然而不管对过去十八个月处理事务的情况有什么意见，首相照例以镇定自若的态度结束这场辩论时的论点却大有可议之处。他说我们不能再回头了，也不能原地踏步。英国给印度做了这一切工作之后，不能再做别的了：

270 我们相信我们在印度做了伟大的工作。我们相信由印度人自己负起责任的时刻已到。我们必须帮助他们。但我们不能自己挑这个担子。^②

如果说政府的决定使英国和整个联邦的舆论界大吃一惊，那末这个新政策对印度的政治家和公众却似乎觉得不可思议。在报纸和政治家们对英国政府决心在确定日期离开一事所表示的一片赞扬声中，私下却出现一股怀疑的暗流：这也许是一种诡计，是一种巧妙手段，使印度政治家彻底丢脸后，英国人可以重整昔日权威？

在听到自己被解职后，韦维尔的表现是落落大方的。他会见了尼赫鲁和阿里·汗，向他们恳切说明有立即进行合作的必要，和机会难得。可是在新总督于3月23日赴任时工作尚无任何进展。蒙巴顿勋爵工作干得很快，决心很大。他同甘地和真纳几乎每天进行的会谈，说明了英国政府的声明和这年青有为总督的强烈个性，给印度政治家的内部纷争带来了迫切感。然而事情马上变得很清楚，那些预言印度已失去统一机会的人是正确的。4月18日，尼

①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7年3月6日。

赫鲁在爪利奥尔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自己承认分治不可避免，并似乎认可这包括旁遮普北方五省和孟加拉都得分治。这样，穆斯林领袖对巴基斯坦的要求很快便得到认可。但他们仍面临严重困难——两个国家的疆界在哪里？国大党宣称，应该允许那些不愿参加巴基斯坦的社团仍作为属于印度的。这自然立刻引起关于旁遮普的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的问题，关于阿萨姆问题，甚至关于西北边区省乃至孟加拉问题的争论。

同时旁遮普和西北局势愈来愈恶化。蒙巴顿勋爵和他的夫人 271 在暴乱最危急关头访问了白沙瓦之举，博得了举世的钦佩。在伊斯梅勋爵的大力支持下，新总督坚持不懈的精神和决心如此之大，使得在5月的第三周就在原则上议妥了一项计划。总督在回伦敦去的几天时间，这项计划由艾德礼和总督秘密透露给丘吉尔和他的一两位最亲近的同僚。在他们作了解释之后，丘吉尔召集影子内阁的全体成员开会讨论，然后，无疑以很大的悲痛心情但丝毫不含糊其辞地写了下面一封信，表明反对党愿意支持计划的顺利推行：

亲爱的首相，

承您和总督昨夜送来可能解决印度问题的几项办法，我已设法征求了同僚们的意见。

因此我现在可以向您保证，如果这些办法能忠实执行，使分治后印度的若干部分能有效地获得自治领地位，保守党同意在这届议会里使其顺利通过，以完成给予这若干部分以自治领地位所必需的立法手续。

请相信我对您诚挚的

温斯顿·丘吉尔

1947年5月21日

他必定是怀着沉重心情寄出这信的，因他深知这是我们一切希望的末日，而且分治后印度的独立要以极大的代价来保持。至于心

情沉重到什么地步,谁也不知道,也不能作出预言。艾德礼的复信如下:

亲爱的丘吉尔,

承来信,表明您和您的同僚在本届议会中,关于总督向您陈述的解决办法一旦被接受并进行必需的立法手续时,所将采取的态度,谨致深刻谢意。

对您诚挚的

艾德礼

1947年5月21日

272 于是首相在6月3日宣布新宪政计划时,他知道能得到反对党的支持。基本内容相当简单。印度次大陆将分成两部分: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的大体轮廓都经同意。主要的困难在于旁遮普和孟加拉。因此这些省份的前途要由立法议会的代表来解决。穆斯林地区和其他地区的代表要分别投票表明赞成还是反对该省分治。每一地区的单纯多数意见将被认为具有决定性。如果投票结果决定分治,就得成立一个划界委员会定出明确分界线。在信德和英属俾路支地区将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其参加现有制宪议会抑或另立制宪议会。这对西北边区省也适用。阿萨姆的锡尔赫特地区主要是穆斯林,那里也将同样进行投票,以定其归属于阿萨姆或东孟加拉。

艾德礼清楚说明,英国政府不打算向印度建议,更谈不上强加给他们一个宪法,哪怕是一个宪法大纲。这要让印度人自己去搞。关于印度各邦,在权力移交后,凌驾于它们之上的至高权限就不存在,因此各邦命运就将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由于蒙巴顿勋爵的努力而迅速达成的这个协议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新的情况,即政府愿意立刻办理立法手续,以便在原定的1948年6月这个日期之前办完。议会通过的一项法令可以把权移交给有自治领地位的后继

国,但这并不损及制宪议会的权力,它仍可在适当时期决定是否愿意留在英联邦内。

印度独立议案的二读是一次历史性事件。首相仍一如往日作了清晰的发言,颇为详细地阐释了法案中的各条。他希望印度不会永远分成两部分,至少这两个新自治领要密切合作。他关于英联邦的独特性质讲了许多话,并追述新西兰总理一句深得人心的话:“联邦表明独立之外再加上一些东西,而不是从独立拿走一些东西。” 273

丘吉尔因病不能参加会,因此授权由我代表反对党发言。关于总的问题确实没有多少话可以讲的。但我觉得应该正式代表我党,表扬那些过去在印度工作得如此出色的人:

在漫长的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异国作出这么多可贵工作的。在印度的服务曾是一种家庭传统,对印度的热爱曾成为父亲传给儿子的遗产。我们所怀念的也不只限于那些出了名的人。英国和印度人民都将无限感激那些普通的工作人员,感激那些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税收员,公益事务官员,卫生官员,赈济官员,警察,法吏等等人员。凭我们在统治印度这段时期所获得的成就,英国人可以问心无愧。从物质意义上讲我们将留下不少东西——铁路,水坝,灌溉设施,保健事业等等,但英国才智所作出的最大贡献,也许在给予一种不会蜕化和演变的公平正义感,它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对穷的和富的,对微贱的和高贵的,都一律平等施行。这树立了世界史上无与伦比的平等标准。^①

议案于7月18日经英王批准,从而于8月15日生效。不再是帝国皇帝的英王向新自治领致函祝贺。事实证明所付出的代价确实是重大的,因为在拉合尔和加尔各答发生了特别惨的流血暴乱。旁遮普的锡克教徒决定与巴基斯坦分离,但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当划界委员会提出报告将拉合尔划归巴基斯坦时,在锡克人

^① 1947年7月10日。

中引起了暴烈的反应。于是出现持续达数星期乃至数月之久的大量谋杀和纵火事件。至今谁也不知道伤亡的总数究竟有多少。随之而来的的是通过边界的一批批难民长流。据信迄至 1948 年约有五百五十万穆斯林通过边界到西旁遮普——今日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虽然印度部分地区陷于这种恐怖统治之下,新制度却开始逐渐形成。但留下了一个瘤子而且迄今未消,毒化着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关于克什米尔前途的争执。这一省统治者是印度人,但穆斯林居民几乎占压倒多数,却划归给印度。这一决定引起巴基斯坦的强烈反对,并导致内战性质的事态,最后止于迄今未变的停战线上。这问题于 1948 年初提交联合国。尽管联合国和联合国为谋解决而委派的各种委员会作出许多努力;尽管英国朋友为谋求和睦解决作出真诚努力;尽管尼赫鲁和巴基斯坦的历任总理长期商谈,争端始终没有解决。后来于 1965 年曾导致两国之间的一场战争。

虽然这些年来我个人同印度或巴基斯坦再没有什么相干的事,但简单记录一下其后发生的几件事也许是有用的。

在巴基斯坦,第一任总督真纳于 1948 年 9 月去世。他是众所爱戴的穆盟伟大领袖。巴基斯坦之诞生主要是由于他对追随者的影响。他的死失去了稳定因素。要是他活着,巴基斯坦也许可以免受其后许多麻烦。第一任首相阿里·汗于 1951 年 10 月被刺。对于一个新独立的国家来说,这位从根本上讲是明智、慷慨而立场温和的人死于一个狂热暴徒的枪口,也许是一件最大不过的损失。在印度,甘地于 1948 年 1 月也在一次类似的暴行中被枪杀。他的死对他本国人是沉重的打击,震惊了全世界。幸而尼赫鲁继续统治印度,直到 1964 年去世时为止。

1948 两位总理都参加了英联邦会议,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一种鼓励。即使当印度于 1950 年成为共和国,六年后接着巴基斯坦也

成为共和国时，他们还承认英国君王是英联邦首脑。英国一般舆论认为，迄今为止以君主制形式联在一起的英联邦，可以而且必须在这种新形式下继续存在和发展。 275

这些年里，使印度得以独立的那些事件的压力，引起了这一整个地区发生许多同样的变化。对这些事我都未直接参与，但我肯定曾把它们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一部分运动加以接受。

1946年底，艾德礼宣布缅甸将以最快最适宜的步伐获得完全自治。那里照常有内部纷争和少数民族或集团这种问题。然而到1947年底英王已批准一项给予缅甸独立的法案，并于1948年1月4日生效。根据缅甸新政府的决定，缅甸不申请加入英联邦。

锡兰在1946年颁布新宪法，只给总督保留防务和外事方面的一些权力，此后独立运动也同样迅速发展。1947年9月新宪法生效，但同年11月英国议会通过一项议案，给予锡兰在一切事务上以充分和无限制的立法权。于是锡兰在1948年2月4日成为独立自治领，并一直是英联邦的成员国。

马来亚的宪政变革计划在1946年初就开始讨论。1948年2月初，九个马来邦和两个居留地（槟榔屿和马六甲），包括除新加坡以外的前英属全部土地，结成马来亚联邦，并于1957年独立。虽然因共产党在大部分地区搞恐怖活动，使新联邦面临一段黯淡的时期，然由于英国军队的帮助以及英军与新政府的密切合作，经过漫长与艰苦的斗争后，秩序逐渐得以恢复。

在加勒比地区早已取得重要的宪政进展，这一过程在1949年由于给特立尼达岛颁布新宪法而有了发展，使民选的多数议员掌握实权。关于成立西印度联邦的初步商谈已经开始，但经短期初步试验后，发觉并不切实可行。在整个地区，独立和自治的原则已经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276

在中非，也有同样的力量在起作用。关于联邦问题的讨论在

1951年秋工党政府最后几周的时间内中止了，但除此之外，在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由于任命非洲人为行政会议的非官方成员，并使非洲人在立法会议中有直接代表，工作也取得了切实的进展。

在西非，英国政府批准了给黄金海岸的一项新宪法，给予实际上的独立，但保留总督在紧急情况下负最后责任。由于恩克鲁玛发动“要求立即给予自治领地位”的暴乱，导致1950年春的紧急状态，而于1951年的选举中，恩克鲁玛的人民大会党获胜。因此在工党政府下台之时，这一地区（以后称为加纳）接近正式独立。

在冈比亚和塞拉利昂局势也有同样的发展。在尼日利亚，根据1947年1月起生效的新宪法，立法会议中的民选代表将占大多数。其后几年中，迄1951年夏为止，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并设立委员会计划下一步工作。同年6月宣布成立联邦，下设三个地区性议会；进行了选举，由各地区性立法议会中成员组成的中央立法机关也成立了。

在肯尼亚，1948年立法会议中已有多数民选代表，虽然官方任命的成员和欧籍代表人数总和还超过非洲人。如果说在肯尼亚的特殊环境下变革还不怎么快，但它已开始而且将不可阻挡。

277 乌干达和毛里求斯也开始走向自治。马耳他在1947年颁布了新宪法，给予内部自治，只有重大要害问题除外。

可以看出，继印度、缅甸和锡兰的榜样，“变革之风”开始迅速吹遍整个殖民帝国。因此当保守党于1951年执政时，这条道路已经打开。当我于1957年任首相时，几乎每一方面都向独立推进。尽管在有些最后的阶段情况特别困难和危险，但那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最有经验的殖民地行政管理人员则深信，拖延肯定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为使叙述完整，再记一件令人懊丧的事。1949年4月18日爱尔兰脱离英联邦。但正如唯独在爱尔兰事务中所能发生的情况

那样，所产生的影响几乎微不足道。英国与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仍旧不变，两个民族之间互相尊重和友好的关系只有增进而没有减少。

本章中我原未打算把同我个人有着某些关系的事件多加详述，但把 1945—51 这些年中如何迅速走向独立的运动记录下来也许有好处。这些运动由战前的一些决定所推进，而为战争及其后果所加速。在争论其后所出现的变革时，人们常忘掉我们在战后头几年曾经走得多么远。在我当首相期间的那股“变革之风”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一阵难以入耳的“撤退号角”^①。一位比较友好的批评者则声称这是“唤醒人们面对现实的起床号，并以主动精神与想象力去对付新问题的时代挑战”。^②

① 索尔兹伯里勋爵于 1965 年 10 月 12 日在《每日快报》上的文章。

② 惠勒-贝纳特：《献给诗神的花圈》，59 页。

第十章 保守党的复兴

两党制是英国所特有的。三百多年来,除几次中断以外,它支配了我们的政治生活。我们曾把它输出到外地去,如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斯,但在那里它从未生根,那里老的忠诚关系和种种残风余俗依然保留。在美国它在经历了将近两个世纪之后继续存在,尽管从政治内容上讲它已愈来愈失却现实性。

两大党可以说是在内战时期初呈雏型的。尽管它们内部各自有意见分歧并在所持主张上深浅程度不一,保皇党和圆颅党毕竟代表了对政治问题和宗教问题的两种不同立场,而这种不同在它们的后继者托利党和辉格党也可以看得出来。从复辟到安妮女王逝世为止这段岁月中,甚至在皇室授命权无限而自由选举权有限的年代,大选一般能反映全国特别是各郡人民在政治态度上的变动。因此辉格党和托利党人的政治命运都曾遭受或喜遇过巨大的变动,而历届议会的调子和作风也会有剧烈的变化。但在1714年博林布鲁克与哈莱可耻失败之后,随着汉诺威王朝的君临英国,又出现了辉格党长期占优势的时期。托利党则一直分裂,一方面是诚笃的雅各派(拥詹姆士二世者),另一方面是牢骚满腹的乡绅,他们总把辉格派的主张同战争和高额土地税连系在一起。在整个十八世纪上半叶,政治就靠辉格党各派别之间的争衡奔逐来搞,这些都各有头头,他们只偶尔听命于像卡塔姆那种杰出天才做他们的领袖。乔治第三登位后,出现“王友党”(King's friends),控制了下院将近一百五十个议席,并几乎独立成为一党。北美战争的不光彩下场使王权垮台,于是真正的两党制重又复现了。小皮特虽然名义上是辉

格党人,实际上他是新托利党的创始人,这个党使他和他的后任能对拿破仑进行长期的斗争,甚至在拿破仑失败后还继续掌权十五年之久。

在托利党长期掌权期间,辉格党也像以前的托利党那样分裂成派系:一派是追随伯克的,他们赞成对拿破仑作战;一派是追随福克斯的,他们是和平主义者,或者是同情拿破仑的。在1832年通过第一个改革议案之后,托利党遭到惨败。胜利上台的多数派辉格党似乎注定要在整个一代的时间里掌权。然而皮尔把他那个党的实力在几年之内又恢复到这样一个程度,使那不得人心的辉格党政府,只有靠他们对年青女王思想感情的肉麻照顾,才得以保住权位。到1841年皮尔就大获全胜。

皮尔从某一意义上讲是头一位现代保守党人。他充分认识到,一个政党在严重挫折之后,只有靠领导上的精神力量,靠优良的组织和(用现代的行话来说)新的“形象”,包括对政策的重新估计和重新申述。领导权由皮尔自己掌握。唯一可同他相抗衡的惠灵顿公爵是乐于放弃这个权利的。凡是读过《Coningsby》一书的人都会记得,这一新组织是在“登记,登记”这一著名的口号下搞起来的。一百多年之后,这也是伍尔顿勋爵对他选民提出的要求之一:

必需有一种特殊的登记册;在一个政治组织里,没有什么东西比准备这个登记册更费事——或者说更重要的了。^①

从老的含义上讲,这当然是说让拥护保守党的人在投票表册上签个名;从现代含义上讲则是指两次大选之间做些细致的工作,以便在决胜关头可顺利地说服支持者去投票,或开车把他们送到投票场所。

至于给党制造出一个新的“形象”,皮尔则依靠他自己的身份: 280
新兴工商阶层第二代人物的代表。他同样还依靠一种手法,把托

^① 伍尔顿伯爵《回忆录》(伦敦,1959)341页。

利党改名为保守党。他希望这样就免得人家一提到“老朽的托利主义”那句传统老话时使自己感到难堪。

皮尔处理政策的办法是于1834年出版那闻名的“塔姆沃思宣言”——它可能是最早最重要的这类政治宣言。他想通过这一切，使他的党摆脱那个被老朽、昏庸和反动势力所统治的坏名声，而以一种新的姿态——作为谋求秩序和进步的工具——出现。当时虽有年轻的迪斯雷利在他对新保守主义的出名评语中把这一着嘲讽为“托利党的人，辉格党的措施”，然而它的效果非常之好。

不错，皮尔在十二年之后毁了他自己搞出来的这个工具，因他虽靠标榜保护政策重新当选，却在废弃谷物法之举上放弃了这个原则。其后托利党在1846年的垮台不单单是由于民意摆向辉格党，那也是政党自己把自己搞垮的一个例子。结果，除了在两次短暂的时间，保守党人曾组成少数党政府，历经一切困难不时遭受屈辱外，直到1874年迪斯雷利的大胜为止，从未在议会中真正成为多数。托利党在1846年因接受自由贸易而垮台的情形，与1714年安妮女王去世后垮台的情形是一样的。

这之后将近三十年中，辉格党以各种形式占领了政治舞台。各集团和人物之间再次发生对立和龃龉，其中罗素家族中人常居显要地位。往往是哪一党也不能获得明显多数，于是辉格党政府只能靠辉格党、自由党、激进党与爱尔兰挺进队组成联合阵线来掌权。在1910年大选中自由党失去多数地位后，阿斯奎斯也曾不得不屈居这种地位。十九世纪中叶的情况，由于帕默斯顿最能保守（就保守这个词的字面意义来说）而变得复杂化。他控制了十年议会而且广泛受人欢迎，这使迪斯雷利的反对党领袖工作很难搞。帕默斯顿肯定知道，搞政治的窍门是迎合中产阶级和温和派的意见。

在上一世纪中，辉格党在使它自己适应那种为它所推动的逐步进行的革命形势方面，搞得颇为巧妙。1832年的改良法案并没

有(虽然它很想要)摧毁贵族及地主豪绅的权势和政治力量。即使在取消了个体特权选区之后,不少小市镇和郡的选区仍在有势力地主的影响(虽非绝对控制)之下。1867年的法案也没有使情况发生实质上的变化。但工业革命以及大批中产和中上阶级的崛起,却使辉格党人不得不逐渐对自由党人和激进派作出某些让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格拉德斯通执政时,贵族议员还凌驾于下院议员之上。据传在十九世纪中叶曾有一位辉格党的达官贵人说过:如果一个人没有一座能放养麋鹿的大庄园,他就不能在内阁里当女王的亲密顾问。不过整个说来他们的后卫工作做得还算巧妙。只是在帕默斯顿死后,辉格党才终于同自由党和皮尔派融合。

在整个这段时期,随着党派作用的减少,下院的重要性增加了。辩论是以高水平进行的;表决的结果是难于逆料的。由于各集团之间流动性大,督导员再也不能对某一特定议案的投票结果有什么把握了。表决虽然次数不多,但在反对或拥护政府的表决上,双方相差总不过少数几票,而且谁胜谁负很难预测。这确实是议会辩论大出风头的年月,那时候的演说雄辩,不是早就确定了结论,发言者和听者仅仅为应付场面所不得不做的事,而是觉得这些东西可以左右结论。对维多利亚时代长篇大论的发言和辩论,下院不仅忍受得了,而且也听得下去,它们往往能说服动摇分子,从而决定政府的命运。

1874年之后,开始出现有组织的两党轮流执政,各有地位突出的领袖进行对手决斗,并在议会外掌握效能日益提高的政治机器。

固然,1886年由于内政法案问题导致自由联合派退出自由党 282 (这自由联合派是由哈丁顿勋爵为首的辉格党人和约瑟夫·张伯伦为首的激进派组成的)。但这对自由党的打击,还不如皮尔放弃他那个党的政策所引起的打击那样致命。虽然这样一来使保守党

掌了二十年权，但到 1906 年自由党又以空前的多数票上台，它当时的多数仅次于 1931 年大选的结果。

1906 年的大选常(而且也正确地)被认为是保守党历史上所遭受的最大一次打击。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仅仅四年之内，在 1910 年的两次选举中，保守党和自由党在下院就势均力敌了。同时，1903 和 1905 年之间阿瑟·鲍尔福对党务的巧妙处理，虽然经常受到无知历史学家的讥评，却取得了他所想达到的目的。他不像皮尔那样为经济教条所左右。如果说他在为保持团结的决心下不惜撵走主张保护政策的大臣和主张自由贸易的大臣，那末他毕竟使党保持完好无损。而在鲍尔福不光彩地遭受选举失败后十年内，他的伟大的对手阿斯奎斯却眼看着那个历史性的自由党四分五裂而几乎灭亡。

政党的历史连续性也许是很难捉摸的，因为政策总在改变和调整。但主旨是有一贯性的，使一代一代的男女倾向这一党或那一党的思想状态是有其特殊性可说的。欧洲大陆按照其立法会议厅的形式，用“右”和“左”这种说法来区分不同的集团和派别。英国下院是长方形的，并实际上由于每次表决的最后选择都是“赞成”或“反对”这一事实，所以我们愿意采用两党制。当然这一正常的制度，在像皮尔和格拉斯通给他们的党所带来的以及阿斯奎斯下台后所产生的紧张状态下，也时而会受到一些压力。

托利党和保守党，也正如辉格党和自由党那样，都曾追求过不同的并且往往是矛盾的目标。他们有过反动或不动和停滞的时期。但其后每个阶段总有伟大领袖带来新鲜的和有生命力的思想，使党恢复青春。迪斯雷利比博林布鲁克的才大，富有皮尔所完全缺乏的想象力，曾经恢复和重新教育了他的党。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在其短暂并悲惨结束的戏剧性生涯中，也曾模仿那位大人物作了类似的贡献。约瑟夫·张伯伦这个激进的改革家和帝国主

义者,尽管使人民受了许多苦难,也曾带来那传遍各阶层的新的热情和新的想望。而且在每届议会里都有改良派集团和思想进步的人。保守党从来不是保存和膜拜过时教条的庙宇。反之,它倒有时很可能被人谴责为太近于实用主义甚或机会主义。它在经过不少失败和失望之后,肯定保持了它的弹性,它的生命和力量。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辉格党的伟大作家和理论家中,很少有人能相信辉格党乃至自由党会遭到消失的命运;也不会相信,在一百年之后而且在给予男女以同等普及选举权之后,保守党政府会在连续三次选举中获得愈来愈大的权力。

左派政党易于从刚获得选举权的阶级中或思想激进的青年中获得拥护者,但必不可免地又会时时把一些人输给右派政党。辉格党的情形就证明是如此。随着自由党和激进派压力的增大,一部分辉格党人就开始滑到托利党的行列中去。要是没有出现爱尔兰问题,这一过程无疑会进行得慢一些。但也许可以不失公正地说,许多人是乐于利用 1886 年这个机会,来除掉那个在自由党内日益占主导地位的危险趋势,并摆脱格拉斯通这天才人物的转弯抹角然而咄咄逼人的压力。自由党那方面则成功地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兴起的左派运动方面获得支持。当工党作为一个全新的政治组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会传统奇怪结合的基础上成立之时,自由党人接受甚至恩宠这个新盟友,正如伟大的罗马军团 284 欢迎有标枪手和弓箭手来支持他们,作为他们的狙击兵和辅助兵那样。

在 1906 年的议会里,有三十人是这新组织中的。在一些选区,为避免有三方竞选而经过安排后,他们有时作为工党人士,有时作为“自由党—工党”人士选入议会。甚至像约翰·伯恩斯那样一些人也进入政府。所以直到第一次大战,那强有力的自由党并不嫉视或害怕这新的工党。1914 年,这小小的工党分裂为赞成和反

对战争的两部分。在 1915 年成立第一次联合政府时，阿斯奎斯可以毫无困难和顾虑地接纳像阿瑟·韩德逊和威廉·布莱斯这样的工党代表。然后是 1916 年阿斯奎斯的下台和劳合·乔治的第二次组成联合政府。于是自由党无可救药地分裂了，不是由于政策，而是由于更难堪的个人意气之争。此后它再也没有恢复它的团结或权力。尽管在两次大战之间有过短暂的接近，阿斯奎斯派和劳合·乔治派从未真正和解过。政敌之间的一次交锋很少会留下什么了不起的仇恨。但是一场内讧，正如一次家庭争吵那样，却能成为最难忘怀最难和解的事。虽然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以及他们各自的家庭成员和追随者之间，偶尔也在所谓“婚丧喜庆”的场合碰面，但裂痕从未得到弥合。

自由党的过早分裂阻碍了可能出现的比较自然的发展：工党与自由党以及激进势力联合组成新的左派政党。这就使麦克唐纳和斯诺登成立的党钻了空子。于是在 1922 年使劳合·乔治政府倒台的选举后，有一百四十二名工党议员选入下议院。一年后工党居然组成一个政府，虽然是少数党的政府。从那时起，工党也像往昔的辉格党及其后的自由和激进党那样，有时作为反对党，有时作为执政党，变成全国两大政党之一了。诚然，它在 1924 年并又在 1931 285 年的选举中遭受过严重挫折。但它在广泛的工会组织里有坚实基础，它对那些可能在十九世纪会跟随布赖特和科布登或莫利和狄尔克的分子具有吸引力，使它取代了自由党的地位。部分由于处理得当，部分由于时运好，它轻而易举地巩固了它所赢得的权威。在我们这样一个不喜欢有很多小党派的国度里，那个老的自由党就迅即衰落。因我国人民本能地感觉到，党派众多的结果，势必导致两种糟糕的局面：或者是产生一系列靠阴谋诡计组成、靠利害关系而不是靠政治原则维持的、无能的政府；或者是把议会制度搞垮而产生某种形式的独裁制。所以自由党虽尚能在多次选举中

取得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一的选票，它已从一个政党衰落成为一个集团。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手腕和热情，而是势所必然。我国历史上多次有人试图组织中间党和联合党，但除了短时间外，他们总遭失败。政治舞台还将继续由两大党把持，政权仍将由它们胜负各有千秋地继续争衡，而不管这两党的名称是什么。

1945年大选后，我曾怀着这种想法长期沉思保守党的处境。在夏末和整个秋天，我把业余时间都花在提前举行的补缺选举准备工作上。如果布朗利的状况是我党在全国总状况的典型，那末我们所遭受的严重失败肯定是不足为奇的。战前在斯托克顿经常有很多我们所熟识的经验丰富的组织人员和委员会男女人员参加，相形之下，布朗利的协会就几乎不存在了。那里有一位人缘好的主席和年迈的办事员，此外就没有别的人了。这当然主要是由于战争，因为一心投入战争工作去的人，那里也没有像斯托克顿那样普遍。但这也是由于战前对政治活动的看法有问题。逐街逐巷地去搞竞选活动，不是被人认为新奇而有点令人讨厌。区委员会这类组织当时是未曾听说过的。结果是，在我前任经常取得相差颇大甚至几乎是必然多数票的那个选区，在1945年的票数减到小得可怕的数字。这一切都不能归咎于有关的人。他们走惯老路，安286之若素。战前他们认为这一席位很保险，无需派很多的或工作得力的人去负责。如果布朗利的情况有典型性，那末可以清楚看出，工党方面靠着他们的工会组织和精心制定的宣传，他们在战争最末两年支持他们活动的机器，比我们的远远优越得多。

重新当选后，我开始更深入思考这整个问题。当时有些人说这下子工党要“掌一辈子权”，保守党将“一去不复返”了。根据政治历史，我深知这些轻率的预言是很值得怀疑的。我回顾往昔，寄希望于未来。不过这需要采取积极的步骤。

第一，有领导问题。1846年党曾搞得没有一个领导。鲍尔弗在

1906年竞选失败后，不仅失去了议会中的大部分支持，连他自己的议席也丢掉了。对关税改革法案的争议，不仅使党陷于混乱，而且几乎使它分裂；鲍尔弗虽然还能使他自己维持到1910年两次选举之后，但反对他的阴谋活动终于迫使他在1911年11月辞职。丘吉尔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他是党的无疑的和不容争辩的领袖。他把全国从失败的边缘引向胜利。他在全国和国际上都是个至高无上的人物。然而在战争结束时，那些对他深深铭感的人民，愿意把一切好的东西给他，只是不能让他作为托利党的首相而再把权交给他。他们愿意封他为公爵，愿意出钱也给他修建一座布伦汉（指丘吉尔祖先马尔波罗公爵在伍德斯托克的邸宅）。但按人们在战后的心情，他们不需要他，更不需要他的那批政友。凡是无偏见的人都清楚，不是由于丘吉尔，才使保守党这样不得人心。相反，这是由于党的最近的历史，由于它在战前掌权时期的失业数字，由于它不能保持和平。对这些往事的记忆，曾致命地（虽然是很不公平地）损害了丘吉尔竞选获胜的机会。

所以党的领导方面是没有问题的。诚然，随着岁月的推移，议会党团里和他的同僚间对他曾颇有微辞。有些前大臣甚至曾联名向主任督导员发诉怨言。^①有些时候，下院最有势力的独立议员集团很不听话。有时人们觉得，反对党领袖把太多的时间花在写历史和出国旅行发表国际性演说上，而对国内政治注意得太少。所有这一切，当然都是由于我们不能在下院和全国取得显著进展，在人们灰心失望的情绪下所引起的结果。这些不满怨言，在1947年之时是严重的，但不费什么周折就平息下去了。1949年初，在我们寄予很大希望的南哈默史密斯补缺选举中失败后，这种怨言又起来了。但是年春在全国各市镇和伦敦郡议会的地方选举获得大胜后（这些是伍尔顿实际工作的初步成果），这种怨言就再也听不

^① 詹姆士·斯图尔特著《在圈子内部》（伦敦，1967年），第145页。

到了。

不管怎么说，搞这种阴谋是既愚蠢而又无价值的。全国都知道他是当代（并可能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英国人，任何想把他撵下台的企图必然为全国所痛恨，并将给予党的希望以致命的打击。而且这种企图肯定要失败。凡是深悉丘吉尔的人必能认识到，他这个人是不倒也同样难以搞得掉的。他清楚知道好牌都在他手里。谁想当布鲁特斯，^①谁就会被公众当场枪毙。

除了党的领导人之外，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党的名称。我强烈感到，正如皮尔把托利党改名为保守党后增进了党的声誉那样，现在时机成熟，也该来搞这一手了。但除非我们能同时提出一个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新政策来，光改名肯定没有什么意义。于是我开始花相当力气，来发动搞这两项工作。在战前，我曾为推行《中间道路》^②这本小册子中所述的政策，进行过辛勤的劳动，现在这项劳动似乎要一下子开花结果了。昔日的思想一下子就活了起来。我在自己的选区和全国许多地方播讲了这一观点。我希望一个 288 新的名称和政策，会吸引公众中持温和意见的或动摇阶层的注意。这个政策至少已经在布朗利证明是成功的。因为虽然那里工党候选人的票数还多到令人不安，但自由党候选人的票数却已惨落：一个曾在 대선中获得一万二千张票以上的候选人，六个月以后得票不到一半，而投票总人数却非常多。

于是，我在 1946 年夏开始大力发挥这一主题思想，在保守党内大小集会上演讲，在一些读者多的大报上写文章。当时流行在夏季每星期六下午、在各地举办保守党的文娱晚会或集会。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虽是为吸引各党派的男女老少，供给他们各种娱

① 布鲁特斯，刺杀凯撒的罗马政客。——译注

② 哈罗德·麦克米伦著《中间道路》（伦敦，1938 年），1966 年重新发行时，书名为《中间道路：二十年后》。

乐,并给地方党务经费增加一笔可观的收入,但有时也常在各项节目之间穿插政治讲演。如果时机选得合适而又慎重搞好,就正好利用这种集会来宣传我的思想。在这种场合,当然需要有相当多的前大臣出面。但必须清楚认识到,发表演说对当场观众是一种不受欢迎的插曲,他们只是拘于俗礼才勉强听下去的。这是非叫听众硬咽下去不可的东西。正如在给小孩子喂药前后要给他吃点甜食那样,演讲也得安排在两项比较吸引人的节目之间,如同戴根纳姆吹风笛的女郎或机动两轮车表演之类的节目。而且,如果在开会前把发言稿送交报社,那末只要它稍有新闻价值,肯定就会在星期日的报纸上广为传播。

我选在 1946 年推行我的计划,部分是在我的选区发表讲演,部分是写文章,而主要是在两次保守党举行的集会上,一次在哈特菲尔德,另一次在恰茨华士。我觉得这两地宜于推行我的运动,因前者基本上是个托利地区,后者则是辉格党其后是自由党的据点。

289 我对这件工作并不过于认真,也不指望它立即奏效。我的目的是要人家注意党要搞新的名称——这个我知道将成为“新闻”,是要强调党有彻底“重新考虑”政策的必要。只有真正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才能使我们应付当代的问题,并可能指望在一定时间内获得选民的支持。自 1886 年以来,保守党只有同自由联合派结盟才能掌权,而这两个集团也只是到第一次大战前夕才合并。自由联合派不仅把关心未来的辉格党分子,而且还把一批新的、有力量有生气的激进分子与进步分子带进党内。现在我们再一次需要一个团结的党,使它能一切不要社会主义但要求进步的人士团结组织在一起。

我在哈特菲尔德的演讲引起了一些惊动。我说几年内人们将对社会党政府和它的所作所为产生强烈反应:

当反应到来之时,我们决不要坐失良机。我们必须有准备;我们必

须有团结和信念作为我们的精神武器。新民主党——因那就是我们将要成立的党——必须准备负起它的崇高使命。我们必须坚持过去一切优良传统——一切好的和崇高的作风。

同时，我们必须对未来抱有强烈的和热情满怀的信心。但我们要培养谦虚和与人为善的精神，而不要骄横跋扈。因为英国人民虽曾在战争中团结一致，却可惜在和平时期彼此分裂了。

民主党的口号是团结统一，而团结则要求各阶层和各行各业的人都作出自我牺牲。它谋求在英国实现的，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奴役制，而是要在一个互相负责互相宽容的民主社会中，实现真正的经济和政治自由。

这里，我故意把这个民主党将是什么样的一个党含糊其词。它是一个新的名称，还是仅指明一种新的目标？许多人向保守党官员迫切提问，闲话作者和漫画家也立即动起手来。在哈特菲尔德和恰茨华士两次集会之间的那两个星期内，报社里对我的真实思想有许多互相矛盾的纷纷议论。最有趣的结果是出现了罗的一张漫画杰作，题为“给布林普起教名”。^① 291

在恰茨华士集会举行之日，政治记者和政治评论员都忙碌起来。我重新讲了调子相同的话，仍然不明确表示是否改变党的名称。我要求有一个新的政策，或者至少有一个为适应现代条件而重新考虑过的政策；我要求各阶级人士忘却过去的分歧，在一个有建设性的和进步的纲领下团结起来。我们和我们的前人之间，毕竟隔了一道鸿沟。战争的年月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使我们面临新的、巨大的问题。有些旧的偏见岂不是可以忘怀吗？

最大的分界线存在于这样两批人之间：一些人相信原始的社会主义教条——把一切生产、分配和交换的资料国有化——请注意，一切，不是经过选择的一些合适的事业，而是一切事业；而所有其他的一些人，则预见这种发展过程会引向极权国家的一场恶梦。

^① 布林普是英国出名漫画家罗创造的虚构人物。——译注

我觉得我国大部分公民是反对这种粗浅教条的，他们

希望看到有人能找出解决现代问题的办法，同时又能保证自由和秩序。这样一种解决办法要放在平衡、温和、执中原则的基础之上。

我接着说，在那持第二种观点的庞大队伍之中，出来得最早并站在最前列的，就是强大的保守党；同他们站在一起的，已经有“国民自由派”人士。^①在那个根本问题上赞同我们的还有官方自由党人士，这些人在上次大选中曾获二百二十五万选民的选票。此外，投票拥护过社会党的人，现在也开始怀疑起来了。凡是持温和意见的男女人士，他们肯定会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赞同我们的事业。但他们切不要误解，以为托利党或保守党会需要任何被迫地或不自愿地改变的信仰。保守党需要的是自由的同盟者。这应该是一个新的联盟，而它的这一新的内在的精神，很可能需要有一个新的名称来作为公认的标志。

在这些问题上让大家来进行广泛而热烈的讨论，那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这会引来大家注意比党的名称更大得多的问题，如关于它的原则和它的政策的问题。我这次在这项事务上微不足道的插手，达到了我的主要目标。在其后几年中行将出现一个新的保守党，它将在精神上同战后世界的活和生活和新社会相适应。

1946年夏，伍尔顿勋爵应丘吉尔的迫切请求担任了党的主席。伍尔顿从来不是保守党员。他一向是有自由党背景和传统的独立人士。他自己说过，他是在听到1945年保守党竞选惨败后参加保守党的。选他来担任这个职务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伍尔顿不仅是个伟大的组织工作者，而且是我所知道的最优秀的推销员。他的明智、人缘、慷慨以及真心关怀他人的精神，使他为一切人所钦佩，为他的朋友所爱戴。此外，他的名字还是家喻户晓的。在战争最困难的年月里，他始终任粮食大臣，那时他用几乎不可思议的办法，

^① 这一派自由党人自从1931年大选以后就同保守党站在一起。

使人们乐于接受从未有过的——迄那时为止——最低限度的配给品维持生活。我想这是因为，他同许多位居高官的人不一样，特别是肯定不同于大多数官僚主义者，他使人民感到他是真诚关心他们的。全国几乎每个家庭主妇的心里——不管她们对“伍尔顿式糕点”的配料法是否同意——对他都有这样一个印象：这个和善慈祥的老汉肯定愿意拿出他的一切来帮助她。此外还有他的太太莫德，她是我们的无价之宝，因为她去到那里，那里的人就喜欢她，而她是哪个地方都去的。

伍尔顿同意党的名称要改，并且常常同我讨论。他清楚知道，“保守”这个词对选民群众实在无吸引力，特别是对那些在苦难的战争年月中想望新的美好世界前景的人们：

许多保守党人想给党换个新名称，因为这新世界要求人们敢想敢做和有进取心，要求摒弃这个国家战前经济生活上的限制，而“保守”一词则与这新世界连不上……①

他想把这个党称为“联盟党”：

这确实是它应该有的名称，这表明帝国的团结，表明英王、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团结，表明那肯定适应于我们这个国家的一种思想状态，即我们讨厌阶级斗争，几乎就像我们讨厌那感情用事的政客口中的什么国际主义，或马克思社会主义，或俄罗斯共产主义这些外国教条一样。我们很像一家子人，在安逸之时沉溺于各种意见的争鸣，而在困难、紧迫或危急之际，则迅即坚强团结一致。②

但他又认为政党改名只能在事业顺利成功之际，而不能在失败之际；要在它有力量的时候，不能在它孱弱的时候。（可惜的是，一旦那种时候到来，常常会有许多更迫切的问题。）当我们参加党的秋季年会时，显然可以看出这是党员的一般观点，于是他就这样接受下来。但他总设法不让我们的对手享有他们那个名称的好

①② 伍尔顿回忆录第334页。

处,总把他们称作“社会党”而不称“工党”。

我们之终于获得胜利,伍尔顿对党的机器的精心整顿是其一个(虽即不是主要的)原因。他有这么一种了不起的手腕来控制一切,却又能使他手下每个人都感到他是放手让自己负责一切的。他又认识到,政党也像宗教团体和慈善事业一样,几乎完全要由志愿工作人员组成。在他当了主席之时,他对所接过来的那个摊子的松垮和混乱的结构,感到惊讶甚至震惊:存在着那么多独立或半独立的集团,而没有一个妥善的协作方法。制度得要一点一点建立起来。他第一个本能的措施是把一切推倒重建。保守党员全国联盟和联盟协会,主要是伦道夫·丘吉尔所建立,为同党的领导与督导员争夺势力的一个组织。这组织当时具有无与伦比的全部权势,而今则变成了整个机器忠实而不可缺的一部分。它同那些围绕在党的核心四周的同类半独立组织一起,执行了两项任务。它

294 鼓励个人的热情和志趣,没有这个,任何志愿组织都要垮台;它又能防止任何集团或个人享有过分大的权力。总之,伍尔顿相信,他能使他的制度在实践上行得通:

事实是,虽然从写在纸面上的东西看来,把这称为组织几乎令人觉得可笑,但起作用的不是机构而是人,因此,也像许多英国组织那样为好些聪明的外国人所不能理解,党的中央机关这个组织,在许多工作异常勤恳而忠诚的党员手里成长起来了。而由于它工作分布各地,便以它在各选区的工作,起到了任何良好政治组织所能起的主要作用。^①

除了这个总的组织问题之外,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遴选候选人的问题。我曾对鲍德温在二十多年前的一段话印象很深。这是他在1923年大选失败后一次党内集会上的讲话。他说我们(从失败中)取得了教训,而这种教训不是能以别的方式取得的。我们应该记取它,运用它。他对工党曾向青年发出的号召和曾经提供的

^① 伍尔顿回忆录第333页。

机会表示不满。他接着说：

我们党内常有这样一种愿望，想挑一个有钱的人来当候选人。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有那种每年能以一千英镑来灌溉选区的候选人，那末你就只能从百分之零点五的口中去挑选，而如果你要以此去同那从全民中挑取候选人的政党进行斗争，你就决不能在今生战胜他们，你也决不配战胜他们。^①

可惜的是，鲍德温和他的同僚并未对此采取任何改革步骤。我们好多人早就痛恨这种制度，它使有些议席，通常是最保险的议席，总落在那些庸人手里，他们作为后座议员不起作用，更谈不上将来当大臣。如果公开拍卖，议席常会落到二十世纪暴发户老财手里。^②我记得有位朋友告诉我，1929年他不幸丧失议席，就申请到一个保守党选民占大多数的选区去当候选人。他欣幸地看到在有好多 295 申请人的名单中他居然名列第六。其后他接到通知去开会，他和那些竞争的人都受到协会主席的殷勤款待。会上至少有三、四百人，他原以为会要求他们轮流向大家发言，就事先花工夫准备迎接这场考验。使他惊奇的是他们并没有打算搞这一套。主席解释说，他认为搞这么多演说颇腻烦人，而且根本不需要。于是他拿出一顶高帽子放在桌上。“先生们”，他这样说道，“现在只要你们每人拿一张纸条，写下你们每年能捐献多少钱，每次竞选能资助多少，然后把纸条塞进帽里，我想这事可以迅速得到满意的解决。然后我想大家将愿意接受我的邀请共进午餐。”候选人就这样挑定了。我那位朋友没有如愿，但午餐是第一流的。

对这个问题，作为伍尔顿担任主席后所采取的改革工作中的一部分作了坚决处理。这也是 D. M. 法伊夫主持下的一个委员会

① G. M. 扬格：《斯坦利·鲍德温》（伦敦，1952），第74页。

② 原文为 Nabobs。Nabob 指十八世纪从印度发财回来的欧洲人。——译注

所研究的问题之一。研究结果提出的报告，得到一致的坚决通过。这以后，对候选人不再有任何财务方面的限制；候选人捐助的补充经费限为每年二十五英镑；议员可以捐到每年五十英镑。所有竞选费用，以前主要（虽不一定是全部）由候选人负担，今后必须从选区经费中提供。

296 这项改变是革命性的，而且我认为它对拯救保守党所起的作用，大于任何其他因素。它受到热烈欢迎，也引起一些人担忧。财务人员以前的收入主要靠有钱的议员，他们现在问哪里来这些钱去办所要做的这一切事，我们的回答很简单——从一般党员身上拿。我们采取了重大的步骤；保守党决心靠它各地的党员来维持；它要变成一个基础至少像社会党那样广泛的党，而且让它的每个党员都有工作可做。这是实行了托利党的民主。这给那些争取选进威斯特敏斯特的男女同胞开辟了一条大道。^①

这项改革产生两种结果：第一种是完全良好的结果，第二种则可能有些问题。把一切财政负担完全放在选区，这在各方面都有好处。它虽在选区协会的主席中引起一些忧虑，但这迫使他们不再眼睛朝外去求支援，而要力争自给，并在其后还承担向中央提供一部分经费的义务。不过这项改革在另一方面却不那么令人满意。给予选区党组织以挑选候选人的完全独立权限之后，中央办公厅和党的领袖实际上就放弃了他们对进行挑选的任何控制。在名义上中央有否决权，但也许除了一些很特殊的情形之外，这否决迅即形同虚设。正如法伊夫所指出的，这以后将会出现一种趋势，使地方协会组织运用他们的自由而不考虑全党整体利益。在那些议席保险的地区更将如此：

……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只知本地利益的当地公民，他们不能够——事实

① 伍尔顿回忆录第 346 页。

上根本不愿意——从全国和国际的角度去看问题。^①

接着他又批评说：

特别令人气愤的情况是，许多可以成为第一流议员并可能充当大臣的候选人，却让他们不止一次而是两次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三次，都在同一个毫无取胜希望的选区里进行竞选，而保险的选区却由那些才能远远不如的人占有。这将对党造成很大损失。^②

然而，在当时这项改革是必要的，而且尽管有些缺点，总的效果证明是良好的。选区在挑择候选人方面的完全自决权，乃是他们在负起这新的而又重大的（由伍尔顿婉言而坚决地放在他们肩上的）担子后所无可避免的结果。

他又用同一委婉曲折的手法，搞了一项新的措施，改进了党务工作人员的地位和报酬。这项改革当然要增加地方组织和中央的 297 经费开支，因为它要包括一项相应的养老金制度。但这是为重建党的机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工作。他也给予“青年保守党人”运动以慷慨的支持，因那时这一运动在人数上和作用上开始迅速扩大，直到后来成为可能是欧洲最强有力的青年运动。

伍尔顿的下一步措施是关于地方政府方面的。他认识到，由于我们的对手早就把这作为全党性工作来抓，我们尽管多么不同意也得照着办。这一决定虽在许多方面令人遗憾，然而却是不可避免的，从政治上讲也是明智的。因为在地方挑候选人并在地方进行竞选斗争，这对建立保守党协会的力量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管这个问题，使社会党人只要去对付“独立派”或“纳税人协会”之类的反对就行了。在决定以全党力量去进行地方竞选的同时，党的中央机关里也成立了掌管地方政府的组织，并在全党更加关心地方问题。这也是反对中央集权主义的一种措施。他又坚决要求在党的每年年会的头一天，必须专门对地方政府问

^{①②} 基尔穆尔伯爵《回忆录：政治生涯》，第 158 页。

题进行讨论和辩论。

这一切改革当然都需要花钱。除了直接归伍尔顿管的那些活动之外，他还得给巴特勒管辖下的工作提供经费。这就是重新建立的研究部，它是1929年由张伯伦创立的，但在战争期间撤消了。现今它的工作范围和内容都大为扩展。此外还有1945年5月在巴特勒倡议下成立的保守党政治中心，它独立于中央办公厅，有它自己的刊物，并在某种意义上起一种保守党内费边社的作用。在巴特勒富有进取性的领导下，这两个组织的威望都与日俱增。它们是不受中央办公厅控制的，也不在一处地方办公。用伍尔顿自己的话来说，它们“除了交账单时以外是完全独立的”。为进行这种种工作以及党的中央和地方性一般工作，都需要有大量的钱。这位新主席把几乎惊人的重任放到地方协会上，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他们有至少多于目前收入两倍或三倍的经费。在这方面又显出他是何等深谙人情世故。他原打算搞一笔比较小的款项，但最后还是决定：提出的目标愈大反而更易于完成任务。这样，募集一亿英镑经费的目标就提了出来，而且居然也完成了这个总数。

虽因伍尔顿和我在苏塞克斯是邻居，常有机会彼此讨论这些事，但这些工作我很少参与。我唯一可以向他进言的，是根据我自己（特别是在斯托克顿）得来的一点经验。我们常争辩说，选举不是在公众大厅里或大小集会上赢得的，而是在街道上赢得的。它们通常是在竞选开始前就定了胜负的。我妻对这方面工作具有专长而且不辞辛劳，斯托克顿的几乎每家每户都熟悉她并为她所熟悉。她为一切人所尊敬，为许多人所喜爱。记得二十多年前我们开始在英格兰北部搞工作时，感到作为一个新来的陌生人，这是使人知道自己并获得拥护的不二法门。同样重要的是要有一批热心的支持者，他们一周又一周地深入街道工作，使他们不仅被人们看作是政党的支持者，而且被认作他们的朋友。当然，那些年也有

许多别的议员采取同样做法。这一制度也开始逐步推广和完善。每个区委员会的成员，都熟悉他所负责的街道，也为街道所熟悉。伍尔顿不久就认识到：

战斗不是在公共讲坛上或大厅上或欢呼的群众集会和游行过程中进行的，而是靠一些懂得该讲些什么话的人，挨家挨户地作艰辛而平凡的走访来进行的……^①

这种做法(其后他称之为“敲门战术”)就成为新的保守党对待选民 299 的基本态度之一。

此外，他完全理解，搞竞选工作的必须是见多识广而且聪明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愚蠢无知的竞选工作人员能起莫大的破坏作用。因此，很有必要使所有派去搞这类工作的人，特别是“青年保守党人”，熟悉一些论点，不仅是熟悉有关他们所分发的小册子，而且确实要教他们学点东西。这项工作就由保守党政治中心来搞，举行所谓“思想问答交流会”，暑期补习学校，周末学校，报告会和学习小组。党组织为中、青年人举办的社交活动，除了为募款外，必须继续搞得既能吸引人又能提供消遣娱乐。但伍尔顿正确地把这看作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党的宣传工作人员也得像教会派出去的传教士一样，他们必须是既有热情又有学识的人。

有了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有了未来候选人可能在更广泛更民主的基础上选拔的保证，有了一个从过去废墟上逐步建立起来，并在其漫长历史上空前坚强的党的组织，这就只待再给党创立一个新的“形象”了。这就要靠制定并广泛宣传一些新的政策，它们诚然是以旧的原则为依据的，但能适应新的和不断变动的情况。

不少人深深怀疑这些做法是否正确。他们相信，我们应该部分地依靠民意的正常摆动，部分地靠在朝党所犯的 error 和所遭受

^① 伍尔顿回忆录第 361 页。

的不幸，才能重新赢得政权。持这种观点的，不仅有那批稳然代表
保险选区而仍栩然显示他们颀颀无能的老派议员，也还有一些干
练的政界人士。丘吉尔固然也赞成宣扬新思想，正如他在苏黎世
和富尔顿的演说中所做的那样，但他怕建议提得太详细，可能会只
落得个“到头一场空”。^①的确，这方面在野党总是要冒风险的。如
300 果他们提出的政策合情合理，那末这些政策很可能被当权的政府
窃取据为己有。正如在游泳场的情况一样，托利浴客的衣服很可
能被辉格浴客抄走当作他们自己的。

大家都同意，所谓的保守主义应重新加以规定和充实。但也有
有些人觉得，我们应该满足于迪斯雷利 1872 年在水晶宫演说词里
所规定的那几条。那时候他规定了托利党的三大目标：“保持我们的
制度，保卫我们的帝国，提高人民的生活条件。”这些目标总的说
来都很不错，而最后那一条在当时更醒人耳目。但在七十多年后
的当代局势下，这些确实是不够的。然而，撇开一般的原则不谈，
政策与政纲是可以区别开来的。详尽列出政纲总有其不利之处；
至少应当把它保留作为竞选宣言。但这样一个政纲并不是凭空制
订出来的。它应该是在政策声明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而政策声
明则需要两次大选之间经党的领导批准和党的会议确认后随时
发表的。这类声明的内容，应力求包括那些介乎原则和政纲之间的
东西。但若要确实打动人心，它的内容就必须足够明确。我决心尽
力之所能朝着这个目标去做。很可能在竞选到来之时，我们仍得
运用以前的论点。但只有这样的一个政党，它因其先前的行动和
多次重申的政策，在人民中获有先见之明的声誉，获有持论平和且
了解当代需要与当代民情的声誉，才可以用过去的论点。而这种
声誉正是我们在 1945 年所奇缺的。最最重要的是，我党还必须

^① J. D. 霍夫曼：《在野时的保守党，1945—1951》（伦敦，1964），第 110 页及
他处。

使自己顺应“混合经济”的需要，以及自由企业与集体事业综合一起的需要。换言之，就是要在公开演讲或私人交谈的场合，继续倡导我那个“中间道路”的思想。

这样重申的一种政策，在年青党员中很易于获得坚强支持，特别是Q. 霍格，P. 桑尼克罗夫特以及其他战时在托利党改革小组里共事过的一些同僚。这也特别受到我们新候选人的欢迎。但若你以为那些墨守传统观点（特别是在外交和帝国问题上）的人，会对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上的新观点发生反感，那就错了。事实上，我那几年所倡导的政策曾获得一些朋友的支持，他们那正统的托利观点是谁也不容怀疑的。例如，我在1946年春接获克兰蓬勋爵^①的一封信中，就令人钦佩地表明了这种观点：

有那么多保守党人趋于持否定态度。他们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但这在如今是不够的。如今的危险在于保守党党员群众的无动于衷，这种无动于衷的态度是由灰心失望与失败主义引起的。他们眼看着社会主义日甚一日地强加到他们头上，而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摆脱这种状态的另一选择是提出一种进步的政策。而在这方面像你那样的人是可以出力帮助的。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前途在于资本主义的普及。我觉得资本主义的过失并不在于资本家太多，而在于资本家太少。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住自己的房，种自己的地，在他们干活的工厂里参加管理。我知道说这番大道理是非常之容易，而实行起来却非常之困难。但我相信这是走向进步的道路，是我们应该加以研究和倡导的。

1946年10月勃拉克普尔保守党年会上的讨论表明，大家希望重申保守党的政策，特别是在工业问题上的政策。于是就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制定一个慎重考虑过的文件。委员会的主席是巴特勒、斯坦利、利特尔顿、法伊夫和我代表前座议员，协助我们工作的有后座议员D. H. 艾默里、D. 埃克尔斯、P. 班内特爵士和J. 哈奇

^① 其后为索尔兹伯里侯爵五世。

森上校。秘书有D. 克拉克、R. 莫德林和M. 弗雷泽。我们这些人一起形成一个坚强的、有代表性的集团。我们经常开会，而且除了委员会的工作之外还到工厂区去访问，同保守党的主要工业家和工会人士谈话。我负责的地区是英格兰东北部，包括纽卡斯尔和里兹。其余的人则去利物浦、曼彻斯特、加的夫等地。我很钦佩巴特勒主持讨论并引导我们通过许多困难的技巧。我们当中有些人的思想自然会比别人慎重些，但彼此间的讨论和意见交锋往往是很能发人深省的。我们之中还有些人对工业有长期经验，他们能充实讨论的内容。

文件起草完毕后呈丘吉尔阅。使我惊异的是，丘吉尔对此很下功夫，他不仅像我们原先所指望的那样推敲文字，而且也注意其内容。作了一些修改之后，他从总的方面表示同意，这样文件就在1947年5月公布了。虽然其中许多建议如今看来有些过时，有的建议其后证明不可能作为法案通过，但这一文件的公布在党的历史上肯定是个里程碑。有的人热情支持；有的人反对，认为它是“激进”和“半社会主义”的；还有人认为它决不能实行。但一般都认为这文件敢想敢说而且在政治上是明智的。在工党政府大力搞规章和推行国有化之际，文件重申自由和私营企业的必要，但也指出在一个混合经济体制内，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各自有发挥作用的协调的前景。这文件同次年发表的类似文件一起，它的主题思想便是继1951年社会党终于垮台后保守党执政十三年中，指导他们进行工作的理论基础。

人们称之为“工业宪章”的这个文件，证明我们决心要维持充分就业，保持并改进社会福利事业，继续把经济的战略控制权掌握在政府手里，而又尽可能保存私人企业的战术作用。我们的目标是“把中央指导的必要性和对私人经营的鼓励协调起来”。我们认可煤矿、铁路和英格兰银行的国有化不可逆转，承认这是泼水难收的

事。文件的最后一段内容是所谓“工人宪章”，其主要目标是实行“人道主义化而不是国有化”；是为给产业工人获得保障和地位，使就业有连续性，并有明确规定的合同权利。 303

文件中列出的原则指导了其后几届保守党政府的政策。有许多具体建议成了法律。对垄断企业问题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作了处理；除少数例外，维持物价的政策取消了；对改善工人地位的许多规定赋予法律实效。然而就这类声明说，特别是由于它是在野党所发出的，其重要性并不在于详细的建议，而在于其总的调子和精神。

大都市各报的反应是在预料中的。《每日邮报》和《每日电讯报》热烈支持，《泰晤士报》褒贬参半。《新闻记事报》持批评态度，认为这些建议“过于露骨地为追求自由党人的选票”。^①《每日快报》和《标准晚报》起初口气不定，但愈来愈露敌意，这显然是按比弗布鲁克勋爵的指示办事的。各省地方报纸的批评照例是合理得多，总的说来他们是表示赞许的。在一些周刊的意见中，《观察家》说得很中肯，它认为这宪章消除了“想给保守党戴上反动派帽子的最后借口”。《新政治家与国家》，《雷诺新闻》和《论坛》则当然持敌对态度。最末这个刊物并预言“不出今年，巴特勒宪章将引起托利党的分裂，正如它过去曾分裂了半个世纪之久的那样”。^②随着时日的推移，比弗布鲁克勋爵的攻击愈来愈恶毒，并有一些不出名的右翼报纸附和他。

下院里有些保守党议员对文件持批评态度并表示忧虑。这一派的带头人是 W. 斯密瑟斯爵士，他欣然自命为一个好托利党人，但其所持经济和社会观点，实际上同十九世纪中叶曼彻斯特自由放任派的主张毫无差别。他们最反对的一点是我们承认煤矿和铁路的国有化不可逆转。但甚至在 10 月份党的年会以前，攻击的人 304

①② 霍夫曼前书第 152—153 页。

就开始动摇了。比弗布鲁克勋爵的报纸继续抱敌对态度，这些攻击有时用社论发表，更起作用的是副刊上含沙射影的短文。《星期日快报》上的“中座议员”写得特别恶毒。大体说，党内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墨守辉格党与老自由党传统的人，他们是反对新保守主义的。真正的托利党人则愈来愈热情地接受这一主张。

在党内和高等教育界以及知识分子中间，巴特勒把工作做得特别出色。他在研究部那批才能出众的同事支持下，是制定新政策的主要负责人。他以他的学识和机智为此进行辩护。至于公开宣扬宪章并反击来自任何方面的攻击，这个任务就落到我身上。^①我搞这项工作正求之不得，因我觉得现今党的政策和性质，几乎妙不可言地照着我在两次大战之间那无所作为的岁月里所宣扬的路线发展着。为此我到全国各地讲演并给报纸写一些文章。这些工作我干起来格外显得轻松，因为它是我早先几个月里一贯的思想。例如，在早一年的秋天，我就声明我们打算按照现代条件提出一项新的工业和经济政策：

它是否可以称为一项新政策，这个我不敢说。它肯定符合真正保守党传统和哲学中的精髓。现今反对党和政府间的重大分界线开始明确起来了。社会党政府侈谈计划，但愈来愈看得清楚，他们并未懂得而且肯定没有实行他们的原则。他们混淆了国家和个人的作用。他们想做的事太多，因而就冒办成的事太少之险……[我们的政策]是以政府和工业界之间的合作这一主导思想为依据的。它坚决主张各方面要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它要求企业主、经理人员和工人之间有一种新的伙伴思想。民主的基础在于财产分散，而不是集中在愈来愈少的一些人手里，更不是全部为一个半极权的国家所占有。要安全通过威胁着我们生活的这许多危险，我们所取的道路是要各方面分工负责，而不是一揽子混杂包办。^②

① 霍夫曼前书第 152—153 页。

② 在埃普索姆的讲演，1946 年 11 月 23 日。

社会主义必然导致极权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导致纳粹主义。俄国的社会主义导致共产主义。

305

英国的传统以同等的程度体现在托利党的主张和激进派的主张方面，它摒弃阶级斗争不可免论，而坚决主张国家的基本团结。^①

我又坚决提出劳资双方需要有一种新的关系：

工业问题只有小部分是属于经济方面的，它主要是道德上和心理上的问题。医治的办法是需要有一个新的法规——如果你们认为合适也可称为宪章，根据这个法规，资本、管理和工人将结成一体进行工作，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进行健康而真诚的合作。

一家人闹对立是搞不好的，这在战时如此，在和平时期亦何尝不然。^②

关于国有化问题，我继续遵循“中间道路”的思想路线讲话：

工业国有化并不解决人这方面的问题。国家的大垄断并不比私人垄断好些——有些方面反而更坏。我们反对一切垄断，不管是公的还是私的。

但这并不是说国家在工业方面毫无作用，当然有的。但除了在特殊情况下的少数例外，国家的作用在中心位置上，而不在边缘。政府应在政策上解决总的带战略性的问题。^③

于是我声明：

我相信国家之存在乃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人民为国家服务。我们要把生活朝上拉平，而不是往下拉平。我们不要废除私人产业，而要把它分配得更广。

我们相信真正的民主制，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在每个国家里愈来愈看得清楚，社会主义和民主制是不能共存的。前者意味着专制——也许是办好事的，也许不是。后者则意味着发展自由和进步。^④

宪章发表后，部分由于战前我在这方面的声誉，部分由于我为

①② 在特鲁罗的讲演，1947年4月9日。

③④ 在旺兹沃思市政厅的讲演，1947年4月24日。

此作了多次公开讲演而给我以答复，报纸的攻击开始集中到我身上来。尽管我对比弗布鲁克勋爵有私人感情，我还是不得不进行答复：

《每日先驱报》挖苦说工业宪章不是真正保守党的政策。比弗布鲁克勋爵的两份喉舌《每日快报》和《标准晚报》也是这么说。比弗布鲁克勋爵为人在公私两方面的品质都很高尚。在战时任大臣期间他对国家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但在政治问题上他的判断并不总是正确的……他指责我勾引保守党，使它发表了进步的政策声明。我很乐于接受这一责备，如果它可以算做责备的话。但实际上我并没有搞什么勾引。工业宪章不过是在现代的条件下，重申了我党那个根本而永远不变的原则。

最后，批评我的还有 H. 威廉斯爵士和 W. 斯密瑟斯爵士。对于那些同他们站在一起的先生们来说，时间不仅是停止不动的，而且（如果竟然有别的可能）是在倒退的。

因此这个国家的所有反动势力，《每日先驱报》、比弗布鲁克勋爵、W. 斯密瑟斯爵士之流，一齐联合起来说工业宪章不是托利党的政策。幸运的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因为，无论我们的批评者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我仍愿坚持迪斯雷利的传统，此外还有丘吉尔这个崇高权威的支持。^①

我用几句当时广泛传颂的话总结这些反对者：

307 社会主义者害怕它；比弗布鲁克勋爵不喜欢它；自由党人说它太自由化因而不可能公平合理。我们还能指望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话呢？有哪个孩子能一生下来就交上这样好的运道呢？

有一个评论使我特别感到高兴。来自“中座议员”的这个批评看来实际上是一种恭维：

这个报告是麦克米伦先生的一次胜利。〔他〕曾经写过一篇政论叫做“中间道路”。这是那个政论的再版。^②

① 在威斯特敏斯特教堂的讲演，1947年6月14日。

② 《星期日快报》，1947年5月15日。

斗争就这样在党内外进行着。但一天比一天清楚，我们对手的做法是要失败的。到10月里开年会时，伍尔顿以他一贯的机灵手法明确告诉会上说，领导上不打算把宪章强加给一批不愿接受或持怀疑态度的代表。丘吉尔已经在总的方面予以赞许；会上有一切权利进行讨论并作出自己的结论。

我在战前对保守党年会有长期的经验，在那些日子里，代表中大抵是党内死硬分子而不是进步的一翼。凡是超出当时官方正统范围的思想，特别是由比较年青阶层提出来的，他们总习惯于用怀疑和担心的眼光来看待。主要由于伍尔顿改革的结果，在1947年年会及其后各次年会上，大多数代表的观点是温和的或明确倾向进步的。因此当他们讨论工业宪章问题时，他们不满足于仅仅把这些新思想接受下来作为概略性的引导或参考意见。他们要求更明确地加以认可。桑尼克罗夫特在奥尔—欧文支持下所提出的一个动议，经过一系列修改后，通过了一个形式远远明确得多的决定。年会不仅仅满足于对宪章表示欢迎，承认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而把它接受为“保守党经济政策一般原则的清楚申述”。莫德林提出的进一步修改，语气上等于完全赞同。“青年保守党人”对此特别表示热情。这样，经过我们三个月斗争的结果，我们的对手 308 当时在比弗布鲁克报纸以及同类反动势力的帮助支持下，一度似有至少形成一股力量雄厚的少数派之势，但到最后却变为一、两个人的喃喃异议。

丘吉尔虽在年会上的讲话里不愿涉及细节，但坚决支持这新的保守党主义。这在感情上是同他很合拍的，使他感到在他那漫长而丰富多采生涯的晚年，能亲眼看到党重新回复托利式的民主主义，而这一主张的先驱正是他的父亲伦道夫勋爵。为宪章及其对保守党未来所产生一切影响而进行的斗争，就由这次年会上的认可而告终结。

宪章的成功及其事实上的为全党所一致接受，标志着巴特勒政治生涯中重大的一步。在战时，他因拟制并在议会中通过一项教育法案的成功，获得各党派的高度评价。那项教育法案标志着发展国民教育事业的重要的一步。他在为教会（罗马天主教与英国国教）学校问题的谈判中至少获得暂时解决这一点，表现了他的外交手腕。这次在开展新保守主义方面的领导工作，使他成为党的第一流领导人。

如果说宪章标志着保守党思想发展史上重要的乃至革命性的一页，那末它对工党和自由党的温和派（特别是在其党员群众中）也不是没有吸引力的。用丘吉尔的话来说：

这是一项广泛的政策声明，凡是反对散布僵硬社会主义的人，现在都可在它旗帜下团结起来。

在其后的斗争过程中，我继续不加掩饰地吁请自由党支持。1947年9月在哈瓦登的一次集会，也许是发出这种议论的一个最富戏剧性的背景。那次会是查理·格拉斯通先生主持的，他是格拉斯通先生（过去英国首相）的孙子，哈瓦登的乡绅。在这样一个幽静古雅的环境来开这样的一次会确实是怪有意思的。会上有些人可能还会记得，当年曾有上千的自由党朝圣者经常到这闻名的309 公园向那位老大人致敬，聆听他的妙语。现在则在查理本人的建议下，利用自由党的这块圣地，开会来支持托利党——这在他认为是唯一能与社会主义进行有效斗争的集团。查理·格拉斯通曾是伊顿的主人，也是我的私交，因我儿曾在他的住处住宿过。他在致《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以简单率直和令人信服的语言表明了他的立场。

我从星期五晚到星期日下午住在他那里。这个历史性的地方我从小就听父亲的朋友J. 莫莱等人多次谈论过，如今亲身住在这里，确实是了不起的经历。主人告我说，那位伟人的书房自他死

后一直原样保存着。他把那些丰富而可贵的神学方面藏书以及别的许多书送掉了，但留在他书房兼工作室的那些书则五十年来一直未动。我惊奇地——并且几乎难以置信地——发现，陈设在这房子里的许多胸像中，竟有一个是迪斯雷利的像。我觉得很奇怪，就问查理·格拉斯通。他肯定说这是同皮特和其他名人的胸像一直就在那里的。我心里纳闷为什么格拉斯通要搞一个迪斯雷利的像，对这个人，如果他会怀有这种非基督徒的感情，他必然要怀恨的。他是不是要以此来提醒他自己，以警惕这个坏家伙的危险和诱惑呢？还是作为巫魔钉在那里呢？这个神秘的疑问我始终没有解开。

在他的讲演中，查理·格拉斯通说明他从未参加任何政党或任何政治活动。从传统和个人信仰讲，他是自由党人。他的为人，只希望各种地位的人都能享受最大限度的自由：

人们曾问：“格拉斯通先生要是活着会对今天的事务有什么想法，他会怎么看待自由党？”这是个可供猜测的问题，但我要反问，索尔兹伯里勋爵又会怎样看待今日的保守党？迪斯雷利先生会怎样想？他们可能会说，保守党人已抢走了自由党人的许多旗帜。这话我相信是对的。我相信保守党代表老保守党和自由党的一切最美好的东西，也代表老的工 310 党（在它没有被知识分子理论家污染以前）中很大一部分最美好的东西。

我自然顺着这个调子发言。我提醒听众说，一年多以前，在一个类似的集会上，我曾提出要把我国的政治势力重新改组。在文明世界的每个国度里，现在都有两种强有力的对立观点：一方面是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广泛的民主理想。

在这里，在哈瓦登古堡，我从这个自由主义原则和传统的圣地提出一个问题：目前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他们之间隔着什么东西？没有——除了过去的追忆之外。他们每个党都曾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每个党都谋求对现代问题找出一种解

决办法,而又能保证自由与秩序。他们都谋求个人权利与社会义务之间的平衡。他们都认识到,社会正义感要求我们给每个人保障牢靠的生活基础,决不容许他和他家庭的生活陷于这一水平之下。他们都同样要求,除了要给工人以保障之外,还要与更高的地位及真正的主动积极性相结合,给他们以更多更好的机会,此外,他们都同样有力地谴责现在这个社会党政府严重地搞乱了我国的内外经济。^①

我常想起那个著名花园里的那次集会,那儿有一个已经废弃的古堡,座落在一个小山上,俯瞰山下。这是英格兰最古老的地区之一,附近还有罗马时代的城堡,并且是多少世代以来各种敌对部队的争锋之所。也许有些人会觉得那位伟人的孙子不忠于他的祖父,但更多的人则会赞扬他的勇气和诚挚。

看来格拉斯通先生的品格和风度肯定是渗透在这整个地区——房屋、花园、公园之中,特别是在公园里还留着许多姿态优美的橡树。这些是当时幸免(或者还未成长到可供)他的斧砍而保留下来的。但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第二天一早去小教堂参加礼拜的情景,这生动地证明他的影响和他的信仰力量依然存在。因我看到这小小的乡间教堂里挤满了参加礼拜的人。

继工业宪章之后,我们还在巴特勒领导下编写和发表了其他一些政策性文件。第二个里程碑是“英国的正确道路”。这是以艾登为主席的一个委员会搞的,其中的成员包括巴特勒、索尔兹伯里、伍尔顿、法伊夫和我。我对这一工作满有兴趣,尽力促使它按照进步与富于理想的路子去搞,并在这过程中撰写一些意见交给同事们传阅,有时并吁请丘吉尔的支持。这个文件主要是从以前发表过的政策声明推演出来的。但其中有些部分对外事和社会福利事业问题有新的重要意见。这是那一系列文件中的最后一个,而我们在1950年大选前公布的最后宣言“这是我们的道路”,则大体

^① 在哈瓦登古堡的讲演,1947年9月6日。

上只不过是这较长声明的缩本。

这些活动事实上就圆满结束了伍尔顿的改组工作。候选人的择取；中央和地方的经费；地方协会的独立性；工作人员地位的改善；参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各方面进行宣传的新方法，有了这一切之后，还得重新塑造和重申我们的政策，这才能重新树立整个人民对保守党的信心。我们需要使大战后的选民们深信我们承认充分就业和福利国家是必要之举；深信我们同样承认中央计划之必需，并于物资短缺时该有实物控制。我们需要订出并发表我们在老的自由主义和新的社会主义之间所采取的立场。我当然知道工党有许多右翼人士也在搞这类综合工作。例如，莫里森早就认识到，不这样搞，工党就不能获得更不可能维持政权。对我们来说这事也同样重要，除了提出些详细计划和建议之外，需要把现代保守党思想的新面貌亮给人民看。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踏着我们最伟大的那个前驱者的脚印而已。我们也像他那样得“教育我们的党”。

这一切都使我深为满意，甚至有点沾沾自喜。因我党领导上 312
和作为整体的全党党员现在所接受的政策，大体上就是我过去竭力倡导而未能实现的东西。

由于需要向人民解释这项新政策，这就使保守党党员特别是前大臣的工作格外繁重。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到国内某处去作讲演，而且往往需经长途奔波之苦。这些，再加上花在下院和搞欧洲运动的工作以及处理我自己的业务，使生活相当紧张。不过那是些幸福的年月。孩子们一个个结婚了，孙辈也开始有了。我们在家庭和亲友间的生活是轻松愉快而趣味盎然的。当大选临近之时，我们都感到很高兴。

1950年1月10日，艾德礼宣告议会解散，并指定2月13日为选举日。我们有准备也抱着希望。但我们也认识到眼前这个任务是很吃重的。政府在下院比保守党多一百六十六席，比各党派合

起来多一百三十六席。要单在一次选举中把这么大的优势夺回来，并使我们自己获得足够的多数席位，那将是非常困难，而且几乎也是空前未有的事。

每次大选，对于那些候选人来说，都是件特别重要的事，如果不说独一无二的事。每次大选都曾被人说成是历史的转折点。事实上，除少数例外，它们并不是什么了不起。在竞选者之间的这战后第一次实力较量（1945年的大选是在非常的情况下举行的）之中，伍尔顿正确决定不要攻讦个人，而要把辩论放在有关原则和政策的高水平上。虽然那些习惯于老一套方法的人，觉得这次竞选运动搞得“彬彬有礼”甚至“文明稳重”，但投票人数之多（百分之八十四），说明运动之所以没有引起骚动和起哄，并非由于竞选者劲头不大，而多半是由于他们对面临的责任采取严肃态度。不过我们还是免不了碰到一些无关宏旨的无聊事。工党政府在他们的政策文件“工党对英国抱有信心”中，提出要把制糖业、水泥业、肉类另售业、冷藏业和化工企业国有化的计划。这些企业的经理人员或业
313 主自然要采取种种办法抵制这一威胁，他们在整个冬天通过刷大标语、报上登宣传广告以及其他方式，展开强有力的运动。这就惹得莫里森发火，他看到那些行将被剥夺权利的人竟敢持这种无助于大局的态度，大为震怒：“这批畜生太坏了，你打他们，他们竟敢自卫。”于是他发表声明说，这些罪恶活动的所有费用，都要从拨给保守党候选人的经费中扣除。伍尔顿明智地劝说各公司，在议会解散到投票日之间，停止搞这些广告活动。但西蒙勋爵（前检察长）和法伊夫（前法官）抗辩莫里森的决定不合法。不过这一切最后证明都是无聊之举。这虽在政界人士间引起相当激动，但公家并不理睬。

丘吉尔劲头十足地大力参加竞选。他照常以令人叫绝的妙语攻击他的对手。虽然主要负反击之责的莫里森显然以欣赏的态度

看待这竞选场面，并未发出悻怒之声，但克里普斯却回到他战前的老样子，在发言中嘲讽丘吉尔年岁太大。丘吉尔机智而幽默地进行了反击，正式发表声明，否认他已去世的谣传。

竞选期间照例有头面人物广播政治讲话。在分配给我党的三名播讲人中伍尔顿明智地把查理·希尔博士^①列为其一。希尔是千百万听众都熟悉的“无线电广播博士”，这次以“自由党兼保守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这无疑是竞选运动中效果最大的一着。对希尔博士来说，这也是他日后出色而成功的政治生涯的序幕。

自由党在经过内部各派系的竭力争夺，并大力抗拒地方协会（他们在许多情形下是愿意同我们达成协议的）的压力后，终于提出了四百七十五名候选人。我们花了那么大力气向他们讨好，还落得个这样的结果，当然使我们感到失望。但因他们只向百分之九点一的选民进行竞选，而且只选出九名议员（有三百一十九名候选人落选），所以大部分自由党人实际上投了保守党的票。

由于我自己在布朗利的地位相当保险，于是就花不少日子到 314 全国各地去讲演。人在未到前排地位的一个好处是，他的竞选讲话很少在全国发表，因为有那么多比他更出名的竞选者。这就使他多少能用同一演说词在略加修改后去应付多种场面。这些讲演主要是用来阐释我所辛勤倡导的那些政策的。我个人的竞选讲话则是足够简单的：

正确的政策应该有牢靠的基础。它应该建立在精神的和物质的基础之上。男人女人都有义务，也享有权利。他们对上帝和邻人（用近代政治术语来说就是对国家）都负有责任。这些是他们的本分。他们也对他们自己和家庭负有责任。这些是他们的权利。

在自由放任时期，极端个人主义忽视了人对邻人的职责，过分强调了个人和家庭的权利。

^① 其后为柳敦希尔勋爵。

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教条则同样忽视了个人权利而夸大了国家的权利。

这两种极端都是错误的，他们都依据唯物的哲学，没有精神道德的基础。一个引向无政府状态，另一个导向奴隶制。

正确的路线是“中间道路”，把进步和自由相结合。

四年前我对你们发表演说时曾写下这些话。现在我觉得仍没有加以更改的理由。

这之后我用两页篇幅发挥这一主题思想。

我发现这种中庸之道是听众愿意接受的，并在讲演之中适当掺些打趣和挖苦的话，主要是针对工党方面一些极左派的。如比万和欣韦尔，他们坦率可爱而且真挚，对我们实在大有用处。英国人是不大会喜欢骂对手为“虫豸”的，因为无论如何那些对手至少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也不大会喜欢那样的一个人，他认为除了支持他的人以外都是一文不值的。确实，1950年大选的有趣特点之一是两党都趋向中间。共产党候选人一百个，只有三人落选；被开除
315 出工党的极左分子如 D. N. 普利特，约翰·普拉茨-米尔斯，L. 索利和 K. 齐列亚寇斯则竞选完全失败。

竞选运动平稳过去了。激情要留到最后来迸发。不知何故，当晚午夜前只报出二百六十个选区的投票数字，而除了真正的专家老手，很难从这些数字作出判断。布朗利的选举结果是2月24日下午发表的。当我们在计算票数时，不断送来他处的结果，并且不久就很清楚，这将是一场不相上下的竞赛。布朗利那时已分成两个选区，原来那里的贝克纳姆和彭厄组成了单独一个选区。所以选民减到五万左右。我个人获得一万〇六百八十八张的多数选票已经是心满意足了。当我们在结果发表后去协会办事处时，看到一大群人挤在那里屏息无声地紧张望着得票数字。清晨三点，差数缩小到十五票；到四点时是六票；四点四十五分相差一票；约

五点时，两党票数相等。这场叮叮咣咣的比赛一直搞到后来工党的票数开始增多，于是到八点就肯定知道工党要占多数了。最后的数字是：在新的下院里，保守党和它的盟友国民自由党共二百九十七席，工党三百一十五席，自由党选上了九席。于是政府超过保守党和国民自由党的议席减到十七，超过所有其他党派的议席只有六席。由于在有关信任问题的任何表决中，官方自由党的九票总是支持政府的，所以政府就有了明确的多数，但在那些日子看来，这并不能看作是顺手的多数。

从选民全体来看，摆向保守党的占百分之三。那些把民主制度仅仅看作是供选举学专家搞研究的人，自然会觉得，我们花了那么大力气还只能得出这种结果，未免令人失望。但统计数字往往不可靠。在米德尔塞克斯和伦敦郊区各郡，摆过来的在百分之七、八之间；在伦敦的超过百分之五。在工党的堡垒选区——煤矿区和老的工业区，摆过来的根本没有，或者低于平均数字。所以全国平均数字并不真正代表（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心理上）实际结果。重 316
要的一点是，从 1945 年以来，人们的心情和态度大为改变了。那时“工党”席卷全国，满怀着掌权一代或更久的信心。托利党是残兵败将，几乎溃不成军。而今在搞了五年的社会主义之后，政府只能以极有限的多数重新上台。诚然，由于人口移动，使工党的一些老的囊中市镇几乎无人居住而归于取消，因而重新分配议席的结果使我党约增加二十五席。但另一方面大学的议席也取消了，使我们失去了两个杰出的人：安德森爵士和赫伯特爵士。但是，不管数字大小，可以明显看出潮流已经转变过来了。

1950 年的大选大家都认为是另一场比赛的前奏。艾德礼正式发表声明说“英王政府必须继续干下去。”但每个人口头的问题是“干多久？”^①

^① 基尔穆尔伯爵前书第 170 页。

第十一章 工党政府衰替史

新议会的寿命比许多浅见的人所能料想者要长。这届议会于1950年3月6日召开到1951年10月5日解散,历时十九个月。政府在议会中微弱的多数,本来似不可能使两次大选能相隔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这有着两重原因,一是大政党也像拳击选手那样,斗了一场之后,需要休息一下才能上场重斗,部分是为了养精蓄锐以便重整旗鼓,部分是为了能集结足够的财务支持以便再作较量。二是议会中各政党的组织和巩固程度有了很大改变。在十九世纪,凡少数党成立的或仅靠微弱多数成立的政府,若是没有反对党的包涵,是很难执政多久的。但晚近政党制度发展的结果,使各党对党员的控制大为加强。过去时代的那种流动性,现在已冻结在党纪的严密模子里了。左翼的独立分子几乎消失了;而右翼则人数日见减少,影响日见减弱。在有关政府命运的议会场合,连党内的那些异端分子和不满分子也得像病羊那样乖乖地被人牵去出席。反对党击败执政党的希望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落空。要想在年初几个月迫使政府举行另一次大选,这也看不出有任何希望。

保守党里对下一次大选有许多谈论,我们不仅想使自由党弃权,不投票支持政府,而且还想获得自由党与保守党结成明显的联盟。为此我们必须有适当的基础:

限于大城市试行按比例选举代表的办法,从原则上可以讲很多道理。这样做没有坏处而可能有好处。否则这些庞大的社会主义者“集团”怎能啃得动?像钢铁(企业)国有化这种重大而危险的改革仅以六票之差的多数获得通过,看来是件荒谬的事。征收任何数额资本的议案也

会照样获得通过的。^①

尽管丘吉尔看来也支持这种想法，但其后并无结果。同时下院中的自由党人几乎总是投票赞同政府的；或者，对于他们不可能投赞成票的那些问题，总会事先把他们的意图告知执政党督导处，使其能有充裕时间安排以免出任何危险或差失。在其他较易应付的场合下，他们可把为数寥寥的党员分成两批或三批，有的投票赞同政府，有的反对，有的弃权。他们的唯一目的，看来就是防止政府早垮台。

这一切不定因素，使整个议会高度紧张。从1945到1950年，不管我们的情绪多么愤懑不平，但当时处于这样无望的少数地位，看到我们经常被压倒多数所击败，那是不足为奇的。如今却经常能指望出现有利于我们的票决^②。但即使在1951年春，政府因几个主要部长去世和一些部长辞职而大为动摇之际，工党仍团结一致：

下星期二我们要提出关于原材料状况的议案。这并不是——张不信任票；但是如果这议案通过了，我想政府就将垮台。这议案经精心措辞，使比万，威尔逊，弗里曼等人很难投反对票。^③

但设下的陷阱结果无用：

看来比万，威尔逊之流不太可能反对这一议案，因议案几乎就是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表达的。但比万声明（仅几句话，并保留以后对整个问题的发言权）他将投票支持政府。^④

还在1950年秋，我就感到党的机关和督导处的控制日见其紧。当时对首相致辞的辩论即将引起另一次紧张的票决，我受委托对这场辩论作一总结时，便发觉我们虽以“凭讨论执政”自豪，仍

① 1950年10月5日。

② 英国议会中辩论到难以分晓时，进行投票表决，分两批人，以计算票数，叫Division，姑译为“票决”。——译注

③ 1951年4月25日。

④ 1951年5月1日。

必须坦白承认讨论能影响投票结果的情况是非常之少的。因此，“若要对票决施加影响，医生比演说家更为重要”。^①我接着指出：虽然议会里的独立人士似趋消失，但不受党派约束的选民却日见其多。尽管我们把自己约束得愈来愈紧，我们只不过是那些独立的男女选民决定命运的人，是他们决定选举的结果，决定政客的命运，决定政府和各党派的遭遇：“我们的政治命运系于浮动选票”。^②

每当开始辩论一项重大问题时，报纸就猜度种种结果，殊不知结果之确定是不容置疑的，除非是因病或不得不缺席的场合对一方的影响甚于另外一方。1951年2月我病了，故对那激动人心的一周内所发生的大部分事情未能亲历其境。丘吉尔猛烈抨击钢铁国有化提案。但当进入票决时，

政府(尽管报纸预料流感将会影响票数)以十票多数获胜；七名自由党员投我们的票。票数是三百零八比二百九十八。每一票(除我的票以外)都是在预料中的。这种票数确是异乎寻常的——谁也不记得过去曾有过这样的票数，它表明各方面都越来越紧张了。一个次要提案在委员会讨论阶段的普通票决，投票人数为四百五十到五百。在这种督导书标三行议案^③的场合下，当然不会有普通搭配^④。如今只有垂死病人才能形成搭配。

次日，政府多数降至八票；又一政府支持者病倒而我则回到议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0年11月7日。

② 1951年2月9日。

③④ 英国各大政党有一种督察机构，叫 whip，其字面意义是“鞭子”或“鞭策”。这种机关和其中的官员都叫 whip（译为督导处和督导）。这种机构的作用主要是保证该党议员在重要场合必须出席，并每周发给议员督导书(也叫 whip)，通知议会中将讨论的议案，其重要程度则由文字下所标横线的行数表示。标有三行的最重要，在这种场合议员必须出席，若无充分理由缺席则可能开除党籍。如因故拟征求督导处同意缺席，督导处还得事先安排，问妥对方督导处是否也有类似情况的缺席者，如有，便形成搭配，才能批准不出席。——译注

会。但政府还是撑住了。

当然会有人死去；但除非那些议席未稳的人愿意死，这都无补于事。据说有一个（政府支持者）快死了，但他们有两万票的多数，区区一人又算得了什么。再者，那些年岁较大看来最可能在紧张斗争中病垮的，往往又是席位最稳的人。^①

1951年3月1日，在对现役法案作通宵辩论之际，社会党（指 320
工党，下同——译者）左翼对其中一条款大加抨击：

那些“同志们”一直酣战到午夜以后，其中还对社会党部长先生们以前的发言说些挖苦的话。在第6款辩论完毕之后，我们对第7款提出修正，迫使举行一次票决，结果是八十四对八十二（以二票之差被击败）。^②

讨论到第12款时，我起来发言反对，虽然在我们自己的议程单里没有这一项动议。我想这时有些政府支持者可能以为不会再有票决而悄悄溜掉了。

这一着并不完全成功，但确乎搞出一个平局：八十二对八十二。当然委员会主席投他决定性的一票支持政府。

于是“散会睡觉”。

次日，在一反对派议员所提动议的票决中，我们以四票多数击败了政府。

因这是个重要问题——原材料短缺问题——而商业部大臣哈罗德·威尔逊又偏要对此大发议论，这一失败对政府是个打击。^③

但这还不是致命的。

1951年3月中旬，当我访问斯堪的纳维亚返英之际，发现议会情况异常，它

完全失去控制，就像一位软弱老师上法文课时那样班上秩序混乱。各个

① 1951年2月9日。

② 1951年3月1日。

③ 1951年3月2日。

议员随便互相咒骂，也合起来共骂议长。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情况。每天质询开始以后，就对程序或特权问题争执不休……政府劝告议长要在选择常任委员会人选时进行干预。这一切和其他内部小纠纷都争得面红耳赤。①

当时我国正受到世界许多地方的种种伤害，而政府又只占如此微弱的多数，议会中充满了派性和斗争：

我们在国外没有力量，没有信誉，没有权威。但在国内我们却像寻开心似地争吵。仅仅离开一星期之后重返这种气氛中，就感到像是跨进一个疯人院。②

就这样日复一日地下去：

自从大罢工和贸易纠纷法案那些日子以来，从未记得党派之间有过这样紧张的情绪。更糟的是，议长显然已支撑不住了。他总把开会拖长时间看作是对他个人的一种侮辱。〔结果是〕他的裁决常常受到抨击和议论，他也只能让这些议论进行下去，有时一下子议论半小时。到了深夜，他时而发出微弱的呼吁，时而发出更微弱的威胁。③

接着是对采取“祈祷”——即在会上提出取消某一议程的动议——进行咬文嚼字的辩论，这种“祈祷”当时可在正常休会的时刻以后提出，并在整夜中几乎不断地提出。我们这种战术搞得很成功，使威尔逊在绝望之下

宣布说，如果托利党（指保守党，下同——译者）人坚持要“祈祷”，他就要中止进行那些可能需要新议程的关于贸易问题的种种辩论了。④

这是个荒唐的失着，对此丘吉尔充分利用大做文章。于是唇枪舌剑继续交锋。本人曾发表过一句谬言颇为传闻一时：

“这东西（指政府）除了祈祷和斋戒是不会出去的”。举国已经斋戒一些日子了。现在该让下院来祈祷了。⑤

①②③ 1951年3月12—17日。

④⑤ 1951年3月20日。

1951年6月里的一次会几乎开了二十二小时，从星期四下午 322
一直开到星期五午后：

政府所得多数票全在八到二十之间(大都是十票)。丘吉尔始终坚持在场，给党内人很大振奋，并在每次票决时都参加投票。①

在7月里，

我们在林业法案的委员会辩论阶段以三票的多数击败了政府。这不是个大胜仗，但对他们是个适当的刺激，这就会迫使他们在终会以前每个整天都得发出三行督导书。②

这些场面我认为不能引起公众多大兴趣，而且某些方面证明对我们不利。但在当时那是不可免的。随着议会的进行，政治斗争愈来愈剧。骨子里还保持稚气的丘吉尔就喜欢参加这种混战。也许估计到即将到来的大选，他想趁此显示他的能耐和精力，尽管他当时已届七十六岁高龄：

他意识到许多人都觉他年纪太大不能再组政府，也知道这可能在大选中被用来作为反对他的口实，他就特意利用这些日子来显示他的精神和活力。他在每次票决时都参加投票；作了一系列精采的简短发言；把他那谈吐幽默善于挖苦的本色流露无余；最后以一顿非凡的早餐（上午七点半）作了登峰造极的表演：蛋，咸肉，辣酱油和咖啡，接着是大瓶威士忌、汽水和一支大雪茄。后者很博得大家的赞扬。他的这一切天天受到比弗布鲁克系各报的表扬；他在崇仰和欢呼他的旁观人群中，驱车进出皇宫场，除了当天下午他的赛马殖民者二号③获得阿斯科特④金杯奖一事外，还有什么能使他更出风头的呢。⑤

如果说这十九个月来下院里搞得有味而且往往搞得有劲的

① 1951年6月6—8日。

② 1951年7月16日。

③ 丘吉尔开始赛马，这匹马使他获奖。

④ 每年7月在此举行赛马会，1711年莫依安妮创始。——译注

⑤ 1951年7月16日。

话，那末我恐怕我们这种行为无补于议会的尊严。在早期议会史中，这也许不致被认为是失常之举。但战时行政权力增大之后，使人感到在议会里要把戏捉弄政府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不过丘吉尔彻底享受了这种消遣。

艾德礼在所有这些场面下始终保持他特有的自制，有时甚至显得漫不经心。在这几个月里，不仅他自己染病，而且损失了最重要最忠心的两名同事——贝文和克利普斯。

赫伯特·莫里森继贝文之后任外交大臣，在此之前他已显示出是下院里一名成功的而且几乎是胜利的首领，在院内外都是政府的坚强支柱。但他当外交大臣却不那么胜任愉快。他的发言铿锵有力，能在济济一堂的下院里激起党派热情，但他的政治宣传组织才能却很不宜于应付其即将面临的更困难（因它更不易处理）的任务。他有点吃不消，似乎也自知他不能抓住问题的要害，或者不能使他的那套辞令适应新的工作岗位：

一次冗长而颇乏味的外交工作辩论。他照本宣读了一份面面俱到的演说辞，就像往常外交部里那些小伙子给贝文所起草的一样。但贝文至少会在宣读过程中随时插入些他那出口成章的粗话（使厢座里的那些小伙子为之惊讶）。^①

但莫里森却善于利用国外局势来谋取国内政治好处。当波斯问题和埃及问题发生之后，他多方设法诱使丘吉尔采取一种使他能斥之为“战争贩子”的立场。

莫里森肯定不企求当外交大臣。这一任命对他其实是欠公平的，他在“和平时期政府中这个最伤脑筋的职务”干不出什么出色的成绩来，无疑是在艾德礼辞职后不能继任工党领导人的原因之一。这对他是个痛苦的打击，因为他有一切理由自认为他是1945年工党获胜的伟大组织者，从而是艾德礼的天然继承人和接

^① 1951年7月25日。

班人。

克利普斯的后任是盖茨克尔，这是选得很好的。虽然他的发言有点经济学论文的味道，但他的态度是和解的，因而不久赢得整个下院的尊敬。他的预算案总的说来是合理而又可敬的，因此当他提出预算案时，他第一次获得举国称誉：

新任财政大臣盖茨克尔是多尔顿博士的高足。他仿效那位老师颇爱卖弄博学的文风，絮述显然的事理，有气无力的手势，令人不快的微笑。但他发言的姿态虽像多尔顿，内容却像克利普斯的。他的发言是成功的，具有现今使发言成功的一切因素……

他的广播演说甚至比这还要好。^①

尽管所居多数极为有限，内外压力日见增加，又丧失了几个最著名的忠实同事，艾德礼并不因而丧气，仍怀着勇气和决心坚持他的工作。他得面临新的、不可预料的危险处境。这些都来自国外，但对国内每次都立即有可怕的反应。本来已很紧张的英国经济局势又加上压力，使它在1951年秋面临严重的危机，甚至崩溃。他相继面临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波斯的没收英资石油公司以及埃及的反英运动。这些事件中的第二件总算经多年商谈之后满意地调整好了；第三件孕育着不少未来的麻烦。而第一件——朝鲜战争——则对经济局势和工党两者都具有迫切而又深刻的不利影响。

日本在二次大战中终于战败之后，苏美占领军在朝鲜相逢而止于三十八度线。1946年4月双方代表举行会议，未能就朝鲜统一问题达成协议。拖了又一年之后，代表们重新开会。还是不能找到解决办法。于是美国把这事提交联合国，由联合国指定一委员会主持选举，以期选出一立宪议会。1948年1月联合国委员会按时到达南朝鲜，但其人员未能获准去分界线以北。不过南方仍

^① 1951年4月11日。

然举行了选举,空出适当比例的席位给北朝鲜,以备他们一旦准备与会时参加。但这一邀请被拒绝了,于是北方就成立一个“人民共和国”,并出现这一不祥称号所带来的一切。俄国人和美国人都同意撤走他们的武装部队。到1948年底,俄国人声称他们已撤完了。不过他们留下了经过俄国训练和装备的十二万五千左右北朝鲜军。六个月后美国也撤完了,留下五万名南朝鲜警察维持治安。在这之后的当年几个月里,边界冲突不断发生,到1949年底,由中国共产党人训练的北朝鲜部队开始重返北朝鲜。之后是一段不安稳的和平,美国人虽然看了有点着急,不过一般并不认为可能出现什么大危险。但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人越过三十八度线发动有力进攻。在美国请求下,安理会立即开会。当时苏联因中国仍由台湾的蒋介石流亡政府作代表而抵制出席,使安理会处于可喜的地位。因此在没有俄国否决票作梗的情况下,得以一致通过要求北朝鲜人撤退,并吁请各会员国协助。两天之后,杜鲁门总统宣布将派美国海空军帮助南朝鲜人防守其领土。7月2日美国人又投入地面部队。几天之内有四十八国同意给予某种支援——军事的、经济的或医药的支援。到年底有十四国确实派出了一些武装

326 部队。英国先是说派遣海空军部队,不久又答应派一支陆军部队。根据安理会的一项建议,所有联合国部队的总司令由美国政府来任命,于是对日战争的英雄麦克阿瑟将军就被任命干这职务。

艾德礼对付他所谓共产党政权的这一直接挑战是毫不犹疑的:“这是赤裸裸的侵略,必须加以制止。”他的发言里还包括这样的话:“根据过去三十五年来我们的痛苦经验,大家一定会同意,不管什么地方发生侵略,必须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加以制止,才能使我们全体免于浩劫。”^①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0年6月27日。

下院支持政府决定,无一异议。部长们还指出共产党的侵略仅仅是共产党施加压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自己也在马来亚受到类似的威胁。虽然有些工党议员鉴于我们在其他方面的一切义务,对派兵到这种远方战地一举有所指谪,但议会和国家是支持的,认为有此必要。确实,当想到可能在国防、重整军备和经济方面产生严重的后果,曾使我们之中许多人一度觉得在完成此项任务以前可能需要先成立一个新的联合政府。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才使保守党人对9月里政府的决定恨之入骨。这一决定是:继续执行钢铁国有化的最末几段工作,并强使这一独党措施在虚弱的上院通过。自此以后,辩论以有增无减的敌对情绪继续进行,而集中举国精力来应付新危机的一切希望,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泡影了。

数量虽少但足以表明全国决心的第一批英国部队于8月底到达,并立即扩展为一联邦师,他们在整个战役中都打得有勇有谋。到9月中联合国军已到达三八线并赶走了侵略军。但美国人当时又决定越过此线推向中国边境。于是联合国军在10月9日越过了三八线。在整个10月份内战争进进退退。中国“志愿军”的一次大规模的优秀反攻迫使联合国军退回原先阵地甚至更远。对中国和北朝鲜军的强大、凶猛及其有效的指挥,引起了相当大的惊慌。到11月前途仍在不可知之数: 327

如今看来,麦克阿瑟的乐观是不对头的,因报载北朝鲜举行一次大反攻,其中可能有十万到二十万之数的中国人参加,换言之,美国对中国的战争开始了。当然,也可能俄、中方面之计是要把美国及其盟国尽可能深地拖入这场远东冒险事业中,然后再在别的什么地方点起火来。据说伊拉克撤消了它同英国的条约。可能波斯也会接着起来惹麻烦。那时俄国人会忍不住在中东开始动手,那里的代价是真正巨大的——它供应欧洲的石油。

同时,下院却以典型的英国人逃避现实的态度,对是否应在星期日

下午开放不列颠游乐园欢庆活动的问题讨论得津津有味。^①

在这关头，所传美国总统的一句话引起了下院的深刻担心：

好像是在一次普通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杜鲁门总统关于原子弹的事。他说是“在考虑中”。（以后解释这话的意思是：原子弹也像所有别的事物一样总是在被人考虑着的。）你可以认为议会当局会把这个陈词滥调（或官腔）理解为不采取任何行动的同义语。但看来这话却使工党人士感到像是惊慌失措了。一封致政府的公开抗议信立即得到一百人以上的签名。^②

最后，在那一日之末，在那个自慕尼黑以来最不平凡的日子，艾德礼宣告他打算立即前去华盛顿：

这决定在下院宣布之后立即引起一阵歇斯底里反应，正如张伯伦那次出名飞行所引起的一样。^③

同时中国人的浩荡大军汹涌而入，看来谁也不知道英美部队能否结成并守住一道防线：

我觉得几乎更加使人不安的是我国人民那种“一厢情愿的想法”。看来谁也不理解中共和俄共之间的紧密联盟。那种认为中国能用交情拉出去的想法，我确是很怀疑的。^④

反对英国深深介入远东战争的，有一个更重要的军事方面的理由：

我们的（也就是说整个自由世界的）弱点是这样显著，因而愈来愈深地陷在世界这一部分战线上，肯定是件很冒险的事。^⑤

有人怕俄国在欧洲采取新行动。还有人觉得麦克阿瑟做事愚蠢，也许他不按命令做过了头，以致冒险越过三八线把战争搞到中国边界上。当时的国防大臣欣韦尔把这一点说得很有力，虽然不一定很有分寸。他在一次周末讲话中猛烈批评了麦克阿瑟：

看来欣韦尔对麦克阿瑟的异乎寻常的攻击，使他自己和他的党在国

① 1950年11月27—28日。

②③④⑤ 1950年11月30日。

内大为不利，但这些攻击并没有在美国报纸上广泛传播。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动议谴责从而进一步宣扬他的“失言”似非明智之举。何况欣韦尔所说麦克阿瑟不按命令做过了头这话很可能是对的。但责难中的真正要害是……没有像大战时期在联合参谋长之下那种明确的指令、有效的磋商和控制。^①

(联合国军)继续后撤，艾德礼与杜鲁门会谈进行得如何，从华盛顿传来的消息很少。但两国政府有重大分歧则是明显的。下一步该做什么？是姑息还是战争？我们该不该向中国提供联合国的席位作为侵略的酬报？或者莫如再投入一切可能的力量而在获得全面胜利之后恢复旧日边界？这时丘吉尔和其他人担心“我们在西方如此孱弱之际‘陷在东方’的前景”。^②我个人则不甚相信俄国在西方发动进攻一说，因那将会引起可怖的原子战争。

当先是远东接着是中东被共产势力席卷，或因其恐惧共产势力如此之甚，以致我们在那里的影响完全消失，从而逐步迫使欧洲只能依靠自己，这岂不是一种更为危险的前景吗？^③

保守党人是焦虑不安的，他们在各种非正式集会上流露出这种忧心来。我和一些同事认为可虞的是我们把在东方脱离接触的战略好处说得过甚其辞：

我们把道义问题(无端的侵略)等等强调得不够。对一种东方“慕尼黑”的警告也提得不够强烈。尽管不“陷在”(照如今的说法)朝鲜从技术上讲有多大好处，道义上的失败肯定将意味着白人在东方的地位完蛋，而且这道义上的垮台很容易传播到西方。

如果印度支那丢了，暹罗(指泰国——译者)跟着也就完了。然后是马来亚。在这种情况下香港自然不保了。缅甸再一丢失，共产主义就易于征服印度。欧洲在世界的无上权威主要依靠它在非洲和亚洲的

① 1950年12月6日。

②③ 1950年12月11日。

地位。①

艾德礼从美国回来,于12月14日向下院汇报,讲得很好,表现了相当大的勇气。这显然不合他那一党的胃口。我很奇怪有那么多的人内心里其实是绥靖主义者或失败主义者。这里包括两方面的人,一种人是去礼拜堂的老派激进和平主义者(值得尊敬的,虽颇为执拗的人),另一种人则是共产党知识分子及其同路人。②

丘吉尔和他的同事们多次讨论之后,作了很好的发言,统观了整个局势,把在东方和在西方该做的事精确加以权衡。最后他吁请政府至少在这危急时期放下钢铁国有化的事。这自然是使分裂了的社会党人重新团结起来的一个信号。

如果目的是要使对方分裂或想利用对方已显示出来的分裂,这发言并不巧妙。但我认为它可鼓励国内许多支持我们的人,他们已开始觉得我们对政府几乎支持得太过头了,而并未获得对方的丝毫感谢领情作为回报。③

附带说,欣韦尔的发言攻击虽属失常,看来几乎是满有理的,因当时日趋衰弱的贝文透露出奇怪的消息说,

麦克阿瑟并不从任何联合国参谋部或英美参谋部领取指示,而是接受美国各参谋长的指示。我们曾对越过“裤腰带”的事表明我们的看法,但他们不听。④

新年里中国人又举行一次有力的进攻,我们只能勉强挡住。接着在欧美从一些神秘人物口中流传出一些和平建议,这些都被一般人按其表面价值接受了。但我认为其目的主要是想在美国和其盟国之间打进一个楔子。

从朝鲜来的消息仍是糟得很,前途莫测。现在(我方)的计划似是打算撤到战役开始时被迫退回的釜山桥头堡。同时联合国里拟就了要向

① 1950年12月13日。

②③④ 1950年12月14日。

中国人提出的一项新的“和平”或者莫如说是“停火”建议。它建议就朝鲜问题、福摩萨(指台湾——译者)问题以及其他远东问题同中国人直接商谈。①

印度政府在尼赫鲁指使下对美国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妥协,这同他们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所取态度截然不同,未免令人诧异。最后美国勉强同意联合国提出的一项“停火”建议。1月17日晚,我出席一个宴会与伍尔顿同桌,当时在场者尚有鲍勃·孟席斯(澳大利亚总理),西德尼·霍兰(新西兰总理),艾登,马克斯韦尔·法伊夫和利特尔顿:

正值就餐之际,消息传来说中国人拒绝考虑联合国所提“停火”建议,而这主要是应英联邦之请而提出的。大家听了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如果会谈真的举行,则可能严重危害英美联盟。

大家还一致同意如今应致力作战并力求守住朝鲜一部分地方。②

战线迅即喜获稳定。但传来关于麦克阿瑟的消息却有点使人担心:

该将军在—批阿谀奉承的“应声虫”包围之下,日甚一日地生活在忘乎所以的君王气氛之中。他不向任何人——更不向华盛顿透露他的政治和军事计划。③

到是年春,大家都明白

麦克阿瑟专横武断,但至少懂得他要干的是什么——那就是同中国人打,并尽早把他们打败(如同1920年时丘吉尔对付布尔什维克俄国那样)。杜鲁门动摇不定;马歇尔则据说已年迈不起作用。英国政府既弱又分裂,对事态很少或不能施加影响。④

① 1951年1月12日。

②③ 1951年1月17日。

④ 1951年4月7日。

332 这一切同二次大战时我们所处的顺利情况形成可悲的对比，当时由丘吉尔-罗斯福合伙，有组织周密的军事参谋部为他们服务。可是不料在一两天内就作出了断然的决定，4月11日总统承担风险撤了麦克阿瑟的职，代之以李奇微将军。这以后不会再“冒险”了。我们将全力守住并巩固三十八度线。

6月末苏联政府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采取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行动，他

发表了一篇奇怪的广播讲话。其内容大都是对美帝国主义对（北）大西洋公约等等的久已听惯了的谴责。但其中有在朝鲜搞个停战协定的话，基础是双方都尊重三八线。星期天报纸上满篇都是这个消息；但这又有点太像希特勒的老把戏。等着瞧美国政府会有什么反应。①

6月29日李奇微将军提出了一项停战条款。这“在原则上”被接受了，于是7月10日开始讨论。会谈经过是曲折多变的，并且拖了好几个月。这把戏中国人玩得比较聪明，他们一度成功地使美国将军们处于

一群战败者乞求无条件投降的地位！除非他们带着“政治顾问”，那些（实际上是所有）美国将军也只能这样做。②

最后，所成立的停战委员会于11月27日同意了一条停火线，但由于交换俘虏问题辩论不休，战争还在时打时停地继续着。

不过大家都清楚，战争事实上过去了，虽然还得过许多个月甚至几年才能接受正式和平，到1953年7月14日那天战争从一切实际意义上讲业已告终。

333 这次大斗争在英美关系上有其重要反应，它加快了欧洲重整军备的步伐，其中有——尽管多么迫不得已——德国的参加。它对英国国防政策也产生类似的影响，随之严重影响我们的财政和

① 1951年6月29日。

② 1951年8月5日。

经济,而这又引起政治上的严重后果。

朝鲜战争所首先冲击的自然是一九五〇年的防务规划。三月间白皮书发表时丘吉尔已对此感到不满。他诉苦说,我们在欧洲和海外所承担的这一切义务之下,如今要在接到通知后短期内派出仅仅两个旅到世界任何地区去的能力都没有。现在整个问题刻不容缓了。短短几个月之内贝文不得不勉强接受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这在他早先几次同丘吉尔的辩论中,曾被说成“纯属蠢事”。政府经考虑后开始提出增强军事能力的明确建议。七月底他们宣布增拨国防费用一亿英镑,主要用于扩充战斗机数量。虽然还要派一些地面部队去朝鲜,国防部仍强调要优先照顾香港和马来亚。同时正规军取消退役,还招募了限定数目的后备军。

丘吉尔对这些建议的规模和提出的时机都不感多大兴趣,他不断要求举行秘密会谈,以便能坦白而无拘束地讨论我们的各种困难。尽管艾德礼不赞同这计划,丘吉尔仍坚持。七月二十七日他提出要“审查闲人”。这一提案要是通过的话,就等于把议院里除议员和工作人员之外的一切人都赶走。这议案仅以一票之差被击败。接下去辩论时,丘吉尔的发言虽忧郁,但能动人。他特别担心西欧常规防御力量孱弱可危。俄国至少有八十个师,西欧只有十二个;俄国有二十五到三十个装甲师,我方只有两个。欧洲的防卫主要地虽还不是唯一地依靠驻在东英吉利的一百八十架美国重轰炸机,而这些只能在准备付出原子战争这种可怕的代价时,才能加以运用。我们的主要工作应是不顾一切牺牲保护这些轰炸机。但 334 我们干了些什么呢?我们卖了一百架喷气机给阿根廷,还有一百一十架给埃及,而该政府则不顾条约义务,不让英国船只通过运河,说是所载货物可能运往以色列。

美国政府也发出类似呼吁,要求英国增加防务拨款。也许是受了他们的影响,也许是接受了丘吉尔的要求,政府对其防务政策

宣布了一项重大的，几乎可说是耸人听闻的扩展。他们提出一个规模大得多的三年防务计划。这三年内将要花费三十四亿英镑。这样国防费用将由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八增至百分之十。这对各方面当然会有严重的不利影响。支付平衡将为之破坏，因进口必增而出口必减。为应付这一局势，政府吁请全国共怀危急之感，并相应增加生产。

数日后议会休会，丘吉尔和一些同事聚会在斯特拉斯堡。他告诉我们说，他曾要求同首相会谈，首相有礼貌地接见了，但对前途的困难和危险似拿不定主意，而又束手无策：

[丘吉尔]对他前几天同艾德礼的会谈感到失望。看来搜罗三千士兵和装备到朝鲜去就得花两个月！甚至要一些高射炮也只能从林肯郡防守美国“原子”轰炸机的那些高射炮里抽调。^①

不过政府尽力做他们所能做的一切。8月底宣布增加服役军薪，兵役期从十八个月延长到两年。从以往社会党人一向对国民兵役制的态度来看，这确实是很有勇气的一步。

议会休假一月后复会，又发生了另一重大辩论。大家知道政
335 府提案不能再修改，因我们支持其中三项主要建议：增加正规军薪，两年国民兵役期，以及一项含糊然而内容充实的重整军备方案。辩论将进行三天。因首相关于国防问题所说的话比我们所期望者还要肯定和坚强，所以大部分讨论转到经济后果方面来。

首相宣布辩论开始，其态度和往常一样——说话简要、严谨而无懈可击，并且还带几分尊严。《泰晤士报》喜欢这样的人，因这使他们想起张伯伦，缺点在于完全没有领导气派。“我们做到了人们所希望于我们的一切”；“我们正在做盟国所要求我们做的一切”；“我们所做的并不少于任何其他人”；“美国人要求我们做这做那，我们积极响应”。一个大不列颠首相持这种态度是不太能鼓舞人心的。当我有时闭眼，就感到好

^① 1950年8月6日。

像自己又回到 1937—39 年时代。负责的社会党人——头脑清醒而又可靠的人——现在也甘于说出像尊敬的保守党人所惯于说的那种话来了。怀特利模仿了马杰森。^①

现在政府建议三年内军费增到三十六亿英镑。这些钱要用来建立六到十个正规师，其中有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留驻国内。现驻德国的两个装甲师要加强并增加第三个师。明年将有相当于十二个地方师的兵力。我们的空军将因扩充喷气战斗机而相当增强，堪培拉型轰炸机也将予以改进。这一切形成一个相当可观的计划，我们除了批评以前因缺乏远见让我们的弱点保持得如此之久而不加改正之外，再没有什么别的话可说了。丘吉尔因此表示欢迎这新计划。他发言中谈到政府和反对党双方的职能时，有这么一段难忘的话：

政府和反对党都要尽他们的责任，但其性质不同。政府掌握全部行政权力，其担负的任务——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很沉重的——是保证国家的安全；政策的形成、制订和实施之权，全在他们手里。 336

反对党的责任限于在我们同意认为国家安全所需的那些措施上协助政府，同时尽其可能来批评和纠正所能看到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反对党没有责任来提出完整而复杂的政策措施。^②

他接着说：

这次我们将投票赞同政府提案，但我们并不以此限制自己的这种权利和义务，而仍将以充分的自由对其政策和事态进程进行批评。^③

当时我就觉得，这将成为说明在朝党与在野党间宪法关系的一段经典性言论。

秋天召开工党大会时，对如何应付物价、费用和工资上涨的问

^① 1950 年 9 月 12 日。威廉·怀特利是政府方面主任督导，而戴维·马杰森则是战前主任督导。

^{②③}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0 年 9 月 12 日。

题，似有许多混乱看法。当时我以颇为愤世嫉俗的心情写下了自己的感想：

只有一点很清楚，即打算“从富人那里挤出钱来”偿付重整军备的费用。甚至莫里森也得承认这一点。克利普斯走了，在病院里。有人说他病了，还有人说他疯了。因他一向就是个又病又疯的人，我倒希望他回来重新当财政大臣。^①

翌年初，即1951年1月29日，艾德礼以真正的政治魄力宣布一项扩大的国防计划，这连他的许多支持者也并不欢迎，而批评者不限于极左分子。他直言不讳地声称需要付出新的和痛苦的牺牲。需要征收新税；须节省社会服务的开支；民用事业费须削减或暂停支出。几天后我们听说提出的总数已增到三年内四十七亿英镑，物资储存和资本投资还不算在内，显然经济局势必将变得严重，而且如果没有坚决措施可能成为灾难性的。但他竟然有办法让他的部长们和党内接受这么庞大的一项计划，我们真是不胜佩服。六个月内计划变了三次，规模和支出都一次比一次大，这一事实至少说明政府在不断努力赶上形势的发展。

这些年月里伦敦时时有人几乎在公开谈论俄国人可能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作出什么反应。但是许多人认为这种恐惧是言过其实的。在参加一家重要大使馆的宴会之后，我记下了当时的议论：

现今主要是公开谈论俄国会不会在今夏攻打南斯拉夫。大使告诉我南斯拉夫人现已认为这事不像前几个月那样肯定了。朝鲜事件使俄国人不得不多想一想。他们本未料到美国会作出什么反应的。还有人说可能斯堪的纳维亚得先被“干掉”。我们如今所生活的真是个奇怪的世界——或莫如说是个两重性的世界。我们以一半的心思应付日常事务，计划来年等等的事；又以另一半心思讨论（私下的，无人报道的）文明世界行将来临的末日。但尽管这样，我相信世界总还会生存下去。^②

① 1950年10月5日。

② 1951年1月31日。

保守党既已全面支持政府国防计划，大家的兴趣便开始从军事问题转移到财经问题上来。拿什么来偿付这新的负担？它对我们的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美国贷款已经用完；国内赋税已很重，部分用于偿债，部分用于负担战后义务，部分用于支付福利国家日益增多的需要。我们已被迫贬了一次币值；看来又面临着另一次。所以大家都以焦虑的心情等待新预算案的提出和它的后果。这是新财政大臣盖茨克尔提出的第一个也是末一个预算案。

工资和物价的相对稳定时期业已过去。那些国有化工业——338
煤矿和铁路——带头提高物价和工资，每一方都把提高的原因归罪于另一方。虽然物价控制制度从原则上讲仍在执行，但连部长们也承认物价的进一步提高不可避免。食品津贴每年达四亿英镑，这个数字是克利普斯定下来的，政府已坚决不许再增加。所以小麦和肉类费用一旦增加，这必然要反映在消费者所付的价格上。

盖茨克尔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糟糕的局面，这局面又因重整军备法案而变得更糟。消费量将因涨价和物资短缺而减少或至少受到控制，这一点他确信无疑，因而对赋税只提出适量增加。这些增加包括标准所得税率增六便士，分配利润的利润税增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每加仑汽油增税四便士，征收较高的娱乐税，以及对汽车、无线电、家用煤气和电气设备购置税的增加。这一切在当时情况下看来都是合理的，虽然反对党的评头品足使财政法案特别是关于限制海外投资条款的辩论照例拖了一些日子，但真正使人感兴趣的是安·比万的立场。盖茨克尔在艾德礼和整个政府的支持之下决心要限制那日益增长的国民保健服务费用。比万已大胆声明，如果政府要迫使利用保健服务的人付出什么钱来，他决不当这一政府的成员。由于盖茨克尔在预算案报告中宣称立法要求患者支付一半的眼镜费和假牙费（这在以前是不收费的），往常隐藏在那些枯燥统计数字后面的人间悲喜剧，便立即引起各界日益增长的

兴趣。首相正在住院，他的病情有必要使他免担这份忧虑。还有什么事能比比万和威尔逊去找他谈话会更严重地影响他的治疗呢？
339 可怜的艾德礼在提出预算案的前一天还得经受这番考验。但看来他仍以往常那种无所谓的态度应付了这一考验。盖茨克尔肯定按照克利普斯的严格理论办事，对于克利普斯呼吁过的一切阶级，他也要求他们拿出同样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如果克利普斯在职，他显然也会对社会服务费用采取同样的限制。保健服务工作在当时和今日都是社会主义者认为不可触犯的神牛，但由于克利普斯在工党左翼中的威信甚高，如果他在职，比万的反叛将无足轻重，甚至根本反不起来。比万是个热情、易冲动但并非完全不懂世故的革命家。但克利普斯，带着圣洁气味，有干过激烈鼓动工作的优良记录，他是“海绿色的出污泥而不染者”——是罗伯斯庇尔，不是丹敦^①。盖茨克尔当时还不能指望在党内达到这种崇高地位，虽然他的勇气和决心从未稍懈。

经过一个星期的议论纷纷之后，4月23日终于宣布工党的大臣比万辞职了。双方往来函件的文体新颖，而这种文体嗟乎今日已流行成风——“我亲爱的克莱姆”（对艾德礼的爱称——译者），“我亲爱的奈”（对比万的爱称——译者）。自此以后，这种表示亲密无间的称呼有很多人仿效。但这里并不能掩盖通信者双方互相深恶的情绪。再从艾德礼那封有几分恼火气味的复信中，还可以看出艾德礼感到比万把争执范围扩大到“远远超出我认为是你当初所反对的那件事”。因比万不仅说他反对装假牙配眼镜收费，而且还反对预算案中许多别的东西。他为各社会阶级之间分配不公平的新增加的负担鸣不平。他争辩说，军事开支的规模是不可能

^① 罗伯斯庇尔与丹敦都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领袖。“海绿色的出污泥而不染者”是卡莱尔在《法国革命史》中描述罗伯斯庇尔的用语。——译注

办到的。他反对财政大臣打算靠涨价来控制消费，而不顾工业会脱节，民众会不满。最末他声称预算案将标志着取消社会服务事业的开始，而这本来是工党特别引为自豪的东西。当天下午比万发表个人声明。

这类声明我已听说过很多。艾登，克兰伯恩，德·库柏，萨·霍尔等人都发表过这类声明。艾登措辞谨慎尽量不使他的同事难堪，因而许多人读了他的声明还搞不清楚究竟他和张伯伦争论的是什么事。克兰伯恩说话有分寸，然而不饶人。德·库柏气势汹汹，但用语典雅。萨·霍尔则几乎是痛哭陈词。比万的“自白”虽在内容上无新颖之处，但其方式上却肯定是别开生面的。这是他对一些同事的猛烈声讨，措辞之尖酸刻薄殊难置信。从某一点说这写得不错，但他终于失去议院中的同情。他说明他为何同意付一先令的处方费和把去年造房数削减二万五千。他之所以同意，乃是因为他明知这些措施不切实际，行不通。这种话使议员们听了吃惊。他对一些同事施展了诡计——更甬说是耍了两面派。^①

关于比万的前途如何，有许多猜测。许多议员认为他“完蛋”了。

我认为不一定。他说的一些话是绝大部分社会党人盼望他们的头头说的。他的反美主义是一条能获得人心的路线。他们中许多人都赞同他对预算案的攻击。社会党人对他的“不忠”很气愤，因这要影响他们的席位……但其实都赞同他的思想感情。“干吗不来一次征收资本呢？”^②

艾德礼在紧接着的暴风雨之后尚能幸存下来，但谁也不相信议会寿命能拖过秋天。

贸易委员会主任威尔逊也辞职了，明天他该发言。听说弗里曼（他是供应部副大臣）将要辞职。这将使在辞职边缘摇摆不定的施特劳斯处于难堪境地。我料想一旦到那地步，他和斯特雷奇会〔犹豫〕的。^③

次日报上对比万大加攻击。那些敏感的记者和主笔们看来对他那愤世嫉俗的不忠很生气。我仍觉得他可能变得既可畏又危

^{①②③} 1951年4月23日。

险。他的发言并不面向 1951 年或 1952 年的大选，而是看得更远。
341 翌日下午威尔逊发表声明，他由于同情比万而辞去贸易委员会的职务：

语调更典雅些——温和而又伤感。议院和工党都喜欢它。除了弗里曼之外，再无别人提出辞职。威尔逊发言之后，辩论假牙和眼镜议案。迄今一切平静。①

我所察觉的比万在工人运动中的力量，几个月后证明是不错的，这可从斯卡巴勒镇上工党大会的情调中看出来：

下午传来的消息说，在社会党人行政团的选举中，比万以获绝大多数票而名列其首。欣韦尔在干了十五年之后被刷了，代之以卡斯尔夫人，是个比万派。②

这一结果对保守党人倒不错——至少从眼前讲：

如果“比万主义”明显得势，许多自由党人和中产阶级的票就会投向我们这边。③

这时议院中的工党团结在首相及其财政大臣的四周，随时准备参加吵架。多尔顿把对盖茨克尔的攻击说成是“恶意的，不真实的，而且没有价值的”。但辞职、生病和死亡使政府的力量和威信严重削弱。1945年的主要大臣都是丘吉尔战时内阁中的人。如今新的一代已接了班，虽不能博得那么多的全国支持，但这些苦难——经济上的、财政上的以及政治上的苦难，大都是旷日持久朝鲜战争的后果。除了这些苦难之外，伊朗政府关于 5 月 2 日决定把英伊石油公司的资产——油井、设备和炼油厂收归“国有”。

这声明发出后几天内，伊朗议会通过必要的立法议案。虽然这对英国议会和公众是突如其来的打击，但早有许多征兆预示将有麻烦来临。英伊石油公司早于 1933 年与伊朗政府订了约，规定

342

① 1951 年 4 月 24 日。

②③ 1951 年 10 月 2 日。

若公司的产油吨数和付出的红利增多时，交付伊朗政府的税也要增加。因此克利普斯限制红利数一举，伊朗人自然要看作是剥夺他们收入的一种花招。英国政府持有该公司的大量股票；此外又从公司收税取得大量钱，一旦不让红利率提高，就等于用伪装手法夺去伊朗人该得的钱。艾登和公司的董事们确曾警告克利普斯说有这种危险，但克利普斯不为这种说法所动^①。该公司是向英政府登记的，故必需遵守自愿限制红利制度，不管后果如何。

公司请求商定一新约，以五十一——五十对分利率为基础。当时伊朗首相拉兹马拉将军是个肯负责又讲理的人，解决问题的希望很大。不幸拉兹马拉于3月7日被人暗杀。几星期后摩萨台博士继任首相，他早就是石油工业国有化的热烈鼓吹者，而且是石油委员会的主席，上台后坚持要立即采取行动。莫里森写下了他的愤激之言：

这是当代外交(或莫如说乏交)上骇人听闻的事例之一，其后不顾协定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是另一桩。^②

但当时情势有其滑稽的一面，这是伊朗人十分清楚的。英国政府接受了国有化“原则”。因这是他们政治信条的基础，他们不可能连这一点都不承认，尽管迄今他们感到这项东西不宜输出国外。他们要求补偿损失；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公平价格，显然都是伊朗远远付不起的。于是他们根据公司与伊朗政府在1933年的协定又提出请人仲裁。这一提请遭拒绝之后，英国政府把纠纷提到 343 国际法庭。

这时美国人的态度肯定不是有助于我们的。也许是石油资本家互相妒嫉，也许是美国政客乐于看到社会主义英国作法自毙。

我不喜听波斯方面来的消息；更讨厌美国人颇为不友好的态度。艾

①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兜了一圈》(1960,伦敦),193页。

② 莫里森爵士《自传》，288页。

奇逊（国务卿）向英国和波斯呼吁要他们保持冷静！好像我们是两个巴尔干小国该倾听爱德华·格雷爵士在 1911 年对他们的教训似的！^①

同时摩萨台博士像疯子似地狂叫怒吼。英国人素有幽默感，对这位整天披着睡衣躺在床上接见客人的家伙，几乎不可能认真看待，可是情况毕竟未见改善，6月初公司派代表去德黑兰，提出先付一千万英镑，并在纠纷解决以前每月付三百万英镑，并建议伊朗人把钱向国家石油公司投资，使他们能用来经营一个有伊朗代表当董事的新公司。这建议若在几年前提出，那肯定是可以接受的。

1947 年我访问阿巴丹和德黑兰及油田之后，就怀疑公司想继续独揽对伊朗如此生命攸关的企业是否明智。卡德曼勋爵的后任似不懂怎样对付如此骄傲而又狡猾的民族。公司在油田里干得很好，不过派往首都的代表却不那么能干。但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德黑兰而不在阿巴丹。

伊朗人在真实感情冲动下（在几乎狂热的摩萨台领导下掀起一阵爱国主义的浪潮）会走得多远，他们还想进一步把这不祥的鼓动推到多远，这是难以估计的：

鲁格特（1947 年危机时英国驻德黑兰前任大使，现在布鲁塞尔）上星期六告我说，这一切的幕后其实有俄国人在操纵，他们对所谓波斯爱国者或民族主义者以及“杜德党”或左翼党都一样加以利用。^②

到 6 月 20 日听到消息说伊朗人拒绝了公司的反建议。危机似已到来。莫里森（虽然当时我们不知道）硬是要采取强硬行动：

我个人以为，可以提出许多理由来说明采取断然有力措施的好处。但内阁毫不怀疑：要想建立一支有效的打击力量需时甚久，因而可能失败。我们终于得放弃任何军事计划，除非是英国国民受到攻击时才使用

① 1951 年 5 月 17 日。

② 1951 年 6 月 5 日。

武力。①

换言之，英国政府至少将使用一种显示武力姿态来保障我国国民得以安全撤退，但并不用以保护我们的财产。

他们这样将生命和财产加以区别之后，当然完全忽视对英国在中东威信以及对波斯前途的影响。很可能整个波斯经济将趋崩溃。但在那种情况下，受俄国控制的共产党政府将接管波斯，使俄国共产主义扩张而获得新的巨大好处。在这件事上确无中间道路可走。我们可采取一条很慷慨的路线，把整个公司送给他们，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几乎肯定能达成一项安排，使我们在“代理人”的基础上给波斯人经营。我们所得利润将是可观的，即使不像现在那么大。而在和平时期——并且也在战时，石油本身仍将掌握在我们手里。不然的话我们得派部队去保护我们的财产。这将导致——不是战争而是——瓜分(波斯)。俄国人将占有波斯北部，而我们占其南部，以那里的大山脉为分界线。②

当采取决定的日子似已迫近时，反对党要求进行辩论。尽管我们的后座议员都发火，想建议甚或要求立即派遣部队，丘吉尔却不愿把自己陷入军事行动的细节，因这是他很外行的事：

345

他也明知莫里森之流正想俟机给他扣上“战争贩子”的罪名。③

颇为出乎所料的是，外交大臣拒绝进行辩论：

我想他希望这样不理睬我们之后，至少会激起某些保守党人发出一些不慎的言论，以使用“战争贩子”的字眼来加以敲打、斥责。但他估计不到艾登的才能和经验之丰富(他的发言无懈可击)，也估计不到其他人如此严守党纪。④

第一个发言的是工党后座议员，唐卡斯忒地方的议员雷·冈瑟⑤：

① 莫里森《自传》，282页。

②③ 1951年6月20日。

④ 1951年6月21日。

⑤ 其后为工党在1964—1968年的大臣。

我以前从未听他在辩论时开口说过话；但他作了一次雄壮、爱国的发言，他蔑视波斯人（他似在他们之中生活过一段时间），并且气势汹汹几乎达到“好战”的程度。这使莫里森和他的朋友们感到吃惊，而且显然感到不愉快。^①

当莫里森起来答辩时，大家才明白为什么他以前不说话，因为他无话可讲。他强调保卫“生命和肢体”以及保卫“财产”之间的区别。他们的计划是向海牙法庭起诉，并希望到了紧要关头伊朗人不至于傻到毁灭他们收入来源的地步。多少陷于迷惑的下院都不满他的讲话。

7月27日质询结束之后，丘吉尔问首相愿否同他和一些朋友私下谈一次。这马上获得同意。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使人感到各政党能合作，自是明智之举，而且这同时也可使我们获得一些消息。丘吉尔在汇报他的会谈经过时，明确说解决问题还有一些希望，说已在施加巨大的国际压力以谋获得解决。油船方面的立场令人满意，几乎所有船主都同意抵制运油。虽然我们的政府仍拿不定主意怎样玩这手牌，看来整个事情可能要拖得很久，并引起足够的国际压力使伊朗人更讲理些。当他提到1922年的委员会时，丘吉尔

关于波斯问题讲得很温和谨慎。他显然觉得事态可能会好转，托利党要是“伸出脖子”去管闲事那就太傻了。这话不合他的一些听众的口味。^②

但他仍小心翼翼地持谨慎态度。

最近的行动〔是〕宣告（同他们第一次的决定相反）摩萨台博士和波斯政府愿意同杜鲁门总统的“顾问”哈里曼“讨论”石油危机。这显然证明丘吉尔的等着瞧政策是对的。^③

① 1951年6月21日。

② 1951年6月28日。

③ 1951年7月10—12日。

哈里曼到达德黑兰时，共产党人用暴乱来欢迎他。他虽声明并非“调解人”，事实上他显然扮了这一角色。他的介入有助于使保守党领袖们摆脱困境，因为辩论不得不推迟了。而不管怎样辩论，很难在“战争贩子”与“绥靖主义者”之间的薄刃上找到平衡的立足点。

有一点越来越清楚了，即政党相持不下——社会党人和托利党人时时盯着对方——的局面于公众利益没有好处。谁也不敢主动干些什么而只待“发生什么转机”。处处都是密考伯精神。^①

同时我们等着哈里曼使命的消息。

看来波斯人现已处于这样一个有利的地位，即从个人方面受到俄国人的贿赂，从集体方面受到美国人的贿赂。他们稳坐中间，看着两边出价一次比一次高。^②

哈里曼的使命失败了。他来伦敦只不过是敦促大臣们同德黑兰恢复商谈。如今辩论不可避免了。因我受托“总结”反对党的意见，就于前一天在恰特维尔细阅丘吉尔的发言稿。他以惯常的灵活手腕准备了不少材料，足以应付此后二十四小时内所能发生的一切。但他不断被他那新的业余爱好所分心，那是个室内鱼池，满槽是纤细可爱的热带鱼。他很欣赏这些鱼的优美姿态。他还趁此机会送我一本有他签名的第四卷战史《命运之枢轴》。尽管年事甚高，这位非凡人物所能进行的工作量之巨确实惊人。自大战以来一直处于透不过气的紧张状态，但他已参加两次大选并即将投入第三次战斗。他的富尔顿讲话，成为西方反对俄国侵略的思想支柱；他发动了欧洲（统一）运动；他还写完了四卷书。

辩论开始之前，莫里森向德拉姆煤矿工人作了一次激烈演说，

① 1951年7月16日。密考伯是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柏菲尔》中一个穷困潦倒、听凭命运摆布的角色。——译注

② 1951年7月17日。

控诉托利党人要打仗。但他在下院开场的发言则又长又乏味。正如丘吉尔所说,如果他向达拉姆矿工的讲话由外交部来起草,而由他自己草拟在下院里的讲话,那倒要好得多。

丘吉尔用他那最厉害最圆滑的讲话作了回答。(它比星期日写好的讲稿改进了许多。)他给人以高大的形象,并用大量的嘲笑挖苦话掩盖了他唯一的弱点——过去六星期内他对托利党人激烈心情的抑制。这样他就在党内乃至在整个下院内处于叱咤风云的地位。他开头的一段话,谈到大战以来英国地位的改变,在世界上失去威信等等,又说这些在美国的合作之下可以恢复到一定程度,这都讲得很好。还有关于反对党的作用(按照劳斯唐德勋爵的用语)也讲得好。他们(反对党)可以提出论点说明采取某种军事行动要慎重,他们应尽可能少提采取军事行动的要求。这是政府的任务。①

348 轮到我发言时,我抗议对我们这个至少代表全国一半人的政党,攻击和中伤它想贸然冒战争的危险和痛苦。这肯定是

对我们大家如此熟悉的二次大战前几年的历史,在业已精心歪曲之后再作一种新的歪曲。②

我们的责任无疑是要鼓起我们人民的勇气,我们应蔑视那种利用他们恐惧心理的做法。

艾德礼

用他那善于模仿鲍尔温的油腔滑调(结束了辩论)。他是降温专家,通常总把整个事情变得像星期日下午孩子俱乐部里那样闹一阵子开心完事。他在九点五十七分说完坐下,没有回答任何提出的问题。③

他坐下之后我高声问“从阿巴丹撤走的事怎么样了?”首相的回答很奇怪,他说可能要从油井和阿巴丹的一些地方撤走,“但我们的打算是不完全撤走”。④

① 1951年7月30日。

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0年7月30日。

③④ 1951年7月30日。

政府席位上有的叫好,有的不动声色;我们这边热烈鼓掌。钟响了,辩论结束了。这简直是个奇特的胡闹的国家。

这复杂故事的下一步是掌玺大臣德·斯托克斯率领的一个使者团于8月初抵达德黑兰。谈判又一次失败了。英国政府又一次接受了“国有化原则”,这句愚蠢而又确实致命的话,必将给我们带来无穷的麻烦。在8月初那些日子里,很少有消息传来,只是听说伊朗政府急于想解决问题,虽然摩萨台博士显然害怕暗杀者的刺刀或手枪而不肯表示退让。伊朗政府此刻声称,按法律,唯一能谈判的是补偿损失、雇用外国专家和卖油给老顾客这些问题。

与此同时,随着从朝鲜和伊朗传来的同样坏的消息,随着经济³⁴⁹局势的恶化,议会看来不太可能再维持多久了:

大选前的气氛日趋热烈。双方报纸开始嚷嚷要提前大选。艾德礼面对种种责难像个常败的运动员那样逆来顺受,一声不吭。不管怎么说,他腰痛了。^①

但9月19日那天的晚报在自负责任的基础上,——也许是走漏消息的结果,因上午内阁开了会——宣布10月25日是投票选举日。当晚九点十五分首相的简短广播讲话证实了这谣言。议会解散之日是10月5日,投票选举之日是10月25日。

正当这时传来消息说,摩萨台已下令要公司的所有英国雇员于10月4日离开德黑兰,而那天议会正要开会通过一项致英王的慰问,慰问他在大手术之后的康复。看来摩萨台倒有些幽默感。

现在说话和辩论的时间过去了。面临伊朗人这一最新要求,必须采取一种行动。虽然英国政府决定把整个纠纷提交安理会,他们却不得不同时甘让英国经理人员和雇员被人赶走,并从油田阿巴丹撤走。撤走是在所能想象的最屈辱的情况下进行的。

^① 1951年9月18日。

波斯人不让英国巡洋舰靠近码头（那是英国财产）以便使最后一批三百五十多名英国雇员登船。他们甚至不让这些男女人员乘巡洋舰自备的小艇上船。他们得由波斯人的小艇送走，每次送走三十人，在一大群公司的波斯雇员、印度雇员等等的众目睽睽之下被送走。很难想象能找出更好的办法来破坏英国的最后一点威信了。^①

于是这次漫长争执的第一阶段告一结束。这是一直到差不多
350 三年之后才终于解决的。那是英国支付平衡受到严重破坏而伊朗经济日趋混乱的三年。1953年初美国改换政府之后，可以明白看出新的共和党执政不准备给伊朗经济写保票，那时摩萨台的威信才开始下落。虽然他牢牢掌握大权，足以在1953年8月间把沙暂时流放出去，他还是在月底以前被陆军逮捕了。他的后任在美国人的密切参预之下同英国石油公司谈判达成了一项协议。

在伊朗地方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同埃及之间的困难达到了顶点。大选前十天，埃及政府废除了我们的条约，发生严重暴乱，使英国财产受相当损失。这一切还伴随着所谓英国暴行的通常虚假报道。这事件是几年来施加压力的最高点。1949年以色列埃及的停战，给这地区带来不稳的和局。但瓦夫德党和埃及爱国者的政策显然是要及早使我们撤出埃及和苏丹。1950年11月，埃及政府单方面声明他们打算废除1936年规定我们在尼罗河谷统治权利的条约以及1899年建立共管苏丹的共管协定。比万回答说，英国将信守1936年条约，直到经双方同意改变为止。至于苏丹，必须让它决定自己的未来。这之后我们方面就停止供给埃及武器，而埃及方面则借口船上货物可能运往以色列而严重地干扰了我们在苏伊士运河的船运；去海法的一切油船都被扣阻了。

1951年的整个春夏外交文书不断往来而无结果，埃及人继续进行挑衅：

^① 1951年10月2日。

埃及政府……现在开始扣阻我们在海上的船只了。这件事，再加上外交大臣莫里森那种无所谓的态度，使托利党人甚至有些社会党人（特别是犹太人）大为恼火。^① 351

10月初开罗通过废除条约的法令，于是暴乱开始。英国政府则以邀请埃及与美、法、土共为伙伴参加盟国中东指挥部一举作为回答。我们还建议将新指挥部认为超出份额的英国部队撤回。这建议被轻蔑地拒绝了。

所以最后决定废除条约一事，乃是许多月来争论和威胁的最高点。这是纷纷涌向工党政府掌权末期的又一重大麻烦事。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气氛下，国内困难日增，苦难临头的经济危机因伊朗和埃及事件而加深，两大党另一次较量实力的舞台背景布置就绪了。

在决定举行一次新大选的问题上，当时艾德礼的许多同事觉得所选时间于工党不利。但艾德礼无疑是正确的。在议会中两党这样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再也不可能有效地应付国内外问题了。他也许希望在充分就业和维持和平这两个有效的口实下，工党有可能加强地位重新上台，以应付这么多的危险。也许他是在孤注一掷，想在熬过了六年战争与六年和平时期之后趁机下台休息。不管他的动机如何，牌是打出去了。

^① 1951年7月10—12日。

第十二章 1951 年大选

352 一次大战期间，我们曾以阅读那卷虽则有时含糊然而写得很不错的《战地勤务规则》^①作为一种消遣。我们常能从这丰富的矿藏里找出一块纯金来。始终留在我头脑里的有这么一句话：“卸货装货，做法一样。”1951年大选和1950年大选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如此说。各党发出的宣言大都照旧不变。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准备制定我们的宣言；但就其效果说，提出强大自由的英国无非就是这条路这一口号的新版，而这条路本身主要是英国该走的正确道路的缩短语。工党方面的文卷也走着熟知的老路。广播电台上的和竞选台上的许多辩论也是这样。工党方面吹嘘他们的维持全民就业和(以一种新的大张旗鼓的方式)推行“福利国家”。保守党人则以种种批评来回敬：批评经济停滞，批评限制措施阻碍企业发展，批评生活水平低得可怜——特别是从配给这个角度讲。故可把这新的较量看作不过是上次斗争的重演。尽管见解各不相同，上届下院中全体代表至少有一点是一致同意的。谁都乐意看到这无所作为且又不得有所作为的议会寿终正寝。

但这与上次较量还是有些重大差别。自由党候选人从四百七十五名降到仅只一百另九名。这结果证明有利于保守党，因若无自由党候选人，则自由党选票或是弃权，或是分成三比二有利于保守党^②。此外，1950年大选时英国经济状况不算坏，而到1951年10月间一次新的财政危机已到达危险阶段。议会解散前几天，盖茨克

① 《风云变幻》原书第63页。

② 巴特勒：《1951年英国大选》(伦敦，1952)，242页。

尔宣告是年第三季度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史无前例地下降约六亿美元。这次大选的另一新的特点是：工党宣称如果保守党人特别是丘吉尔重新掌权国家就可能陷入战争。因此，如果说1900年是“卡叽”大选，1918年是“配票”大选，那末1951年的大选肯定将以“战争贩子”大选之名载入史册。

保守党把一个问题突出摆在许多国内问题的前面。这就是每年造三十万套房这一闻名于世的诺言。这面旗子已在布莱克普尔的1950年保守党年会上牢牢钉在我们的旗杆上了。代表们聚会时情绪热烈，为上次选举结果的大有起色而人心振奋，迫不及待地要来一次新的较量。他们以可嘉的热情进入会堂，安静倾听台上发言。但当谈到住房问题时，这

很显然是每人都感到激动的一件事。当代表们要求至少每年造三十万所住房为目标时，他们所反映的不仅是政治感而是人道感。他们确是又坚决又激动。^①

会上对工党政府（在这方面）成绩太差表示轻蔑，明显地有抬高指标的趋势，而不管上面怎么说。伍尔顿对这场面应付得很巧妙。说真的，如果没有他的妙手干预，我们可能会承诺一个我们能力所很难完成的数字。当丘吉尔在末次会上发言时，他接受了三十万，但他把这说成是一个作为目标的争取数字，而不是至少要完成的数字。在他发言前夕，房屋问题权威和经济学专家想劝他不接受这一诺言，但他明智地拒绝了。附带说，他在这次会上讲了一段难忘的话，并随着用手势作了一次精采的表演。1950年我们几
354
乎获胜。下次较量不会拖得太久了。他呼吁要

“再鼓一下气把他们撵下台”。说话前先表演动作（这本该如此），而且表演得精彩。他把手臂从肩部往前推——前后大力摆动；然后像希腊

^① 1950年10月13日。

神话里的力士推石上山时那样把他那阔肩膀猛的一耸。这使满座笑不可支。^①

保守党人满怀信心临近大选。不错，这两年来来的十六次补缺选举中席位没有变动，但是出现了明显不利于工党的趋势；并且即使照一般看法说是补缺选举结果可能不可靠，这些数字仍给我们以鼓励。同样，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也逐渐变得有利于我们；尽管在临近选举时比分之差可能会减小，我们还是具有获得可靠多数的一切希望。

9月20日，丘吉尔邀请他的一些主要同事共进午餐。本在斯卡巴勒地方召开的党的年会已决定取消。拟好了的政策稿只要稍加修改就可用。他本人要自拟一篇简短的宣言，其后证明这是一小篇杰作。他劝我晚上再回来吃晚饭。

有人送了他一些鱼子酱，使他兴致很高。他把战史第五卷完全写好了。稿已送去付排。第六卷(末卷)正在打字，实际上也完了。(必要的话，可由伊斯梅勋爵和他的班子——迪金上校等人——负责一直弄到出版。)但第六卷必须等到1952年总统选举之后出版，因其中直率道出了战末丘与杜鲁门在俄国问题上的分歧。这项巨大工作(一百二十五万字)花了他许多精力。^②

他很清楚

将上台的任何保守党政府会面临哪些国内外困难问题。他不会因此增加声誉；他只能冒丧失以往声誉的危险。^③

355 一般都认为这样突然解散国会之举是艾德礼自己决定的，这一点在次日我与劳合·乔治谈话时得到证实：

他告我他听人说(根据确实可靠权威)解散的决定是艾德礼突然作出的，而且既未与莫里森商量，也未与盖茨克尔商量，甚至连电话也没通

① 1950年10月14日。

②③ 1951年9月20日。

一个（二人在美）。议会开会时，除多尔顿以外的所有大臣都反对现时举行大选。但比万用威胁的话事实上讹诈了艾德礼，说是除非议会解散，他将收回他的支持。据劳合·乔治说，社会党队伍里人心大为涣散。但就我所看到的，工党投票的阶级团结精神给我以深刻印象。他们会发牢骚，会告诉盖洛普民意测验的人说以后决不再投社会党的票，但每逢选举，他们总还是投他们党的票。^①

我们在9月22日开会，丘吉尔读了他宣言的初稿。他也提出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

他对交易所兴旺感到关切，并担心由此将在一般人中产生一种感觉并为社会党人所利用，即保守党好像是实业、利润和分红的党。必须采取一些行动（从政治观点说）来抵消这个。能不能搞出一个政治上有利而经济上合理的计划来？在这重整军备时期恢复另一种形式的超额利润税，你们看怎么样？^②

这问题讨论了很久，而且相当奇怪，大家似都同意他的建议。组织了一个以安德森、巴特勒和我为成员的委员会来制订草案。

议会解散那一天，我同布伦丹·布雷肯作了一次奇怪的交谈。布雷肯自己虽不出来竞选，但他似非常熟悉内幕：

据他说，一旦选举获胜，丘吉尔打算干一年或十八个月（但不再多）的首相。（附带说，布雷肯对胜利是满有信心的。）“艾登将当外相；巴特勒当财政大臣；利特尔顿当生产大臣。”我会当什么呢？三军各部的大臣如同在战时一样实际是次官。^③

有一种想法是设立参谋长委员会常任主席，这是美国人的方案，我们以后也采用了。那样我将是国防大臣，除非丘吉尔自己担任该职务，不然的话还有下院领袖一席。艾登掌管外交部不可能再

① 1951年9月21日。

② 1951年9月22日。

③ 1951年10月4日。

当下院领袖。我愿意干那个吗？我们就交谈着这类奇怪的事情。另一个大问题也提到了。马克斯韦尔·法伊夫不可否认有当财政大臣的资格，但丘吉尔很想让他当内政大臣（以后终于就是这么安排的）。丘吉尔也曾想让赛斯·阿斯奎斯当财政大臣，主要是他希望在他最末这一任内阁里既有个阿斯奎斯又有个劳合·乔治^①。可惜前者身体太弱。

在我开始参加竞选以前，丘吉尔请我到他恰特维尔住所去讨论他的广播稿。我交给他一份记有一些想法的摘录。我们从头到尾推敲了广播稿。我感到这会收到好效果，事实也正如此：

他语气谦逊而又生气勃勃，口齿清楚而且流利，丘吉尔的广播是大选中保守党方面的最好广播演说，也许是所有党派的最好广播。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他从大战以来成绩最好的一次个人努力。^②

我同以往一样，在自己选区以外的国内各地作了一些演说。我的论题不多，并因当时还处于那种不常被人报道的可喜地位，故能经常重复：

同各次选举一样，这次选举中提出了许多事情，讨论了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往往是很重要的。但它们在历史的伟大进程和演出中却并不是决定性的。

357 现今实际只有一个问题。今后将是社会主义，各种形式和各种程度的，温和的或是极端的，硬的或是软的，红的或是粉红的？或者是否将有自由和秩序，使每个男女具有公平分配的权利和义务？我们是否将再来一届社会党政府，容忍在这种政府下国内外所发生的一切？还是希望有一新的政府？这将是“如前的杂烩”？还将是一种新政？

选举进行下去时，可以明显看出我们在初期的领先地位很可能在竞选过程中消失。这是因为广泛流传着许多虚构言论，部分出现

① 因这也是英国以前两个首相的姓氏。——译注

② 巴特勒前书 66—67 页。

在竞选演说中，部分为谣言所传播。说是我们会砍掉社会服务，而不知根据什么奇怪的理由，社会党人竟认为这些社会服务是在1945年（他们上台）以后才有，而不是一百多年来好几代保守党和自由党政治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说是我们要废除房租控制；说是我们要破坏家庭津贴；说是我们要削减教师工资；说是我们要减少养老金；说是我们要把国民兵役期从两年增到三年。所有这些假话都有广泛的危险的流传。我在每次（选民）集会上都设法详细驳斥。在一次较全面的驳斥后，我加上一段话：

请大家拿过去的回忆作为堤防，来阻挡这假话的洪水泛滥吧。当你听到新的谎言，你得想想那些老的谎言。这样你可以又一次得到宽心。假话不是自恃其力的强者的利剑，而只是内心虚弱的残废者的爪子。

但这一切之中最难阻挡的暴风雨，几个月以前还不过是以一阵微风开始，如今却刮成诬言的飓风。

伊朗事件自然给搞“战争贩子”运动一种推动力。当尽管艾德礼保证政府打算在阿巴丹守住一立足点而其后全面撤退时，丘吉尔自然要抨击政府的行不顾言。莫里森反过来问保守党的观点是否认为我国应准备战争。尽管丘吉尔回击说这事的职权全归政府，但显然可以看出，维持这种争论不息，其目的是要进一步攻击保守党人好战。我在一次演说中想回答这种话，当时曾一度广为 358 报道：

社会党人问我们“你们想在波斯打仗吗？”这是个可笑的问题，就像是问人家“你还打不打你的老婆了？”据透露他们直到新近的9月22日还拒绝对方提出进行谈判的新建议，由此更显得他们所问的话可笑。但他们把这事隐瞒了。

这件事是从《曼彻斯特卫报》上的一篇文章透露出来的，那里刊出了政府在紧急关头竟然多少使人震惊地拒绝继续谈判这一事实的全部内容。不过，尽管我们指望政府会因国际事务的严重挫折而

抬不起头来，但事情的发展却有利于工党在整个竞选中的地位。^①

对丘吉尔说的坏话不仅伤害人而且也特别愚蠢。如果国人在战前几年的重大时刻听从了他的话，他所谓的那个“不必要的战争”就有可能避免。但他以战时伟大领袖出名这一事实，在一种奇怪的混乱思想下，不知怎的竟让许多人相信他将欢迎再有一次机会来重显身手。他最末一次在普利茅斯的讲话中，用最妙的言辞驳斥了这种攻击：

这是一种恶毒而又忘恩负义的指控。事实正好相反。我之所以在此刻还没有退休，就是因为……我相信对于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我可能作出一点重要贡献……我确实祈求能得到这种机会。这是我想争取的最后奖誉。

宣传也像广告那样，其效果因重复而日增。它在夏初开始，接着搞得愈来愈烈。5月，多尔顿声称：

如果下次大选让丘吉尔和托利党重新执政，我们就将在十二个月内同俄国开仗。

虽则别的大多数工党领袖不用那样露骨的话来设法使听者得到同样的印象，他们用暗示而不直说，但每次讲话总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散播这印象。布置选民大会会场的人甚至想造成一种惊恐气氛。一个典型的标语是：“投托利票等着拿枪，投工党票等着拿养老金”。但在这诬蔑运动中，最有效的武器是发行量很大的《每日镜报》制造出来的：

使主要论点形象化的，是《每日镜报》在去夏铸造出来的那句暧昧而又带挑拨性的口头话“让谁去掌扳机？”这话他们在关于大选的第一篇社论中加以重复，说这是当前高于一切的紧要问题。^②

另一句话由记述大选的史家充分描述如下：

① 巴特勒前书第 118 页。

② 巴特勒前书第 121 页。

《每日镜报》到10月15日以后才又来搞这个名堂；那天他们开办大选专栏，第二版全用来登读者关于选举问题的来信；其中第一封信的醒目标题是“决不让那扳机下的手指头儿发痒”。10月18日，根据巴黎一则电讯，纽约出版的《民族》周刊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故事，说是丘吉尔向斯大林发出“和平最后通牒”。10月19日，还是在头版上，在“丘吉尔在巴黎确实说了什么？”的标题下编造了这个故事，而在反面版标题为“通牒式会谈”的社论里，虽承认“尚乏证据”，但提出警告说不要对俄国施加“压力”，并要求丘吉尔解释理由。保守党中央办公室发出丘吉尔的声明，称巴黎报道“纯属捏造”，于是10月20日《每日镜报》在登载第一篇故事的同一地方，用标题“丘吉尔说我没讲过这话”刊出声明。同日第二版的读者来信分载在两个标题之下，一个标题是“当工党的指头护住扳机时”，另一标题是“现在丘吉尔领导谁？”10月23日该报把选举信刊在居中横跨两版的显要地位上，在“让谁去掌扳机？”标题下突出那些谈战争问题的信。到选举前夕《每日镜报》简直肆无忌惮了。在拟投工党票的选民照片“英国工人横断面”上方，“让谁去掌扳机？”成了头版通栏大标题。最后，到了投票那一天，《每日镜报》的头版上把这个问题铺张得耸人听闻，促使丘吉尔对该报提出诽谤起诉书。^①

360

可惜诽谤起诉书不能马上见效。甚至在七个月以后定了案，《每日镜报》向丘吉尔作了体面的赔礼道歉，偿付丘吉尔的费用和所受损失（这笔款丘吉尔用于合适的慈善事业），这事算是悄悄地过去了。损失已经造成了。投票日的头版报道必定影响了几十万人甚或几百万人的投票。

当投票日之夜清点票数时，马上可以明显看出，我们所能期望的只是一个（相差）非常小的多数。果然，到10月26日前半夜几小时点票结束时，我们只多占了十一席。但格局是振奋人心的。几乎处处，工党的多数在下降，保守党的多数在增高。虽然在全国的平均票数相差只不过占百分之一一点一，但在十分之九的选区

^① 巴特勒前书，第133—134页。

里，这差数在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四之间^①。到末后我们净增了二十三席，工党净失了二十席。因自由党减到六席，再把爱尔兰国民党的二席和爱尔兰工党的一席算进去，我们比工党多二十六席，比其他各党派加一起多十七席。席数够了，但只是刚好够。我自己的结论如下：

361

这次大选的情况如何，现在可以看清楚了。全国是(两党)平分秋色——几乎刚好对半开。因若把非反对派的自由党票数估算进去的话，双方所得票数刚好一样。自由党在下院中等于销声匿迹了。上次全国虽还有二百万选民投他们的票，但这次(因他们只有一百多个候选人)在五百多个选区里的自由党人只能弃权，投保守党的票，或投工党的票。就今日所知，特伦特河以北地区的自由党人，投保守党票的与投工党票的是二与一之比。这在苏格兰很明显，在达勒姆或北约克郡也如此，因那二地在社会党的专权控制之下。米德尔斯布勒西部和达林顿二地也是如此为我们所争取。在中部各郡，自由党或是弃权，或是对开，或是更糟。林肯郡，伯明翰，诺丁翰等地的情况也可以这么解释。在这一地区的自由党人中，受内战期间激进党和圆颅党传统的影响太大，是不会投保守党票的……

所以这次结果又是个精神上的一筹莫展。一个政府在执政期间犯了大量错误，其施政有多次惊人失败，像暴风雨中无能之舟似地随波逐浪经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的颠簸。所以乍看之下，只能对未来抱最阴郁的预感。在托利党执政三、四年之后，随着不可免的错误和失败，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再者，有那么多几乎解决不了的国内外问题向我们涌来，会发生什么事呢？会不会在下一次选举时产生可怕反应，仍让工党有二百席的多数，并在那时以比万(而不是以艾德礼)为首领呢？

与此相对的显著事实是，我们的席位一直很稳定。我们一个也没丢。甚至仅以三十票或四十票保住的席位也有所改进。事实真相是社会党人(很精明地)不是用社会主义而是用恐惧来同我们竞选。恐惧失业，恐

^① 巴特勒前书，第242页。

惧减薪，恐惧减少社会福利，恐惧战争。他们聪明地，虽也是不择手段地利用了这四个恐惧。如果在下次大选前，事实证明这些恐惧都不合理，那就可能迫使反对派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同我们竞选。那时我们就能够赢。^①

我自己选区里的得票数是令人满意的。我所居多数从一万另六百八十八增到一万二千一百二十五。由于无自由党候选人，大多数自由党人显然是弃权或投了我的票。

选举结果无疑使保守党失望。从盖洛普民意测验和其他迹象来判断，本来相信至少可获五十席或更多的多数，到末了出现不利于我们的摆动，心怀不满的工党选民照例又起来支持他们政府。这无疑是部分原因，但主要原因则是在“战争贩子”问题上猛烈攻击丘吉尔的结果。“要第三届工党政府，不要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口号证明是厉害的。一个最有能力的工党竞选人曾说，他们用突出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手法缩小了保守党人的胜利，这话肯定是对的。然而，除了对《每日镜报》表示可理解的愤慨外，丘吉尔并不怀恨在心。他照常在一场事情结束后准备投身转入另一场。

艾德礼于10月26日下午五时辞职。两小时内宣布丘吉尔接受英王任命。组阁过程现在开始了。

为此丘吉尔肯定采用了不寻常的做法。根据10月27日六点钟消息，提出了九个部的大臣。这究竟是内阁全部人马还是部分人马，似乎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仅有这“九个亮相的”，还是这届政府也像别的那些现代化商品似地要分期出售给公众呢？往后才知道丘吉尔认为这将是“一个高明的主意，可以让公众不断注意，一批批的公报显示出一个逐步开展的行动等等”。但其实这做错了。更严重的是他决定自己当国防大臣。像他那个年纪确实不宜担任这双重职务。很短几个月内他得出了这结论，于是任命亚历山大

^① 1951年10月28日。

元帅任此职。决定艾登任外交大臣兼下院领袖一举同样不明智。曾经在战时已证明这是他几乎不可能承受的负担。如今保守党只有微弱多数，这将更行不通。这一点也得改，于是第二批任命名单中的卫生大臣克鲁克香克得放弃这职位去当掌玺大臣，并领导下院——这个职务他干得出色成功。

363 当天伍尔顿勋爵打电话给我，我祝贺他的组织成功；但他看来有闷气。他不高兴当国防大臣。至于我，他说当然会让我担任内阁职务的，但对这种做法也像我一样迷惑不解。第一批阁员已宣誓就职，公众和报纸都莫明其妙。有两个人选使政界和公众同样感到有些惊异。谁都知道利特尔顿多年奋力工作宜于领导财经事务，他是我们之中具有实际工商业知识的仅有几人之一。大家都以为他将当财政大臣。但丘吉尔却宁选巴特勒，于是这一任命等于使他成了政治等级中的第三号人物。除丘吉尔本人和艾登，地位最高的就算巴特勒了。但事实证明利特尔顿当殖民大臣干得很不错。另一个任命许多人觉得奇怪，而其实是经过慎重研究的，这就是法伊夫的任命为内政大臣：

法伊夫的任命是正确的。他当内政大臣比当劳工大臣好。他的言谈和文章彻底吓坏了工会方面的人，尽管丘吉尔在竞选期间否认，仍引起他们惊恐而使他们团结起所有的力量。他将是个好的内政大臣……蒙克顿之任命〔为劳工大臣〕是出乎所料的，但合适。他头脑比法伊夫机敏灵活。他应能够干得很好。^①

10月28日晨我接信让我去恰特维尔。

下午三点钟到达后，发现〔丘吉尔〕有一种最愉快而且颇为感激涕零的心情。他请我去“给人民造房屋”。原来是这么一项任务！^②

这建议使我吓了一跳。关于住房问题我什么也不懂，只知道我们

① 1951年10月27日。

② 1951年10月28日。

许诺了一个很大的数字，专家们都认为是不能完成的。我问如今的住房状况如何。他说他心里没底，但“伙计们”会知道的。

于是就把伙计们（文官大臣爱德华·布里齐爵士，内阁大臣诺曼·布鲁克爵士）——和一些威士忌酒都找了来。看来这整个事务有不少混乱。大致说，从前的城乡规划部管这些工作，但该部现改称地方政府及规划部。地方政府的所有职能一般由它管。它还得执行那个倒霉的城乡规划法案，还得管住房问题。但管理所有建筑物的实际机构，不管是住房还是其它建筑，却是工程部（它也经管以前工程署所管之事）。营建的先后次序或部署则由内阁来定。为把造房这面旗帜高高举起，显然得给部另起名字。^①

当然这个部的大臣是内阁里的一员，而工程部大臣则不是。丘吉尔接着说，要造出我们许诺的三十万所房屋来是个大冒险。如果我不愿干，可以去管贸易部。但那仅仅是个例行公事。

然后我们讨论谁当工程部大臣，我说不知道能否劝请斯温顿爵士担任这样一个职务，虽然在内阁里有过这样长的经验之后，这是不容易的。（其后他接受了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的职位，这对我有莫大帮助，因包括钢铁的各种原材料都归他管。）谁当我的政务次官？我提出欧内斯特·马普尔斯。不错，他会赞同用马普尔斯的。他对住房问题而且确实对其他许多事情懂得很多。他是个聪明人。在这次谈话最后，丘吉尔严肃地对我说：

“这是一场赌博，它会树立也会毁坏你的政治生涯。但若你做成了，每个小家庭都会为你的名字而祝福”。他说着，不禁又淌下泪。我说我愿考虑这事。^②

我老婆是开车送我来的，此刻正在花园里同丘吉尔夫人散步。我同她一起散步，问她的意见，这个我从长期经验知道一般都是对的。她毫不迟疑地说我应接受。以前丘吉尔要我做什么我总同意

^{①②} 1951年10月28日。

做什么,而且迄今为止都做成功了。当我去阿尔及尔时,谁也想不
365 到任命会有那样结果。它第一次使我在政界获得真正地位。她又提醒我有过供应部的经验和那些日子里结交的不少朋友。我们肯定可以像造坦克造枪那样去造房屋。

于是,我回到首相房间,告诉他说,我愿照办。^①他接着向我表示许多谢意和希望。现在既然就那么样重新被接纳在同一官场里了,就得要我留在那里别走。再次接触使人回想起战时遇到丘吉尔的那些场面,是很有意思的。服务员们,朋友们,大臣们,私人秘书,打字员,都大为忙碌起来,都为重返舞台中心而尽情欢庆。我回想起1939年传遍舰队街的那个信息——“温斯顿回来啦”。

同时,

照例的……“送往迎来”。莱瑟斯勋爵来了。他将任国务大臣,管协调运输、燃料和动力事务。但是约翰·安德森爵士到哪儿去呢?他将成为子爵,管协调原材料、供应等任务。通知他了没有?不,还没有。给他打电话。于是就去打电话找他。同时克莱姆·戴维斯来了之后又走。他愿不愿当教育部大臣?他愿意,但自由党怎么办?他愿去劝说他们干,但梅根·乔治和塞缪尔爵士会拒绝。他出去开会去。(以后从无线电上听说自由党人不愿搞。)然后谈了不少关于较低职务的事。克鲁克香克和帕特里克·巴肯·赫伯恩(他们也到了)这方面很熟悉。丘吉尔几乎连姓名也不知道——只记得要让埃克尔斯担任一项职务。此外还有拉尔夫·阿什顿。〔然后还要安插其他〕不入阁的职位,如邮政总局局长,国家保险大臣等等。但那些三军首长怎么任命?……还有议长?让莫里森去干还是让霍普金斯·莫里斯去干为好——两人都合适?等等。^②

从这一切纷乱之中,最后搞出了一个计划。在下午和晚上持
366 续进行的漫长讨论中,可以明显看出,不管前途如何,

^① “第一批名单中没有哈罗德·麦克米伦的名字……于是麦克米伦就去干那被认为是次要的部——住房部。”基尔穆尔伯爵《回忆录:政治历险记》,191页。

^② 1951年10月28日。

我们是从破烂摊子里接过这项差使来的。有的是财政危机，外交危机，国防危机。万事纷纷一团糟。这是没有挨轰炸和死伤的1940年——但也没有当时全国团结一致的精神。能想什么办法唤起这种精神吗？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问题都在3点到7点之间提出过，讨论过，撇开过，又回头重新谈过。^①

最后老婆和我告辞回家。回家之后我开始体会到担负了多大的担子。我知道丘吉尔感激我并会支持我；但怎样去进行工作，我确是一点门也没有。这令人激动的一天以一件较轻松的事作为结束。从恰特维尔和从唐宁街十号都有电话来说有急事找我。我想是否事情会有新的转变。但实际只不过是说多罗西的姻兄弟詹姆斯·斯图尔特（人家以为他在苏格兰）这个人找不到了。

但现在要找到他，让他当苏格兰事务国务大臣。今后谁也不会说托利党人急着等官做，而是要找他们来做官！^②

两天后，10月30日，我同其他一些大臣为接受任命亲了英王的手。我觉得王上消瘦，但比我料想他最近这次病后的情况似好一些。惜哉，这不过是外表的康复。

^{①②} 1951年10月28日。



第三篇 再任公职

(1951—1955 年)

第十三章 造房

冬尽以前，不列颠和英联邦人民笼罩在深切的哀悼之中，英王 369
乔治第六多灾多难然而又光荣的当政突告终结。

英王虽在 1951 年春患重病，但看来已康复。即使在 9 月动手术之后，他已复元，完全可以履行公职。事实上，已经宣告他将于次年巡游各联邦。他执行了 10 月 5 日解散议会的仪式，而且尽管大家都知道他还体弱，他仍能应付开一次会议的通常事务。在冬初几个月里，他康复正常而且起色那样显著，使政府指定 12 月 2 日星期天作为全国祝贺英王康复的感恩日。

同时，伊丽莎白公主由爱丁堡公爵陪同在加拿大和美国作了一次最成功的旅游，使英王于 12 月 4 日庆贺这次旅游时，任命他的女儿和女婿都进入枢密院。他和他的一家在桑德林厄姆度过了圣诞节，发表了通常的节日讲话，虽然为了减轻他的劳累，那次讲话是在他体力允许时事先逐句录音的，这一点当时公众并不知道。1 月底他回伦敦，并在王后陪同之下到过一次剧场。1 月 31 日英王到伦敦机场给伊丽莎白公主和公爵送行，他们的第一阶段行程是去东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当时几乎所有居民都可在电视上或报上看到他光着头风吹动他的头发挥手送别的形象。^①

然后英王返回桑德林厄姆，看来一切平安。因此，当 2 月 6 日 370
晨我正在接见一代表团被私人秘书打断我们的谈话，说上午 11 点要召开紧急内阁会议时，我感到非常吃惊：

^① 见惠勒—贝内特著《英王乔治第六：他的生平和治世》（1958 年伦敦出版）800 页后。

他悄声说，“王上去世了。尚……未宣布。”但当我从部里走向唐宁街时，人家告诉我这消息已公布了。^①

开会之后，首相用几句简短动人的话报告了这件痛心的事。王上在桑德林厄姆时看来健康正常。白天出去猎兔，看来愉快轻松。晚餐后按常时就寝并安然入眠。而清晨，他的心脏停止跳动^②。这次崩驾之突然和出乎意料，使大家感受的痛苦更深。内阁成员几分钟内默哀不语。但事情还得办。当时大法官和议长被特邀出席，就同他们商量善后程序，并咨询枢密大臣如何处理急待召开的继位会议。

最近一次缺席宣布继位人选的事发生在安妮女王逝世之际，当时就继位问题说情况比今日更危急。^③

新后虽未在场，大家决定于下午5时在圣詹姆斯宫开继位会，并立即按例发出通知书。议会两院把两点半钟的开会时间延到下午七点，让议员们先宣誓效忠于新后。

在讨论这些事的时候，我不禁回想起从1935年末到1936年末那不幸的十二个月之间的事，那期间我同许多人一样，作为议员，向三个君王宣誓效忠：乔治第五，爱德华第八，以及刚去世的这位英王。我与英王虽无密交，但可回想他在北非检阅三军士兵的光辉日子，特别是他在巡洋舰桥台上抵达马耳他岛那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④。我也忘不了他和王后对我的恩宠和同情。我在返国之日常被召见，或被召去便茶便谈。我还记得他如何详悉内情；他那王室世代相传的天生记忆力；那既简朴而又庄重的风度。

内阁自然要关心新后伊丽莎白公主的安返。许多人觉得航空旅行的危险不能忽视。但大家终于一致认为她一定想尽早回来，

① 1952年2月6日。

② 见上页脚注。

③ 1952年2月6日。

④ 见《战争风暴》，原书第344—350页。

很可能现已动身。下午又产生如何写宣告文书的问题。老格式中有过“皇座”这个提法，而这对联邦的新地位不合适。这个词的真实意义如今早已为人遗忘或为人所不解。“皇座”原意是指持此称号的君王，并非任何皇帝或上级的下属。但也许只有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能懂得它的原意，而旁人则将会误解。因此决定删去这个词，而在称号中加上“联邦元首”这一说法。出席继位会议的，以前总是“僧俗高官，枢密院成员，以及其他主要显贵，伦敦的市长大人、市参事会员与公民”。现在大家同意再添加“联邦其他成员的代表”。

下午5时，我们沿大使院之侧进入，会集在圣詹姆士宫。会议在楼上一间精致大厅里举行。伍尔顿勋爵（作为总管大人）主持会议。出席的人很多，有贵胄，各部大臣，前任各部大臣，枢密大臣，高级专员等等。市长大人和市参事会员身着礼服出席，其余人均穿晨便服。^① 372

总管大人宣读伊丽莎白王后二世即位宣言初稿。我不知道当时大家对这将在苏格兰引起的困难体会到何种程度，因那里认为新后是英格兰第二人，而是苏格兰第一人。

宣读了多种命令草案，其中有给市长大人的，给国务大臣等等的指示，指示如何宣告新后即位，鸣炮，发“通知书”（给一般议员）等等。之后，大家都在特备的大羊皮轴卷上签字。^②

这时大家听说王后可于次日晚返回，并同意派包括工党和自由党领袖在内的一小批人去迎接。当晚丘吉尔向国人发出广播文告：

这是我所看到或听到他诵读的最好一篇散文。有些句子将永为流传，如“近几月来王上以死神为伴与之朝夕相处，这伴侣与他素识并不可怕。如今死神终于作为朋友降临了。”他提到太后与玛丽王后的地方也说得很好。最末一句话可永志不忘：“在维多利亚时代那庄严、至尊、谧静

^{①②} 1952年2月6日。

的光辉照耀下度过了青春时代的我，在这再次祷颂‘天佑吾后’的时刻，心情深为激动”。^①

2月8日我同其他枢密大臣及显宦去圣詹姆士宫。大家会集在老接待室里。十时正，仪式开始，总管大人命丘吉尔和艾德礼等少数几个人“为王后陛下迎驾”。

373 王后的驾临；大臣们的躬迎；王后颂读谕旨，履行各种仪式（包括宣誓维持苏格兰教会）的那种坚定而又悦耳的语音，对大家都产生了很深的印象。^②

当然，如果大家都像司仪官、威斯特敏斯特执事（哈里法克斯勋爵）以及其他一、二个人（包括御骑兵和禁卫队官员）那样全副盛装，效果还要更好。相形之下，我们的黑礼服和条子裤就显得颇失体统了。

入殓和出殡盛况描写得已很多了。太后与王后至威斯特敏斯特大厅致哀的情景是令人难忘的，当时我正同妻儿也在那里。

英王乔治被他的所有臣民和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无数男女所衷心哀悼。大家都知道他是怎样无可奈何地在最艰难的条件下接过王位重担的，他统治的年月是多么历尽忧患。王后本人在差不多四年后他的纪念馆揭幕式上的话，也许就是对他的最好颂词：

就是这种纯真的人道主义，对“人的天然自尊心”的这种重视，才使我父能在这历经变故的世界中使人们保持对王位的爱戴与尊敬，以此维护我们这个自由联邦的团结。^③

她最后那段简要而真实的话也说得毫不过分：

任务不管多么困难，他决不回避，直至最后一息，他从未松懈他对各族人民的职责。^④

1951年10月末我被任命为住房大臣，在职正好三年。这在许多

① 1952年2月7日。

② 1952年2月8日。

③ 转引自惠勒—贝内特前书804页。

④ 同书805页。

方面是我在部长生涯中最幸福最得益的三年。如果我无缘参与地中海战役的激烈场面，那末干“武装全国”这项工作几乎也是同样困难同样激动人心的。我们所要克服的障碍在许多方面与1940到1942年面临的问题不同，但几乎是同样难以解决的。就职之后我马上觉得应感谢从过去的上级特别是从比弗布鲁克那里学来的教训。要获得成功，肯定就得采取一些非正统的方法，而且我们不得不苦战力争，特别是要同那些顽固不化的“计划家”争，他们总是从虚假的前提出发，用无懈可击的逻辑来争议，让你非接受他们那错误的结论不可。正如以前在供应部时那样，需要采取应急措施和有某种不顾一切的闯劲。当然会冒风险，但也有甜头。处理一般政策性大问题的各部门，很少能指望得到具体的成就或经明确证实的结果。但在我们这个部里，至少从建造房屋这点上讲，却有一个简单的考试成绩可查——实际完成的住房和公寓数字。

保守党肯定是把前途押在运气上了。不管怎么委婉地说是作为争取的“目标”，全国总期待着你每年造出三十万套住房来。因这是每隔一月要公布的数字，所以这是所有评论家——友好的或敌意的——都不断注视着得分牌。你不能含糊诿过于经济局势或劳力与材料的困难。无情的数字将自行说明一切问题。

然而就像比万那样一个有决心的人，也得听从他的顾问劝告说二十万套住房是能合理争取的绝对最大数字。事实上，从1948年以来，甚至这个起码的总数也达不到。而且那个目标还是在经济相对稳定时期定下来的。艾德礼及其同事们加于全国的那个雄心勃勃的重整军备计划，对于经济上的恼人的压力在1951年上半年尚未反映出来。事实上，正如丘吉尔不久就得承认的那样，这计划从款数和物质资源方面讲都太大，在所定时期内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更有甚者，1949年的英镑贬值，虽使我们的出口在对付战后复原生产增加的日德两国得到暂时好处，但这不过是使所受打

击缓冲一下。英国的国内物价不久就上涨许多。作为出口主要来源的那些工业，特别是机器业，又得为重整军备的需要而服务。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些困难与日俱增，而当大选来临之时，我们又面临另一次经济风暴。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障碍；因若采用传统的老办法，财政部肯定会要求削减进口，提高银行利率，并缩小所谓“资本投资计划”。我们确实很可能只限于完成那些业已动工的住房，而那是上届政府低水平计划下的数字。要新造住房并扩大计划，阻力很大。结果在头几个月甚至头几年里，我就不得不经常同财政部作战，以争取（专家们告我的）现有资源中该合理地属于或者毋宁说是超出于该归我们用的那一部分。在这场战斗中，我感到特别要钦佩巴特勒的手腕。他对一大批消费品加以限制，甚至进而限制许多重大工程，而在面对这些迫切需要限制的事项之中，他总没有忘记正反两方面的政策需要。甚至在大乔治街那个寒冷的冰箱里，他仍设法保持他那扩展主义者的一片热心肠。

如果说财政枷锁可以挣脱或避开，次一个问题便是完成任务所需的行政工具。我所接手的那个部直到最近还是那个任务过重的卫生部的一部分；而在单独设部之后又被重新命名为地方政府及规划部。它的人员主要是管理地方政府事务的官吏，因而这是个做指导、提议、监督有时甚至是做警告和申斥工作的部，但从来不是进行正面工作的。它是靠发通知书和备忘录等来办事的，很少是靠个人接触来办事的。又因为它并无直接权力，所以它不像供应部那样可以同大大小小的公私房建当局定货订立合同。在英格兰和威尔斯有一千五百多个地方房建当局负责发放“私营”房屋许可证或计划并定造“公”房。但没有什么督促和推动（的机构）；没有中央或地方的生产组织；没有掌握进度的官员；没有用来查找并打开喉咙口的机关。这个部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个“生产

部门”——但尽管它的组织机构如此，尽管白厅的规章如此，它无论如何得变成一个主动的有生气的机关。我给它起了个新名——住房部；我必须灌输给它新的精神。

下一步是重要的政策问题。在工党执政几年中，私营企业造房出售之数大减，因发出的许可证过少而规章过多。建筑公司几乎停了业。在六年战争时期和六年社会主义时期（指工党执政时期——译者）的严格控制下，建筑业失去了一切弹性。它已习惯于在困难重重的经济丧气和虚弱气氛下进行工作。我们的材料，钢据说是造公寓甚或几层楼房所必需的，木材几乎全靠进口，水泥尤其是砖则（照行话说）现正“缺货”。还需要防止老房失修或倒塌。如要处理这问题，至少得冲击一下房租问题，而几百万所房屋的房租仍受控制，有些还限在1914年前的水平。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贫民窟的丢人现状。除了闪电战（指二次大战期间德国空袭——译者）干了一些尽管多么悲惨然而有益的工作之外，多年来清除贫民窟的工作几乎被人放弃了。但直到我们在周围建立新房以示鼓舞之前，我们怎能拆毁那些尽管条件太差但终究还能栖息的房屋呢？

末了还有那个名谓“城乡规划法案”的怪东西。当1947年这法案在议会讨论通过时我未予理睬。我（甚至我的任何一个顾问）都不敢说曾充分了解这一法案。但这里面含有一项财政措施叫做征收“发展费”，其结果（即使并非其目的）则是阻碍一切发展工作。

这一切，以及某些有关的困难问题，包括新城市及“遭闪击城市”的需要，便是三年中占据我时间与精力的主要问题。如同以前我经管战时补给工作时那样，我很少能思考甚或梦及他事。做一个反对党议员或后座议员，就理应关心涉及广泛政策范围的整批事项。但在这一类部里任职其工作需要如此专注，且对整个政府的成败如此攸关，就必须全神贯注我的思想和行动，以突破一狭窄

然而防御甚严的阵地。在工作压力较小的有些部里，一个大臣自然可以履行一切部内职务而仍有充分时间过问整个内阁所面临的大问题。这样他就可以适当履行各部大臣集体负责概念之下应尽的职责。现在我自知在许多领域里不能理直气壮地运用和申辩我的思想。在一个领域里，即在大的财政和经济问题上，我充分发挥了我的作用。那是因为那方面问题的解决与我自己的工作有关。因为我们履行建房诺言的成败取决于财经政策。但对于别的问题，如国防问题，外交问题，特别是欧洲统一问题（那是作为在野党议员时我在丘吉尔鼓舞下花了很大精力搞过的问题），我就只能偶尔加以注意了。这种疏忽在此后的岁月里成为我良心上最痛苦的负担。但在当时也许是可原谅的，因为当时我和我的同僚们只顾追求完成建房指标，其他一切就都顾不上了。日复一日地，我们在部里、在各地区、特别是在白厅走廊里早晚工作着。议会中的辩论和质询是烦人的有时是恼人的分心之事。但我们知道，一旦有了成果就可以避免这类干扰，开头几个月是多少有些令人失望的，但当成果开始出现时，就有一种不可言传的完成任务与喜悦之感。部里的官员们也都同享此感，他们愈来愈充满快上、大干的精神。还有朋友们的体育竞赛本能也鼓舞着我们，他们愈来愈兴奋地看到造房数字与日俱增，也许竟有点像赌徒对赌注那样的关心。因为确有许多友好人士以每月的造房数字来打赌的。

在大选期间，经济局势的整个严重性不会被内阁阁员无故缩小，并且这是反对党领袖们所不知道的。但财政部立即把真相写在一份纪要里报告给丘吉尔，据那份纪要说，除非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否则我们将“走向早期破产”。议会一开始，他就透露了这一事实，并说他已将此备忘录的一件抄本送交艾德礼，使他知道这届政府的起点是什么。

在海外支付问题上，危机比 1947 甚至比 1949 年更糟。虽然 1951 年上半年的数字相对说是令人鼓舞的，但到年底的赤字将达五亿到六亿英镑之数。而且瞻望前途情况不会更妙。虽然巴特勒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命令削减进口三亿六千万英镑并将银行利率提高到百分之二点五，但到 1952 年初已显然看出还需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政府开支，特别是资金方面必须大力缩减；同时丘吉尔也同意必须调整重整军备计划，因前任政府拨给当年的一亿二千五百万英镑不可能用掉。他察觉比万的意见“虽并非出于最善的动机，碰巧却是正确的”。但这一措施并不能真正节省什么，因它只是推迟了这项开支，而并未将其取消。

部长们在这头几个星期和月份里都忙于应付这个问题。首相设法做到使议会从 12 月初休会到 1 月底。但除了圣诞节前后几天外，这段期间内全是大臣之间的会谈和部内会议。到 1 月底已明显看出最初几项应急措施未能迅即挽回局势。储备的流失仍在继续，而且更厉害了，看来必须作更大的牺牲，因公认到 1952 年中 379 期储备将下降到五亿英镑，达到 1949 年时不得不使英镑贬值的水平。于是 1 月 29 日宣布再削减进口一亿五千万镑，并在 3 月中又宣布再削减一亿镑。银行利率提高到百分之四。

因当时大家仍生活在严密管制与依靠政府采购的战时经济下，故可下令紧缩进口。英镑不能自由兑换，故可在发进口许可证时分别轻重缓急，而不致耽误应偿付之款。于是烟草进口削减了；储备物资动用了；至于肉类配给量，因执政时的储存量只能供应三星期多一点，就从每周一先令五便士削减到一先令二便士。伍尔顿特地出主意用增加咸肉配给量来加以弥补，但肉类配给量是在六个月之后才恢复的。又因对钢的需求（或者莫如说是申请）量超出每年的供应量达一百万吨之数，这方面也采取了分配制。1952 年的总建筑量不应超过 1951 年所达到的水平。在铁路、燃料、动力甚

至下水道和水源方面的投资计划也得缩减。在非美元地区的采购工作方面,困难也未能减轻。我们不仅缺少美元,而且缺少一切外币。用巴特勒自己的话来说,“所有外币”都“硬”起来了。

同时我们必须设法开发联邦地区和英镑地区的资源,进一步紧缩海外军事开支,并对工资和一般生活费用加以限制。这种步骤对于一个靠扩展政策选上台的新政府来说虽是不能鼓舞人心的,但这却无疑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在头一个星期内一下子都削减了,而不是零零碎碎地咬掉两三口烂樱桃,事情也许要好一些。做出了一项大胆的决定,即对美国和加拿大贷款的本息按期偿付了,虽然这又要进一步流失储备。我们许多人开始自问,如果英国继续挑着行使银行制度与贸易制度的重担,并且肩负着英镑作为国际通货的一切责任,我们大不列颠还能不能继续开张营业?

在这样一次会议之后,我在日记本上阴郁地写道:

最丧气的事,“支付平衡”状况日见其坏。进口还要削减,还得大量动用储备物资。国外旅行许可削减到二十五英镑。^①

这时丘吉尔已去华盛顿,有些事要待他回来最后决断。预算案得提出来,我们希望到3月中可结束搞限制这项痛心的工作。

这时我同盖茨克尔进行了一次轻松的讨论:

因我们同在一个软席卧铺间(而且只有我们两人),我们就谈得自由、融洽。对下半年的情况他感到比他公开说的更有希望(因他想在这方面帮助我们)。他相信:(a)进出口交换比率正在变得稍稍有利些;(b)巴特勒采取的措施应能阻止资金逃逸;(c)美国人已开始购买,并将有所增加。

但他担心英镑美元问题上的这些危机是一种地方病。情况可能会变好,但也许十八个月后又会上来另一次危机。我们的问题是怎样能取得足够的黄金与美元储备来应付压力。如果美国人提高金价,那倒是摆脱

^① 1952年1月22日。

困境的好事。但(a)在美国的繁荣时期他们不会这样做。这是准备在衰退时采取的一种措施；(b)收购黄金一事有引起公众疾声反对之虞。^①

这次谈话在我记忆中是很愉快的：

盖茨克尔的天性和信仰都属温和派。他能干而又容易相处。^②

在此后与他有更多接触的年月里，我对他的性格与为人的好印象 381
不断加深。

在预算案刚要提出之前，发生了一个新问题：

尽管我们努力节约进口，削减国内开支，并在国内采取一切合理措施，我们作为银行家将被我们的顾客搞垮。除非采取某种断然措施，否则无法阻止英镑的流失。^③

英镑差额问题（在许多场合下要靠“单方面出口”来对付），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在某些英镑地区所负欠的巨额款项，乃是我们战时为防御那个地区和人民所应付的费用。我们许多人觉得这一负担不仅烦重而且不公平。定出了一个新方案，给“外国”和所有独立英镑区成员的所有英镑差额冻结或垫付资金（按正常利率）使达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八十。其余可自由兑换，但兑换率不固定。在伦敦开设可自由转移的英镑市场和自由黄金市场，剩下的储备金则用来维持兑换率。

这一方案由财政部急急抛到部长们跟前，此后成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多次讨论的问题。当时我觉得它有很大缺点。联邦各财政部长在伦敦开过会刚动身返家。如果把他们刚同意的整个协议撕毁而代之以完全新的方案，这岂不令人吃惊甚至是件轻举妄动之事吗？然而我又觉得虽则提出这方案的时间不好，并且危险，但其主要内容可能是正确的。如今已过去了许多年，固定兑换率这一概念已为全世界所接受，使世界贸易尽可能自由化的一个扩

①② 1952年2月2日。

③ 1952年2月29日。

382 大了的机构也已为全世界所接受。所以局势同 1952 年初我们所面临的大不同了。但当时有人提出大道理来支持所谓“浮动兑换率”。有些大臣自然觉得事先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这样一个突然的、有重大改革的建议。但他们仍在多次会上对此作了充分的和毫无偏见的讨论。

财政部应在前四星期就通告我们，让我们知道只要仍让资金继续外流（通过我们的银行顾客），“削减”是不管事的。他们的一切估计都错了。如果资金继续流出英联邦等地，作这些麻烦而又不得人心的削减是无用的。我们倒莫如把英镑区（除联合王国和殖民地外）统统收起来。^①

最后我们采取的政策是依靠业已商定的防御措施，把较大问题搁置到至少能有某种适当商谈之时。

很可能到 4 月或 5 月又会碰到这一问题。但那将是要经过……商谈或讨论之后才能决定的事，而不致成为被贻误了的（或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八十被贻误了的）无法收拾的烂麻刀。

但我仍旧不安：

……如果这方案正确，那是在 11 月时才正确。事实上要早在 1945 年时才是正确的！因整个方案的基础是：用这样少的资金不可能经营像英格兰银行那么大的中央银行业务。要能“随时提付”三十亿英镑而没有资金应付该银行欠顾客的偌大债款，那是不堪忍受的局势。（这是丘吉尔久已有的本能感觉的出发点，认为“英镑差额”问题必须解决。）这局势在某种程度上已由债务解除协议解决了。这至少对顾客的提款要求作了规定。^②

控制提取率使收支平衡得以保持的协议达成了。这些虽非根治办法，但可缓和一时。还有，债务并非全是战时所遗之物。澳大利亚的经济地位因羊毛价格高涨而突然加强。钱已交付在合资账上，

① 1952 年 2 月 29 日。

② 1952 年 3 月 1 日。

我们不能反对他们大量提取他们账号下的款项。现在，主要的焦虑是1月和2月间美元的继续流失所造成的。 383

但我们在进口方面的削减(因合同并未取消)尚未来得及生效,而整个联邦的削减则尚未开始。^①

我们就这样依靠正统政策敷衍过日子。

预算提出后,大家觉得合理,都愿接受。行线上^②数字有相当大的盈余,但巴特勒正确提出不对赋税作显著的增减。食品津贴开支从克利普斯所定的四亿一千万英镑减至二亿五千万英镑。但家庭津贴以及战争残废及其他补贴则相应增加。所得税的标准税率未变,但在儿童津贴方面,在所得税减免方面以及在最低收税水平方面的改动,则给予靠工资收入为生的人民大众以相当好处。所以这是个“中立”预算案。

不论是在内阁里或内阁委员会里讨论这些问题时,我自然主要想到自己在造房工作这方面的需求。但我同样也急于想找出些办法,使我们的财经政策能转到扩展方面去,而这种想法我觉得巴特勒是表同情的。问题之艰巨有时使我愁闷,因财政部每一次新的估计都比前一次估计更使人丧气。按照其中一次“我们面临破产”的估计:

……我们已进入相当糟糕的时期。如果在“支付平衡”方面幸免于垮台的话,那就得使失业率陷入一种使人们(在他们经历多年的充分就业之后) 384 认为是难以忍受的程度,并将会有人说那是托利党故意制造出来的。^③

我们都知道英镑出现危机的日子将是7月到9月。同时,4月的地

① 1952年3月1日。

② 按传统,几世纪来英国国账是以现金数来计算的,即当年预算是以“现金收入”“现金支出”计算的。资产账与岁入账上的支付款项则不加区别。多尔顿在1946到1947的预算里采用一种新编制,其后一直沿用。现金支付与现金岁入记在行线之上,而资产账上的任何收支则记在行线之下。

③ 1952年3月29日。

方选举中,又出现政治上不利于我们的动荡局面。

党因郡议会选举中的失败而丧气,并十分担心地面对5月间即将举行的市议会选举……物价上涨了,失业增加了,兰开夏几乎垮了,食品更少更贵了。我们的“削减”政策为社会党人所猛烈反对,并加以利用。而支付平衡问题虽稍有缓和,却并未解决。^①

同时海外局势一片阴沉:

美援几乎全停了,他们还尽力压低橡胶价和锡价。波斯问题短期内解决希望毫无,从而使支付差额方面有巨大流失。^②

埃及局势同样使人不安。

这时决定在1952年11月举行联邦总理会议,并尽一切努力准备制定一个建设性方案。尽管我身缠其他事务,仍觉得必须对此尽一份力。因此我写了两篇备忘录,第一篇在6月第三周发出去,第二篇在7月初发出。如果说重念以前发表过的讲稿是件枯燥的事,那末阅读几年前写的老备忘录更是乏味。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或者至少某种确定步骤已被接受。但内外局势变了;当时也许是切实可行的办法,如今二十年之后则已进入历史垃圾堆。但我们在当时看来如此迫切重要的讨论,如今回顾一下也许仍有些意义。

财政部的观点摆得很清楚。除了已执行的那些之外仍需有紧急补救办法。尤其是向非英镑市场增加百分之二十的出口一事极关重要。这些出口主要靠使用金属的工业部门来做,一部分要从国防工业抽用,一部分要靠进一步限制社会福利计划。作为一种政策,它的好处肯定在于简单。但我怀疑它是否合理或可行。它能使问题永久得到解决吗?财政部方面自己承认“困难未达‘顶峰’而是脉脉相承峰峦迭起”。他们的解决方法无疑就是克利普斯—盖茨克尔政策的延续。不管怎样,谁也不相信对非英镑区的出口能增到百分之二十,贸易委员会肯定就不信。如果这一点办

^{①②} 1952年4月8—10日。

不到，“那末前途不仅是缓慢的衰退，而是灾难”。

我觉得需要有更富于生气和积极精神的作法，而且这作法要考虑到如下事实：英国对世界其余部分的经济地位的永久性改变乃是我们一切问题的根子，而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用短期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解决得了的。我建议应把目标放在增加国内生产上——特别是在食品、煤、其他矿产以及现从美元地区进口的任何机械工具或消费商品的生产方面；并且作为一种有系统的持久的政策，进一步缩小从美元地区与其他我们对之有亏欠地区的进口量，并于必要时以英镑地区的进口来代替；凡目前从非英镑地区取得的食品和原料，应在英镑地区发展其代用品的生产供应；从我国消费品工业和资本货物工业的观点出发，最好地利用因采取上述政策后所形成的新市场；在符合这些政策的条件下继续鼓励最大限度地增加向非英镑地区的出口量。

反对这些观点的人自然要说它们会产生这样的危险，即在新形式的自给自足经济下形成一种限于高价商品之间进行交换的人为制度。我的一些同事很强调这一点。但我指出，美国的保护贸易主义虽在初期有这缺点，但随着市场的扩大以及相应产生的大规模生产的优点，在一段时期内就使面貌发生改变。英镑地区岂不也能同样做到这一点吗？再者，尽管以英镑计的物价高，但非美元地区短缺美元的情况可能会有利于我们。当然，支付差额问题可能暂时会增加。我们应以收缩一切非绝对必需的美元进口与非英镑进口来解决，即使暂时削减社会福利事业也在所不惜。但这些都应由公开政策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应是行政管理不善而产生的结果。

但这不过是政策的一个方面。我们现在能不能在欧洲领头？如果能在相互贸易和货币流通方面作出安排，那我们能否同西欧国家形成一种共同体之类的东西呢？或至少使欧洲货币与

英镑之间有紧密合作呢？我们能否在形成一个巨大的新市场方面迈出头几步，使我们能在这新市场中发挥我们的力量并取得我们的独立？

西欧国家对美元世界所处的地位也同我们很相像。他们的许多经济学家和工业家早已想把他们的经济同美元隔绝，其所取路线也同我所倡导的相似。由于摸不准英国的政策，他们的想法趋于把舒曼计划地区国家弄成一个多少带排外性的贸易地区，其结果则只能增加我们的问题。但他们面临的困难至少同我们想独力恢复英镑地区的困难一样大。因此有理由可以相信，在某种方式上同我们结合的前景以及恢复我们经济力量的计划，对他们是会有很大吸引力的。

当然，对于以美元作货币的加拿大，问题仍然存在。但优惠制至少可使加拿大人在某种程度上肯定知道我们手上的任何美元将会花387 花在加拿大而不花在美国，并随着我们力量的增强，我们在加拿大的购买力也会增加。

我坚持认为，若是想限制投资，不管在国内或联邦内，那便将铸成大错。从长远讲，甚至从较短期内讲，我们必须设法摆脱债务国的地位，重新建立我们以前作为债权国的老地位。任何一个年度的支付平衡问题都不像基本局势那样重要。尽管其后许多人对此表示惊讶，这分析证明是正确的。我常本能地感到对一个国家力量的实际考验就在于此。缺乏短期伸缩能力一事可能使人感到麻烦而且难受。但一个国家的绝对资产及其赚钱能力，也像一个企业的一样，必将是考验其实力的最终尺度。事实证明确是如此。

战后执政成绩的最好证据，也许并不在于当年平衡或基本平衡的趋势，而在于从债务国成为债权国的转变上。到战末，联合王国在国际账务上(短期的和长期的合起来)是个债务国(可能是个重债务国)；但不到

二十年，它已成为债权国，其净余资产到1964年底超过二十三亿英镑。^①

财政部则援引伦敦市和英格兰银行的观点来反对我们。对此我忍不住要作出——也许欠恰当——不够尊重对方的回答；尽管伦敦市特别是英格兰银行的权威一向总是很大的，但考察该行历届总裁提出的财、经政策，即使是最温和的批评家也很难说英格兰银行给当时政府提出的建议总是明智的。我举出各种例子，如坎利夫勋爵对德国偿付赔款能力的估计；蒙塔古·诺尔曼先生向财政大臣建议以一英镑等于四点八六美元恢复金本位的事；长期的通货紧缩政策，引起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一阵反感情绪，迄今犹未平息；1931年的事件以及在失业标准问题上对美国银行界意见的明显让步；最后，1947年恢复英镑自由兑换那个馊主意。这一切曾在许多人心目中至少引起疑问。所有通情达理的人都尊重“银行与财政界”的权威，但无需因此就坚信伦敦市的意见是万无一失的。财政大臣原是很有幽默感的人，听了这话之后曾为之莞尔开颜。

在所有那些年月里，我的造房计划受到猛烈攻击，使我颇难容忍。但即使在新的威胁之下，我也不放弃我的大目标。自由兑换与不歧视这两点应是国家计划中的最高目标。但在孱弱时刻肯定不能冒险搞。现在一切都要看11月份的联邦总理会议了。我们不能靠冻结英镑来摆脱困境，我们只能靠在国内和英镑地区内发挥我们的最大力量与扩展能力才可摆脱困境。如果我们同时得进一步削减进口，我也愿接受——甚至是削减木材的进口，只要我们仍能依靠巧妙设计来找出取得成果的某种方法。但对人民的任何进一步的要求，必须是而且应被人看成是为积蓄我们活动力量的一种计划，是为奔赴前程而大胆跃进之前的起跑准备。不管我们要求

^① A. R. 科南，见《威斯特敏斯特银行评论》，1967年8月号，11页。

消费者作出的牺牲是什么，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发展而不是限制工农业的生产。我的这些希望也并非全属空想。近年来农业的非凡成就及其对支付差额的重大贡献是资本投资、高超技巧以及科技方面进展的结果。我们未曾对一种衰落而无效的工业给予保护或保证其产品的售价。我们倒是用这种方法建立了世界上投资最多、装备最好而且最有效的农业结构。虽说不是全部，大部分的生产工业都取得了同样的成就。

我曾一度开始感到失望并怀疑是否值得干这一切。当时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联邦计划和欧洲计划，我认为值得做而且并非行不通。但也许莫如只扫自己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虽然许多同事对我表同情，但我常感失望，甚至苦恼：

我在阅读官员们的报告……它们不能鼓舞人心。“他们一边拿钱一边喃喃不满，这种病没法治”。也许莫如放弃斗争请求变为美国的第四十九州。但那时这些官员们会尝到什么？美国人不会再用他们了。^①

下院里对经济局势的辩论也没有什么帮助。比万在一次辩论中作了最有效的发言，但这同往常一样不是建设性的。在发言过程中他猛烈攻击盖茨克尔，连艾德礼也被激怒了。次日，下院开会时，

我们碰到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故。艾德礼在质询之后起立发表“个人”声明。（这种步骤通常是为自己辩护而非攻击别人。）他说比万泄漏了内阁秘密，破坏了阁员们应信守的传统。（这是有关工党政府任期内重整军备计划之初的事。）当时比万不在下院，但埃利斯·史密斯（工党）……问艾德礼是否通知过比万。回答说，“是”，但看来也许出于偶然，也许出于授意，通知信并未送到比万手里。比万将在明天发出声明。^②

比万申辩时下院满座：

① 1952年7月2日。

② 1952年7月31日。

话讲得可嘉。他详述了对他最有利的情节，即艾德礼支吾其辞不敢肯定说他给比万的信在昨天讲话之前已经送出去。只是在一点三十分时送一张字条给门房，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随便做法。

对于艾德礼控诉他的实质内容，比万的申辩就不那末理足了。但他提到 1931 年发生之事（麦克唐纳政府垮台之后）则显得很机灵。^①

发生分裂的反对派之间的这种内讧虽可作为一种笑谈，却无助于解决我们的困难。在这方面，并在帮助我完成造房任务方面，³⁹⁰ 斯温顿是我的最坚强支持者。他的长期的经验，敏锐的头脑，简明有效地摆出他观点的方法，给人以深刻印象。我们两人都感到许多专家在现实事务上考虑得不够。他们似对生产实际财富的事不够关心，太专注于银行收支账目与储备金的变动，而这些只能反映人为的甚至是表面上的变动。

联邦总理会议的日子临近了，但还没有搞出什么大的目标或中心计划。当我们在 11 月末进行最后讨论时，我深怕又重新滑到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的观点方面去。于是我又尽可能清楚地重述我的立场：

1. 不赞成有固定兑率的自由兑换制。“要自由，就得浮动”。
2. 必须依靠其本身优点来维持自由兑换制，即自由兑换制必须反映非美元地区生产确实改进而出现的经济稳定实况。
3. 数量上的限制等等在未臻安全以前不能取消；若逢危险，我们必须能单方面自由采取我们所需要的保护措施。^②

这个似得到同事们的赞同，并且至少我们提出了决不准备让步的几点意见。

会议召开时，对总的目标取得一致意见，但在公开声明中，这些目标却讲得含糊其辞或似不可能达到。制止通货膨胀，提高生

① 1952 年 8 月 1 日。

② 1952 年 11 月 24 日。

活水平，扩展贸易，这一切都很对头，但仅只是表白希望之辞。自然，有些英联邦成员希望他们的货币能与美元完全自由兑换而不顾对英镑有何后果。但总的说来他们是帮忙的也是肯谅解的。如果说会议在细节上成就不多，它总还使大家得到好的印象。这肯定是巴特勒的一次胜利。“集体措施”避开了主要陷阱，并似在弯曲的上坡路上前进了几步。

1952年就这样过去了，这是忧虑多难并且往往因争论与纠纷而使人不安的一年。但这也是至少取得有限进展的一年。在1953年，部分地由于短期措施的结果，部分由于对英国的决心有了日增的信念，部分地也许是由于仍然主宰着剧变经济潮流的那种神秘的涨落，情况有了显著改进，紧张局势因而松下来了。

在这整个时期内，首相始终保持生动活泼的精神。几乎每一次内阁会，不管局势多么严重，都可传述他的一些妙语。例如有一次对一个冗长为难的问题讨论了两小时之后，当一位大臣说了“我想把这事讲明白”这话后，丘吉尔风趣地嘟囔着插了一句话才使大家轻松了一阵。他说“那可是件很危险的事啊！”还有一次他很关心监禁一个疯子犯人所花的钱，这是因一个青年仆役被判“有罪但有疯病”。他早就说过在如今这种衰微的日子里竟然还能看到有的人家养得起一对仆役，倒是件鼓舞人心的事。现在他一股劲儿地问内政大臣拘留这个可怜的犯人得花多少钱。他问“拘禁他有何意义？”“每年一只猴子（英俚语，意即五百英镑）够吗？”我记得内阁会议桌上用这种土话早已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又一次在颇伤脑筋的会议过程中，得到通知说贝专纳^①地方因对赛雷茨·哈马总统的决定而引起了骚动。汇报了情况以及有关大臣告诉我们他打算怎样说之后，丘吉尔用以下的话总结这番局势：

^① 现名博茨瓦纳，在非洲南部。——译注

局势确实可怕。一批愤怒的暴徒，用棍子和石头做武器，被酒精鼓起勇气，又为自由主义所煽动！^①

有一次他感到或假装不懂为什么要争辩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之分。“我记得小孩子的时候同一位阿顿巴勒先生搞过我那块金表的交易。从未听说有过那种咬文嚼字的区别。”

以后，关于朝鲜战争，坎特伯雷主教，闻名的“红色主教”，在那里谈控诉“细菌”战争的傻话。他的控诉在国内和海外引起广泛的愤慨。单单是坎特伯雷这个名号就给他以招摇撞骗式的权威，但我们不能把他撤职：

“在国内他算老儿。但在东方，他们一定会说‘他们害怕这位法师，所以想封他的嘴。’当然，养这批教士莫如用来使我们准备去极乐世界并且使我们早升乐土较好！但我们没法处治这位主教。”^②

1953 年头几个月给我们带来与日俱增的宽慰。尽管联邦总理会议与 3 月间巴特勒在华盛顿的会谈没有得出很具体的结果，但经济气候稳步好转了。同时我们达成了两项重大目标。接纳日本进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之事被搁置了，我们还能避免就使英镑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之事采取肯定行动。

在目前情况下让英镑变为自由兑换货币实在毫无意义。也许我们又会吃 1947 年那样的苦头。^③

4 月 13 日我们得悉巴特勒预算案的主要轮廓：

我觉得其主旨是对的。对工业起一种促进作用。这里他提出恢复对新建厂的初期津贴百分之二十（原数的一半）；他要在一确定日期停征超额利润税；他要把一切采购税（不管原税率是多少）削减四分之一；从所得税中减去六便士。当然，这将被人称作是“资本主义”的预算案。但

① 1952 年 6 月 10 日。

② 1952 年 7 月 10 日。

③ 1953 年 3 月 10 日。

我们本来就相信资本主义是使人民获得繁荣的最好工具。作为一种甜头,所得税方面有些小调整,食糖“不在配给之列了”。(这是以低价购入一百万吨剩余古巴糖的结果。)是个好的预算案。

393 我力争要取消征收超额利润税,因觉得这能鼓励砖瓦与水泥商投资建新厂。但津贴也是同样重要的。预算案无疑标志了经济局势的改善并体现了经济力量的增强。

丘吉尔也随之精神焕发。据说有一议员在吸烟室里颇为唐突地问他还想当多少年首相,他霎眼间回答说“干到酒馆关门为止”。另一种说法是他回答“我肯定还要参加下次竞选——也许作为保守党候选人”。

所谓“集体措施”还继续采取,其目的(据我所了解)则是为产生这样一种局势,使整个英镑地区都能接受自由兑换制。我则仍坚持要求实行我的另一政策——联邦与欧洲(共同体),这个政策一些同事和我认真相信,而专家们则常加嘲讽。不管怎样,每月情况都有好转:

此刻政府处境很好——支付差额[亏欠]减少了,赋税减少了,充分就业保持着。^①

财政评论家开始担心的新危险是美国的经济衰退对英国和欧洲的严重影响。朝鲜战争的结束对美国经济当然有相当影响,到秋天,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曼彻斯特卫报》和《经济学家》的主要作家,都认为至少一个小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些情况下,由于我们的后备资金必将受到影响,就有人对美国贷款协定中让弃条款的准确作用进行了许多讨论。让弃这个词的意义不清楚,虽则我们在最困难情况下未曾运用这条款也没有那样打算过,但有人觉得对这条款的任何疑点应予澄清。记得有一次吃饭时丘吉尔问我,“让弃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表示说我不还了?”奥利弗·利特

^① 1953年5月6日。

尔顿声称美国人认为它意味着“英国人让弃统治”，^①但这话似稍欠公道。

到年底我们觉得相当站稳了，虽则可以清楚看出很难指望美国人再来帮助我们：

1. 他们不想降低关税。
2. 他们不想简化他们的关税手续。
3. 他们不想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搞笔款项去支持英镑，从而帮助我们推行自由兑换制。

这样财政部的大梦可以醒了！我们莫如回到关税和联邦—欧洲计划上去。^②

危急日子里天天开会讨论的忙乱日子过去之后，随之而来的1954年整年都比较平静。谁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如此，有些评论家看来颇觉难堪。从我作为住房部大臣这个狭窄角度来看，短期内这一切都很好，虽则从长期讲可能有危险。1954年的预算案被巴特勒称之为“维持现状”预算。它既不促进也不减小购买力。《泰晤士报》与《经济学家》认为近来结果令人满意，但仅由于世界局势有利而致。不过这种局势可能不会继续下去。但至少暂时还是如此。因此，由于这样一种奇怪过程（难以解释然而常见）的作用，整个情景突然变了。我们在1951年接过来的那场经济危机到1954年底看来很象业已消失。也许我们所未曾认识到的一点是：这不仅是一场流行病，而且是可能一再发生的地方性疾患。但在1955年春我们确实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非居留者之间，他们手中的英镑券做到了实际能自由兑换的程度。我就职之初使我几乎不可能完成造房任务的那种财政压力，现已逐渐消失，直到财政部不再斤斤计较

^① 原文为“Britannia waives the rules”，waive与wave同音，这句话又表示以前常说的“Britannia rules the waves”（英国人称霸海上）如今要颠倒过来了。——译注

^② 1953年12月29日。

我的开支了。至少到那时他们已认识到同我斤斤计较也无济于事；因他们知道首相和同事支持我，把我的造房计划放在政治需要的很高地位上。他们也知道我会坚持要求，并于必要时会以辞职
395 来坚持我的要求。只要对危机的恐惧存在一天，我就总要碰到麻烦。但当危机象舞台银幕上的神龙那样缓缓敛迹时，我对部务的操心也因此消退了。

当我被任命为住房部大臣时，最迫切的任务也许就是在中央和全国各地搞一个有效的造房行政机构，以便使房屋得以营建起来。不久就清楚，如要获得成功，就得有类似战时体制的那种机构。政务次官希普香克斯是个惹人喜欢的有教养的人，他在学术界与宗教界都有地位——他是主教的儿子——而且举止文雅。他对官场事务见多识广并恪遵其成规。地方政府及其各组织都爱戴他。但他对工业问题或生产问题一窍不通。有两位副次官：约翰·里格利爵士对地方政府的知识和经验是独一无二的，但已接近退休年龄；伊夫林·夏普女士非常能干聪明，而且性格坚强。我一开头就感到她将是我的一位得力同事，并且不会反对我们将采取的非正统做法。但显然得有一个人起总指挥的作用，就象战时管生产的各部里那样。想做到这一点就产生两个问题。第一是找出这样的人来并说服他来做；第二是怎样把他安插在现有编制里。我和一些战时老友如格雷厄姆·坎宁安爵士和威廉·鲁兹爵士商谈之后，决定设法去找珀西·米尔斯爵士。我在他任机械工具总管之职时就熟识他^①，并于其后一直保持联系。他是一个够格的行政工作者。他战时在政府中工作过六年，其后在德国当过三、四年经济总顾问。所以他对白厅很熟悉，并在那里有许多朋友。但如今他已回到工业界干他的老行了。能不能使他的同事们再忍受一次牺牲，至少再让他出来干一年呢？当珀西爵士前来见我时，他一如往

^① 《战争风暴》原书第95页。

常地谦虚说他能力有限，并坦白说明要出来有困难。他自己是愿来的，但不容易安排。“也许莫如我自己去找那位主席劝他放你走。”“我并不认为那样做会起什么作用，”珀西爵士说。“他从未闻知你的大名。”“那末要谁的大名呢？”“只有丘吉尔。丘吉尔是他的英雄，他的上帝”。

我就按照他的意见设法于次日晚见到首相。我拟好由他寄给那位主席请调珀西爵士出来工作的信。他对此颇不耐烦，但我终于说服他非此就造不成那些房子。“好吧，我就发这封信。把它打印好让我来签字。”“不，首相，你得亲笔写，不能打印。”经常惯于用口述打印信件和备忘录来办事的丘吉尔，对这可感到是件不愉快的负担。“我真不愿干这类事。这简直是强加于人。”“那末，首相先生，如果你不肯写，恐怕三十万套住房就完不成。”“如果我确实写了，他们会怎样处理这封信呢？”“他们会把它装在两面可见的玻璃镜框里当作宝贝收藏起来。并且还需要有一张你自己亲笔签名的相片。”“除了给极少数人以外，我不寄签名相片；给陌生人决不寄”。“但是，首相先生，这人比你所认识的许多人更重要。他是下决定令的人。我只要两个人帮我。你已给了我马普尔斯，他是非常能干的工程师和组织工作者。如果有了珀西爵士这个第一流的行政工作者，我相信就能办妥事情。”

进一步商讨一阵之后，我达到了目的。于是就带着这些珍宝去找米德兰兹公司。我去了，见着了，并于送礼之后办成了。

搞这项任命在白厅和下院里自然会遇到些麻烦。在白厅里，人家不厌其烦地告我说，如今离战时已久，再也没有给珀西爵士那种人的实际名位了。此外，他来当行政官还是当顾问官？他同常务次官和部内外各司长相比处于什么级别？他的职务究竟是什么？

我为珀西的职务问题同那些人事官员纠缠不清。他们要他当顾问

官,我要他当行政官。现今情况变得同我以前任职时大不一样了。官员们的“工会”又掌权了。财政部计划人员的意见高于一切。他们对待大臣们很客气,但毫不买账,只当作惹人厌的过客。^①

甚至爱德华·布里奇爵士,我的一个老同学和最无偏见的人,也有些烦了。最后给我送来一篇长文,摆了各种条件和资历。我说这一切都很对,但事实上所有议论都是多余的。我把这些条件当作印在公债券背面的条款。“除非到期不付息,谁也不会去看它们。珀西爵士是非常机灵而又有干劲的人,他无论如何定能博得那些共事人的不仅信任而且爱戴。”事实证明就是如此。在下院里,对11月28日正式公布的任命珀西爵士的事也有些反对。比万免不了要挖苦说他是“年俸一元者”。^②但报界反应良好。

我接受任命不几天,决定会见建筑业工会的代表。工会领袖科波克爵士与福西特爵士应邀前来下院见我。他们很友好愉快:

我告他们说,我对这问题懂得很少,甚至是门外汉。他们听了很高兴,“前任部长们什么都懂,但同他们谈话毫无用处,只能让他们谈给我们听”。这是指的比万和多尔顿。工会领袖们拥护工党。但他们对政界领袖很少好感。^③

然后我会见建筑业主的领袖们,其中包括科斯坦,以后证明他是热情而又大有帮助的人。

398 第二步是仿战时供应部的格局成立一个小的部务委员会。它的工作立即见效,虽有人认为它是危险的新创举。它减少了公文往来并可迅即得出结论。但即使组织改进了还得有外援。我们要依靠他部,特别是工程部。到11月中我同该部大臣埃克尔斯和负责原材料的斯温顿勋爵达成协议,成立一个机构经管整个建筑计

^① 1951年11月19—24日。

^② 英美在战时被资本家派进政府机关工作的工业界人士有此称,因他们拿资本家工资,几乎不拿政府工资。——译注

^③ 1951年11月5—9日。

划为各部共谋方便：

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造房、修房、建工厂、建学校等事能得到通盘考虑，并以互相体谅与通情达理的方式进行工作。^①

于是我们请苏格兰事务部参加工作。结果就获准在内阁中成立一建筑委员会。这使我们能得到内阁秘书处的帮助，有F·毕晓普其人作为我们优秀的秘书。这人其后就相继成为艾登和我在唐宁街十号的主要私人秘书。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又灵活又忠诚。这使我们在中央获得一有效机构。

但不久便清楚看到，由于不能真正直接控制造房计划，还必须成立坚强的地方组织。有了新机构，只要存货与财务许可，我们可伸手要到材料。我们可把造房方法和设计加以改进和简化，想出各种方案来节省时间、金钱和劳力。但除非在每一地区成立工作组来视察和控制计划执行的细节，并恢复战时那股热心精神，我们就不能有效推动工作。而这需要大家都努力干。我们必须成立地区房建委员会。还必须不厌其烦地去找地方当局。必须把造房事业放在政治斗争之外。我们必须制造公众舆论来支援我们不久后提出的所谓“造房进军”。

就在1952年1月的头几天里，我们讨论了详细计划。

P. 米尔斯爵士很急于要成立地区房建生产委员会，其中有劳工部、399
工程部官员以及劳资各方代表参加。这事把部里的人吓坏了；但我决定赞同珀西爵士的计划。^②

这还在初期，人家的怀疑和犹豫是在意料之中的：

部里人仍对珀西·米尔斯不放心，虽则没有他我简直不敢想像该怎么办。他以现实态度与精确估计处理每一问题；他的建议既大胆又巧妙；他那股子耐心的韧劲使得事情总能照他的意图办。因他冷静而有

① 1951年11月15日。

② 1952年1月1—4日。

礼，谁也不能埋怨说他是“庸俗的商人”。但他们不放心，特别是不放心他工作速度那么快。秘书(T. 希普香克斯爵士)在一次长谈中公正而坦率地说出了他的担忧。我想我已说服了他，使他相信这套制度不仅可能推行而且必须推行。^①

财政部老早就想结束地方机构制度，这是战时产物，其所以必要不仅是为生产所需，也是由于交通困难。他们当然对我1月底在诺丁汉发起的“造房大进军运动”不感兴趣。我们要在委员会里加入建筑业资方和工会代表的想法更使他们头痛。但我们终于实施了我们的计划。

每个委员会要有一独立的主任，通常由工业界名流担任。在宣布成立这种委员会时，我明确提出它们的任务是：

400 它们得摆脱官样文章并简化办事手续；要看计划的进行而解决随时随地出现的生产问题；要打开喉咙口；要克服物资短缺；要迅速处理所发生的一切困难，这些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同我们要逐渐加快步伐前进的决心分不开的。我相信它们还会有助于唤起热情和道义上的激情，无此是不能成功地执行并有效地完成任何大任务的。^②

这样，我们用白厅的部际联席会议，达成了地方和中央的相当完整的合作体制。

到4月14日米尔斯在布里斯托尔建立了第一个地区房建委员会。接着全国各地都成立同样机构，而且尽管我们仍同一些习惯于按老处女那种小气方式办事的高级文官发生麻烦，我们逐步战胜了他们的反对。

在整个3月份，这种委员会纷纷建立：

房建机构逐步形成了。各地方的委员会在建立起来……米尔斯显示出他的想象力和决心。^③

① 1952年1月8日。

② 1952年1月22日在诺丁汉地方阿尔培大厅的讲话。

③ 1952年3月4日。

到3月中，虽然常务次官仍对所有这些新的非正统的作法抱怀疑态度，

所有别的文官(包括里格利爵士及伊夫林·夏普女士)都热情工作，并且似已逐步懂得他们对于生产和经营管理知道得多么少。我确实感到他们开始欣赏这种修改的比弗布鲁克主义了，对这种主义，在马普尔斯(我的政务次官)与米尔斯的协助之下，我打算加以宣扬和实践。^①

不久我们感到必须提高委员会的权威。碰到物资短缺和出现喉咙口方面的困难愈多，愈需要就地加以处理。然而即使到了1953年4月早已充分证明委员会的用处时，我还得再一次正式受到财政部方面的攻击。

房建工作的日常事务都是在地方机关办理的。要是在眼看就能达到目标的此刻去扰乱他们，将是件要命的事。

造房计划仍然主要依靠当地；他们的突出成就……则要归功于当地 401 人员的工作。有时需使他们加快步伐，有时则须放慢。这不能依靠信件。这需要有最适宜的处理；说到底，许多(地方)当局在政治上是反对我们的。

今年希望造三十万套房。但看来材料方面很没有把握。我们得要求有关各方尽量节约用砖；对其他材料可能也得这样做。有关方面不爱听这些；但在地方人员的劝说下，大多数是和我们合作的。若不节约就没有房。我们只有不断察看才能做到节约。发文件不仅无用而且有害。我还说，如果同事们对每年造房的数字变得无动于衷，

那时我们也许得把各地机关收起来。到了那个时候我希望自己也该收摊了。

这话没有被人听进去。

不久我们感到必须把部内其余机构按照房建部门的样子重新改组，并且虽还有相当大阻力，我们还是做成了。常务次官不断向我诉苦说我的建议和做法都是他所谓的“不合宪法”的：

^① 1952年3月13—14日。

次官（而且只有次官）可向大臣进言。他必须咨询人事部门的头头布里奇爵士。这样主教咨询大主教。多逗！^①

到 1952 年底，所有内部困难大都克服，主要问题是安排米尔斯走了以后工作怎样组织。米尔斯将要走，这是我们很懊丧的前景。显然报来的造房数字已开始看出成绩，但我感到对怎样安排不放心。定货单象流水般的涌来，再加之在材料方面从未发生过严重问题，这些终于使建筑业的业主和工人产生了信心。虽然进展不平衡，但生产在上升。不过总还有人抱怨就是了。

我写了一封回信当消遣，这信是答复由财政大臣签署但显然是由一位……财政部官员草拟的可笑的信件。他抱怨说建筑业用人比前多了。但他没有说生产增加的百分率更大——几乎是两倍。^②

12 月 8 日米尔斯要走了：

下午米尔斯爵士前来“告别”。他干完了一年的期限。这是件令人懊丧的事，将会使事情难办得多。但很幸运他能来，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同时，1953 年将是有斗争和困难的一年。砖和水泥是最伤脑筋的事。它将象陷入滑铁卢一样的“可恶困境”。但我觉得如果现今努力工作，我们会顺利通过的。^③

到这时我们都已学到了不少东西。我当然仍同米尔斯保持密切联系，随时征询他的意见。由于我对他以前的工作有好评，并于新近亲身体会他在这重要关头的一年中干出来的成绩，故在 1957 年要我组阁时我就邀请了他。我们的友情保持不变并逐年增进。部里有些官员对我们采用的新的忙忙碌碌的作风看不惯，这个我毫不责怪他们。这是因为他们从未搞过战时生产工作或在生产部门工作过。但他们都是明白人，不久就会觉得这种新经历很有意

① 1952 年 3 月 1 日。

② 1952 年 9 月 10 日。

③ 1952 年 12 月 8 日。

思。确实,在 1955 年底(当时我是外交大臣)我写信给希普香克斯祝贺他退休时,接到他一封最优美的回信,其中他愉快地提到我们共事的日子。“你任职的那段时期”,他写道,“确是部里了不起的时期……对于和你共事的那些日子,我将永远怀着愉快的记忆。”这个我相信是真心话,因虽则我们的做法看来奇怪,但他和他的同事都是些能干而爱国的人,是受高尚思想和优良传统熏陶的。

403

我们在 1951 年所面临的住房问题,部分地还是十九世纪遗留下来的,那时尽管造房速度快,人口快速增长的结果使一些老城市拥挤不堪,产生了贫民窟和半贫民窟。这情况又因房租控制变得更糟。房租控制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出现,其后并未完全解除,而在二次大战时又重新推行。这就使许多只要进行季节维修便可延长寿命的房屋继续坏到不合标准。更有甚者,出现大量的“拆烂污房子”,再加上房租控制,更给我们留下大批逐渐变得不堪修理的房屋。二次大战期间有六年几乎停止造房;而这些年里因约有三分之一的房屋被德国炸弹或轻或重地毁坏掉,大量的维修清除工作就影响了造新房。据 1951 年的初步统计数字,家庭数超出住宅数达一百万之多。而且在现有一千三百万单套住宅中,有二百万套以上是住了两家或更多家的。战后造房进度也不稳定;只有 1948 年那一次超过了二十万套。

按照丘吉尔那句名言,“工作,食品和家庭”是战后全体人民的主要愿望。他可以声称这第一点在他上次执政期间完全做到了;至于第二点,配给终于在 1954 年底完全结束了;而朝着满足这第三点合理的要求,已经做出了可观的成绩。

战后六年间我们仍生活于其中的那种窘迫甚至失败主义的气氛,现今是很难体会的。在当时条件下,也不可能把那些束缚手脚的规章制度一下子除掉,因按估计所短缺的劳力和物资以及未曾

404 满足的需求之大，这些规章制度似都有必要。若无当地发出的许可，任何房屋都不能建造。而除非在部里分配的定额内，任何地方当局都不得造公房或允许建造用以租售的私房。而且所建房的大小与费用也受严格限制。同时还指示地方当局对每十起建房申请不得发放一个以上建私房的许可。这规章其后变到五起中发一个，虽然此项规定仍可行，但并非必须照行。1951年11月19日我提出一项计划，把这提高到二起中许可一个，同时定出行政措施，继续控制房屋大小的限度并规定转手出售的条件，以保证房屋落入确需安家者的手里。其次我提出允许在适当保证下出售市属房产。对这类房产自然就不再给予津贴。第三，我打算让地方政府鼓励建造小房。幸而在多尔顿执政时期已拟定了一些计划，一方面规定了起居间和卧室的最小标准，同时又相当缩小总面积，从而节约劳力与材料。我对内阁讲清楚，这些提议都不能增加1952年内的造房数，但因许可盖房的手续更宽更方便，可能使较小建筑业业主早日重新营业。但我确实相信这些改变以及希望能输送给造房当局与建筑业的新力量，会使1953年及以后几年的造房数字增加。

这些建议经内阁批准，于11月27日宣布。

我宣布之后来了一阵暴风雨似的补充建议；但我觉得反对派有点乱了阵脚。艾德礼与莫里森都起来提补充，这是不寻常的事。^①

405 立即有人提出审议案，但我发现三项中只有两项建议受到谴责。多尔顿还足够明智，看出第三项设计较小住宅的建议是同他的想法一致的。总的说，辩论后他们败了：

多尔顿先讲，语调很温和。我接着讲。……多尔顿对“可比较的住房需求”一语表示嘲蔑。这能表明什么意思？（这是表示对[私]房……与[公]房的申请之间的比较……）答复时我说这字眼是从上届政府的公

^① 1951年11月27日。

文中引用来的。奇怪的是比万(他继我讲话)也落入同一陷阱(关于另一段话)。我让他一直说到对我的另一句话大发脾气。这些暧昧的字能表明什么意思?它们是圈套,是骗人的鬼话等等。然后我站起来说,“恐怕我得请你来说明它们的意思。这里我又一次犯了剽窃罪。那是你自己的用词,从你在1948年的通知书那里抄来的。”比万再也不能神气起来了,他余下的话吞吞吐吐,讲得很差劲。多么生动的一堂“查核你的引文”课!①

如同后几年的情况一样,工党方面似乎搞不清他们究竟想反对一切私人占有房屋还是只想反对扩大私人占有,其理由则认为这将影响建造新的公房。关于第二点我可从以前的经验来说明,即在许可的分配数字中,私营房产不可能超过四分之一。因此,如果我们在1952年只造二十万套,公房数字仍会同以往任何一年一样多。但我当然满怀信心地希望公房数字大有增加并能满足私有住房的需求。对公房的出售也提出了同样的反对理由。我们大家仍被一种生硬的资本投资计划和一种以现有劳力和资源为基础的数学公式理论所愚弄。似乎谁也不去想想有这样的可能,即吸引小建筑业在村镇上不宜搞大建筑的小块零星地上很快地造起许多小房来。而且谁也没有认识到满满的定货单和信心能把生产提高到怎样的程度,人们的智慧能如何找到短缺材料的代用品。但除了这些反对意见之外,当时的(也许甚至是今天的)社会主义者讨厌大家占有住房的想法。

虔诚的社会主义实行家确实相信他们能给所有别人的事办得比那些人自己还要好。他们诚心诚意地那么相信,相信为此就得把财产集中起来。奇怪的是,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早就有许多教派和学院坚持这种观点。有一度是教会这样想;再一次是帝王;然后是封建主;再是辉格党大地主;然后是工业巨头。同他们那么多的前辈一样,社会党人只能

① 1951年12月4日。

是赞成财产的，如果财产能归他们控制的话。他们只能是拥护地主制的，如果能让他们当普天下地主的话。同样，他们不喜欢附属房屋，除非它们是附属于国有化工厂……①

我们的用意则不同。

我们希望财产尽可能广为分散。我们觉得适合这种分配的一切财产形式之中，房产是最好的一种。②

当然，我们知道在多年之内大部分家庭还得要租住房屋。但我们打算看到他们能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家。我发现在前届政府任期内国民储蓄委员会曾发出一种广告画配合储蓄运动，我就接到过这样一幅画。

画的是一个人倚门想望着花园里的一个别墅，标题是“他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但那个太危险了。这可能被缺乏头脑或思想不健康的人看作是当时政府在鼓励人们为占有私产而储蓄。这是十足的邪说，将会导致分裂。于是西尔金爵士立即进行工作，派人查究，把广告画收回，而那位画家无疑会受到应有的申斥，甚至被解职。③

407 因此，这最初的交锋总的说是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同时报界反应友好，包括《每日镜报》在内，公众此刻准备等待。

另一桩难题是随着银行利率提高之后必然会产生。关于借给地方的贷款应收多少利率的问题，马上就引起争论。看来利率要继续上涨，这是件对我的造房计划大有关系的事。因为若果利率增加，则即使为维持现有造房规模也必得相应提高造房津贴。我始终坚持说，提高银行利率的目的是为使人们停办那些不必要的事。所以如果政府想停建更多的住房，下一道命令就行了。我对同事们说这很容易做到；但一面想鼓励地方当局和私人多造房，一面又提高利率，那岂不矛盾。幸而重订津贴的正常日期不久就到了。为应付各种需要，津贴制很复杂。我终于在1952年2月底以

①②③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1年12月4日。

前能够宣布增加造房津贴，使地方当局能偿付所提高的利率。每所房的标准津贴从每年二十二英镑提高到三十二英镑十二先令，其中四分之三仍如前由财政部负担，而四分之一由所得利率偿付。我花了很大力气办成的这件事，从理论上可能讲不通，但肯定行得通。有人在《泰晤士报》上对它猛烈抨击，这对保守党的一些支持者也产生影响。《经济学家》也持同样论点。这些评论家除了感到需要有住房之外，似乎从未想到津贴问题和房租控制问题必须通盘考虑才行。只要房租控制不许触动，津贴就必得保持。处理房租问题还不是时候，先得有了房才能谈房租。

必要的立法手续相当平静地通过正常途径进行，并于7月底以前结束。我同比万的私人交情一向很融洽，感到他是当作一种享受来进行争辩的，并感到他的抨击虽很厉害，但不想伤人。对楼上常务委员会会议，也象这时对所有的法案一样，颇需要慎重应付：

因我们只多一票，不足以提出停止讨论动议，故得靠对方包涵才能 408
通过。^①

然而我从白厅和下院商讨过程中的辩论里学到不少东西。除了计划庞大之外，关于完成它的方法上也有不少事情要做。我们必须根据这个扩展性计划开始

设想下几步可能做到的事。其中最重要的是：(1)减少“津贴”房屋这个猛涨的河流，增加“私造”房屋的涓涓细水；(2)处理“房租”问题，从而解决“修缮”问题；(3)搞掉“发展费”。

所有这些目标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可以合起来当作一个完整一致的计划提出来。

到1951年12月中旬，我准备好同工程部大臣和苏格兰事务大臣一起为一个扩展性计划进行辩论。我要求肯定准许每年营造，我要求明确的权利按每年三十万套的速度建造住房，要连同必

^① 1952年5月30日。

须的设施如上下水道、电、煤气管等等。这个数字必须分段完成。我要求在头三年里至少准许造八十万套。只有这一点得到同意之后，工程部才能有信心有把握地去计划必要的材料与设备。因缺钢和木材，可能必需做些调整并设计新方法。此外，那种对工程部大臣所能发出的修缮许可证的任意削减的建议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愚蠢的。必须让工程部大臣按当地情况自行判断。

我要求有权免掉所有这个年度计划和财政部方面象老祖母那样的控制。我要求在今后三年期间内造八十万套房。我应能指望在1952年造二十三万套；1953年造二十六万五千套；1954年造三十万套。如能获得这项权力，工程部大臣和我就能一起计划必须供应的建筑材料。只要减少多层公寓，多造些两套卧室住宅，造小房，就只需增加极少量的钢便能完成三十万套。我们将会碰到困难和喉咙口。但财政部方面却根本不肯让我们试一下。^①

回头想想，可以体会到当时财政大臣对我的活动多么担心，他和他的同事们为他们的的工作争得多么坚决。年度资本投资计划的确切概念对他们说当然很有价值，但这于我并不适合。当丘吉尔同我私下谈话时，他觉得我搞得颇固执。我满足了没有？我所要求的事毕竟还没有被否决。还会有进一步的讨论和咨询。

我回答说，“不。再开一次会就等于再耽搁一个月。为了推动这件事我已浪费了两个月时间。我必须着手改组建筑业，并首先是建筑材料工业。我必须请求内阁正式批准我的总计划。”^②

下次开会时看来万事大吉。我说明了请求批准的一切事项，没有返工。

这样我们掷出了“双六”骰子，开始准备造房的铁丝与梯子了。^③

但我太乐观了。当经济大风暴猛刮之时，我几乎被刮倒了。我该

① 1951年12月15日。

②③ 1951年12月28日。

多么感谢 1950 年保守党年会和名闻一时的所谓目标——但不久被人当作是许下的诺言。这是我的应急副锚。我要靠它来渡过这场暴风雨。

1952 年的年初几个月里又起了争论，幸而牵涉面较有限。我们的造房计划从理论上讲没人反对了；但对用水问题还有争议，这倒主要不是为了住房用水而是为了工业用水。在平静时，我细想起在限制气氛下宣布扩展性计划的危险。知识界的风尚变得跟以前多么不同啊，不仅是白厅里的人们，连那些在正经报刊上写过很多文章的职业经济学家也对我的顽强深表惊讶。在我这方面则以 410 熟思这些人的品格来慰藉自己：

他们喜欢观望，不冒风险。这就是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大人物和文官的原因。他们崇拜安全，这是现代的财神爷，这比过去所曾崇拜的任何假神为害更大，对英国的权势、财富和力量有更大的破坏作用。但公众对我们表同情，特别是那些“大众”报刊……我想我们已让人知道我们对住房问题至少是要有所作为的。^①

到 3 月底我还在等待有人还击。同时我感到事业已有进展：

住房政策在形成中。我们已获得更多的灵活性与自由。向我们要房子的“定单”已超过五十万而不是比二十万少。有材料和劳力吗？劳力，当然有；材料，暂时还有——但来年将很困难。冷静而百折不挠的米尔斯确已把整个部改造得适合我们的目标了。没有他我简直毫无办法。^②

一直等到 6 月底才对 1953 年的所谓资本投资计划进行讨论。我感到这颇象学术讨论。实际问题当然仍是怎样减少进口。有人提出应取消八万五千史坦达（每史坦达合二百五十至三百磅——译者）木材的进口许可。据财政部计算这可节省五千五百万英镑。

① 1952 年 1 月 27 日。

② 1952 年 3 月 29 日。

但这也要减少三万套住房。这时马普尔斯在积极搞一种住房设计，可以几乎不用木材而代以水泥。我称它为“无骨鸡”^①。但即使这项设计成功了，也很难对1953年的计划起作用，因在当年大部分时间内完工的房屋必定早已动工了。

经过不少争论之后有人提出一项新方案，要求把1953年的造
411 房计划稳定在二十三万套之数。这对我当然很难接受。我指出早已准许我大致按如下进度造房：1952年二十三万套，1953年二十六万套，1954年三十万套。现今在计划中的有五十万套，其中二十五万套正在造，其余的或已订了合同或已将空白合同发给地方当局。即使我不再往下分派数字，在来年初业已宣布的计划数字仍有三十六万套。我们不能停造或缓造这些房屋，除非是对已分派的任务拒绝提供资金或发放许可证，或者不提供材料。前一种做法需要正式宣告，并将产生一切政治上的和工业上的后果。第二种做法能暂缓危机，但只会使它更深化。

1954年当然又当别论。如果政府放弃三十万套，我们就可以把分派和摊派的速度放慢。我指出，要想改变业已动工房屋的设计或造价，如今已无能为力了。但现正采用较小型的设计，1953年计划数字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这种所谓“人民住宅”。这虽不能大量节约木材，但实际可省百分之十的结构材料。我们还在设计不用木材的房屋，但还不能把它纳入计划。

我认为搞年度资本投资计划的基本错误在于缺乏现实意义。虽然为了方便或政治宣传上的目的，按历法年度来作为计时单位是有用的，但它对生产计划的关系不大。生产应是个持续而稳定的过程。建筑业方面有过痛苦体验。过去也曾犯过下令要立刻多造或少造的错误。如今决不能再犯了。

幸而有一份书面报告支持我的论据。那是上届政府由最著名

^① 应为“无骨奇”，借用谐音鸡字。——译注

人士组成的建筑事务工作组的报告,其中强调指出:

在过去,建筑业也许比任何其他行业因经常不按原定计划执行而受到更大的损害。如果认为建筑事务可因经济需要而象水龙头那样随时开关,那就不能指望有效生产。 412

因此我请求不要改变 1953 年计划,但我将尽一切努力来节约钱和材料。对于 1954 年则尚无需作出决定。

辩论继续进行,但愈来愈不切实际,请来的几位专家从来离不开他们的本本。谁也不能准确估计建筑业的年产量。

计划人员说(象奥林比亚山神似地肯定)十六亿英镑。如果完全承认各部的整个要求,则相差百分之十。如果根据他们修改后的较低要求,相差百分之五。那末为什么还要继续辩论这个纯属理论的问题?①
当我们对木材与钢材近乎达成协议时,水泥问题又出来了。已有一百九十万吨水泥拨出来准备出口。

“但是能不能提高水泥产量?水泥毕竟是本地产的。它不过是用泰晤士地区的泥石做的。”“但需要投资。”如此辩论不休。②

我觉得很难想象有谁能认真看待这一切讨论。

如果有谁真的相信这一切关于投资之类的荒谬侈谈,他就只能随同它的发明者克利普斯到瑞士病院里去安息。③

这种责难当然太刻薄了,但可表明我们当时的情绪。

同时讨论仍日复一日地以各种形式继续着,只是偶尔为其他同样紧迫的问题所中断。我们仍难使人理解 1953 年计划已安排好,并订了合同,仍难让人理解设计方面的改变只有到 1953 年后 413 期才能生效,特别是稍露任何削减的风声必会使信用破产并减缩产量。我对钱数限额方面的议论仍抱怀疑。支付差额则是另一回事。但即使再削减四百五十万英镑按现价计算的木材进口量,我还能保持全速造房。价格仍在下降,如果这种局势继续下去,那末

①②③ 1952年7月11日。

或是用低价木材或是靠“无骨鸡”，我有信心在1954年造出三十万套房来。在这些苦恼的日子里，马普尔斯和米尔斯给了我了不起的支持。到夏末，主要是由于双方都谈得精疲力尽了，我们的论点通过了。这多亏丘吉尔对我们的同情和他的善于敏锐地抓住争论中的主要问题。1953年所定的二十六万套房屋这个目标保住了，但彼此谅解在这目标以内要尽一切努力节约劳力和进口材料。

造房数字完成得不错，秋天开保守党年会时看来我们至少能在1952年完成二十三万套住房，因为已完工的增多了百分之二十二，建造中的将近百分之二十，新建的约百分之三十。在这次会上马普尔斯和我受到欢迎，我则特别归功于埃克尔斯和工程部。但我知道前面还有陷阱：

度过了这一切斗争和到处被人讨厌的年月之后，回想起来觉得事情确实颇为可笑！情况不会老是这样。造起房屋来总是好事。但下一件任务是提高房租！^①

约在此时，作为资本投资这一教条的副产品，出现一次新风暴，它起初只是几片乌云，但终于成为疾风骤雨。这便是“受闪击城市”问题。我事先已得到一些警告，因1952年9月底我去过一次普利茅斯。我看过所有房址，参加了市内通常礼仪。但当时的实际任务是同重建委员会开一次会。普利茅斯受敌人轰炸的损失很重，但在阿斯特爵士领导下，重建城市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事情已有了些进展，但有关的人急于把工作推进。我不能带给他们宽慰的消息，因我知道拟定分派给所有十八个受闪击战城市的款项根本不够用。

这“资本投资计划”实在令人难以容忍。对于象普利茅斯那样一个地方，就显得特别愚蠢，那里无需建造军工厂或出口品工厂——甚或任何样的工厂。普利茅斯的工厂就是皇家海军码头。所以如果我和财政

^① 1952年10月10日。

部的仗打输了，普利茅斯的许多人包括可敬的阿斯特(下次选举之后)在内都将失业。^①

下院开会时，各党议员都开始为这个难题操心。大家都已知道现有款项将大为削减。至于削减得多么厉害，就连评论者也未充分体会。在此情况下，显然应该做出某种决定告知公众了。

局面很简单。1949年以后历届大臣除造房外还分得一批投资额，以便进行一些重建工程。过去三年工程的实价是：1949与1950共二百三十万英镑，1951年三百五十万英镑。当然，投资额只意味着发了许可证。政府并不提供钱，除非是一些特拨款项，用以支付已购得但尚未使用的土地贷款利息。建设事业几乎全部由私人出资经营，主要是办公楼与店铺。若将1953年款数削减到二百五十万英镑，所余的新工程就微不足道，因来年内单是把进行中的工程完工就至少要二百万英镑。一旦让大家知道这一建议，势必引起大叫大嚷。从政治观点讲要牵涉到六十八个议会席位，其中二十八个是支持政府者所占的。迄今为止都拿缺钢一事作为方便的借口，但去年大家已知道用钢筋混凝土并在有些情况下用承重墙代替钢材试验成功，所以显然不能再使这个花招了。造店铺和办公楼在一定程度上需用特殊工人，因此可能同普通建筑工程很少关系。事实上如果没有足够的工作，建筑工人就要转入他业或靠救济生活。 415

我建议1953年内为新建工程再批准二百万英镑，这样全年总计划数字则有四百五十万英镑。至于新工程在何处并于何时开工，那就应由工程部通过地方建筑委员会去决定。这就能避免同国防、工业、住宅或学校等优先建筑工程冲突。还应记住的是，几乎所有的创办人都是不靠补助、津贴或支援来办事的。如果要他们缓办的日子太长，他们可能就根本不办了。

^① 1952年9月24日。阿斯特是普利茅斯(萨顿)地方的保守党议员。

我有一种颇不庄重的习惯，喜欢在备忘录开头引几句轻松的话，通常引自《艾丽丝漫游记》。这次我引了两段话，我认为都是中肯的：

平日总是说你“托米长托米短”，还说

“把他轰出去，这畜生”；

但一旦大炮轰鸣，

又说你是“国家的救星”！^①

我们当然先得集中一切现有建筑劳力去重建那些受苦最深的城市……^②

我想是这两段引文起了作用。

1953年3月间发生一次短时辩论，使我有机会来说明资本投资计划的目的何在，因那时公众几乎还不知道这件事。我想在完全自由（因条件尚未成熟）与太僵硬的制度之间采取中间立场。我常常认为

416 在我们今日社会结构下，经济计划是非常必要的；这个社会如今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受公众控制，并由公众出资经办事务，因而只能由直接计划来加以控制；另一部分受私人控制，并由私人出资办事，则可由其他可能更为陈旧的过程来控制。^③

我得要讲清楚，就被闪击城市说，由于资本投资计划包括公方或私方出资经办的一切工程，所以它跟支付方法无关。考验的尺度是现有的劳力和材料。但估计数字决不能绝对准确。它估的是全岛的总数量，虽则我们都知道劳力是不能流动的，甚至物质财富也只有花费高价才能获得。此外建筑业在任何一年估算的总产量是一系列奥妙计算的结果，只能供总的参考。它是有一定误差的。只

^① 拉迪亚德基普林献给为英帝国主义在印度卖命的士兵一首诗中末段。——译者

^② 1945年3月15日丘吉尔在威斯特敏斯特中央大厅的讲话。

^③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3年3月2日。

要不是书生气十足地使用它，这方法是切实而明智的。而且还要考虑到生产率会一年比一年增加。不管怎么说，重要的是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而不是分派数字。而工程量的数字则大有希望。我们在1952年完成了价值四百六十万英镑的工程量，

这数字比我部在严格遵守资本投资计划情况下所能完成的肯定要高。这些事的妙处之一是你非得等到年终才能把数字加出来……同时我们在这些城市和国内其他地方所造的房屋，比我们自己或任何别人认为可能做到的还要多……^①

我们对每个城镇及其所处特殊情况作了就地考察之后，就补发新的许可证。我相信这方法是明智而且灵活的。

这场辩论历时不久，并且总的说没有派性。这场辩论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揭开了那仍然遮在中央计划控制工作上的神秘帷幕。不管怎么说，我们对被闪击城市问题不再伤脑筋了。这问题曾一度有变成重大政治问题的危险，终于因其内容贫乏而消逝了，但当然谁也没有因而对政府特别说句表示感谢的话。

这扩展性的造房计划在种种干扰之下终于保存下来了，我们 417 觉得理应尽一切努力来减轻国库的负担。从财政方面讲，最好的办法是增加私人造房的涓涓细水，来汇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代替津贴造房的那股洪流。于是在1952年8月间，我们授权地方当局，在认为需要增发造房许可证时可以不限公私之间的比例。这是抑制津贴数字增长的最好方法，而津贴数字的增长则正不断受到攻击。在这个问题上确有许多混乱思想，因为这些津贴都是契约规定的。若拒不执行业已商定的事便将大大丧失信用。最好的希望是使无津贴造房数占扩大计划中的较大比例。1952年12月我发出又一个通知，说明私营建筑商造一千平方英尺以内的住房无需请求许可。私商可以自己出钱同时造十二所住房。我指示地方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3年3月2日。

当局对这两类申请可自行发给许可证。下院里对这些稍稍搞点自由化的做法自然有相当辩论，发言者按其各自的倾向把它赞扬为进步措施或斥责为反动措施。然而许多人都把这看成是造房事业有起色的证据。大约在同时，对无需申请许可的修缮限额提高到私人修缮五百英镑，工农业基建的修缮两千英镑。这样我们是分阶段地前进着。（我想起吉劳德将军的话，“鸚鵡学舌式的政治工作是逐步做的。”）^①

因所有这些步骤都得经同事们赞成，我觉得应同时再让他们明确肯定至迟到1954年要达到三十万套的目标，并将数字可能提前完成这样一个不幸的消息事先警告他们。1952年天气好有利于造房。的确，到是年年底造成了二十四万套，而1951年则只有十九万五千套。因此我们对整个做法能否获得成功是有相当信心的。同时在两股航道上掌舵自然是难搞的。这当然不能做得干脆利落，尽管有人似乎觉得这很容易。

但现在必须面临比许可证问题更严重的障碍。这是因1947年城乡规划法案中的规定而引起的。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我头几个月的观点看来觉得有点学术气味，但如今却变得急待处理了。因为只有把发展费这个问题搞清，把法案中关于财务方面的条令取消或修改，才能使私建房屋方面确实得到进展。

如果说上届政府遗留给我的这部分工作使人麻烦而头痛，那末理该称颂对我的工作较有利的两份遗产，这才公平。

工党政府在兴建新市镇这件事上显出他们确有理想。保守党对这一政策只给予颇为勉强的赞同。尽管有种种内在困难，时间证明新市镇是件明智的甚至是有利的创举。那里有许多头痛的麻烦事，特别是在当时物资受限制的日子。但当我一就任，我就决定

^① 《战争风暴》，原书第293页。

尽一切力量帮助新市镇的进展，想靠它们对完成总的造房计划至少能作出一些贡献。这些新市镇委员会里的主任和成员一般都是非常称职的人。尽管在有些情况下必须换人。但在当初那种必然会令人丧气甚至令人束手无策的环境中，所有的人都非凡热情地进行工作。

要把新市镇搞成功，得形成一个均衡的社会集团。那里需要有新工业以容纳一批人就业；造新房屋，新学校，新商场，新的教堂和一般娱乐场所。要在大致同一时间内提供这些设施并非容易办到之事。此外还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即如何防止不顾一切地把这些新市镇变成一味收容大城市（特别是伦敦）拥挤过剩人口的场所。要形成一个新的社会团体，使之能享受真正文明生活，这新人口 419 的素质就很重要。所发生的这些问题自然因地制宜。

当新市镇有一老村或老镇作为中心这种有利条件而兴建起来时，新社团的进展就容易些。因此，部分地还由于其主任托马斯·贝内特爵士高明的手腕和学识，新市镇克劳利一开始就办成功。史梯芬奈奇和类似地方的情况也是这样。但像巴塞尔敦这些在原来几乎没有居民中心四周建立起来的新市镇就出现严重困难。哈洛的开发起初也同样困难。我幸而能劝说H.盖尔将军（战时在阿尔及利亚的老同事，部队里所曾见到过的最好行政官之一）担任前者的主任，D.科斯坦担任后者的主任。在几乎所有的新市镇里，最尖锐的问题是设立足够的学校。这些地方绝大部分人口自然是有孩子的青年人。所以急需办一些学校，其规模远大于年龄正常分布地区的学校。可是一开始孩子的比例数特别大，而日久年长之后情况会变得怎样却很难预料。另一个较简单并且非常近乎人情的困难是缺乏老人，这使青年夫妇的担子特别重。当我听到诉苦说缺少“阿姨”和“奶奶”时我是很表同情的，因那样使安排抚养婴儿的事几乎不可能解决。这是开创新业的人群必然要

碰到的局面。

我的直接前任 H. 多尔顿在实行新市镇计划上献出了不少力量和热情，这也是他所倡导和推动的事业。我们尽一切可能尽量去促进这些新市的成长和福利。这是我承受下来的一份宝贵遗产。

还有一份我就职后接下来的同类性质的遗产，几乎也同样有用，那就是前任起草过的一份名叫“市镇发展法案”的文件，我马上看出这对实施我的计划是一份重要财产。它的目的很简单，不过是给那些想安置其过剩人口的大城市提供保证，使其能同邻近的地方当局在有条不紊的与友好的协议下安排此事。接受流入人口的小城市或郊区在这文件里叫“受方”，他们可在“遣方”与一些政府津贴的帮助之下发展其地区。由于它给有关人员提供了必要的方便，这项措施无疑给许多有价值的计划外工作开了方便之门，并有助于工业和机关的迁出大城市。尽管有些人反对，我要求立即通过这项法案。当该法案提出时，我自然要归功于它的亲生父母，多尔顿也相应认可。尽管比万批评这法案“小气派”，但看来他主要是挖苦他的老同事而不是在攻击我。他有一种奇怪的自相矛盾之处，

他居然赞同我原以为他可能反对的一个条款：授权地方当局在经部里批准后得出售其产业内自由保有之土地。^①

代表“受方”地区的一些议员自然不会很热心，但他们爽快地接受现实。

1947 年的“城乡规划法案”的起源要追溯到国民政府时期，先是从著名的奥茨瓦尔德报告及 1944 年的白皮书开始的。法案就是根据报告提出的并充分引用了报告材料。制定法案最后形式的责任虽属当时的工党政府，但总的提纲是非党派性的共同努力的

^① 1952 年 2 月 25 日。

结果。正如丘吉尔所说“我们全体都在里面”。不幸我如今已深陷到脖子上了。

法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内容是广泛的计划条款，这些我们无意改变；事实上，在我们这个人多地窄的小岛上，这些条款是不可少的。它们的原则早已为历届自由党与保守党政府的立法所确认。如今它们又有新法案作为倚恃，而这新法案本身又是两党联合提出的。局势日趋复杂，应付这种局势的权力则由于这一原因⁴²¹或那一原因而感到不足，新法案则使这权力得以加强并施之有效。其主要目的是制定一项综合发展计划以协调全国计划工作，要求日常发展计划以此作为依据进行考虑；二是扩大公众团体为计划工作而得到土地和经营土地的能力，为此政府给地方当局拨款的范围与规模也扩大了；其三是为便于控制，规定所有发展工作（除极少数例外）应获取地方计划当局或中央政府的许可，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保证土地的使用应最有利于整个社会，这样可防止在良田或蕴藏优质矿的土地上建房。使城市的延伸得加以限制。带状城市的发展得加以阻止。新房可作更有效的设计。在土地往往需拨作建厂或建房之用的同时，使农业利益和游娱乐场所尽可能保持，此外，还可使某些有特殊历史意义或建筑风格的楼房得以保护。这些想法都很对头，我和任何保守党成员都无异辞。至于这些目的能达到何种程度，那是可以争辩的。但任何大臣或政府都不会反对这些目标，或者不去尽其所能行使这法案赋予他们的权力。地方计划当局也以同样的精神尽力而为之。这一切是两党的共同立场。

只是在考虑法案的第二部分——财政措施——时，我才在1952年春那个时候感到确有困难。财务安排上有两个方面特别重要。其一是提出一笔三亿英镑的款项——至少有这种主张，来补偿土地所有者，如果他们认为并能证明他们的发展权益的价值⁴²²

因法案而有所降低的话。事实真相是，政府受法案约束应于 1953 年中期付出这整笔费用，来补偿该补偿的要求。第二点是在我眼中看来觉得是更加不合理的一点，即要求经计划当局许可而进行任何营造工作的人付出一笔费用，叫发展费。据说这代表因获准发展而使其土地增值的那笔费用。这两项财政措施我都想加以废除。特别是第二项为公众所深恶，被认为是既难令人理解，又是一种恶劣的敲诈，显然是使私人发展特别是使造房工作的致命拦路虎。所以从实用观点出发，我就急于想废除法案的这一部分，而将其计划部分保留不动。

1952 年 7 月初，我向同事提出一项计划，要废除三亿英镑的总补偿费和发展费。经过多次讨论并考虑了许多别的选择方案之后，我的计划终于在 11 月中旬获得批准。

1947 年的计划从理论上讲可能很高明，但实际上行不通。也许这是由于它想一下子解决两个很不相同的问题——计划问题和征税问题。许多人曾经而且至今仍认为应对土地征收一种“增益”税，即并非由于土地所有者本身努力而是由于社会发展所致的所谓“不劳而获的增值”。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亨利·乔治和劳合·乔治（后者形式稍有不同）。这在我们新近的财政制度里也采用了。但不管拥护这种税收的理由是什么，我认为把一个计划法案变成一种税收机器总是错误的。特别是把它同一种发展税联系起来更加要命。

无论如何，1947 年的制度作为一种税收工具是愚蠢而错误的。它不打算对正在使用的地产的大部分增值采取什么措施。它也不可能准确估计该征之数，而若要使征税公允并为人们所接受，则必须能估计准确数字才行。专职的估值者无疑会尽力做好这工作；但发展费的估计从未有科学方法，而随着土地的自由买卖已成过去之事，这种估计就变得愈来愈不准确。中央土地委员会部分

是内地税务局的代理机构，部分是管计划的。它的第一部分工作与别处可以干得较好的工作重复。第二部分才是它真正的职责。

当法案生效后，特别是在我采取了似将恢复私人造房业的那种措施之后，反对发展费的呼声增强了，对它的痛恨也加深了。下院在个别人动议之下已辩论过这个问题，甚至在反对党的席位上也几乎找不到拥护这种征费或征税的人。决定征费多少往往没有什么理由，这种例子已经不少。由于没有估计征费的真实原则，这显然就变成收税人和缴费者之间一种讨价还价的事。收费数字的估计随着不同的地点和场合差异非常之大；使纳税人和委员会之间取得一致意见所采取的方法更适用于一个东方集市里，而不符合英国税收制度的传统。

因为财政部付出了三亿英镑收买所有土地的发展权和计划权，从理论上讲这项税据说就是为了弥补那笔总款额的。但虽有一部分人得到补偿（不管是否够数），所付费用的负担却落在另一批人身上，而后者却正是我们造房计划和工业发展所依靠的那个阶级。对大大小小的造房业来说，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负担。而且仅仅减少税额——如我们在初步讨论时强烈要求的——也没有什么意思。这项税或者是完全取消，或者只能让它留在那里，数额不定，牵涉着所有的发展工作，成为使私营造房业和无津贴造房尽可能快发展起来的严重障碍。

要说服财政部使他们相信我不是只为了想把钱塞进地主的钱包里，是件颇为困难的事，因为那里的有些官员沾染了年深日久的强烈反地主情绪。要说服我党里的有些大地主，让他们相信我并不剥夺他们的权益，也有同样的困难。因为按照 1947 年的那套办法，地主只要提出要求——而几乎所有大地主和消息灵通的地主都提出了要求，就能分享三亿英镑总补偿数中的一部分，而不管他 424
有无发展其土地的计划。可以提出要求的土地不仅限于那些已经

开发利用的或即将利用的,而是包括纵跨南北两端的全岛土地。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地主提出要求的土地从未打算进行开发利用。但因不允许他自己去利用,他就有权获取一笔相当数量的钱,这笔钱对他是不错的意外收入,而按公理与常情讲,他们似不应享受任何实际权利。这种情形很多。当我们经济拮据在许多方面力求节约之时,在1953年夏付出三亿英镑而不管要求补偿的人是否确受损失,在我看来,总认为是件矛盾甚至是荒谬的事。

这三亿英镑的整个计划是不好的,不仅在于其立即成为财政上的直接负担,而且还在于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假定被认可的要求数目加起来就是三亿。事实上迄今为止的总数已达约三亿五千万英镑。但有些地主,特别是小地主可能就没有提出补偿要求,因一般认为二、三先令以下的就不必再付了。总之这三亿之数是随意定的,并不是一次付清的补偿要求总数。其次是,这项发展费虽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为抵消补偿费的,但实际只是一种税。而且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收入的发展费总数能弥补政府所付出的三亿英镑。从理论上讲,土地经准许发展之后,它的价值就增大了。但增值这笔固定财产以后可能成为现实,也可能不。而发展费则得用现金支付。这笔钱即使可以由发展者转嫁到他人身上,它最后必然要落到买房人身上。这就成为一种房屋税了。

这套办法的真正缺点是:那些出力和办事的人——即搞发展工作的人或他们的顾客,得在他们该花费的款项之外再花一笔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不公平的钱,而一大批并未遭受实际损失的地主,却因其土地在理论上的发展价值而得到收益,尽管他们并不打算
425 过为发展而出卖这种价值或由他们自己来发展。换言之,1947年那套办法使闲者受益而忙者受损。

1952年12月1日我提出这议案的二读,其目的是为取消对未来发展计划的发展费,但保留对发展计划或变更使用方式的许

可权,其次是为停止支付三亿英镑补偿费,并为此另作规定。这议案比较短,因其目的简单,但其所牵涉的问题甚广而且难以避免。这些问题另写成一白皮书供立法讨论。为此得取消已订的合同;得处理已被认可但另行指定或出售的补偿要求;得拟订一套冗长复杂的办法使所有问题接上头,并阐明许多不明确之点。

这使我不禁想起麦考莱讲的一个故事。有一个罪犯,要他在两种处罚之间进行选择。一是罚他去读圭卡提尼的冗长的佛罗伦斯史,否则就罚他去多桨船上划桨当苦工。他选罚读史;但第一卷就吃不消,于是改变主意宁可去划桨。当我披荆斩棘似地阅读1947年城乡规划法案中的财政措施条款时,差不多也有类似的绝望情绪。

当时工党里除少数人外很少为发展费进行辩护,以后也不再想恢复。近来他们主张要抽改进税而不抽发展税。这种办法是否能成功而不致引起麻烦的反应,有待实践来检验。但1947年那套办法作为一种改进税来说,也是肯定要失败的。

……我并不认为1947年法案的主要目标是为抽改进税。如果是为抽改进税,那是一种很不好的办法。出售土地供人建房的地主有时保有所有改进物——尽管建房者得偿付费用,而法案则不求保证现有设施如空房、店铺、办公房……中因改进而增值的部分归购买者所有。^① 426

计划工作的财政措施无疑是要重视的,但不必为了要办好眼前有限的几件事情而把全英国将来的所有发展权都收买下来。

我想起查理·兰姆讲的一个中国人为吃烤猪肉而焚房的故事。每当这人又想吃这种美味肉时,就盖起一所房,然后再把它连同猪一起烧掉。^②

虽然直到1953年5月20日才通过议案的各个阶段并获英王批准,我们还是预先就采取了措施,以便一旦议案通过就能立即停

^{①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2年12月1日。

征发展费。所以对那些把赌注押在议案会形成法律的人来说,发展费事实上在 1952 年 12 月 1 日就停止了。

这样,经过十二个月的努力之后,影响无津贴造房的行政上与立法上的障碍,到 1952 年底就实际上已扫除了。

第二个城乡规划议案是第一个法案的结果,它处理支付补偿的安排工作。我们的目的始终是保持 1947 年法案中关于计划部分的那些优点,而去掉支出的三亿英镑或发展费的不良影响。说到底,做计划的目的

不是去阻止发展,而是在合适的地方和时间促进发展。于是我们搞掉了发展费——搞掉了谁也不惋惜;至于补偿,我们决定不急于统统支付,以免后悔莫及。我们采取一种必要时就付的制度,这就是现在所做的。^①

⁴²⁷ 我原想把许多笔补偿一次付清的办法改成必要时支付是件相当简单易行的事。但事实证明这难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一切意外情况。自 1948 年 7 月 1 日起,我国土地所有制史上第一次把土地和土地的发展价值分开来,而以前这两者总是混在一起的。发展价值从理论上讲归国家所有了,私人只保留对三亿英镑补偿费的部分要求。这样,补偿要求便成为一种单独存在的东西,成为一种财产形式,可以脱离土地而出售和按遗嘱处理。若想清理过去几年内所发生的事,就会发觉议案中有许多纠葛。我们对不起

那些蒙受损失而未要求补偿的人;对不起那些自愿或被迫以较低价值出售其土地而未要求补偿的人;对不起那些未准其发展土地的人。^②

并不是每一个交纳过发展费的人都发还了款项,而只限于那些保留要求的人,或出高价购买土地付了发展费而未提出要求的人。

在这种尴尬处境下,按照迪斯雷利那个出名的意见,我作了很长而含糊其词的发言。这发言达到了它的目的。

^{①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4 年 3 月 15 日。

往下进展迟缓,到降灵节,这七十二款八条的议案才讨论通过了四十三款。但正如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依靠同反对党领袖们的良好关系和因腻烦而产生的有益效果,我们到6月2日就结束了委员会讨论阶段。可惜议案起草工作没有做好,经过同顾问们讨论并与反对党人士友好商谈之后,议案在提出报告阶段我就得把需修正补充的二十页提出来暂缓讨论。三读终于在1954年7月13日获得通过。但这样还一直要等到11月才经英王批准。因 428 为由于强迫征购土地而引起的一些困难情况需要获得上院谅解。这些情况部分是从一件出名的皮尔格林先生事件引起的。

一天清早唐宁街十号值班员来电话到我寓所。“首相请你立刻去。急事。”到那里后人家带我上楼,见丘吉尔在床上快吃完丰富的早饭,即将点起那不可少的雪茄。他穿着流行的中国式睡衣,头上停栖着他心爱的澳洲鸟。床上摊满了报纸。但他的态度并不和蔼。事实上他显出发火生气的神情;见了我就倾泻出一顿咒骂和责难。“为什么逼死这个人,你和你手下的那些大将?看过报没有,《每日镜报》?听到皮尔格林自杀的消息没有?你要对皮尔格林之死负责。你打算怎么补救?”当时我以为首相疯了。皮尔格林,死了,补救——这是搞的什么名堂?但当我看了报纸——更准确说是当我回到办公室之后——我才能弄清楚这件悲闻的详情。

皮尔格林于1950年在其罗姆福住宅旁购进半英亩土地。他付了四百英镑,按1947年那个法案,这价格太高了。他显然不打算在这土地上造房,而是留作供庭园娱乐之用。但若许可他盖房,那就得付发展费。若由公家征购,他们只会付出现有价值的费用。不幸以前的地主未曾向政府提出补偿要求,而到1952年再提要求又太晚了。这倒霉的人实际上付出了发展费而没有因此得到任何好处。这一切当然是由于把土地及其发展价值分开之后产生的致命结果。但若这块土地一直没有发展,那也许就万事大吉。但其后

市镇当局为造房征购了这块土地，据估计现有使用价值是六十五英镑，市镇当局按法律不能再多付。不幸的是皮尔格林是借了钱买这块土地的，眼前这笔损失使他如此心痛以致寻了短见。如果他或以前的地主向政府提出要求，他可以按 1947 年法令获得三百三十五英镑。不幸他们都未提出要求。即使按照我那个尚在议会
429 中讨论的议案，他也得不到好处。因为我们决定认为不可能处理那种理该提出要求而疏忽未提的情况。

我虽然坚持只处理被认可的要求这一原则，但只要不有损于整个计划，我愿意看到法案中包括某种灵活变通权，以应付难解决的问题。在皮尔格林这件事中，如果地方当局被授权，他们是会付给他有关款项的。可以制定合适的补救办法支付优容款，作为一种照顾而不作为应享权利，以应付类似的情况。

丘吉尔的生气是合乎他本性的。他不能容忍任何不公平的事，特别是使普通老百姓吃亏的事。不幸的是在这个复杂问题中，有许多不平等的事几乎不可能都避免。但从某种意义讲，皮尔格林之死可能造福了他人。丘吉尔虽一度坚持，但终于被说服相信我不是使此人殉难的祸首。

当议案终于在下院通过时，我接到副次官伊夫林·夏普女士一封最热情颂扬的信：

如果不是你当大臣，我们决办不成这件事。要是允许我这样说的话，我认为你对这一议案的处理是我有生以来所看到的办得最漂亮的一件事。你让它顺利通过而不留痕迹，我想别人谁也办不到。

我们的初稿潦草，给你增添麻烦，使我甚为不安；你对这额外的不必要的负担如此耐心，使我深为感激。

她正确提醒我还需要有些修改，以处理因强制征购而引起的不平等情况。但我知道不可能一下子勾销那 1947 年法案。同时，我们的主要目的——给私人发展扫清道路，则已完满达成了。

现在成立了一个新的土地委员会，其任务包括征收地税。至少已没有人敢于恢复发展费了。我当然高兴，终于摆脱了这件麻烦事。几乎有两年之久，这件事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占据了我和部 430
内最得力人员的时间。

在所有这两年中，我得为保证供应私房、公房、学校及其他必要工程包括一切修建的建筑材料，而不断进行斗争。物资短缺部分由推广小房设计和增加需求量大的双卧室住宅的比例来弥补。但主要注意力得集中在节约材料的使用与增加供应两方面。我们得想方设法从统计学家的一品脱锅子里掏出比一品脱多一点的东西来。

第一桩难题是钢材。这方面幸而有斯温顿爵士的协助。就在第一次会谈时，他就断定需要有一种合适的分配制。为此需要有一个星期光景来作安排，这时明显看出，至少在纸面上，短缺大约一百万吨钢。但斯温顿是个很有经验的行政人员，知道报上来的数字肯定要打个折扣，他就毫不迟疑地发出超过现有钢材数字的书面许可。这种做法证明是可行的，这就使我们在需要最迫切的关头大大松了口气。我这方面的贡献是减少公寓幢数，并立即着手考察承重墙的使用情况。新成立的造房委员会劝告建筑和营造人员用钢筋混凝土代替钢结构，起了很大的作用。在1952这一年中，我们使建筑方法产生了一个有益的而且确实是影响长久的变革。自然，不久就感到所需的钢筋不足，而那又是炼钢业不大愿意多生产的。到1952年2月，我们采用一种新的价目表，以鼓励钢筋的生产。此外，我再以造房委员会的名义呼吁那些需钢量大的用户节约。此时我的老友亚历山大勋爵是国防大臣。当时他对用钢大户头三军各部的实际权力只是名义上的，甚至尽管他有长期经验，也似乎对“那类军需人物隐瞒库存的程度”^①难测高深。然 431

^① 1952年3月29日。

而我还是凭着他的权威办成了一些事。我们虽在1952年一年到头愁钢铁问题，但新方法的宣传非常成功。到年底钢材的短缺不那么明显了，而且一般都可由当地官员自己解决了。

木材是件同样困难的事。不幸因战时国内资源——成材木材以及往往是不成材的木材——消耗掉了，几乎所有软木料都靠进口。这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至少在私房方面采用新设计，以及鼓励使用本地产的或从英镑地区进口的硬木。虽则供应削减了不少，我们还是能凑合过日子，最后还无需大量采用“无骨鸡”。对战时木材控制的取消并恢复由私商购买这一决定，无疑产生了良好的结果。到1953年底，由于许可木材大量进口，我们的问题就实际上解决了。

砖始终是严重问题，因计划一扩展，砖的需求就猛增。而且长距离运砖的费用很大，在有些情况下运砖不切实际。但我们让许多小砖窑恢复了生产，并使大单位如伦敦砖瓦公司加班生产。这方面我也给公司一些帮助，说服劳动部雇用额外劳工，主要是意大利人。三军各部也进行节约。最难对付的是国有工业的独立王国。例如不列颠电气局在修建电站时就像古代埃及帝王似的搞了许多砖石大建筑。要想让他们用钢筋混凝土来代替几乎不可能。我一看见这上百万块砖如此用之不当，就心痛欲裂。1952年底危机达到高潮，各主要地区官员开了一次会之后，又向各部发出呼吁要求节约，并要求订货日期提前。太多的建筑业者似乎觉得他们
432 还可以像战前那样从充裕的存货中随时提取砖块。在圣诞节假日里，我向各市包括镇长和郊区区委员会主席签发了一千五百封信，呼吁他们协助节约，特别是在设计方面。在房屋设计方面，仍有不少砖块浪费在不必要的额外增添的设备和装饰上。快到第二年初，我决定从比利时进口一些砖。财政部同意了，这批支援对总需要量来说虽为数甚少，但有助于避免供应严重脱节。

水泥是第四项主要材料，我们一开始就为它操心，并且由于采用新方法水泥的需求量更大了。但水泥也能节约。可是不幸，由于1953年初大水以及空军方面的需要对水泥的需求又增多了，虽经我个人出面呼吁，他们也尽量采取多种办法来协助，同时到1953年底大的雷达装置都完工了。但这方面减轻的压力抵不过为美国轰炸机场上的水泥用量。不过我们终于多方设法熬过来了。用不着等多大时间水泥的产量就稳步上升了。

在1954年整个一年中，因材料发生困难或脱节的情况并不严重。

同时，到1953年中期，总的计划有了真实的进展。造房数字一月比一月高。那时我们确实想把造房进度稳定下来，转而注意那久已被人忽视的清理贫民窟问题。这些有目共睹的成就，对我们的拥护者是很高兴的，但并不完全适合反对党的胃口。他们到处抨击我们只注意造房而忽略了其他建筑。为此决定于1953年7月1日辩论学校建筑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教育大臣佛罗伦斯·荷斯布鲁格受到无情攻击。但她作出了详尽而令人信服的答复。在结束这场讨论时，我指出这次攻击的真正目的是利用学校问题 433 来缩小政府在造房工作方面的成绩：

因反对党领袖曾向全国断然声称不可能一年造出比二十万套更多的房子，我们的成绩当然使他们感到恼火和不悦。特别是看到在“托利党劣政”下第一年就造出了二十四万套房子，他们就更为恼火了。^①

我接着说：

再看到造房数字月月增加，他们必定更感到难受。我不知1953年的最后数字将是多少，但如果这正打中靶心甚或只打到内圈，难道这会博得反对党高声持久欢呼吗？^②

①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3年7月1日。

我不明白反对党为何这样小气、妒嫉。完成造房任务的不是我，也不是我的政务次官，甚至不是我们这个部。这是靠建筑业的业主和技工，不分保守党或社会党(工党)，在他们所控制的地方当局协助之下，在以造房十字军精神参加工作的大小发展工作者的协助之下，共同搞出来的。比万攻击我是靠削减学校、工厂和电站的数字而把造房数字搞上去的。“工党执政时期，造房计划是不失调的。”^①不过这话可用事实和数字来回答。

于是我列举数字。在辩论开始之前，每个人都焦心等待阿宾顿一次补缺选举的结果。

因此我准备了两份发言稿，一份语气较和缓，另一份则胜利陈述我党政策之成功……阿宾顿选举结果没有在一点钟(按预期)发出。但到两点一刻消息发出来了，是一次大胜利。尽管出来一个自由党候选人，尽管报道官员很蠢(他没有等待邮寄选票到齐)，我们获得的多数几乎高达一千。这个结果非常说明问题，因为那是一个公认为严重“不稳”的议席……^②

434 我的一次小动作逗得下院都笑起来：

谈了一段关于学校建筑和造房问题的话后，我说“那末有些什么数字呢？你们都听说过，但我还要重复念一下。”于是我捧起一大卷统计数字书，叫《统计月刊》，这是议员们都熟悉的。我调整好眼镜念道：“这里就是统计数字。尼弗二万二千九百八十六票，卡斯尔……”(这是阿宾顿补缺选举的得票数字。)于是哄堂大笑。甚至图斯肯尼那一批人也笑不可仰。^③

但真正有关的数字也同样对我们有利。从已完成的工作来检验，而这我认为是最确实的东西，我们在学校建筑方面的成绩也是不容置疑的。1952与1953两年都超过前届政府那些可怜年月里所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3年7月1日。

②③ 1953年7月1日。

完成的数字。小学、中学以及包括工科大学与其他一切教育建筑都是如此。把币值的变动估计在内，在我们执政前几年的平均完工数字是三千四百五十万英镑。在1952年的数字是五千万英镑。1953年将是五千四百万英镑。完工数字的比较情况就是如此。

他们会说，“啊，但为什么不比较一下开工数字？”他们都这样说。因为摩根·菲利普斯先生这样说过，所以他们都得这样说。这是“主人的声音”。他说，“别管什么完工的数字，要想想我们开头创办的那一切工作。”当然，社会党人在许多事情上都开了个头。他们是了不起的开头派。在社会党执政时期开头追猎的兔子比历史上哪一届政府都多。但他们一只兔子也没有打死。什么事情他们都开个头，但没有一件事他们办到底。他们说，“完工吗？那是枯燥、平凡、乏味的事；把那留给托利党人去完工吧。”^①

关于工厂的修建，情况也一样。尽管大搞造房运动，而且尽管钢材不足，工厂修建数字也与年俱增，从1950年的一亿另二百万英镑增到1952年的一亿一千八百万英镑。在遭闪击战城市里，我们今年完工值的数字是五千五百万英镑，而1950年只是二千三百万英镑，1951年只有三千五百万英镑。

又有人重新提到关于计划问题的争论，于是我乘机重述我的立场：

“计划”这个词对我并不生疏。在计划工作并不像今天那样吃香的 435 时候我也曾经是个计划工作者。我认为计划总表明一种大的政策，一个总的方案……是一种战略措施而不是〔一种〕战术措施。用钱数表示的一个工业部门的生产潜力是一种有用的参考数字，但我们不应陷入那种错误的想法：以为既可用钱来衡量产量——不管是人的或是物的，那末这些人和物也可以像钱那样轻易地从这一议案调拨到那一议案。^②

因此我们该做的事是利用大大小小的承造商。这些都是经过慎重

^{①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3年7月1日。

选择并适合其特定任务的。他们不能像棋盘上的棋子那样随便挪动。建筑业里的人不仅仅是一堆东西。有的商号和人员宜于建住宅，但不适于承造技术要求高的厂房或大工程。有些小商号可参加我们的城乡造房运动，而不会影响大规模工厂建设所需的劳工。造房和学校建筑的完工周期日趋缩短，这一事实证明整个工业界已恢复了信心。生产率在不断提高。如果从另一方面拿学校数目来作检验，则显见教育计划未受影响。提供的学校几乎增大了百分之百。此外，在有关各部协作下有更好的设计方案，同样数量的钱可以建造更多的学校来。换言之，在住房、学校、工厂、清理旧房并开始处理贫民区包括贫民区的学校这整个计划上，我们的工作进度可以用一句习用的话来说，“已经有所提高，现正在提高中，今后还应更加提高。”

这是我们成功的一天，表决取得相当大的多数——三十三票。工党方面有一、二位朋友未投票，因他们认为这场攻击是愚蠢而又言不由衷的。

436 第二天报上的言论对我们有利。但报上又登载了我在头天夜里用官方名义发出的消息，即我得在几天内住医院动手术。6日下午八时左右，在五点半开始的一次内阁会议之后，我进了圣汤姆士医院。在内阁开会时，奥利弗·利特尔顿看我有点紧张，递给我一张条子：

“你看过这墓志铭没有？”

多尔顿博士带着沉重的心情

埋葬在这里：

他再也不能泄漏

墓穴中的秘密。”

话说得刻毒，但说得对。多么奇怪的一段插曲。一个当财政大臣的人会泄漏预算案的秘密，这在邈邈婆娘之类故事书里也不会出现（即

使有菲尼亚斯菲恩那样的作家)。而他竟然在实际生活中这样干了,并且还能回到内阁,真是令人难以想像。^①

我只歇了两星期。几个月来我因胆结石感到剧痛。事实上我真不知怎样讲完最后一次发言。但由于我的医生(约翰·理查森爵士)的精心治疗和两位外科大夫(博根先生和内文先生)的高明技术,手术完全成功。几天之内我就接见来访者和阅读部里的公文。7月28日晨我可以离院参加一次内阁会议。这时我又接到1953年头六个月完工的住宅数字(尚未打算公布的)。这个数字总共是十四万五千,所以我们显然干得不错。

工作不断进展,以前受限制的私营建筑业开始有相当大的发展。到10月保守党年会时,三十万这个目标看来肯定在两年内而无需三年就能达到。至少我可以说,我们在1953年八个月里完工的住宅比前届政府在1951年全年的数字还要多。我的发言是颇易成功的,因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听众反应也好。但在讨论了好多项决议案并在开了一上午或一下午长会之末来发言,我总觉得要在发言一开头就引起代表们注意是不容易的。因此我经常先说几句人家意料不到的话。这次我的发言是这样开头的:

……几星期前从报上听说艾德礼从南斯拉夫度假带回一对古董燧石手枪和一只独弦提琴。我想工党年会所需要的正是这种东西!我虽然面临着一项艰巨任务,要答复关于两个大问题的记得是四十四项的决议,但我认为尚无需乞灵于这种不择手段的办法。^②

其余部分我就根据以前在下院中的辩论发言,有月月增进的造房数字来增强我的论点。

一个月以后:

① 1953年7月6日。

② 1953年10月9日在马加特年会上的讲话。

我刚获悉 10 月份造房数字——超过三万,创战后新记录。完成三十万该有如“探囊取物”了……财政部的统计人员开始大感惊慌!①

12 月 1 日我可以宣布说现在已达到了我们的目标:

……从 1952 年 11 月 1 日起到 1953 年 10 月 31 日,我们造了三十万另
一千套住宅。所以我们在政府执政的第二个整年就完成了任务。这话
得到政府支持者的欢呼,并给发言作了很好的收场——特别是当发言完
毕时丘吉尔走了进来。②

12 月份造成了二万九千套。这样在 1953 年中数字达到三十一万
八千多。是年夏天我就想到有人会攻击我们住房造得太多了!事
事实上若不采取步骤控制洪流,下一年很容易达到三十五万。于是
我们决定让私营企业全速前进,而且确实用一切可能的办法鼓励
439 它。这样可以使国库和地方当局节省点力量。使公房建筑仍保持
高的数字当然很重要,但现在该是想到稳定进度,把用于津贴造房
的一部分力量转移到清除贫民窟和解决过分拥挤现象的时候了。

我部的工作不只限于造房和有关的问题。我们的职务几乎包
括地方当局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和灾祸。1952 年夏就发生了这样
的一件灾祸。那时,经过了非常干旱的三个月之后,到 8 月初天天
都是一场又一场的雷雨。1952 年 8 月 16 日夜据说埃克斯莫尔地
方下了九英寸的雨,引起了可怕的水灾。我一从无线电里听到这
个消息,便安排工程人员去现场。然后我自己出发去视察。受灾
最甚的是滨海休养小镇林茅斯。此外还有一两个村庄也受影响。

市区包括两处分开的集镇,各有约一千名住户。一个集镇叫林顿,
在山上;另一个叫林茅斯,在海滨。受灾的是林茅斯,因特大洪水溢出河
床而造成,使大街变成河道。山洪冲下的大量石块(据计有四万吨)破坏

① 1953 年 11 月 15 日。

② 1953 年 12 月 1 日。

了桥梁。修复费用很可观；主要的是道路和桥梁。①

我在小市政厅的一次会上见了所有地方议员，郡议会代表、军警和志愿工作队首脑。

每个人都抢着要发言……气氛热烈但秩序不佳。从星期五夜里（发水之时）起已做了大量出色的抢救工作。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从人的方面来讲）建立一个领导班子和任命一个头头来发号施令。②

440

会上自然有人要求政府立即拨款搞修复工作。

我告诉他们自会同有关大臣们考虑这一问题，并劝说他们应集中力量完成眼前必需做的工作，而不要先争论该谁来付钱。除了政府拨款资助修建工程（如道路）之外，大家无论如何还得响应民政长的劝募慷慨解囊。最后……一致同意建立某种工作秩序，我相信事情定会开始好转。③

重要的事是照顾灾民而又不致破坏滨海胜地的经济生活。所以我得说服他们，让他们同意不征用余下的旅馆，仍让这些旅馆开业接待游客，使这个小集体里的人保持就业。

现在主要的危险是(a)9月初涨潮时的林茅斯这个地方；(b)村子里房屋的倒塌等等。(a)是很严重的。这需要在目前这一段期间内赶紧修起一条海堤，以防下次涨潮再碰上强大西风而受海水侵袭。④

报上、新闻纪录片上和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自然充满了关于北德文特别是关于林茅斯地方的受灾情况。除了救济费外我们还安排了充裕的拨款进行恢复重建。到月底捐款共达三十万英镑，并寄出大量衣物及其他必需品。

但次年发生了更严重更广泛的天灾。1953年1月最末的一个夜里，东海岸从奥克尼到肯特发生了不列颠前所罕见的大洪水。灾祸引起不同程度和各种惊惶。据说这是由于春潮和强烈东北风

① 1952年8月19日。

②③ 1952年8月12日。

④ 1952年8月19日。

汇合一起的结果。有人认为这是由所谓“海啸”而引起的，据说高达十一英尺以上，再加上大风和高潮。关于这些海啸大家知之不详，只是有些权威人士认为这无非就是潮水、风和海浪的结合，它在千百万年前冲去了不列颠连接大陆的最后一条灰土岗，从而使不列颠变成了一个岛屿，不管这对后代是祸还是福。

那天星期六夜里，我和妻子从布朗利娱乐场所回家很晚。风雨很厉害，路上难以开车。第二天——星期天部里的官员和报界都打电话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很明显出了一场大灾祸。星期日下午和晚上大部分时间，丘吉尔自然是忙于打电话，“但半夜后不久就停止了。”^①我觉得我应带头处理这事，便于次晨召集有关各部开一次会。我们议定了一个合适的办事程序，成立了以弗朗克·纽珊爵士(他是内政部常务次官)为首的委员会和以内政大臣为首的大臣委员会。这样我得以把自己从领导地位摆脱出来，而且没有比高级国务大臣来应付这重大急务更合适的人选了。马克斯韦尔·法伊夫以非凡的专诚和效率执行了他的任务。于是立即开募市长救济基金，并在年底募得五百万英镑，是这种情况下所募得的最大数额。政府负责分文不爽地发放这笔款项，而募款自然是其中困难最少的一部分工作。

主要问题仍是安置灾民。我们并不认为数目很大；但这比安置中心或免费私人接待所能处理的要多。伊夫林女士和他部人员搞了个“食宿”津贴方案。财政部方面……颇有疑虑。但明天(星期五)我们必须作一明确声明。这是每个工人阶级家庭的“预算日”。除非我们作出一项声明，否则这些人都会离开私人住所而挤到也许是压塞到安置中心去。邻居间的如此互相照顾确是不寻常的。在惠特斯特布尔地方约有六千人无家可归。但只有五十人住在“安置中心”，所有其余的人都在肯特地区的村镇里安一个家。^②

① 1953年2月2日。

② 1953年2月5日。

反对党在不久之后提出的批评之一是我们近年来减削了海防费。防止海岸侵蚀的费用确是有些削减。

但滨海崖岸崩塌是不会引起海水内灌的！^①

事实上，海水是冲过老海堤灌进来的，其中有些海堤还是中古时代的東西。

幸而我不久得以宣布解决食宿问题的办法，其要点由英国广播公司多次播送：

政府将给每一成年人以十先令六便士住宿津贴，给每名儿童五先令。我相信这将起很大作用，并且从长远讲将节省花在……收容所、临时医院等方面的费用。^②

但是还有他方面的问题仍待解决，特别是同“市长基金”有关的问题。

有人会把它当作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救济来要求补偿受灾损失。这个我们要拒绝，否则所需的款数太大；这也违反保险原则；而且如果公司企业对于可以交付保险的损失接受了女王陛下政府的“补偿”，最后必将激起公众的愤慨。^③

我曾公开宣布，如果认为所有各种损失，不管是保了险的或尚未保险的，也不分是否需要和困难，统统要由政府来负担，那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我曾因此受到了批评。这种批评的诱力极大，使反对党禁不住要提出一项敌对的动议。不过到了3月23日进行辩论那一天，以前任内政大臣身份发言的詹姆斯·丘特尔·伊德也觉得他把事情说得太过分了。

他们能及时发觉这一点，对他们还是幸运的……开始发言的丘特 443
尔·伊德“像一只雏鸽那样乱叫”。马·法伊夫十分老练地阐述了女王

① 1953年2月2日。

② 1953年2月6日。

③ 1953年2月19日。

陛下政府所做的、正在做的和准备要做的一切。这在事实上就结束了那场辩论。^①

马克斯韦尔·法伊夫在处理洪水问题上以及在议会中的发言，赢得了声誉。

不过最重要的事是修复旧海堤。到2月底仍有些危险，每小时都要为此发出警报。不过临时修补工作搞得不错，以后没有再发生麻烦。

很难估计这次大灾给国家带来的损失有多少，但内政部估计，若不算永久性的修复和对海堤的改进工程，损失在四千万到五千万英镑之间。有十五万到十七万五千英亩土地受咸水浸渍，虽则其中三分之二土地不会受严重影响，但其余土地将在多年内不能耕种。受淹的住宅虽有二万五千所，但毁坍的只有四百所。至于进一步的善后措施，我们决定成立以韦弗利勋爵为首的一个委员会来考虑整个问题。再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办法了。尽管有那么多农田和营建地位于高潮水线以下，但除了罗马时代和中世纪曾发生两次类似灾祸外，人们却一直在这里生活得很舒服；认识了这一事实仍未减少人们对危险的迫切感，这可能有些奇怪。不过不管怎么样，英国人毕竟以他们传统的漠然态度不久就忘了这事。我们在这件或那件事上花费过大量的钱，但要完全防止再发生这样的灾难所花的钱就要以天文数字来计算了。

这期间我乘轻便飞机巡视全区，看到受灾范围之广实在惊人。愈走近受灾前线，人们同往常一样更显得欢乐友好。我除了关心
444 人们所受的痛苦和物质财富的损失外，自然还痛惜为修建和筑堤所需的成吨砖与水泥。

洪水之后是苍蝇，这些麻烦事像埃及瘟疫一样都来侵扰我。

① 1953年2月5日。

是年夏，南海岸的滨海休养地带都受大群苍蝇侵袭，似已无法控制或使之减少。我同一些博学教授和那些更富于理想与办事精神的药剂机械制造商巡视过一些城镇如布赖顿和伊斯特本，有人想用估计能彻底杀蝇但于人和浴客无害的喷剂，有人以为蝇类由海草滋生，想用商业上已有供应的各种机械来除灭海草；还有其他值得颁发白骑士勋章的办法都有人提出过。在视察这些地方时，我总受到款待，并且使一般人都觉得大臣在尽其全力办事。幸而这苍蝇也像其他那么多麻烦那样，过了一些时候就消失了。

在这几个月里，我考虑着与造房有关的那些最复杂并且在政治上最危险的问题。1952年7月间，卫生检察员协会的一个报告指出，每年塌废的房屋等于甚至超过可能新建的数目。这一部分是因旧房倒塌而成了贫民窟，但更多的是由于缺乏维修。而所以缺乏维修则又由于房租管理制度不合适。

1952年7月9日，我们在部内小会上第一次谈到房租问题。我虽认为只有当人们看到大量房屋造了起来，他们才肯接受处理这头痛问题的任何办法；但另一方面，要拟订法案并使之通过将需十八个月或两年光景的时间，所以最好早点考虑它。从政治上讲，把几乎占总数三分之二的住房房租提高，要影响到一千六百万到两千万的人，这是非同小可的事。由于两次战争的结果，公众对房租的态度已改变了：

战争遗留下来的一项难处是人们花钱的方式改变了。由于像食物 445
等必需品如短缺，许多奢侈享受如音乐厅、电影院在灯火管制期间不可能有，加之衣饰、跳舞、旅行、假期等等或是给的或是不兑现的，人们就把通货膨胀下的工资都花在少数还能享受的奢侈品或娱乐上去了。大致说，这些就是烟、酒——以及（对战时说）书籍。（现在是电视机、电影院、跳舞等等代替书籍了。）但不容易使人们回到老想法上去，即家庭收入

首先应花在居住设备方面。^①

9月中旬,应同事们的请求,我提出了一个计划大纲。

我的理由是说房租限制与造新房是密切相关的问题。前者(至少从政治上说)只有在后者获得成功的气氛下才能加以处理。现有九百万套住房是以每周六先令与八先令之间的人为低房租租用着的,而普通新房的经济房租则至少是每周三十先令。即使把家用设备上的差别估计得十分大,有那么一大批冻结了租金的房子在那里,就足以阻碍无津贴的造房事业和私人购置房产。有些这类房屋已不堪使用,更多的是年久失修。有些这类房子当然不值得再修,其合适命运就是拆毁。为此必须再搞战前的清除破旧房屋运动。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最后采取的解决办法是施行分级津贴制,让地方当局能有兴趣集中搞清除破旧房屋工作。那些新建城市自然给予足额津贴,因它们对新配置住房问题有贡献,同时那里没有老房可以把平均房租拉下来。受房租控制的老房,若经恰当维修,大部分还可作为很好的家庭住宅使用多年。而为了使房子保持适当的维修,则业主多得而住户多付房租是合理的事,不管增加房租是件多么不得人心的事。要使增加房租的事公平合理,双方应有这样一种谅解,即除非业主把房子搞好了,才能多付房租。从长远讲,分级估值来定房租是可能的,但这要等一些时候才能办到,因为1948年“地方政府法案”中有一处疏漏,所以必须对房子重新估值定级。1948年法案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已经发现如按它的公式来处理,那么考察一下,就可看到不同等级的房屋之间有可笑的不公平之事。我得采取措施使法案暂缓执行,并定出一种新估值法,使内地税务局人员便于执行。

缓期执行案在1952年12月里比较顺利地通过了。下一年——1953年5月8日,我们得定出新法案,来代替那垮了的老

^① 1952年9月27日。

规定。估值工作仍如前项法令那样由内地税务局来做，但用一种新的公式。很难预计工作什么时候能做完。但做完后这个制度至少可使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地区与地区之间达到公平合理。如把估值责任又交回给地方当局，那显然是倒退的做法。由于中央政府分配津贴拨款的方式与统一估值制的关系如此密切，所以我们必须等待内地税务局的官员完成任务之后。对议案本身的辩论虽为期较近，也在三个月内通过成为法律了。

同时，如果新的估值到时还没有搞出来，就只好用战前的老估值，再把新财产作必要的增加，用来作为增加房租的依据。经过圣诞节假日里辛勤劳动的结果，我终于能在1953年1月的最末一个星期里向内阁提出一项综合计划。它

包括四份内阁文件——三份是主文，一份是短札。所有这些文件都是我自己写的（由部里的人……帮助和提意见），都是以我在圣诞节后第一个星期日所写文件作为根据的。这些文件现都已印出校样，因而我可以看阅校样并于周末送交内阁印刷所。^①

我照常引用一段语录作为开场。这两段引语是：

447

愿上天使我们能认识并懂得应该做的是什么，并使我们有幸并有能力来忠诚履行这该做的事。

上帝所要毁灭者，必先使之丧失理智……

第一段语录是作为一种鼓励，第二段作为一种警告。

文件很长，处理关于新旧住房的整个问题，包括房租、修理、清理贫民窟以及估值分级问题。我提出的新估值法议案没有异议而被接受，因这事显然是必需的，不管以后怎样决定去利用这些估值法是作为涨房租的根据和促进维修都可以。由于其他工作的压力很大，内阁一直等到4月中旬才有时间充分讨论其中的一些较大的问题。在这之间的几个月里我们可以重新考虑许多难点，并提

^① 1953年1月24日。

出许多改进办法。我还说通丘吉尔，允许成立一个小委员会来审议我的提案和业已开始定型的议案草稿。

这时我已受日后不得不为之住院的疾病初期征兆所折磨。我得让估值议案及其他两项小议案在议会中通过。这些可以委托给干练的马普尔斯去办。但我决定撑到我的主要计划通过或刷掉后再去住院。不断复发的一阵阵痛楚，使我很难支撑，但靠着医生的帮助和违背医生的劝阻，我终于达到目的。

丘吉尔也开始关心这事了。

首相打电话来问住房问题方面有些什么“信儿”，可供他下周在苏格兰的讲演之用。他听到“造房津贴”和“几百万套住房因房东不能维修而在倒塌”的事非常激动。我请他看看我发出去的一些文件……他听说我身体好一点并能出席下周内阁会议，感到宽慰。①

448 次日，我口授一些供他使用的材料。他要在苏格兰发表一次重要讲话。

我提醒他无论如何不要谈房租问题（除非是用最一般的语句）……要等到地方选举完了之后再说。在政治上，没有比过早地暴露侧翼更糟的了。②

不幸我们要搞这问题的消息已开始泄露到报界去了。

4月16日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讨论。

首相要我用两句话说明这件事。我说“恐怕不可能。我可在十分钟内说明。”我准备了一份发言稿，每句话都写好了，还有一切插图和图表数字。③

同时我指示部里有关官员，要保证使砖、瓦、水泥等必需物品流向待完工的住房，防止今年内开工的房屋太多，以免打乱将来部署。

① 1953年4月9日。

② 1953年4月10日。

③ 1953年4月16日。

因不久更重要的工作将集中于修理和翻造，而不仅仅是增加造新房的数字。

巴特勒早知一切内情，给予我可贵的支持，丘吉尔也一样。于是我的建议得到大家赞同。那天晚上丘吉尔同我谈了好久。他认为修改限制房租法令的立法措施不应给地主带来经济利益。应让人们明确知道政府的目的是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增加可用的住房数。他看到工党在最近的一本小册子里承认有些房屋的控制房租不足以使该房产得到很好维修，故若修改法案，使一部分房租能用于房屋的维修和改进，住户也将得到好处。所以我们的立法议案从政治上讲有机会在下次开会时通过，因这议案可以公正地说是为了增加可用住房数而提出的。

现在我们的打算是在11月初对首相致辞开始进行辩论以前用白皮书公布我们的计划。这可以把整个计划都摆出来。这样圣诞节前可以进行二读。7月底我告诉同事们，449

如果“白皮书”（它的初稿将在明天内阁会上传阅）一公布，就必须“干到底”。换言之，如果这一计划提了出来，今秋就不得闲，事实上或许两年内不得闲。^①

到这时地方当局对造新房变得很热心，几乎开始超出我的目标，而这是为现有材料和对津贴费用的浩大支出所限定的。我急切劝告他们要尽可能快地把一部分力量转用到老房的翻修和改进上面，并再致力解决贫民窟问题。

8月底下院度假休会时，我们的事情已准备就绪。房屋的分级和估值议案已成了法律。白皮书已完成了第三或第四稿。除了我们忙着搞的第二个城乡规划法案外，我还可以集中精力考虑维修和房租问题。但所有这些计划却因丘吉尔在1953年夏的病和对其未来的捉摸不定，而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复杂化了。白皮书又

^① 1953年7月28日。

在9、10月间进行了讨论，讨论时所着眼的是苏格兰的特殊问题。在这方面国务大臣詹姆斯·斯图尔特给了特别的帮助，他是几个月来我就整个计划与之谘询的人。有一两位部长质问为什么必须能看出房东确实把钱花在维修上之后才增加房租。为什么不拿房屋本身的好坏来作为应否增加房租的唯一准则？这一点容易回答。之所以不能拿房子好坏来作为唯一准则，乃是因为我们知道有几千起这样的情形：房东多年不管修房子，房客无奈只好自己修或自己出钱修。

内阁会议终于在10月5日同意了白皮书中的文字和议案草稿。我重述以前的意见，就是一旦提出了要对那么一大部分人增加房租这个政治上担风险的建议之后，我们便必须干到底。说也450 奇怪，许多事都同这一点有关，因而我觉得必须强调提出，因为很明显这就意味着不能在1955年以前进行选举，并且同丘吉尔是否有能力或决心执政那么长久也有相当关系。无论如何我觉得有责任提出这一警告：如果我们提出一项议案，不管它是多么公平合理，我们必须使该项计划有实施的机会，让它能行之有效而获得公众的赞同。

白皮书定名为“住房问题——下一步”，在11月3日公布了。女王发言中也有提到新政策的地方，丘吉尔也在辩论开始时一般地提到它。莫里森接着发言，在发言过程中，他对我们的“住房问题——下一步”称为“急救外科手术”这种通俗的提法表示不满。他说这是滥用政府机器来作党派宣传的工具。

其后当比万以更逼人的形式重复这种说法时，我有社会党政府自己的一些产品来回敬他们，这些东西的宣传气味和针对性比我那起码的作品厉害得多。正如我所指出的，1949年的“预算案和你”甚至还有一小条漫画。^①

^① 1953年11月5日。

我发言时先说据估计 1939 年只有六分之一的人口住在不合适的或过分拥挤的房屋里，尽管在改进工作和清除贫民窟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待做。当时的住房虽然好坏不等，但其数目几乎同独立的家庭数一样多。而如今尽管做了许多工作，仍有许多人年复一年地等着解决住房问题。原因有两方面。第一，生活水平比以前高了，一般都要求有更好的住房；第二，除了人口有所增加之外，其组成部分也与以前显然不同：单身的更多了，老人更多了，要求有单独住房的青年夫妻更多了。

接着我谈到现有住房问题及其总的维修状况。归地方当局管的有二百万或多一些。这些机构是靠得住会维修房产的。他们也有权在认为必要时增加房租，而他们就是在这样做的。从整个不列颠来说，估计这一千三百五十万所家庭住宅中约有六百万所是最近三十五年内造的。总的说来这些房子情况良好。但有七百五十万所是在 1914 年前造的。其中半数有百年之久，四分之一有六十五年到一百年之久。

这里面总共有五百万所是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时造的，有许多是……1875 年“公共卫生法案”载入法典以前造的。下院诸公会记得，这法案以及手艺人居住法案是……托利党在其最伟大的领袖之一本杰明·迪斯雷利领导下提出的。现在想来很奇怪，当时的进步舆论，特别是知识分子方面的意见，却讥嘲这种措施，因它们同当时风行的放任主义潮流不相容。^①

如果没有二次大战，如果清理贫民窟工作照 1938 年那种速度搞下去，这些房屋中有好多早就拆毁了。但目前我们得面对现实。即使每年新造三十万所住房，还得有一段长时间来替代这些旧房。它们同时还是必须加以保存的一笔财产，我们应像供应新房那样用同样的劲头去处理旧房问题。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用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3 年 11 月 4 日。

简化的单一的办法去解决。

因此必须对修理、维护、改进、改造、拆毁及更新有一个全面的计划。^①

为方便计,我们把住房分成四大类。第一类是最好的,房屋质地好,只要收入足供维修,可以保持良好状态。另一极端是贫民窟房,必须尽早拆除更新。但若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就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即它们不可能在目前几年内都拆掉重建。

有些还必须留着住人,这是件可悲之事,然而它确是真的。你不能让人们住到街头上去。政府认为只要这些房还住着人,就必须对它们做些急救工作,让那些不幸被迫住在里面的人生活好过一些。^②

第三是在这两类极端之间的,我们称之为“失修”的房屋,状况不妙,但还是值得修理。其中有些要想修好,其花费不是房主所能合理负担的。另外一些房主可自动或被迫进行修理。第四类房屋如果加以改进,就可以好好使用许多年。

房客要有浴室、热水供应、较好的厨房设备等等,而有些造得结实的房屋可以比造新房花少得多的钱——而且肯定在短得多的时间内——达到这一标准。^③

这类房屋中包括那些太大不合现代需要的房子,但它们可以改造成好的公寓。

这样摆出问题之后,自然会引出我们所要提的措施。为此必须谈点房租控制这段突出的历史。有些房租 1914 年以来就受控制,并一直保持在那个水平上,但于 1920 年允许增加百分之四十。其他房租在两次大战之间失去控制,但于二次大战爆发时又受控制。有些则因房价或房租关系而逃避了控制。结果使许多房租同保持房屋经常维修的费用不相称。房租之间也彼此不均。我们在一些城市里作了最细致的抽样调查后,发现房租变动很大。估值

^{①②③}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3 年 11 月 4 日。

一样的房屋,属于同一类,在同一街道上,有同样设备的,其房租相差却自七先令到十七先令六便士。曾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考察今日与战前维修费的比较。他们的结论是费用约为以前的三倍。地方当局自然可以增加房租。我们建议仍让他们负责不加干涉。但对大量私有房屋的房租怎么办? 453

一种办法是使房租与所估房产值成比例。西尔金爵士提出这计划作为一项长期解决办法;但由于1948年的法令失效,须等待一些时日才能作好新的估值。这期间维修工作必须做,否则房屋要继续塌坏。于是我们提出许可房租有“修理附加费”。我们的目的是严格按目前房租来增加房产的收入,做得尽可能公平,同时保证因修理而增加的房租不超过某一最大百分比。我们还得保证使房租的任何增加都确实用于修理而不是仅仅使房东已有的收入增加。为此所采取的办法是允许所谓“修理费”的那部分估值增加两倍,但注明任何房租都不应增到超过总数的两倍。所以如果房租已经同增加后一般水平一样高或更高些,它就不会再增。有人提出在这项计划下有五到六百万所住房的房租要增加每周四先令七便士到五先令五便士。这当然不对,只要看看我白皮书里公布的统计数字就可明白。例如估为每年十五英镑的那类四百万所房屋中,房租能增大的最高数是十一先令六便士。如果房租已达这个数字,就不会再增;如果房租是十先令六便士,可增加一先令;如果是九先令六便士,可增二先令,等等。只有当房租是六先令十一便士时,它才会增加四先令七便士那么多。这种保险办法以后被人称为“卡子”。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款,以保证房子修理得很好,并要求房东在必要时能提出证据说明房子在最近三年内是修过了的。这是为了防止那些由房客而并非由房东维修的房屋增加房租。经过这一番解释之后,就可使下院相信:在各种控制制度所产生的千差万 454

别的房租情况下，如果像两次大战之间那样简单地一律按百分比增加，就会出现非常不公平的事。

然后我谈到另一极端——贫民窟或半贫民窟的情况。这方面不可能说出完全可靠的数字。二次大战开始时有十四万所住房本拟拆毁。但所有或几乎所有这些房屋仍住着人。如今这些陋屋的数目或许已经到了那个数目的两倍甚至三倍。有些专家估计总共有五十万所。这是一幅可怕的图景。现在我建议在政府拨款资助之下，促使地方当局全力以赴处理这一问题。物资将随之而来，我相信若用造新房那股劲头，清理贫民窟工作又可开始进行。但即使怀着最好的愿望，在有些城市里，要清理掉所有贫民窟尚需十年也许是二十年的时间。但对这些等着要住好房的人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有所作为；我们不能就让他们呆在那情况越来越坏的屋里，意冷心灰。这确实是个重大的人道问题，是对任何基督教国家的一个重大挑战。^①

因此我们建议有权承办的地方当局仅以地价收买这些房屋，然后由他们负责照顾这些房客，直到他们有新居为止。同时地方当局可尽力之所能处理这些贫民窟。

他们可以修修补补，洗洗刷刷，使其至少情况有所改善。它们不会是好房，决不能变成好房，但那些住户会知道在给他们想办法，知道他们没有被遗忘，知道他们住好房的日子会到来。^②

我知道这对地方当局是个难题。他们是以所管房产自豪的，他们
455 不愿成为贫民窟主人。但我相信他们会认识到这将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当家人，认识到负起这个新责任是符合他们过去的优良传统的。伯明翰城已经开始试行这个做法。事实上我是从他们的首创工作才想到把这办法推行于全国的。

①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3年11月4日。

这就是两种极端的情形：一种是可以指望房东能把房屋保养好而不必考虑增加修理方面的房租或是目前房租太低适当增加后即可的，另一种是贫民窟。这两者之间还有一类叫做“失修”的房屋，这类房屋情况不妙，但可以整修好。房主依法有责任把房屋修缮好，宜于住人。若有房主不履行此责，地方当局有权越俎代庖，并从房租中扣除所需费用。这样一个法案可增强他们的权力，我希望他们会善于运用他们这一增大了的权力。

最后是关于可以改进或改造的那种房屋问题：

我们都知道大城市首次扩充时造的那一大批房子，它们的结构是好的，造的技术也不错，往往是为那些在我们反动的前辈称之为中产阶级而如今则称为中等收入者设计的。这些房屋的麻烦之处在于它们是为前一代人修造的，没有现代设备，一家一户住也太大。^①

进步社会有一可喜特点，即这一代人的奢侈享受会变成下一代人的必需。这些变化来得这样快，以致年青人难以认识它们是怎样变过来的。我一生中所看到的生活方式上最合意的虽不是最戏剧性的改变之一是浴室。我简单谈了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家庭浴具——一般是个圆的马口铁装置，热水是在煤气炉上烧的。之后就谈到如何改造或改进这类住房的问题，这些住房的构造是结实耐用的。议案中有一些建议，由政府适当拨款资助地方当局和房主或企业家执行这一任务。 456

这个综合方案就这样顺利提出了。当讨论到二读时，反对党处境尴尬。莫里森感到不好办，因为比万（莫里森同他关系搞得最糟）已经声称唯一的办法是由地方当局接管全国所有房产，其结果所增房租数字将大大超过我这法案中所拟增加的。莫里森是个精明人，知道要地方当局负起收管七百万所住房的担子是行不通的。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3年11月4日。

但比万的最有力的论点是说所增的房租不会引起房主进行维修的兴趣。在这一点上反对党又陷入混乱。进行二读的马普尔斯立即指出在最近一次补缺选举中,这议案曾被人攻击为“房主的一次丰收”。而比万却说这对他们好比是“发霉的老萝卜”。丘吉尔要我在国内演说时充分利用这一点。他说,“他们必须声明他们想攻击的究竟是哪方面。根据赛马场的规则,他们必须说出哪匹马是走走装样子的,哪匹马是想比赛获胜的。”

1954年1月议会开会时,我们马上发觉这一长而复杂的议案(它包括四十条以上的条款和五份表)需要花一些时间才能通过。

现在我们只得耐心再坐七个半小时,听安奈林·比万(用一新条款)阐述他对改革住房情况的大议论。他力图使不甚情愿的艾德礼、莫里森等这一批人支持他。他想强使工党接受他这个由公家(或至少由市政府)接管为私人房主所有的一切房屋的原则。①

这一切对我们都是很有趣的,但对那些较温和的工党议员却很尴尬。

我很关心无津贴私人造房屋中专为出租用的所占百分比太少——仅百分之六——。我很想知道能否有办法使这种能提供出租房屋的企业家恢复营业。因此我在报告阶段加上一段修改,使所有新造的住房和公寓以及所有现有房屋经新改造后供出租用的都可免受房租控制。对这项措施的反对意见相当多。但我觉得这是走向自由的又一步骤。

这不是不排队夹塞……而是许可并鼓励人们到正确的路线上去排队,而不是像现今许多收入较好的人那样被迫……去和他们的邻居挤到津贴房屋中去住。②

① 1954年3月11日。

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4年4月13日。

进行三读辩论时，我又提到比万那个建议，即所有住房应国营或市营。这建议是不是还要消灭住自有房的住户这一点看来还不清楚，但我想至少应在革命初期象允许富农那样允许这些人存在。即使如此，这也是社会主义未来的一幅可畏图景。虽然反对党对三读的意见分歧，但这时辩论已不热烈。我们则至少可以说在这个别人对之望而却步的问题上表现出敢于处理的勇气。

经过在上院的一些修改、定稿等等，这法案于1954年7月30日经英王批准，刚好是我们在部里首次讨论房租、房租管理和修理问题之后的两年。

现在需要向全国宣传并解释这个房租和修理方案。在那些日子我们还不能如此随便利用报纸和无线电这种普通的宣传工具，但我们尽可能利用了这些工具。此外我们还布置了一个多种改进和改造旧房的观摩展览。马普尔斯以他巨大的才华就在牛津街附近的霍勒斯街布置了一个巧妙的展览。那里有些历时百年的成排平顶房，已经被定为不合格房屋，但主要结构造得不错并且容易翻改成体面的公寓。有一所保持其老式的破破烂烂的样子，既无浴室又无合适的厨房。另外两所则每所花了不到八百英镑翻改成现代公寓。马普尔斯花了不少心血，使房间的“布置”像老样子。其实，他收集了那么些古董家具、瓷器和其他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设——包括假鸟，这可能会使某些人觉得，这种未经改造的风格别致的公寓，反而比那翻改过的有现代设备的公寓更有吸引力。 458

回顾这一切，我相信我们在“失修”房屋的翻改、清理贫民窟以及修葺未能拆毁的不合格房屋的工作上获得了可观的成绩。这些工作肯定使人们打开了新的思路，并在其后的年月中做出了许多有用的工作。关于控制房租问题，比万早先那个批评可能是正确的。允许增加的房租数目可能在许多情况下不足以使房主进行必要的维修。但我们的计划终于破碎了房租控制的坚冰。以前谁也

不敢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而我们的方案则办成了不少事情。但下一步要待我在部里的后任来做了。

同时我们还继续进行处理津贴问题的工作。内阁于1954年7月末接受分级津贴以利清除贫民窟的想法。如今我们可以希望在1956年有十五万所无津贴房屋，这就会使办公楼数目减少些，或至少把一些建造办公楼的力量调到清理贫民窟工作的所谓“一般需要”上去。

修理和房租法案，包括“紧急外科手术”，这是我们许多成熟计划中的最后一个。此外我在1954年春写了一份处理部里大量过时文件的意见，这些残骸是我在1951年冬在部内柜子里发现的。有些已在最近两年内恰当处理掉了；有些即将送火葬场；但还留着许多未处理。于是我发出一篇文件，提出我认为应处理的几件事，
459 虽然这也许要等到下届议会。第一件是关于地方政府的改革或至少是改组的事。第二件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问题。第三件是税率以及结束对工业不断减税的必要性的问题。这套办法在大约三十年以前是大胆有效的，但现已完成了它的使命。第四是我认为拉平资助办法需要修改。第五要对造房津贴问题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逐步集中力量解决清理贫民窟及过分拥挤问题，想办法使人们更乐于自置房产。最末是关于征用房屋这个腻人的问题，这是战时遗留下来的，主要涉及伦敦，我认为这问题必须处理了，政府或是把这些房产收买下来，或者发还给原主。这份纪要我把它称做“行动一览表”。因我的任期即将告终，所有这些问题要留待下任部长来解决。

党的年会于1954年10月在布莱克普尔召开，最近这个议案在会上经过讨论并受到批评。我自然向听众提到四年前在这同一会议厅里的情况，当时代表们提出了令人难忘的要求，有解决住房

问题的雄心壮志。有些人还会记得当时伍尔顿勋爵把叫价（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煞住到三十万之数的情景。“他的这三十万如果是畿尼^①，我们也会好办的”。我在会上赞扬了所有有关人员，特别是我的政务次官马普尔斯和工程部大臣埃克尔斯，然后告诉他们1954年内将造出三十五万套房屋。现在我们已着手搞另一项不那么受人欢迎的工作。但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打算做的工作比造房更为重要。我们党应有责任向人民解释我们所采取的新措施，并要为之辩护。所有这些话看来都是听众能接受的。

1954年10月丘吉尔改组了他的执政班子，要我当国防大臣。我已在住房部干了三年，准备调换一下工作。虽然我多么不想离开那令人留恋的职务，但我觉得丘吉尔的决定是正确的。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自得其乐，可以感到有些称心如意。在第一年，珀西·米尔斯的工作是非常可贵的；事实上，要是没有他，我们很难干出什么名堂来。即使他完全离职，也总是随时能提供意见来帮助我们的。在其后两年中他出席了我们的许多会议，我和马普尔斯所采取的一切步骤，没有不事先同他商量过并利用他的经验和判断的。马普尔斯是我的非常忠心和专诚的同事。他又是一个办法无限多、头脑极灵活而工作不知疲倦的人。其后我能推荐他担任阁员，确是一件喜事。在公务人员中，托马斯·希普香克斯爵士起头有点不知所措，以后对我们打算做的工作开始有了总的认识。他虽然常常不同意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但终于对我们取得的成就表现出长辈般的兴趣。部里的主要支柱是伊夫林·夏普女士。她无疑是我所见过的最能干的一位妇女，也是最可爱的一位妇女。在部里各级官员之间以及在地方官员之间，这些年来都产生一种同志感甚至亲热感。这对埃克尔斯和工程部来说也一样。我们还

^① 一畿尼等于二十一先令。——译注

同苏格兰事务部密切协作，而詹姆斯·斯图尔特那冷静有效的作风使我们的工作变得很顺利。

这样，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三年生涯就于1954年10月18日结束了。我能被派担任这工作并能和这些人共事，真是三生有幸。当我回想起在恰特维尔开始的这一切情景时，我得衷心感谢丘吉尔，他在平时也如在战时一样，都给了我发挥工作能力的机会。

第十四章 在阵痛中的欧洲

1951年秋新政府一上台，就面临好些严重问题。艾德礼政府 461
在其最后一年里一直在各条战线日益增长的压力下挣扎。国民经济处于又一次循环性危机的剧痛之中。不知是时运不佳，还是处理不当，每逢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那些危机似乎总变得特别紧急。同时，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形势，也是一片混乱，危机四伏。从1951年到1954年这随后三年，在外交上是一段错综复杂的时期，在这期间，自然期待英国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丘吉尔的重新上台，受到整个欧、美两洲的欢呼，被当作是大有可能成为探讨欧洲团结问题的一个新途径的标志。他那种自从马尔巴勒时代以来就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和凭以阐心竭虑于创立和促进欧洲运动的精力，都理所当然地足以唤起普遍的希望。经过那么多的动荡不定，现在英国终于可望有一个肯定的领导了。如果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是可悲的不该有的幻想——几乎是有负众望的话，那么，回顾一下丘吉尔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外的种种困难，乃是应该的了。

不仅英国内阁在国内既面临着经济几乎崩溃的局面，在议会里又只依靠那样微弱的多数，以致大有朝不保夕之势；而且政府内部对欧洲问题还首鼠两端濒于分裂。何况，到1951年的最后几个月，形势的发展已经使政府比一两年前更少回旋余地了。

在1947年12月作为一个非正式组织成立的欧洲运动，已经 462
导致了欧洲委员会这一正式组织的建立，委员会设有两个机构——部长会议与咨询会议。多半是由于丘吉尔坚决要求，西德才

被接收为正式会员国。在经济方面，关于煤和钢的舒曼计划已经拟定出来，并为法、意、西德、荷、比、卢等六国所接受。尽管处于反对党地位的保守党作出了努力，该计划还是在英国未参与拟订的情况下制定的。因此，该计划最后铸成的形式具有高度组织性的超国家性质——包括主权的全部组织机构，这是为英国各党所深恶的。我们当中有许多人认为，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参加计划的草拟工作，未始不可使有关各国同意一种不那么严格官僚制度化和合法化因而更可接受的办法。然而，现在是无法可想了，只有重申我们决心与这个新的共同体尽可能取得密切联系，并采取步骤派遣观察员出席这一新机构的一切会议。在这方面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于是迅即同意应发出一个适当声明送交欧洲委员会 1951 年的 11 月会议。

由于大臣间有思想感情上的意见分歧，所以这项声明的确切措辞乃是内阁中妥协的产物。我们当中有些人想把话说得更热情些，但另外一些人则宁愿措辞显得更淡漠一点。不过这一回有所争议的倒不是什么舒曼计划问题，而是欧洲军的问题。经过多次协商之后，到 1951 年夏末，普利文计划已经发展成为后来通称为“欧洲防务集团”这样一个组织了，其广泛的条款已为有关各国所同意。显而易见，对于这样一个保留了普利文计划中一切具有超国家特征的组织，英国是不能作为正式成员加入的。我们可以成为它的伙伴，但不能成为它的成员。工党政府在它执政的最后几个月中所做出的这项决定，已为其后任所接受。然而，我们当中那些对欧洲运动一直怀有很大兴趣的人开始看到我们再次被排除在欧洲生活的另一重要方面之外，却都认为是憾事。舒曼计划——如果有朝一日真正实现的话——我们必须加以接受。欧洲防务要是完全归由该六国掌管，那对英国将会是个进一步的打击。甚至更加危险的事态发展还会相继而来。

新政府执政的最初几周，发生了一场不幸的误解，原因是1951年11月马克斯韦尔·法伊夫受权代表内阁在斯特拉斯堡发表的声明与几小时后艾登以外交大臣身份在罗马记者招待会上的答记者问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法伊夫的话是曾经得到批准的，内容如下：

……我不能答应无条件正式参加，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决不会由于对可靠友邦的需要缺乏充分考虑而不采取真正有效的办法。……就英国来说，它是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的。……^①

这段话，即使有一点含糊不清，也自然被认为是满腔热情的、积极主动的。艾登则满足于重申早在两个月之前赫伯特·莫里森所发表过的声明，据称英国愿与欧洲大陆共同体建立“在各个发展阶段上尽可能密切的联系”。不幸在回答问题时，他却明白解释说，“联系”一词并不意味着英国的部队与军种会成为欧洲军的一部分，而可能是其他形式的联系。这种相当冷淡的语调，在许多人看来是无助于事的，甚至是傲慢的。这简直不像是曾在世界决定性战役中作过战的马尔巴勒·惠灵顿、黑格或艾森豪威尔属部军队的方法。这两个人的声明，发表时间如此相近，以致在当时和以后引起了不少争论。但是这个事件虽然当时在斯特拉斯堡造成了相当的混乱，在欧洲运动的支持者中间也引起了严重的忧虑，却不具有起决定作用的重要性。然而它却是英国大臣们对此问题抱有不同态度的朕兆，而且似乎突出表现了新政府的首鼠两端。我们当中一些在丘吉尔领导下的人一向是欧洲运动的倡导者，热心 464 支持斯特拉斯堡会议。艾登、索尔兹伯里和其他人则被认为是不大热心的欧洲统一运动者，他们确信困难是真的，利益则未必。这些怀疑论者问道：英联邦和殖民帝国（其大部分地区大体还在我们控制之下），怎样能按任何新组织制度或任何超国家权力机关

^① 基尔穆尔伯爵《回忆录》，第187页。

的方针与欧洲联系起来,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如何能够解决呢?这的确是困难的核心。但我们中间的另一一些人却认为,谋求一种解决办法的愿望既是如此强烈,我们就应该掌握主动权,以便能达到一种可以接受的折中办法。我本人相信,而且有充分理由相信,法国的联邦论者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法国人毕竟是最偏狭的民族,正如最近所表明的那样。大多数法国人对于为欧洲建立一个新组织是不太关心的。他们眼前焦虑的是如何解决德国重新武装和法国安全问题的矛盾。即使没有欧洲防务集团设计人那种苦心设计而却几乎无法运转的机构,我们也一定能够应付这个困难。

从个人观点说,政府成员与反对党成员有一个可悲的差别,这就是展现在眼前的全景给弄狭窄了。处于反对党的地位,整个领域都是开放的——举凡外交和联邦事务,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领域无不如此——而且都是一览无遗的。但是,一旦你当上了大臣,特别像掌管住房事务这样一个部的大臣,那就很难发现自己的眼界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当然,内阁文件、外交部电文以及其他涉及全局的有关备忘录,都是发给每个内阁大臣传阅的。然而,文件之多,实令人望洋兴叹,而且一般说来,其文体又是立意要使读者无法卒读,而不是要引人入胜的。在内阁里面,尽管决定都是以名义上的平等地位,组织上的集体行动作出的,但事实上却像在其他每个人类组织里一样,权力和威信总是有等级之差。几个“大亨”,如
465 首相、外交大臣、财政大臣,也许连同一两个具有特殊势力和经验的人,实际上形成为一个指导小组。按长期的传统,外交事务是在外交大臣和首相指导下进行的。他们的同僚,特别是那些可以说是要他们放弃学习古典以便专心攻读现代知识的人——住房大臣就很像这一类人——是只要求他们做好分内事,而在那些老大

哥们操持一切的讨论会上洗耳恭听，至多偶尔作些提问性的发言而已。不错，丘吉尔喜欢召开内阁会议的——实则，在最后一段时期，内阁会议简直成了他工作的最重要部分，他喜欢鼓励讨论，而且常常讨论起来就没完没了。但是，那些比较无足轻重的大臣心里都明白内阁头头们对谋求解决的大小事务是急于要着手进行工作，而不耐烦去听别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发表议论。如果大头头东拉西扯，小头头们就不耐烦。当然，在最重大的问题出现时，每个阁员都有权利也有义务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于必要时以辞职来坚持己见。不过，许多问题并非由于爆发特殊危机而引起，或是并不要求立即作出果断决定的。这种问题就一天天拖下去，从一次会议拖到下一次会议；如果你埋头本位工作，要想跟得上国家大事的发展有更多的作为，那是非常困难的。何况，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是不容易的。我作战的直接对象是财政部。为此我需要与唐宁街十号结成积极的联盟，并至少争取到外交部的善意中立。

不用说，我尽了最大努力关心欧洲问题，对这方面我曾经非常感兴趣而且起过一定的作用。一有可能我就跟象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以及邓肯·桑兹和戴维·埃克尔斯（这两人虽是政府成员，但不幸未入阁）那些在斯特拉斯堡（表现）特别活跃的同僚讨论欧洲问题。我也不时向艾登提出书面和口头呼吁。他总是用他特有的那种礼节周到和文雅的态度对待我。这位外交大臣时常在国外，而且即使有时间同我讨论，他对任何具体细节都那么了如指掌，都那么说得头头是道，因此很难使别人提出或辩护那些更一般性的观点。

在1951年11月底12月初之间的讨论中，艾登和赞同他的人们说得振振有词。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干预欧洲防务集团呢？⁴⁶⁶军事方面的讨论已圆满结束，而只有待于政治协商来促其实现

——首先要六国政府同意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其次要有关各国议会批准该项条约。除了实际参加这一组织之外，我们现在应尽一切努力促其成功。如果法国政治家们犹豫不决，我们应敦促他们按照他们计划的进程一往直前。对于我们不能接受煤钢联营以及照现在所设计的防御机构这一意见，我虽然不好反驳，但我真心地希望而且也相信这两个组织终将归于失败。如果搞成功，特别是如果促进了德国的立即重新武装的话，其好处也可能是短时期的。但从远里看却是凶多吉少的。这个欧洲集团将会有效地控制着欧洲，而把我们排除在外。这正是我们先前反对路易十四，继而反对拿破仑，并在我们这一生之中曾两次反对德国的历史性斗争。德国现在是削弱了，但终究会比法国强大，并用不了二十年的工夫我们就会使德国称霸欧洲，而为了防止这种称霸，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内我们就两次遭受非常惨重的牺牲。所以，我们倒应该是希望舒曼计划和欧洲防务集团(后者更为重要)归于失败。即使我们对后者不能公开地加以扼杀，也用不着格外殷勤，力图使它存在下去。在欧洲防务集团死亡和埋葬之后，那我们才可能倡导建立一个作为代替的体系。我相信，只要我们提出条件，是不会不被接受的。整个欧洲正在等待着一个领导，他们弄不懂为什么丘吉尔领导下的新政府不挺身而出。

在内阁中我有一些同僚也同样抱这种看法。可是大多数人却认为是不现实的，是无视眼前的危险，无视日益加剧的俄国压力，而不屑予以考虑。按照这个观点，当务之急就是早日组成包括有德国部队在内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我自己对这种论证却不无怀疑。我认为，可以制止苏联一百二十个师进一步入侵的，不是我们最终能够集结起来的二十甚至三十个师的兵力，而是原子力量的压倒优势。

一直到1954年年底问题最后解决的这几年内，法国人总是为

相互矛盾的疑虑所苦恼。尽管俄国在西方和东方都咄咄逼人，难道它真是最可怕的敌人吗？恢复整个第三共和国时期所执行的并至少曾经迫使德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法国旧传统政策，难道不是明智的吗？设法同俄国妥协，使德国保持中立并解除其武装，以维护法国的安全，岂不更妙？但是，如果争论的结果倾向于承认俄国为主要危险的话，那末毫无疑问，支持德国重新武装是正确的，但也要用尽可能多的条件和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把德国束缚起来才是深谋远虑之道。因此产生了欧洲军的计划，拟以这支部队置于严格的超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权力机构控制之下，并以减少德国掌握庞大军事编制的危险至于最小限度为基准而加以组织。即使如此，法国仍在不断努力寻求一些补充办法，来防止德国一旦重新武装后规避对新欧洲集团的义务以至脱离该集团。为此，他们随即求助于英、美两国。

这是法国的两难处境。而德国人也处于一面忧心忡忡，一面心存希望的苦恼之中。阿登纳博士的地位还没有完全肯定。虽然协议正在谈判中，预定于1952年5月在波恩签字，到那时西德可以摆脱被占领地位而成为一个盟国，但是阿登纳却遭到许多爱国的德国人的抨击，理由是西德如果完全同它的西方盟国联系在一起，俄国同意德国统一的希望就会从此告吹。俄国那方面则利用这个形势，在1952年春季开始提出召开会议讨论德国统一问题的建议。艾登用相当巧妙的手腕排除了这种干涉，立即提出由一个联合国委员会来安排德国选举条件的问题。

所有这些考虑和互相冲突的动机在这决定命运的几年内一直468在德国和法国起着作用。为求迫切解决而进行的谈判注定要持续三年左右。在整个这期间，丘吉尔毫无表示。外交部的官方原则占了上风：坐待西欧防务集团的成立。

我有许多朋友从事欧洲运动而未在政府任职，他们随即开始

向我表示他们对事态发展的震惊。1952年1月间，欧洲运动创始人之一约瑟夫·雷廷杰博士来访，心情非常激动。他问道：“英国为什么不宣布自己的条件呢？”联邦主义的压力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大。德国人仍然不喜欢法国人。法国人还在怀疑德国人。英国必须出来领导。我们不能做的事，用不着对欧洲国家讲；但我们愿意做的事，应该直截了当地明告它们。

1952年初，我对广泛传阅的一份外交部汇编的有关欧洲一体化问题的备忘录，感到十分痛心。在我看来，备忘录是以对欧洲统一运动的现实和力量的完全误解为依据的。实则，它是以一定程度的轻率和鄙视态度来对待这全部努力的。我出于个人的关心，编写了一份答复。我和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商量之后，决定为谨慎起见不把它作为内阁文件传阅，而直接送交艾登。他为此对我表示谢意，答应仔细研究。他认为我的意见是“鼓舞人心的”——不祥的滥调。

我对外交部的意见曾经感到震惊。他们认为参与舒曼计划各国的全面联合在短期内不会有害于我们联合王国，而只有在德国变为占支配地位的伙伴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内利用它的地位来对付我们的时候，才最后是危险的。这种联合形成一个在世界冲突的场合下保守中立的一个第三种力量，也有一定的危险。这种想法真是鼠目寸光，愚不可及。但是最使我关切的议论是这样的主张：英国因处于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不能够参加一体化运动，而只能同这个运动保持友好的联系。这实质上是倒退到福克斯和张伯伦的孤立政策了。除此而外，它又好像回避了整个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参加限制我们大英联邦成员资格或我们同美国联系的这样一种联邦组织。但是，联邦并不是国与国之间组织上联系的唯一形式。可以采取建筑在政府与政府间的不断磋商这一基础上的邦联形式；咨询会议可用来制造欧洲舆论；欧洲的通货可单独或集体

地与英镑相联系；欧洲特惠区可以创建起来，同我们英帝国特惠税制互相结合；专门的但不是超国家性质的权力机构可以成立，来处理诸如防务和重工业等问题。我们当然可以参加由至少以师为单位的国家部队所组成的一支欧洲军，其联合指挥部则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概念分别对各该本国政府负责。法国已经在印度支那进行着头等规模的战争，并在北非泥足深陷，当然不能把全部兵力交给欧洲军。我们可以提出类似的保留条件。如果我们一无作为，则法、德、意的联合组织——“小欧洲”，尽管法国犹豫不决，却也会组织起来——然而英国却被排除在外。它将受到美国的鼓励，而终久会给英国以至大英联邦带来经济和政治危险。

固然，三国政府看来已经原则上决定成立这样的联合组织，但是荷兰和比利时却不大愿意接受。我也不敢断定法国议会最后是否会同意。如果它能被说服参加，那只是因为别无选择余地。但是，倘若我们尽一切努力劝说法国和其他政府接受欧洲共同防御组织，我们无异是在创立甚至外交部文件也预知其终不免出现危险的那个集团。

我们现在确实应该宣布我们准备加入的那种欧洲联盟该具有什么纲领吗？那样的话就要由欧洲大陆各国在这样一种联盟和一个密切结合而不包括英国在内的联邦之间作出选择。这一招是大有成功可能的。如果失败，然后，也只有在其失败之后，我们才应当考虑与大陆联邦谋求新的联系，以便影响其政策，减少其危险。 470

然而外交大臣以及整个政府都不认为我的意见足够“鼓舞人心”而采取我所期望的行动。他们决定了不同的政策，我们官方的路线很快就变得明确了。我们将对法国施加一切可能的压力，要它参加欧洲防务集团。我们甚至考虑用各种声明和保证来防止欧洲集团的某一成员的背叛，换句话说，就是防止德国退出。

1952年2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在里斯本召开，通过了

所提出的成立欧洲防务集团的计划,但是条约既然尚未批准,这也就只不过是长期外交纸牌游戏中的一个数码而已。

与此同时,艾登见到煤钢联营已着手成立,并预料到欧洲防务集团将为各国政府所同意和将为各国议会所批准,于是在3月份向欧洲会议的部长委员会提出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随即被命名为艾登计划。建议的目的据说是通过商定把煤钢联营组织、防务集团组织和其他任何这一类的专门性组织,与欧洲会议相互联系起来,以加强而不是削弱斯特拉斯堡机构。这个意见引起了我的许多朋友的焦虑,因为它看来很像要让六国的组织吞并欧洲会议,而使其他国家如英国、瑞典、挪威、丹麦以及希腊和土耳其很快就起不了什么作用或影响了。

在我看来,这不是改造欧洲会议的时候。煤钢联营组织预定要到所有六国全都批准之后半年才会建立。防务集团组织还遥遥无期。一旦发生问题,会有充裕的时间去处理。我担心如果防务集团没有我们参加而成立的话,最后势必是一个在德国支配下的
471 欧洲。我们能够施加有效影响的唯一讲坛将是欧洲委员会。因此我认为把欧洲委员会变成六国的一个机构是毫无道理的。此外,还有我们对欧洲和欧洲联盟问题的整个态度这个更大的问题。看来这是女王陛下政府采取建设性的、大胆的主动行动的一个时机。

我同戴维·埃克尔斯和邓肯·桑兹这样一些亲密的朋友商量过,他们虽非阁员,但可以发挥很大的影响力。邓肯·桑兹在幕后对我帮助极大,他说丘吉尔看来有点茫然,不能了解整个欧洲失望的程度。人人都希望新政府会唱出新的调子,但是从唐宁街的两边不曾出现什么新的东西。

1952年3月10日,我在法国大使馆和我的老朋友马西格利共进午餐,我得到的强烈的印象是:即使法国政府能继续下去(看来不大可能),如果英国与欧洲防务集团没有比较密切的联系,法

国是否会最后接受该组织，也是大可怀疑的。我曾把当时自己的想法记录如下：

在存亡攸关的草创期间做出的事情是何等愚蠢啊！一方面是舒曼和摩勒搞荒唐机构创建工作，另一方面是贝文和外交部的孤立主义，合而造成了这样的局势。^①

在戴高乐上台十年之后，这一切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而在法国历史车轮下一次转动的时候，这会显得是怎样的更加不可思议、更加可悲啊！

1952年3月13日内阁召开会议讨论我对欧洲的意见时，我得到了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的忠实支持。但是显而易见，艾登尽管因病未能出席，还是会得到同僚们几乎一致的支持。这次讨论是有一定价值的，可能在下一阶段上产生一些有益的影响。在一个较小的问题上，即艾登关于改组斯特拉斯堡机构的建议被正式通过了。我要求把我的不同意见载入议事录内。丘吉尔并非毫不留情地指出，这是没有必要的。我的意见将会记录在案。总 472
而言之，这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好。在其后几天内，我认真考虑过提出辞呈。我的辞职未始不会是一个打击——但是绝不会像后来我成了一个有成绩的住房大臣时辞职所能造成的打击那样有分量。在内阁内部，我竟得不到什么支持，只有内政大臣马克斯韦尔·法伊夫是例外。他深感不快，他在这问题上比我还有更多的关系。

可是丘吉尔怎么样呢？他在这些一般性的问题上不发挥任何主导作用。他打算坐候欧洲防务集团的结果。我们能以比十字军的创始人更加正统、更加虔诚的姿态出现吗？尤其是我（象马克斯韦尔·法伊夫一样）是矢忠于丘吉尔的。我对他不仅尊敬，而且爱戴。在政府成立不到几个月的这段时间内，我除了听从我的领袖

^① 1952年3月10日。

的意见，学习他的耐性之外，还能怎么办呢？当然，只有历史学家才能确实断定一个人的动机。但是，就我未经他们帮助而分析自己动机的结果说，我认为我所以决定不挂冠而去的主要原因就是对丘吉尔的爱戴和矢忠。

总之，除了这些一般性的理由外，要找出一种明确的论点来作为决裂的依据是困难的。用辞职来反对一项明确的、积极的政策并不难。身为政府的成员之一，而以这个政府正奉行一条消极而暧昧的路线为理由来提出辞职，就不那么容易了。因此我决定再草拟一份备忘录提交丘吉尔，重申我对整个问题的意见，然后再静观事态的发展。可是我并不认为我在取得任何进展。我闷闷不乐，特别是因为我那些没参加政府的朋友在逼我出来带头。在这期间，我本身已有不少麻烦。我想成立某种建造房屋的组织，正为了款项问题在与财政部作斗争。要和外交部在这个具体问题上斗出一个最后结论，似乎有点像唐·吉珂德的行为。实际上，艾登计划虽然为英国内阁和斯特拉斯堡部长会议所采纳，并于1952年9月底为谘询会议所认可，但整个问题却很快成为纸上谈兵，因为欧洲防务集团既已瓦解，也就使这计划无所依附了。

473 在这期间，法国依然犹豫不决。谈判的始末，在艾登所著《兜了一圈》^①一书的有关章节中作了令人赞佩的叙述。在1952年间，最后达成两个重要的决议。5月26日，对德和约经法国、美国、英国和西德在波恩签字。这就结束了占领状态，并恢复了西德共和国对国内事务和外交政策的充分管理权，而以有关盟国权利的某些重要保留为条件，那些保留权利从德国的分裂和柏林的地位来看是有其必要的。第二天，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连同议定书在巴黎签字。同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防务集团之间缔定了互相保证条款。艾登从而能够非常满意地把这一系列的复杂的条约和声

^① 阿翁伯爵：《兜了一圈》第三、七章。

明的内容通知下院。他要求，必须把这些文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声称这标志着在谋求安全方面迈进了一大步。下院认为满意；法国却不然。

我把自己当时的感觉记录如下：

欧洲防务集团和德国问题的协定以及所承担下来的全部复杂义务和保证，都已谈判成功——艾登的巨大胜利。但我并不认为法国或德国议会会予以批准。这将是一场灾难呢？还是给予英国的另一个机会？

在此后两年期间，当欧洲防务集团的命运还在未定之天的时候，艾登的一举一动都步步留心，生怕对他的大陆国家的同事有所不忠。他觉得我们既然不能参加现在所拟议的那种形式的欧洲防务集团，就没有权利提出其他可供选择的建议。如果我们要这样做，就要被认为是破坏者，而将六国政府不肯签字或议会不肯批准的后果归罪于我们。英国的不忠不信有可能导致欧洲联合的失败。他认为我们可以干得体面的唯一事情就是支持欧洲防务集团。等这个新机构成立，我们就可以谋求怎样与之进行最妥善合作的办法了。

这时，每个国家都踟蹰不前。因此，为欧洲的长远利益着想，⁴⁷⁴英国应接受任何一个能够得到大陆支持的建议。但是，从更远来看，我本人却满怀疑惧。我仍然相信，如果这个新的集团成立的话，既有它本身的防务部长、会议和统一指挥的部队，那末未来的欧洲就将变成一个把英国排除在外的欧洲。我们由于本身的错误，已经被排除在煤钢联营组织之外了。如果我们又被排除在欧洲防务组织之外，那就意味着一个六国的欧洲，而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英国和希腊等外围国家排除出去，就意味着一个自给自足的内向的欧洲，这在短时期内也许能获得一定程度的众望所归，然而很可能成为欧洲真正复兴的一种障碍，倘若一旦苏联控制松弛，就不能为中欧和东欧提供团结的中心了。因此，我带着某种超然的

愤世态度，静观法国、西德和美国彼此之间玩弄着错综复杂而又往往迂回曲折的把戏。我一旦决定不在这个问题上辞职，我就可以扮演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如果照我所希望的那样，欧洲防务集团终于垮台，那末才会有一个新的机会，英国也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也许是最后一个希望。

法国最后怎样决定，猜测纷纭，莫衷一是。我在1952年6月见到莱顿勋爵，他认为法国首先要做的事是推迟（如若不能阻挠）德国的统一。因此，如果德国批准条约，他认为法国也会照办。^①

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我和马西格利有过一次谈话：

475 关于法国对欧洲防务集团的立场，他非常着急。他认为国民议会是否会批准（或应否批准），现在很成问题。法国人只是刚刚开始（非常震惊地）明白“联邦”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要是按照我们原来提出的“邦联”计划行事会好得多。何况，法国既有大批军队投在亚洲，那么德国岂不立刻就会重新取得过去的领导权？我问他是否把这一切都同艾登谈过了。他回答说，他不能像跟老朋友作“非正式谈话”那样对一个外交部长推心置腹地谈心（或者有时这样说三道四地批评他自己的政府）。……议案无疑要首先提交国民议会（进行相当于我们的二读辩论），然后再提交外交委员会。在外交委员会里（如有必要）可以把它搁置下来，以便对某些点重新商谈。与此同时，法国明显的日甚一日的犹豫不决已经使许多德国人认为他们应当不再迟疑地立即批准这条约！如果这件条约对法国不利（据论证说），那就一定对德国有利！^②

我不断接到我那些从事欧洲运动的朋友们（特别是欧洲经济合作联盟中的朋友们）就较广泛的问题提出的严重警告。一位忠实的朋友贝丁顿—贝伦斯向我谈到经济战线上正在出现的其他种种发展。如果这些发展取得了成功，那就会产生一个按煤钢联营

① 1952年6月22日。

② 1952年10月31日。

方针组织起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英国会再一次被排除在外。这将是一个严重的、说不定是致命的打击。

同样，我从其他方面，特别是从我们驻斯特拉斯堡的保守党党员那里也收到急报。我的女婿艾默里不断地向我报告。里斯·威廉斯夫人既有非凡的经济专业知识，又有一种近似先知的能力，能准确抓住重大问题的长远后果。她在1953年1月给我送来的一份备忘录，以惊人的准确性预告未来的发展趋势。照她的看法，英国只有三条道路可走。它可以努力保持作为一个尽可能影响其他国家行动的固有的世界大国地位——这是我们多少世纪来一直奉行的政策。要不然，它可以采取孤立主义的和独立的政策，集中力量只顾本身的防务和利益，放弃争取世界大国地位的一切努力——换句话说，变成另一个瑞典。第三、它可以变成美国事实上的另一个州。（第四种可供选择的道路是单独与俄国结盟，这看来几乎不值一谈。）如果我们选择第一条，里斯·威廉斯夫人说，保持世界强国地位的唯一方法就是加入欧洲： 476

在今日的基础上，英国不可能保持一个世界强国的地位。除了作为一个加冕典礼的点缀品之外，大英联邦是不复存在了。中东和穆斯林世界充满了反英的民族主义；非洲正浓烟欲火；印度随时都可能变成共产主义；欧洲行将在一个完全反英的模子里塑造定型，他们那些政治家的主要希望将是抢走英国的贸易，而同时要求英国为反对俄国、保卫他们自己的边疆作出贡献。

要继续坚持目前的方针（即避开欧洲并努力迫使法国拥抱德国），则无异是自招奇灾大祸。

……如果英国置身于欧洲之外，而听任这种情况出现，它是在放弃保持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一切可能性。只有现在主宰欧洲，它才能继续表现出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去赢得包括大英帝国各自治领以及不久以后各殖民地在内的世界其他各国的尊敬。英镑区可以隔宿之间涣然消失，如果英国不再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世界强国，如果大部分（纵非全

部)的海外贸易同时消失。

如果立即作出决定，那就有可能按我们的条件建立起某种欧洲联盟：

[英国]将会得到美国的充分赞助，实则也将会成为美国的救星，只要它能成功地把西德拉在西方这一边。它可以不仅仅在欧洲，而且在整个世界建立起一个新的庞大势力范围。它非但不致丢掉它的帝国，还将会牢牢保住这个帝国，因为它将会强大得足以使自己的一举一动像磁铁一般，而今天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前途原是可以有希望的；俄国是能够威吓得住的；德国是可以驯服的；欧洲的基督教文明是可以重整旗鼓，再度发扬光大的。清偿债务，以至于财富都不难取得。与非洲的伙伴关系未始不能建立起来。民主和自由至少在世界上的一部分地区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477 她进一步论证说：加入欧洲，虽然确乎有风险，但利益是无穷的，而走其他任何一条道路也同样有很大危险。英国孤立的前景，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也同样地危险重重。在“小英格兰”的基础上，就不可能维持贸易上或国际收支上的顺差。然而这种想法无疑地正吸引着某些人，如老的孤立主义者和失败主义者。按照法国的体制建筑师所珍视的方针建立那样一个复杂的欧洲联邦结构固然是荒唐之谈，但是关于经济结构和防务问题的具体建议，现在倒是可以接受的。欧洲必须是邦联性质的，弘扬忠于欧洲概念，但要反对（我们还来得及这样做）极端的联邦体制。这种体制，即使在防务和经济的一定领域内，因别无良策而为法国勉强采纳，但在政治方面实际上是决不会被接受的。

这个文件在预见性上的确是了不起的。

在这时候，美国的方针是简单的。我们在最初几个阶段上得知，华盛顿急于要我们不顾一切明显的反对，而必须参加欧洲防务集团。但艾登告诉我们，当时任盟军最高统帅的艾森豪威尔将军

并不认为有此必要。“联系”同样可以在军事上起作用。与此同时，美国人对有关六国都施加压力，要它们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1953年12月14日杜勒斯曾经就此使用了威胁性语言，说法国如果不接受欧洲防务集团，美国不得不“忍痛重新估价”它的地位。想起法国对美国人可能离开欧洲这一威胁的神经质的反应，倒是多少有点讽刺意味的。当时为避免这样可怕的事，几乎任何事情都认为是该做的。这当然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就产生了制止苏联向欧洲扩张的希望以前的事。这也是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以前的事。

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还是照旧踌躇不决，举棋不定。为帮助法国，提出了一系列建议：由英美发表支持的声明，由英国和欧洲防务集团订立条约，以及其他类似的种种保证。法国依然犹豫观望。

1953年3月，我又发出另一份传阅的文件，质问我们为什么要希望看到一个“拥有共同军队、共同煤钢工业，而以拥有共同的货币、共同金融政策和共同自由贸易区为结局”的这样一个六国联盟的欧洲？不管这样的一种联邦最后是否为德国所控制，都是违背我们无论作为一个岛国或是作为一个帝国的利益的。自然，法国很想把破坏欧洲共同防务的责任推到英国身上，但是我们每作出一次新让步，另一个要求总是接踵而来。因此，我建议不再向法国施加压力，不再劝导。如果欧洲防务集团垮台，那倒是我们的一个机会。艾登最后向我保证，我们不再向法国让步，他也没有建议这样做。如果德国批准了这个条约，这无疑会对法国产生重大影响。他重申他自己仍然认为欧洲防务集团是取得德国对防务作出贡献的捷径。

1953年5月11日，丘吉尔发表了一篇演说，谈论与俄国取得某种和解的可能性，这对世界舆论起了戏剧性的影响。有人认为

他的演说大有助于劝阻法国投入紧密结合的“小欧洲”体系。虽然这篇演说是根据他心目中远为广泛的目的并遵循他长期酝酿的概念和思想而拟具的。

德国人于1953年3月19日由联邦议院批准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接着于同年12月又由参议院予以批准；但法国仍然拖延。它越来越寄望于与俄国直接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而不愿面临将来德国重新武装的危险。

度过新年之后，尽管政府早已作出听任事态自然发展的决定，却又授权艾登提出更进一步的、更加有吸引力的建议来劝诱法国批准这项条约。到1954年8月，除了结婚之外，我们差不多什么都提出来了。接着在4月份英国与欧洲防务集团签订了一项条约。以法国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为条件，英国将以一个装甲师加入欧洲军团。

1953年10月，舒曼向我保证说，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提供了遏
479 制德国最好不过的办法，所以肯定会得到批准；但是1954年间来自法国的一件件报告却依旧使人怀疑法国国民议会是否会通过这项计划。英国驻巴黎大使也持有这样的看法。

1954年6月间我访问波恩时见到了阿登纳。他相信，如果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不获批准，德国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局面。这是我自海牙会议以来第一次与德国总理会谈。我去德国是应该由政府邀请讨论住房问题的。在为我举行的宴会结束后，他领我到旁边去谈。他发表了一大篇引人入胜的谈话，不仅讲到当前的种种问题，而且还叙述了自从罗马时代直到现在的德国民族的历史。我对这段独白深感兴趣，无论如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在此后九年期间，每次同他见面，我总少不了再听教一遍。

俄国人现在正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利用丘吉尔关于召开四国会议的建议。其意图是要阻止欧洲防务集团这个计划的贯彻实

行，而尤其重要的是阻止德国重新武装和西德获准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艾登很正当地坚持要求俄国须作出某种具有诚意的保证，例如签署拖延已久的对奥和约。

在巴黎签署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之后两年多，孟戴斯—弗朗斯又作出新的努力谋求其他五国作有损德国的让步，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1954年8月29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考虑孟戴斯—弗朗斯的新建议，结果失败了。法国总理继续压制以欧洲大局为重的法国人的真诚热情，但也并没有真正使法国“爱国论者”得到满足。因此在8月30日传来法国国民议会做出最后决定的消息时，也就不足惊奇了。批准条约的议案以二百四十六票赞成，三百九十一票反对，四十三票弃权而遭到失败。值得注意的是，孟戴斯—弗朗斯不同意把批准条约作为“信任问题”，而且在他本人的演说里多少采取了超然态度。他与其说是作为一个鼓吹者，倒不如说是作为个裁判员来讲话的。

奇怪的是（经过近两年来种种推测和估计之后）我原来的看法竟然 480 得到了证实。我再查阅一下1952年2月我所写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内阁文件，当时我预言条约是批不准的。我仍然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的结果。欧洲“联邦”意味着欧洲的“德国化”。“邦联”（如果我们处理得当）将是英国领导的欧洲。但是在这个特殊时刻，我不愿意同外交部发生太多争论。

……从言外之意可以看出，法国所以反对欧洲防务集团似乎多半是由于失败主义，而不是由于民族主义。赫里欧的演说是纯粹的贝当主义的。爱国主义者与中立主义者的合流是欧洲防务集团的致命伤。^①

一两天后，我虽然不愿发出自己的内阁文件传阅，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出面领导，不应只是恭顺地追随美国，亦步亦趋。不管怎样，美

^① 1954年9月3日。

国人现在一定明白他们对欧洲防务集团的态度是多么错误（我们的外交部也是一样）。美国一直对法国施加压力，几乎达到了讹诈的程度，而有时则行贿收买，使法国深为愤懑。这一直是主要的麻烦之一。我不认为由于我们现在讨厌法国人，就可以作出歪曲事实的判断。应该有一个大西洋政策，也应该有一个欧洲政策。^①

总而言之，坚持了那么久的一项政策最后归于失败，英国政府是负有很大责任的。

在将近三年的这次令人深感失望的长期谈判中，艾登表现出极其高明的外交手腕。他真是一个最能以礼待人而又通情达理的同僚。我时常感到我给他的建议多了，插手内阁事务也太多了。可是他从未有过讨厌或不耐烦的表示。我收到过他的许多信件和备忘录，讨论我所提出的问题，无不出之以友好的态度。我对他的感情在这段时期加深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忠实的朋友。尽管如此，我却觉得没能使他了解我的焦虑的深度和广度。他总是在谋求解决眼前的问题——德国的重新武装及其获准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问题。我的目光，不管正确与否，总是注视着比较长远的未来——本世纪后半叶欧洲的组织以及英国和英联邦在一个宏伟计划中所应处的地位。

我现在抱着这样的想法：要把现存的欧洲联盟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许可以使德国重新武装及其获准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两个问题比较容易为法国舆论所接受，也比较合乎英国工党的口味。因此在1954年8月底，我提出了德国现在是否可以参加布鲁塞尔条约的问题^②，因为德国还不是该条约的成员国。布鲁塞尔条约是1948年由贝文在法、英、荷、比、卢五国之间商订的，它继续存在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内。我们根据这种方针也许能

^① 1954年9月4日。

^② 见本卷原书第132页。

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当然,这也可能遭到反对,因为布鲁塞尔条约并不包含超国家的因素在内,而这一点却是联邦主义者所珍视的,也是杜勒斯为了某种原因似乎认为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他立即就展开了一场争论,与往常一样,长篇累牍,喋喋不休。我跟朱利安·艾默里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他帮助下我准备了一份文件,送给艾登。

我那个文件中建议在大西洋箱子里再放一只欧洲箱子,这实际上是以1950年丘吉尔在斯特拉斯堡提出的计划为依据的。在1954年9月8日的一次谈话中,艾登接受了这个利用布鲁塞尔条约做为出路的意见,我因此感到很高兴。他早已要求我把我的文件送一份给丘吉尔。艾登还决定不辞去外交上担任奥德赛这个角色,以便把这一主张向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广为推销。他准备在此后两、三个星期内分访五国首都。关于这项任务所遭到的困难和大体上所取得的成功,他已经做了生动的叙述。^①凭着他的人缘和善于游说,这次出国访问证明是一个转折点,尽管杜勒斯极力从中作梗。杜勒斯从来不放过坐飞机旅行的机会,因此他宣布想先飞往波恩,然后再飞往伦敦。他还讲了一通艾登称之为“批评布鲁塞尔条约的长篇废话,因为这个条约不是超国家性质的。”^②杜 482 勒斯的干涉是非常不幸的,而且未始不会造成巨大的危害。然而阿登纳毫不动摇,正如我从几周前的一次谈话中断定他会采取的态度那样。他说联合王国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对此他没有意见,而只有钦佩。阿登纳尽管有些过失,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而且具有非常丰富的常识。在艾登回国之后,内阁很快就接受了这个布鲁塞尔条约解决办法。

可是,在谈判进行时,法国开始提出他们的条件。在伦敦召开

^① 阿翁伯爵:《兜了一圈》,第151—158页。

^② 阿翁伯爵前书,第153页。

了九国会议，包括五个布鲁塞尔条约国（法、英、荷、比、卢），意大利和西德以及美国和加拿大。法国要求进一步采取更有歧视性的措施来控制德国的重新武装，会议几乎因此而失败。法国人对德国的重新武装是提心吊胆、寤寐不安的。孟戴斯—弗朗斯不断声称，只有解除了国民议会的忧虑，他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安东尼认为对欧洲作出新的保证是必要的——正如我们确实常常在一起商量的那样，但是对此始终不曾要求内阁的正式批准。我们必须承担把四个师（或相当于四个师）的陆军和战术空军置于欧洲最高联合统帅部的指挥之下，并驻扎在欧洲大陆。如果我们提出这个办法，（他认为）我们就会在九国会议上达成协议。否则，整个西方联盟可能崩溃，而美国则可能恢复原来的“外围防御”或者（更糟些）退守“美洲堡垒”的政策了。^①

这的确是一个庞大的——而且正如不久所证明的那样——繁重的义务。直到现在，我们的占领费还一直是由德国负担的。有了一个新的独立的西德共和国之后，这笔费用就要由我们来支付了。此外，既然布鲁塞尔条约国将成为能够通过多数票解除我国负担的唯一权力机关，既然布鲁塞尔条约还有四十四年的期限，所以这笔费用还会是我国下两代国民不能卸肩的。

483 虽然如此，利害关系确实还是——或似乎是——很大的。因此，9月28日内阁做出了历史性的决定。在法国更进一步企图勒索更多的利益之后，规定成立西欧联盟的协议于1954年10月23日在巴黎签字了。

我们投入具有这样大约束力的一个事业究竟是否明智，就是现在也很难说。的确，但书中关于英镑的未来负担问题拟具得很糟，只给予我们同伙伴们讨论问题的权利，而无权作出自己的决

^① 1954年9月27日。

定。在后来的年月里，这已经证明是忧虑和困难的一个永久性根源。关于(占领区)维持费问题所一再发生的争论，也从未对英德关系的改善有多大补益。尽管如此，从当时欧洲局势的混乱，美国国务卿发出的种种威胁和人们对苏联意图的担心等等情况来看，这个决定毫无疑问是并非没有道理的。不过，遗憾的是，对于欧洲政治、经济的发展前途没有相应的协定和谅解，而我们竟承担了一种和英国传统大相逕庭的义务——那就是派大批部队长期驻扎在欧洲大陆上。当时法国人害怕德国东山再起，几乎曾哀求我们给他们担保、撑腰，可是几年之后我们却吃了法国政府的闭门羹，这真是一剂令人难以服下的苦药。在形势已完全改变了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信守我们所作出的承诺一事，也像1940年法国惨遭崩溃时我们曾救援过他们一样，都被法国人忘记了。如果说现在法国人可能已痛痛快快地把他们在德国人手下吃过的苦头通通忘掉，那么，要他们真心诚意地原谅原谅曾给过他们好处的英国，就似乎更办不到。

第十五章 伟大的下院议员

484 1951年10月底，正是丘吉尔七十七岁寿辰的前一个月，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组阁。尽管他那漫长而富有戏剧性的一生之中的辛勤劳瘁，在这次历史上最可怕的六年战争中已臻于极点，然而这个非凡的人看来还保有全部的充沛精力和大部分青春活力。他甚至还有点淘气的年轻人的脾气。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在1949年患过轻度中风，后来显然完全康复了。无论如何，嗣后他又参加了两次大选，出版了两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下余两卷则有待他在最后一次首相任内问世。然而以他那样的高龄，用哈里·克鲁克香克绘声绘色的话来说，在白厅里丑声四扬的时候，重又出山，担当重任，真不能不佩服他的魄力。外交、国防、经济、粮食和燃料等情况无一不糟，而且有点令人束手无策。何况丘吉尔明知这不会使自己的声誉更高，而只会使他的盛名逊色。

如有可能，他无疑会恢复过去他那种得心应手的人数不多的战时内阁制。但是，在和平时期这是绝对作不到的。然而，以后来的标准来衡量，这个内阁的规模还是小的，仅以十六名阁员为度。差不多都是战争年代以来的老友、老同志，诸如利特尔顿，斯图尔特——执政党在议会内的首席督导员——以及无足轻重的我本人。巴特勒和马克斯韦尔·法伊夫也是同样亲密的同事。可称为代表党内少壮派的唯一新阁员就是桑尼克罗夫特。虽则这个阵容没有给我们的内阁带来什么新观感，然而他们却都是丘吉尔的知
485 交故旧，其中不少人是同他历经最暗淡的岁月，患难与共，一道工作，一道奋斗过的。

他也采用或恢复了这样一种计划，通过“领部大臣”制来把各部分别组合起来。国防大臣已具有统辖海、陆、空军三部一定的权限，至少在理论上如此。现在则以莱瑟勋爵统辖运输部以及燃料和动力部。农业部和粮食部则委由枢密院院长伍尔顿勋爵负责。直接负责这些部的大臣们都不入阁，而应在上司的指导之下执行职务。如果真正能够形成一个金字塔结构，最上面有一个明确的决策人，那这种做法倒是大有可取之处的——尽管在国防部门完全做到这一点也是十年以后的事。可是在无丝毫法律基础的情况下，这个新结构就开始垮下来了，其原因有二：第一、“领部大臣”的职位除了备有一个办公室和一个私人秘书外几乎没有什么配备，这样就很快变得形同虚设，可有可无；第二、所属各部大臣不管对其有名无实的上司如何忠诚，也开始感到他们对各自的部所负的责任更重于此。此外，既然大臣们都是下院的议员，而下院对拥有那么多贵族的内阁已经有所嫉忌，因此这种计划不管在原则上怎样有价值，但实际上却变成行不通的。^①

这时丘吉尔高兴非凡。他又回到首相官邸了，身边都是他的知交故旧。他那时面临的险恶形势，虽然性质不同，却和十年前他所遇到的正不相上下。第一次内阁会议的情况，我记忆犹新。在彼此道贺之后，丘吉尔立刻就转到国内外的事务方面。他本人向我们评述了防务情况，对之很不满意。他请外交大臣艾登给我们谈一谈中东和其他地区的棘手问题。接着巴特勒以财政大臣的身份发言，他委实有一番苦衷要谈。这样开场之后，就非立即采取行动不可。丘吉尔在预定访问华盛顿之前亲自负责完成防务检查工作。其他公务则分别交由各有关大臣在各种内阁委员会的帮助下

^① 丘吉尔曾邀请安德森爵士担任统辖财政、贸易、供应三部的“领部大臣”，但他因看出这个制度不适宜于和平时期而谢绝了。参见约翰·W·惠勒—贝内特：《维涅莱子爵约翰·安德森》（伦敦，1962年版），第352页。

处理。在这个繁重的日程表上，首相完成任务之迅速是他人所不及的，他在年底以前就完成了防务检查工作。

尽管丘吉尔有时在内阁会议上随兴之所至发表一通长篇大论，独自占去大部分时间，但我很快就发现这并不一定是上了年纪人的一种弱点。每逢他本人占去会议许多时间的时候，就往往表明他对于究应建议采取什么方针还胸无成竹，或者他想借此拖延议事日程上另外一个项目的讨论。有时这意味着他心里正盘算着一些更加严重的问题，而不遑其他。

一般说来，他认为内阁会议在制定政策和建立大臣间的彼此信任方面是一个重要手段。他喜欢，也鼓励争辩和讨论。对于提出相反的观点，不管措词怎样激烈，他也一点都不恼火。他往往对各部大臣说：“要为你自己的立场争辩。”他不允许年青大臣受制于那些身居高位或经验卓越的权威。他欣赏内阁会议，他召开会议的次数比他的前任多得多——就任头两个月就召开了二十二次。他不象艾德礼那样善于主持会议，如果你把会议的目的看作是只不过为了要把议事日程上的项目尽速通过，以便把决议记录在案的话。他也不把内阁会议看做是一个公司的董事会，在董事会上各执行董事都是要努力完成自己的业务，麻烦越少越好，对同事们的问题简直不加过问。他无疑并不把首相看作是这样一个董事会的董事长，而董事会往往只不过是一个工具，把已经作好了的决议加以正式登记而已。他把内阁看作是研讨问题的机构。毫无疑问，有些公务繁忙的大臣觉得他这种做法旷时费日，令人厌倦。我
487 感到艾登对这种不慌不忙而且有时无头无绪的议事程序就深以为苦，因为他时常有许多令人焦急的棘手问题缠身，非立即做出决定不可。至于我本人，既然除了与我直接有关的问题外，很少参加讨论，所以对所有这些会议倒十分欣赏。我一般是力求退居幕后，但对欧洲统一问题和关系到我的住房计划能否成功的重大经济问

题，则又当别论。这样我才能以既赞佩而又愉快的心情对他主持会议的方法作冷眼旁观，只有在议事日程上与我自己有关的项目因而一周周拖下去的时候，我才感到狼狈。

丘吉尔生长于旧时代，那时人们总是在一点三刻或最早一点半进午餐的。撇开时间无疑要订得早一些的私人约会不谈，如今多数内阁大臣看来都要去参加多少带点公务性质的各式各样的午餐会。一到一点钟，大臣们的心就安定不下来了，因为他们要开始计算去康诺特酒家、萨伏依饭店或多尔彻斯特餐厅需要花多少时间。到一点十分，有些人就开始悄悄地溜走了；如果首相正在高谈阔论，他就注意不到这些。有时候我早已知道到会议结束时剩下来的人未必有一半。虽然他总是当心决不在这种时刻作出重要决议，但他一点也不感到受窘。因为他不是在征求留下来的大臣们的意见，就是在自得其乐，或是在把一篇要向更多听众发表的演说先在我们面前预讲一番，这也并非是不常有的事。

在平地赛马的季节到来时，我记得有那么一些天丘吉尔穿上一件特殊式样的黑羊驼呢短上衣——象职员们在办公室里平常穿的那样。如果你朝桌底下觑一眼，就能够看到首相的坐椅下有一条灯笼裤。这说明他准备去赛马，内阁会议几乎肯定要在十二点五十或五十五分结束，好让他有时间穿上合式的外套，坐汽车或乘火车赶到赛马场。有一次我因为要在布赖顿召开的地方政府会计官会议上讲话，匆匆赶到维多利亚车站。我穿过月台时，看见丘吉尔 488 已经和几个亲密朋友安坐在普尔门式头等车箱里了。他见到了我，就用惯常的客气态度喊我进去和他共进午餐。我想他也许喜欢和他的同伴们待在一起，因此婉谢了。“你到哪儿去，我的朋友？”他嚷嚷着问。“我去布赖顿。”“啊哈！我想是去赛马吧。”“不是，首相。我去出席会计会议。”“我相信，是跑马厅会计吧？那可是开心事。”天啊，我的这个下午并不象他那样惬意啊。

虽则内阁会议有时开得长而乏味，虽则丘吉尔本人往往占去了大部分时间，然而他的每一句话，不管是插科打诨，还是历史的回顾，或是对未来的意味深长的思考，无不令人永志难忘。

在举行他极感兴趣的加冕典礼时，发生了阁员大臣应穿什么礼服参加典礼的问题。我们阁员当中有合乎要求的服装的寥寥无几，而买一套新的，价钱简直令人不敢问津。最初的决定是，穿晚礼服、黑色短裤和长统丝袜。可是后来又推翻原议。丘吉尔听说礼服在莫斯兄弟公司或类似的商店可以买到。没有理由说旧礼服不可以穿，其实只要我们穿得合适，给人的印象只会更加深刻。不过这使他想起了当年他父亲辞去财政大臣职务后，因想把官服卖给他的后任而深感不快的情景。他的后任戈申不肯买，伦道夫·丘吉尔勋爵愤然说：“一个犹太人拒绝买旧衣服，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其次是关于仪仗队问题。按照传统，不但陆军委员会，而且海军委员会（同样还有空军委员会）的人都应当骑马。可是海军大臣们看上去对于骑马有点胆怯。海军第一大臣不同意，说训练一匹马要花十八个月的时间。“你是说，”首相这样反唇相讥，“训练一个海军将领要花十八个月的时间吧。”

不时传来关于上议院的流言蜚语。丘吉尔大体上是反对干预这种议论的。“上议员不来有什么要紧？他们象国民军一样——一出危险就会来的”。

489 甚至他在 1953 年患重病之后，也很快就恢复了他那快活和幽默的特性。例如，关于拟议中的四国会议开会地点的问题，争论了很久，俄国人的态度特别固执，毫无商量余地。最后他们建议在柏林召开。丘吉尔评论说：“这一次又是比较通情达理的一方作出了让步。”差不多与此同时，他还给“问题已经解决了”这句话加上一个异乎寻常的注释：“啊，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达到再争论不下去的地步了。”同样，要是出现了一个给我们造成很大困难的次要

议案而我们又只拥有微弱的多数，在二读会上看来很可能要冒失败的风险时，丘吉尔就坚持以让步为明智了。他说，“只有当一个人犯了大罪，他才该听候处绞刑。”他继续评论说：“绝对没有必要去自杀，特别是如果能活下去而又会后悔的话。”他又追忆少年时代的事情说：“有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不肯跳越篱笆，比硬着头皮跳过去而摔断脖子还需要有更大的勇气。”当美国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对欧洲防务问题特别作梗的时候，丘吉尔说：“杜勒斯先生每天都发表演说，每隔一天就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每逢礼拜天还要讲道。这样干，只能使他自己讲的话失去真正的重要性。”

后来他和我谈到我本人的政治经验时，他让我不要忘记过去的宦海沉浮。“政治上总是风云莫测的。它不是平地赛马，而是跳栏赛马。”

当然，他也发表过许多比较郑重的言论，尤其是在他考虑到举世惶惶，忧心如捣的时候，这类言论也就更多。当时东、西方的分裂威胁似乎远比今天更加咄咄逼人。他深入地考虑了德国和两次大战。“过去的一切应该予以宽恕，即使不能忘怀。无论如何，它没有必要作为未来的榜样。”这是一种典型的想法。还有，“可惊的事实是：苏联政府之怕与我们为友更甚于其怕与我们为敌。”真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敏锐的想法。

他最为高明而动人之举也许就是在他首相任内的最后几个月 490 中在内阁会议室召开的大英联邦总理会议上对核问题的解说。他的演说是一篇令人叫绝的精辟之作，最后以轻快的调子作为收尾。在谈到现在俄国人和西方手里的核威慑力量时，他从双方力量的均衡中感到某种宽慰。“希望可能成为恐惧的婴儿，而安全可能成为毁灭的孪生兄弟。”

凡是读过收在他六卷战争回忆录附录中的议事录的人，得知丘吉尔对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事情，无不极感兴趣，该是不会惊奇

的。他差不多有象学童那样以搜求奇事秘闻为乐的嗜好至死不衰，他所掌握的情报往往使那些比较孤陋寡闻的文官或大臣窘不可言。他对影响公众的事务，或确实直接影响普通老百姓的事情，例如铁路运费和票价的提高，都特别敏感。非难他的处事方法的人强调，他过分急于不惜任何代价以避免工业方面的劳资纠纷，并利用劳工大臣沃尔特·蒙克顿的人缘和手腕以及及时的让步来避免酿成眼前的风潮。在另一方面，倒也很可以这样来辩解：财政既处于危急之际，更鉴于我们只是依靠微弱的多数而执政，那么工业方面任何扩大或持久的争议都可能成为灾难性的。

他对国内几乎每一方面的事情都感兴趣，从普通老百姓怎样生活一直到他可能在一份销路广的报纸上读到的个人自由因官僚政治的干涉而受到的最细小侵害。他的一个习惯办法是每晚派摩托车到舰队街，把所有伦敦报纸的大样搜集来，让他饱览一通，这样他就能预先知道第二天的新闻了。他会在报纸上看到一些东西——对一个大臣的攻击，或一则所谓的政府丑闻。他于是口授一份备忘录，因此那个遭殃的大臣第二天一清早就收到了，可能他还未曾看过报纸，对此事还一无所知。我有一次就是这些横遭非难的人物之一。可怜的皮尔格林先生的事实经过和丘吉尔的反映，我已经在前面讲过了。^①

丘吉尔再任首相时主要关心的事情之一，是处理这个国家被
491 指责为口粮标准低得可怕的问题。当他得知人民全都靠甚至比战时还不如的口粮度日的时候，他又急又气。他在1950年和1951年两次竞选中提出的纲领是“工作，住宅，粮食。”关于第一项，已经有了充分的就业。关于第二项，他委托我来办理，而且实心实意地支持我。关于第三项，他决定由他自己来掌握。他因为觉得（这方面的）数字和斤两有点使人搞不清楚，所以他叫粮食大臣格威利姆·

^① 参阅本卷原书第428页。

劳埃德·乔治仿制一份每个人可以领到的实际数量的食物样品。于是样品在一只大洋铁盘子里展出了——一块着色的肉，一小堆糖等等。首相相当满意地瞧着样品。

“满不坏的一顿饭嘛！”他说。“满不坏的一顿饭嘛！”

“可是这些”，粮食大臣提高了嗓门说：“不是一顿饭或一天三餐的定量。是一个星期的定量。”

“一个星期的！”他大发雷霆地叫道，“这样说来，老百姓在挨饿了。非改善不可。”

于是想办法改善了。之后，我们召开了多次内阁会议，对于猪的繁殖问题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如果肉类不能迅速进口，或改善牛羊供应的速度不能超过其天生的颇为缓慢的繁殖过程的话，那么猪倒是一种容易饲养的家畜，天生易于交配，有令人满意的繁殖力，可以给最贫寒的人家带来猪肉或腌肉享受。鲜猪肉也好，腌肉也好，都是同样受欢迎、同样受珍视的。必须发起一个养猪“运动”——象在战时那样。在牛羊肉可以在工人家庭中恢复其固有地位之前，那段不景气的间隔必须由猪来供应。不管专家们怎么说，丘吉尔却坚持自己的意见。正是多半由于他的顽强努力，到1954年7月，食物配给制才终于结束。

丘吉尔的勤于公务，坚持不渝的精神，同他的思想丰富、表达力强是同样了不起的。我不曾见过有哪个人比他还要勤勉。他忠于职守，即使在晚年和在疾病缠身、力不从心、身心交困的时候，也还是坚持不懈。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这部伟大的机车总是滚滚向前。他的工作欲，在政府组成之初是不可计量的，直到政府下台的时候也未见衰减，尽管他确乎变得比较迟钝、比较优柔寡断了。他在早 492
年春风得意之际，主持庞杂的议项目，处理大量的公务，能指挥若定、从容不迫。他有时刚愎自用，耽延公务，但总有其原因在。尤其重要的是，他培养了从事政务工作的一种风格和修养，对于形

形色色的官腔滥调，始终是深恶痛绝、挑剔备至。他总是给同事们一种分担天下大事之感。在他看来，入阁是一种殊荣——或许是可以落到任何一个臣民身上的无上殊荣。在那个时代里，掌管国家大事是可以夸耀的——甚至还不止于夸耀而已，而是一种真正的荣耀。

因为他知道我喜欢推敲行文的风格，所以常常派人喊我去帮他起草在议院或在讲坛上发表的演说稿，或予批评，或提意见。我虽然早就知道他的任何一句书面或口头的词句都是精心推敲而成的，但还是对他措词遣字的非凡用心惊叹不已。他事事不惮其烦。每个句子都写了再写；每条引文都要核对；每个短语都要斟酌再三。坐在一旁看着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下笔如此煞费苦心，实在深受感动。下院是了解这种情况的，因而感到很荣幸。各党派的议员都知道，不管别人对议会将提出什么样的批评，或对议会在新时代的作用会提出什么样的怀疑，丘吉尔却总是把议会看做是权力的中心和源泉，而且是以敬爱的心情对待议会的。

丘吉尔虽然不是议会的领袖——他把这个任务委托给老练的克鲁克香克了——但是对议会生活的兴趣差不多是发乎衷情的。他是在下议院里成长起来的，因此把议会看作一切政治活动的中枢。他认为，而且不无道理地认为，在议会中的成败，即使现代报纸的报道比较有限制，也会逐渐从议员中透露出去，传到选区的各党派，从而传遍全国。他按时出席下院会议，虽然不想坐在那儿把冗长的辩论听到底，但每在议会休息室里露面，一举一动却都小心翼翼。这是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因为在他的大臣之中既有那么多贵族院议员，而其他大臣似乎又不愿意轻易同他们的下院同僚接近。为了这个缘故，又由于他是一个真正的下院议员，所以他总能获得后座议员对他的同情。

丘吉尔对下议院的掌握仍然象以往那样出色，尽管和每个伟

大艺术家的情况一样，水平不是没有高低的。有成功，也有失败。他能够弹出许多不同的调子。有时候他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气势汹汹、毫不留情而又纯系党派性的抨击，使得反对党人有点怒发冲冠，也使我们这一方的情绪相应地激昂起来。在另一些时候，他又弹起国家民族的调子，重新唤起那引导我国渡过战争恐怖的团结一致旧日感情。后者的典型事例就是政府组成之初他发表的那篇国人期待已久的关于国防问题的演说。人们一直以为他会详细谈论他就任后所发现的防务上的弱点和缺陷。然而这方面他根本只字未提：

要么是出于故意，要么是出于错误，这场辩论竟以显示举国团结的伟大场面而告终。丘吉尔在征兵、在原子武器决议（包括美国原子弹轰炸机进驻东安格利亚的问题）、在努力重整军备等等方面，赞扬了社会主义者。虽然他指出空军方面的严重情况，但并未追究任何疏忽之罪。欣韦尔打断了他的话；丘吉尔站了起来，眼含泪花，称赞欣韦尔是位爱国主义者。所有这一切使保守党人颇感茫然。这是战争贩子选举后多么不可思议的结局啊！也许这多少正是丘吉尔的目的所在吧。无疑也是为他在去华盛顿时给他代表整个国家的地位打下基础。^①

在就任首相不到几个星期，他就下定决心要大力去重建同美国政府的旧关系。

他罕有的几次失败差不多总是由于在重大争论问题上陷入党争。社会主义者倒乐于欣赏他在平常有党派之争的问题上大演其闹剧。但是当他在重大国际问题的声明中包含着对他们领导人的激烈抨击时，却使他们大为恼火。1954年3月在氢弹问题辩论中 494 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在那个月，美国爆炸了一枚氢弹，这件事引起广泛的激动和惊恐。实际上美国人早在1952年11月就作了一次成功的爆炸试验，接着是1953年8月俄国人的一次试验。那两

^① 1951年12月6日。

次并没引起轰动。现在这一次因为发表了许多关于试验规模和特点的详细消息，以致公众对核战争可怕的真实情况有了深切的了解。关于“散落物”及其对当代以及下几代人的可怕危害性的详细情况，第一次有了大量的报道。撇开这种武器用于战争时的骇人性质不谈，大家似乎都认为就是试验本身也必然要毒化大气层，毒害全世界的居民。这是争议的开端，直到九年后俄、美、英三国签订了禁止核试验条约，争议才最后解决。

1954年3月30日，因有人建议英国该设法劝阻美国，不要试验这种为防止另一次大战的“最大威慑”性武器，丘吉尔向议会发表了一篇声明，拒绝这个建议。他讲完之后，出现了相当混乱的场面。但是，事情已经变得清清楚楚：无论如何，工党中比较过激的分子认为他们正可以趁机捞一把，“战争贩子”这个老口号看来大有希望能旧调重弹。但是一些比较明白是非的领袖并没有插手。某些报纸开始掀起一个恶意的反丘吉尔运动，硬说我们已经陷入附庸地位，毫无力量去影响美国的政策。《每日镜报》自然又带了头，刊登了大量类似过去那次大选的新闻标题，诸如“丘吉尔自我招供”，“丘吉尔无力对付美国”，等等。《每日先驱报》也同样激烈；恐慌的浪潮似乎要席卷全国。

4月5日举行了一次辩论。艾德礼发表了一篇温和的演说，这在上周那种连珠炮式的激烈提问形成奇兀的对照，博得了普遍的赞扬和尊敬。下院和新闻界盼望丘吉尔会跟着用同样温和的调子讲话——或许更加现实一些，措辞更技巧一些，会用同样的调子。然而，他一开始就提到这样的事实，说1942年他和罗斯福达成了一项协议，而社会主义政府在执政期间把它抛弃了。换句话说，他自称他在对美国人使用原子弹或其他任何新发明炸弹的问题上已经为英国保留了否决权，而这个否决权却被胡乱地丢掉了。这种意想不到的指控激怒了反对党，弄糊涂了政府党的后座议员，

造成了一场长时间情绪愤激的争吵。艾德礼作了几次有力的插言,使丘吉尔狼狈不堪,答非所问。场内一片骚动,“辞职”、“卑鄙”等等的呼声四起。这样大约有二十分钟之久,他才最后以大家所盼望的语调结束演讲。但这结尾部分和前一部分调子不谐,结果毫未收效,未获任何好评。

自从丘吉尔就英王爱德华八世逊位问题发表的那次演说以来,这是第一次最大的失败——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是如此。^①

在这次辩论之后,我走进首相办公室。他明知这次演讲是个失败,但他绝不气馁。他一定要到议会休息室去,他要坐在那儿和“小伙计们”一直聊到将近午夜。他不想溜回去睡觉。实则,这次失败倒也不是一败不可收拾。虽则他遭到了战术上的挫折,然而却取得了战略上的胜利。不会再有什么“谁的手指在扣扳机”之类的攻击了。我们的回答将是“谁放弃了否决权?”或者是“我们把手指按在保险扣上。谁把它拿掉了?”并没有造成什么真正的危害,说不定还是有所收获的。这次事件最可悲的成分也许是向下院和公众暴露了丘吉尔现在已经变得多么老迈。

这事件本没有多大重要性,但对于判断丘吉尔在议会里的力量却有相当关系,我细想这事的经过,曾将我的看法记录如下:

丘吉尔的失败归咎于两点:第一、对一般“非党派”之争的性质和无情的揭露这两者之间,过分不调和,而且把话题引到这一方面也做得不高明。第二、他已经丧失转败为胜的能力了。他听力欠佳;一碰到喧嚣吵嚷就相当着慌;他一时给“打败”了。他所能做的就是硬把准备好的讲稿照本宣读下去。当然,……他的演讲方法(每个字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就带有这种固有的危险性。但是,……若是在三、两年前,他就能随机应变,应付裕如。^②

阿瑟·鲍尔弗非凡敏捷的头脑使他成为辩论家中一个佼佼

^{①②} 1954年4月6日。

者。他有一次批评丘吉尔说，他的排炮虽然也许是非常有威力的，但机动性很差。所以一次突然袭击或者迅捷的反驳，有时就使他莫知所措了。他没有劳合·乔治^①所特有的那种急智。但丘吉尔这些年来学到了一种显然是脱口而出的巧辩的新本领，尽管他在正式演说时总是离不开讲稿。在过去，他经常每周有四天回答质询。（首相的质询日现在已经减为两天了。）议员提出的质询必须在回答的一两天前印在议程表上。因此答复的初稿已由事务官仔细拟妥，并经有关大臣批阅过了。但是按现在的做法，原来提出的质询常常只是一个主题，原质询人或其他人等都可以乘机提出若干所谓追加问题而不需预先通知。因此，要推测可能提出什么样的“追加问题”，事先准备好尽可能简洁、机智而果断的适当回答，这就需要很大的艺术了。一天晚上，我看见丘吉尔在内阁办公室里伏案工作，显然是全神贯注。“你在作什么，首相？”我问，“啊，议会的质询案。在准备即席作答！非常吃力的工作！”

497

丘吉尔在执政的初期几个月内，经济和财政是突出的重要问题。我们好象处于大有全国破产之虞的一种危机之中，至少财政部的一些专家对我们这么说的。总之，艾德礼曾经相信过他们。

这个局面立刻使巴特勒居于舞台的中心了。我不曾预料到这项任命，我的同事中大多数人也没有料到。我们一般都认为奥利弗·利特尔顿会出任财政大臣。利特尔顿是丘吉尔最老又最信任的朋友之一，也是他过去的酒友，但不知为了什么原因，丘吉尔竟选中了巴特勒。战前我根本不认识巴特勒，当然谈不上同情他的见解。因为他在自从查尔斯二世和多佛条约时代以来我国历史上

^① 在我初次参加议会时，我记得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保守党议员嘲笑自由党分裂成许多的派系——阿斯奎斯派，劳合·乔治派，国民自由派，自由国家主义派以及其他各派等等。“在自由党内部”，他宣称，“有许多公馆。”劳埃德·乔治正在懒洋洋地靠在他的座椅上并显得没大听到似的，竟脱口而出反唇相讥：“是的。而且保守党里有很多的公寓。”

最不体面的那段时间担任外交部次官。在战争时期我不常见到他，因为我大部分时间不是埋头于我那个部的工作，就是在海外服务。可是在我们党处于在野地位的那段时期，我倒有机会跟他搞熟了，亲密地在一起工作。我对他非常尊重，而且由衷地钦佩他的才能。他指导我们的政策研究工作所根据的方针同我正不谋而合，因为那些方针就是遵循我本人在两次大战间隔时期的意见的。我对丘吉尔的决定感到意外，但并不担心。要是奥利弗当财政大臣，我同他的争论可能更加有趣，更加热闹些。但也只此而已。

在我所参加的大部分漫长的经济问题讨论中，丘吉尔始终以非凡的技巧和专一的注意力主持着会议。他给肩负重任的巴特勒以充分的同情和信任。但是，财政部备忘录中的专门术语和长篇大论并不容易使他受骗。1925年他曾上过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的一次当，批准了事关成败的恢复金本位和英镑升值的措施，造成了可怕的后果，至今记忆犹新。尽管他对比较深奥的通货理论，特别是对财政部关于按固定或浮动汇率处理兑现问题所抛出的各种计划，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但他能运用他的优异的常识来掌握其实际应用。有时他对生活方式的变化和普通老百姓所抱的新希望有着出人意料的了解。“分期付款购货办法”，当时是，直到现在仍然是通货收缩论者得意的攻击目标。丘吉尔抗辩说，“现在，凡有自尊心的人，若不能答应至少买一部洗衣机，是不敢向他所选对象求婚的。” 498

长期的经验告诉他，公众讨厌琐碎的变革和细小的麻烦。例如，如果需要开刀的话，不要一次开一点，应该等待时机成熟，一下子全割掉，公众的反感结果倒会和缓得多。没有什么比一连串的刺激更令人恼恨的。从来也没有人能说服他接受限制主义者的极端要求。他无论在私人事务或公共事务方面本能地就都是扩张主义者。但同时他在讨论的压力下也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

他痛恨那头十八个月的经济萧条和艰难困苦，因为一看到削减人民的任何供应或增加人民的任何额外负担，他的人道主义感情就感到难受。随着情况的逐步改善，他也得到很大的鼓舞。

从我的观点来说，无论如何，我总是可以指靠首相支持我的住房计划的。我确实从未劝请他给我支持。然而，在我与财政部和其他同事就住房问题展开的斗争中，我觉得丘吉尔总是站在我这一边。因为他和我一样清楚，能够使内阁有光彩或带来政治利益的，不管还会有什么别的事情，但住房运动的进展，将是其中易于衡量成绩和易于肯定成绩的一件。

但是，丘吉尔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帝国事务和外交事务方面。在他一生从政中，他那丰富的和富有想像力的智慧也正是用在帝国事务和外交事务方面的。到最后几年，自然地出现了疲惫的迹象，也许在判断上还有失于权衡的地方。然而，他一旦打定主意，就以顽强的决心坚持下去。

首相和外交大臣的关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十九世纪，两者的关系是许多争论和一些政治灾难的根源。有时，象帕默斯顿那样一个坚强的外交大臣，几乎把他的上司的身体搞垮。象艾伯丁勋爵那样一个没有魄力的首相，由于优柔寡断，缺乏威权，则听任国家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战争。罗斯伯里勋爵是从外交大臣当上首相的，他希望把两个职务合而为一；但是在听人劝告放弃了这个办法之后，他能轻而易举地紧紧控制金伯利勋爵。索尔兹伯里勋爵在他执政将近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以首相兼外交大臣的办法解决了这个困难。阿斯奎斯和爱德华·格雷两人是关系融洽，相安无事，彼此以至诚相待的。劳合·乔治虽然对鲍尔弗很敬重，但无疑却左右着寇松勋爵，有时使之失望流泪。

麦克唐纳在他第一次执政时，象索尔兹伯里一样，身兼两职，他在外交部无疑赢得了了不起的声名，但是在国内事务方面却没有

抓住。在比较随和的鲍尔温治下，差不多一直没有什么困难。后来的艾德礼也同样任由贝文自行其是。但是，张伯伦却把艾登控制的如此之严，以致后者不得不辞职。因此我总是满怀兴趣、但有时抱着不安的心情，观察丘吉尔和艾登之间的关系。丘吉尔多年来一直把艾登看做他的当然接班人。艾登虽则不是他的儿子，却无疑是他的继承人。他有时开艾登玩笑，有时宠爱有加，偶尔也将他一军。在内阁中有许多问题未经事前磋商就提交公开讨论，这显然是不合艾登口味的。但首相认为内阁有权对外交政策的一切详情细节作充分而直率的辩论，除非他另有更合适的想法。

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了解这些年来艾登肩负的担子是不胜其沉重的。先是棘手的朝鲜停火问题以及在停战协定终于签字以前没完没了的谈判——拖延了大约二十个月。接着是柏林会议，从1954年1月25日一直开到2月19日，最后因为俄国人不妥协的态度而破裂了。艾登不顾杜勒斯的愚而自用，几乎单枪匹马地使印度支那战争在日内瓦会议后于1954年7月告一胜利结束。的里雅斯特问题的达成协议，是经过长期斗争的。谈判拖了几乎三 500个年头才最后结束。此外，从1951年10月到1955年3月，有三年半的时间花在分别同伊朗和美国人进行的最复杂的谈判上，最后解决了石油的争端。这个争端是因摩萨台夺取阿巴丹的炼油厂和英伊石油公司的财产和特权而引起的。

对所有这些问题，我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插手。在各次内阁会议上不时谈到这些问题时，我总是尽量静观其发展。虽然丘吉尔偶尔过问一下，而且见解一般都是高明和有助益的，但所有这些头绪纷繁的问题都完全交由艾登处理。而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起码非要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外交大臣花上几年的工夫不可。艾登把这些问题都一一克服了，这不仅归功于他的外交手腕，而且归功于他那种罕见的耐性和毅力。但是，首相本人起了主导作用的两

个问题象一根线那样贯穿着整个那些年头。第一个是埃及问题。第二个是俄国问题。

根据外交大臣贝文同埃及政府签署的一项协议所订条款，最后一批英国部队已于1947年3月28日撤离开罗闻名的卡斯尔尼勒兵营。该协议也接受了驻扎在埃及六十多年的现有英国军队其余部分必须一律撤离的原则。这无疑是不可避免的；但总不能不说是一个可悲的时刻。不幸此后对我们并无真正好意。埃及民族主义者立即提出苏丹问题，埃及国王要求对苏丹享有主权，而英国政府官员则赞成由苏丹人民自决。这就要在此后十年中毒化我们双方的关系了。而且苏伊士运河的防务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而完全凭靠1936年的英埃同盟条约。

1951年10月，在我们重新执政的前几周，埃及首相纳哈斯·帕沙宣布废除1936年英埃条约，虽然该条约还有五年才满期。既然条约并未明文规定可以采取此项行动，这无异是一个不遵守条约义务的恶例，因此当然被艾登认为是恶化国际关系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开罗一直发生严重的暴动，对英国臣民生命财产的侵袭屡有所闻。国王法鲁克不孚众望，实则很快就变得不值一顾了。虽然，毫无疑问，他未始不赞成适可而止，但他不能使他自己的任何一项政策发生实效。

接着是困难而又不幸的三年，其结果是在1954年10月19日签署了一项有关保卫运河和维护我们苏伊士运河基地的协定。艾登对这些大事的曲折经过已经作了详尽的叙述。^①在这段期间，发生了1952年1月间的暴动，焚烧牧羊人旅社和赛马俱乐部，捣毁银行、商店和事务所，同时一些英国臣民遭到了血腥的屠杀。在英国军事报复的威胁下，国王解散了纳哈斯内阁，任命了一个比较温

^① 阿翁伯爵：《兜了一圈》，第十章。

和的人物。美国人象通常一样一直逼我们作出让步，特别是关于埃及人对苏丹主权的的要求。丘吉尔和他的全党一样，深切关怀我们对苏丹人承担的义务。但他同样以苏伊士运河的防务问题为虑，想同美国合作来建立由美国和我们盟国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中东联合司令部。

1952年夏季纳吉布将军发动军事政变，国王逊位，建立起现在还继续着的独裁统治。和时常发生的情况一样，第一个革命人物不久就被他的一个部下推翻了。但从某些方面来看，牵涉到国王个人自尊心的苏丹主权问题因革命而放松了。到1953年2月，关于苏丹前途的协议签字，规定了一个过渡的自治阶段，然后再由苏丹就完全独立或与埃及建立某种形式的联合作出抉择。

下一阶段，运河区的问题相持不下。当艾登在假期间，丘吉尔⁵⁰²本人在1953年春季临时掌管外交部，他大力打开谈判。但谈判进展缓慢，而且谈谈停停。例如在1953年5月间谈判就中断了：

在埃及，谈判将有两个星期的间断。无疑埃及人（他们早已有了美国大使卡弗里作靠山）……希望从杜勒斯手里得到点外快。后者预定一两天内到达。……杜勒斯肯定会干出“没脑子的事情”来，如果他有可能这样干的话。由谁来控制共和党的战斗只是刚刚在开始。艾森豪威尔将军目前看来与其说是个领袖，不如说是个裁判员。也许以后他要维护自己的权利的。^①

艾森豪威尔总统赠给纳吉布将军一支左轮手枪这个不可思议的插曲，也并没有使情况改善多少。但是，丘吉尔因为现在正全神贯注于对俄国的关系，所以打算听任形势发展，而集中解决运河基地问题，只要给予我们一段相当时间的租借权和再度进入的权利，不管根据什么样的条件解决都行。但是，埃及政府继续拖延，也就是要求我们做出更多的让步。到1953年年底，丘吉尔又在盘算着由英

^① 1953年5月6日。

美两国代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埃及建立联合基地的想法。埃及条约现在看来很有可能以既丧失威信又在国内产生危险的政治影响的一种形式下而告终。但是，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不惜庞大开支以八万部队无限期地驻扎运河区吗？在沃特豪斯和阿什顿的领导下并得到麦克莱恩和朱利安·艾默里积极支持的党内某些成员完全反对英国撤出运河区。但就是他们也明白我们无法在那儿保持那么多的军队。于是，留驻一个旅而不订条约的计划提了出来，不过这看来会使两个世界的最糟情势难以避免。我将自己当时的想法记录如下：

503 如果我们按目前的建议签订条约——我们将赢得党的满意，但有二、三十票反对。这可能意味着艾登的地位要受到严重危害。……斯温顿非常明白，认为条约是对的。如果我们做对了，就用不着担心。……

如果条约签订不下来，我们就必须实行一种自动集中和全部撤退的计划。^①

这一年年底，看来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我们正接近最后破裂。美国人非常不愿意承诺任何形式的帮助。他们甚至极不情愿在这时候拒绝向埃及预付大笔贷款以施加压力。丘吉尔虽然有意采用逾期则收回我方建议的限期讨论办法来逼出一个结果，但他再一次不急于坚持自己与艾登意见相反的观点。他仍然在集中精力研究俄国计划，因此愿意让艾登去处理埃及问题，尽管还时时对之行使一种节制权。

到1954年年初，还是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原因是：一、纳吉布政权害怕穆斯林兄弟会阴谋政变，因此非继续鼓动仇外情绪不可。二、美国大使卡弗里继续给他们援助和安慰。三、有人〔工党左翼人士〕对他们说，女王陛下政府将不得不屈服。卡弗里的行为的确太恶劣了，因为他所干的并不是总统以至国务院所真想干

^① 1953年12月20日。

的事。^①

这个月的早些时候，看来“革命委员会”在扑灭了国民党和穆斯林兄弟会之后已逐渐意识到他们只有依靠军队。但纳吉布政权正一步步走向末日。2月25日纳赛尔看上去已成功地夺取了政权。然而斗争远没有结束。纳吉布反败为胜，这就使他能够在未来的几个月内行使一定的权力。一会儿纳吉布似乎胜利了，一会儿纳赛尔又似乎胜利了，彼起此伏，令人目眩。只是在这样反反复复之后，夺权斗争才得到解决。纳吉布最后命运是暗淡的；但纳赛尔却具有中东政治生涯中罕见的生命力，他历经这一切成败进退，终于站稳了脚跟。 504

我们的谈判地位从头到尾都具有双重弱点。第一、1936年条约到1956年就期满——只剩有两、三年的时间。第二、英国的军事负担越来越让人吃不消。我们在全世界都有驻军，几乎没有一个可动用的后备师。丘吉尔和任何人一样地清楚了解，我们无法把大批部队无限期地留驻埃及，一动也不能动。

既然这番旷日持久的谈判看来不可能取得成果——谈判从3月份起一直中断到7月，而苏丹的局势却不断恶化，我们又只有一个营驻扎在那里，于是艾登提出了一个计划，准备只要我们有在万一发生战争时重新进入运河区，就同意由英国或英美双方组成的文职人员管理基地。

到这时，丘吉尔深信军事上的论点压倒一切。第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右翼现在放在土耳其以至巴基斯坦方面。第二、在原子战争中，不管是使用原子弹还是氢弹，很难看出我们怎么能再打开这个基地，因而这个基地的价值的确是值得怀疑的。同时，军队消耗在苏伊士运河上，每年耗费达五千万英镑。在那里，既无所事事，又没有任何训练，而且士兵在不时发生的袭击中遭到杀害，至

^① 1954年1月1日。

于娱乐则根本谈不到。因此他现在声言,不管是在台上还是台下,都准备根据纯军事上的理由为新建议作辩护。国防部和参谋部都以必定会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而感到欣慰。到7月底,条件最后商妥,这多半得力于陆军大臣安东尼·黑德的手腕,是他完成最后安排的。协定包括和平时期的基地的组织和使用问题,以及在战争时必需具备的设施问题。遇有战事发生,我们的权利将包含使用埃及的港口在内。在我们的部队完全撤退之后,我们还享有皇家空军降落和飞越领空的一切便利条件。同样重要的是经决定双方确认1888年公约,保证运河的航行自由。

505 在这长期争论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一直是根据俄国在东欧和西欧进行的侵略以及大战可能爆发的设想来考虑问题的。因此,美国人抱着起伏不定的热情和我们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埃及应从中发挥其作用的中东防御体系。不过,这种想法,埃及人从未正式接受,计划因此告吹。尽管任何看上去是撤退和放弃长久以来保持的地位之类的主张同丘吉尔的脾气都是不相容的,但他一旦下定了决心,还是给艾登以慷慨的支持。一度在他本人前途未卜的时候,丘吉尔确乎未始不能激励保守党内持异议的一批人,来造成麻烦。反对签订任何条约的这类人为数约四十人左右。但他决不屑于采取这种策略。的确,正是因为他在私下和公开场合都坚决捍卫这个条约,这才左右了那批犹豫不决的人们。

尽管如此,这种长期争论的整个过程是极端痛苦的,当时我们自然预见不到纳赛尔一旦得到最高的控制权竟会转而追求扩张主义的目标,立意建立一个阿拉伯帝国,或那样迅速地开始对以色列施加日甚一日的隐蔽和公开威胁,而同时又准备以完全嘲世讽俗的态度否定埃及就运河问题所应承担的国际义务。也许最后使丘吉尔下决心的主要论点是根据这样的事实而来的:条约即将期满,加之他已开始那么热情地投入了一场新的冒险事业,想对世界

两大势力集团间的生死争雄问题找出一些解决办法。他深知，只要这种紧张局势得不到缓和，维持秩序与和平，维护世界各国对其他国家权利的尊重，就没有多大希望。

丘吉尔在旷日持久的埃及危机期间的思想发展，观察起来是令人深省的。它可以具体地说明丘吉尔性格的两个方面——一是他对我们伟大的帝国体系的眷恋和自豪，二是他甚至以那样的高龄还富有凭以掌握现实并使英国政策与新时代条件合拍的那种想像力。正如他理所当然地羞于看到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归于消失一样，他也同样简直不愿同意放弃尼罗河流域，因为我们为了它的整个战略意义和政治意义把它保持了那么久，而且就在几年前我们还那么英勇、那么不惜付出高昂代价保卫过它。同时，丘吉尔也充分了解改变了的世界力量对比的含义。 506

他的思想尽管所涉范围之广足以令人惊异，但还是倾向于集中考虑一个主要问题。他的伟大和他的力量也的确正体现在这一方面。战前，他是首先认识到希特勒政策所引起的危险的人们之一，他总是把弗朗哥或墨索里尼所引起的问题搁在一边，认为是无关宏旨的，无论如何，只是把它与德国的威胁联系在一起考虑。同样，也许一部分由于他在欧洲对本身防务问题的探讨既进展缓慢而又令人备感痛苦的那种特殊情况下，无法对他处于反对党时曾费过几许精力的欧洲联合问题作出任何重大贡献，所以他现在开始越来越把心思放在俄国问题上了。是他在1946年富尔顿演说中着重指出俄国是人类的新危险，接着西欧各民族才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条约的庇护之下团结起来。虽则常规军备还是颇有疑问和缺乏实效的，无论如何和平已经靠美国原子弹的压倒优势而确保无虞了。

从不时同首相及其亲密朋友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他现在已经

放弃或推迟了实现其欧洲概念的任何努力。他对法国人感到不耐烦，似乎不了解他们犹豫不决的原因。他的这种态度当然鼓舞了那些怀疑欧洲运动的人，其中有些人对丘吉尔竟然不大再关心欧洲运动，并不感到十分惋惜。

507 丘吉尔竟不愿保卫他费了偌大精力所促进的思想和理想，殊为不可思议。猜想有人把他改变战线看作是纯机会主义：当他在野时，欧洲适合他的需要；而现在他不用操心了。我认为，这不是实情。现在他的心思绝大部分用在设法组织某种真正防御这一实际需要以及不让美国人置身事外这一点上。对他来说，这两者乃是我们当务之急。^①

在他上台的最初几个月内，他的精力主要用于建立适当的防御力量，并使美国支持这个目标。可是美国爆炸了氢弹，他们甚至可能在俄国没有获得同等力量之前就想摊牌。看上去他们的一些军事顾问已经提出这个办法，从而引起了丘吉尔的严重忧虑。1953年初的一个星期天，我和他待在契克斯，我发现他心情抑郁，盘算着所有这一些问题。他正不耐烦地等待着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请其参加一次会谈的答复：

可是他(和其他每个人)却忘记了这是华盛顿的诞辰，在周年纪念的两三天内美国是停止办公的。^②

对丘吉尔来讲，公事从无停办之说。

随着俄国人或者靠了他们自己的技巧或者靠了收买叛国者而取得了全部核秘密这一事实越来越清楚，丘吉尔也开始对似将展现在世界之前的悲惨前景越来越焦虑。原子战争或核战争的整个概念使我不禁有谈虎色变之感。撇开他对时常被称为战争贩子的那种恶毒攻击十分敏感这点不谈，他的人道感、慈悲心肠和活泼的想像力，就使所有这些可怕的前景成为一种几乎永远不胜其沉重

① 1952年2月18日。

② 1953年2月22日。

的负担，压在他的心头。他在政治上孤立的时期花了好多年的时间，试图提出及时警告以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虽则他曾分享过正义战争的一些荣耀（的确，他所参加过的战役一定比历史上几乎任何一个人多），可是在那个时期伤亡虽重，痛苦虽深，但战争却一直是按照可以称作是正派而体面的方式进行的。现在这种大规模毁灭对他来说却是一种骇人的梦魇。

他谈了这番话的几天之后，传来了斯大林于3月5日逝世的消息：

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今天由克里姆林宫正式宣布了。昨天一天，向苏联和全世界发布了最不可思议的新闻公报，其中以大量篇幅详尽地报道了病状和医疗情况。看起来好象全体医生都在不遗余力地来确保自己免被指控为无能和阴谋背叛。^①

大权会落在谁手里，个人还是委员会？迄今还没有任何迹象可寻。会是莫洛托夫，还是马林科夫或贝利亚吗？还是另外一个人？不到一两天我们就听说

马林科夫继承了奥古斯都的地位，而以贝利亚（秘密警察）作为凯撒。莫洛托夫任外交部长，不过看来不再是皇族的一员了。^②

7月间贝利亚倒台——接着被处决——大体上被认为是好事。大约在这时候，铁托元帅来伦敦访问，丘吉尔在首相府设盛宴招待，我应邀作陪。我是在战争时期认识铁托的，他还没有忘记我。在短短的谈话中，他告诉我说，克里姆林宫内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还远未结束——实则不过刚刚开始。

虽则仅仅斯大林的逝世并不一定预示苏联政策的重大改变，但是由于这个事件倒是出现了新的可能性。丘吉尔慎重地指出：

① 1953年3月6日。

② 1953年3月7日。

“恶政府开始革新之日即其最危险之时。”^①不幸,最初的朕兆并不令人鼓舞,因为俄国人在柏林走廊击落一架英国轰炸机,从而引起了往来如梭的措词强硬的照会。但是,中国人大概在俄国人同意下对朝鲜强制遣返战俘问题正采取比较好的态度,这件事倒是鼓舞人心的。所谓俄国人的“和平运动”已经初露端倪。

这时候我本人是抱怀疑态度的:

我不能不想起太阳和风的寓言。一个新的温暖的冒牌太阳(除非我们非常小心),比过去几年的刺骨寒风可能更有助于阻挠乃至制止重整军备。^②

509 尽管如此,但显然有

一些[利益]可以得之于当前俄国的国内形势。我们甚至可能[正式]结束朝鲜战争。但是我们不能保证这不会意味着在印度支那和马来亚重新施加压力。^③

当丘吉尔告诉我们说,他认为艾森豪威尔对俄国人表面解冻的反应似乎过分冷淡时,他的思想在怎样活动,也就一目了然了。国务院显然想就真正缓和,纵非正式和平重申其详细条件。在朝鲜,退回鸭绿江,在联合国监督下,在统一的朝鲜举行自由选举;在奥地利,签订和平条约;在各卫星国,举行自由选举;统一德国;裁军;也许还有对原子弹生产进行国际控制和检查的富有想像力的巴鲁克计划。丘吉尔认为这些虽然在原则上是无可非议的,

然而要把这些问题赤裸裸地且不说生硬地提出来,就会让世界舆论认作是当前一种相当消极的行动。这将被人看作仿佛是青霜骤降,阻春信之初回——并不是真正的春回大地。^④

同时,首相很高兴和总统建立友好的联系,并能和他开诚布公地讨论发展中的局势。

^{①②③} 1953年4月4日。

^④ 1953年4月14日。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1953年春——新闻界已经开始攻击丘吉尔缺乏“理解力”，不能对经济或政治问题提出任何首尾一贯的政策。但是，关于他引退的问题很快就变成完全不可能了，因为4月6日宣布了艾登病情严重，需要开刀的消息。结果是一次困难而复杂的外科手术，而6月初还非得去波士顿作进一步治疗不可。在我看，这时丘吉尔正在非常吃力地工作着。由于艾登在假，他暂时掌管外交部。他非但没有被繁重的例行公事所吓倒，而且脑子里充满着自己的各种构想，并且极力设法把这些想法表达出来。对艾森豪威尔在4月16日发表的演说他早已表示过欢迎。这是自从斯大林去世后艾森豪威尔第一次发表的演说，呼吁俄国的新领导人一变历史潮流，与西方妥协。总统坚持他的声明说，一项具体的行动，例如签署奥地利条约，将成为和平诚意的保证，要比书面备忘录或公开的口头演说更使人深信不疑。然而演说的总的调子正是丘吉尔所希望的，因而不吝为之喝采。俄国人对艾森豪威尔的答复是一长篇既明确而又合情合理的照会，异乎寻常地没有一句谩骂之词。 510

这就要轮到丘吉尔登台演说了。他那篇演说是他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在下院所作的许多极为重要而又具有戏剧性的演说之一。

在开始对外交事务作一般性辩论时，他详细阐述了自由世界和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关系。他同意这样的看法：俄国人的政策可以部分地用担忧，特别是对来日重整旗鼓的德国的担忧予以解释。但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和西方国家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的力量已经制止了俄国任何进一步的侵略。现在努力消除俄国人的忧虑也许是必要的。要是按过去的洛迦诺条约的方针签订一项防御条约，由德俄双方保证互不侵犯，消除俄国人的忧虑也许就不难作到。无论如何，这是探出俄国内部是否象改换主人一

样地也改变了思想的一个时机。说不定最高级领导人举行一次小型的秘密会议会是有所获的。这种会议不应受“冗长的或硬性的议事日程的拖累”。即使不能达成明确的协议，领导人聚在一起，看一看将来有没有比要把人类弄得四分五裂、生灵涂炭更好的目的，总该可以有所作为的。

下院和全国都几乎带着敬畏的心情听取这篇著名的演说：

511 丘吉尔昨天发表了一篇关于外交问题的“伟大”演说。作为一项议会行动，这篇演说是“伟大的”；作为一位担负着额外外交工作的七十八岁的首相所作出的努力，这篇演说是“伟大的”；作为在战前、战时和战后所作的许多深刻影响世界舆论的演说之后的又一次演说，这篇演说也是“伟大的”。^①

因为丘吉尔决心要处理更大的问题，所以他赞成立即调解远东的纠纷。他料想朝鲜停战已有可能，因此把美、中双方无谓的斤斤计较当作不重要的问题抛在一边。

但是，丘吉尔演说的要点是提出了按(或相当于)早年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的模式举行三强会谈。这个建议博得了反对党的热情支持，得到了保守党不怎么热烈的赞成，引起了全欧和大英联邦的兴趣和同情，但也当然引起华盛顿的震惊。^②

碰巧在演说的次日，我出席了一个宴会，有美国大使和他的一两位馆员在座。我得知美国使馆的低级官员们听到丘吉尔的演说非常吃惊，几乎是愤慨，而“美国大使却认为这演说是篇‘杰作’，而几乎完全同意。”

当然，这件事和其他一些问题加在一起，很有给美英的共同努力造成裂痕的危险。我得承认，我也多少有同样的担忧。照我几个月以后所了解的，外交大臣也有他的忧虑。他关心的是，对俄国

①② 1953年5月12日。

不断施加压力的政策和我们在欧洲建立起来的力量是否已达到了足以允许我们作这种缓和局势的尝试的程度。合适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丘吉尔在发表演说前确乎没和全体阁员商量过。但是，他那时既是首相又是外交大臣，这样做无可厚非，尽管内阁中有些人马上就提出这样的对比：在我们一次次旷时费日的会议中，对较小的问题都花了很多时间去讨论，而这样大的一个问题，事先却提都不提。但是，丘吉尔决心要干下去。他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千载难逢的时刻已经到来。他认为自己致力于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乃是他可能给这个国家和全世界所作的最后服务。不存在什么“姑息”问题，象某些人试图对他的话所作的曲解那样。这一点在 512 他的演说里，既未暗含，也未明述。他是想从西方毫无疑问地拥有的力量出发，而不是从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们在生死攸关的日子里曾经是我们大为失策的软弱地位出发的。

这时候许多事情都取决于他所希望的与艾森豪威尔安排的会晤，所以当他在5月21日能够通知下院说艾森豪威尔已经表示希望与法国总理和他本人会晤，以便讨论这些重大事务时，他真是心花怒放，高兴极了。会晤地点将是百慕大——英国的领土——日期是6月中旬。这样就可以有时间征求一下英联邦总理们的意见，因为他们全都要在6月2日齐集伦敦，参加加冕典礼。

甚至从李承晚突然决定释放两万至三万战俘一事看来，也不象是有朝鲜战争再起的危险。这些战俘都是北朝鲜人，据说是反共的。盟国曾经要求给予他们以任便留居南朝鲜或返回故乡的选择。单单为了这一个问题，已争论两年之久。当李承晚把这个问题拿来单方面处理时，这就激起中国人和北朝鲜人的极大愤慨，并引起某种程度的普遍震惊。我自己却不认为会有多大关系：

如果俄国人和中国人想停止战斗的话，他们是不会太关心战俘的。实则，要把这个事件当作破坏停战谈判的理由，那倒真落入了李承晚的

圈套,正中他的下怀,因为他正想继续打下去!①

事实证明是如此。现在百慕大会议的一切准备工作好象是安排得相当不错,丘吉尔为此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不幸由于法国政府垮台,而新政府还没有成立,看来会议很可能要延期到6月底了。法国组织新政府的失败,以及意大利因陡向左转而使加斯佩里联合政府仅仅居于微弱多数地位,都是很不凑巧的。

看起来好象欧洲正在马林科夫的阳光照耀下融化分解。斯大林的寒风倒曾经使欧洲结成一团。②

现在据

庄严宣告,俄国人将要复员一支十二万人的部队。这支部队的存在,俄国人是一向不承认的。

正在这寄望殷勤、举世引领的时刻,传来了丘吉尔突然患病的可悲消息。6月27日从查特韦尔发表的新闻公报如下:

首相长期以来勤劳奉公,日不暇给,目前需要完全静养。因此,我们劝他放弃百慕大之行,并减轻他的工作负担,为期至少一个月。

事实上,在四天之前,他又一次患了中风。

① 1953年6月18日。

② 1953年6月14日。

第十六章 和平缔造者丘吉尔

6月29日,星期日,全国各报都登载了丘吉尔患病的消息: 514

公告是在星期六发布的,星期日就在所有各报刊登了,但并不是在所有的报纸上都占头条位置。因此,这项消息是分成两个阶段向人民透露的。在星期日那天,消息是着重于百慕大会议“暂”缓举行的报道。鉴于在朝鲜表面上的僵持状态,这项消息无论如何是不会使公众感到意外的。在星期一那天,主要是报道首相的实况。消息仍然是十分简略的,但所造成的印象是首相“疲倦不堪”,必须休息。^①

中午12时召开内阁会议。在首相和外交大臣缺席的情况下,巴特勒主持了会议。索尔兹伯里勋爵坐在首相位子左边他的那个老位子上。我们很快就明白了,他两人是以极大的勇气和忠诚,在这紧急时刻,把作出这一决定的重担挑在自己肩上的。巴特勒把他和索尔兹伯里于星期五访问查特韦尔的情况向我们作了简短的叙述,在那里他们发现丘吉尔的健康不佳,但仍神采奕奕。他向我们透露了我们不幸而猜中的那种病的性质。我们大家都大吃一惊。虽然病情说得很简单,很有分寸,而我们当中已有很多人眼噙泪水,甚或禁不住要夺眶而出了。我们讨论了各项事情的安排,商妥了要在下院发表的声明。至于由谁来“管”外交部则尚有待明确。索尔兹伯里勋爵将去“帮忙”,但这个计划在下院的压力下立即被打消了。

第二天在答复了议会的质询后,我就去找

515

我最要好、相交最久、最靠得住的朋友哈里·克鲁克香克闲谈。他告

^① 1953年6月29日。

诉我索尔兹伯里的安排是怎样被打消的。来自艾德礼和整个下院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以致招架不住——但是外交事务非有一个人来负责不可。所以，在同查特韦尔通了几次电话之后，这件事就安排定了。索尔兹伯里勋爵被任命为“代理外交大臣”。（在鲍尔弗勋爵和寇松勋爵时代都有此先例。）^①

哈里·克鲁克香克似乎对于我不久也要进医院就医一事很担心。他觉得内阁中有三个阁员同时失却战斗力总不是令人鼓舞的。在下午晚一些时候为了一项部里的问题，我见到巴特勒，他力劝我暂缓就医。可是，当天晚上我见到理查森医生，他却十分坚决：“不能再耽搁了，不然病会变得十分严重。我们已经把它忽略得太久了。”^②于是商定在7月6日傍晚进圣·托马斯医院。

7月2日我奉召前往查特韦尔，于晚饭前到达。

当我走进客厅的时候，只有莫兰勋爵在那儿。他告诉我他对于所取得的进展很满意，而且还不止满意而已。但是，他恐怕我看见首相的病情会要大吃一惊，虽然最近两天他已经好得多了。^③

我最初的印象是惊讶，一个人遭到这样的灾难，居然还能显得这样愉快和勇敢。从进餐时起直到晚11时刚过他就寝时为止这一段时间，他的谈话几乎完全和往常一样。空气一点不沉闷，反而可以说是趣味盎然。在进餐之初，他对我说：

“你晓得，我中风了。你晓得这是第二次吗？1949年患过一次，在那之后，我又参加了两次竞选。”跟着，他描述了他怎样从斯特拉斯堡到比弗布鲁克勋爵在法国南方的别墅怎样在洗澡之后发病。他说他的胳膊差不多已经恢复，腿也大为见好。在进餐时和餐后，的确有过好几次我想他是要表演一番，但是，无论如何那是一次非常大胆的表演。^④

在傍晚时分，我有好多次比他更想要落泪，因为我对他超乎寻常的

① 1953年6月30日。

②③④ 1953年7月2日。

意志从来没有比这次更加敬佩了。我们谈话涉及的面很广：

我们讨论了解散议会的可能性，死亡和约翰逊博士对死亡的恐惧，佛教思想和基督精神，波兰土风舞——酒、女人和马，以及其它许多话题。^①

但是他很快就把话头转到德国和欧洲问题上去了：

他已看过我的报告并表示感谢。他还没有下定决心。他认为现在形势正在发展中，我们必须等待德国的选举和法国对欧洲防御共同体的决定。但是他并不失望。他希望美国人会同意和俄国人举行会谈。^②

他自然晓得艾登在秋季之前不宜于恢复工作，但是他焦急地等待着艾登在8月间返任。

在丘吉尔就寝之后，我获悉这可怕的一周的全部经过：

病是在6月23日星期二在加斯佩里餐厅进餐时发作的。当时病势还轻，首相便离开餐厅到卧室休息。到第二天早晨才找到莫兰勋爵。〔丘吉尔〕并不太吃力地到达内阁会议厅，而且将内阁会议开完，并没有透露发病的事。（我除了看到他面色苍白外，确实别的什么都没注意到。他话说得不多，但口齿很清楚。我记得，他招呼我说，“哈罗德，请你把窗帘拉下一些，好吗？”我也注意到他不大讲话。）^③

在内阁会议之后，丘吉尔仍然竭力要去下院答复质询，但是被劝阻了。第二天，他就动身去查特韦尔。

他的病情大为恶化——血栓似乎在增涨，他的手臂和腿的动作也更加不灵活。因此，看来它不像是一种突发的机能不全的瘫痪性中风，而有点像是开始时很缓和而一点一点地趋于恶化的那一种。^④ 517

星期五，巴特勒和索尔兹伯里前往查特韦尔，并决定于星期六下午三时发布通告。可是，在星期六，他的病情恶化，似乎已经临危了。

接着，他又好转，并且从星期一或星期二起，他一天一天好起来了。

①②③④ 1953年7月2日。

在星期一那天，他在通电话并干着其他一些事情。今天我可以看出他的情形是个有病但却极其愉快的人。^①

首相及其家属都希望以比较乐观的口气去发表病情公报，而巴特勒和索尔兹伯里同意这样办是负有很重的责任的。可是，我认为他们是完全有道理的。应该让丘吉尔有几周的时间使他去下决心才好。

他有两条路可走： he 可以先撑到 10 月份，然后再把位子让给艾登。或是这样撑到 10 月份，如果到那时候健康没有什么问题的话，然后再拖到“议会休会”。显然这位老人的心里是有这种打算的。出于对艾登的义气，又为了要报答他的情义，他决不能现在就交给巴特勒，除非他在良心上感到自己不能再在首相的紧要工作上有效地为女王陛下服务了。这样作，并不需要他奔波或发表讲演——我的意思是说几周之内是不需要的。^②

丘吉尔曾经同我谈到我进医院动手术的问题，他极力劝我立即进行。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目前是支持得住的。

在进医院之前，我出席了一次内阁会议，在会上分析了形势，我们大家都觉得更有希望了。首相像往常一样地随便和人通电话，并且还接见来宾，阅读文件。据商定，索尔兹伯里应前往华盛顿，代表艾登出席美、法、英三国外长会议，设法不要让四国会议这个理想从此石沉大海。这样至少会保住一些势头，还可防止丘吉
518 尔的创议不致烟消云散。虽然“最高级”会谈是美国或法国所不能接受的，但却提出了在秋季召开一次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的建议。这无论如何不失为一个好结果。尽管如此，会议闭幕时发表的公报似乎

空洞无物，显然这是出于美国人的手笔，而且挂一漏万。距离丘吉尔想

①② 1953 年 7 月 2 日。

要举行的那种既无繁文缛节又无议程的四国首脑会谈的理想不知有多远。^①

在我住医院期间，有很多朋友来探望我，其中有H·亚历山大陆军元帅，他似乎相信丘吉尔一定会撑到秋季，届时他会避路让贤，以艾登自代。这一点我倒不是那么有把握。

如果到时候他觉得完全恢复了健康，他很可能决定干下去。显然这些次“中风”或“旧病复发”都是轻度的。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他第一次患中风，在身、心两方面都没有产生任何显著的影响。这一次他也很可能像上次一样的恢复健康。这主要将取决于他的意志以及他要干下去的决心有多大。此外，我还认为，这还要取决于他是否认为他所能希望探索和利用的外交形势有无可乘之机。^②

丘吉尔的健康有所好转，这为到医院来看我的斯温顿先生所证实。据他说，首相的心智从来没有真正衰退过。他的议事录和备忘录也从来没有这样生动而有力。另一个来访者马西格利主要谈到法国国民议会未必会批准欧洲防御共同体，只要还有希望同俄国会谈。俄国人是疯狂反对美国人的，他们认为美国人决心要打仗。这种担心究竟有几分是真，又有几分是宣传，那就很难讲了。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艾森豪威尔来参加会议是不容易的，参加一下签字仪式也许还可以办到。7月24日，我总算能出院回到苏塞克斯家里了。

关于内阁有意从丘吉尔的伟大讲演中所规定的路线走回头路的谣传，我听闻之下，深感担心：

无论如何，丘吉尔负有全责，而且政策是一致同意的。问题是，只有丘吉尔一人才能哄骗、威胁甚至强迫美国人去作他所希望的事情。由于他患病，这就办不到了，他也完全认识到这一点。^③

① 1953年7月16日。

② 1953年7月19日。

③ 1953年7月24日。

工党自然极力要散布流言说丘吉尔政策正在被放弃：

当然，要想在丘吉尔与政府的其他人员之间打进一个楔子，那是愚蠢的。一旦他不能去百慕大，那要想比在华盛顿以索尔兹伯里的出色手腕和不屈不挠的毅力所取得的更多有所获，也就没有机会了。可是，无论如何这却在议会和全国帮了社会主义者的大忙。幸亏，艾登与此完全无关。有趣的结果是，这必然将鼓励丘吉尔干下去。因为这位几乎使我们在上次大选中失败的“战争贩子”，现在却是一位能够为我们赢得下次大选的“和平缔造者”了。^①

在一般公众看来，要说索尔兹伯里勋爵在丘吉尔已经胜利在握的冷战中打败了一个战役，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很明显，俄国人要是合情合理的话，那么，在各国外长会议上作出一个开端原不会有什么困难。无论如何，索尔兹伯里说得清清楚楚：丘吉尔认为我们已经从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而这绝不是对他更为广泛的计划关门。

与此同时，

比弗布鲁克继续对索尔兹伯里（代理外交大臣）进行恶毒的攻击。索尔兹伯里去契克斯同丘吉尔一起度周末。跟着，丘吉尔就去法国南部住在比弗布鲁克那里（据说是如此）！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难以预卜的世界——大人物的生活！^②

但是，社会主义者们开始理解到他们的危险：

他们现在已经把丘吉尔捧为“和平天使”——他们已经使他超凡，即使还没有使他入圣。要是他终于恢复健康，或者更糟的是，要是他在“与俄国和解”的呼声中死去，那又将如何呢？^③

520 可是，议会现在就要休会了，很可能会有一个重新思考的机会。

在此后十四个月中，直到1954年10月改组政府时为止，占支配地位的是俄国问题和丘吉尔有无能力及是否愿意留任首相这

①②③ 1953年7月31日。

一对孪生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密切结合在一起。由于既忙于自己的事情，而提出复杂的新立法又有刻不容缓的需要，所以我只是偶尔到内阁去露一露面，而在私下讨论这场精采的戏剧性事件。我自己的某些计划，诸如增加房租法案，显而一定会受到像解散议会日期之类决定的影响。但是在头几个月里，主要的疑问是，丘吉尔能否坚守这个堡垒直到艾登销假。

8月初，我同艾登作了一次长谈。他刚从纽约回来，并且就要前往地中海地区度假。虽然这第三次手术的打击一定是很大的，但他除了体重有些减轻外，看起来已经复元了，风度依然如故，温文尔雅，潇洒风流。我也因为自己身体中所感染的那种病毒已经根除而感到庆幸。

丘吉尔恢复健康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艾登告诉我，近几周来他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

左腿仍然迈不开步；胳膊也没有好；嘴歪向一边，而且有时——虽然绝不是经常——口齿不清。他目前不能在公众场合露面；他可以利用无线电广播；但这样作会是冒风险的。^①

艾登自然急欲避免遭到任何阴谋策划的指责；于是，他在看过一、二个同僚之后，立即前往法国南部，然后乘坐游艇旅行。他在10月以前是不会回来的。下院领袖哈里·克鲁克香克对艾登和我都表示挂念。

……如果本届议会不顺利结束，而议员们又已经嗅到了布莱克普尔或苏 521
格兰高地的气味，我们就拖不下去了。在最近几周里，由于每天都有外交新危机，而首相和外交大臣又都在假，这种局面越来越成为不能容忍的。^②

当然，一切都以首相能否出席10月间举行的全党大会而定。

8月中旬，当我们大多数人正在暑期度假的时候，首相康复后

^{①②} 1953年8月4日。

的惊人精力及其伟大头脑的灵敏有着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8月8日，在议会已经休会之后，(政府)公布了十六国的声明，略谓中国或北朝鲜倘若破坏最近议定的停战协定则它们保证履行义务云云，结果爆发了一场大争论。因为无论是巴特勒或是索尔兹伯里，在停战的当时，都没有提到过这一点，所以政府被指责为不诚实。

《泰晤士报》在一篇文字臃肿装腔作势(而又愚蠢)的社论中已在攻击政府……^①

工党也跟着提出了一些类似的抗议。在我看，这未免有点滑稽可笑，因为其中的含义是这样：

巴特勒和索尔兹伯里，一个好斗成性，一个素有虐待狂，据认为是这两个人把和平缔造者神圣的温斯顿禁闭起来而窃据要津，篡取大权，为期虽短，而廉耻丧尽，自非轰下台去不可。^②

这时候丘吉尔突然出现于唐宁街：

……(像罗马皇帝泰比里厄斯从卡普里回来那样)，他口授了一份大肆挞伐的、典型的丘吉尔式的回答；追述了社会主义者的纪录和1952年2月的辩论(这件事我全都记得，因为我曾用过“是谁把手指放在扳机上”这一句嘲笑话来为政府解围，这使我在下院受到了我从未得到过的雷鸣般的欢呼)……在这次可怕的一阵排炮——除了《泰晤士报》仿佛完全若无其事外，包括《纪事报》在内的所有报纸，都认为是势不可挡的——之后，这位老首相反而比以前更加稳如泰山，而且在他的同僚们正短期度假的当口，他选定这个机会重振他的权威，重新表现出他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魄力。“从唐宁街十号发出的声明”这个辉煌的词句，使“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似乎黯然无光了。^③

522 在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再也不怀疑了，首相所以打算留任，不只是为了艾登保持这个最高领导权，而且是要把他曾经以他的惊人勇气所能集结的力量专心致志的那份计划付诸实施。

^{①②③} 1953年8月16日。

8月18日他主持了内阁会议，这是他自6月底以来参加的第一次。唐宁街上挤满了密集的群众，得知丘吉尔归来，无不感到高兴。他的气色很好，比我上次看到时要好得多。他当然是坐着，而且我们也没有看到他站立或走动；但是他却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妙语如珠。会议议程既冗长而又棘手，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显出疲倦的样子。不管各人对前途的看法如何不同，谁也不能不对他表示惊异和赞佩。

与此同时，在重新统一德国和签订对奥和约问题上，苏联和各盟国政府正一个劲进行着索然无味的照会往来。俄国氢弹爆炸是在8月20日正式公布的，但是，这项消息既早在意料之中，所以除了加剧世界日益陷于其中的可怕的危险外，对于舆论并没有多大影响。几天之后，俄国人拒绝参加关于对奥和约的会议。

在这令人抑郁的外交活动期间，索尔兹伯里把他为散发给各盟国而拟具的许多复文底稿拿给我过目，我也尽力给以帮助。在我看，我们的复文总应该是越简单越好。“没有什么比试图用公文往返来进行会议更糟的了”（用比德尔·史密斯的话来说）。^①麻烦的是，美国人——无疑是在杜勒斯指使之下——几乎总是喜欢用连篇累牍、反复争论而又往往满纸气势汹汹的尖锐反驳。

当所有这一切正在进行的时候，我同美国大使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有过一次晤谈，我同他已开始结成莫逆之交。他告诉我

总统对丘吉尔的友谊是如此的诚挚，以致一则由于他的健康情况、再则 523
由于他同英—美政策的明显背离而感深忧。总统认为5月11日的演说，尽管有其可取之处，却仍然是一个错误……^②

大使继续说，丘吉尔企图用私人通信的办法恢复旧有的丘吉尔—罗斯福关系，这使艾森豪威尔感到为难。我说，当然，罗斯福

① 1953年8月18日。

② 1953年8月19日。

像丘吉尔一样是一个艺术家兼政治家，而艾森豪威尔却两者都不是。然而，我同意，应该把首相与总统之间的这种非正式的通信办法，留供特殊情况下使用。像其他的東西一样，如果常用，就失去了它的价值。但是，我却坚持

美国政府不管是否喜欢5月11日的那篇讲演，却必须承认它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世界大事。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使我们的政策倒退到5月以前的停滞状态。丘吉尔已经打开了这座冰山。它已经移动了。我们必须学会在冰山之间航行。^①

尽管这样，在这个阶段上，首相自然无论如何是不能以原有的精力处理他的全部公务的。关于以艾登任副首相的想法，议论纷纷。顺便提一句，实际上在我国宪法中并无此一职。以丘吉尔和艾登高踞其上，外交大臣将会是怎样一个职务，也不容易看透。我同任何一个讨论这种想法的同僚都进行辩论，强烈反对这项计划。

8月25日举行了另一次内阁会议，首相再度精神抖擞地出场：

他口齿很清楚而且话讲得很机智，但并不太多；公事处理得很好；对于每一个人都温语相加。^②

从我的观点来说，我是极力赞成避免解散议会的，以便来年我可以实行我所提出的关于住房问题的立法。我特别不愿意放弃我的房租法案；但是难以看出在每人的租金都提高之后两、三个月，怎样再能解散议会。我还记得1929年的大选，当时在选举投票之前一、两周，所有的房地产估价已一律提高了。

在整个8月份中，公众对于大臣及其他人士走访契克斯的事
524 都很感兴趣，报纸上也充满了对丘吉尔意图的揣测。我个人觉得这未免有点小题大作。我认为他大概是烦闷，想同尽可能多的人见面谈一谈作为消遣解闷。

① 1953年8月19日。

② 1953年8月25日。

8月31日我奉召前往契克斯。

自从在他发病后一个星期左右我在查特韦尔同他进餐以后，还一直没有见到过他——除开两次内阁会议之外。但是在室外走动，却是一个更为严重的考验。他复元之快，委实令人惊奇。他步履稳健，虽然左腿还有点迈不开。胳膊似乎恢复了；面部一点没有或看不出什么中风的迹象。讲话和以往一样清楚……可是在另一方面，如果碰巧在他无戒备的时候，你从正面看他一下，他就显得是——事实上也本来是——一个老态龙钟的人了。^①

虽然我们谈到午夜以后才就寝，但所谈的只是些东拉西扯的事。改组政府的各种可能方案都讨论过，主要是由于某些年老的大臣希望退休，那也就牵涉到废除“领部大臣”制度的问题。

第二天我们单独作过一次深入的谈话，很坦率地探讨了各种可能。他温文尔雅，体贴入微而又富于同情心。经过一系列独白、多方探问和正常的讨论之后，我得到的明晰印象如下：

(甲)只要首相能“应付”得了本党大会和下院，他就打算照旧留任。所谓“应付”当然意味着他体力是否吃得消。他仍然是如他所说的“腿不大好”，但情况在改进中。如果他能保持我上次见到他以后所取得的那样的进步，他认为他是能那样作的。

(乙)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拖延他的任期而已(或者是他这样坚持表明、无疑也这样劝慰自己)。他认为他在未来六个月左右期间，可以对改善世界局势作出一些贡献，或许还可以作出极重大的贡献。

(这就意味着他要继续留任干下去，一直到1954年5月女王从访问澳洲回国时为止等等。)^②

艾登可以自行选择，或留任外交大臣，或出任副首相。我说，当然 525
这不是属于我范围以内的事，但是说老实话，我并不认为艾登出任副首相是一个妥当的计划。这简直会使外交大臣一职成为没法当

① 1953年8月31日。

② 1953年9月1日。

的职位。

我们相当详细地谈论了我急于完成的自己的任务；但是我清楚表明，在1954年5月之前，我无法使我的议案通过，并获得女王批准。

“那很好”，他嘟哝着。显然，1954年5月是他时时刻刻努力争取达到的日子。他将留任到1954年5月，等女王回国。

如果他的健康允许的话，那么，下一步他当然要争取撑到1954年秋季，或是1955年春季。^①

关于法国、德国和欧洲防御共同体等问题，我们也进行了饶有意味的讨论。他不相信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能签订下来，他正在考虑另一种代替办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件事都要以德国人为转移。

“俄国人唯一担心的就是德国的重新武装。”“是的”，我说道，“每个人都不难这样说。然而，这难道不就是说，这是我们必须打出的唯一的一张王牌吗？”他同意了。^②

接着，我们谈到艾森豪威尔。

我试图向他描绘我所习知的艾森豪威尔的形象。并使首相认清艾森豪威尔是决不愿意出席“高级”会议的。他并不相信他自己。他喜欢用正统的方法通过他的僚属来进行工作。在阿尔及尔的时候，我经常是同他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打交道，很少同艾克直接来往，虽然我的地位是一个内阁级的大臣。人们的工作方法各有不同。这就是他的工作方法，我认为这是一个精明的方法。

丘吉尔全盘同意。

“但是我也许要亲自去同马林科夫会谈。我要去俄国。我自愿去俄国一行。”^③

526 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难忘而动人的际会。他差不多是以父辈的

①②③ 1953年9月1日。

温情来待我的；然而，这也是一件令人神伤的事，因为他虽然把未来的打算描绘得那么生动、灿烂，但终究是夕阳无限好的黄昏景色了。

丘吉尔未来几周的计划无疑已经普遍传开了：

他去约克参加莱杰赛马。赛马终场后，他搭皇家专车去巴尔莫勒尔。女王的马跑赢的希望很大。果真如此，梅尔本勋爵一定在那里！^①

10月初艾登休假归来，3日参加了有全体大臣出席的内阁会议。在首相欢迎他返任视事之后，我们就谈公事。公事确实很多，有埃及、的里雅斯特、住房以及其他等等问题。我明白表示：如果我们要推行我的计划，至少在十八个月之内我们不应冒解散议会的风险。

其次一个重大事件是马加特会议。艾登同巴特勒都作了令人钦佩的讲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在会议的讲演和娱乐等活动中，令人兴奋的场面却集中在星期六的下午。丘吉尔怎样度过他这个严峻考验呢？

他的答复委实是冠冕堂皇。他用最出色的丘吉尔式语调讲了五十分钟。旁白和即席讲话都和往常一样精彩。他的声音似乎偶尔有点微弱，有一、两次有点接不上气。但是，这种现象每个人在发表长篇讲演时都是会有的。^②

总的说来，这位老人已经用他的道道地地的不屈不挠精神取得了又一次胜利；在会议大厅内外的听众几乎都为他的胜利而欢欣若狂。

另一次的考验是在议会开幕、首相在辩论中发表演说的时候：

〔他的〕11月3日的成就真是了不起。这是自5月11日以来他在下院发表的第一次讲演。他比在马加特时更大有信心。确实，他完全控

① 1953年9月1日。

② 1953年10月11日。

制住了自己和下院。要说在6月底因第二次中风而病倒的就是这个人，似乎令人难于置信。在夏季甚至在初秋时我也想不到他能这样。^①

在这期间，关于俄国，除了极力当心采用比较友好的措词来答复那些刺耳的、强争硬辩、有时肆意攻击的俄国通牒外，简直无事可作。11月初，在一份有十八页之多的“乌烟瘴气”的文件中，俄国人提出了用来解决德国问题的一系列根本办不到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这证实了丘吉尔的直觉是不错的：互换书面文件是无济于事的。要想取得任何进展，那就非靠不订议程的当面会谈不可。

丘吉尔现在期待百慕大会议的举行，会期已定于12月4日到8日，美国总统和法国总理都准备参加。他在健康良好的情况下前往百慕大，因出国前一天他受到下院各方面极其热烈的欢呼而兴高采烈。“这是祝愿他在百慕大万事如意。这是一种表示好感的典型的英国式姿态。”^②这次在艾登陪同下的旅行，难免有一次长途飞行和一番倦人的会议，以及在百慕大议长举行的宴会上的一次讲演。

幸运的是，由于11月27日俄国发表了另一个照会，空气大为改善。在这份最新的通牒中，苏联政府接受了西方国家历经夏、秋两季不断提出的举行四国会议的建议，并且表示柏林是一个适宜的地点。会期没有提出。为了保全面子，俄国人还补充说，他们将在会议上提出召开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国会议的问题。这最后一点是前此一直为盟国所拒绝，但是在它的新形式下未始不可予以接受的。苏中两国政府这么快就发生争吵，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不可思议的。

百慕大会议的主要成果是接受了苏联的提案，并建议把会期定于1月4日。其他方面就简直没有什么成就。同时，还公布了

① 1953年11月5日。

② 1953年12月1日。

其他两件好消息——的里雅斯特问题的最后解决以及英国同伊朗之间达成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这些协议构成了外交大臣的巨大胜利。在圣诞节第二天的休假期间,收到了苏联关于会期的答复,柏林会议就确定于1954年1月25日举行。虽然这将是一次外交部长级的会议而不是首相(总理)或国家元首的会议,但是丘吉尔因形势发展比较有利而大受鼓舞。

俄国的动机是不易揣测的。

我永远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接受前几次提出的举行四国会议的建议。如果他们的想法是打算阻止欧洲防务集团和德国重新武装,为什么他们以前不同意,反而发出一系列强争硬辩的答复——关于中国问题等等?朱立安·艾默里曾经与俄国代办有过几次晤谈,这位代办极力表白俄国人确实想要解决德国问题和原子弹问题。照我看来,西方国家地位所以软弱,就在于欧洲防务集团问题迄今仍未获得解决。俄国要就这个问题在法国政府与其他两个西方国家政府之间打进一个楔子,该是轻而易举的。俄国人要试一下这个显而易见的把戏。^①

现在普遍认为,在5月中旬女王于长期周游英联邦归来之后,丘吉尔就会呈请辞职。但是我自己认为他不会放弃同俄国进行有成果的谈判的希望。即使柏林会议失败,他也会加紧推行他自己的计划。在12月29日同他一起进餐时,我试图摸一摸他的底。他显然不会再参加一次大选运动了。尽管有帕默斯顿的先例,可是八十一岁的高龄究竟是不行了。他也不会

冒另一次失败的风险,所以他将在议会解散之前辞职。但是,只要他能干下去,他就要干下去,一个日期到期之后,总可以找一个新理由再推到将来的另一个日期。去年秋季他不得不留到艾登归来。现在他又必须留到他渡过埃及问题的难关。然后就是女王的回国。到明年夏季还会找到另外一个理由。这种做法是多么狡猾又是多么天真,总之是很能迷住

529

^① 1953年12月27日。

人的！当然，我不会是一个公正的评判员，因为他并不使我为难。他把心思都用在俄国和整个世界，对于我，只要成绩不错——事实上是不错的——他就不加追问。但对艾登就不一样了……①

我们的主要弱点至少在当时并不在于外交事务方面。每一个外交大臣都必定要受到当时首相的很大的关怀，甚至干预。我们的麻烦在于经济和内政的处理方面。我们有一批很干练的大臣，但是由于丘吉尔仍然苦于体力不济而最有权力的第二号人物又是外交大臣，所以我们就感到在国内事务方面我们一直是放任自流而没有制订任何确定的计划——既没有新的宗旨，也没有新的信念。我们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恢复和善后工作。我们现在似乎需要有一个新方案。这种情绪也许过分悲观。后来的两次大选可以证明人民对保守党的信心并不是降低而是提高。困难之一却在于内阁本身。上年纪的大臣太多了，需要新血液。年轻的党员照例盼望能够得到机会。但是这也都必须要等首相对他自己的前途作出决定才行。

柏林会议在1月25日开幕。经过情形已经由艾登详加描述了。②莫洛托夫态度非常消极，到2月18日所有欧洲问题都显然陷入僵局。德国问题没有解决，对奥和约没有任何希望。尽管如此，由于欧洲防务问题以及德国重新武装问题仍未解决，我倒觉得

莫洛托夫的蛮横比他装做温和，危险性反而要少得多。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中间势力已经相应地削弱。皮杜尔的声誉已经提高……③

虽则就西方问题来说，柏林会议以完全失败而告终，但东方却有较多进展的希望。业经商定在4月间举行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国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这体现了杜勒斯的让步和艾

① 1953年12月29日。

② 阿翁伯爵：《兜了一圈》，第53页。

③ 1954年2月20日。

登的成功。4月间，这个会议按期在日内瓦举行，一直持续到7月。艾登再一次表现了他的杰出的谈判能力，并且达成了一项协定，他把要点归纳如下：

结果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但是我们已经就在行将危及世界和平的当口，停止了八年的战争，并且减轻了国际紧张局势。这个成就是十分有价值的。现在，全都有赖于执行协议的精神了。^①

艾登在日内瓦会议上是个中心人物，在这整个漫长而曲折的讨论期间，丘吉尔和内阁都全力予以支持。各项讨论的进展及其能否成功都有赖于艾登的调度，这一事实更加清楚地说明了至少在1954年夏季决不会有政府更迭的问题发生。

在这几个月里我时常去见丘吉尔。有一次，我同他单独进餐，他态度非常亲切。他对于未来问题谈了很多，但对他自己的计划却举棋不定。他仍一心一意思虑着原子弹和氢弹以及其可能威胁人类前途的可怕的毁灭性武器。在外交大臣长期公出而日内瓦的讨论没完没了拖延的时候，丘吉尔开始越来越多地考虑到如何找出一种方法，去说服美国人同意与苏联领导人举行“高级”会谈。因急于要取得一些进展，他决定在6月初独自或在艾登陪同下再一次访问艾森豪威尔。他的同僚对于他要自己单独在彻韦尔勋爵（他现在尚未入阁）的陪同下出国，去完成一项几乎可以肯定要受到误会或曲解的使命这一想法，极为忧虑。如果日内瓦会议结束，也应该要艾登同去。如果还没有结束，丘吉尔的出访就应当延期。⁵³¹真正的麻烦当然是艾森豪威尔决心避免同丘吉尔单独会谈。他会坚持要杜勒斯在他的身边；由于这个原因，要艾登陪同首相前往似乎是很重要的。

6月中旬，在为欢迎澳大利亚总理拉布博士举行的宴会之后，首相把我带到内阁办公室。

^① 阿翁伯爵：《兜了一圈》，第142页。

他原打算在7月份辞职。但是，怀着执掌政权只不过再有几周的念头，他怎样能去同美国总统商谈呢？这会剥夺掉他的权威。可是，我们或许终于会达到一个高潮。在同总统会谈之后，他可能（在总统的赞同下）去会见马林科夫。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这样，他就宁愿等到9月底再办理移交了。^①

经过仔细考虑之后，我马上认为我应该对丘吉尔开诚布公。照我看，9月底可能是办理移交最坏的时间。于是，我在6月18日就给他写了以下一封信：

机密，亲启。

亲爱的首相：

星期三餐后您同我提起的那件事，我已详加思考。深蒙厚爱，寄以心腹，不胜感激之至。

但不能不向您坦率奉陈，照我的看法，如要在本年内组成新政府，则能使各大臣得在夏季休假之前而不是在休假之后履新，将有很大的好处。说实在的，我认为这是真正至关重要的。否则，我们将白白浪费掉两、三个月非常宝贵的时间。

当然，国际方面的发展可能会使上述考虑白费。这些应由您和安东尼裁夺。

我对自己的职位，殊不在意，此节自不待言。但是，如果有人要接管我的工作，那就越早越好。而且对全体来说，也是这样。我能为您服务并且得到您的支持和信任，不胜荣幸感激之至，谨再次布陈尊前。

532 我所能做的只此而已。

我已经尽了我的职责，因为我确知任何更多的拖延都可能给我们再度当选的机会以致命的损害。照目前的情形看，我们已经可能遇到足够的困难了。^②

我收到首相的一封简单的复函，但我也并没有心存奢望。如若他

① 1954年6月16日。

② 1954年6月18日。

真打算在此时退休，我确信我的意见是合适的。

虽然日内瓦会议还没有结束，但是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已经安排就绪，而且艾登也能够前往参加，尽管他还有其他公务在身。

出国的一行人在报界和人民的欢呼声中登上征途。丘吉尔为此感到高兴；但是，我认为艾登也在较小的程度上从民众的赞美声中得到鼓舞和力量。的确，他在星期三（6月23日）那次议会辩论开头和结尾时发表演说之后，他在国内的地位之高为前所未有。他得到了下院双方的慷慨支持。^①

不幸的是，显然杜勒斯的態度仍不友好，而我们两国之间的裂痕也开始有所发展。在远东问题上的分歧正在向其他方面扩展。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全都认为这次访问是明智的、及时的。

困难之一是美国政府软弱而欠老练。艾森豪威尔是豁达而高尚的人物，但他不是一个坚强的角色……共和党人上演了一场反麦卡锡的蹩脚戏。艾森豪威尔对待这个问题像查理二世对待泰特斯·奥茨一样——听任瘟疫自行蔓延。（但同时却造成了不少无辜的牺牲者。）^②

与此同时，尼赫鲁同周恩来在德里举行了一次更为不祥的会议。即使在日内瓦达成协议，显然还有必要在远东组织某种类似西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规定的那种防御体系。

虽然在华盛顿的会谈表面上是成功的，但是并没有取得什么积极的成果。总统一向是喜欢会见老朋友的。但是他从心眼里讨厌这些或其他任何会议。他喜欢退居幕后，等到必须采取最后决定的时候，才对一个拟定好了的方案表示赞成或反对。对探讨各种可能路线的预备性和细节上的讨论工作应一律委由僚属去办；至于各项结论批准与否之权则应保留在首脑们自己手里。在另一方面，首相却乐于搞这类事情。他总是喜欢下榻白宫，为他个人所受到的接待和尊敬而高兴。但是他一心希望在历史上不仅成为一

^{①②} 1954年6月25日。

个最伟大的战争大臣，而且还能成为一个最伟大的世界和平缔造者。所以，他考虑的就只是俄国；至于许多国家的外长所操心的其他一切问题，在他看几乎是不相干的。他在争取时间，因为他知道他必须随即对自己的前途作出明确的决定。他在6月初就已经告诉艾登他要在7月底退休。^① 为了访问美国，他才改变了主意。虽则信口说出一个9月的日期，但是保守党的总督导员现在好像认为他会留任到年底。无论如何，他也晓得，如果像他这样一位老人要想充当把人类从核战争恐怖中挽救出来的大救星的角色，他就难免——用他父亲的话来说——像是“一个迫不及待的老人”了。

艾登在这个时候很难指望同俄国人办成什么事。虽然在一定限度内他愿追随丘吉尔，但是他的内心却宁取以建设我们自己的力量为当务之急的政策。在他看来，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在解决欧洲防务问题上还没有取得成功。关于欧洲防务集团问题的讨论仍然拖延未决，在德国重新武装的问题上也还没有达成协议。他不得不从日内瓦的讨论中脱身出来前往华盛顿。日内瓦会议既在相当无望的情况下休会，那么这位外交大臣对于摆在眼前的一些迫切问题要比对于首相的梦想和抱负更加关心，也就不足为奇了。从华盛顿会议所能取得的唯一收获，也许就是在东南亚问题上有了同杜勒斯达成某种协议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会谈只是表明各种不同见解而在作出任何具体结论方面无所收获就毫不奇怪。

这两位英国首长乘船回国。在旅途中，丘吉尔不顾艾登的意愿和忠告，给莫洛托夫发出一份过分殷勤的电报，建议同马林科夫及其同僚举行一次私人会见。这份电报很清楚地表明美国并不牵涉在内。任何会谈只能以两国为基础来进行，至少在开始时如此；

^① 1954年6月5日。

但可能发展成为三国、以至四国会议。时间和地点问题还有待解决。电报又清楚地说，丘吉尔的目的是在发出任何正式邀请或提议之前要非正式地弄清楚俄国人的意见。艾登的本意是反对这样一种电报的，但是在船上他终于同意了。因此将它拍到伦敦转发。莫洛托夫的答复是热诚的；但是苏维埃主席团当时混乱的情况几乎也同不久以后的英国内阁不相上下。

[在俄国的答复中]有下一段话：

“我们觉得这样的个人接触会有助于[原文如此]实现更广泛的最高级会议，如果它[可以推想是指会议而言]能为关心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和平的各方所接受的话。”

这段话可以解释为指美国或红色中国或同时指中、美两国而言的。^①

由于船上有一点忙乱而伦敦方面对情况又不充分了解，这份重要电报竟在不曾征询内阁意见或关照之下就发出了。因此随即引起了某些麻烦是理所当然的。第一个疑问是关于艾森豪威尔总535统的。既没有磋商，也没有通知一下，在离开美国东道主不过三、两天的工夫就发给俄国这样一封电报，看上去丘吉尔是有点不诚实。可是，丘吉尔却有他的看法，而且倒也不无理由；据认为当他在华盛顿的时候，他已经表明了他的意图。

当他们讨论到这件事的时候，杜勒斯曾经说“你要做一个中间人？”“不”，丘吉尔回答道，“因为我晓得我是站在哪一边的。我愿意做个巡逻侦察兵。”不管怎样，艾森豪威尔总是说“你完全有权单独行动”。丘吉尔，据他自己说，答应去作一个“单独的朝香客”。但是，如果他失败了，决没有什么重大损失……如果他成功了，世界和平就会得以保全。不管怎样，他是“可以牺牲的”。^②

尽管有些阁员深表怀疑，我个人倒认为除了接受这个形势之

①② 1954年7月16日。

外，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也认为英国人民对于这种或其它任何可以导致“缓和紧张局势”的姿态都会是赞许的。由于杜勒斯明显的不妥协态度以及约瑟夫·麦卡锡和其余反共极端分子的古怪行径，甚至英国的温和舆论也越来越反美了。无论如何，除了把所发生的情况全盘通知总统，等候他的答复之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艾森豪威尔的答复收到了，它在语调和态度上都是豁达大度、冠冕堂皇的；但是他却明白表示对于这件突然的举动不承担任何责任。他对丘吉尔离开华盛顿才一两天就发出这份邀请，自然感到意外，并多少有点不快。“‘你一定是说干就干，不失时机地’云云。”^①

关于他去莫斯科朝香的拟议，丘吉尔本人也开始重新考虑了。为什么不去斯德哥尔摩或维也纳，甚至伯尔尼呢？他所要作的不过是开始他使徒的使命。两国会议必须导致三国会议或是包括法国在内的四国会议；他要提醒俄国人应该表示出一种明朗的有诚意的姿态——如果他们签订对奥和约，艾森豪威尔即使不参加谈判工作，也会到伦敦来签署这个和约的；这样，他的梦想就会实现了。所有这些都是动人的，但也说来可悲，因为我们心里明白，尽管我们十分敬爱我们的伟大领袖，他的生命现在已远远超越了六十三岁这个大关。固然在短时期内他的精神会健旺如昔，他的性格的坚强也不减当年，但是他已经不能胜任任何漫长或繁琐的谈判了。的确，除非我们十分当心，否则像这样的当面交锋是会产生悲剧性的结果的。

内阁中某些成员的这种焦虑一度似将引起严重的冲突。我竭尽全力来从中调停，我最有力的论据是：我们不能表现出反对丘吉尔召开最高级会议这一愿望的实质，更不能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这实在只是一个手续问题。我们现在该做的事是向他明说在日内

^① 1954年7月8日。

瓦会议结束之前不能举行会议，借此来争取时间，然后设法把会谈地点改到中立国去。丘吉尔立刻接受了这个见解；艾登现在回到日内瓦，已经同莫洛托夫会谈过，会谈情况也已报告了内阁。

[艾登]向他透露了丘吉尔不愿去莫斯科的意见。在日内瓦有了令人高兴的结局之后，去伯尔尼怎么样？日内瓦会议一定会有一个良好的结局。莫洛托夫似乎并没有过分激怒，虽然他说他们莫如在苏联某地举行。^①

艾登也提到了除伯尔尼外也在伦敦开会的可能性。如果是在伦敦举行，美国总统毕竟是会来的。

7月20日传来日内瓦会议成功结束的消息。其结果似乎比所希望的要令人满意得多。老挝和柬埔寨得到了分别保持非共产主义生活的机会。越南被分割——法国离开河内与越南北方——这对于天主教大家庭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是，他们维持不下去了，退出或撤退总比一次大屠杀要好。越南南方（包括全部交趾支那在内）仍然照旧——自由。但一般的预料是：除非在另一方面能树立起一个当地人物，那么在即将于两年之内举行的选举中，南方必然会投“民族主义者”或“共产党人”的票的。美国方面将“尊重”这项协定，虽然他们对这场争取 537 这项协议的斗争是袖手旁观的——全部的工作都落在艾登肩上。他一定是以非凡的耐心和技巧来进行工作。虽然早已有了一些“慕尼黑”的风言风语（无聊，因为两者毫不相干），可是我却认为艾登的声望和权威将大为提高。^②

在得到这个消息的前几天，丘吉尔找了我去，我们就时局作了一番长谈。他对于我那封谈到他所拟议的辞职日期的信，看来并没有不愉快。他用他特有的机智，把局面转变得有利于他。“如果日内瓦会议成功”，他大声说，“出访俄国就比较容易了。如果失败，出访就更有必要。”

① 1954年7月13日。

② 1954年7月20日。

首相是厚道的，对于我所讲的一些逆耳之言（我一有机会就讲！）并不以为忤，比如我曾说过，他对待他的内阁很不合适，像劳合·乔治和张伯伦一样；他应该告诉我们他的辞职日期，又说日期应该订在10月份举行本党大会之前。我所能找到的对付他的唯一方法就是用一大套打趣的话半逗笑似地说出我要说的话。^①

幸而局势由俄国人自己缓和下来了。7月24日，艾登打电话给我说。

由于向中国、英国、法国和美国发出了一份建议召开全欧各国会议的同文照会，一个完全新的局面出现了。这（尽管答复起来是左右为难的）虽然要破坏欧洲防务集团（并且最后要破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是它却造成一个完全新的结果……（用一句看来奇怪的自相矛盾的话来说）至少可有助于使英国内阁团结起来。^②

事实也将证明是这样的。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必须答复俄国的照会。一般地讲，这要花五、六个星期的时间，因为各盟国之间要进行磋商，并且互相交换复照的文本和草案。

俄国的照会既是宣传性的，也是毫无诚意的。延迟答复，至少拖延到法国国民议会关于欧洲防务集团问题的辩论结束之后，显然是明智的。但是马上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难题。在8月1日那天，我听说，莫洛托夫发来了一份复照，内容是他们

对于进行私人访问的念头并没有不友好的表示，并没有等待三国对俄国最近照会作出答复。绝口不谈地点——只谈到日期。^③

这难免要使人怀疑他们希望用这种策略来防止欧洲防务集团以及任何有效的欧洲军事组织的成立，包括德国重新武装在内，甚至借以搞垮阿登纳和他的外交政策。经过一番讨论之后，丘吉尔答复

① 1954年7月16日。

② 1954年7月24日。

③ 1954年8月1日。

说，莫洛托夫的电报是与他心里所想的计划不相适合的。他觉得俄国的新照会是

显然要暂时代替那个可以成为三国或四国最高会议序幕的小规模非正式会晤。^①

对于这一点，莫洛托夫答复道，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又指出了丘吉尔在7月间曾经提议过举行一次没有任何议程的非正式会议。对内阁充分信赖的丘吉尔，提议用下述这样的词句来答复：

我并不是想奉告，我对自己的原计划有任何改变。不过自您意外地重新提出（您在）柏林（提过）的建议后产生了新的局势，因在召开一个大型正式国际会议的同时又进行我所提出的二强首脑非正式会谈将是不可能的……接获您正式函件的英、美、法三国政府现正准备他们各自给您的答复……这些答复无疑将在本月内发出。为此我们不妨等到这事明朗之后再按当时情况重新研究我的计划。^②

这样就恢复了协调一致，至少在他的同僚之间。9月间，三国复照俄国的时候，照会的大意是：除非俄国同意签订对奥和约，并允许在德国全国举行自由选举，否则拒绝参加会议。

8月初，美国大使要求同我会见，看上去想获得消息比要供给 539 消息的心更要迫切。我告诉他丘吉尔的政策已得到举国一致的支持，并且告诉他，不管他听到了什么有关内阁分歧的谣传，那都是关于手续而不是关于实质的问题。同时这位大使重述了赫伯特·莫里森的一个有趣的评论，那是对于艾德礼和比万要访问莫斯科和北京——他们最近已经访问过了——所引起的批评的答复。莫里森的答复是“对呀！如今，大家不得不飞步前进，这才能显得比丘吉尔还左。”

在我短期休假归来之后，收到了邀我去查特韦尔的请柬。丘

^{①②} 1954年8月2日。

吉尔心情舒畅，和蔼可亲。在一直持续到将近下午四时的午餐席上，先就苏联政策，欧洲防务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阿登纳的地位，法国的混乱等等问题，漫谈了一通，然后才转入正题。他现在已下定决心不照他原来的计划在9月间辞职了。他提醒我说，我曾经提过反对意见，因为我认为要是在年底之前组成一个成功的政府，这日期就为时太晚了。因此，他明白表示，他打算能留任多久就留多久。他提出了一堆有利于这个计划的论据：

第一，他（世界上只有他一人）也许还能在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的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掌舵。他的地位是盖世无双的。他能够同铁幕内外的任何人对话，不管是用私人通信或者面谈的办法都无不可。因为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他不能放弃〔他的〕使命……第二，在议会届满时组成的一个“香烟屁股”政府是决不会成功的。像罗斯伯里勋爵和阿瑟·包尔弗那样杰出的人物，尽管他们有才华、有魅力，然而在他们该继任格拉德斯通和索尔兹伯里的时候，却被刷掉了。如果他（丘吉尔）能维持到大选，那对于艾登要好得多。不然，就在大选的前夕让艾登接任首相，倒也不失为聪明的办法。这一点可容以后再决定。第三，他是首相，只要他能够组成和控制一个政府并且得到下院的信任，那就无法把他赶下台。在议会休息室中和报纸上对于他辞职问题不断窃窃私议是不能容忍的。当然，这是由于他去年生病引起的。可是现在他已经康复了。自然，像任何一个年近八旬又曾经两次中风的老翁一样，随时他都可能辞别人世。但是他不愿意在任何非常时期死去，同时，他也不提出辞职。①

540 自然，所有这些话并不是有条有理、滔滔不绝、一口气讲出来的。其间有时停顿、有时提问，也有时沉思默想，并且在间隔中间，我也不得不适当地插几句话，激发他把心里的话和盘谈出来。当他逼我谈一谈我的看法时，我认为，把它很诚诚恳恳地、如实地谈出来才是正理。我说：

(1)没有理由设想国外问题是临时性的或者即将事过境迁；(2)关于“香

① 1954年8月24日。

烟屁股”政府一节，也有反面的论据。我们需要新动力和新套套。安东尼·艾登会给我们这两者。他就不行了。(3)既然他曾经向每一个人都一再谈过他打算在本年秋季辞职，那么，应该对这种广为传播(甚至普遍传播)的臆测负责的，正是他自己。今年夏季他曾经在艾伯特大厦举行的保守党妇女大会上发表过告别辞。但尤为重要的是，他在最近三、两个月里曾多次对安东尼说，他即将“办理移交”。起初他对他说在女王回国的时候，也就是5月份；后来他又说在7月份；最后在6月11日所写的信(我曾看过这封信)中，他明白无误地告诉艾登说他要在9月份辞去首相职务。不管怎样，他现在对艾登还有什么话说呢？^①

丘吉尔对这番话自然不大喜欢听，但是仍像往常一样总算对于我所讲的话还是持冷静和客客气气的态度。我曾经一度向他讲过我比他的某些同僚能对他谈得更坦率些。他长期以来把艾登像他的长子一样的看待，而且即使艾登病倒了，比我资格老的还大有人在。凡有大产业的人家，长子决不能对他的父亲谈论把产业交出来是否明智的问题，继承不到任何东西的幼子倒是应该承担起这541项任务，不管这项任务是怎样不讨人喜欢。我一向就是抱了这种精神同他讲话的，而他也已经认为这个比喻是不错的。

我现在再次问道：他曾经对艾登讲过些什么，这个新计划又是什么？原来还是：让艾登出任副首相，下院领袖，并负责“国内战线”，将由他在国内发言；控制党的机器；“计划”下次大选的程序。用商业上的话打比方说，他就像是一个执行董事，而丘吉尔则仍留任董事长。只要艾登同意这一点，一切就都会迎刃而解。我坦率地回答说，我认为这个决定对艾登会是一个严重的冲击。他多半是宁愿留任外交大臣。无论如何，我力劝他不要让问题拖下去，而要当机立断。我们实在必需在三两周之内做完我们所要做的事，以及解决如何计划我们的工作。丘吉尔对此表示同意，答应照

^① 1954年8月24日。

这个意见写一封信给艾登。

但是,必须解决的还不仅是首相一职的问题。政府已经不再能够完全有效地进行工作;大臣中有许多人不称职;没有一个协调的政策;内阁会议变得冗长而沉闷,并且还过于频繁。议会党团已感到不满,可能不久要分裂成许多派别和集团;整个党的机器要失掉控制。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对丘吉尔的意图一直琢磨不透所造成的。报纸上已公开加以讨论。

正在这个当口,这位年近八旬、对个人和政府的前途都打不定主意的首相,显示了一次他的魄力和气度,这也是我永志不忘的最珍视的往事之一。当时我正路过伦敦,他邀我到唐宁街共进午餐,但是因为管家在休假,我们就前往巴克俱乐部。

他那部大轿车,飘扬着五港大臣的旗帜;向人群点头微笑;他那帽子、雪茄和手杖——一个超级的风头人物。我们从圣·詹姆斯大街驱车去克利福德大街俱乐部,一路张口惊看的行人纷纷向他招手欢呼。

542 这次午餐是经过仔细挑选的,这道菜或那道菜,这种酒或那种酒也都是详加品选过的,对于一位八旬老翁来说,这顿饭是满不坏的了。有一打牡蛎,有奶油汤,鸡肉馅饼,外加香草和杨梅冰激凌。用法国莫塞尔葡萄酒和白兰地酒来消食。我怕我受用不了那个奶油汤和冰激凌。^①

他有两、三件重要但极其机密的事想同我商量一下。因为他没有带助听器,这就有些困难了。要是不商量一下,那么在等于是全体阁员的会议上,任何一点也都难以得到尽心竭智的讨论。餐后,巴特勒也参加进来了,只要有一、二个阁员——都是丘吉尔的老朋友,其中包括鲍勃·莱科克——设法不让外面人群太靠近这位主人,我们的谈话就比较容易进行。等到我们快要离开的时候,在俱乐部门外的克利福德大街上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

首相与财政大臣和住房大臣同车离开,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① 1954年9月14日。

“我认为我还不是完全处于‘借方’地位”，他笑呵呵地说。简直好像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我们打算。^①

丘吉尔现在开始同艾登(当他有可能的时候),巴特勒,有时也同我讨论在他领导下改组政府的各式各样计划。9月份尤其是10月份的大部分时间,艾登一心一意考虑的并不是他自己或丘吉尔的当前出处,而是分访欧洲各主要国家的首都,在欧洲防务集团遭到法国拒绝之后对建立西欧联盟一事进行商谈。

丘吉尔对我说,如果艾登能接受副首相职务,那我就可以去外交部。另一个办法是,如果艾登愿意留长外交部,就可以由我来照料包括经济事务在内的“国内战线”——这是一项不切实际的建议,因为财政大臣不能同意放弃他的传统责任。

看来我们最好努力应付保守党大会和议会会议而不要有任何更张。丘吉尔也许会在11月30日他的八旬大庆之后提出辞职。

隔了不久,伍尔顿勋爵通知我说:

543

曾经派由最有经验的人员作一次仔细的形势调查,每一个地区都作为一个工作点进行工作。其结果证实了盖洛普民意测验等等。目前在现政府主持下,举行一次大选将会引起一场选举上的灾难。选举结果的票差也许不大(像1945年那样),但却具有决定性作用。进一步的调查证实了这样的看法:除非政府全盘改组并另换一新首相,否则来年这种结果是无可避免的。^②

我问他是否打算把这种判断送呈首相。他说,是的,但是,凭着他的往常的机智,他是不会硬来的。这样作会导致党内的长期而痛苦的分裂,比一次大选失败还要糟。

现在又开始谈论调我去国防部的这个意见。由于艾登似乎推断我会喜欢担任这个职位,

① 1954年9月14日。

② 1954年9月22日。

我解释道,我认为这是一个要不得的主意。(1)那里无事可作,为今后三年制订的整个方案在一两天之前刚刚确定下来。(2)公众一定不是认为亚历山大勋爵搞得一团糟,让我去收拾残局;就是(3)认为我们对和平已不抱多大希望,而在拼命备战——或者这两种想法兼而有之。如果艾登要求留长外交部(这当然是他的权利,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只应听其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办法,而不应加以任何压力或影响),那末,我最好担任不管部大臣或类似这样的职务。①

艾登因有欧洲要务缠身,使他目前不能作任何决定;但是由于丘吉尔动辄就随随便便讨论这些问题,所以随着党大会开会日期临近,许多谣言也就不断流传开来。

544 内阁中领导成员现在的一般看法是,不管丘吉尔本人对自己的前途如何决定,政府必须有一次像组织新政府那样的大规模改组。在10月1日的内阁会议之后,丘吉尔问我是否同意这种意见,我说我同意,于是他就同我讨论了一些方案,都是以艾登是否接受副首相兼下院领袖为转移。他约略讲了一下他心里打算的一些主要任命。现任下院领袖克鲁克香克将调内政部。由我担任外交大臣。我的唯一问题是艾登是否同意。我补充说,我认为首相应当体会到计划经常变动对于艾登是多么痛苦。丘吉尔答称:

他必须极力劝说他。显而易见,[丘吉尔]已断然下定决心干下去,而不愿意考虑任何确定的退休日期。②

我的确认为这次拖延很久的政府内部危机必须解决,不然我们势必使彼此都心神不定。因而,我在10月2日给首相写了一封信,措词如下:

日昨承不弃,寄以腹心,曷胜铭感。我是否也可以对您推心置腹一谈呢?

① 1954年9月24日。

② 1954年10月1日。

我十分理解,目前要对政府进行比较彻底的变动是有困难的。但是,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艾登的职位问题。这是一个成败攸关的问题。

经过所有这一切意外之后,我希望您会认为有可能同他就办理移交的日期达成一个明确的安排了。

他必须知道这一点,并且让他在大选前能放手去作。否则,我恐怕我们现在就会失掉他,而在大选到来的时候,竞选也会遭到失败。

10月5日内阁会议开完后,丘吉尔把我留下来:

(他问我)信里最后一句话,“我们会失掉安东尼,竞选也会遭到失败”,是什么意思?我说,我认为他已完全听腻了,但对于前途,需要让他清楚知道。^①

然而,丘吉尔看来一点没有感到厌烦。他说日期会早一些而不是晚一些;但是他并不希望约束他自己。我回答说,我认为除了一个明确的计划外,别的都没有用。不然的话,在党内和报界继续不断的谣言煽动下,混乱的情况会持续下去。丘吉尔同意

政府改组一定要在下星期之内——议会开会之前——解决并予以公布。

[他]十分友好,但若有所思,差不多是沉思默虑。^②

我察觉我自己对某些事越来越急于解决。

被迫去做丘吉尔和艾登之间的调停人是一件特别讨厌的事情。我对他们两位都是具有深情的。如果我们不经长期争吵而把事情全部解决,那真是天大的好事。然而,为了党和国家以及为了我们悠久的友谊,这的确是十分重要的。^③

那一年的党员大会是在布莱克普尔举行的,而且进行得相当顺利。首相讲了一个多钟头的话,虽然偶尔有几句话说得结结巴巴的,但是靠了一些非常漂亮的旁白和即兴的穿插而弥补过去了。在我们回来的第二天,我被召到查特韦尔,我发现只有丘吉尔一个

^{①②③} 1954年10月5日。

人在那里。他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每一件事都照他的愿望解决了。他

留任首相，至于日期，却既没有书面也没有口头确定下来。艾登仍然在外交部；拉布很自然也很适当地留在财政部。法伊夫接替西蒙勋爵任大法官，还有少数其他更动；我被要求去“接替”哈里·克鲁克香克，充当掌玺大臣兼下院领袖，他则去担任内政部大臣。（因为他是我最老的朋友，这一点不大好办。）^①

我向他解释了我对取代克鲁克香克一事感到的为难，丘吉尔答应同这位执政党的议会领袖作进一步商量。现在，人事更动已经决定了，他急于想迅即付诸实行。

第二天(10月11日)，丘吉尔打电话给我，要我亲自去看克鲁克香克。我说，我愿意这样做，但是一切都必须取决于他是否愿意有这种变动。我真心不想去接替这样一位老友的位置。克鲁克香克对于他的看法十分了然。丘吉尔是必须走的，但是他不能“plus royaliste que le roi”〔比皇帝还保皇〕或是“que le prince de Galles”〔比威尔士亲王还保皇〕。但是他不希望任内政大臣，他也并不劝我去担任下院领袖。

除了现任首相或副首相之外，没有人能够执行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的下院领导任务。如果我们只是第四、五把手，那么无论是他还是我都办不到。所以最好是照他以前的老样子办下去，作为副官（过去是如此的）而不是作为指挥官。我马上说，这就解决了。^②

我于是打电话给丘吉尔，他仍然在查特韦尔，我说我不可能同意去接任克鲁克香克的位置。如果他叫我去国防部，我是愿意干的。我晓得艾登会喜欢这种安排，因为这会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布鲁塞尔条约等工作上给他一臂之助；这将会使克鲁克香克仍留

① 1954年10月10日。

② 1954年10月11日。

在他已取得出色成绩的那个职位上。丘吉尔似乎有点生气，但是我以他通常很快就会消气的这种想法，来聊以自慰。

在我们所有的其他急务之外，还要加上9、10两个月又是工业战线上令人心烦的月份。码头工人罢工，新闻界工人罢工，以及险些爆发的铁路工人罢工，相继发生。所有这些，蒙克顿都用他那种素来镇定自若的济世之才加以应付。但是，要决定我们的政策却须要召开许多次内阁会议，并设立各种内阁委员会。

首相对于这次新的人事安排似乎是满意的：

终于，每件事都解决了。（当然，一、两小时后也许又有新的问题出现）克鲁克香克留任下院领袖兼掌玺大臣。我调长国防部。蒙克顿同意留任，至少度过当年冬季。因此，劳合·乔治就能担任内政大臣兼威尔士事务大臣。（妙极了！）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将就任大法官。埃克尔斯主持教育部……桑兹管住房部，塞尔温·劳埃德出长供应部。^①

我对令人钦佩的住房部政务次官欧内斯特·马普尔斯的前途很关心。他将调养老事务部任政务次官。因为养老金法案将是下次议会会议的主要立法议题，这将是一个很有帮助的经历。 547

10月18日发表了新任大臣的全部名单。报界和公众一般所作的推论是，政府既然进行了这样大规模的改组，丘吉尔决不会像一般所想象的那么快辞职了。

同时，西蒙勋爵和亚历山大勋爵的退出内阁，使我们丧失了两位相处极好的同事。因为丘吉尔希望不让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离开下院，而西蒙勋爵既没有政治经验，又原本打算派他为大法官，所以这项调动是有充分理由的。陆军元帅泰然去职，毫无惋惜之意，而且当他（把国防部）移交给我的时候，因为摆脱掉他深感不安的政治漩涡中未来的一切纠缠，他看上去如释重负。一个主要的

^① 1954年10月12日。

而又严重的损失是奥利弗·利特尔顿的去职。他决心回去搞他的商业，他在这一方面早于战前就已经声誉卓著。尽管如此，他的弃官而去使我怅然若有所失。他是我相交最久的同窗老友之一。我曾目睹他如何历尽战争期间的大风大浪、人事沧桑以及所谓和平时代的令人寢寐难安的岁月而辛勤工作，不辞劳瘁。利特尔顿，能干而机智，忠心耿耿，性格异常坚强，在危难之际，尤其显得索尔不群。幸运的是，我同他的友谊历久而不渝。

一般公众对于新政府似乎是满意的，这从利特尔顿升为贵族而在奥尔德肖特举行的补缺选举中可以看出，这次选举在投票比数上没有丝毫变动。

两个政党似乎仍保持原样，既没有前进，也没有后退。这是个奇特的局面，甚至〔工党〕企图利用对“老年养老金”的不满似乎也并不很成功。^①

548 在利物浦的西德比区，就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的席位而言，我们的成绩甚至更好。其结果是

政府的一次巨大胜利，反对党则是一次大挫折。他们攻击过生活费问题；他们攻击过取消食物津贴问题；他们攻击过租金问题；他们也攻击过养老金问题——没有一样能够证明他们是胜利者。^②

在这里，在投票人数大大减少的情况下，保守党的多数却从一千七百零七票增加到二千五百零八票，

尽管存在有本来以为很危险的新房产问题。（或许因为终于有了自己的住房而要表示点感激之意吧！）这无疑对于希望赢得这一席位的社会主义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③

在国内政治方面，有一些特殊问题总是在小题大作，并且往往把它抬到不相称的重要地位。在这个时候，在需要增加养老金的问题

① 1954年10月30日。

②③ 1954年11月19日。

题上，人心非常激动。虽然这个部的大臣奥斯伯特·皮克完全控制住了局势，但是要准备一份立即可以付诸立法的全面方案，却不很容易。首相对这件事特别关心，并为求其解决而作出不断的努力。在很大的压力下，提案终于在12月1日准备就绪。我记得在讨论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事。该部大臣对于退休年龄问题大发议论。应该仍旧是六十五岁呢，还是应该提高到六十七岁？“我想，不是强制性的吧？”丘吉尔问道。回答是：“噢，一个人到了六十七八岁，实在不适合于工作了。”这时候，首相的面部表情实在精彩。

虽然我正在为设法从国防问题的迷途中寻找出路而忙得不可开交，丘吉尔却还是不断同我商谈他自己的前途问题。我现在看到他实际上作的是内阁之外的事。因为他主持防务委员会会议，并且凭着他无与伦比的知识和权威，在所有国防问题的讨论中，都起了主导作用。这将成为我的一种新经验，并且我真怕我认为他精力日衰的看法会得到证实。当我担任住房部大臣的时候，没有任何困难，因为他对于我的问题的细节不感兴趣，而且凡是我需要作的事情，他都给我以充分的真诚支持。但是，现在我在近便得多的地方观察他，不禁为他日益疲劳的样子而感到悲伤。

11月1日，他邀我单独同他进餐，讨论前途问题。到现在我⁵⁴⁹已经很习惯于开诚布公地同他讲话或写信了，这次我还是照样行事。我力图让他牢记这一事实：按照正常的惯例，议会不应该超过1955年底，那么，大选就必须在年内举行。既然照我的理解，他已经不准备在另一届议会中领导党的活动，那么由他的继任人来自由选择大选日期就至关重要了。也只有这样才是公正的，因为日期的选择可以说极其重要。事实上，大选只能在春季或秋季举行。对我来说，我很喜欢在春季举行，无论如何艾登总应该有选择的机会。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在1955年的头几个月中就职。虽然丘吉尔起初觉得他能够继续干到秋初，我却力主以听由新首相选择日

期为妥。在我看,春季是再好不过了。

我们应在12月和1月提出并通过养老金法案。然后(在2月10日左右联邦各总理一离开英国)丘吉尔就提出辞职;由艾登组织政府……并解散议会。^①

大选如能尽早举行,我们就会获得战略上主动、战术上攻人不备的有利条件,再加上人事变动所引起的兴奋和兴趣更会事半功倍。对艾登来说,这几个月不会是“落选议员”的月份;养老金法案会通过的,希望从国家预算中取得的好处就在眼前。我断言:“搞政治和搞恋爱一样,期待比满足还要好。”丘吉尔对于这些意见似乎很感兴趣,事实上也付诸实行了,所不同的是想把国家预算案在调换领导人之前提出来。

可是,在月底之前,报界就开始插手其事了:

550 关于早日解散议会的问题,报纸上议论纷纷。比弗布鲁克的报纸力主丘吉尔领导保守党进行另一次选举。与此同时,政府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②

议会于11月30日开会。这是配合丘吉尔八十寿辰而作出的安排,议会和国人自然是借以作为向他表示爱戴和敬佩的一个绝好的机会。

恰好在圣诞节前,在丘吉尔主持下举行了一次由主要大臣参加的会议,名义上是讨论大选的日期。这倒是个讨厌的场合,因为总避免不了要讨论由谁来领导党的问题。在这位老人的心中接下来将有一段时期是无所作为,难以决断的。他看上去作不出任何决定。那些对他感情最深也最为尊敬他的人们,则既不愿面对也同样不愿拖延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这一年就这样结束了;是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结束的,因为国

① 1954年11月1日。

② 1954年11月22日。

外依然波涛汹涌、局势险恶。11月13日，俄国又提议召开全欧各国会议，企图借以进一步阻止西欧联盟的批准。11月29日，英国正式答复，坚持在西欧联盟未成立之前不能举行会议。12月9日，俄国人以大量增加军备来对付他们所谓的“德国军国主义的崛起”相威胁。踵随斯大林逝世而来并鼓励了丘吉尔在1953年5月发表那篇演说的殷切厚望，看来即使不是终成泡影，也是暂时遭到破灭。虽然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泰国与菲律宾于9月在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但是印度和锡兰并没有参与这项努力。在远东，中国共产党人威胁着要进攻大陈、马祖、金门等沿岸岛屿上蒋介石的国民党人，而艾森豪威尔总统则认为有必要发表保卫台湾和琉球等岛以防止共产党进攻的正式声明。所以东、西两方局势的紧张看来仍有增无减。丘吉尔那种盖世无双的威望没有比现在更加需要的了；但是我却不能讳言，最近很多个月来，他已经不能胜任同那些顽固不化、目空一切 551 的对手进行任何严肃的讨论或谈判了。他可以诉诸人类的感情和迫切需要；然而对于这样一种呼吁看上去还是会被人充耳不闻的。为当前计，加强我们自己的力量仍然是头等重要的事。

在国内，我们遇到了铁路工人罢工的威胁，1月初旬已不得不作好各种应急的准备——在桑德林厄梅成立一个委员会，发布公告并召开议会。我以新职务的身份，不得不决定是否要取消军队休假。幸而总算侥幸成功；因为在讨论和争辩了几个小时后，1月6日午夜终于决定对最低工资收入的铁路工人每周增加工资六先令而解决了这一工潮。这次让步自然受到了《泰晤士报》、《经济学家》周刊以及《曼彻斯特卫报》的攻击，它们对于这个看来是一个很坏的先例深为震惊。无论如何，这是让这些人分享国家日益增长的繁荣的一个好例子。真正令人不安的倒是我们在这次谈判中有受人讹诈的那种感觉。同时，我也并不认为应该完全归咎于某一

方面。

与旧日的铁路总经理处(詹姆士·米尔恩爵士公司)相比较,运输业委员会是机构臃肿而且官僚主义十足的。谈判总是整月整月地拖下去,而情况并不因委员会有如此多的委员是前工会领袖,是由偷猎者变成的猎场看守人而得到改善。^①

整个国民经济在沉重压力下正开始下降,不久就会有采取某种限制措施的必要了。这就是实行“收一下,放一下”的温和方式的一个例子;由于巴特勒及时地采取了必要的步骤,结果证明了是不错的,并且避免了任何严重危机的发生。我一定不忘记吸取这个教训。

1月7日,我应邀去见丘吉尔。我不得不与他讨论一些他所特别关心的国防问题。在整个进餐过程中,他是很有风趣的。他的一位私人秘书提到某人在他的那个部里很得人心。丘吉尔马上回答说:“那就意味着他不让部下作什么事,让他们早下班并为他们搞得一塌糊涂的事情打掩护。还是给我从军界里找一个不得人心的人吧。”现在他开始谈论大选问题了,我觉得他是在挑逗人,希望人家提相反的意见。由于艾登要在2月底出国参加马尼拉会议,然后再去印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无论如何,在3月底以前是谈不上改组政府了。

过了一天,莫兰勋爵和夫人同其他人到白桦林我们家作客,共进午餐。莫兰开始谈论丘吉尔的健康和他的工作能力。我觉得最好还是开诚相见,于是我就告诉他,由于我对首相的爱戴和忠诚,所以我盼望他能信守等艾登回国就办理移交的计划。如果莫兰把这次谈话内容告诉丘吉尔,这对丘吉尔也不是什么新闻了。因为这正是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断向他提出的口头和书面忠告。

可是,每次访问丘吉尔,都是一件愉快的事。例如,我记得在

^① 1955年1月7日。

这段期间有一天一大早他就用紧急通知召我去见他。他在床上，有一只绿色小鸚鵡站在他的头上。他床上放着鸟笼，手里夹着雪茄，身旁有一杯威士忌苏打水，这只小鸟不时去喂几口，然后开始在室内盘旋飞翔，有时落在我的肩上，有时落在首相的头上，在整个这段期间历史学家吉朋式的言语从这位名音乐家的嘴里滔滔而出，谈的是炸弹——这种人类前所未有的最可怕、最具有毁灭性的武器。这只小鸟不时像美国女演员一样用嘎音吐出几个字，又不时去喂一口威士忌。真是奇妙而难忘的一幕。

1月份的几个星期过去了，国外形势并没有改善。到月底，周恩来声明了他要“解放”台湾的决心。艾森豪威尔总统立即要求国会授予使用美国武装力量以确保和防卫台湾和琉球诸岛的权力，两院都通过决议，授权总统采取行动。自然，我们除开一般的关心之外，对香港的特殊危险总是时刻放心不下。我们可以希望美国的帮助，但是我们从痛苦的经验中知道香港的军事地位是多么难以防守。确实幸运的是，在这个月底开始举行的英联邦会议上，出席的各方一致同意了外交大臣即将采取的方针。唯一鼓舞人心的迹象似乎是在莫斯科，因为很清楚，俄国人显然不希望在远东发生一场一发而无法约束的战争。

实则，莫斯科和伦敦都正在（多少有点荒谬地）沿着相同的路线努力，并且正在设法约束各自的朋友。^①

美国决定帮助中国国民党军队撤出大陈这个争执中的岛屿之一。这就把没有多大军事意义但具有相当心理上价值的金门和马祖留置下来了。这两个岛在今后很多年都将不断成为一个令人烦心的问题。虽然我们对总统的决心并不全盘同意，但是他就我们所提也同样撤出这些岛屿、而只在台湾和琉球群岛坚持到底的建议所作的答复，却无疑是一份有力量、有论据、有说服力的文件。

^① 1955年1月31日。

他的理由是：(1)如果国民党人士气败坏，台湾就可能在他们手里丢掉；如果中国人发动进攻而蒋的内部崩溃，它就是一个没有用处的防卫工具。(2)只要中国人和共产党人再前进一步，整个东南亚就会受到影响。(3)这可能是另一幕慕尼黑——但是，甚至希特勒在慕尼黑还许诺不再进行进一步的侵略。固然，他事实上并没有信守诺言。但是，中国人却断然拒绝作出任何这样的保证。^①

554 在这次危机中，一个鼓舞人心的方面是，尼赫鲁从头到尾都是友好的、帮忙的。整个英国人民既不了解这个问题，也似乎没有为之过分惊慌。无疑，联邦各总理的出席会议是有稳定作用的。这是丘吉尔最后一次主持这样的会议。如果说这是他唱出的临终之歌（天鹅曲），那末它的调子肯定是高昂的。

2月初，从俄国传来了戏剧性的消息：

本星期最激动人心的大事就是马林科夫的垮台。这种典型的俄国事件是以照例闹剧般的效果上演的。马林科夫已经下台了。但是为什么他没有被枪决？因为他是赫鲁晓夫的连襟吗？真是人性难移！真是堕入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对，也许他会要被枪决的——在以后。目前，他已经奉派担任燃料和动力部部长！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些什么把戏？

马林科夫承认他有罪。他忽视了农业。但是，他与农业根本不相干。那是赫鲁晓夫的职掌，赫鲁晓夫现在却继承了这个大老板的位置。全都是古怪而又古怪的事！^②

在当时，我对这些变化的真正含义以及怎样产生这些变化，都不够了解。我从来也没想到我已注定要在两、三年内同赫鲁晓夫发生密切接触。其重大意义当然是：这种不流血而更换领导的能力，表明了斯大林统治方式的告终。虽然赫鲁晓夫像斯大林一样当上党的总书记，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作为部长会议主席的布尔加宁毫

^① 1955年1月31日。

^② 1955年2月11日。

无实权),可是他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效法斯大林那种以残酷手段对付敌人或竞争者的作风。

在这段时期,国防部的工作使我常常与丘吉尔接触。我觉得他确实是甘愿退休了,因而他无论在内阁会议上或私人谈话中,心情都是轻松愉快的。当然,偶尔也有反复,例如,当巴特勒为了对付一个银根有点吃紧的局面而不得不采取财政措施的时候就是如此。虽然这些措施都是极其温和的——银行利息提高一厘,分期付款购货办法作了一些修改——而首相却自认为“鉴于财政危 555 机,他不能离开这艘正在下沉的船。”^①

但是当2月26日我在查特韦尔见他的时候,他心情非常愉快,态度和蔼可亲,像父亲般的慈祥。他急欲以首相身份去支持这次的预算案,但我对他说在3月底之前提出,会不难布置一切的。

[首相]说,他心想在4月5日提出辞呈。应当留一天待女王批准,以保全王权的现实性——他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②

其余则讨论到在即将到来的国防问题辩论时准备发表的讲演。

在这次辩论结束之前,他忍不住插进了这样一段话:

他站了起来,开始对我们谈出他想要同俄国人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的内幕。我坐在他身旁的议席上,急得浑身发颤,不晓得他要讲些什么。……他一上来先讲他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总统的满心不情愿;接着讲到他自己的病——“我病倒了,瘫痪了。”他用一个极感人的姿势用他的左臂、左肘和左腿显示“中风”的样子。下院鸦雀无声。然后他讲到[去年]夏季的经过。我在想,他最后怎样结束呢?所有这些话都是“脱口而出的”……。我们可以接下去谈一谈[国内的各种困难]吗?不,他很成功地滑过了这些陷阱。是俄国人的不妥协和反对欧洲防务集团才使他不得不等待。现在我们必须一直等到伦敦—巴黎协定批准之后

① 1955年2月25日。

② 1955年2月26日。

再说。^①

这是我在下院见到过的最紧张的场面之一。虽则说丘吉尔露出了一些老年人的弱点,但是他并没有丧失他壮年的勇气,而且还增添了一些更加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东西——一个明知自己当权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而又渴望为世界安全和幸福作出他最后贡献的人的那种至诚之心。

556 现在开始发生了一种以报业罢工方式出现的稀奇古怪而又臆想不到的复杂情况,影响所及,就一般公众来说,凡凭靠首都报纸得到消息的人都陷于半黑暗状态。3月26日,全伦敦的日报和星期日报,连同它们的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版都停刊了。这次纠纷直到4月21日才得到解决。所以,在丘吉尔终于辞职以及政府办理移交这一整段时间,公众竟没有机会读到对他的丰功伟绩的全部歌颂之词,否则,他们是不会看不到的。全世界的所有报纸都刊登丘吉尔了不起的功绩和无与伦比的贡献。这对于一个不仅是我们最伟大的政治家而且也是我们最杰出的作家和新闻记者的这样一位人物,可以说是一件痛心的不幸之事。

4月4日首相举行了一次宴会,女王御驾亲临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因为在来宾中,他的阁僚寥寥无几,所以我得以应邀恭临其盛,不禁感到万分光荣。

现在他真的决定去职了,我们全都感到怅然若失!

可庆幸的是,我们将会忘掉最近的那三、两个月(这几个月一直是度日如年、伤透脑筋的,特别是对于艾登),而对这位盖世无双的人物的伟大和崇高将会永志不忘。^②

宴会后,首相打破一切先例,发表了祝贺女王健康的演说。

在发表之前,丘吉尔曾把底稿交给我看,事后又给了我一份复

① 1955年3月2日。

② 1955年4月4日。

印本。其内容如下：

兹谨不揣冒昧，举杯向陛下祝酒。忆昔在陛下高祖母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充任骑兵尉官时曾常常享此殊荣，在此之后五朝的君主治下，曾在政府和议会服务，据此窃以为恳求陛下恩准我举杯祝酒，该不致于开创一常常会引起不便的先例吧。

陛下，我愿借此机会表达一下我们以及陛下的所有臣民对陛下和爱丁堡公爵殿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给予的帮助与鼓舞所怀的感戴之诚，而这种感戴之诚正以日益加剧的雷霆之势磅礴于整个英国、英联邦和英帝国。

我们对于这种感戴之诚的需要，莫过于我们正要渡过并希望帮助全 557 世界渡过的这个使人焦虑不安、日益暗淡的时代了。

履行不列颠帝国所肩负的这种庄严责任的矢贞矢忠、尽心竭力，也莫过于在陛下御宇这个光辉灿烂的时代了。我们感谢上帝对我们的恩赐，谨再信誓，愿为这个神圣事业和以春秋正盛的陛下作为干城的这种贤明仁厚的生活方式而献身。

女王在答辞中说：她也愿意做一点历代先王之中没有几位有机会作的事情，来举杯祝她的首相健康。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是一个举世无双的人物一生事业的恰当结束。

在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上，首相的告别辞是热情洋溢、亲切备至的。他看来未被任何最近发生的困难所烦扰。艾登代表我们全体致答辞。然后我们鱼贯登楼，照惯例在大客厅里摄影留念。

在当天——4月5日——的晚上，丘吉尔觐见女王，4月6日中午女王召见艾登。当下院开会时，艾德礼发表了一篇漂亮而风趣的演说，尽情歌颂了我们历史上这位最伟大的英国人。在祝贺艾登时，他谈到了那个家喻户晓的梅尔本的掌故，当梅尔本接任首相而感到踌躇的时候，他得到了下面这些话的鼓励：

咳！该死，从来没有哪一个希腊人或罗马人担任过这样的职位，但

要是当上英国首相,那怕只有三个月也是值得的。

不管新政府以及可能举行的大选多么令人兴奋,在丘吉尔离职后,生活却不知怎样似乎非常平淡乏味。虽则最后那段时期曾经是度日如年,而且常常是痛苦的,然而这种回忆却随即一扫而光。当亲爱的父、母或朋友的逝世终于来临的时候,最后年月里的缺点、痛苦或衰败全都忘得一干二净,而马上回想到他伟大的岁月、高尚的品德和光辉的人格。对丘吉尔的情形正是这样。我们所怀念的是他的鼎盛时期而不是他的衰退年月。虽然他又继续活
558 了好多年,而1955年4月5日这一天却成为他政治生命结束的标志。所有琐屑的小事和烦恼都已烟消云散。我们记得的只是这个人的力量和光辉。我们也记得他那种说不尽的温文尔雅、倜傥风流,他那种在冗长而厌人的议会辩论之后大有妙用的令人忘倦的微笑或鼓励人心的话语。我们回忆他事业的鼎盛年代——1940年到1945年。今天我们面对我们的新任务,我们意识到的是我们责任的重大,而不是兴高采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再也碰不到像他这样的人了。

有些人评论说,丘吉尔从政的最后十年是失败的,无助于他的声誉;另外一些人则过甚其辞地说,他本来应该在1945年大选之前——一生事业的顶峰时——就急流勇退。对于这种多少有点抑郁的论断,答复是简单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要是不经过一场斗争就要他放弃他的职务,那是完全不合乎他的性格的。在一场大选中失败之后告退,对他来说,就更加不合情理了。他是一个天生的战士,禀赋的英勇刚毅是无与伦比的。何况,这十年也绝非虚度。在某些方面,这十年收获之丰,正不亚于他一生中的任何一个时期。其间有1946年的富尔顿讲演,因此而导致西方和民主国家结成反对日益增涨的俄国侵略威胁的阵线。他奠定了欧洲运动,使欧洲得以复兴;如果说他的计划并没有全盘实现,那也丝毫

无损于他的眼光远大和慧眼独具。没有哪一个卸了任的大臣在外交政策上有过这样的影响。同时，当保守党处于反对党地位时，他给了该党以新的生命和动力。由于他一生中最大推动力之一的对他的父亲的怀念，激励他把他的影响力都投到支持进步的保守主义的发展方面。

在他最后一次执政的四年中，他把这个国家的经济从 1951 年底所降到的低水平带到一个高度的经济复兴阶段。他的“工作，食物，住宅”这一得意的口号，体现出一个真正的信念，认为这些才是人民的主要需要。他的诺言都不折不扣地实现了。由于没有过度的通货膨胀而保持了充分就业；历经各届工党政府相延下来的配 559 给制度废除了；住房建筑规模之大是最善意的评论家都认为无法办到的。同时，他在许多艰巨而复杂的谈判中给予他的外交大臣以支持，其中有一些使许多困难问题得到了最后的结果，而所有这些都是有助于普遍和平的。他最后的贡献是想要实现他的这样一个理想：铁板一块的苏联本身会随着事态的发展与时间的流逝而不可避免地要起变化。虽然他不能看到他的梦想的实现，但无论如何他是把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带上了他们后来一直走下去的那条大道。不仅仅“和平共处”，而且某种真正的缓和已经由步随他所开辟的路标前进的人们付诸实现了。

第十七章 核阴影

560 从1954年10月到1955年4月，我在国防部的这段时期，多少有点劳而无功。据我所得悉的丘吉尔的意图，我知道我担任这个职务是不大会超过三、两个月的。这使我想起了1954年夏季我在所谓“看守”政府内担任空军部国务大臣时所处的地位。然而要做的事情却是不少。

我很快就明白，国防部与住房部是怎样地大不相同了。

我的这个新部是一种奇怪的职务。我没有实权，但却事事都要负责——特别是如果出了差错的时候。首相总是忙于国防事务——每星期三，国防委员会在他主持下开会几达六小时之久。（实则，有二十分钟的工夫就足可办完。）当我要求召开一个由陆、海、空三军大臣参加的小型会议时，出席的人数竟达四、五十之多！^①

这个部的根本缺陷，我很快就清楚了。总之，不到两个星期，蒙哥马利勋爵来访，他的话是像往常一样地令人神清气爽、令人鼓舞的。

当然他已经看出我们国防机构的真正缺点。国防大臣无权，而三军的参谋长需要有一个专职的总头头。但是，不通过立法手续，这一切都是改变不了的。我不能不靠自己手里的这个工具尽力而为。^②

561 国防大臣这个头衔从1940年5月以来一直是丘吉尔担任的；但他是一个无部的大臣。他满足于一个在伊斯梅勋爵领导下工作的“设计人员”小组。战时，首相可以在战略决策，有时甚至在战术

① 1954年10月29日。

② 1954年11月8日。

决定方面起主导作用。总之,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丘吉尔以其无与伦比的丰富经验,通过陆海空三军的职业首脑来执行他的任务,几乎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海军第一大臣、帝国总参谋长和空军参谋长差不多天天和他碰头,一切重要决定都是由这个小组做出,而陆海空三部的大臣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再者,首相以大部分时间(虽然不是全部时间)专心致志于研究战争的种种需要。国内许多方面的重要事务则由枢密院院长或其他大臣主持的委员会来管理。

战争结束之后,一种比较正常的制度恢复了。同时根据议会的法令设置了国防部。阿·弗·亚历山大——后来的亚历山大勋爵“是为我们主管合作社的那一位亚历山大,不是曾为我们打过胜仗的那一位(亚历山大)”,用丘吉尔打趣的口吻来说——被任命为国防大臣,并建立一个正规的部来协助他的工作。尽管如此,陆海空三部大臣的宪法责任,不管是法定的还是依惯例的,都仍然未变。国防大臣的权力与(陆海空军)各部大臣和国务大臣的权力之间并没有明确界限,亚历山大任内如此,其后任任内也是如此。他们是同级关系呢,还是上下级关系,并不明确。当然,每个人都声称他们是完全独立的,因为他们各有其向议会负责的报告官,各有其法定的职责。国防大臣是“一个协调三军工作的人,不是三军的首脑。”

首相在和平时期的地位也不完全明确。国防委员会是这时议会和公众得到正式通知的唯一内阁委员会,但无固定成员,也无固定职权。当然,丘吉尔对主要问题,是有个人兴趣的,而且几乎是满腔热情的。然而在国防委员会召开会议时,陆海空三部大臣都正式出席,各有其参谋长随同,国防大臣的地位则变得有点模糊不清了。在正常的讨论过程中,主持会议的首相自然要征询三军各部大臣或海陆空三军的有关将领们的看法或意见。因此,权限虽

562 名义上归属于国防大臣，而实权却仍然掌握在陆海空三部大臣及其军事顾问的手里，除非国防大臣由首相兼任。后来我担任首相时才决定一改这种制度的固有缺陷。我采取了许多试验性质的措施，而总是遇到强烈的、有时是动感情的抵制。差不多直到我首相任期届满时，才能在桑尼克罗夫特和蒙巴顿勋爵的帮助下实现了这整个机构的改组，从而建立起三军的真正统一，无论如何就最上层而言是如此。

在这期间，我不得不用这个可供利用的工具来进行工作。国防部常务次官帕克爵士是位有经验的行政官，似乎很明白这些困难和反常现象。副次官鲍威尔爵士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人。他后来晋升到文官的最高职位，退休后，在金融界和工业界声名卓著。首席军事顾问布朗约翰将军是一位普遍得人欢心的人，并且是一位谈判能手。我从住房部调开，是多少有点令人诧异的事，在该部，我们只需避开财政部的耳目，就可以全权掌管自己的事务。我现在却发觉自己只享有一种不明确的权力。在我上面有对战争理论和实践或许比当代任何人都懂得更多的首相，在我下面和名义上受我指导的，是强有力的陆海空军三个部，各部都各有其固有的悠久传统，并且因取得了历史上最伟大战争的胜利战果而加强了它们的地位。此外，还有几个其他有关的部。最重要的是供应部，负责供应大部分国防所依靠的重要军需。还有我们搞民防组织要与之打交道的内政部以及关于调用人力和兵役期限问题要与之打交道的劳工部。我得到科学顾问弗雷德里克·布伦德里特爵士的主要支持。他既有渊博的知识，又有朴素的幽默感。我回想起11月底讨论更换一种特殊而重要武器时的情况。这个问题的讨论持续了四年；但要做好这种更换工作起码还需五、六年的时间。既然对于更换的目的好像谁也不甚了然，所以在召开了一次有许多人参加的漫长会议之后，我们决定建议根本推翻原议。弗里德里克爵士后

来到我这里，满口祝贺，说这几乎是他到国防部任职以来所知道的第一个决定。

但是，我当前的任务与其说是在于技术领域，倒不如说是在于外交领域。要回忆那些年月的心情，就是现在也是困难的。旧日战时联盟的解体和俄国的威胁使专家以及业余人员的考虑都集中在建立欧洲防御组织的需要以及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承认：任何较大战争的爆发都将不可避免地以东、西两大国之间的核较量为先导或偕以俱来。因此，迅速解决欧洲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贡献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最近总算靠了艾登的努力把问题解决了，但仍有待于正式批准。因此也迫切需要德国的重新武装。同等重要的是，需确保业经恢复了经济繁荣的德国公平合理地分担一部分(欧洲)防务费用。

因此，我接受任命的第四天，就得到指示，要我去巴黎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议。在这个组织里，各国外交部长是各国的首席代表，并由他们组成主持会议的委员会。但也希望各国国防部长出席，并让他们起适当的作用。

这是我头一次从事新的外交活动。我同帕克爵士和私人秘书一到达巴黎，立即驱车前往大使馆。驻法大使杰布爵士以殷勤待客、手腕老练这种出色的兼长主持馆务。我在大使馆里遇到了艾登，得机祝贺他在前一天荣获女王颁赐的嘉德勋章。他在防务问题的令人不安的矛盾中保全了欧洲的团结，嘉德勋章正是他的努力所应得的奖励。除开萨尔的归属问题^①，现在一切都已获得解决。法国自然以萨尔问题作为一个机会，施行其讨价还价⁵⁶⁴之能事。但是，如果这个困难一克服，那就只需要正式签署证书、

^① 自从德国战败以来，法国就已经对萨尔负起全部责任了，虽然在1950年法国同萨尔签订的一项协定，已经给予萨尔人以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自主权，只待和约作最后解决。萨尔的各矿由法国经营管理，并且双方成立了经济联营。

声明、议定书、决议和条约了。

照例有大量的文件审拟工作——但这不用我操心！现在，别人也不用烦心了，如果萨尔问题得到解决的话。这却是问题的所在。我们在马提贡饭店午宴——是孟戴斯-弗朗斯举行的招待会。有许多老朋友在座——马西格利、帕罗迪（外交部长）、马热里（政治顾问）。我坐在伯什先生（卢森堡人）——一位伟大的人物的旁边。^①

大家都好像相当激动，而我们的主人孟戴斯-弗朗斯来得非常迟，因为刚刚和他的同僚开了一次拖延时间的会议：

根据不晓得是有意还是无意透露出来的消息，（法国）内阁正采取一条极强硬的路线。如果法国在萨尔问题上得不到满足，他们就要破坏整个西欧联盟组织、德国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协议，以及其他一切。这一些话究竟有几分是认真的，又有几分是虚张声势的，倒很难说。^②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领教法国的外交方法，也不是最后一次。看来阿尔及尔和巴黎是没有多大差别的。

我们后来去参加在夏乐宫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正式会议。开会时间名义上宣布为三点一刻，而到四点才开始。这些新的国际集会给我的印象是非常莫名其妙的。无论如何，就仿佛是飞蛾扑火一样扑向这只国际蜡烛的人数来说，维也纳会议和凡尔赛会议无疑不是完全不相似的。首先开九国会议^③，是在一个比较小的房间里举行的，大约只有一百人参加。必要的正式决议通过了，一批文件签署了。我们接着去到一个大得多的大厅里：

565 在这儿，十四国外交部长齐集在一个有看台的矩形会场四周。在场的有十四国国防部长和大约三、四百名其他人员——专家和顾问，还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处官员，其中帕格·伊斯梅^④像以往一样地春风

①②，1954年10月22日。

③ 参阅本卷原书第482页。

④ 陆军将军伊斯梅勋爵是1952—1957年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秘书长。

满面，和蔼可亲。斯蒂芬奥波洛斯先生是这一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轮值的主席。他看来两耳不聪，双目不明，而又非常神经质，这就势必要拖长会议的进程了。

为了起草决议和准备公报，照例要暂时休会。但一切都一帆风顺。尽管进展缓慢又闷热逼人，然而这仍不失为一次令人难忘的仪式，尤其是由于阿登纳博士和其他德国人却以观察员（虽则还不是以成员国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以及萨尔问题有关国家的人员和与之无直接关系的人员就协议、建议和反建议进行了幕后谈判，这就使得这个仪式更加具有戏剧性了。

艾登认为在这一阶段上最好不要介入，虽然杜勒斯似乎急于想插上一手。但是，既然孟戴斯-弗朗斯和阿登纳都参加英国大使馆的宴会，大家认为宴会之后可能会达成某种协议的。^①

我近年来只限于和房屋、租金、修缮等问题打交道，因此目前这一切对我来说倒是一种相当新的世面。不过，我在斯特拉斯堡曾经见过和这多少有点相似的场面——所不同的是，斯特拉斯堡是无实权的业余政治家的一个集会。在这儿，职业政治家们正在做出可能影响世界前途的种种决议。第二天看上去似乎是

在英国大使馆的宴会之后的确发生了不少情况。法国总理和德国总理两人在饭后单独留在书房里。“专家们”则在别的房间里等待，以备谘询。杜勒斯和艾登都没参加。在下午两点左右散会时，显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所有这些活动的结果是

德国人和法国人就萨尔问题举行的谈判成功了，一系列协议在法国外交 566 部签字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协议也在夏乐宫签字了。^②

^① 1954年10月22日。

^② 1954年10月24日签字。萨尔协定大大有利于法国，其中明文规定，要就萨尔法规举行国民投票。在1955年10月举行了国民投票，结果以大多数票否决了这一法规。

这是英国引为自豪的时刻。以欧洲防务集团为最主要范例来解决欧洲统一的联邦方式寿终正寝了，而由西欧联盟所体现的邦联概念正生气勃勃。英国已经引导欧洲走出这个混乱的迷宫。

这时候，不能不承认核力量是防止苏联政府侵略的主要威慑力量，实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目前情况下，也是唯一有效的威慑力量。除开从这种战略概念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外，还有许多紧急问题不得不予以解决。当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目的是要尽可能迅速地征集主要以常规武器配备的大批部队。但是，既然必不可少的协议只是最近才签字，而德国重整军备的进程还需要一些时日来完成，因此，现在所能做的事充其量不过是尽可能有效地组织基层供应机构，制定指挥体制与便于地面部队和空中力量抗击任何进攻的最好的战术计划。但人人都心里明白，这种抗击力量必须依靠在英国发展中的核力量支持下的美国的核力量。在这个方面，英美两国还严重地缺少合作，甚至两国的努力还有叠床架屋的情况。为安全打算——或者说不定是为贸易打算——1946年8月间美国国会通过了麦克马洪法案，完全剥夺了我们对美国核力量的发展情况充分了解的权利，而这项权利是我们根据战争期间丘吉尔和罗斯福所达成的协议一直享有的。我在晚得多的一个阶段上才能以消除这个障碍。而且，迄今还没有达成协议来明确规定究竟有哪些敌方目标，特别是一些对联合王国非常重要的目标，直接由美国轰炸机去对付。

可是，现在产生了一个甚至更为复杂而棘手的问题：根据谁的
567 授权，由什么机构来动用核力量？虽则它会是一种有效的威慑力量，但尤其重要的是必须保证其可靠性。必须让苏联政府确信核力量的动用将是不仅有效的而且是迅速的。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复杂问题：

我担心，公众发现我们除了打核战争之外确实不能打任何战争的时

候，将会感到相当震惊。用两套武器——常规的和非常规的——来武装我们的部队是绝对不可能的。空军和不久的陆军将大量配备这种或那种核武器。这就是说，如果俄国人进攻……用的只是常规武器，我们在一开始就要被迫发动核战争，而不计一切后果——包括对联合王国的反击在内。从纯军事观点来说，这是无法可想的。我们在一场常规战争中会一败涂地。但是，在政治上，不管国内或是国外，都是充满危险的，可能重新导致失败主义和中立主义的激烈情绪。^①

12月中旬要在巴黎举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决定联合部队的作战命令问题，届时围绕此问题定有不少争论。我急于想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先由我们同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商量一下；但时间过于紧迫，不容取得多大进展。任何作战命令的困难都在于似乎既打算告诉军官们除非战争真正爆发不要做什么，而又不能让他们知道怎样辨认战争是否爆发。也许这正像大象一样——很难给它下一个定义，但一看见就可以认出。进一步的问题又产生了。欧洲联军最高司令，不管由谁担任，他只能统率划归他指挥的部队。这完全排除了美国战略空军。关于这个困难，我作了如下的描述：

一、如果他们的战略空军从大不列颠出动，他们只有征得我们的同意才行。（我不知道他们和其他国家如西班牙是怎样安排的。）

二、如果他们从本国的基地起飞，那就由他们自行决定，不需和别人商量。但是，他们已经表明，不和他们的主要盟国磋商，决不单独采取行动。

我到达巴黎时，我们同杜勒斯及其随从人员和加拿大外交部长“迈克”皮尔逊的会谈已安排于12月16日上午在（英国）大使馆举行。艾登主持会议，我大抵扮演旁听的角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委员会已经提出一项文件，要求以俄国一旦进攻即动用原子武

^① 1954年11月25日。

器和热核武器为基础来拟订计划。这个文件在新闻界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议会内引起不少议论。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勋爵最近发表了一篇演说,着重指出了我们在常规武器方面处境的孱弱。其结果增加了人们的怀疑和忧虑。我们在伦敦商议的结果,是准备了我们自己发布作战命令的程式。美国人也准备了不同的一份,但对我们比较合适,而且在政治上也比我们的草案要稳妥得多。建立在核基础上的计划得到了一致的同意,而各国政府对使用这项计划的最后决定权利也再次加以肯定。

这并没有涉及到遭到突然全面进攻——即所谓“晴天霹雳”——的问题,也不可能涉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的反应一定是立即的,几乎是自动的。这实际上差不多完全取决于美国了。但是,那个发布作战命令的程式看来在政治上正合我们的要求,于是我们一起去出席爱丽舍宫的会议,在议会上,孟戴斯—弗朗斯同意了我们的建议。在军事问题上事事都一帆风顺。但是,法国总理再次提出萨尔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他提出了确实精采的盘诘(想不出更恰当的词汇),首先盘问杜勒斯,随后——以较轻松的态度——盘问艾登。美国人[曾经给予法国人]——在不同的时间,通过不同人的口——非常全面的保证,担保在和平条约签订(不管什么时候签订)前的一段时期和和平条约本身中解决萨尔问题,我们(通过贝文)作过某种同类的保证,虽然马歇尔和艾奇逊讲得更明确一些。^①

艾登和杜勒斯都抱怨他们的前任走得太远了,这一点孟戴斯—弗朗斯是了解的。

569

他提出了有充分根据的文件(比我们充分),沉着而又无情地追求他的目标。他这行动无懈可击,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弄得非常尴尬。^②

①② 1954年12月16日。

这是出色的辩论,但也许不是非常出色的外交手腕,因为把杜勒斯和艾登都给逗恼了。

第二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在上午举行。场面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名义上每国有三位部长参加,再加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秘书处人员;事实上大厅里有几百人出席。限制性会议的出席人数想来总是一国二、三人,然而留了下来的看来为数很不少。业务方面准备得倒很妥善,各项议程毫无困难地达成了协议。

下午从3点起,我们大家都相继发言。我事先已接到通知,要我谈一谈英国准备作出的贡献问题。我冒昧提出一个论点。这个论点使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新手:

我们现在所必须作出的,并不是一种短期的、急促的或一鼓作气的努力。这是一场长期的、严酷的、坚决的斗争。这不只是一鼓气把所有的力量都使出来的短距离赛跑——我们正参加的是一种马拉松长跑,因此我们需要我们集体武器库中的每一种武器——现代战争的经济的、政治的、精神的和技术的工具。的确,在这场比意志的竞赛中,道德和精神的品质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物质。

我接下去说,照我看来,下述的论证是错误的:

这些新武器尽管是革命性的,却减少了和平的机会。相反地,我倒认为这些新武器,通过了威慑力量的大大加强,已格外增进了和平的希望。至于我们英国,我不得不着重指出我们在威慑力量和常规力量两方面作出的贡献,并且提请注意下述的事实:

联合王国最近已经通过伦敦和巴黎协定而承担了新的和前所未有的义务。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中,独有我们岛国人民已经与欧洲大陆建立了为期五十年——整整两代——的有约束力的契约关系。 570

所有这一切将意味着外币方面的额外负担,因此把我们的经济保持在健全基础上是和其他方面一样重要的一个贡献。这篇演说看来颇为大家所接受。

第二天即12月18日，在马提贡旅社举行午宴，接着孟戴斯-弗朗斯、杜勒斯和艾登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

第一个主题就是萨尔问题。孟戴斯-弗朗斯为取得在和平条约签订以前这段时期美国政府表示支持的一封信件而讲价讲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以放弃第二阶段的要求而得到了他所希望的东西。但是，和平条约……看来是遥遥无期的。^①

回国后，我的第一项任务是要考虑从已接受的战略概念中作出怎样的推断。鉴于最新“几代”飞机和其他武器所引起的困难，便迅速做出了两项决议。防空指挥部应予撤销。在现代，常规的高射炮，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辅助空军中队因现代军用飞机的复杂化，不得不予以削减。这两个决议是在下院答辩中宣布的，为新闻界所完全接受。首相事先把取消防空指挥部的事告知艾德礼，他表示完全同意。但是，现在也产生了一种新的恐惧。这种恐惧第一次引起白厅人们的普遍注意，并开始透露给新闻界。这是与“散落物”问题有关的，不在把这些可怕的武器用于战争时，而且在较小但不容忽视的程度上当其用于氢弹试验时都有“散落物”。早在12月份我就不得不对内阁说，凡是有关的主要事实均可提供政府各部门参考，对于公众也不能长期隐瞒。一个新的民防体制非推行不可，以便有更大的机动性，进行更高度的训练。在新的观念方面，我们应该试图同意美国人的看法。虽然在此后的几周内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个问题应留待在国防白皮书中正式提出，在辩论国防时加以讨论。

在我的国防大臣任期将近结束时，出现了关于使用核武器的最后一个问题。现在在不论是由战略空军或战术空军来发射、还是后来由火箭来发射的原子弹的巨大威力之外，又加上了一系列较小但更加精密的核武器。1955年3月间，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

^① 1954年12月18日。

公开提出这样一个理论：在大的热核炸弹与那些较小的核武器之间可以明确地加以区分。他们早就被要求利用适当时机着重辩明使用“战术”核武器在技术和道义上的正当性。我们英国参谋总部的意见很明确，认为这是徒然的，要说较小的核武器的爆炸不产生“散落物”，那也不符事实。杜勒斯曾经说较小的核武器可以用常规武器的发射架发射，而且只以摧毁“军事目标”为限。这种提法只会引起关于“军事目标”究竟指什么的那个不会有结果的老争论。

艾登和我提出个站得住脚的论点来反对美国人的论点。在我们看来，把大小核武器加以“区分”，即使从科学上和军事上看是可能的话，但这样做也要遭到严重的反对。西方储存着各种核武器并握有发射的能力，这是达到我们防止战争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企图把核武器划分为一种是小型的因而在道义上讲是正当的，另一种是大型的因而是非正义的，这势必无可避免地贬低了整个威慑力量的价值。如果使人们得到这样一种印象，认为只要氢弹不投到盟国的领土上，就不会用它来对付俄国，或者在新的世界大战中核武器的唯一可能受害者将是武装部队，而不是居民，也不是政府所在地和工业中心，这必将造成致命的后果。而且，为要使威慑力量发挥其最大的效力，就必须让俄国清楚了解，要动用他们的任何核武器来攻击西方，它就必将立即遭到整个西方盟国核武库的报复。美国人提出的区分是办不到的——根本划不出什么分界线。如果有可能加以区分的话，那也会是危险的，因为它贬低了现代科学兵工厂制造的可怕武器的特有价值。尽管这种讨论要断断续续地进行下去，但我们的意见是无争论余地的。

撇开这些构成为所有和国防有关人员担心的主要原因的严重问题不谈，我也开始意识到“冷战”问题几乎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殖民地的时候。

逐渐出现的核均势所产生的自相矛盾的效果,在我看来,是打一场大战的可能性将随着这种冒险性越来越具有毁灭性而继续缩小,但其必然结果是“冷战”将以当前的发展势头长期继续下去,实则还多半会变本加厉。我觉得今后几年内我们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殖民帝国也许会成为一个存亡攸关的“冷战”战场。万一我们在那里被打败,我们在西欧所花掉的大部分精力都将全功尽弃。殖民帝国内部的纠纷可能受到共产党人的鼓励。要不然,他们也可能利用从诸如民族主义以至种族主义之类的其他根源所产生的动荡不安。

要对付这种威胁,首要的是出色的情报工作。

谁也不负全部责任——是国防部负一部分,殖民地事务部负一部分,外交部负一部分。没有一个全力以赴的反共中心组织。“冷战”比“热战”还要使我放心不下。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取胜,而俄国人既有一中心阵地……所有努力又调度有方,而且在每个国家都有其得力的代理人(通过共产党)。^①

在马来亚和肯尼亚,我们都遭到过突然的打击。如要早为防范,就得有人及早来报警。虽然我明知照例会有部方的反对,但我认为有了像伦诺克斯-博伊德那样一个气量恢宏的殖民事务大臣,在这方面应该有可能取得进展。我要求授权组织一个小型的大臣委员会来研究这些问题。我的想法是成立一个以斯温顿勋爵任主席的委员会,因为他对这些问题的丰富经验,是受到普遍尊重的;同时我还想力劝坦普勒将军指导这项行动。我认为只有把调查和推荐人选的责任付托给单独一个人,我们才有希望成功。内阁迅即同意了。到1月17日,我就能把报道殖民地安全与情报的任务交给这位出类拔萃的军官。他立刻接受了。我以前不曾见过坦普勒将军,这次却获得了很深刻的印象:

^① 1954年11月30日。

他的确是一位出众的人物——他一身是胆，而又性格坚强；信心十足，却又虚怀若谷。^①

他的委任令很快被批准。据商定，要他在5月1日提出全面报告。考虑到这项工作的性质，我急想避免公开宣布，可是到了3月中旬，报纸掌握了坦普勒将军正在为我们工作这一事实，因此不得不以尽可能不致使人启疑的形式发表一个声明。虽然我一调职就结束了同这位将军在职务上的联系，但我有幸能够在他成为帝国参谋总长的时候时常晤面。他是具有头等智慧而对于女王陛下，对于陆海空三军，对于国家又忠心耿耿的少数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

我们的主要抱负之一，在当时以及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都是想减少我们在国外的军事承担以及在国内建立的一支战略部队。但是，我们既在德国承担了保持大批驻军的义务而远东又出现了新的危险，因而很难看出从哪儿能够解脱重负。香港驻军几乎不能削减，时机未成熟我们也无法从马来亚撤军。有两点理由对远东冲突的处理必须特别审慎。美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是我们经常焦急的根源。此外，自1942年新加坡不幸事件以来，我们不得不特别照顾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焦虑。最近东南亚集体防务条
574
约的签字与其说减少倒不如说增加了我们的义务。即将召开的英联邦总理会议将提供一个机会来就这一切困难作开诚布公的讨论。

丘吉尔同意签订埃及条约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希望把固定在那个地区的部队解脱出来。但是，即使这批部队也不能撤得太快，以免影响按条约负责管理基地设施的非军事人员的士气。同时我们也同意这样一种看法：万一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灾难，就不会有像上次大战那样在开罗或亚历山大缓慢地集结大

^① 1955年1月17日。

批部队的问题。把一个旅迅速空运到苏伊士港会具有大得多的价值。

在这个时期我们有大量的现役部队。现在回想起来似乎不可思议的是，在1954年有八十万人在海陆空军服役，其中大约三十万是国民服役人员。这些兵力还有六十多万的后备队和补助部队做为后援。服役两年的国民服役法仍然有效，尽管维持远地驻防的这个办法使军费开支变得越来越大。即使这些服役人员因实行募兵制而大为削减，我们也看不出有满足我们要求的希望。此外，民间防空组织的问题也不得不按照新的核危险而予以正视和解决。最后，三军的常规和非常规武器配备必须供应，如导弹之类新式武器的必要计划也不能不制订。所有这一切只能在财政部所拨经费的范围内来完成，1955—1956年度的经费定为十五亿二千五百万英镑，驻德英军的开支还没有计算在内，然而这笔开支仍然希望由我们付出全部或一部分。

在我任国防大臣期间，正在就西蒙斯顿基地的前途问题商谈一项有效的协定。这个一揽子交易，虽然能够使我们既可在战时使用该基地，又可向南非出售相当数量的主要武器，但却引起海军部的某些怀疑。但斯温顿勋爵却给以大力支持。他的判断是我非常同意的。尽管存在着政治危险，从右派观点来看是“又一次投降”，从左派观点来看是与“反动的”南非订立了一种不道德的契约，可是这种解决办法却经历了十三年的考验，直到后来我们的继任者工党执政才鲁莽地使之陷入险境。

在1955年的英联邦会议中，我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自然是微不足道的，尽管我不能不写一篇关于热核武器在热战和冷战中广泛战略效果的陈述作为2月2日召开了一次会议的开幕词。这时国防白皮书的草稿已准备好，不公开地散发给我们英联邦的同事。但是，对我来说幸运的是，主要的责任都由首相承担

了，他执行任务的老练，就他的年龄而言，允称奇迹。就在这次会议上，我们首次宣布了我们制造核弹或氢弹的决定。我们以后的讨论，大部分是围绕着这个决定对英联邦防务问题所产生的革命性新概念而进行的。

在新白皮书公布之前，我简直不可能不把全副力量都集中在需要马上作出决定的主要问题上。1月初我总算把白皮书的一般性质决定下来；当时剩下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有关飞机的方案。在轰炸机方面，我们处于健全的地位，但战斗机的情况却混乱得可悲。最简单的办法似乎是坦率地说明这些情况，作为正规国防白皮书的附件另印单行本。我们的前任曾经订制两种型号的战斗机——猎人式和快速式。快速式1型、2型和3型证明是不成功的，因此无法可想，只好宣布退货。我们对快速式4型和6型几乎没有真正的信心，但还在进行着进一步的试验。快速式5型和7型也许在执行某些专门性任务方面是可以胜任的。这两种型号的战斗机在1950—1951年都几乎是从图纸投入生产的。虽然在战前使用当时比较简单的飞机——喷火式战斗机之类——的时候，这种方针证明是成功的，但是这一步骤，尽管在朝鲜战争时，由于形势的关系而无疑是有词可解的，但毕竟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做出决定尽管是痛苦的，我们却不得不放弃快速式而信任猎人式，576因为后者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成功的最新式飞机了。制造这种飞机的白皮书在2月份经首相批准，新闻界大体上并没作出什么过多的批评。有些新闻记者无疑地感到自己受了骗，因而想搞一次戏剧性的诽谤。但是，反对党自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逼人太甚，因为原来的决定就是工党政府做出的。在宣布摒弃快速式的同时，我们准备继续研制“蓝空”式——首批空对空导弹。所有这一切现在已经证明是以后几届政府在生产现代武器的许多问题中一个最棘手问题的不幸序幕。我们现在必须承认，有成功也必有失败，有

实现了的希望也必有失望。即使在资源丰富的美国，情况也一直是如此。战争的器械越是先进，越是精密，冒险性也就越大。此外，从开始研究到发展、再到最后投产，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时期，这也就使得一切成本估算都几乎毫无价值了。

因自制武器既困难百出，而且其中有一些是否有价值也大可怀疑，所以我不得不要求内阁向美国购买名为“伍长式”的地对地导弹。这是一种带有原子弹头的导弹。其射程在七十五英里以内，因此被认为是一种战术武器。采用美国这种新发明的武器有两重目的：一是增进与美国人在武器研究方面的合作，二是避免我们自己的计划负担过重。我们订购了八套地面装置和十一枚导弹，价款九百五十万英镑，于三年内付清。就当时我们所能预见的情况来说，这是保证我们部队在1965年以前能够获得原子火炮支持的唯一办法。问题很明显，在驻德的美军，也许还有德军都能利用这种武器的时候，我们自不能让我们的部队向隅。

尽管有这一切的活动，但我的主要精力却用在起草国防白皮书的正文并争取得到首相和内阁的批准方面。自然，公众的注意力大部分集中在政府决定制造氢弹的重要声明上。我们在飞机白皮书发表几天之后公布了国防白皮书，这样就把虽属重要但毕竟细小的问题和这些重大决定成功地区分开来了。这些重大决议虽然受到种种批评，但直到目前为止，所有继任的几届政府还一直是维持原案的。

对我来说，也许最有趣的体验就是1955年2月在两天国防问题大辩论时和丘吉尔一起工作。按正常做法，国防大臣要首先发言为白皮书辩护，因为白皮书是以他的名义提交议会的。丘吉尔却希望把这种程序颠倒一下。

他为在星期二那天首先发言感到非常抱歉。但他觉得非这样做不可。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有名的演说；既然他自己已经把氢弹问题的责

任承担了起来，那就应该由他为辩论开场。他也觉得没有责任坐在那里一直到辩论终场，并在其后进行干预。^①

我原以为自己首先要发言的，所以预先准备了演讲稿。我把草稿送给他看。他读过之后，非常欣赏。

他曾经逐字逐句地读——他读了好几遍，似乎把它看作是一篇杰作。^②

他希望我在第二天首先发言，但我认为这样不行。为了解决飞机的困难问题，供应大臣应该先讲，由我作结束发言。丘吉尔当时把他的演讲稿拿给我看，里面有一些漂亮的段落，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几乎在一开头他就对是否有任何裁军计划能否行得通表示怀疑，因为要把足够炸掉大半个世界的钚元素……藏匿起来，逃过检查人员的耳目，是完全可以办到的。^③

我对他说，如果他一开始就把这个暗含的言外之意和具有新闻价值的论点提了出来，谁也就不愿意再听他演说的其余部分了。何况，他决不应在他最后一次议会演说中让人听来似乎是在破坏全世界的主要希望——裁军。他立即同意了我的意见；我第二天看他的讲稿时，里面仍然有在核领域内任何形式的裁军都全无可能这一极似失败主义的段落。我因此写了一张条子给他，在他的私人秘书帮助下对讲稿作了最后的修改。举行辩论的那天上午，我9点被找去，全篇讲演已终于讲完，和通常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反映，从而使这样的会议变得奇妙有趣，令人难忘。

丘吉尔的演说，他在下院发表的这最后一次重要演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演说大部分谈的是原子弹和氢弹问题，语气和音调都极其庄严。他用自己出于至诚的信念打动了听众。虽然承认核武器无法防御，但他相信保持核武器作为主要威慑力量来防止第

^{①②③} 1955年2月26日。

三次世界大战却是我们的责任，也是自由世界的责任。这样，威慑力量不久就很可能为裁军铺平道路。

有两段很漂亮的话，非常值得追忆。第一段在演说的开头部分，第二段在演说的结尾：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要采用哪一种办法来保全我们的生灵和世界的未来呢？对老年人来说，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快要入土了。但是一看到生气勃勃、热情洋溢的青年人，而尤其是一看到正在嬉戏的儿童，我就感到心情沉痛，如果上帝对人类生厌的话，前途实难预卜。

下面是他的结束语：

……如果我们把耐性和勇气结合起来，时间还来得及，希望也是有的。在今后十年之中，一切威慑力量都会有所改善，获得威势。到那时候，威慑力量就很可能登峰造极而收到它的最后报酬了。当公平待人、热爱同类、尊重正义和自由这些美德能够使世世代代的人从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可怕时代沉着而胜利地向前迈进的时候，天就可以露出曙光了。在那时候到来之前，决不要畏缩，决不要厌倦，决不要失望。^①

反对党的修正案对政府决定制造氢弹的问题谨慎地避而不加质询。的确，在国防白皮书公布之前三、两个星期，艾德礼对他的党员们说过，那是英国防务所不可缺少的。因此，欣韦尔在首相演说之后展开辩论时不免左右为难，因为反对党的修正案明白地采取这样一种方针：他们虽然非难我们的方法，却同意我们的政策。

随后的辩论，双方都掌握得很好：

希利（〔工党〕右翼外交问题专家）自作聪明，反而弄巧成拙，竟落入比万的圈套。保守党的马丁·林赛陷入了同样的圈套——我们应该清楚提出哪些事情是侵略者不许做的，否则就要发动核战争。他似乎不明白，这样一来势必就把所有可以放胆去做的事儿都向侵略者和盘托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5年3月1日。

出了。^①

我对讨论中出现的这种显明的左右为难的局面获有深刻印象。不要把我们和那些下达指挥官的过分细密的定则和指令连系在一起，确实是重要的。

第二天，先是约翰·斯特雷奇企图把所有工党议员集合在一面旗帜之下，而塞尔温·劳埃德以引人注目的技巧予以反驳。之后，辩论的特色则是比万的一段插话：

我认为这是我听到过他所作的最漂亮的一次发言（手腕极为高明，为我闻所未闻）。他猛烈攻击丘吉尔。他说了一句既妙而又中肯的话：“他词藻的冠冕堂皇正掩饰了他思想的平庸。”（正击中要害）。他对斯特雷奇和欣韦尔大加颂扬，对保守党大肆攻击——所有这些先下一伏笔的策略上的运用，取得相当大的成功。因为（正如很快就看出的那样）这并不是〔他发言的〕真正目的。^②

比万很快就把丘吉尔刺激得忍不住不插言了，那答辩是与丘吉尔本身利益有切肤关系的，但与目前正在展开的使用核武器的辩论并无多大关系。^③这番离题的讲话既是比万事先没有料到的，而其固有的兴趣和紧张特性又使得他难于再捡起自己的话头，之后他就开始非常巧妙地透露出真实意图：

他支持欣韦尔的这一论点：“如果俄国人不发动核战争，是不是我们要发动呢？”白皮书第22段谈到用核来保卫我们自己以对付俄国常规武器的优势，这是什么意思？他曾经赞成把氢弹视为一种威慑力量。他会赞同使用核武器，如果敌人开始使用的话。但是，首先发动核战争却是他和他的朋友们所不大赞成的。如果工党的动议果真有这个意思，他和他的朋友们一定弃权。艾德礼是否愿意提出他的解释呢？他是否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呢？他们的决定必须取决于艾德礼的答复。

① 1955年3月1日。

② 1955年3月2日。

③ 参阅本卷原书第555页。

我要阻挡丘吉尔本人出面作答，是有些困难的。他一出面就会使艾德礼大大松口气，并使他能够把他的工党团结起来。但是我总算劝阻丘吉尔不多讲别的，而只说：“尊敬的议员国防大臣在今晚结束辩论时将会谈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现在不谈呢？”艾德礼的忠实信徒们叫嚷说，他们希望解围。我站起来说，我认为等艾德礼先讲我再谈，这样更合乎礼貌。因此比万又接着讲下去。^①

现在很明显，艾德礼原打算借此来显示党内团结的这次辩论却将以分裂和混乱的狼狈相而告终。但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不回答比万提出的问题。影子内阁显然在傍晚已经开过会，但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因此，他满足于一言不发，当然这并不等于是一次不信任票。

艾德礼坐下之后，议长请我发言。因此我做出起立的姿态，但把动作尽量放慢，

好让比万有时间站起来。他果然站起来了。他专横而无礼地（可以看出他是在不惜公开地暴露他党内的争执）要艾德礼明确回答他的问题。他慢吞吞，留有余地地说：“我是作一般性的发言。”比万张开双手，做出个讥诮的姿势。^②

581 尽管下院，或者说至少是反对党，多少有点儿激动，但是人们不难了解：对于在什么确切情况下使用或不使用这种或那种武器的假设问题，要任何一个政府一定作出明确的回答，这是不可能的。

要侵略者知道什么不可以做，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也不应该开门揖盗般地告诉侵略者说他可以做什么。^③

这最后一次辩论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在发表主要演说时，下院总是座无虚席，而且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插曲。丘吉尔似乎从头

①②③ 1955年3月2日。

到尾都控制着全局。这是他那无与伦比的政治生涯的一个值得纪念的、有价值的结束。^①

在新政府成立时，我离开了国防部，在许多方面我都感到遗憾。尽管我非常高兴地等待去外交部——一项艰难的任务——我却已经对国防部的工作变得很感兴趣，而且正在着手了解某些根本问题。我觉得我的时间太短，不能把任何事情做得非常有成效；但又觉得时间太长，不能规避一切责任。作出了一些重要决定，但是，天啊，还有多少问题有待解决！不管怎样，和战时我与之有过愉快接触的老友重逢，却是一种欣慰。十年已经过去了，如今在专门职业方面当上首脑的人们当中，有一些正是当他们还担任较低职位时我就已经熟悉和钦佩的人士。总之，与三军人员共事并为三军工作，始终是一件快事。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5年3月2日。

第十八章 第一次最高级会议

“两人换岗，从来没有比这次更顺当的。”这是丘吉尔用来描写他的辞职和艾登的奉召继任的一句話。^①然而，如读者所看到的那样，正像复杂的操练动作只有在练兵场上勤学苦练才能做好一样，政治哨兵在最后换防以前也是经过将近两年演习的。

4月6日，艾登拜命任首相，并向女王行吻手礼。第二天，我接任外交大臣。艾登无疑希望把外交部交给索尔兹伯里勋爵，他对我也并不隐讳他比较看中谁。然而，他判断：把外交大臣放在上议院里，会使首相的负担太重，因为下议院必定坚持要有一位比政务次官地位高的人去掌握外交部的辩论。他曾经亲自见到他自己在1938年辞职后所产生的那个不幸的结果，当时上议院里的哈利法克斯勋爵出任外交大臣，而下议院里代表外交大臣的这副重担便主要落在首相张伯伦先生身上。用艾登自己的话来说，他势必成为“外交部在下议院的主要发言人，这对任何一位首相都是一副额外的负担。”虽然他这种踌躇正中我的下怀，因为出长外交部是我的最高愿望，可是以后的事实证明艾登这种担心是错误的。当后来我推荐霍姆勋爵为外交大臣时，下院并无多大激动情绪，在野党也只提出一些无效的抗议。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我的这个计划其后是非常成功的。为了避免艾登所预见的那些危险，我曾指派爱德华·希思以掌玺大臣的身份，作为外交大臣的主要副手代表出席下议院。

现在我可以指望搞几个星期这种令人神往的工作了，而且，如

^① 阿翁伯爵：《兜了一圈》，第256页。

果我们能在这次大选中得胜，而我又表现出适当的才干，还可以指望在这伟大的岗位上接着干上四五年。在这之后，便可告老退休。当我接受任命的时候，我的思想就是这样的；像许多人对于自己前途所作的预测一样，这些想法后来证明几乎每一点都是不准确的。

除了因丘吉尔辞职和艾登继任所引起的政府中一些必要的人事更动之外，艾登尽量少作变动的做法是对的。塞尔温·劳埃德接任我的国防部职务。由于他曾任外交部国务大臣，继而又做过供应部大臣，他早就具有丰富的经验。财政部的几位大臣之一雷金纳德·莫德林继他而任供应部大臣。霍姆勋爵接替斯温顿勋爵而任联邦事务大臣。我对后者的去职深为惋惜，艾登要是把他安插在政府之内——至少可以安排一个挂名差事——未始不是明智的，因为他是最能干、最多才多艺和最忠诚的同僚之一。

当务之急是规定大选日期。凡是艾登所曾征询过意见的大臣，几乎全都主张越早举行越好。拖延六个月，我们得不到一点好处，反而显示不出有一位新领袖后所出现的主动精神和新气象。因此，4月15日首相就宣布5月6日解散国会，5月26日举行投票。虽然对于前途尚难作出什么估计，但是很清楚，这次双方仍将是势均力敌的。

谁也说不准这次大选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如果票数没有显著地向任何一方变动的話，则借助于从选区的重新分配而多得的席位，我们可以勉强赢得这次大选。但是一定会有一些损失，然而太多选票的损失是经不起的。^①

政治形势是平静的，双方都没有太感情用事。选民们势必要把保守党政府四年来的政绩同前此社会主义的诺言和成就加以分析比较。我们那个预算的主要特点是减低所得税六便士。因此它 584 很容易被人攻击为“富人的预算”。但是同印度政府谈判的成功，

^① 1955年5月6日。

使它对英国棉花进口税的减征百分之五十，却是好消息；此外，取消对棉制品课征的购买税很可能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皆大欢喜。

我很快得出结论：我在消除全国忧虑方面所能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无疑是核战争——的问题。差不多一年之前，政府已经接受一项决议，欢迎

女王陛下政府立即采取主动促成首相与美、苏政府首脑举行会议，其目的是重新考虑裁减和控制军备的问题，并筹划积极的政策和措施，以使世界各国人民摆脱他们压在心头的恐惧。

对此迄今还无所作为，但是安排一次四国会议来讨论这些问题，似乎颇有希望。然而，我认识到，在荒谬的政党政治气氛中，“最高级”会谈与“不那么高级”会谈是大不相同的。在这类重大争执中，外交部长们已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小萝卜头。“最高级”就是指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这当然是丘吉尔在1953年5月11日那篇有名演讲的遗物。在大选的气氛中，这种差异可能是成败攸关的问题。自然，外交部常务次官柯克帕特里克爵士，对此有清楚的——即或有时是刻薄的——认识，他很快就指出：

有关德国、裁军、远东、核战争等等迫切问题，都是极端复杂的问题。它们是不能轻易得到解决的。我们对所谓最高级会议的经验是不令人鼓舞的。

他还提醒我这样一点：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最令人满意而又有实质性的进展，一直是通过

585 老式的外交办法而不是通过最高级会议的。

但是他完全同意，那种试图以这种理由

去说服英国人民别对最高级会议谈判抱那么大的信心（不管说得多么老练多么不厌其烦），

都未免太天真了。可是，他并不过分担心首相所作的任何声明会使美国总统感到尴尬。他写了一个小条子告诉我：“我并不认为他

会过分恼火，因为美国人已经习惯于这样的事：即使是最好的朋友，为了选举的缘故，也要互相使对方为难的。”

因此，我着手草拟一份能为我们盟国接受的计划。4月25日，我第一次以外交大臣身份出席下院会议的时候，我就能够答复一个会引起这种希望的问题。在提到巴黎协定行将批准一事之后，我声明我打算在即将到来的5月9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上同法、美两国外长和德国总理讨论举行四国会议的问题。我又补充说，不管是那一级的会谈，政府首脑级的也好，外交部长级的也好，我们都高兴参加。

我们现在就要投入大选运动了，从政治观点来看，要使工作见效，就必须迅速行动。为此，4月27日我就同美国驻伦敦大使奥尔德里奇进行了一次谈话，把我们对于举行政府首脑会议的看法告诉了他。他似乎并没有感到惊讶或不安，虽然他对于艾森豪威尔的公开反应是抱怀疑态度的。可是，在我们未去巴黎之前，不能取得多大进展。

在动身之前，我去见丘吉尔，他刚从西西里休养回来，暂住海德公园旅馆。现在，并且一直到我退出政治舞台为止，我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向我的老上司汇报，并从他那无比丰富的经验中获取教益，这已经成为一种例规。这一次，他似乎很高兴，并且对于形势新发展满有兴趣。谈话中他对于形容肖克罗斯爵士的那句妙语⁵⁸⁶感到很得意，此人曾在工党政府担任过总检察长，但是现在却越来越多地发表一些中间的或“偏右”的演讲。丘吉尔称他为“肖脱利·弗罗-克罗斯爵士”^①。他一定能凭他自己的经验看出朕兆。

接着，我又同艾登讨论了我心里盘算了好多天的一项计划。我也早已谨慎小心地向一些新闻记者试探过。我认为最高级会谈

^① 这是拿人名谐音打趣，变成 Shortly Floor-cross，意思是指肖克罗斯不久前还是“对方议席上的人”现在变得向我们靠拢了——译者。

是一直被人误解了。

丘吉尔有过(或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我们需要像卡萨布兰卡、开罗、魁北克或雅尔塔那类的会议。

在这种会议上,在一种急如星火的气氛中,于事务繁多的短短几天之内,就作出了许多重大的决定。在应付战争的情况下,盟国这样做本来是对的。(雅尔塔会议是一个失败,一场灾难,因为它主要是讨论关于战后的问题。)艾登自然反对这种杂乱无章的、仓卒从事的工作程序,因为那不适合于和平时期的需要。大家也一直指望在同俄国举行的一次“最高级”会议中作出重大的差不多是最后的决定。^①

如果做不出这样的决定,公众就会相应地感到悲观和失望。

但是为什么不把“最高级”会议看作“开端”而不是“结束”?在这个会议上应该讨论各种能取得成果的途径,然后再交给外长们和专家们去作进一步的探讨。第一次会议开过后,可以接开第二次。

作为将来进一步工作和研究起点的某些有限度的决定(或解决办法)是可以达成的。^②

我觉得现在必须提倡一种长期谈判的观念,为期或许是几年乃至几代,而不仅是一次会议,一次会议肯定是要失败的。为此,我为艾登起草一份致艾森豪威尔的电报,简述了这个计划的纲要。我也给杜勒斯送去了一份复本,同时也给我们驻美大使罗杰·梅金斯发出了指示,建议他用什么方式处理这件事以打动他们两人。那天,我最后还前往查特韦尔。丘吉尔情绪很好,甚至是很愉快的。

587 他说了一句挖苦艾登的话:“一个人爬到最高级时,最高级会议是多么过瘾啊!”^③

总统的答复并不完全使人泄气。他虽然对于我们竟然把我们的想法作为具体建议提了出来,感到意外,但他十分理解在目前情

^{①②③} 1955年5月5日。

况下这样做对于我们的的重要性，并且意欲助以一臂之力。但是，他也不得不考虑他自己国内的舆论。他同意：不久将在维也纳开会，签订对奥和约的所有各国外长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件事，并报告各自政府在最高级会议上应该提出些什么问题，以便发现大家是否都愿意诚心诚意地进行工作，来寻求一些解决办法。梅金斯在报告他同杜勒斯讨论的情况时，表示他对我们的提案可能被接受是抱有希望的，但是我们必须给他一点时间。如果四国外长首先能够一致，那么最高级会议就有希望。从这一点可以清楚看出，如能把杜勒斯争取过来，那就大有希望。在去巴黎之前，我同奥尔德里奇作了进一步的晤谈，他给我描绘了我想知道的关于杜勒斯的性格，并建议我怎样同他打交道最合适。

5月7日，我同我的两位优秀的私人秘书朗博尔德和斯塔克前往巴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美国大使馆去拜访杜勒斯。我发现他的周围有一大批顾问，其中有奥尔德里奇和美国驻巴黎大使狄龙等人。

他很客气地接待我，三言两语之后，便问我是否愿意同他单独谈。我说那很好。我们大约谈了三刻钟。在谈话的后半段时间，奥尔德里奇也在场，而且很有帮助。我们先友好地互谈往事——总统和墨菲等人发来的文件，并且似乎谈得都很愉快。我发觉杜勒斯比我所想象的要和气得多。他有时候似乎有点心不在焉——仿佛在考虑着别的事情。那时，他眼睛并不对着你，或者只是“朝着”你。但是他面带愉快的微笑和忍不住要笑的样子。^① 588

我谈出了我的计划，小心翼翼地把它作为是全新的、完全不同于两年前丘吉尔所建议的东西向他提出来。

我不相信政府首脑会议必然是谈判的终结，而应该是开端。据我看，四国外长要开一两次会议，作出各种初步安排并且讨论有关达到解

^① 1955年5月7日。

决问题的主要途径。然后再由各国政府首脑开上短短几天(不超过一个星期)的会,以后再开几次会——也许要按照所讨论的是东方还是西方(德国或印度支那)问题,而分成有不同国家参加的不同小组。①

我补充说,我觉得我们正在进入可能要召开不同级别的一整套会议的时期;这样做,可能逐步取得进展,使一些世界难题较易解决。艾登和我都很盼望这项计划应该从它本身的优缺点加以考虑:当然它在选举中会对我们有帮助,但它决不只是一种竞选花招而已。

它反映了我国人民(我们相信也包括欧洲其他国家人民)内心中最深切的感情;而且也是解决我们当前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途径。②

杜勒斯很听得进这些话,

心不在焉地在纸上乱写,不停乱画(他几乎也像艾德礼那样善于乱写乱画),偶尔也提一个问题。……他很理解我的意见。不要开成像卡萨布兰卡、德黑兰、雅尔塔那样的战时会议,而要有并且应该体现出一种全新的程序。

在这次谈话之后,就把双方的专家找来。我方官员们一直在设法向美国对手“推销”这个意见。在回到英国大使馆时,我循艾登的要求立刻打电话给他,以谨慎的口气告诉他,我认为我们正在取得进展。

589 在这个时候,法国对西方问题并没有像它对远东的处境上那么表示重大的关切。当天晚上,在马提贡饭店召开的会议上,对于整个越南问题作了长时间的、痛苦的讨论,当时越南南方的非共产党部队分成亲法和反法两派,而美国的援助则集中于最不利于法国的那一派。但是在这个阶段,我除了静听杜勒斯、法国总理埃德加·富尔和法国外交部长M·安托万·皮奈等人各自发表意见之外,简直无能为力。由不同国家的部长带着一大批随从人员举行的这类会议,使我深感这种谈判方法未免有点荒唐;但是这却已经

①② 1955年5月7日。

成为讨论国际问题的一种公认的做法。我总认为要在这么一大帮人中间进行有益的会谈是极其困难的。总之，这次会议，像其他多次会议一样，得不出什么结果。法美双方彼此都在竭力虚声恫吓。我们的主要利益是维持最近在日内瓦达成的解决办法，并保护我们在马来亚的利益。

就在这一天，英国大使馆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宴请将要参加组成新的西欧联盟各国——即原布鲁塞尔条约国家再加上西德和意大利——的全体外交部长。我被推主持宴会，我们很成功地一边享受着佳饕美馐，一边处理着工作，到深夜十一点半将公务全部处理完毕。我们工作的迅速完成，使我获得了很多赞扬。

但是我的紧迫的任务仍然摆在面前，当星期天，5月8日早晨我到外边散步顺便去看杜勒斯的时候，他告诉我说

他一直在考虑我的建议。他对我的意见一直铭记在心，虽然他甚至不肯负责把这个建议转呈给总统。在星期五离开华盛顿之前他同总统讨论我们电报的时候，他对我们的计划并没有真正理解。他不知道他的部下和我的部下能否草拟一份电稿，以便他呈送总统，把这个意见提出来。〔他们〕肯定是能够的。^①

我接着又拜访了阿登纳，他对俄国的革命史发表了一通有趣而动 590 人的论述，讲到它的过火、它的摇摆不定以及它的各种缺点。他不愿意被人指责为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忠，这个组织在下一天就要正式通过接纳德国，但是他相信能够取得一些进展而不致危及更大利益。他断定——在这点上，他表现出有相当的远见——俄国人主要是害怕被中国人拖进战争。在这个阶段，我只能用一般语言来谈论我心目中的首要问题。

在等待总统回答的期间，我们在5月9日开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正式全体大会。

^① 1955年5月8日。

这实在是一个庄严而动人的场面。除了举行一些仪式之外，唯一的事情就是接纳德国为成员国。在主席（M·斯蒂芬奥波洛斯）用很蹩脚的法语致过开幕词之后，十四个国家的代表分别对这个新参加组织的国家——最后加入我们俱乐部的会员——发表了简短的欢迎词。我们按照字母的顺序绕圆桌（倒莫如说是椭圆桌）而坐。我是倒数第二个发言的，杜勒斯先生（顺序是 US）又在我之后。

开会的仪式——全体发言，拍电影，拍电视，无线电广播以及其他等等——占了一上午的大部分时间。^①

我以能参与这样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而感到自豪。虽然如此，我不久却发觉一波才平一波马上又起。关于萨尔问题，尽管阿登纳与皮奈已经达成协议，法国却又想要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可是，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次限制性的会议上，却就更广泛的政治问题展开了一场有益的辩论。在同杜勒斯商定后，由我来解释我的四国会议计划，只是一般性的解释，既适用于政府首脑级会议，同样也适用于外长级会议。晚餐前，杜勒斯和我见到皮奈并且说明了情况。总统根据杜勒斯的意见，现在已经趋向于完全接受我们的计划。所以我们就把业经美国人同意的拟送交俄国人的请帖的稿本交给了皮奈。^②其中包括一项在外交部长们开过预备会议之后举行政府首脑会议的提议。虽然这个建议只限于对各项问题作初步的讨论以及在“探索解决办法”上所应遵循的方法谋求达成协议，但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达到了。不管形式上怎么说，政府首脑会议决躲避不了有关问题的实质性内容。杜勒斯极力表明总统还没有作出决定，但显然这件事实际上是解决了。

第二天我同杜勒斯单独在夏乐宫会谈。

在皮奈未来之前，〔杜勒斯〕问我，如果总统不来而让副总统来，行不

① 1955年5月9日。

② 函稿见附件二。

行。我以为他是开玩笑，就告诉他那个有名的音乐厅的笑话。“可怜的琼斯夫人，她遭到多么可怕的变故呀！”“她出了什么事啦？”“怎么，你没听到过吗？”“没有，我没听到过。”“噢！她有两个好儿子。一个随着泰坦(火力神)号邮船沉入大海了，另一个当上了美国副总统。这两个孩子从此都消息渺然了。”

哈罗德·卡其亚告诉我，当我这样答复的时候，福斯特·杜勒斯显出一种维多利亚女王式的庄严神气说道：“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好笑的。”(看来美国总统提出这个建议是十分认真的！)

然而，当这个故事说完的时候，他放声大笑(在他是难得的)，并且说，“我猜想可怜的尼克松是不愿意那样被人取笑的。”所以这件事就此作罢了。美国总统会来的。于是我们便圆满地完成了这第一个重大步骤。(对奥和约问题和萨尔问题还有待解决。)皮奈来了，我们把文件定了稿，商定了发文的方法和宣布邀请的时间。^①

5月10日，我回到伦敦，知道我需要为竞选运动在电视上露面。这种严峻的考验对我来说是十分新鲜的，而我的表演颇差劲。我不得不讲上几分钟的话，跟着就是拍镜头，虽说很幼稚，也许还不致于一无作用。但是，因为邀请俄国人的消息已经决定在午夜发出，所以我不能在当时宣布，这倒是一个遗憾。当这项新闻在第二天公布时，英国报纸和法国报纸都兴高彩烈。

在发表广播讲话之后，我又马上回到巴黎。虽然上午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只是解决公报问题，但是在下午西欧联盟却开了一次困难重重的会议，会议延续了四小时又三刻钟之久。我因担任执行主席，搞得精疲力尽。

经过巨大的努力，所有法、德之间在对萨尔地位问题上悬而未决的各点，都达成了协议。真是一桩吃力的工作，在某些时刻，我是提心吊胆的。皮奈为他的委托者——萨尔的现政府(亲法派)艰苦奋斗(但是十分正当)。一部分折衷方案是我提出的——应当明天由我去见萨尔总理

^① 1955年5月10日。

——究竟是去征求他的同意，还是去通知他说已达成了协议，这一点在会上含糊其辞。^①

在经过一场辛苦然而终于成功的讨论后，我总算完成了这项任务，这件事终于就此了结。

但是5月11日的累活并没有干完。晚十时，我同我的顾问们又去参加另一个讨论越南问题的会议。

富尔态度通情达理；杜勒斯也是如此。但是，咳，搞得好长！到了午夜，显然协议已经达成，只要有人把它写成文字就行。最后就由我执笔，写了一张纸，被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概括。^②

大选运动现在已是如火如荼。我自己不在场有点担心。虽然我知道我的选区是把稳的，但我已应邀到全国各地去讲演。然而，安排一场最高级会议要比我所能发表的任何讲演——不管讲得怎样漂亮——对我的帮助都大。

在我能回英国之前，还有另一项任务，如果能胜利完成，一定会提高政府的威望。这就是完成那个谈判已久的对奥和约。

593 为谈判对奥和约而进行的为时漫长的斗争的背景，除了偶尔在几次内阁会议上听到过一些之外，我一无所知。它的经过是简单的，但是长期拖延的幕后动机却是模糊的。英、美、法、苏四国从1947拖到1950年谈判的结果是对条约的主要方针取得了同意；实则，只有在比较不太重要的五个条款还有争执。不知是什么缘故，苏联政府显然是决意不希望缔结这项条约。在随后的四年中，俄国人提出一大套不相干的借口来阻挠进一步的谈判。于是，在我就任外交大臣的前一年1954年的柏林会议上，西方三国外交部长告诉莫洛托夫，只要他愿意缔结条约，他们就会接受苏联对那五项有争议条款所拟的条文。这使莫洛托夫有点吃惊，就又阻挠，他一面

^{①②} 1955年5月11日。

提出新条件，一面拒绝规定从奥国撤出占领军的任何具体日期。然而，在1955年3月间，苏联政府开始同奥国驻莫斯科大使进行单独会谈。接着就在4月间有以总理为首、包括副总理和外交部长在内的奥国代表团于4月间访问苏联。在这些会谈期间，俄国人建议立即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他们甚至同意四国占领军应不晚于1955年12月31日撤离奥地利。

关于所谓德国产业问题的冗长而沉闷的争辩，由于最后决定支付一亿五千万美元，作为将这些产业归还给奥国原主的代价而宣告结束。俄国人也答应在偿付现款后把多瑙河航运公司归还奥国，而归还各石油公司的条件则是在十年之内分期用原油偿付。最后，他们准备讨论奥—俄贸易的“正常化”，甚至准备讨论遣返现仍扣押在俄国的奥国战犯。作为交换条件，奥国人——或者是我们这样认为——重新提出一年前在柏林会议上所提的各项建议，并答应永久保持中立，也许是像瑞士那样的中立。此外，他们要尽可能为这项声明取得国际支持，并欢迎对奥国领土完整和不受侵犯作出国际保证。接着，俄国人便建议西方三国政府召开四国外长会议来讨论缔结和签订一项正式条约。西方国家自然同意，但是建议应先由四国大使做些准备工作，为此，四国大使应于5月2日开会，并邀请奥方参加。

苏联政府，照旧厚颜无耻地马上非难西方国家使用拖延策略。在采取拖延政策足足八年之后，他们现在反而谴责十天左右的推迟。他们竟大肆宣传，对于我们建议在外长会议之前先举行大使会议这一点，横加责难。事实上是有实际而必要的工作需要完成的。在外交部长们前来签约的时候，准备好一份为大家同意的文本，或者至少使做法上的漏洞尽可能少，那是很重要的。虽然条约的文本多半会按照好几年前实质上已同意的去写，但因事隔多年，在草案中需要正式修改的地方几乎不下一百处之多。何况，由于

奥俄会谈的结果，看来有些条款也不得不予以删除。我们没有预料所有这些会有多大困难，但是我们有权利坚持按正当工作程序办事。

有一个迫切得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为此，我必须在4月底之前取得内阁的正式同意。简单说，这问题有两个方面。我们应否承认奥国宣告的瑞士式的中立。其次，我们应否参加四国保证。关于第一点，苏联的明显目的是要阻挠西德按巴黎协定重新武装，如果德国希望取得重新统一，那就拿中立的奥国给德国作为有用的样板。“接受中立吧”，俄国人向德国人这样进行说教，“那么你们就可以获得撤军这一无价之宝的礼物，这样——而且只有这样——东西德才能重新得到统一。”但是，不管动机如何，俄国的这种新主张对于奥国人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显然他们已准备为和约付出这个代价。

三军参谋长经征询意见后拟具了一份草案，措辞很高明，但对有关军事和战略上的估计却颇不明确。他们最后通知我们，“一个不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不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以假道权的中立的奥国，只能在它的中立确实有效而且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才能予以接受。”他们用这种高明的笔法来讲显而易见的道理，但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才能使中立有效或者怎样才能使它得到充分保证。尽管如此，很清楚，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无疑是愿意接受一个中立的奥国的。在这方面所发生的另外一个问题，只是俄国是否准备让奥国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或者参加其他欧洲的经济组织。无疑还会有其他困难，但是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为奥地利这个国家争取最大限度的自由。

但是参加四国对奥国领土完整和中立的保证引起了更加严重的忧虑。依照草约规定，奥国武装力量要受严格限制，使奥国无法防御外来的侵略，因而与瑞士甚至瑞典的那种中立并无真正相同

之处。我向内阁解释说,如果西方国家拒绝参加,那就有单独订立奥一俄双边协定的危险,这便给俄国以单独进行干涉的权利。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有过保证比利时中立的沉痛的往事。然而,为了避免把这一领域全部让给俄国人,我觉得最好还是承担某种义务,只要美、法政府也准备这样去做。这可以有多种形式,从只有当保证国全都同意时才起作用的集体保证,到对保证国具有约束性或许可不受约束的一系列个别保证。我也清楚说明,在承担任何义务之前,必须与议会磋商并且请其批准,而且在所有各阶段也都要随时通知英联邦各政府。

与此同时,我们接到报告,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为奥国人举行的一次宴会上,费了很大力气要英、美、法三国代表参与其事。他和布尔加宁都说,五国都应当赶快解决这个条约问题。“我们迄今已经误了十年;让我们不再浪费十年吧。”⁵⁹⁶

在身赋全权但对俄国这种新姿态的含义还弄不清楚的情况下,我于5月13日离开巴黎前往维也纳,把选举的那些烦心事都丢在脑后,前去进行一次新的甚至是激动人心的冒险。在大使级会谈中,仍然有若干意见分歧。但是,当俄国人听到,除非他们在两个条款上让步,杜勒斯就要拒绝前来维也纳的消息时,他们立刻让步了。

俄国改变对奥政策,其原因只能臆测。它的确变得很快。刚刚在一年之前,俄国人曾以位置在他们的交通线上为理由,要把他们的部队留驻在匈牙利。如果放弃奥国,匈牙利怎么办?而且,突然把瑞士式的中立提升为一项政治原则——不仅有实践上的价值,而且还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未免有点滑稽可笑。在大战期间,中立一向被俄国斥为“亲法西斯懦怯行为和投机取巧之道”的明证。现在突然又把中立说成是摆脱军事纠缠而享受田园诗般自由的好东西。何况,瑞士的中立无论是俄国或美国都从

未承认过,所以那种说法更加是一种奇谈怪论。

苏联政府的真正动机何在?仍然很难估计。在当时,我们当中许多人都在欺骗自己,认为这标志了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洗心革面,并且是举行最高级谈判的一个好兆头。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但是现在似乎更可能是他们利用对奥和约作为斯大林死后所实行的“强权政治”这个把戏的一部分。赫鲁晓夫为了满足他个人的野心,不得不小心行事。首先,他须要集中全力摧毁贝利亚。为了这个目的,他在年轻人中同马林科夫勾结,在老战士中同莫洛托夫勾结。马林科夫的部长会议主席从1953年做起,到1955年初就被撵下台。然后赫鲁晓夫把矛头转向莫洛托夫,后者一直到现在还是他的伙伴。莫洛托夫是一个老派的虔诚的革命者,天生是反对同西方国家进行谈判的。他反对搞缓和,他是正统共产主义政策的一贯支持者。同样,他也不愿意同铁托搞什么妥协。在对奥和约签字的前一天,到南斯拉夫作国事访问的消息已经公布,无疑,这是他所深恶的。莫洛托夫以外交部长身份前往维也纳;他不包括在前往贝尔格莱德的权要人物之内。这一行人包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和谢皮洛夫。这一切都是有意贬低莫洛托夫,从而导致他的最后倒台。^①在莫斯科所达成的接受对奥和约的决定,究竟有几分是由于它本身的好处,又有几分仅仅是由于把它当作斯大林继承者间争权夺利的一种手段,这是谁也说不清楚的。碰巧莫洛托夫代表一条死硬派清教徒式的共产主义路线;好共产党员一定不会因同西方国家接触后而受污染。因此赫鲁晓夫在处理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之后,就把莫洛托夫的这种僵硬态度作为谴责他的口实。但若莫洛托夫赞成一种前进的和灵活的政策,赫鲁晓夫会不会攻击他是个异教徒呢?谁也难说。但幸运的是,在这次争权过程中,斗争的胜利者认为他自己有需要采取一项对俄国和

^① 见罗伯特·康奎斯特:《苏联的权力和政策》(伦敦,1961年),“随处可见”。

西方世界都有益的政策。总而言之，即使充分估计共产党政策的冷酷无情，我也相信，适合赫鲁晓夫用来抓权的那条途径，也是符合于他的禀赋和才智的。

我携同外交部副政务次官哈罗德·卡奇亚前往维也纳。他受到奥国人的特别好的接待，因为他曾有四年之久担任驻奥高级专员，很得人心。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威廉·海特在维也纳接我们，他将俄国态度的突然变化向我们作了有趣的叙述，并且讲了他对俄国人的动机的看法。虽然他们最终的目的依然不变，他觉得他们是真正盼望和需要有一个短暂缓和紧张局势的时期。 598

天气好极了，阳光灿烂又不太热。人民是处于心情非常愉快的状态，展望着长达十年之久的占领的结束这个光明前景。英国只有一营象征性军队在那里，而美国则有两万军队，俄国军队还比这个数目大两三倍。

在5月14日上午，我同英国大使沃林格爵士前往拜访奥国总理拉布博士。奥国外交部长菲吉尔博士也在场。他们住在玛丽亚·特里萨的故宫——一幢可爱的建筑物。

两人都有点压不住心头的喜悦。俄国人（在这个小小的国家驻有四万到六万人的部队）真的能够在秋季之前撤走吗？^①

在作了一般性交谈之后，

我们被带领去参观了这座宫里精致的房间，〔其中〕包括举行维也纳和约签字仪式的那个房间。这就是那个开有五个大门的房间，是特为沙皇、奥皇以及其他三个国王能在同一时间入场而建筑的——这是解决谁先入场问题的一个绝妙办法。^②

接着在美国大使馆举行会议，在会上杜勒斯、皮奈和我讨论了所拟程序。我们还得决定宴会以后同莫洛托夫会谈要采取的方针。现

^{①②} 1955年5月14日。

在大家同意，我们应该提议在7月底或8月初举行四国最高级会议。在洛桑或日内瓦举行对我们都一样合适。

四时半我们离开大使馆去参加正式会议。

天气晴朗宜人；街上充满了欢乐的人民；我们插着英国国旗的轿车驶过的时候，人群向我们挥手欢呼。在盟国管制委员会大楼外聚集了一大群人。我下车的时候，他们欢呼、鼓掌和挥手。我站在台阶上，点头、挥手等等，摄影记者则摄取他们的镜头，无线电〔广播员〕也大显他们的身手。^①

599 杜勒斯提议由莫洛托夫主持会议，这一点大家同意了。解决条约最后文本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然后，倒有点出人意料，莫洛托夫宣读了一份精心炮制的关于俄、奥莫斯科协定的说明书，坚持要把它的前五段用所有各国语言宣读。接着，他又拿出并宣读了一份关于签订奥国中立的四国宣言草案。我们自然提出抗议，因为这两种声明的文本，我们事先都没有看到。而且，这个条约非先取得奥国政府和议会的批准，就根本谈不到什么四国保证的问题。经过一番讨论之后，莫洛托夫就完全不提这件事情，而会议也就此结束。

莫洛托夫同我相隔颇远，我不能仔细端详他。照我看，他比我所想像的矮小些，并且还老了一些（我们都见老了）。他头发灰白，不复是少年头了；面色苍白而带青；前额宽阔，灰白头发剪得很短。他穿了一身华贵的黑色服装——看起来倒活像个穿着他的星期日出外服装的园丁头子。^②

丘吉尔在《风云紧急》一书中曾经将莫洛托夫描写成一位有显著才能而又冷酷残暴的人物。尽管这样，他主持会议倒的确是一丝不苟，不浪费时间，是个当主席的老手。那天晚间，我们全聚在一起，在美国大使馆晚餐以后，他兴高彩烈，大讲其俄国人在轻松时所习

^{①②} 1955年5月14日。

惯的那种颇为粗俗的笑话。在就餐前交谈和喝酒的期间，他第一次提起英国的大选，在这天晚上的其余时间也时常说到这个问题。有例行的频频敬酒和交谈，虽然由于要翻译而进行缓慢，但还随便。晚餐后主要讨论的是拟议中的四国会议问题。

杜勒斯解释了麦克米伦计划，以及政府首脑会议可以推动通过外交部长和其他适当代表继续举行谈判。莫洛托夫十分坚持首脑会议，看来他并不愿意在首脑会议之前举行外长会议。杜勒斯解释道，所有这些应当是一个会议，各外长或许只是早到一两天决定一下最后的安排而已。莫洛托夫希望不要有议事日程。杜勒斯同意了。这次会议的确想把议事日程放到以后来规定。双方都同意不要引起我们这些国家的舆论指望有个惊人的成功，而只是耐心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一个新制度的开端。莫洛托夫将“新的推动力”^①重复了好几次。

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满意，因为这正是我曾经说服美国人接受的计划。

莫洛托夫对开会的地点很关切。他喜欢在作为中立象征的维也纳开。但是杜勒斯明白表示，总统不会到一个被占领国家去。无论如何，我提醒莫洛托夫6月底在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周年纪念会上还有另一次会谈的机会。我们又设法说服他放弃奥国声明中立而由四国保证予以尊重的这个想法；这一点应该交由各国大使去进一步考虑。我觉得莫洛托夫已经体会到英美两国所遇到的困难有点像以往对比利时的保证那样。

第二天，5月15日，在贝尔维德尔宫一层大厅举行条约的正式签字仪式。这座宏伟壮丽的王宫和花园是奥国皇帝送给尤金亲王的礼物，正像布伦海姆宫是安妮皇后送给马尔巴勒的礼物一样。我们都同意发表简短的讲话，但是莫洛托夫还是忍不住要作长篇大论的宣传。这场签字仪式是一个有深刻印象和历史意义的盛

^① 1955年5月14日。

会,签字以后,

601

我们大家一再去到面对花园的阳台。拥挤的群众向所有外长(当他们分别露面的时候)狂热欢呼。我想莫洛托夫受到的掌声最多!或许是因为在俄国人——共有六万人之多——终于要走开的时候,他们格外高兴。要不然也许是共产党组织了一批专门雇来捧场的人向他欢呼。不管怎样,这都是使人非常感动的。

在贝尔维德尔宫之内大饮其香槟酒,在花园之外群众们陶醉于欢乐之中。^①

接着,在玛丽亚·特里萨王后住过的皇宫老殿举行了有很多人参加的大规模午宴。它从下午二时开始,到四时方结束。

皮奈和我(不是杜勒斯或莫洛托夫!)去听感恩赞美诗的音乐,这是在圣·斯蒂芬天主教堂为僧、俗两界显贵演奏的,唱得非常优美。^②

休息片刻之后,我们全体又不得不穿着晚礼服再度出发前去参加下午七时在顺布吕南宫举行的晚宴。

这次晚宴在金壁辉煌的大厅举行,用的是华丽的金盘(我们在午宴时已经用过许多)和令人喜爱的瓷器——我猜想这些都是属于皇室的。花也美丽极了。(这是维也纳风光最宜人的时候,城里街道上、花园里繁花似锦,丁香和其他种种鲜花盛开。)祝酒词很短。我们每人都轮流祝酒。^③

宴会后,在顺布吕南宫的舞厅里举行一次有二千名客人的招待会。其中有

红衣大主教、大主教和其他教士……个个衣着华贵。把莫洛托夫介绍给他们,他似乎有点尴尬。^④

在回伦敦之前,我应莫洛托夫之邀,到他住的别墅去拜访他,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作了一次范围广泛的讨论。在许多话题中,他谈到音乐(他是作曲家司克亚宾的表兄弟),还谈到他关心

①②③④ 1955年5月15日。

他那小外孙女或小孙女学习音乐的事。那天下午，他的确表现了他性格中柔和的一面。他那大而圆的脑袋给人印象很深，他那浓黑的短须和朦胧的双眼很相配。一方面他很像个能干的技术员；另一方面，又有点像个哲学家。

对奥和约的缔结标志了向欧洲和平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当然，还有待于奥国议会以及所有有关国家的批准。唯一悬而未决之点，事实上，已经在6月20日于旧金山解决，那时我们四人都同意，如果奥国议会要求我们履行所承诺的就奥国中立发表宣言的义务，大家应当用同一个文本。 602

这件事的后文如下：6月29日我在下院动议对奥地利国家条约议案进行二读。

我不懂为什么我们非把它作为一个议案提出不可，而（在我讲完了我的提要时）下院对此也是糊里糊涂的。可是，到下午5时半我们把所有步骤都完成了！^①

所有的国家都已经批准了，这项条约开始于7月27日生效。根据协议，所有外国军队于10月底以前一律撤走。奥国的中立并不排除奥国参加一种非军事性质的国际组织。而且，既然奥国必须保卫它的中立，就要让它建立它自己的军队。在该年年底之前，奥国获准加入联合国。总而言之，这个插曲是我们同俄国的关系上一出令人适意的垫场戏，并且为将来创造了一些希望。这和举行最高级会议的协议加在一起，肯定对于我们选举的前景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现在该是回英国参加一些大选活动的大好时机了。在回国的那天，5月17日，我投入另一场电视表演，当了次要的角色。这是一场稀奇的但并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实验。十位报馆主编提问题，

^① 1955年6月29日。

五位大臣则像小学生般坐在一排来回答他们。我的同僚有艾登，巴特勒，蒙克顿和麦克劳德。据说相当成功，但是这场表演看来很不老练。在那个年月，电视才开始影响政治争论。我们一向习惯于在选区的课堂或露天会场里集会，或在公共会堂的大会场上出面。我们后来也开始学了点电台广播的技巧。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一个人有过搞电视活动的经验。而且，向我们提问的人都还对我们表示尊重，甚至是恭而敬之的。后来我才经历了一些比较新鲜也不那么客气的场面；但是我还说不上已经掌握了这种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有野心的政客所必须具备的一项重要本领。

在当天晚上，我和伍尔顿勋爵谈了一次，他告诉我事情搞得相当好，但是自由党却一直在干扰，打算夺去我们十五个以上的席位。第二天，据盖洛普民意测验趋势看来稍为有利于我们。但是结果如何还是不能肯定。

令人奇怪的是，人的一生遭遇会因一件多么小的事而变得大为不同呀。在一个星期之内，我也许就要回到圣·马丁街去，也许还在外交部再干上几年（除非我自己闹出笑话来）。似乎谁也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从来没有比这“更安静”的选举——对我的胃口来说，未免有点太安静了。^①

在投票前两天，《每日镜报》开炮了，这原是意料中的。

这只是对保守党人和保守主义的一个极其下流的攻击。我不相信它会造成多大危害。但是，它的销路当然是很广的。它的主要说法是，保守党人难免要上台，所以要“投工党的票”，以削弱保守党人的多数地位。^②

这一天我全部在约克郡周游活动，在帕德西，布雷德福，基思利以及希波莱等地发表演说。我最后到哈里法克斯，我的儿子莫里斯

① 1955年5月22日。

② 1955年5月24日。

正在那里争夺工党占有的那个席位。

大厅挤满了人——我想总有一千五百人——当我进去的时候，莫里斯正在讲演(我认为讲得很好)。我讲了三刻钟的话，并举行盛大的招待会。然后，我们回答问题，这使每一个人都非常高兴，因为[莫里斯和我]分工答复他们的问题，这是一出好“演出”。^①

我把在布朗利的竞选工作几乎完全交给我那干练的妻子去办。在投票那天，我们照例周游选区，后来还到萨沃依饭店去等候选举揭晓。象往常一样，西索尔福德的选举结果是第一个宣布的，604 保守党多得了二千多票。到了午夜，虽然所增加的席位很少，却可清楚看出我们一定会胜利：不是一边倒的大胜，只是稍为倾向于我们，或者说是没那么倾向于社会主义者们。

凌晨一时，我前往保守党的中央办公厅。当我走进伍尔顿勋爵办公室的时候，那里正不断收到选举结果并在进行分析，哈里法克斯的结果来了。莫里斯以一千五百票当选。我是那样兴奋，马上赶回萨沃依饭店，我发现许多人围着多罗西祝贺，她高兴得几乎要流出眼泪。这真了不起——他居然赢得一个席位，而且全凭他自己努力。^②

在布朗利，直到5月27日才宣布结果，数字也是令人满意的，我的多数恰好超过了一千票。就全国说我们在下院的多数有了提高，从上届的十七席提高到本届的六十席。在全部投票中我们获得百分之四十九点七，工党获得百分之四十六点四。艾登真是领导有方，在整个竞选运动中，他没走错过一步。

虽然我们这时要受到铁路罢工的折磨——在这次罢工中，机车工和司炉工联合会的工人全体不上班，而全国铁路工人工会的人则留场罢工——但这也许是我们最经得起罢工的时机。罢工在大选

① 1955年5月24日。

② 1955年5月26日。

后立即开始,持续了十七天。政府做得很对,没有再被迫作任何让步,但它对经济却造成了很大危害,有些危害是过了几个月之后才显露出来的。

大量进口煤炭将是必要的。这意味着将要耗费六、七千万美元的外汇。在另一方面,事实却是:(1)工业界的和一般人民的生活至少能够顶得住火车停顿五分之四所造成的压力而不至于崩溃;(2)工人实际得到的工资并不多于开始罢工时的工资,这可以产生一种收缩通货的作用,而且多少总能够煞住最近一两年开始露头的工资和物价交互上升的现象。^①

虽然如此,由于大选平安地渡过,我已经能把这些问题交给我的同僚处理,而且带着一定的安全感重新从事外交部的工作。

605 俄国对我们举行最高级会议建议的正式答复。实际上是在投票那天到达的,但是他们的意图早已为人所共知。关于举行会议的地点,经过若干争执之后,到6月中旬苏联政府同意了我们的建议:四国首脑应当于7月18日在日内瓦相会。

现在大部分精力用来进行秘密讨论,以便确定在大会上关于俄国、德国和裁军等主要问题提出各种不同计划。主张用一个小非军事区把东、西方部队分隔开的所谓“艾登计划”,经过我们自己内部以及和盟国之间长时间的辩论,提出各种不同的计划和改动。大家所同意的最高级会议的目的,虽然在名义上是“确认”各项问题,拟制和准备为将来进一步谈判的议事日程,但当时我们劝说艾森豪威尔前来的那个条件,现在都默认可以不管了,因为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觉得不仅是形式问题而且实质问题也是可以辩论。

我带着一大帮顾问于6月16日到达纽约,当天杜勒斯就同他的工作班子前来访问我们。我们下榻在西河地区一所房子里,距离纽约有二十分钟的路程,它是一所舒适的旧式房子,比起市内的

^① 1955年6月15日。

公寓不知要舒服得多少了。

我们很快就按照惯例的程序进行——每一方的首长象拳击师一样身后坐满了他的帮手和教练。午餐时法国方面也前来参加了(内有外交部长皮奈以及顾夫·德姆维尔, M. 奥珀诺特等人), 之后这场牌就改成三个人来玩了。①

讨论题目涉及加沙与以色列问题, 核战争, 如何对付阿登纳, 以及我们最后可以对俄国人作出什么样的让步作为重新统一德国的代价。所有这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很顺利, 在一次短会里就都解决了。下午, 由法国方面安排的会议, 主要是关于程序和内容问题的。

会议进程很缓慢(不像打板球那样每分钟都能得分), 但是却进行得很平稳。当天的会议到下午5时左右才收场。②

第二天, 由昨天那几位部长带着他们的原班人马共约二三十 606 人在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旅馆的所谓“总统专用套间”里再次举行会议, 于午餐前苦干了三个小时。英国外交部现在已经沾染了美国那种撰写所谓“意见书”之类文件的习惯。但是这种制度的毛病是, 我们和美国国务院似乎都把更多精力集中在讨论什么是我们所要的, 却较少考虑如何去达成我们的目标。“确认”这一新词变成大家爱用的一句口头禅。人们随即认为, 如果能把一个问题明确下来, 那它不久就能够顺利解决。在当天晚上, 阿登纳总理同他的主要顾问赫伯特·布兰肯霍恩参加了这个会。他向我们谈了他的意见, 这些意见看来是很通情达理的。

(1) 他要西方国家为了宣传目的进一步推动“裁军”。(他在这问题上所根据的理由是危险的, 但是那时他对于核问题并不理解。)(2) 他下定决心要德国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3) 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必须留在欧洲。(4) 但是他相信俄国人的立场是需要缓和, 而且可能为了换取在欧洲有某种安全保证而忍痛放弃东德。③

①② 1955年6月16日。

③ 1955年6月17日。

在这种显然是把精力集中于讨论西欧问题的背后，在中东和远东潜伏有更为紧急并且在许多方面更为严重的危险。几周后形势越来越明显：中东和远东的可虑之处要比西欧的更为真实，在西欧至少已经有一种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稳定。

这次到纽约的短期旅行，给了我以首次参观那座不寻常的联合国大厦的机会，在这座玻璃大厦里充满了互相攻讦的人们。我拜访了哈马舍尔德，他主要担心的看来无疑是中国而不是俄国。但是照杜勒斯告诉我的话来判断，在远东目前不象是会出什么事的。杜勒斯对我所讲的那些话是颇为诡秘的，可是也偶尔泄露一些天机。总的来讲，在中国问题上，我觉得假若他不受制于（大部分为他那个党造成的）舆论，他是会采取灵活态度的。

在去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创立十周年纪念大会之前，我和来访的阿登纳进行了一次谈话。我们把成群的顾问统统调开，仅仅留下布兰肯霍恩和卡奇亚。

〔阿登纳〕详细发挥了他以前偶尔谈过的问题……他有他自己的欧洲“脱离接触”的计划，这和我们所讨论的那个计划（若干计划之一）并没有多大不同之处（虽然更彻底、更有雄心）……它有很大的优点……因为它在各国一视同仁。

阿登纳的计划是……在欧洲中部建立一个非军事区，那里不许驻扎军队或建筑工事。再在该区两侧……另立非军事区……那里可拥有某种武器和军队，但不得有其他种类的武器和军队。然后再往两侧……限制更少一些。

总的设想是：（1）欧洲兵力均等；（2）脱离接触；（3）在各控制地区之内对所准许的各类武器加以控制。^①

6月19日我们飞往旧金山，我希望在那里有机会能同我的老

① 1955年6月17日。

朋友艾森豪威尔会晤。但是使我们两人感到失望的是，不打破来此参加典礼的许多国家首脑以及各国外交部长同他的会见，是得不到这种机会的。然而，在他到达的那天早上，上午八时光景，他给我住的旅馆打电话，以下是我们谈话的内容：

总统：喂，哈罗德，你好吗？

麦：我好。

总统：我也好。能听到你的声音，很高兴。你近来好吧？

麦：我近来很好。

总统：今天我事情办完之后，打算来看你。会有一个空当的。

麦：那很好。

608

总统：你同福斯特处得怎样？

麦：我同他处得不坏。

总统：福斯特乍看有点固执，但是当你了解了他的时候，他的心眼是很好的。你要去了解他。你了解了，他是满好的。他同我讲，我不能来看你，因为还有别人哩。

麦：我只要能再一次听到你的声音就行了。听不到，我是不能离开美国的。

总统：那好。那就是我向福斯特讲过的话。我并不是因为你是英国大臣而要来看你，是把你当作我的政治顾问而要来看你的。

麦：那好。

总统：安东尼好吧？

麦：他也好。

总统：那好。告诉安东尼，我星期日上午去日内瓦。我打算早一点到那里，那天我要同安东尼好好谈谈。

麦：这正是安东尼希望的。

总统：那末，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我的一位朋友吉米·高尔

特去那儿。①

麦: 是的。

总统: 如果你能把吉米·高尔特弄到那儿去, 对我们意义很大。

麦: 吉米现在伦敦城里。

总统: 上帝呵, 他是一个股票经纪人吗? 我想他是从事海运事业的吧。

麦: 我希望是这样, 真太好了。

总统: 好吧, 事情完了之后我来看你。②

这次交谈虽不深入, 但至少是轻松的。

无疑, 因为地理上的因素, 所有在旧金山的人对远东问题似乎要比任何其他问题更加关切。如果和解没有进展, 恐怕对“沿岸岛屿”(金门和马祖) 的进攻就会爆发一场危机。这将是一件在长时间内不断使人非常担忧的事。

609 晚上, 我们全体都去那所规模宏伟的歌剧院, 联合国的正式会议在那里举行。出席的人一定有三千到四千人之多。一别四年的艾森豪威尔总统, 看起来并不比以前老多少, 但态度有点拘谨。他的演说, 组织得好、表达得也好。在他讲完之后, 休会, 我们都去参加招待会, 在那里各代表团团长受到美国总统的致意。他绕场一周, 同每个人都谈几句话。我站在莫洛托夫旁边, 在等候总统期间, 我们互相开个小玩笑。当总统走到我的面前, 他亲热地紧握我的双手, 说了几句很亲切的话, 提到了在电话里的谈话; 照外交礼节不允许再多谈了。

晚上, 在旧金山有名的工会俱乐部举行宴会, 我因为已经被选

① 准将詹姆斯·高尔特爵士在大战期间以及后来在驻欧盟军最高统帅部, 曾先后任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助理。

② 1955年6月20日。

为名誉会员，所以执行东道主的任务。杜勒斯、莫洛托夫、皮奈和我仅带着翻译人员在一个由我搞到的密室进餐。在这样庄重的、实际是十分保守的气氛中聚在一起，使人颇感奇兀。餐后我们转移到另一个房间，有我们的顾问参加，但每人只限带三名。

我们早已殷切期待我为之不远千里而来的这次谈话，证明是个失败，至少是很大程度的失败。莫洛托夫似有意捣乱；对于我们为7月会议提出的所有程序上的计划，他或多或少是接受的。然后他要求将整个问题的交由三国大使同美国国务院在华盛顿讨论。这激怒了皮奈，忍不住大发脾气。总而言之，这四小时的会谈……是付诸流水了。外部世界都以为我们是在决定世界命运，而我们却为鸡毛蒜皮舌剑唇枪。^①

只解决了两个稍为有点重要的问题：第一，在最高级会议上，彼此不得向对方作冗长的宣传讲演（这是一个注定要被破坏的协议）；第二，我们应当每天发布联合新闻公报（这一点是小心翼翼地履行了）。杜勒斯解释说，总统在日内瓦期间将不参加宴会或举行宴会。⁶¹⁰

这太愚蠢，但由于雅尔塔等等会议在政治上积累了许多反感，所以有这个“后遗症”。当然安东尼是想要举行招待会的，可是我给他保留设宴招待的一切权利。^②

第二天，在我正式致贺词之后，又同杜勒斯进行了一次会谈。很明显美国政府对远东要比对西方更为担忧。

〔他们〕真不知道对中国该怎么办。他们在内心里，知道他们的政策是没有前途的——除非是冒灾难性的风险。他们没有自己接管台湾的勇气。那会是“殖民主义”。所以他们不得不去支持一个残暴而腐败的政权，这个政权随时都会“出卖”他们而向共产党人屈膝投降。他们不能自己“摆脱困境”反而怨恨每个设法帮他们忙的人。但是，我必须说明，杜勒斯本人并没有流露任何怨恨，至少，对我没有流露。他似乎是需要

^{①②} 1955年6月20日。

安慰。^①

在离开旧金山之前，我应莫洛托夫的邀请，驱车到他所租的别墅。从市中心起，汽车大约跑了四十五分钟——那是一座典型的“阔老”住宅，

有宽广凉爽的房间，有冒牌货家俱，有游泳池，等等。十天租金四千美元。一座带围墙的花园房子，地方很大，可供所有那些俄国人之用。

跟我在一起的有卡奇亚和安东尼·朗博尔德；他有他的两个人。会谈进行了一小时，充满愉快气氛，但主要是在“比剑”，也偶尔彼此在对方的要害地方搥一两下。每次我同莫洛托夫会面，我总深感他性格上有奇怪的二重性。尽管他是以冷酷、消极、蛮横的态度出名，但是人们与他单独会见时，却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吸引力，甚至是和蔼可亲的样子。我觉得俄国人需要缓和，他们真被美国在欧洲的基地吓坏了，因为他们愿意减少在军备上的开支和努力。

611 但是，他愿意付出代价吗？难道他们愿意为一些实际上并不符合他们目标的事而付出一点代价吗？

〔我们的建议〕不能真正给他们以所需要的东西——因为那是要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撤退美军。^②

在第二天，来自菲律宾的一位身材矮小的伟大雄辩家罗慕洛将军，他以冷讽热嘲和雄辩的口才成功地将莫洛托夫一直在大肆宣传的发表和平宣言那种包藏祸心的计划攻击得体无完肤。当莫洛托夫上台发言，那只是一个令人失望的表演，至少别人看来是如此。他差不多讲了一个钟头，他占去的时间是从分配给卫星国代表团的时间里“借来”的。他的讲演只是

把他和他的宣传机器经常讲过的每一点再重复一遍。他把他所主张的裁军建议说得很了不起。但是，空话连篇。他只是拿出一副老牌，把牌

①② 1955年6月21日。

亮出来,可是他究竟要打出什么牌(如果有的话),没有露出一点头。①

旧金山庆祝会结束后,我取道刚刚开辟的飞过世界顶端的斯堪的纳维亚航线离开洛杉矶。我在哥本哈根着陆,从那里再去奥斯陆,女王在那里对挪威作国事访问。按照习惯,外交大臣须要前往陪同的,这几天倒实在是一幕适意的插曲。在动身的前一天晚上,女王在皇家游艇上为挪威国王以及他的朝臣们举行告别宴会。我被邀同她一起取海道回国。

现在最高级会议已准备就绪。西方各国领导人之间讨论了无数的计划和各种变动。无论如何,我们已离开会议的本意很远了,因原来会议的唯一目的是“审定”问题,而不是谋求解决它们。

艾登心里早已明白:在我们的集体建议中应该有三个组成部分。在根据协议条件定出一条非军事地带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在 612 欧洲特定地区内限制军备的计划。这就需要有一个为大家所同意的最高军备限额,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有一个共同的监查制度,因为任何形式的裁军或军备限制都需要有检查和视察。艾登计划的第三部分是要签订一个部分是用行动、部分是用担保来支持的欧洲安全公约。这种行动大部分已包括在头两项建议之内。

可是,虽然我们英国同僚是满意了,却仍然需要说服美国人,他们坚持要按当初发出正式邀请时的条件来开最高级会议。我以为这事非由首相和总统亲自处理才能解决;尽管如此,我总觉得事态发展的实际压力以及在讨论过程中,有些困难自会解决。例如,大家并不反对讨论某一问题的各种不同解决办法,只要它们是以“建议的方式”提出来的,而且并不承担以后要按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解决问题的义务。这是杜勒斯那种奇特思想方法的一个典型例子。当然,我当然主张:在对各种以建议方式提出的解决办法自由

① 1955年6月22日。

交换意见之后,需要由各国政府首脑制定一项文件,作为各国外交部长进行工作的根据,例如,需要研究一下如何完成德国的统一而又不致危及苏联的安全。

虽然大家都理解,须要讨论的主要课题是德国、裁军以及俄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等问题,可是远东的危险却总是在背后起作用。在我们多次的私下交谈中,远东危险总成为西方各国政府间考虑和争论的主要话题。

在我被任命为外交大臣之后不久,有过这样一种建议,如果中国国民党人同意从沿岸岛屿撤退,则由“有关各国”给台湾以担保。我可不敢建议去承担这样一种沉重的义务。这种事应当提交可能为此安排的一次四国会议上处理,较为明智。就在这个时候,由于杜勒斯对周恩来在4月举行的万隆亚非会议上表示愿与美国进行谈判这一点作出反应,形势也已经略有改善。杜勒斯最初的反应虽然是冷淡的,然而,在4月26日那次大肆宣扬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似已改变立场。我们极力促成谈判开始。确实,我劝杜勒斯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谈的主要论据之一就是,当最高级会议有希望的时候,周恩来对这个问题不象是会硬来的。杜勒斯同意,为了达到对蒋和中国国民党人施加压力使其放弃沿岸各岛这个目的,我们是需要时间的。在5月间他同我历次谈话中,都强调是为了这个理由而欢迎最高级会议的。

接着便开始了一个情况复杂的时期,这是由印度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团长克里希南·梅农在与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讨论之后,大肆插手这件事所引起的。虽然周恩来似乎愿意进行谈判,美国也不全然抱敌视态度,而主要的问题是要为任何有益的谈判确定一个基础。梅农的插手既有用而又造成混乱。这使联合国秘书长心烦意乱,华盛顿也没有什么反应。梅农的为人也引不起杜勒斯的重视。

他不喜欢克里希南·梅农，后者干扰了联合国解决问题的计划。所以，（照哈马舍尔德的意见）在中国人等候梅农的外交手腕搞出结果期间，是不能再作什么的。从杜勒斯对中国问题所讲过的话来判断，目前也不会有什么真正进展。美国人不能理解梅农的计划，而就他们所理解的来说，他们是不喜欢的。我已经有一种感觉，杜勒斯是愿意改变他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的，但是他现在正等待美国的舆论能允许他这样做。^①

在6月20日，我同“迈克”·皮尔逊进行了一次谈话，他表示担心，如果不作出反应，中国将会猜疑美国的意见是在强硬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发动对沿岸岛屿的进攻来促成一次危机。

杜勒斯，虽然以他的谈话和解决问题的那套方法而论，是令人莫测高深的，现在的讲话却远比以前坦率得多。

他对于远东问题真的开始感到“束手无策”。他不晓得该怎么办。⁶¹⁴他实在想要蒋离开沿岸岛屿，但是他办不到。在几周之前，他曾打发罗伯逊^②和雷德福海军上将^③去办这件事，但是他们失败了。因此，他开始大谈他早期（1918年在巴黎会议上）同俄国革命时期逃亡外国的皇党打交道的经验，以及他们怎样使他感到灰心。^④

在最后，他又回过头来讲梅农计划实质上是什么。这意味着要举行一系列零星会谈，来解决引起争论的一些小问题。

到了6月底，我觉得美国政府对远东问题的态度已经变得比较灵活了，而最大的危险却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可能作出判断错误的行动而立刻引起报复。在最高级会议进行期中，我们发现人们普遍觉得远东的形势比欧洲更加危险，虽然并没经过正式讨论。

① 1955年6月17日。

② 沃尔特·S·罗伯逊，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③ 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④ 1955年6月20日。

我们在巴黎进行了一、二天进一步的商谈之后，首相和我于7月17日，星期日，到达日内瓦。

在日内瓦的情况使人愉快。天气是热的，但不是太厉害，而且大人物们住的别墅既舒适而又凉爽。艾登，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各单住一所房子，都是由日内瓦的社会名流借赁的。法国总理富尔和所有的法国人住在离总统房子不远的一所别墅里，俄国人住在市外稍远的一所大住宅。我的级别较低，住在旅馆里，即闻名的湖滨宾馆，我们外交部顾问大多数也住在这里。这里有一些靠得住的真正名贵的爱德华时代的装饰品。

艾登带来了内阁秘书厅主任诺曼·布鲁克爵士，我除了私人秘书外还带来了外交部常务次官伊冯·柯克帕特里克爵士。运气得很，还准许我们带妻子，虽然并没有什么可以使她们娱乐的，可是换一下伦敦的紧张空气，也足够使人愉快了。除了克拉丽莎·艾登和多罗西外，还有富尔夫人和其他一二位法国女士，可以搞一些社交活动。但是美国人和俄国人都严格地只限于男性。

这次最高级会议十分振奋人心，并在各国引起了广泛的希望。自从大战之后以及世界致命地分为共产主义和自由国家以来，这类聚会还是第一次。它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下（现在很少人能记得了）举行的：第一次泄露核武器威力的消息已经传开，其使人震惊，甚至使人恐怖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减轻。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经领导盟军取得胜利的这位将军亲自参加这次会议这个事实，被作为希望的征兆而受到欢迎。大家都知道他深受居于领导地位的俄国司令员们的尊敬。如果说现在没有一个具有斯大林那样权威的人为苏联政府讲话，那么在一种有点象内阁制的比较温和的政权下，有可能出现一种和解的气氛。因而，每次集会，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有大批大批的群众以及大批的摄影记者和电视工作者在场。在这历史名湖之畔，以名山为背景，受

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制度当局的款待——这里也许有取得进展的希望。如果说瑞士联邦已经解决了民族宿仇问题，为什么这些大国本身不能照这个榜样办呢？

星期日，即开会的前一天上午，在总统的别墅里举行了一次小会。他看来很高兴，在会谈开始之前，他单独与我散了一会步；可是，他是叙旧，而不谈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困难。

会谈是在他别墅的书斋里举行的。参与的有艾登和我；富尔和皮奈；总统和杜勒斯；每方各有两名顾问（我们的是柯克帕特里克和诺曼·布鲁克）。传阅了总统的讲稿——倒不如说是讲稿提要，没有人表示什么特别的意见，只是要求关于“卫星国”和“暴政”这段话口气可以改轻些。这点照办了。^①

法国总理富尔接着就他的想法作了长篇讲话。虽然他似乎对德国 616 问题没有异议，却更关心在裁军问题上取得进展，这不知是为了国内原因还是为了国外原因。

他准备了一份精心制订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要建立一个国际团体，各国要把从裁军省下来的钱提供这个团体。然后把这笔钱重新加以分配，以帮助“落后地区”。他声称，履行提供款项的义务，是使人相信真正在实现裁军的唯一的保证。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此似乎都不十分热心。^②

幸运的是，我们身边没有财政部的代表，所以我们对这些想法表示了客气的但也是言不由衷的同意。

艾森豪威尔当时虽然没有提出他的详细计划，却把一份计划大纲提出来了；这是因为还需要使它与美国的那个理论——我们不能提出“计划”，只能提出“举例说明的建议”——相符合。为了照顾皮奈而需要进行翻译——因为富尔能讲英语，至少是懂英语——这就花去了整整一个上午。

^{①②} 1955年7月17日。

我们全体与总统共进午餐，一次具有特色的午餐，有斩碎的大片肉……加上橘子酱调味。法国人为之大皱其眉头。^①

会议在第二天上午十时十五分开始，在通往会议大厅——原国联大厦——的路上挤满了观众，由警察排着队把他们隔开。我们一进会场，就感到气氛可怕。各国主要角色围着摆成长方形的桌子坐着；中间空隙的面积约有一个小型拳击场那样大。这桌子的四周又摆着一排一排的座位和长凳，大概原是为各国顾问们准备的，但似乎却被一群热心好奇的旁观者占用了。会场四壁装饰着巨幅的杂乱的壁画，有描绘世界末日的，或大力神之战的，或罗马人掠夺塞宾妇女的，或这三者的混合画。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场面能比这个安排得更不宜于进行亲密而有益的谈判。这次会议的全部正式活动势必变成一系列照本宣科的讲演。只有各政府首脑或者外交部长在会场外的小房间里举行限制性会议时，才能进行认真的讨论。

代表俄国方面的是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表面上是由布尔加宁负责。各国的正式讲演占用了一整天。布尔加宁态度友好，但对事僵硬。艾森豪威尔讲了一些悦耳的话，并建议各国外交部长应在第二天上午集会拟定议事日程。政府首脑将在下午举行会议。所有的讲演词应一律公布。

第二天上午外交部长举行会议，由皮奈主持，他要我发言。

我说，我已经仔细阅读了昨天的全部发言稿，其抄件已经分发了。我注意到，有些题目每个发言人都提到过，有些题目却是为一部分发言人、不是全体发言人所提到的。我认为首先处理那些为每个发言人所提到的题目，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些题目是：

德国的重新统一，

欧洲安全，

^① 1955年7月17日。

裁军，

发展东西方之间的接触。^①

莫洛托夫接着发言，他补充说还有其他题目，诸如远东问题、世界贸易问题以及结束冷战问题等，都不应遗漏。于是杜勒斯指出，在那种情况下，卫星国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问题也都应当占有它的地位。

我一度认为我们对议事日程会有一番冗长而无结果的讨论。但在第二轮发言的中途，莫洛托夫就接受了我的建议。^②

政府首脑在那天下午举行了会议。我将所得印象记录如下：

第一轮发言：——

618

安东尼·艾登：谈谈安全保障问题如何？

布尔加宁：我们是强大的；我们不需要安全保障。取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总统：我向你保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为了和平的。

富尔：我们必须让德国统一。

第二轮发言：——

安东尼·艾登：你说你们不需要安全保障，那末，你为什么还要提议欧洲公约呢？

布尔加宁：取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要再谈德国。

总统：我已经坦率谈过我的意见了。

安东尼·艾登（插话）：德国问题还没有谈透彻。我们必须对它加以考虑。

布尔加宁：让我们谈欧洲安全问题吧。

富尔：那好吧，但是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

接着，我们就都走开了。^③

所有这一切大约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

除了维也纳会议以外，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对于这样

①②③ 1955年7月11日。

大量浪费时间,我感到有些焦心,但是柯克帕特里克告诉我这是通常的现象,何况,对于议事日程的争论是具有真正重大意义的,而不仅仅是一个表面问题。例如,象艾登提醒我的那样,波茨坦会议的议事日程就曾经把对意和约和对奥和约列为头两项。

此后两年中,直到签定了意和约时止,俄国人一直拒绝讨论对奥和约。^①

这些喋喋不休的讲演,若不是中间常常休会,真会使人无法忍受,感到厌倦。在休会期间我们都到那个可爱的小卖部去喝上几杯。在那里每个人都很快活,表现出充分的殷勤和友好。

在第一天晚上,俄国人到首相的别墅来晚餐。这纯粹是英、俄之间的事,我们告诉了他们我们要谈谈公事,他们假装着高兴的样子接受了我们的意见。

619 布尔加宁看起来像一个法国工业城市的激进社会党市长。他可能是个老好人。他装出一副高兴、友好而并非不庄重的风格。他是个胖子,六十岁左右,是个合适的傀儡人物。在正式会议上,他所有的发言都是照本宣读。在吃晚饭时和饭后,他谈话倒是很随便。^②

艾登在就餐和饭后的时间,以他那卓越的才华,充分运用他的感染力,来处理这些事情。当时我所得到的印象如下:

(1) 在斯大林这个暴君去掉之后,他们是很轻松愉快的。(他们欢天喜地地说道,从1953年之后他们就在正常的白天工作,而不在整个夜间工作了!)(2) 他们不想再要一个斯大林——一个残忍而又变化莫测的暴君。(3) 赫鲁晓夫是老板,但不是另一个斯大林。他控制了党,从而在一个没有议会的国家里,他这就控制了政府。(4) 他们不能接受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重新统一德国,他们将为此而竭力反对。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公众会因此而感到恐惧。德国人过去对待他们毕竟真是太令人可怕了,他们恨德国人。(5) 他们不怕战争;他们不相信美国真会向他们进攻。

① 阿翁伯爵:《兜了一圈》,第305页。

② 1955年7月19日。

(6) 他们担心中国。他们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们(象我们一样)愿望金门和马祖能沉没海底。(7) 从长期着眼,他们可能害怕中国将成为他们东翼的一个危险。我想,他们可能愿意有一个他们能够进行掠夺的软弱的民族主义或资本主义中国,而不愿意有一个他们不得不予以援助的共产主义中国。(8)他们不想要会议失败。他们愿意打成一个平局。①

艾登作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想使俄国人同意某种妥协,以便使德国重新统一问题至少可以继续讨论下去。我想,他们是被他的公正态度所打动了。

描写这次盛会的细节会使人厌烦。艾登已经作了使人钦佩的叙述,美国国务院也即将公布正式记载。况且,那些没有正式公布的讲演稿,事实上已经透露给报界了。

7月20日艾登和我前往总统和杜勒斯那里共进早餐,时间安排在上午八时半这样一个不合道理的时刻。艾森豪威尔决心要取得某种可以称之为成功的结果,或者,无论如何也要避免失败。在外交部长们开了一次不得要领的会议之后,政府首脑终于同意大家可以保持不同的意见。 620

但是大家商定交给外交部长们一项任务,拟具一份在明天上午下达给他们自己的指令,限当天下午“送呈”各政府首脑。②

在7月21日下午开全体会议的时候,布尔加宁担任主席,他以自己的一长篇讲话作为会议的开始。他讲话的题目虽然名义上是裁军,实际上他讨论的是欧洲安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其余所有问题。他甚至提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与华沙条约成员国之间缔结一项新欧洲条约的文本。他接着就另谈一个与争论问题比较接近的题目。但是,由于他的计划实际上是要立即废除一切核武器而又没有任何有效的控制制度,所以这不是一个有价值的

① 1955年7月19日。

② 1955年7月20日。

贡献。

艾森豪威尔接着发言，发表了一篇虽不十分有条理却很动人的讲演。他建议把铁幕两边的每样东西都加以开放，让任何人都能作充分的视察。^①

很明显，总统很重视这个带有戏剧性建议的重大作用，而俄国人在回到莫斯科之后则注定要加以拒绝。他认为，为互相进行空中视察提供便利，才能切实走向真正的安全。艾登接着提出了另外一个温和而切合实际的建议：

为什么不以目前的界线为中心，先在一百英里内进行视察，然后扩大到二百英里，然后再进一步扩大呢？^②

考虑到这种外交演出的幕后的现实性，我递给柯克帕特里克一张小条子：

“现在取消核武器，会把恐怖扩展到全欧洲。”^③

因为我正在开始越来越多地想着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核威力是在维护和平而不是在危害和平。这个悖理的事实使后来关于裁军问题的许多辩论造成混乱，并使之无效。

第二天，7月22日，我们在艾登的别墅里共进早餐。

杜勒斯来了。他一个一个地接连吃煮鸡蛋……我们极力设法使他开口讲话……但是他吃得那样慢，说得也那样慢，以致我们从他的嘴里简直听不到什么我们以前没有听到过的东西。^④

当外交部长们按照指示在上午单独会见时，事实上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的。

关于欧洲安全问题的指令文本业已一致同意。关于德国问题的文本也获得一致同意，但东、西德政府有“权”参加这一点除外。这是阿登

①②③ 1955年7月21日。

④ 1955年7月22日。

纳决不能接受的。①

但是这一切都费了很长的时间。的确，当时间过了下午一时，皮奈第一次尝到俄国人筑墙战术的味道，感到十分烦恼。莫洛托夫开玩笑地提议我们下午二时半再开会。皮奈觉得这有点太过分了，他建议改在下午三时半。

我承认我要去同法国人共进午餐，并且正在盼望着要去；但是我认为下午的会订在三点钟开就可以了。莫洛托夫说“麦克米伦先生总是搞折衷方案——而且都是些不错的折衷方案。就决定在下午三时吧。”大家就这样同意了。②

法国的午餐确实太丰盛了。气氛轻松而愉快。参加午宴的女士们有克拉丽莎、多罗西和富尔夫人。法国人没有忘记他们的经验，摆出了一道一道珍馐美味，酒也同样是名贵的。这是在对野蛮的新世界（不管是在东方的还是在西方的）显示旧世界的文雅精致。

这是痛苦的一天，没干出什么事来。外交部长会议和政府首脑会议要做的事，一直到晚八时十五分才做完。英国代表团接着就去参加俄国方面为他们举行的宴会。空气是轻松自在的。俄国人十分好客，以举行宴会为乐事，照例的各种美味全有，之后就是祝酒，讲了一些关于上一次大战、同志般的关系、将来的合作等富有情感的话，其中夹杂很多有风趣的话。我越来越觉得布尔加宁虽然名义上是首脑，但不重要，而莫洛托夫已经是个病人了。

赫鲁晓夫是个谜。这个肥胖、粗野、长了一双猪眼、讲起话来没完没了的人，怎么能真的当上这个具有亿万人民和幅员广阔的国家的首脑——沙皇的候补者？

朱可夫元帅也出场了，他是一个正规军人，满可以在旧俄国的军队里和英国的军队里都干得很出色。就是在这次的宴会上，艾登邀请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于来春访英国。他们对这个邀请显然是真

①② 1955年7月22日。

心喜悦地接受了。

我的印象如下：

1. 他们不想要战争。只要核武器存在一天，他们知道战争就是不可能的。当然，他们很想让弱小国家放弃核武器。

2. 他们对他们同中国的关系并不十分中意。现在同中国的结盟是为了一时的方便；但是这大大吮吸了他们的工业和军事资源。尤其是，他们展望未来，疑虑中国会不会成为一个危险。

3. 虽然他们大吹大擂自己的农业情况，他们却为此忧心忡忡。

4. 他们对德国人又恨又怕。只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存在一天，他们就要想尽一切方法阻止德国重新统一。^①

在某种意义上，会议的工作现在是完成了。所能作到的最好一件事是，为本年较晚时期举行的外交部长会议所拟定的指令，取得一致的意见。在工作了很长一天之后，终于照我原来所提出的形式达成了协议，把欧洲安全问题和德国重新统一问题联系起来列在一个议题之下。或许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在裁军的指令上所用的那些可以令人接受的词句被批准了。最后一次的辩论是在一个有限制的会议上进行的。俄国人对于文本的每个字几乎都要争论，有几次使人很担心让总统下不了台。但是到了五点钟的时候，我们把所有可能解决的各点都完成了。剩下来的，只有定于六时半在大厅里举行正式全体会议这一点了。富尔先生担任主席，指名艾登发言，他的讲话简短，调子恰到好处。布尔加宁接着发言，既长而又粗野，把头一天所讲过而后来被迫逐步放弃的那套主张又重新说了一遍。无疑，这些话部分是有意讲给他国内人听的，部分则只是出于他的恼怒。总统非常生气，但忍着性子只驳斥了他一句，然后发表一篇简短而高明的讲演。

经过了六天台面上和幕后的艰苦工作，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① 1955年7月22日。

总统和杜勒斯直接去飞机场。我们向法国人告别后回来参加一个宴会。我们应俄国人的要求还要再举行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我们所讨论的几乎全是关于印度支那的问题，俄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所抱的观点似乎是很合理的。

布尔加宁接着开始谈他去英国访问的问题。赫鲁晓夫插了嘴，对于这个前景似乎相当高兴。大家同意他们要在莫斯科“同他们的同僚们讨论一下”。他们希望能看到英国下院在星期三立刻宣告这事。

然后他们提出其他访问的问题——军事代表团和海军访问等问题。显然朱可夫元帅也想要有他自己的旅行！^①

艾登紧接着在战俘问题上向他们呼吁，相信仍然有为数极多的德国和意大利战俘关押在苏联，俄国人极力抗辩否认。

赫鲁晓夫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来证明他曾在数年前想把某一个意大利战俘遣送回国，但是已死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

如果他们讲的是事实（我们没有人相信），那末，几十万这类可怜的人必定都死了。我认为，艾登对这件事处理得很好。他只把话讲到恰好足以刺痛他们，也许使他们感到担心（因为他们似乎想讨人喜欢），而又不把话讲得太多，显得对这样一次访问有所失礼或者失当。^②

会议的成就，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呢？首相在回到英国后向记者们讲道：

我想我们不过多纠缠在一些细节上，这是明智的。我真正想去完成的是三件事：使大家对于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取得一致看法；探索前进的道路；在私下的讨论中设法消除不信任感。我认为，如果说我们在这三件事上的成就已经超过了我所预期的，这是事实。^③

其余的人则比较抱怀疑态度，并且觉得除了比以往各次会议气氛较为友好之外，没有真正的收获。当议会对这件事进行辩论时，艾

①② 1955年7月23日。

③ 《纪事年鉴》，1955年版，第45页。

登竭力把他的第一次说明讲得既清楚又无瑕可击。莫里森接着发言,话说得公正而大方。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来访消息的宣布,或许给这次讨论增添了一些生气,否则就很平淡乏味。虽然下院是表同情的,我觉得我没有多少可讲的了,而不得不结束这次辩论。我告诉他们:

……一个外交部长总是处在无情的两难境地,他不是讲些陈词滥调就会轻言泄密。他要么是呆头呆脑,要么是捅漏子。^①

在回想日内瓦这一奇特——对我是新鲜的——经验时,我受到一些鼓舞,这大部分是因为在我心里有这样一个印象:所有那些玩弄核赌博的大国现在都承认现代战争——即核战争——是很不可能发生的,因它只能导致互相毁灭。

625 其他国家,如中国,也应当知道这一点,这是很重要的。“和平”,所有报纸的社论作家都说,“现在得到了保证,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在今天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者。”在几段话之后,他们接着写道“要禁止核弹”。但是这种三段论法真站得住脚吗?这种推理对吗?如果我们废除核弹(它已经消除了战争),那不是又要把战争带回来吗?总有一个(战争的)危险,即使我们能建立起一种严密的控制制度,有视察以及其他种种措施也不行,何况这些还根本办不到。^②

照我看,俄国人是会信服这个事实的。但也许有一件事他们不能比我们有更多的认识:在各大国之间由于它们具有核力量而实际上消除了战争后还存在一种危险,即可能会使没有这种顾虑的小国之间更易于发生小的冲突。我在日内瓦所得到的经验,有助于使我在后来做首相的时候努力去同俄国搞缓和。但是我那时并没有充分理解大国协作的破裂,其影响是多么严重,也没有完全理解,当一些大帝国逐渐衰落下去之后,那些曾在他们控制下得以维

① 1955年7月27日。

② 1955年7月25日。

持和平和秩序的地区,却普遍地变成巴尔干半岛式的地区,这将是多么危险的局势。

我们回国后,我立即前往查特韦尔去朝圣,发现丘吉尔独自一人在那里。

他对于我这些小小的关心感到十分欣慰。蒙塔古·布朗(以前是他的一个私人秘书,现在回到外交部了)每周去看他二、三次,帮他处理繁重的通信工作,并且挑选一批国外来电给他看。^①

他对日内瓦会议很感兴趣,但议论了一会儿之后,他显然更喜欢回忆往事。

我就听他谈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利波利、劳合·乔治等等掌故。他说,在他担任过的各项职位中(除首相一职外)他最得意的是在海军部。但是,唉,它的魅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核战争和国防部已经使这个部昔日的光辉消失殆尽。他认为阿斯奎斯误听人言,要不是为了他的朋友所误,他〔在1916年〕原可以保住自己的职位。但是,即使他有功绩,他却不能指挥战争。他的头脑太死板了。^②

626

俄国领导人在从日内瓦回国途中认为有必要去东德住上几天,以表示他们的忠诚支持。在这之后,阿登纳接着在9月8日访问了莫斯科。他同俄国签定一项协定,把将近一万名的所谓“战俘”(这是俄国人承认还在他们手里的仅有一批战俘)连同在苏联国土所能找到的其他德国人送回德国。德国总理被迫付出的代价是建立两国的外交关系。许多人认为这是苏联在外交上的巨大胜利。但我并没有这样的担心。“至少这将使德国人不会再来责难我们(他们往往这样说)对俄国人太软弱了。”^③

① 1955年7月25日。

② 1955年8月5日。

③ 1955年9月17日。

在阿登纳离开(莫斯科)几天之后,苏联与东德政府缔结了一项条约,表面上给他们以联邦共和国所享有的同样的主权。西方国家政府为了响应阿登纳的要求,在9月底发表声明,认为联邦共和国是德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以示反击。它们还补充说,它们认为德国现存的边界是临时性的,只在和平条约谈妥以前有效。这种作法是否明智是可以争论的;但这是双方在举行日内瓦外长会议之前玩的一部分外交花招。

在国内,当公众静待关于解决欧洲问题的秋季会议能有所成就的时候,他们对裁军开始担心起来。表面上完善的俄国建议已经对舆论发生了影响。可是,我们知道俄国人自己也承认要建立任何视察和监督制度都是有困难的,而只有依靠这种制度,才能废除核武器,才能对军备进行任何真正有效的限制。我本人觉得,在即将到来的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会议上,我们必须坚持彻底讨论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如果大家都明白我们想不出有效的办法,如果俄国人也同意我们全都受这一困难的折磨,那末,我们应该至少把我们协议的范围加以扩大。同时,我们决不可欺骗自己。我们一定不要被引到一种虚假裁军的邪途上去,那只是建筑在一纸“意愿的声明”之上,而没有任何有效的监督制度为其基础。公众当然期望能采取某种积极行动,而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政治问题。不顾来自多方面的压力,我继续主张我们应当集中全力促使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对各种现实问题——视察和监督等问题进行有效的研究。若是没有这些制度,废除核武器协定反而可能成为对和平的一种积极威胁,因为它会削弱对战争的威慑力量,从而引起一场秘密制造核武器的危险竞赛。

对裁军问题这一场热烈而又往往是无知的争论,还将继续进行若干年而得不出任何积极结果。在各国首脑之间的讨论,主要是搞唇枪舌剑,而双方又把它用作宣传。不久之后达成了禁止核

试验的协议。甚至在当时，肯尼迪总统和我都深为遗憾地接受了该条约只限制那些易于为世界任何地方的科学工作者所查核的核试验，即大气层核试验。由于俄国人拒绝接受在俄国国土上进行那怕是怎样有限制的视察制度，所以我们不能把废除地下核试验也包括在条约之内。

我们自己的核武器发展情况这时候有些使人担心。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进行我们自己的核试验。因而，废止核试验的协定会使我们为难；但是，如果能够设计出一个真正有效的制度，这就不致成为一项压倒一切的大事。我也觉得我们应该准备讨论把常规部队减少到任何为大家所同意的数字，并且应当准备好把这样的一个限制立即付诸实行。此外，我们可以提议核大国应立即承诺除了受到侵略性的攻击外，对任何国家都不使用任何种类的非常规武器。但是，我们不应听任自己（即使是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接受我们衷心认为既无效而又危险的那些建议。我主要担忧的仍然是那种易于使我们上当的谬论：“核战争已经使战争成为不可能的了。所以要废除核战争。” 628

第十九章 纷争的种子

9月25日，我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出席这种会议已经成为所有各国外长的职责了。虽然要对正式辩论作出什么很有价值的贡献是困难的，但是这样的集会对于非正式的讨论却提供了有益的机会。

在我到达纽约时，曾与我在阿尔及尔共过事的、我们那位受人钦佩的代表皮尔逊·狄克逊爵士前来迎接我。他告诉我：

艾森豪威尔总统于星期六凌晨在丹佛城突患冠状动脉血栓形成。^①

这个不幸消息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同情和忧伤。甚至连平时的那批摄影记者和新闻人士，

似乎也表现出一种异常的沉静——几乎是一种虔诚的沉默。整个美国都深感焦虑不安。^②

当我第二天见到杜勒斯时，他对我说，他希望并且相信总统会很快恢复健康的。在此期间，我们的工作继续进行，还与美国人和法国人安排了一系列的会议。

这些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官方的工作人员一直在极其妥善地为开会作好准备。我设法使唯一存在的严重分歧问题——英国的非军事区的主张——达成协议。^③

在杜勒斯招待各国外长——莫洛托夫当然在内——的宴会上，也有机会讨论其他一些问题。就日内瓦会议的安排方面来说，件件都很容易地取得了协议。但是还有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我们

①② 1955年9月25日。

③ 1955年9月27日。

却认为不得不提出来。

在日内瓦的时候，艾登和艾森豪威尔曾经充分地讨论了远东问题。⁶³⁰前者坚持说，对金门和马祖两个岛屿承担义务，不是出于坚强而是出于软弱。总统接受了这个论断。他承认他的责任是沉重的，他决心去抑制蒋。但是他所愿意作的，只限于努力说服蒋不要把这些岛屿当作根据地，而只看成是前哨阵地，这样，如果这些岛屿最后被攻占，则可以减少威信的损失。在我们的私下会谈中，俄国领导人没有向我们掩饰由于他们同中国的关系消耗他们大量资源，以及他们对于前途的担心。我们在日内瓦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劝人忍耐；而俄国人充分认识到远东危机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在9月间，美中双方就彼此交换在各方领土内的对方国民达成协议。因此，到了我们同莫洛托夫在纽约会谈的时候，局势虽然仍旧令人焦虑，但看起来却不再像以前那样紧张了。的确，当我们10月底在日内瓦会面时，莫洛托夫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中国）共产党船只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扣留的问题。到了现在，我们所主要关心的，是劝说美国人对于英国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问题采取更为宽容的观点。这始终是我们与华盛顿的关系中的一个伤脑筋的问题。尽管我们强烈感到禁止出口的项目过于广泛，但鉴于其他方面发生的困难要大得多，我们也就同意推迟到年底再作最后决定。因此，在几个月的期间内，远东危机，虽然后来变得激化，暂时却已消失。除了重大的欧洲问题外，一切忧虑目前都集中在日益增长的中东纠纷和俄国人要进行干涉的紧急信号上。

作为国防大臣，即使仅仅为了给伊拉克和伊朗两个友好国家的政府以支援，我一直不得不强调英美两国政策一致性的重要性。1955年2月，土耳其和伊拉克在巴格达签订了一个共同防务条约，⁶³¹英国于4月4日声明参加。巴基斯坦于7月宣布参加巴格达条

约,是一次重大的成功。连杜勒斯当时也准备对伊拉克人说,如果能够达成巴勒斯坦的和解,美国就同意作为正式成员国参加。但是巩固中东稳定状态的一切努力都被阿一以的对抗给破坏了。

1955年在尼罗河谷发生的事件是英国单方面的、不求报酬的姿态。我们撤离了苏丹;我们作了退出运河区的准备;我们同意在对埃及政府解冻英镑的问题上作出新安排,我们也答应提供规模有限的武器。不幸的是,我们在1954年的协定中未就埃及解除对以色列的封锁一事作出规定。5月间,因对埃及的宣传和不妥协态度感到惊慌,并担心其发动进攻的以色列总理摩西·夏里特,请求美国作出保证。杜勒斯不愿意保证一个为全体阿拉伯国家所拒绝的边界,而只能在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之间达成协议时,才考虑采取这样一种措施。

杜勒斯秘密地提出了一个解决阿一以争端的方案,这在当时成了急待讨论的主题。这个方案打算为阿拉伯国家规定通过内格夫的通行主权,而又不损害以色列有在红海上通往埃拉特港的通行主权。这就是说,以色列应该让出埃拉特港以北几英里的内格夫最南端的两小块三角地,一块连同它在埃一以边界上的基地让给埃及,另一块连同它在约一以边界上的基地让给约旦。这两块三角地的两端同以色列那条从贝尔谢巴到埃拉特港的公路连接起来;在这个连接点上(那里可能需要由两国进行混合监督或由国际监督),一条完全由阿拉伯控制的从埃及到约旦的公路,可以从上面越过(或者从下面穿过)那条通往埃拉特港的公路,而这后一条公路则仍由以色列全权控制。据信,这种外交手法和工程技术的结合,将是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中的一种新奇的、或许具有决定性的特征。这个颇为异想天开的方案是杜勒斯的得意之作。像白衣骑士一样,他洋洋得意地声称这是他自己的发明。

632 美英两国驻开罗的大使都传来了不利于杜勒斯那个方案的报

道,看来不可能有什么进展。加沙一直不停地发生边界事件,虽然加沙的形势在6月中旬有所改善,可是又传来了埃及人可能倒向俄国人一边的谣言。

在议会辩论的过程中,我所能作的,只是重申英国政府要在运送武器上继续保持均衡和遵守三国宣言的决心。^①

在此期间,我一直力劝杜勒斯参加巴格达条约,并为英国对伊拉克努里·赛义德政府供应“百人长式”坦克提供资金。

由美国创始的、接着又退出的那个土—伊条约早已留给我们去办了。美国人是否能够用下列两种方式来帮助我们同努里·巴夏的关系呢:(一)许诺在〔他解决以一埃问题的设想〕已经推动之后参加土—伊条约;(二)用国外采购的方式从我们这里购买“百人长式”坦克交给伊拉克。^②

在首脑会议上,艾登和我竭力劝说总统与我们一起把英国“百人长式”坦克送给伊拉克。总统同意:如果我们赠与十辆,美国愿意赠与七十辆或者更多些,由“国外采购”从我们的库存中提出供应——这真是一项非常令人满意的安排。

在这种令人困惑的气氛中(撇开以色列问题不谈,阿拉伯各国之间的关系也象万花筒似地瞬息万变),只有一件事能差强人意。沙特阿拉伯一直在利用宣传和金钱干扰我们在亚丁保护国的地位。我说服内阁派出了大批增援部队,这才使秩序迅速恢复。伊冯·柯克帕特里克爵士不失时机地向我和首相指出了这一教训:“要在亚丁海湾保持强有力的地位。”

在王室和努里·巴夏的得力领导下,伊拉克看来好像是这一动荡局势中的一个相当可靠的因素,但是纳赛尔却业已开始在用他的暴力论的宣传来煽动阿拉伯国家。任何温和克制的表现都受

① 参阅本卷原书第149页。

② 1955年7月14日。

到谴责，阿拉伯国家中的那些比较稳定的政府对它们所遭受的压力开始显出惊恐。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和约旦越来越处于纳赛尔的影响之下，中东政治中司空见惯的那种通常的行贿与恐怖交替使用的手法也在发挥作用。虽然叙利亚人向努里·巴夏保证埃—叙条约是针对以色列而不是针对伊拉克的，但是随后的事态发展证明我们的伊拉克朋友的担忧是完全有理由的。

我们从首脑会议开会回来之后，在伦敦和华盛顿之间，关于美国愿否加入巴格达条约和遵循他们自己要我们走的那条道路的问题，用冗长而错综复杂的文电往来进行了磋商。杜勒斯仍旧坚持只有达成巴勒斯坦和解并由美国加以确保之后才有可能。因此，他提议在8月19日公布他的和解计划，但这是一个比较概括而不那么具体的方案。

杜勒斯现在提议：（一）以相当一般性的词句发表他的声明；（二）定于8月25日或26日发表。这引起唐宁街十号不安。然而，伊冯爵士在电话中还是沉着回答。^①

我赞成让美国人走在前面，因为照目前这种形式发表，我看不出会在阿拉伯国家引起任何重大的反应。何况，

我们已经使伊拉克得到十辆“百人长式”坦克，还答应以后有更多的送去……。在那个日子以后，美国方面所作的任何演说害处都会大得多——因为竞选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他们就要厚着脸皮去追求犹太人的选票。^②

我们当时还得到了一个明确的许诺，即如果阿—以的紧张局势一旦缓和下来，美国就会加入巴格达条约。这是一个很值得冒一些风险去争取的目标。

634 现在我才开始对杜勒斯的奇特而复杂的性格有了一些了解。他尽管有他的缺点——他那恼人的慢吞吞的讲话，他那不愿正面

^{①②} 1955年8月19日。

看人,他那迂回曲折的工作方法——但是只要透过他的外表,还是能发现他有某些可爱之处。他那难得的微笑很有魅力。我留心他的所作所为,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但我却能够理解他本国许多同胞对他所抱的那种既钦佩又猜疑的心情。他多年来就是一位热衷外交事务的学者,并在巴黎以及其他地方为美国各届政府工作过。但他学识固然渊博,而成就似乎不大,尽管仪表非凡,讲起话来也往往俨然一代泰斗,然而他实际上是一位狐疑不决、优柔寡断的人。但是他那动摇不定的本性却为他的华丽辞藻和接二连三的巧妙计划所掩盖。我们感到的困难是,艾森豪威尔对他是言听计从;除了在极少数至为重要的事件之外,要越过这位国务卿而向总统直接吁请,是没有用处的。素具幽默和机智的柯克帕特里克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在辩论关于公布杜勒斯计划的问题时,他写信给我说:

杜勒斯先生有些事特别使首相生气。因此,当你听到他对杜勒斯先生最近那些古怪行径大为反感时,你将不会感到意外。

但我的印象是,首相已经出了气,他不会同美国人公开闹翻的。

声明草案委实并不太坏,我确信我们的最好办法是要尽量加以利用。^①

实际上,当公告和我们的支持声明发表时,伊拉克给予了好评,虽然其他阿拉伯国家犹豫不决,还在等待埃及率先表态。不幸,几乎就在同时加沙发生了危险事件,9月4日,以色列也发动了进攻。正如我不得不向意大利外交部长盖塔诺·马蒂诺(他适于此时访我)解释的那样,加沙的怒火是从杜勒斯的提案里点燃起来的。然而,迄今还没有一个国家指责过这一提案。9月中旬,以色列大使伊莱亚胡·艾拉特那位乐观而真挚的人来访问我。 635

他是奉命来提一些问题的(那是我知道他会问的),我作了一些回答

^① 1955年8月20日。

(那也是他盼望我会给予答复的)。随后,我们对形势作了一次非常有益的交谈。①)

埃及的进行武装——部分是由我们帮助的——使以色列人感到忧虑,但是这位大使完全承认,我们在配合法国人和美国人向各对抗国家提供武器方面,已尽最大努力来保持公平的均势。自然,他也抱怨说,如果必须要等待作出最后解决才给以色列以保证,那实际就是给阿拉伯人以否决权。另一方面,我也不得不指出,要保证一条谁都不同意的边界,那是有困难的。如果新计划获得成功,形势就会有所改变。

但是,埃及人坚不让步,他们仍然要求至少得到南内格夫,并且声明,走廊地带的方式是不会令人满意的。尽管如此,就连他们也没有完全拒绝美国的计划,随后却传来了一则标志着惊人的发展的消息。

9月22日,我们听说埃及和俄国达成一笔重要的武器交易,其规模之大足以严重地改变中东的实力均势。显而易见,尽管我们单方面给予埃及人以各种各样的好处,但是我们并未赢得丝毫感激之情。纳赛尔此时已经看清,只要稍施压力,他就可以引起西方和苏联竞出高价。这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为媒介所达成的现实交易是:一百架米格飞机,一百辆坦克,一定数量的潜水艇,以及俄国技术人员在一个“限定期内”的援助。在此之前,所有中东国家都是依靠西方大国的。虽然在细节上有过许多争议,但是一般都同意在公平的基础上交付武器。现在在已经错综复杂的混乱局面中,又增添了一个新的不祥因素。这是不是克里姆林宫决心要大张旗鼓地进入中东政治的开始呢?这是不是俄国的新帝国主义行动呢?是要我们退回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几届英国政府周而复始地面临的那种局面吗?

① 1955年9月15日。

首相立即同我面商，并向华盛顿发出了急电。我也向埃及新任大使萨米·阿布勒·费图先生表示不满，他只能多少有点言不由衷地嘟哝说，这笔交易还没有办成。当我在纽约见到杜勒斯时，他

告诉我，他曾以强硬口气对莫洛托夫谈及此事，并告诉他，总统和他都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莫洛托夫力图把它当作一笔纯粹的商业交易搪塞过去，但是杜勒斯不听他的那一套。我们全面地谈论了这个问题，谈论了我们可以用什么办法来对纳赛尔施加压力，是用大棒还是用胡萝卜，还是两者兼使。^①

真糟糕，这两种手段都证明无效。9月27日，纳赛尔正式宣布这笔交易已经办成，事情已经显然不可收拾了。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在纽约的四国外长当天晚餐后就开会了。会议是按通常形式进行的：

……在会议室中间放着四把供主角坐的扶手靠椅。全体副手、专门人员等等，都围坐在后面。^②

在提到了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和联合国接纳新会员国的选举问题之后，杜勒斯问是否还有其他问题要提出来。我首先提到了巴勒斯坦问题。当我们正在试图谈判一些较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同时使这个地区的形势保持平静，确是符合所有大国的利益的。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局势既紧张又微妙。我们曾经努力使它们在军备上保持平衡，并尽可能地制止军备竞赛。我曾听说俄国出售了大批武器给埃及。如果属实，这将在整个中东引起严重的后果。

莫洛托夫的回答同他以前对杜勒斯所谈的颇有出入。他说他对这件事一点也不知道，但是愿意去查明。他同意应使紧张局势缓和下来。^③

① 1955年9月26日。

②③ 1955年9月27日。

但是，怎样才能保持平衡呢？他建议说：也许可以通过互换情报吧？此时，他似乎是很尴尬，甚至有点鬼鬼祟祟的样子。

俄国人这次的突然闯入，是令人深感不安的根源，在此之前，他们一直小心翼翼地置身事外。在同我商定之后，杜勒斯便着手向纳赛尔写了一封私人抗议信，此外还通过美国驻开罗大使提出抗议。然而，莫洛托夫关于互换军火交易情报的提议，却引起了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艾登很有照它的表面价值予以接受的意思，并且希望使俄国人能参加某种大家所同意的政策，以使中东各国的军备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均衡的基础之上。虽然这种想法有明显的诱惑力，但是也有危险的一面。在此之前，俄国人的政策一直是不插手中东。邀请他们参加进来，这样做好吗？

在一次俄国人举行的宴会上，我终于从莫洛托夫那里挤出一点关于他所说的交换看法究竟怀着什么意思。我得出的结论是：

俄国人不会因艾登或其他任何人的花言巧语而放弃这一新的行动。他们正在设法接近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利比亚和其他一些国家。当欧洲受到日内瓦精神的“遏制”，而远东暂时变得稳定的时候，这实际上是他们在中东一次新进攻的开始。俄国人这样作是无须付出任何代价的。他们将要提供的武器都是陈旧的或行将报废的，总之，反正都是一些马上就要替换的东西。^①

我也没有因埃及外长马茂德·法齐的谈话而感到多大欣慰。他是主动要求来见我的。他是一个老派的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圆滑而又会巴结人。他说武器交易这个插曲是“一件最令人遗憾的事件”。尽管如此，形势仍是“可以改善的”。我对似乎完全违背去年638 “英埃条约”整个精神和日后将会充满危险的武器协议，只能表示惊愕。

此时艾登正急于要向布尔加宁发出他个人的呼吁；可是我坦

^① 1955年9月29日。

率指出他所拟的措词过于广泛,是很危险的。法齐早已向我表明,埃及对杜勒斯建议中的走廊安排不能满意。埃及现在要求的不仅是南内格夫,而是整个内格夫。在他那种迎合人意的态度背后,有一种强硬的甚至是挑衅的口气,这使我猜疑他确信会得到苏联的支持。我本人认为给布尔加宁的任何私人信件都不会起作用。我们的正确途径是支持伊朗以及其他愿意与我们一起参加巴格达条约的国家。首先,我们必须作出新的努力劝说迟疑不决的美国人毅然改变方针。我已去华盛顿,在那里与伦敦频繁交往函电。我不喜欢艾登草稿中的最后一段。

他不能代表美国人(他们决不同意)和法国人(他们没有接到过我们的要求)去建议同俄国人一起讨论我们对中东各国供应武器的计划。^①

我一回到英国就听到首相已经把他给布尔加宁的电文提交内阁决定。这是一次精神上的重大胜利,因为我觉得自己正在陷入以前历届首相迫使艾登所处的那种地位。这类电文必须得到现任外交大臣的同意,如有任何分歧,就必须提交内阁决定。然而,由于我所提出的要点实际上已经纳入修正稿之中,我也就感到满意。于是这封电报就在10月4日发出了。这次小小的争执有它的喜剧性的一面,因为,尽管在伦敦是那么激动,那么迫切要求采取紧急行动,以后才发现在10月10日以前,无论是布尔加宁或是赫鲁晓夫都不在莫斯科,我们驻那里的大使没有机会在10月10日以前见到他们。

然而,我们的涉及面很广的政策正在开始形成。

639

我想使波斯(伊朗)参加巴格达条约;尽一切可能地支援伊拉克,并且要求美国也这样做。我想宣布苏丹立即独立(纳赛尔对这是不会喜欢的),并要求美国人减少对埃及的经济援助,转而增加对伊拉克的援助。^②

① 1955年10月2日。

② 1955年10月4日。

尽速把我们的坦克运交伊拉克，并催促美国配合行动，这也是极为重要的事。日内瓦精神固然很好，可是，如果它只是在西方国家中造成一定程度的松懈，并且引起俄国人在中东搞新的侵略，那么我们一切努力的结果太惨了。

布尔加宁的复电来了，可是不太令人鼓舞。他声言埃及向捷克斯洛伐克购买武器的决定是没有理由值得担忧的。埃及过去已经接受了许多国家的武器装备，它确保国防和维护国家独立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并且那笔交易也没有附带任何政治条件，是纯粹商业性的。总之，缓和紧张局势的最好办法是根据俄国人的建议，达成一项裁军的总协议。我所能得到唯一安慰的是：就在我们收到莫斯科的这个多少有点奸猾的复电的同一天（10月11日），伊朗正式参加了巴格达条约。

在这慌乱奔走之际，我还不得不抽空去参加10月7日在伯恩默思举行的保守党大会，并发表演说。我利用这个机会阐明了我们在即将到来的外长会议上所抱的目标：

640 我们能否成功，取决于对下述一个极简单问题的答复：为什么苏联政府反对通过自由选举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呢？当然，现在我完全明白，俄国在遭受纳粹军队横加于它的严重战争灾害和可怖的伤亡之后，俄国人民和政府势必要下定决心不许这种灾难重新发生，不许俄国的神圣领土重遭侵略。因此，利用战后的那些军事占领国作为一种防护屏障也许是很自然的事。这至少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如果我们想取得进展，那就非努力去理解他们不可。但如果这就是困难之处，我确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我相信我们能够制订出计划，使全世界会感到——并且我希望俄国政府也会感到——我们的计划能够给予俄国人以充分的保障，以防止来自一个统一的德国的任何威胁，不管这个统一的德国是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还是保持中立的。

这些就是西方政府首脑在去年5月草拟的安全计划的大意，我们将在几个星期之内把它更详尽地提出来。我们准备在法律条约里增列实

际的军事布署和安排，并为这同一的目的而作出互相视察和监督的安排，也就是用军事谅解的行动来加强条约文字的意义。如果这些建议，照它们现在所声明的那样或者像将要声明的那样，不能完全满足和适应俄国人的要求的话，那么，我们就让他们提出修正案好了，我们也一定会以希望达成协议的精神来予以考虑。

同时我不能对摆在前面的危险视若无睹。俄国人在日内瓦所表现的比较圆通的态度——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以及我们愿意按照它的表面价值予以接受这一事实，很可能导致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削弱反苏战线的团结。我们已经从阵地战转入了运动战。虽然追求的目标更高些，但外交政策的运用却更微妙了。

如果俄国决定站在阿拉伯一边反对以色列，如果他们不只限于对埃及提供武器，那么要使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国家仍对我们忠心无贰将是困难的。那时我们的石油利益，甚至有人认为我们作为一个大国的存在都会受到威胁。我们用什么来还击呢？我们可以努力使阿拉伯人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危险。俄国是不会给予无偿帮助的，而所要付出的代价将是令人难堪的，尤其是对那些比较保守的国家更是如此。我们唯一有效的措施似乎只能是成立一个由伊拉克领导的阿拉伯集团。但是，这当然可能引起其他阿拉伯国 641 家的敌视，并且在地理上也是困难的，如果埃及和叙利亚对此抱敌对态度，或者都落到共产党政府统治之下。我们马上就要在日内瓦与俄国人进行接触。我们必须作出新的努力，向他们指出他们是正在制造危险，不管是作为他们一项确定的侵略政策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其危险的含义。

现在开日内瓦会议的一切工作都已就绪。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个需要立即予以注意的令人恼火的新问题。沙特阿拉伯要求取得它实际没有权利得到的布赖米绿洲，而这块绿洲对于我们的石油利益却至关重要。经一致同意后成立一个仲裁法庭，并于9月间

开始工作。由于沙特阿拉伯成员的行径和肆无忌惮的行贿活动，英国代表退出了，仲裁法庭也垮台了。我们唯一的办法是支持当地的统治者，承认他的权利，并以武力占领这个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作出这个决定而不先征询美国、甚至英联邦各国的意见是比较明智的。这项军事行动在10月16日上午顺利完成，并及时通知下院。艾德礼忠实地支持政府的行动，并当我在日内瓦把发生的事情告诉杜勒斯时，他似乎并不感到过分不安，虽然一两天后他抱怨说，国务院因为事先没有得到通知而深感不安。我解释说，这是由于担心连累他背上同谋的罪名，他对这一解释似感满意。我们对行贿的指责证明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当我们占领了这个地区时，发现一个沙特阿拉伯警察分局拥有一笔远远超过它本身需要的巨额现款，并且拥有足以证实我们指责的大批文件。海湾的统治者当然完全与我们的行动一致，因为我们的行动增强了他们本身的安全。

在这一年早些时候，这个地区又出现了类似的纠纷，我们在这个地区所采取的行动是坚决的，并且符合我们的最终利益。在马斯喀特和阿曼的苏丹的宗主权之下行使地方权力的阿曼的伊马姆，由于得到沙特阿拉伯在财政上和政治上的支持，开始主张完全独立。他竟胆敢向开罗和其他地方派遣大使。艾登同意我的意见：
642 必须制止这种行动，我们必须给那个历来享有我们保护权的合法统治者以充分的支持。这一行动事后引起了许多麻烦，但是最后的结果完全证明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

在去日内瓦之前，我同杜勒斯在巴黎进一步商讨了中东问题。他同意赶紧给予伊拉克更多的坦克，并派遣军事和政治观察员去参加巴格达会议；但是他对美国成为正式会员国这一点仍然畏缩不前。他辩护说，参加任何正式条约都必须在参议院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数；但是他承认，为了便于美国参加巴格达条约，可以通过

一项“国会决议”来逃避这个难关。美国不会给予以色列以保证，但是会同意重申1950年的三国宣言。这使我们讨论起叙利亚的局势发展，它当时似乎正在向莫斯科—开罗轴心靠拢。他很担心，认为不能容许叙利亚走向共产主义，并且似乎准备采取某种反击行动。

我们继而谈到埃及，我们决心努力通过某种手段由西方集团修建阿斯旺水坝。他给我念了一份报道〔世界〕银行同国务院在华盛顿开会情况的电报，并问我们是否愿意参加。我说，“我们当然愿意”。……①

在随后几个星期中，德国和欧洲安全问题以及中东问题，看来都纠缠在一起了。我们的责任首先是集中解决这年夏初日内瓦会议上各国政府首脑所安排的任务。就这一点说，问题依然有待解决。怎样才能重新保证俄国不受统一的德国的威胁呢？西方三国外长在巴黎讨论了这个问题，10月25日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次规模较大的会上也讨论过。我们能够提出某种新的安全公约或新的保证吗？我从斯特拉斯堡时期就结识了的老朋友、挪威外交部长哈佛·兰格博士主动来见我。他对前途是悲观的，认为俄国人决不会交出东德。

他补充说，即使德国提议保持中立，情况依然是这样。这是使人感 643
兴趣的，因为挪威人消息灵通而且判断力强。他也许说对了。②

怀着这种心情，以及在矛盾重重的忧虑交迫下，我们于10月26日到达了日内瓦。伊冯·柯克帕特里克爵士和其他外交部专家是同我一起来的，约翰·温德姆细心地照料我们的一切物质需要。我们占用了一幢小而适意的别墅，这比旅馆要舒适多了。我们的会议再一次被安排在那个阴郁的环境中召开。皮奈担任主席，在一些程序事项取得一致意见后，开始了第一项议题，即德国

①② 1955年10月26日。

重新统一和欧洲安全问题。皮奈作了几点说明之后就正式推出了英—美—法计划。接着就演了一场滑稽可笑的勾心斗角戏。

莫洛托夫动议休会到明天,以便明天再开始讨论第一项议题。我们同意了。在要闭会时皮奈稍为拖延了一下,莫洛托夫就提出了不得破坏议事程序的质问。他说,我们既然尚未开始辩论第一项议题(这不是事实),因此谈不到公开或发表任何文件。我们对此一直争辩到下午七点三十分!当然,莫洛托夫的真正意图是要阻止我们公布文件,虽然大家都没有把这点说出来。但世界各国的新闻界人士早已应邀在各种记者招待会上听过对这些文件的说明。^①

第二次会议在次日(10月28日)下午四时开始,一直进行到下午七点十五分。我一开头便简短解释了我们的计划,并在结束时宣读了文件的全文。接着就是莫洛托夫的不妥协的演说。

在他念完那份事先准备好的发言后,他想当场回答我的几点问题。他的回答非常蹩脚。

福斯特·杜勒斯的答复是即席的,[而且]是十分得体。他的论点选得很好,而且讲得也漂亮。他的发言很短。皮奈[他去了巴黎之后又回来]以清晰的口齿宣读了[为他]写好的一篇讲稿。^②

644 那一天的全部情况就是这样,甚至最乐观的人也看不出有任何进展的迹象。第三次会议在10月29日三时举行。莫洛托夫担任主席,而且不出所料只是“走了过场”。我再一次设法阐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我们的立场是:德国应该自由——因为它有这个权利。这是在战争已过了十年之后任何国家都应该享有的权利。如果它在取得自由之后加入华沙条约,需要有额外保证的反而是我们。如果它守中立,那对俄国人的目前地位并没有额外风险,因为目前德国四分之三的人口和三分之二的地区已经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了。但是,为了在(德国)东区也

① 1955年10月27日。

② 1955年10月28日。

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如果俄国愿意使其得到自由的话)后补偿俄国,我们就(向它)提供这个保证条约。①

我认为莫洛托夫比以前在日内瓦会议或维也纳时更加衰老,也更缺乏自信了。我提醒他,正是俄国人在东德武装了十万人并提供坦克等等,而西德并未招募一兵一卒。这时他似乎有些震惊了。而杜勒斯则坚持我们的观点,认为德国的重新统一和安全是一个不可分的问题。俄国人什么时候能把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第一部分——这是各国政府首脑会议交给我们讨论的——的观点告诉我们呢?

当周末以后我们再开会时,第三项议题——即东西方“接触”问题——已进入讨论了,我们每人都作了简短的发言,并正式交换了文件。这项议题是易于进行的。在短暂休会之后,我们便回到了正题。莫洛托夫此时提出,应该邀请东西德政府双方首脑,即奥托·格罗提渥和阿登纳,参加会议。在杜勒斯以礼相待的主持下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莫洛托夫渐渐感到厌倦并放弃了他的建议。他已经作了表演,并且认为他可以结束这个事件了。然而,我们觉得应该给他一次教训。我们不能让他随意提出一个问题接着又随意避而不谈。因此,杜勒斯继续同他辩论,这使莫洛托夫大为吃惊和很不愉快。杜勒斯问他,虽然大会已决定不邀请东德政府,但是我们应该邀请西德政府。这是因为他们代表四分之三的德国人民,并且是自由选举出来的。他们现在也是受到在座全体国家所承认的。 645

莫洛托夫颇为激怒地回答说,东德政府和西德一样是自由选举出来的。②

我忍不住插话说:

① 1955年10月29日。

② 1955年10月31日。

“莫洛托夫先生说东德政府是通过自由选举选出来的。我记得他们是由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选票选举出来的。自从我第一次在我国参加竞选以来，已有三十二年了，在这段期间我参加了十次议会选举。我所能够说的是，任何人或任何政党，要是在自由选举中能够得到百分之九十九的选票，那他们决不是政治家——他们是活神仙。”^①

这番话自然引得美国人大笑，在法国人中间也引起一些斯文的笑意。

我也看到有些俄国人笑了起来，但马上又收起笑容，眼瞧着莫洛托夫和葛罗米柯，想要知道是否该笑。莫洛托夫岔开说：“麦克米伦先生老是喜欢讲些俏皮话。”这个问题也就不再谈下去了。^②

已经快到七点了，杜勒斯提议让莫洛托夫把他关于安全问题的补充建议拿出来传阅一下。但是他回答说，他倒情愿宣读，于是就开
646 始相当详细地读了起来。他的新安全条约稍为有点进步，因为它放弃了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要求。但是，它的缺点在于以德国永久分裂为基础。莫洛托夫宣读完毕后，他显然以为我们会要去吃饭而不进行辩论了；但是我不希望这个新倡议的概念占着世界舆论的阵地，在西德造成一个坏的印象。因此，我认为会议最好还是稍许延长。我欢迎这个新计划的某些方面。它的确考虑到了那项责成我们去寻求促进德国重新统一的办法的指令。

我于是接下去说：“在我国有一个在孩子们中间世代流传的奥谜，这个奥谜或许在俄国也流行，因此可以在我们之间形成一愉快的联系。这个奥谜是：

“先有蛋还是先有鸡？”

“这实际上是日内瓦夏季会议时摆在各国政府首脑面前的那个问题。哪一个先解决——德国重新统一还是欧洲安全？他们是怎样解决的呢？”

①② 1955年10月31日。

“他们解决的办法是，决计不管他们个人从逻辑上或政治上对轻重缓急的看法如何，这两口东西都必须一起吃下去，一起消化掉。

“遵照这些指示，西方国家提出了包括第一项议题中两个组成部分的建议。即使有了这些值得欢迎的关于安全问题的新建议，苏联政府还是没有尽了它们的责任，因为他们没有表示出对于德国重新统一问题的看法。西方国家已经提出了一幅完整的图景。苏联是不是也愿意这样做呢？因此，我必须再一次指出，苏联政府的新安全建议仍然是以德国的分裂为基础的。这是不符合我们那项指令的要求的。”^①

这时，我在关于会议情况写给丘吉尔的信中告诉他说，我并未放弃取得某些进展的希望，如果我们有足够耐心的话。但是，我的希望注定要落空了，因为随着时日的推移，会议开得越来越沉闷，越来越无所获了。我们集中力量试图迫使俄国人拿出一个对德国问题的计划来。我们的计划摊在会议桌上已经有六天了，实际上摆在世界人民的面前已经有二十个月之久了。他们终于在11月2日提出一个计划，但它只是建议由一个全德委员会来改组德国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而丝毫没有涉及（德国的）最后重新统一和自由选举问题。

互相宴请继续进行——照常要谈些诙谐打趣的话。例如，我⁶⁴⁷早已通知说我要回英国去一两天，莫洛托夫却在他做东道主的宴会结束时问我回去干什么？

我说：“参加下院的一次辩论。”他问：“辩论什么？”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这倒是你能给我帮大忙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关于麦克莱恩和伯吉斯的问题。你能告诉我他们在哪里吗？他以真诚的、或者是假装的一本正经的口吻说：“这是一桩需要调查的事件。”^②

直到11月5日我回伦敦时为止，这些日子每天开会三四小时。莫洛托夫也回莫斯科请示，盛传他将会带回某种新的计划。

^① 1955年10月31日。

^② 1955年11月2日。

到了11月8日，我回来参加当天下午的会议，而莫洛托夫从他同僚那里带来的消息马上就真相大白了。

〔他〕扔出了他的那颗炸弹——一篇非常有挑衅性、毫不妥协、比以前反而倒退的演说，满口什么垄断资本家和容克地主，一种断然的语调。他完全拒绝德国自由选举。他实际上是主张德国只能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和卫星的国家统一起来。^①

这对我们的希望是一个残酷的打击，但是，我们仍旧坚持。

皮奈伤心地往返奔波于日内瓦和巴黎之间，以谋支撑那几乎每天有倒台之虞的法国政府。但他忠心耿耿地尽了他的本分。我们与当时由冯·勃伦塔诺博士所代表的西德有着密切的接触，他开始力劝我们应“砰的一下子”中断会议，并宣布以后再也不开这样的会议了。

我请他对这点要特别谨慎地考虑。日内瓦会议如果在遇到这第一次严重障碍就从此告吹，那末，受谴责的将是西方盟国，而不是俄国人。联邦德国将会处于来自国内和莫斯科两方面更大的压力之下，被迫去与东德接触并达成协议。^②

648 于是，我们一致同意采取以坚定态度发言的方针，但不是以气愤的而是以伤心的情绪来讲话。总的说来，我们还是成功的。不幸，皮奈曾由于真的生了气而不自觉地发表了一篇冗长和有点夸张的演说，而被莫洛托夫巧妙地顶了回去。在有人动议停止讨论第一项议题时，他想法提出各种各样的、牵涉范围极广的不相干的问题。这真是一次精彩的表演。我忍不住对他说，象他这样一个成功的辩论家，真应该到自由议会的讲坛上去一显身手。

现在的问题只是，怎样和什么时候使会议结束。我们必须避免让俄国人把责任推到我们头上。我们同样必须避免给阿登纳和

① 1955年11月8日。

② 1955年11月9日。

他的伙伴们造成困难。

在快到会议最后阶段的时候，我幸而有机会同一位极为精明干练和精通俄国事务的瑞士外交官进行了交谈。他对苏联政策曾作过深刻的研究，他相信缓和从长期来看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俄国人早晚必定会把对中国的担心看得高于一切。他断言，“他们将努力与西方维持一个和平的局面，尤其是将努力与其他警惕中国潜在势力的亚洲各民族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在短时期内，他认为缓和政策对苏联制度有相当大的危险，因此他们将继续摇摆于温和和强硬路线之间。他似乎同样熟悉莫斯科的内部形势。尽管马林科夫已经降级，莫洛托夫的权势看来也江河日下，但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仍只稍占上风。关于德国问题，俄国人是有信心的。这位给我通消息的外交官

曾经听到一位级别很高的俄国政委说：“如果我们需要的话，我们能够使德国人永远离开西方怀抱。我们可以把东德奉送给他们。如果那还不够，我们可以把奥得—尼斯区奉送给他们。如果还达不到目的，我们可以同他们再一次瓜分波兰。”^①

同时，我的瑞士朋友认为缓和正在给我们这边带来坏的影响——或许比我们意识到的更坏。法国、西德和意大利的人民正在趋向 649 于中立主义。我们必须利用这次会议的结局和它的失败给他们敲敲警钟，让他能有一种现实感。

作为转移或许安抚西方世界对俄国人在德国重新统一和欧洲安全问题上不妥协态度的失望，莫洛托夫重新提出了裁军问题，并且推出了大部分仍是些陈词旧调的一份决议案。因此，我们不得不来对付这个问题，还要找出结束这次会议的最好的办法，因为莫洛托夫现在变得完全抱消极态度了，甚至在“接触”问题上也不例外。看来铁幕又要拉下来了。

^① 1955年11月11日。

11月15日下午，四国外长召开了一次限制性会议来讨论公报的措词。17日，我们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公报是简短而客观的，只谈到将来召开会议的问题要通过外交渠道来处理。

会议在下午六点三十分结束，在举行了通常的仪式之后，我们动身回到各自的首都。因此，这次外长会议在那年夏季唤起的殷切期望之后终于在幻灭感中结束了。然而，尽管正式会议是这样毫无结果，但在幕后却进行了一些有益的会谈。我自然地觉得苏联政府内部在一些观点和意志上是有分歧的。莫洛托夫起初似乎也拿不定该遵循哪条路线，只是在他去莫斯科回来之后，他才开始发出最不妥协和最激烈的恶骂。最后，他又比较温和一些。但是这种背离“日内瓦精神”的行动是令人沮丧的。

根据我的看法，苏联态度的改变有两个原因。第一，苏联当局发现了这样的事实，特别是在一些卫星国家里，比较自由的政策已经唤醒了势必难以控制的一些希望和舆论动向。第二，在苏联政府内部，支持斯大林政策的人们和赞成采用比较自由途径的人们之间，力量对比仍是摇摆不定的。我认为，俄国人既已在欧洲和远东(看来这也是适合他们的)造成一种僵持的局面，因而要把精力集中于中东。我们在欧洲的主要目标当前必须是保持西德舆论紧靠西方，因此，大力推行把德国军队包括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政策，是对我们有利的。俄国人表示，除非以保持共产党在东德的既得利益为条件，否则他们不同意德国统一。俄国人的这一错误战术却有助我们牢固地掌握住西德的舆论。

我向女王陛下和各英联邦成员国作了正式报告。有待答复的只是C·B·弗赖依先生的一个美妙的建议。我对这个建议作了下列的适当答复：

承来信建议教会俄国人玩板球一事，甚感。

我认为你的建议是使东西方进行接触的一种好形式，而鼓励这种接

原
书
缺
页

619--634

来总的说是我的同僚可以接受的。

正式开会的前两天，我与土耳其外交部长佐鲁的一次谈话至少是毫不含糊的。

〔土耳其〕决不会同意让塞浦路斯落入希腊之手。事实是，他们已经被希腊的各岛所包围；塞浦路斯是他们的后门，他们害怕希腊人迟早会变成“同路人”或共产主义者。^①

三国政府代表按期于8月29日在兰开斯特大厦以“东地中海和塞浦路斯会议”的名义正式开会。在安排仪式方面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主要的讨论是关于怎样应付报界和告知公众的问题。大家同意在前四天每天只发表最能抚慰人心的公报，而在会议结束时则应力求发表一项联合声明，以说明三国政府所持的主要立场。8月30日上午，我们开始了实际工作。

……我作了一个长篇大论的讲演，历时几达一小时，阐述了东地中海和塞浦路斯岛的整个军事、历史、经济和地理的综合情况。（除了没有向阿芙罗狄蒂^②献赞辞外什么都说到了。）^③

斯蒂芬奥波洛斯在回答中温和而巧妙地在他的立场进行了辩护。他要求（该岛）自治，但放弃了立即把塞浦路斯主权移交给希腊那种意义下的“意诺西斯”主张。他极力主张，在三年之内当有一个自由政府能自行抉择时，自决原则就应实行。他又说，应该为英国的基地和保护土耳其少数民族的利益作出一切必要的安排。这种态度，虽然包含有希腊人在适当的时候并吞塞浦路斯的意思，却表明稳健派在反对极端主义分子方面有了一定成功。

从根本上看，希腊世俗人士的分裂，是年老的希腊政客、文官和军人 669
（他们骄傲地回顾与英国的世代友谊）同那些正开始重温愚蠢扩张老梦

① 1955年8月27日。

② 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译者

③ 1955年8月30日。

的年轻人之间的分裂。他们是愚蠢的,因为,如果以七、八百万希腊人对抗两千万以上土耳其人,他们将会碰得头破血流。当然,教会人士是不知改悔的,并且是沙文主义的。这多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虽然有缺点,但是,历经四百年之久土耳其统治,(塞浦路斯)总督的教会统治仍然使希腊的民族观念以及希腊文化得以保留下来。①

第二天,佐鲁作了答复。他论证说,依照洛桑条约,塞浦路斯的主权应该保留给英国,要么就必须归还给土耳其。他声称,塞浦路斯的情况虽历经变迁,但其与小亚细亚大陆的历史关系却始终是不变的。

由于地理和战略方面的关系,凡据有安那托利亚半岛的,都要据有塞浦路斯。因为它是进入安那托利亚的后门。②

在私下交谈中,他暗示只要我们在主权问题上能够保证“停战五年”,我们就可以(在该岛)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他似乎对土希关系严重恶化的前景真正感到担心。

尽管进行了多次“咖啡馆闲谈”和共享盛宴,我并不认为很有希望。

土耳其人过于强硬,而希腊人又过于软弱,以致一方不肯而另一方不敢作出让步。因此可怜的老大英国将受到责难——并挨炸弹。③

尽管如此,在自治形式的问题上和对少数民族的保证问题上似乎是有了一些进展。因为土耳其开始在色雷斯方面提出反要求,进行大张旗鼓的威胁,这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670 9月3日,星期六那一天,斯蒂芬奥波洛斯先生偕同希腊大使及其随员一起到白桦林大厦和我共进午餐。英国驻雅典大使查尔斯·皮克爵士也和他们一起来了。这位部长情绪沮丧,但却口若悬河。

他把他的困难以及他那个国家所受的委屈倾诉了约半小时之久。

① 1955年8月31日。

②③ 1955年9月1日。

他解释了希腊政府内部的困难和倾轧。帕帕戈斯元帅身患重病，虽然现在可望康复，但他已不能处理政府日常公务，使事情很难办。国王不在国内，11月初以前不会回来。所有重担都落在他（斯蒂芬·奥波洛斯）的肩上。^①

我极力安慰他，答应在一、两天之内提出一些新意见。在这期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不要使会议破裂，让我们作出一点进展，使我们能保持在一起。他似乎松了一大口气，接着我们就谈了一些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扎马斯基诺斯大主教、共产主义等等比较轻松的话。但是我的印象是，希腊政府对他们所引起一切麻烦的后果忧心忡忡。他坦率地说，马卡里奥斯控制不住这场火，更不要说扑灭它了。

第二天，9月4日星期天，我设宴招待土耳其外交部长佐鲁和土耳其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努里·比尔吉。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大不相同——自负、固执而又顽强。他们请求我寸步不让。自治或许还能容忍，但决不能接受自决。此外，这不单单是把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居民移交给希腊人的问题，而且还会危及本土的安全。尽管如此，他们感到这次会谈使他们得到不少好处，使他们能把他们的观点公之于众，而这在以前是做得很差的。现在应有一个停歇的局面，然后或许能找到某种解决办法。我回答他时谈到我们自己的困难。且不说我们的行政人员和士兵在塞浦路斯所吃的苦头以及所遭受的重大伤亡，我们还得受世界舆论的谴责。

谈到这里我们决定提出自己的妥协方案。其概要如下：

671

我们建议采用一部自由的新宪章，以期在适应国际形势的战略要求下走向最大限度的国内自治。这部宪法应规定成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多数所组成的国民议会，并为讲土耳其语的少数民族在其中保留一定比例的席位。塞浦路斯政府的所有各部，除外交、

^① 1955年9月3日。

国防和社会安全三部应保留给总督外，应逐步移交给对国民议会负责的塞浦路斯籍部长。要保障公职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要有一定比例的部长职位留给土耳其居民。除按照其他殖民地逐步走上自治的通常模式所规定的那些宪法上的安排外，我们还提出了一项新建议。在承认三个代表团之间所存在的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我们提议在伦敦成立一个旨在帮助实施这部新宪法的三国专门委员会，来考虑如何给少数民族以必要的保证，并保护塞浦路斯公民在联合王国、希腊和土耳其境内的地位和权利。我们也建议由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政府委派代表常驻塞浦路斯，并特许其与总督直接联系。这个计划无论如何将会满足眼前的需要。虽然对于最终的解决办法也许还会有不同的意见，但各方在开始执行时应予以合作。在自治政府工作纳入正轨之后，应再召集全体会议对形势重新加以考虑。

虽然我认为这项成立三国委员会以及三国进行合作的建议，应能使通情达理的人感到满意，但我并不满怀成功的希望。因此还必须立即向岛上派遣大量增援部队。

正在这个时刻，问题发生了。一颗炸弹丢在萨罗尼加的土耳其领事馆，阿塔图尔克的住宅被炸毁。出于报复，在斯米尔纳和伊斯坦布尔出现了严重的反希腊的示威和许多暴动。警察似乎不能也许不愿进行干涉。

在私下和初步会谈中，我只是尽力说服希腊人和土耳其人注意我们的建议，并要求他们各自的政府予以答复。当全体会议开会时，我指出自决的论据不是一项能不分大小、位置、历史和战略意义而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的原则。我还得提醒会员们说，甚至有着七百万人民的奥地利也在最近刚刚签订的条约里明确否定了它有与德国合并或有“意诺西斯”的权利。幸而，希腊和土耳其双方回答的语气都使我能够说我可以等待他们政府的正式决定。同

时,我就宣布“休会”。

虽然结果令人失望,但是我认为进行这番努力还是应该的。

至少这证明塞浦路斯不是一个“殖民地”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国际问题。从来没人了解土耳其的立场。大多数英国人不看地图,很少人认识到塞浦路斯对我们和对土耳其的重要性。谁掌握了塞浦路斯,谁就能控制亚历山大港和土耳其的后门。①

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这次会议或许加剧了而不是缓和了紧张局势。在伊斯坦布尔和斯米尔纳的暴动,即使不是政府发动的,无疑也是为它所纵容的。这些暴动倒使得土耳其人暂时感到自愧。随着造成大量损害的耸人听闻的消息开始传来,希腊人谈起了要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是这点我不相信。

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不声不响地推行我们的计划。我们听(美国方面)说,虽然希腊将继续拒绝筹备塞浦路斯自治的“三国”委员会,但是他们还是准备同我们会谈的。我们可以在恰当的时候同意这一点,然后去征求土耳其的意见。这样“三国”计划将变成“的里雅斯特式”的谈判。②

673

英国报界的一般看法是,我们的计划是合理的,也是应该接受的。但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抨击这些新建议,该岛的局势日益紧张起来了。

幸而,由于杜勒斯决定帮我们忙,9月23日联合国以二十八票对二十二票,十票弃权决定不把塞浦路斯问题列入联合国议事日程。

陆军元帅哈丁爵士现在本着最高的爱国精神接受了该岛总督这一职位,于10月3日到达该岛,决心竭尽全力恢复秩序并达成某种解决办法。他是有决心和耐心来执行这项双重政策的。

① 1955年9月7日。

② 1955年9月14日。

陆军元帅随即开始同大主教进行协商，艾登似乎很想试用新方案来进行这些会谈。但是要想不削弱我们地位的新方案是不容易想出来的。整个10月和11月里我们一直在探索一种新的商谈基础。我随时用电报或信件通知杜勒斯。主要的困难之一是不不知道大主教和希腊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合谋的，在多大程度上是各自分别搞的。我不得不有时从伦敦、有时从巴黎、有时从日内瓦、也有时从巴格达来应付这种变化无常的局面。这整个事件使我想起了我们儿时玩的一种考验人耐心的玩具，几乎不可能同时把所有的球都打到各自的洞里去。人们或许能先说通土耳其人，然后再说通希腊人；但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却会突然跳出来。有时人们会说通另外几方面，但是决不会同时取得所有各方的同意。如果使土耳其人安心了，雅典人就会感到惊慌；如果雅典人有点安静下来，安卡拉人就会光火。如果碰巧雅典人和安卡拉人似乎是默从了，大主教又会闹起来。

674 我们明确答应给该岛以很大程度的自治，并要求人民以及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政府同我们合作。在这点上我们的措词是鲜明的、热情的。关于著名的民族自决问题，我们想出了如下的措辞：

英王陛下政府并不是主张民族自决原则决不能适用于塞浦路斯。他们的主张是：由于当前的战略形势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在东地中海的关系所产生的后果，在目前这是一项不切合实际的建议。^①

在争取促进立宪政治的计划方面，我们现在得到了美国的积极帮助，并且得到保证，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和外交部长斯皮罗斯·塞奥托基斯两人都会同意这种民族自决的方式，不过他们对大主教抱有怀疑，而且提出如何说服他接受的各种各样方法。但是我们都低估了或忘记了希腊僧俗人士都同样能以无穷的才智和巧妙手段在措词和定义上来拖延谈判。我年轻时在伊顿学校所受

^① 关于最后方案的全文，参看附录三。

教育的许多优点之一,就是对于早期使基督教会分裂的争议,以及文人学士(尤其是在有个人恩怨的时候)在投入这些争议时会作出多么夸张的荒谬言论,都能获得一些知识,所以我原应对此(希腊人的那套本领)更有所了解。

11月22日,马卡里奥斯突然中止谈判。希腊政府深为担心。同马卡里奥斯公开决裂似乎是吃不消的,特别是在希腊正进行选举的时候。我是在巴格达听到这个消息的,我同曼德勒斯(土耳其总理)和那个既无热情也无怨言地接受我们新公式的佐鲁(外交部长)有过一次谈话。他们两人对他们与希腊关系的恶化都表惋惜。

二十六年来工作被希腊政府所采用的“意诺西斯”和他们的激烈宣传摧毁无余了。^①

但是,这些土耳其部长因伊斯坦布尔的暴动搞得太过分,超过他们原先的要求,又怀疑我们获悉他们参与煽动的底细。也许正是这个缘故,使他们比平常收敛些。然而,他们的担心是真实的。如果不就某些问题取得协议,则两国的少数民族都会成为牺牲品。 675

在色雷斯的土耳其少数民族一直备受虐待。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居住在土耳其的富有而事业兴旺的希腊少数民族(大多数都在伊斯坦布尔),将无可避免地要大遭其殃。^②

鉴于塞浦路斯本身的情况,有必要接受总督所提出的紧急状态的建议。但是,尽管希腊政府和美国人企图向马卡里奥斯施加压力,他却依然举棋不定。鉴于下院的辩论日益逼近,显而易见,我们自己的公式到目前为止虽然一直在保密,现在却非公开不可了。

辩论在12月5日举行,经决定由我首先发言,由殖民大臣(伦诺克斯—博伊德)收场。我的发言很长,但是可以达到缓和气氛的目的。

^{①②} 1955年11月22日。

因为仍有解决希望，所以负责的议员不愿说出那些有伤感情的话。甚至詹姆斯·格里菲思……也不想抱过分不合作的态度。^①

在会议上，我们就自治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土耳其方面有一些保留意见，但是我们仍然全体通过了。

在自决问题上，不妨把那首古老的打油诗改一下，希腊人说，“今年”，或者无论如何，“在一两年内”，土耳其人说，“永不”，而我们说，“终有一天”。^②

（虽然我知道我在引起争端，因为有一位殖民部次官最近曾经说出“永不”这话；在答复一项补充质问时作出的这项声明，必须坚决予以收回，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辩论进行了一半的时候，社会主义者⁶⁷⁶决定不逼着要分组表决。但是辩论，天呀，是不能解决重大问题的。

当我见到希腊大使和土耳其大使时，我看出他们对我在下院的讲话或者对解决问题的公式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异议，这就使我放心了。但是希腊政府似乎一直患着一种精神瘫痪症，几天来，它除了继续诡辩并提出要求“进一步澄清”的新草案外，什么事都没有做。我在12月16日会见杜勒斯时，他也认为，只要稍加改动，希腊就会接受的。我终于在巴黎同意了塞奥托基斯的意见，应当让驻伦敦的希腊大使和哈罗德·卡奇亚爵士去讨论可能是有益的“澄清和解释”，但是我拒绝再作别的。

我在外交部任期的最后几天里，收到了一份来自雅典的电报，从电文中可以清楚看出，希腊政府还在犹豫不决。这份模棱两可的照会就此结束了我从这个痛苦的、纠缠不清的争端所取得的第一次经验。我在下院演讲的最后说了如下的话：

假若我们为了要迎合人们那种模糊不清的思想感情而作出撒手不管的姿态，倒很容易博得那种遇事不动脑筋的人们的同情甚至支持。但

① 1955年12月5日。

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5年12月5日。

是我必须告诫下院,要是我们这么作的话,那后果将会是严重的,甚至是灾难性的。我们势必要放弃不仅是对我们自己的,而且是对希腊和土耳其人民的责任。我确信,我们带给东地中海地区的将不是和平而是激烈的战争和敌对。这样,对那些把我们当作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和在中东保卫自由与民主的主要支柱来依靠的所有的民族,我们就没有尽到责任,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就是放弃我们的任务……^①

英国人的这个深刻责任感在今后若干年一直在指引着我们的行动。后来证明,在维护英国政府在这个基地上的战略利益以及——到目前为止——防止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直接冲突的同时,有可能给予塞浦路斯以完全的独立。塞浦路斯现在是英联邦的一个独立的自治成员国。尽管有冲突,有激烈的游击战,但是不论大主教还是希腊政府都还没有采取“意诺西斯”,即采取由希腊兼并塞浦路斯这一非常措施,这种措施,除非事先两国谈判成功,不然必定会引起土耳其方面的激烈反应。从1955年的事态中至少已经取得的这个教训,至今还记忆犹新。 677

关于联合国接纳新会员国和安理会选举新理事国的问题,虽与塞浦路斯纠纷迥然不同,却也是造成长期而烦人的争论的原因。把这段奇怪而混乱的事情原原本本记载下来也许是值得的。

五年来,因为苏联提出的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候选国在安理会中得不到必不可少的七票而一直陷入僵局。为了报复起见,凡是西方各国提出的建议,苏联人一律否决。意大利外交部长向我指出,意大利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候选国资格已被苏联否决了四次,如果再一次失败的话,意大利政府将感到失望并且它的地位将被削弱。这时候出现了一种新的想法,是否可能取得一项秘密妥协呢?但是盟国的看法是:每个候选国都应该按照它本身的情况来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5年12月15日。

考虑,而且在整个夏季期间这仍然是我们的主张。

8月初,必须在安理会选举土耳其的继任国了。在选举安理会继任理事国的问题上,有着某些一向被尊重的惯例。在安理会里有一个东欧的席位,也有一个英联邦的席位,我很盼望能保持这个传统。因此,我提出南斯拉夫作为东欧的候选国。苏联则为波兰力争。

因此,便产生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安理会的席位问题,一个是联合国本身的选举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杜勒斯承担了支持菲律宾的义务,但是我怀疑他会把这个观点坚持多久。然而,到了10月中旬,南斯拉夫和菲律宾的竞选看上去已经势均力敌,不分高低。美国开始对我们大施压力,要我们支持菲律宾;但我们以为权衡得失还是以支持南斯拉夫较为有利。在10月底的一次谈话中,杜勒斯争辩说,选举菲律宾的问题已经上升为美—苏的斗争问题。如果美国失败,美国的声望和威权也会相应受到损失。在8月间初步讨论时,他承认他把菲律宾的候选问题只不过作为一种姿态而已,此后则已发展到了他们真有被选上的机会。而且,由于现在苏联也支持南斯拉夫,它就不再当作是一个由各方妥协的候选国了。我则从总的世界事务来看仍然倾向于不放弃对南斯拉夫的支持而要鼓励它日益走上独立自主。

我不能同意撤回我们对南斯拉夫作为安理会候选理事国的支持而支持菲律宾。〔杜勒斯〕似乎并不过分地失望,因为我能提醒他说,我在信守他所同意的计划,而他却想变卦了。^①

但是杜勒斯在12月3日写信给我,进一步请求支持菲律宾,并威胁说,如果他们落选的话,他的委托人将准备支持希腊。他还说,有鉴于塞浦路斯的问题,我们也许准备改变我们的立场。我颇为讨厌他这种近似讹诈的企图,并且拒绝了他的建议。我坚持说,南

^① 1955年10月25日。

斯拉夫

确实据有关键地位,如果使他们抱敌对态度,那对我们两国来说,都会是一个大错。他们总是易于敏感的,一旦忘记了斗争的情况,我们很容易受到使他们丢面子的指责。^①

到了12月的最后几个星期,形势变得近于滑稽。在总共两个月的时间内,为了选举安理会的理事国进行了三十五次无结果的投票。因为就小国而论,选举后只有两年任期,联大主席智利的何塞·马萨博士提出了一个不逊于所罗门的意见。他建议两个候选国平分两年任期,每国任职一年。结果南斯拉夫在它于一年后退职这种非正式的谅解下当选。 679

这件事拖拉了大约四、五个月之久,其间函电交驰,会谈频繁,结果可以说是平分秋色,而稍稍有利于我们。

在接纳新会员国这个更大的问题上有着同样激烈的争论。9月中旬加拿大政府提出了一个据说是渊源于尼赫鲁的想法。那就是,所有十六项或十七项(若包括日本在内)申请应该全体通过,以求无需公开争论而达到目的。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自然意味着要支持若干强烈反对英国和英殖民帝国的国家加入。因此,我们仍然宁愿作某种程度的选择。何况,杜勒斯坚称美国决不投票赞同保加利亚、匈牙利或罗马尼亚,他们把这几国都看作只不过是在共产主义集团里的一些受庇护的国家而已。9月27日,四国外交部长在日内瓦讨论这个问题时,莫洛托夫为支持把十六个候选国全体接纳而极力辩护,认为这样就可以打破近年来的僵局。但是,会员候选国的数目现在不是十六个而是十八个了,名单上加上了日本和西班牙。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找我的同僚们商量,并给他们把种种困难的情况勾画出来。要是我们赞成全体接纳的办法,那就会有这样一种危险,即反殖民国家的投票将在以后引起麻烦。

^① 给福斯特·杜勒斯的信,1955年12月5日。

另一方面，如果西方列强除了偏见之外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反对它们，那就会使它们和它们的朋友越来越多地投到共产主义阵营中去。最后同意采纳大家的看法。避开苏联否决权的唯一希望是采取普遍性原则，大部分意见看来要尽量利用这原则。我同杜勒斯在第二次日内瓦外长会议结束前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我告诉他：

680 尽管我们不欢喜外蒙古、阿尔巴尼亚和其他一些国家，我们还是要承担投十八国票的义务（“普遍性”原则）。但是我们不能使锡兰、意大利等国失望。杜勒斯不能容忍外蒙古。法国将对每个候选国都投否决票，除非撤回关于阿尔及利亚的那项动议。^①

第二天杜勒斯告诉我，他已经同莫洛托夫谈了一次，莫洛托夫仍然突出坚持外蒙古问题。

得到其他二十七个国家支持的、主张十八个新会员国全体接纳的加拿大提案，在11月中旬正式提出来了。大会的一个特别政治委员会要求安理会同意这项建议；但是在苏联和国民党中国之间立刻演出一场互相使用否决权的闹剧，后者无疑是代表美国行事的。最后，在12月14日，达成了所谓的折衷方案。十六个国家被接纳，只有外蒙古和日本暂时排除在外。

大量的努力和无数次的讨价还价，导致那虽则无可避免却对我们不大有利的结果。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形，我认为或许我们当时太急于讨好我们自己的委托人了，以致为了帮助他们而太轻易地接纳了那些不合适的会员国。然而，有损于联合国权威的，并不是联合国大会接纳了越来越多的会员国，真正的错误是把安理会扩大到超出了主要大国的数目，而把安理会理事国限于几个主要大国原是联合国发起人的想法。这个事实以及把世界分成为敌对集团这一致命事实，破坏了对联合国原来的概念。只有依靠西方

^① 1955年11月12日。

和俄国之间的真正缓和，才能使安理会成为实现大国一致政策的有效工具。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一最终悲剧，无疑要靠核威慑力量才能防止。但是，在这种恐怖保护伞之下，许多小冲突将会继续使世界扰攘不宁，除非等到有一个真正的大国理事会能够重新维护它的权威。

另一件使人痛苦而涉及个人的麻烦事还要落在我头上。这就是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案件的另一个阶段。虽然这两个人在1951年5月25日就变节投到了苏联，但是直到1955年的最后几个月这件卑鄙的事故才再一次闹得满城风雨。

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这个在1954年4月在澳大利亚叛国的苏联特务，在《人民报》上连续发表了他的回忆录，他的第一篇揭发文章发表于1955年9月18日。这篇文章连同澳大利亚政府指派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在同月公布的报告书，再次引起一般公众对这整个事件的注意。

昨天登出了连载的第一部分。甚至比较体面的报刊也“大张旗鼓”地反对外交部。《快报》、《镜报》和《简报》是比较下流一帮报刊中带头喊得最凶的……当然，我们会由于这几年来对此事讳莫如深而受到抨击。^①

我一直很忙，以致对于这一似乎不可能也不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的事件注意得不太够。彼得罗夫的揭发，以及相继而来的报界的猛烈抨击，使我非得决定采取某些明确的方针不可。

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案件占了整整一个上午。这段肮脏事故竟被报界搞成为一件重大的丑闻。克罗斯曼在《镜报》上对我大肆攻击。^②

对这两个人的任命、使用甚或造成他们逃跑的环境，我是不该受责

① 1955年9月19日。

② 1955年9月20日。

备的。最好的办法似乎就是发表一份白皮书，把全部真相公布于众。9月23日白皮书及时发表了。^①与此同时，首相官邸也发布了一项表示政府愿为早日举行辩论提供机会的声明。幸运的是，哗众取宠的报界

搞得未免太过火了……人民越来越感到厌恶。我收到了一两封工党议员的信，敦促我要坚决抵制对外交部进行调查，〔这是〕赫伯特·莫里森现在已经公开提出的要求。^②

682 尽管如此，这件不幸的事却损害了一个大部的名誉，并且再次引起一般的安全问题。我们不仅已决定了我们辩论的方针，而且还尽了最大的努力防止这类灾难的重新发生。

艾登以他（在贝文进行改革以前和以后）对外交事务所独具的知识，给了我很多帮助。我给内阁同僚传阅了我的发言提纲以及处理意见。当然，对过去已发生的事进行令人心悦诚服的辩护是不容易的，然而我认为把在安全与自由两项原则相互矛盾形势下所产生的一些固有的困难摆出来，则应是可能的。

有待决定的主要问题是应否进行某种形式的调查。有些议员建议组织一个下院专案调查委员会，另一些议员则提议根据法庭条例进行调查。最后，在工党执政最后几个月中曾任外交大臣的莫里森要求对外交部和安全制度进行一次普遍调查。我强烈反对对过去的情况进行任何调查，这种调查只会引起许多传播丑事和造谣中伤之举。我的所有同僚也都有这种看法。真正的问题在于将来如何防止这类灾难。为了这个目的，对有机会接近机密资料的国家工作人员，在有关现行法律的范围内，就整个安全问题进行一次调查，是值得考虑的。因为真正的困难之处是，所有关于采取更严格防范措施的要求，事实上，都几乎等于是对英国传统自由

① 枢密院令，第9577号。

② 1955年10月1日。

的侵犯。这件事经过了详细讨论，当10月间我在日内瓦的时候，所采取的最后决定是反对在目前进行任何调查。

在11月7日举行辩论时，议员似乎分成两派，一派准备给行政部门以更加专擅的权力，另一派则宁可冒一些风险，而要保持英国法律制度与公平精神这种较古老的传统。我一开头就指出，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以及后来在希特勒同斯大林签订条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许多男男女女发现他们在思想信念上的拉力超过他们的爱国心。虽然就共产党来说，这个阶段由于德国进攻苏联而告终，但是当后来英国和苏联政府开始疏远的时候，忠诚问题的矛盾又产生了。 683

因而，在英国是可能找到这样一些人的，他们把别国的利益放在本国利益之上，而不惜犯可怕的叛国罪。这不仅见之于罪犯和堕落分子中间，而且也见之于那些在科学技术方面身居高位的人，见之于哲学和文学上有造诣的人。最后，见之于这次辩论对象的这两个在外交部工作的人。^①

我接着就清楚地表明，外交部方面的全部责任必须由那些在这整个期间主持外交部的人来承担。要把任何一个部抬高成为不受大臣们控制、不受整个议会权威支配的独立实体，这是十分错误的。出了差错，大臣们，也只有大臣们，应该承担责任。事情作对了，他们毕竟会毫不犹豫地去认功的。在当事的大臣中，欧内斯特·贝文和赫克托·麦克尼尔已经去世了。莫里森、艾登和我还健在，因此，我们必须各自分担自己的一份责任。

这番话起了预期的效果，使莫里森不再把这件事变为党派问题来搞。

在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问题之外，报界曾肆无忌惮地指责有一个所谓的“第三者”——据说是“金”·菲尔比。鉴于以后的发展，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5年11月7日。

把我当时所说的话记载下来是值得的。菲尔比被迫于1951年7月辞职：

自从那天以来，他的案子一直是严密调查的主题。还一直找不到任何证据，能够说明他负有向伯吉斯或麦克莱恩通风报信的责任，而在为政府服务期间，他工作得力又能尽忠。我没有理由断言菲尔比先生在任何时候有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或者把他看作是所谓的“第三者”，即使确实有这么一个人的话。^①

684 对下院向我提出的这一直截了当的问题，我如果作了任何其他答复，那将是十分错误的。既然没有任何现成的证据说明应对此人提出起诉，那我当然没有权利给这个人的品格抹黑。但正如众所周知，他后来却在外国全盘供认了。

在交待了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历史及其档案材料的处理经过之后，我提到了在贝文五年任期内对外交部所作的改革。

他无疑不是一个会受事物表面现象过分影响的人；他遇事穷究其底蕴。他不是特权的保护者，同时，也不会屈从于偏见。1943年法案所规定的方案正好轮到他去执行。如果他对此有所不满，我确信他在外交部五年任期内是会毫不犹豫地对此提出修正或更改的。事实上，他对外交工作的忠心耿耿和献身精神，使他的名字在外交部里永远为人们所尊敬和爱戴，这就是对他的充分奖励。^②

在我发言的结束语中，我尽情谈了一些总的感想，并提醒议员们说，我们现在所不得不面临的事，是我们任何人都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英格兰自从1688年以来，苏格兰自从1745年以来，再也没有真正发生过关于政权的性质问题的争论。虽然有过激烈的政治斗争，却不曾有过任何叛国的问题。

我们必须回溯到宗教战争时期，才能找到和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斗争相类似的种种例子，这种斗争把世界分裂开来，并在今后许多年还将继

^{①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5年11月7日。

续分裂下去。①

一个背叛父亲的儿子，或者一个告发自己孩子的父亲，或者一种把做间谍视为美德、把背叛视为职责的心理状态，对我们来说，简直是难以设想的。也许我们必须再研究一下伯利和沃尔辛厄姆这两位伊丽莎白时期的政治家所面临的问题，

当时正是特务组织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也是间谍活动与反间谍活动、⁶⁸⁵阴谋与反阴谋同国际政治分不开的时候。②

我们所必须考虑的是，法律给予我们的手段是否够用，我们是否应该要求新的权力。

这里，请允许我谈一谈对最近刊登在一家著名报纸上批评的感想。这个批评者问道：为什么没有阻止麦克莱恩太太离开英国。下面就是他所说的话，我引用原文如下：

“……政府当局说他们没有法律上的权力去制止她，没有这条法律。”

文章接下去说：

“难道他们不会找出一条法律来吗？”

这正是问题的中心。他们——那就是说，政府当局——连一条也找不出吗？希特勒当然会找出一条来的。墨索里尼也会找出一条，斯大林则已经有了那么一条。③

我们将来一定会尽力之所能来避免这类灾难——使它们不致发生，但是我担心这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在打算授与政府更大的权力之前，我请求我的议员同事们要慎重其事，要权衡一下利害轻重，如果我们在保卫自由的工作中反而破坏了自由，那的确将是一个悲剧。

莫里森在一席对外交部吹毛求疵、但毫无价值的发言中作了答复。他原谅了他自己，却含沙射影地责备贝文。他这番发言是

①②③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5年11月7日。

不受人欢迎的。在这之后，议员们似乎失去了兴趣，艾登很令人钦佩地结束了辩论，他建议就这整个问题同所有各党的主要枢密顾问官进行磋商，特别是关于法律现状以及必定要涉及的那些限制问题。

这件花费了过多时间的事件终于告一结束，令人如释重负。
686 整个说来，报界是帮忙的，这个国家的情绪已经渐渐不再支持那种比较强烈的要求——硬要在和平时期采取那些过去认为只在战时才有词可解的方法。

虽然这个问题暂时就这样解决了，但是根本的困难依然存在；而且，正如我在后来几年中发现的那样，要使各种类型的、在不同程度上接近重要机密的人们避免受到金钱或意识形态方面的诱惑，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其中有一些人，天呀，证明比伯吉斯或麦克莱恩的背叛所造成的后果还具有大得多的破坏性，从而使我们被迫采取更激烈的保卫措施。然而即使这样，大家仍倾向于这种意见：宁冒一定风险，而不愿采用为我们民族感情所厌恶的、与我们悠久传统相违背的方法。

第二十章 一项新的使命

687

首相盼望了一些时候的政府改组于12月21日正式宣布了。有些更动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所以，至少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使人深感惋惜的原因。我自童年时代就已相识的老友哈里·克鲁克香克即将辞去掌玺大臣和下院领袖的职务，以便让位于巴特勒。

他们想要他当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和上院领袖的“助手”。对一个担任了下院“领袖”五年之久的人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好主意。今天上午，他把一切都同我谈了，并且作出了他的最后决定……^①

哈里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有了什么过失而调职的。他早已证明自己是能干而足智多谋的，而且就大家记忆所及，他也是最善于处理议会事务的人。伍尔顿也要告退，而由塞尔扣克勋爵接任其公爵郡大臣的职位。我与伍尔顿相交虽较短，但同他亲密无间。我知道，我们会为失去他的明智的意见和忠心耿耿而感到多么痛心。伍尔顿急于要离职；然而艾登无疑会因这次人事变动而受到损失，尤其是因为他早已同保守党中最能干和头脑最灵敏的斯温顿勋爵分手了。另一个就是战前老友奥斯伯特·皮克也离开了我们。但是，这些最高部门的人事变动自然是最投时好的了。巴特勒就要放弃他掌管了四年之久的财政部，去接任克鲁克香克的下院领袖。我将继任巴特勒的（财政大臣），因此便要退出服务了为时仅九个月 688 的外交部。从前做过外交部国务大臣和现任国防大臣的塞尔温·劳埃德将要接替我的职位。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提议是在9月23日，即展开塞浦路斯问题

^① 1955年12月20日。

辩论后的次日。我当时正向艾登谈论这个岛屿的形势，并提议任命约翰·哈丁爵士为该岛总督。就在我要向他告辞的时候，首相就抛出了一枚炸弹。

他问我离开外交部到财政部去好不好？说实话，我多少有点犹疑不决。“什么时候？”“立即。”“拉布怎么办？”“他可以去做掌玺大臣和下院领袖。”“你同他谈过了吗？”“是的，昨晚谈的。他倒象是喜欢这个意见。”我们于是讨论了对拉布的地位以及对政府威信的影响问题。这岂不有点象自认失败吗？整个政府岂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吗？秋季预算怎么办？^①

艾登似急于要把这个问题迅速定下来，但是我说，我必须极其慎重地考虑一下。我不同意仓卒行事。就在当天晚些的时候，我同督导员帕特里克·巴肯-赫伯恩谈论了这件我所认为的惊奇的建议。他说，首相是在担心“经济战线”，并感觉到巴特勒在四年起伏不定的大量辛勤工作之后，已是疲惫不堪、情绪沮丧了。他个人还因丧偶而非常悲伤。我回答说，领导下院也不是一件闲差事。总之，我认为政治影响将会受到损害。我们只是在几个月之前靠了巴特勒的“要投资到成功的事业上去”这一胜利口号才赢得大选的。如果我们面前出现麻烦（看来大有可能），我们的确应该各守岗位而不要换防。不然，政府和巴特勒的声誉都会受到损害。计划的其余部分也随着摊出来了。艾登的老部下并深得他信任的塞尔温·劳埃德，将接替我。

689 我问，首相的目的是不是真要重新控制外交部。〔这位〕督导员认为并非如此。但是他〔艾登〕很喜欢并且也熟悉外事工作。他认为我是他能委之以财政、经济等等大权的唯一的人。最近几个星期使他对财政部的信任动摇了。^②

情况的确是如此，正象从萧条到复苏后所常常发生的那样，通

①② 1955年9月23日。

货膨胀的苗头已经开始出现了。除非采取坚定措施，不然情况可虞。在8月底，我应艾登之请，就这个问题替他准备了一份备忘录。我并不认为局面是不可救药的，于是提出了某些补救办法。我答应他的这个请求无疑是不明智的，但是我同意给他写备忘录是毫无私意的。几天之后，在8月26日，艾登、巴特勒和我共进午餐，我们一起研究了我为所准备的那份文件。

我觉得首相精神很好，但是巴特勒好象疲惫不堪，有点比平常更显得心不在焉。可是我不怀疑他将挺身迎接新的挑战。^①

我仍然认为采取某种行动是必要的。

经济和财政状况没有改善。8月份的出口上升得确实可观。但是进口则以更快的速度继续增长。我刚好才见到储备有所回升。在9月的前两周，我们又流失了将近一亿七千万美元。据说其中约有半数“游资”。议会越早召开、措施越快采取，情况就会越好。但愿我们不要再拖延上两周。可是，我仍然相信通货膨胀的程度还不至大到无法控制。^②

在8、9两个月间，内阁讨论这个问题的其他会议我当然都参加了。但是当艾登吐露了这个新计划的时候，对我是个毁灭性的打击。自从地中海战役期间我投身外交界以来^③，我把外交部看成是我最大的抱负。只要我能获得这个职位，干上三、四年，那我就可以愉快地告退。我从来就认为我们之中任何人对于公务生涯都不应恋栈过久，如果需要年青一代来替换，我们不应有任何抱怨。如果首相认为我在外交部的工作失败了，那我自然应该接受他的裁决。但是他显然没有这种看法。因此，我必须判断他的真正

① 1955年8月26日。

② 1955年9月14日。

③ 《战争风暴》，第189页及以下。

用意是什么，而我觉得这是不容易做到的。除了同督导员的那次谈话外，我没有向任何人提到此事，只有我的妻子除外。她力劝我至少要继续把手头的一些工作做完。我们对塞浦路斯的政策有待开展；还有日内瓦的外交部长级会议要开；其他许多极重要的问题也需要应付。如果我几个月后就要离开，那真会使人感到奇怪而又费解。我可不可以去对首相说我要仔细考虑一下，并希望在年底以前一定不要作出任何变动呢？我听从了她的这番劝告，当艾登在10月11日第二次同我谈到这个计划时，他也同意等等再说。

在此期间，巴特勒已于10月4日在银行家午宴上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我们正遭遇到“物价持续上涨而国内又无足够的限制措施”的后果。这种限制需要加强，而且他为此而提出的建议也需要在议会一开会就立即予以宣布。10月中，财政大臣的计划为他的全体同僚所接受；计划包括提出一项秋季预算，这在当时是一件异乎寻常的行动，一般地说这是会带来一次严重的危机。但是目前的困难，与过去诸如在1931年或1947年的那种轩然大波完全不同。所要做的事情只不过是稍许踩一下煞车而已。购买税的税率增加了五分之一，某些先前免税的货物现在要征税了。利润收入税的税率从百分之二十二点五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七点五。对地方政府贷款的数额将加以控制，财政部的房屋津贴，除了拆除贫民窟安置过剩人口的新房外，一律都要削减。电话费和房租都增加了。预料这一切措施全年可增收一亿一千二百五十万英镑。

这几个星期，我正在日内瓦，我注意到：

691 据英国报纸报道，反对党正在对这次预算进行无休止的吵闹。削减房屋津贴和控制地方政府借款的新措施看来使他们尤为恼火。但是他们这种愤慨好象是有点出于做作。^①

^① 1955年10月28日。

既想取得领导地位又确实希望避免“不茨克尔主义”^①这一污名的盖茨克尔，作了一次异乎寻常的激昂演说，不仅攻击所提的建议而且还攻击财政大臣的政治名誉。攻击的重点针对这一事实：在实行减轻所得税的4月预算提出才六个月之后，就提出这些新措施来了。当英国报纸送来的时候，我在日内瓦的别墅里阅读了这些报道。

……反对党工党正在自己造成一种激动的状态，攻击拉布，伤害他的“名誉”。但是我深信所有的人都会团结起来支持他的……^②

总而言之，艾登在讨论结束时抓住了辩论的要害。4月预算现在被工党说成是“竞选花招”，但在当时以及在选举期间却曾被斥为“掠夺穷人”的预算。这两种罪名是无法同时加在一个预算案头上的。

尽管巴特勒决心不论好歹都要挺身与经济危局进行搏斗，艾登还是开始催我作出答复。我随即请教伍尔顿。

我告诉他，我是多么喜欢外交部的。（在那里）我是比较有把握的，有一套得力的工作班子（我所信得过的人），而且工作对象是我能够懂得一些的。^③

但是，他认为我还是必须按照首相所要求的去作。

第二天，我需要去巴黎，我的妻子与我同行。我随身带着一封⁶⁹²已经写好准备寄给首相的信稿。我打算拖到明天再从大使馆将信发出。我曾与格威林·劳埃德·乔治商量过，我也接受了他的善意劝告。

① “盖茨克尔先生与巴特勒先生一样，是一位在著名公学受过教育的学院式的杰出人物，某个恶作剧的家伙在几年前曾经虚构一个名叫‘不茨克尔先生’的象征性人物，意思是说这两位政治家，虽然在下院坐在相互反对的席位上，但实际上在很多方面都是大同小异的。工党不希望由一位‘不茨克尔先生’来领导，（因而）盖茨克尔先生就出来表示一下并没有这样一位人物。”《记事年鉴》，1955年，第55页。

② 1955年10月30日。

③ 1955年10月21日。

他说写信列举“赞成”或“反对”的理由是无益的。唯一要做的事是我自己下定决心,并让首相知道我的决定和可能需要提出的一些条件。^①

经过仔细考虑后,我深为遗憾地于10月24日发出了我的信。
信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安东尼:

几星期以来我一直在考虑您提出的要我离开外交部去财政部的建议。

自然,我完全不想这样作,因为我喜欢外交部,喜欢这个工作和这里的人。它使我的宿愿得到实现。

由于您要我承担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我愿意从一开始就把某几点说清楚,这几点是要求作出一些使人伤脑筋的决定的。

1. 我也许要在组织体系上作出重大的变动。

2. 我也许要引进一些外界的顾问。

3. 英格兰银行的组织可能需要加以注意。

否则要我离开外交部去当一名正统派财政大臣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即使不是一个革命家,也必须多少是一个改革家。然而,要改革财政部就象企图去改革克里姆林宫或梵蒂冈一样。这些机构总是易于取得最后胜利的。

因此,我必须要求一定的条件,得不到这些条件而要我去试一下,是没有希望的。

1. 您的坚决支持,特别是在突破初期的麻烦上。

2. 一个不低于现任财政大臣在政府中所据有的地位。作为外交大臣,在首相您的领导之下,我是外交战线的首脑。作为财政大臣,我也应该是在您的领导之下的国内战线的无可争议的首脑。

如果拉布成为下院领袖和掌玺大臣,那很好。但是我不能同意他当副首相。(附带声明一下,宪法上并没有规定这个职位,它是丘吉尔为了适应完全例外的形势而捉摸出来的。)

^① 1955年10月23日。

您该能体会到，在内阁和白厅里有了一位极受尊敬的前财政大臣，这一切的后果只能意味着必定增加我的一些困难，不管他本心怎样想努力效忠于您。如果他再是一位副首相，那末，我的工作就无法做了。

3. 我希望兼顾到商务部。财政部和商务部应该是伙伴关系（就如同力求得到三十万幢房屋的住房部和工程部一样），否则事情就难办。

我认为最好还是直言不讳。如果您不同意，我将完全谅解。如果您同意，我愿意试试看。

您永久的朋友

哈罗德

我随函附上一封预先说明情况的信。

亲爱的安东尼：

这里是我的答复。我想最好能尽快送给您。在我回来参加关于麦克莱恩—伯吉斯一案的辩论的时候，我们或许能够进行讨论。

您永久的朋友

哈罗德

请不要担心，替我打印这封信的是多罗西。

凡知悉此后结果的人，看了这封信，自然会臆断我的行动多少是出于与巴特勒之间的个人竞争。情况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那时，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与我之间会存在有什么被选为首相继承人的问题。我没有理由猜测艾登将会在一年后病倒而不得不辞职。他比我年轻三岁，而且我对他将作为首相来完成这届议会并将在四年左右之后来领导保守党参加下一届选举，是没有理由表示怀疑的。我当时已六十一岁，可能到了下次举行选举的时候，就有六十五岁了。在做满了这任外交大臣之后，不管我们是否赢得下次选举，我将会非常愉快地退休，因为我已开始感到作过军人、出版商和政治家这种生涯的积极活动给我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压力所产生的某些后果了。我所关心的只是，如果我离开了在首相领导下

694

由我完全控制的外交部，我应该在新的岗位上享有同样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和权力。巴特勒已任财政大臣四年之久，作为下院领袖和掌玺大臣，他将处于完全有权的地位。只要我在我的管辖范围内没有受到挑战，我对此是不反对的。我不能同意他当副首相，部分是因为我觉得那会限制我的权力，部分是因为它确实超出了宪法的范围。到了艾登要退休的时候，比艾登年轻五岁并比我年轻八岁的巴特勒，将会是自然的继承人。

预算的提出，使得政府的人事调动只有等到议会的秋季会议结束后，才有可能进行。通过进一步交换信件，各项事情都友好地取得了一致意见。我对在首相缺席时由巴特勒主持内阁一点，撤消了我的反对，因为自艾登政府执政以来，一直就是这样作的。此外，我记起了丘吉尔的一句话——“为了提高你的尊严，你用不着死抱住尊严不放。”对于报刊新闻报道作了如下形式的指示：

巴特勒先生作为下院领袖将负责制定计划、完成政府立法程序和政府在议会里的其他一切事务。他将代表党的领袖负保守党中央事务所的政策指导之责。

麦克米伦先生作为财政大臣，除了监督财政政策外，将在首相的领导下担负起国内外经济政策各个方面的协调工作的全部责任。

在首相缺席时，巴特勒先生将一如既往继续主持内阁会议。

若不是出现了——在完全意外的情况下——要物色一位艾登的继承人的问题时又广泛流传起巴特勒和我之间有长期竞争的流言蜚语，这些细节本来没有什么记载的价值。

12月15日，人事调动正式宣布的前几天，《每日快报》和《每日电讯报》——只此两家——对于行将提出的人事调动发表了一份非常准确的预测，法国报纸也登载了我要离开外交部的消息。由于我当时正在巴黎美国大使馆赴宴，

我认为最好是（机密地）告诉福斯特。他大为苦恼。他想请总统就此事

打电话给安东尼！我听了颇为感动。^①

这种真诚的感动从罗杰·梅金斯^②（我们驻华盛顿的大使）12月22日写来的一封信中得到证实：

福斯特在国务院把我拉到一边，说他对这次人事调动深感苦恼，你们一直在一起工作得很好，这一切真令人遗憾。

当我回到大使馆时，我看见了你的电报，因此我又要求会见福斯特，把你的电报给了他，并按照你给我的电报中要我说的那样说了。

福斯特显然很受感动并且很高兴，在进一步表示了彼此之间的遗憾之后，我们分手了。

我担心我们也许暂时会在这里遇到一种几乎看不出来的僵硬态度，但是我们一定要在它可能出现之前就打破这种局面。

我的许多外国朋友，不论是政治家和外交家，都表示了同样的感情，我觉得这种感情不只是为了表示一下礼貌而已。格拉德温·杰布^③——我们当时驻巴黎的大使——也来了一封我特别珍视的信。除了表示他自己的遗憾外，他接着说：

我料想你能体会到你在整个外交界里是多么得人心的吧！不仅是那些高级官员推崇你才德出众，而且直到打字员和信差这类小人物，也都认为你是他们所知道的国务大臣中最为宽厚最能体谅别人的人。

当我后悔我所作的决定时那已经太晚了。我觉得我在国防部为时六个月以及在外交部为时九个月的这种经历是令人不能满意的。

当一个人正在熟习一项工作的时候，却要离开去作另一工作。以我 696 的年纪而论，要把思想转变到一套完全陌生的问题上去，那是很不容易的。^④

① 1955年12月15日。

② 后来的谢菲尔德勋爵。

③ 后来的格拉德温勋爵。

④ 1955年12月22日。

那末，艾登作出这样突然而大刀阔斧的人事调动的动机是什么，而我又为什么被他的论据所屈服呢？在随后几年里，我对这件事情当然还经常在考虑。要分析人们的动机并确切说出来总是困难的。经过深思之后，我觉得艾登是想由他自己或那些比他年轻和政治经验较少的人来更多地掌握外交事务。这并不是因为他想在外交政策的重大问题上承担比一个首相所应当承担的更大的责任。但是，他在外交事务上的渊博知识和他在外交部的长期经验，使他觉得他能够发挥一个首相通常所能发挥的影响，而又不把自己卷入任何冲突中去；这种冲突他曾尝够了滋味，先是同张伯伦，后来又同丘吉尔。曾经有过一些事情——都不特别重要——我们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并且我体会到，他不愿意象阿斯奎斯、鲍尔温或艾德礼这类首相所习以为常的那样，而是要牢牢掌握外交谈判的细节，我这种想法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倘若他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这种想法所支配，我完全相信他向我说明的理由是真摯的，也是确实的。他担心财政和经济事务，他在这方面的经验不多，没有具备他在外交领域内所具备的那种天赋理解力。他知道，不管政府的外交政策执行得多么好，他的政府的成功毕竟要依靠我们是否有闯过一连串的经济风暴的能力；经过两次大战我们原有力量遭到严重削弱之后，经济风暴看来是近代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了。他觉得巴特勒在四年勤劳不懈的工作之后，暂时已经无能为力，需要卸下他一直肩负的重担稍作休息。他认为在他的全体同僚中，
697 从我的全面的经历来看，我或许最能够担负起这个重任。在外交部，他欢喜有一个权力不太大的大臣；但是，在管理经济事务方面，他要有一位大臣可资依靠，能肩负起主要责任并相应地减轻他的忧虑。

我终于接受艾登建议，其动机是比较简单的。我对离开我一直喜欢的外交部确实感到不欢，我在那里可以会见许多国内外的朋

友并重温友情；那里的生活虽然辛苦但心情愉快，甚至在焦急的情况下往往也感到趣味盎然。因此，我起初很不愿意答应。但是我看出了艾登的困难，并认为我有责任尽我之所能去帮助他。我相信在政治上也象其他行业一样，应该采用一个简单的原则。如果一个人有强烈的正大光明的意见，他就应该毫不踌躇地直言无隐，绝对不可以为了猎取官职或晋级而不畅所欲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当我觉得自己与保守党领袖意见不一致时，我才多少有点自行其是地走我的独木桥。^①但撇开这样的理由不谈，当一个人拿不稳他是否应该为了他的朋友和同事们的公共利益去作人们要求他作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应该听从那些身秉大权的人的判断，因为这些人太抵最清楚什么最能帮助他们达到共同的目标。

我的妻子非常不高兴我所作的最后决定，尽管如此，她还是完全同意了我的这个公式。她为外交部的工作以及交给她的许多任务曾经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她在以后的几年里仍是这样干的。但是她本能地——因为她对公共事务有一种天赋的和祖传的精明——感觉到这次人事调动是一个错误。回顾此事，我深信她的意见是对的。

^① 《风云变幻》，第 335 页及以下。

附 录 一

哈罗德·麦克米伦在1949年9月5日欧洲
委员会大会上引用温斯顿·丘吉尔
1942年10月21日致安东尼·
艾登的备忘录摘要

我必须承认自己的思想主要放在欧洲——如何恢复作为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发源地的欧洲的光荣。如果俄国人的野蛮扼抑了欧洲古老国家的文化和独立，那将是一场不可估量的灾祸。尽管现在还很难说，但我深信欧洲大家庭将会在欧洲委员会这样组织的领导下统一行动。我期望将来出现一个欧洲合众国，使各国间的障碍大为减少，旅行不受限制。我希望有人来通盘研究欧洲经济问题。我希望看到一个可能由十个单位组成的委员会，其中包括先前那些大国〔和若干邦联——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多瑙河地区、巴尔干半岛地区等邦联——它们可以拥有一支国际警察部队，并负责使普鲁士处于解除武装的状态〕。^①当然，我们必须在许多方面，而且在那些极其重要的方面同美国人合作，但欧洲是我们首要关心所在，当瑞典人、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波兰人、捷克人和土耳其人都将碰到一些紧急问题、渴望我们援助并尽极大的能力去让人听见他们的呼声的时候〔我们确实不愿与俄国人和中国人完全隔绝〕，在这些问题上大有文章可作。不幸的是，我们的注意力应优先放在战争问题上。

① 在欧洲委员会上引用这份备忘录时把方括号内的两节话省略了。

附录二

702

1955年5月西方三盟国向苏联政府 发出的邀请

法国、英国和美国政府相信，现在是为解决我们所遇到的各项重大问题来作出新的努力的时候了。因此，我们邀请苏联政府共同努力消除我们之间的冲突的根源。

我们承认，解决这些问题将需要时间和耐心。单是一次会议和抱轻率的态度是不会解决问题的。的确，任何这样的做法都会妨碍解决问题的真正进展。所以，我们认为，试行一种新程序来处理这些问题将是有益的。鉴于问题的复杂和重要，我们建议将这些问题分两个阶段来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先开一次有外交部长陪同的政府首脑会议来交换意见，将会是有效的。在政府首脑会晤的这段有限的时间内，他们不会对世界面临的重大困难问题作出实质性的意见一致的解答。但是，这样一次会晤能够提供新的动力，为将来需要讨论的细节工作打下基础。

为了这一目的，政府首脑可以集中精力系统地提出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商定探讨问题的解决方案时所应遵循的方法。

我们进一步建议，为了协助政府首脑进行工作，各国外交部长（和大臣）应该在政府首脑开会之前不久，先到同一地点会合。上面所说的第一阶段将会为第二阶段工作奠定基础，在第二阶段内，按照所争论的问题的性质，由那些似乎是最有成效的方法、机构和参加者来详细检查这些问题。这一工作，在政府首脑开会之后，一旦可以实行，就应立即着手进行。这种工作程序将有助于使基本准备工作和有秩序的谈判按照渐进的阶段进行，最易于达成协议。重要的是，要迅速开始这项进程，并且要有进行下去的耐心和决心。

我们希望这个建议将使苏联满意，而把它当作发展我们之间更好关系的一个有益的基础。如果苏联同意最近召开一次政府首脑会议来探索这样的方案是有益的话，那末，我们就建议我们的外交部长通过外交渠道或其他方法，为这样一次会议确定时间和地点。不久就要在维也纳为了签订奥地利国

703

家条约而召开的外交部长级会议，也许能为初步讨论这个建议提供一次机会。

1955年5月

附录三

1955年11月提交希腊和土耳其与马卡里奥斯 大主教的有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公式

女王陛下政府坚决遵守在它们所签署的联合国宪章、波多马克宪章和太平洋宪章中所体现的原则。因此，说民族自决原则决不适用于塞浦路斯，这不是它们的主张。它们的主张是，由于既考虑到目前的战略形势又考虑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在东地中海的关系的后果，民族自决原则，现在还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因此，它们不得限于指出，任何最后解决办法必须保障联合王国和它的盟国的战略利益。

女王陛下政府现在已经提出了一个广泛的自治方案。如果塞浦路斯人民愿意参加宪政的开展工作，女王陛下政府打算在以防卫东地中海的有关国家所参加的条约和联盟的范畴之内，为能得到一个满足塞浦路斯人民愿望的解决办法而尽力。在自治被证明是一个可以实行的建议并能够保卫这个共同体内所有各个方面的利益的时候，女王陛下政府将准备与塞浦路斯人民的代表讨论该岛的前途。

封面
目录
正文